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前言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由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它们分别创建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湘鄂西、湘赣、湘鄂赣和中央革命根据地。

红二军团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其基础系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开始后，在湘鄂西地区武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各支革命武装。红六军团是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它主要是由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率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主力挺进赣南、闽西时，留在湘赣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赤卫队和湘鄂赣地区的部分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当地人民群众一道，进行创建和坚持湘鄂西、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由于党的“左”倾路线，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根据地和红军都遭到严重的挫折。一九三四年，红二军团转移至黔东，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同年十月，红六军团奉命执行长征先遣队任务，由湘赣到达黔东，会合红二军团。接着，两个军团在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下，由黔东向湘、鄂两省发展，策应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恢复并扩大了原来湘鄂边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两个军团离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一起长征。一九三六年六月，进到西康境内，会合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同年七月，在甘孜地区，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尔后，同红四方面军一起继续北上，与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完成了伟大的长征，进入抗日战争的准备阶段。这部战史所叙述的就是红二方面军上述历史发展过程的基本情况。

为了便于反映红二方面军所属部队及其前身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发展、壮大和斗争的主要情况和特点，战史分为三个部分，即红二军团暨湘鄂西、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红六军团坚持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向黔东转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红二方面军长征。红三十二军原为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是中央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的一部分，其编入红二方面军以前的革命斗争史未收入本战史。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

第一部分

红二军团暨湘鄂西、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先后创建了十几个革命根据地。其中，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主要是：中央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建这三大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后来称为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军团。

党在湘鄂西地区创建红军和根据地始于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中共湖南、湖北省委在组织秋收暴动时将两省划为十个特区，分别建立了党的特别委员会。在今京广铁路以西的是湖南的湘西特区和湖北的鄂北、鄂中、鄂西特区。湘西特区辖常德、桃源、汉寿、慈利、石门、澧县、临澧、安乡、南县、华容、淑浦、麻阳、沅江、辰谿等十四县，鄂北特区辖枣阳、随县、钟祥、襄阳、宜城、光化、谷城、保康、房县、均县、南漳、郧县、竹山、竹谿等十四县，鄂中特区辖沔阳、监利、潜江、天门、汉川、京山、应城等七县，鄂西特区辖江陵、石首、荆门、当阳、远安、松滋、枝江、宜都、宜昌、长阳、五峰、秭归、巴东、兴山、建始、鹤峰、恩施、宣恩、利川、咸丰、来凤等二十一县，总共五十六个县。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后在湘鄂西特委、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所及地区，大体包括湖南、湖北两省所属的京广铁路以西、洞庭湖——沅江——西水以北的区域，与上述区域不尽一致。在这个区域内建立的湘鄂边、洪湖、巴兴归、襄枣宜、鄂西北革命根据地，及其他小的游击根据地，综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这个区域内建立的红军，有湘鄂边的红四军（后称红二军）、洪湖的红六军、巴兴归的红四十九师、襄枣宜的红二十六师、鄂西北的红二十五师，以及其他游击武装。红二军团起初由红二、红六军组成，以后又编入了其他一些人数较少的武装部队。一九三一年春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

湘鄂西的革命人民，在土地革命战争中，高举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旗帜，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取得了辉煌成就，也遭受过严重挫折。这一过程概括起来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三一年七月，为红军和根据地创立阶段；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一九三二年春，为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壮大阶段；一九三二年春至一九三四年六月为红军和根据地遭受严重挫折阶段。

在湘鄂西的斗争失败后，一九三四年六月红三军转战至黔东，创立了黔东苏区，同年十月与红六军团会师，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进入了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另一斗争阶段。

湘鄂边革命根据地指以桑植、石门、鹤峰等县为中心的根据地。洪湖革命根据地指以沔阳、监利、华容、石首、江陵、潜江等县为中心的根据地。巴兴归革命根据地指在巴东、兴山、秭归边界地区建立的根据地。襄枣宜革命根据地指在襄阳、枣阳、宜城建立的根据地，1932年初正式划归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鄂西北革命根据地指以房县为中心的根据地。

第一章

湘鄂西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创建

第一节大革命失败前后湘鄂西地区的革命形势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北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最强的省份之一。一九二七年六月以前全省有共产党员一万四千余人。在中共长江局和湖北省委领导下，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全省系统地组织了县、区、乡农民协会的县份有四十九个，有农民协会会员二百八十四万余人，负责农民运动的干部有四百四十余人，农民协会特派员有一百三十余人，有枪二千余支，有的县达三百支，少者亦有二三十支。其中鄂西特委所属的洪湖周围几个县及鄂中地区农运发展比较普遍，仅汉川、沔阳、京山、天门、石首、公安、监利、荆门、当阳九县，就有农协会会员六十余万人，约为全省农协会会员的四分之一。这里所以能够执行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关于举行暴动的指示，并在此后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军，创建苏区，是与农民协会力量强大分不开的。

一九二七年六月以前，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已经背叛革命，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武汉政府尚未公开反共，广东及湖南的革命运动遭到残酷镇压，一片白色恐怖。中共中央机关大多转移到武汉地区。国共合作时在广东的黄埔军校在武汉成立了分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也移至武汉，这对湖北革命运动有相当影响。湘鄂西地区的进步青年不少人在那里受到了革命教育。因此，湖北省及武汉三镇成为当时革命力量比较集中的地区。一九二七年七月，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九月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领导及党和军队中的许多同志去南昌组织武装暴动，一部分去了上海等地，但是，相当数量的在党、政、军和工运、农运领导机关的党员和黄埔军校分校、农民运动讲习所、武汉工人纠察队中的党员留在了湖北。这一大批骨干力量，参加或组织领导了湖北省内各县的秋收暴动及其他革命运动。湖北省委能够依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组织群众向蒋介石反动派进行有力反击，主要是因为具备了上述有利条件，特别是有党员多、骨干多这个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宁、汉合流后，在湖北虽然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湘、鄂、川、粤各系及北洋军阀部队交错占据湖北各地，反革命军事力量还是很强的。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初，李宗仁与唐生智之间的军阀战争波及鄂、湘、皖数省，在湖北造成了极混乱的局面。战后，桂系部队控制了湖北大部，众多土匪、散兵和民团武装盘据各地，他们极其残酷地“清共”、镇压农民协会，致使湖北党的组织和工运、农运受到了严重摧残。但是，由于各派系军阀与蒋介石嫡系部队多有矛盾，军阀之间、团防之间也常有摩擦，因而对我党开展武装斗争也有一定有利条件。

湖北地处长江中游交通要冲，鄂西、鄂中所属的邻近长江、汉水的县份，以及紧邻的湘北华容、南县一带，即后来成为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区域，地位尤为重要。它挟襄水，扼长江，胁武汉，控宜沙，繁荣富庶，湖港河汉纵横交错，水路交通便利。虽不似井冈山地区边界多山，易守难攻，不利于敌人

的“围剿”，有利于保存革命力量，然而，党组织和农协力量较强，人口众多，群众条件好，水生植物便于隐蔽，物资丰富又为开展游击战争带来便利条件。

而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界地区，无论是社会情况还是经济和自然地理条件，都与洪湖地区大不相同。它地处偏僻山区，交通不便，文化及商业很不发达，贫富悬殊，民性强悍、淳朴诚实，封建习俗甚浓，群众慍悍善斗。所以，历史上多有反封建王朝的起义军产生，也多有铤而走险的“棒老二”土匪武装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湘鄂边地区，进可东出湘鄂平原、西入川黔边境，退可守武陵山区，地势有利，但地瘠民贫，多山多险，一旦革命武装发展成一支人数众多的力量，不积极向外发展则会因供应问题解决不了而陷于严重困难境地。

该地反动统治阶级的正规部队较少，地主豪绅大都拥有武装，团防较多，他们互有矛盾，互不协调，加之多有土匪、“神兵”等各自为政的武装，相互关系错综复杂。

而大革命的影响在湘西北地区，特别是在桑植、大庸、永顺及湖北鹤峰一带远不如湘中、鄂中地区。大革命失败后，石门、长阳地区在两湖省委组织秋收暴动时曾有过颇具声势的暴动。但是，桑、鹤一带却少有党的组织，秋收暴动的影响也极少波及到那里，一般农民群众对党的认识模糊，对土地革命更是了解不多。一九二七年，曾一度有过农民运动，桑植县内建立过农民协会，但未得到较大的发展。

在那个地区，贺龙个人威望很高。贺龙是湖南桑植县人，年轻时即组织武装，维护乡里。辛亥革命以后及北伐战争时期，担任过澧州镇守使、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独立第十五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他拥护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之后，他参加南昌起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所领导的第二十军在潮汕失败后有部分人员潜返桑植一带，人枪齐全，成为几支独立的武装。这些武装和他们的指挥员崇拜、信任贺龙。那一带也有一些土著武装坚决反共反对贺龙，但又对贺龙心怀畏惧。因此，贺龙在那一地区的威望是创建红军、开辟根据地的一个特殊的有利因素。

湘鄂西其他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虽不及洪湖周围地区和湘鄂边界地区优越，但从总体上看，湘鄂西地区是具备进行暴动，开展武装斗争，创建红军和根据地的许多有利条件的。

第二节秋收起义和年关暴动 红色游击队的诞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叛变和共产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领导而失败了，湘鄂西工农群众运动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许多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惨遭杀害，革命形势十分危急。但是革命斗争并未因此而终止，农村中保留下来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由公开转为秘密活动。城市里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也逐步转到了农村。他们密切结合起来，顽强地领导着革命群众，坚持斗争。

中国共产党为挽救中国革命，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且号召农民举行秋收起义。

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中共湖南、湖北省委制定了两湖暴动计划，确定以农民起义为中心，组织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

为了准备暴动，湘鄂西地区的特委在工作基础较好的县，大力恢复、整理了当地的党和革命群众组织；在党员和革命群众中传达了省委的暴动计划，进行了武装起义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组织精干人员成立暴动队或游击队，收集和添购枪支弹药；同时，加强了瓦解敌军的工作。

由于敌人疯狂实行白色恐怖，有些县的党组织遭受敌人破坏，难以及时恢复，因而湘鄂西各特区的暴动没有按预定计划同时发动而是陆续举行的。从一九二七年九月开始，有近二十个县先后暴动，持续时间达半年之久，中间经历了秋收起义和旧历年关暴动两个高潮。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日，中共鄂中特委和沔阳县委组织少数秘密武装配合农民，在沔阳南部的戴家场，捕杀了罪大恶极的土豪。接着沔阳东部、沔阳西部和沔阳、监利交界地区也掀起了暴动。暴动群众成批地处决豪绅、恶霸和反动官吏，分配他们的财产，焚毁田契，群众组织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党的秘密武装也迅速扩大，建立了游击队。在沔西的段家湾、新沟坝、拖船埠一带形成了一个斗争比较深入、群众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十一月下旬，游击队以一部潜入沔阳县城，一部在城外发动手持刀矛的农民，里应外合，攻克了县城，消灭了团防，镇压了反动县长和一些土豪劣绅，并从监狱中救出了沔阳县委书记姜敏修等数十人。随后，游击队撤离县城转到沔西地区，在当地起义农民和敌军工作者的配合下，袭击了监利县的新沟嘴，全歼当地团防，缴枪六十余支。此时，游击队扩大到二百余人，有枪八十余支，成为鄂中特委领导的主要武装力量。

九月，公安县委杨永祥、樊学赐领导的农民武装及部分团防武装，以及由澧州来到公安的邹资生领导的农民武装，会同县属六、七两区的三百余名农协会会员发动了武装暴动。九月下旬袭击了江陵商业要镇弥陀寺，消灭团防一部，将缴获的大量财物分给贫苦农民。接着又占领了公安县城及其周围的广大乡村，展开了抗租、抗粮和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的群众斗争。驻守沙市的国民党军第二军鲁涤平部不敢贸然行动，直至李、唐军阀战争结束，桂系军阀控制了局势后，才于一九二七年底开始进攻。面对强敌进犯，暴动武装退出了县城，在以陈祠桥为中心的六、七两区，依靠有利的群众和地形条件继续坚持斗争。这支武装以后编成了鄂西特委领导的游击队。

除沔阳和公安暴动外，秋收起义期间，相继举行暴动的还有华容、石首、

当阳、荆门、枣阳、天门、汉川等县。在这些暴动中，又组成了几支人数较少的游击队，如李兆龙、吴仙洲领导的石首中心县委的游击队，程克纯领导的枣阳游击队等等。

在秋收起义快要结束的时候，两湖省委又于一九二八年初组织了年关暴动。咸丰、宣恩、慈利、石门、长阳、松滋、江陵、石首、南县、华容、监利等县，都发动了不同规模的群众斗争，其中监利、华容、石首一带的暴动，由于有周逸群、贺龙参加领导，取得了较大的胜利。

南昌暴动失败后，周逸群、贺龙转到了上海，中共中央决定由他们组成湘西北特委，去湘西北地区组织工农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二八年一月下旬，周、贺等路过监利县境首先找到了由贺龙的堂弟、原南昌起义时第二十军的师长、共产党员贺锦斋领导的一支游击队，随后又与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取得了联系，决定参加他们正在组织的年关暴动，集中几支游击队，给反动派以有力的打击。一月底，吴仙洲领导的石首游击队和肖仁谷领导的鄂中游击队，先后同贺锦斋领导的游击队在监利的下车湾会合。这三支游击队共有五百余人、三百多支枪，编成三个大队，打起了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周逸群、贺龙的领导下，经过十多天的连续战斗，攻克了上车湾、朱河、砖桥、长岗庙、调弦口等市镇，消灭了多股团防和土匪武装，缴枪百余支，并镇压了一批土豪劣绅，有力地配合了南县、华容、石首、江陵、公安、监利、沔阳等县的暴动。在这些暴动中又组成了以陈香波领导的江陵游击队和屈阳春领导的另一支石首游击队。二月中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进攻监利县城，因为守军在革命军进攻前夕突然增加了兵力，未能攻克。

攻打监利县城失利后，周逸群、贺龙召集有关领导人在石首县焦山河举行会议，研究继续暴动的问题。会上，对于行动方针是上山（去湘鄂边）还是下湖（留在洪湖地区）有不同意见。有人提出周逸群、贺龙等宜留在鄂西坚持斗争。各路游击武装多系本县农民组成，一些人不愿远离乡土，加之集中起来攻打监利没有得手，一些游击队领导也主张分散回本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周、贺在上海时，中央曾明确指示组成湘西北特委到湘鄂边开辟工作。指出在鄂西（指洪湖地区）建碉堡、搞寨子的办法行不通，不如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有鉴于此，会议决定把所有部队交给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周、贺等十余同志前往湘西北完成中央赋予的任务，在湘西北地区组织武装，展开暴动。

湘鄂西地区持续了半年的武装暴动，给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以有力反击，坚定了群众的革命意志，鼓舞了他们的斗争精神，有些县的党和群众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开辟了几块群众工作基础较好的区域，建立了几支游击队，取得了武装斗争的初步经验，为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工农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然而，由于当时湘鄂西地区的党组织还缺乏斗争经验，由于党员和群众对敌人的疯狂屠杀怀有急切的复仇情绪，在暴动后期又受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因而，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是：没有很好地根据各地敌我力量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方法，在一些党和群众工作基础比较薄弱的县份，也冒险发起暴动，使得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一点革命力量，遭到敌人的摧残；在暴动中采取了一些过“左”的作法，忽视分化敌人、争取中间阶层的工作，对土豪劣绅、地主及其家属杀戮过多，对其房屋烧毁过

多，波及某些农民的生命财产，因而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有些县份没有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相应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扩大游击区，使游击队难以得到广阔的回旋空间与有力的群众支持；加之革命武装还不会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以致当敌人大举反扑时，往往应付不当，遭受损失。

第三节红四军及湘鄂边苏区的创建

红四军诞生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周逸群、贺龙、贺锦斋和石首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李良耀等十余人离开石首，三月上旬到达了贺龙的故乡湘西北桑植县洪家关。

周逸群、贺龙等来到桑植洪家关时，正逢贺家的亲友旧部领导的武装发生冲突。贺龙当即予以制止，向他们晓以大义，并依照当时的情况，在保持各自的人枪、编制的条件下，把他们组合了起来。

到了三月下旬，由贺龙出面在桑植组织的武装已有十数支，分别由王炳南、刘玉阶、李云清、钟慎吾、谷志龙等及贺龙的大姐贺英领导，共三千余人。他们打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进占桑植县城，组成了中共桑植县委，以李良耀为书记，并着手建立革命政权，发动群众，打击土豪，整顿思想，改编部队。

正当这些工作紧张进行之际，敌人的进攻开始了。

四月初，国民党黔军第四十三军第三师第五旅龙毓仁部侵占桑植县城和洪家关一带。在敌人进攻面前，工农革命军由于刚刚集中未及整理，加之贺龙为搞粮食、经费去了走马坪，部队缺乏统一指挥，在犁树垭、洪家关、苦竹坪等地战斗失利，部队溃散，贺龙和周逸群也失去联系。周逸群转往鄂西的石首地区。贺龙则在桑植、鹤峰两县边境的红土坪一带，收集失散的部队，到五月初，集合了三四百人，在桑植、鹤峰边界活动。与龙毓仁部作战失利的根本原因是，革命军名曰革命，其成员大多对革命并没有认识，部队中没有建立党的组织。这支队伍不是具备了一定觉悟的人们在斗争中组成的，而是在个人号召下，由家属、亲友、旧部仓促组合，互不协调。这样的十几股旧式武装刚刚组合到一起，能与敌正规军交锋，且能于失败后陆续会合起来，已属不易了。

六月，黔军从桑植西撤，贺龙率部在小埠头伏击其后尾李孝渊部，歼敌一连，毙龙旅参谋长，缴获弹药物资一部，复占洪家关。此时，在四月被打散的部队又陆续回来一些，并有贺龙的旧部文南浦等率队参加，工农革命军又扩大到一千五百余人。七月初，桑植民团总指挥陈策勋率部进袭洪家关，工农革命军未能击退敌人，撤至乐育。这时，中共湘西特委代表陈协平到达，带来湖南省委指示：湘西北特区并入湘西特区，湘西北特委撤销；在红军中成立党的湘西前敌委员会，以领导红军及红军所在地区地方党的工作。前敌委员会由贺龙、陈协平、李良耀、贺锦斋、张一鸣等组成，贺龙任书记。同时，将部队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黄鳌任参谋长。下属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张一鸣，约七八百人，是红四军主力。此外，还有文南浦、贺桂如、贺佩卿等率领的几个支队、大队，约七百人。全军共一千五百人。在这一时期，湘西、鄂西党的一些领导同志陆续来到红四军工作，如临澧县委书记汪毅夫、慈利县委书记邓侠清、湘西特委宣传部长陈协平、湘西特委委员张一鸣等。他们的到来，对红四军的建设及尔后创建和发展苏区，都起到了核心领导作用。

红四军的组成，使部队在组织编制和领导指挥上得到了统一。但是，部队成分比较复杂，思想也比较混乱，不少人对革命认识不清，对党的一些政

策有不满情绪，有些人存在着升官发财、坐山为王等错误思想。即使是曾参加南昌起义并担任过第二十军师长的共产党员贺锦斋，在认识上也有模糊之处，甚至撕标语，讲一些违背当时党的政策的话。为此前委曾严肃地对他进行了批评，并给以党纪处分，用以教育本人及部队。经过批评教育，贺锦斋认识了错误，并作了深刻检查，对部队的思想整顿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编组红四军的同时，前委决定：“（1）原有的部队必须渐进的予以彻底改造，故加紧下级干部和士兵训练工作，同时吸收进步的士兵为党的中坚分子；（2）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掀起广大的农民起来斗争。”

正当前委对红四军进行整顿的时候，接到湖南省委及湘西特委要红四军到石门县活动，配合石门、临澧、澧县、常德、桃源地区的斗争，特别是支持石门南乡的暴动的指示。前委遵命率全军于八月二十五日进抵石门北乡磨岗隘，会见了石门县党的负责人曾庆轩、覃甦、吴协仲、郭天民等。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石门就有党的组织并领导工会、农民协会开展革命活动，曾组织过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石门年关暴动。“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湖南、湖北举行秋收暴动，在曾庆轩、袁任远等领导下建立了有二百余人枪的湘西工农红军第四支队，组织群众武装近千人，以太浮山为根据地，在石门、临澧、桃源、常德之间的边界地区实行武装割据，一度形成较大声势。但在国民党第十四军陈嘉佑部三四个团及临澧、石门、慈利、桃源四县团防合力“清剿”下，伤亡极大，七月间遭到失败，石门党组织也受到严重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前委决定先在石门北乡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农民暴动，并在磨岗隘、溁阳一带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而联合附近各县革命力量，夺取石门政权，向常德、桃源发展。

这个决定是以湘西特委、石门县委所介绍的情况为依据的，而实际则与他们所述情况出入很大，西北乡党组织几乎没有活动，工作毫无基础，以致红四军连向寻都找不到。因此，红四军的行动实际上成为一次缺乏群众支持的、孤立的、单纯的军事行动。

根据前委决定，红四军先在磨岗隘附近展开工作，以后又转至溁阳地区。九月五日，奔袭澧县大堰垱、王家厂一带团防和税务机关，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反动头目，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七日返回溁阳，次日遭国民党第十四军教导师李云杰部袭击，红四军仓促应战不利，退到泥沙，再次遭到李云杰部和叛变的原石门县委军事部长罗效之率领的团防袭击。在遭敌两次袭击战斗中，红四军损失惨重。参谋长黄鳌牺牲于溁阳，第一师师长贺锦斋牺牲于泥沙，部队大部溃散。全军仅余二百余人由贺龙率领西撤，于九月底转至鹤峰的堰垱一带大山中。

黄鳌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北伐时曾任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是不可多得的军政人才，他的牺牲对建立不久的红四军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在红四军东下石门期间，桑植乐育一带又为反动团防占领，红四军失去了后方，人员补充、物资供应都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时近冬初，部队处于高寒山区，身穿单衣，缺乏粮食，没有医药，又有不少不坚定分子逃走，部队

见 1928 年 9 月贺龙关于湘西北特委与湘西特委的合并和石门暴动的经过及今后的任务给中央的报告。

减员至百余人。

一九二八年三月至九月，红四军在桑植和石门遭受了两次重大挫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敌人占据优势，红四军建立伊始就不断遭到进攻；地方工作刚刚开始，政仅组织尚不健全，群众也未发动起来，军队缺乏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红四军在斗争方针和作战方法上，还受着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北伐军正规战的阵地战战术的影响，没有学会游击战术等等。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部队成员复杂，基层骨干薄弱，党的领导还未在军队中真正确立，一遇困难和危险不少人便发生动摇，攻则怯战，退则溃逃。历史证明，由旧式武装组成的革命部队，如果不经过彻底改造和斗争的严格锻炼，是难以经受风险的。

红四军虽然遭受了重大挫折，但它的英勇斗争扩大了革命的影响。新的军队、新的政策，给这块以前受革命影响很小的穷困地区的群众带来了新的希望。同时，也为红四军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堰垭整编 湘鄂边苏区的创建

正当红四军在堰垭一带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贺英送来了一批弹药、棉花、布匹、药品和银元，解决了补给问题，鼓舞了士气。贺英并向贺龙提出了以党、团员为核心建立基本部队的建议。前委根据几次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及贺英的建议，着手整顿部队，遣散了老弱和动机不纯的分子，发展了党、团员，加强了基层领导骨干，严格了管理教育。贺龙在谈到这一段历史时说：“石门垮后比较苦，我身上的衣服都换不下来……脑子也清醒了些，骄傲个人主义劲也减少了。我姐姐的话，过去根本不听，现在也听了一些。我把廖卓然、陈协平、张一鸣等召集在一起找我姐姐（贺英）谈，我姐姐说要好好整顿队伍。就整了三个月，共九个班，每个班都有党员。廖卓然当排长，王炳南当大队长。也有了团员。”经过整顿，红四军全军只剩九十一个人、七十二支枪，但人员觉悟较高，立场坚定，并且形成了党的坚实领导，使红四军的政治素质有了巨大变化，面貌大为改观，从此以后便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因此，这次整顿在红四军的建设和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

此时，湘西前委受湘西和鄂西特委的委托，负责领导湘鄂边地方党的工作，更名为湘鄂西前委，贺龙任书记，张一鸣、陈协平、李良耀、汪毅夫、罗统一为委员。

十一月中旬，前委得到中共施鹤部报告，说部在咸丰、利川一带对以贫苦农民为基础组织的“神兵”的工作颇有成效。同时，驻恩施、鹤峰地区的敌湖北警备军马文德旅有向红四军进攻之势。为了发展武装力量，创造根据地和避开敌军的进攻，前委决定红四军向宣恩、咸丰、利川地区活动，留贺英所部在毛坪、红土坪、梅坪一带坚持斗争，派汪毅夫到鹤峰鄂阳关联络由共产党员陈宗瑜领导的，以伐木工人、烧炭工人为骨干的“神兵”。

十一月底，红四军在宣恩地区党组织的协助下，到了宣恩、咸丰、利川一带，发现施鹤部实际上有名无实，只有部委书记杨维藩个人在一股“神兵”中担任首领，而且并未开展党的活动和政治工作，其所能掌握的“神兵”不过五六十人，而该地区的大部分“神兵”仍为地主豪绅所控制。在这种情

见 1961 年 2 月 2 日贺龙《关于一九二七年冬——一九三一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的谈话》。

况下，以红四军的力量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可能性很小。于是，前委决定夺取部分“神兵”武装，然后迅速返回鹤峰、桑植地区。依此方针，红四军采取利用矛盾，分化“神兵”，争取下层，打击反动首领的策略，在半个多月的时间内，争取了黑洞的部分“神兵”，解决了利川汪家营的“神兵”，红四军扩大到三百余人、百余支枪。十二月中旬，红四军向东转移，进到建始县梭布坯时，得悉建始敌人不多，遂袭占了建始县城，接着又在前往鄂阳关途中解决了崔家坝、王花寨的团防。三次战斗，共歼灭建始县长以下百余人，缴获枪支弹药一批，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并且在沿途吸收了一部分贫苦农民参加红军。

十二月三十一日，红四军进到鄂阳关。这时，汪毅夫已与陈宗瑜领导的“神兵”取得了联系，并在鄂阳关附近组织了一支以伐木工人为主要成员的武装。这两部分共三百余人，编入了红军，大大充实了红四军。此时，蒋桂之战正在酝酿，马文德旅从鹤峰调走，前委抓住这一时机，在鄂阳关群众的支援下，一举攻占鹤峰城，并乘胜攻克太平镇和洞柘湾，击毙了鹤峰县长，消灭了一部分团防。

占领鹤峰以后，前委立即开始建立苏区的工作。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三日，在鹤峰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中共鹤峰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选出汪毅夫、陈宗瑜等七人为工农兵代表，并公布了《苏维埃政纲》、《耕田农有法令》和取消苛捐杂税，焚毁地主田契文约等法令。接着，前委又展开了地方工作。经过两个月的努力，至三月，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在东至白果坪，西迄毛坝，南达昌坪，北至红土溪的广大农村中普遍开展起来。群众焚烧了田契债据，并准备分配土地。在斗争中，党、团组织、农民协会以及群众武装农民警卫团也建立起来。

在此期间，前委收到了中共中央于一九二八年十月四日写的《关于军事策略问题给贺龙同志之指示信》。信中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对红四军的英勇奋斗给了充分肯定。同时指出：“……你们现在的实力并不很强，而龙兄在那里的目标太大，徒引起敌人联合猛力向你们进攻。若龙兄仍不开脱，减少目标，这部分实力终久不能保存而要被敌人消灭。中央现在很希望龙兄来中央帮助中央军事工作，务望接信后，即在你们现在的群众中选出一位在群众中有相当信仰能作指挥工作的，代替你（龙）的工作，同时，中央可派一军事工作同志来任参谋，帮助他计划一切，龙兄即刻启程前来中央，是为主（至）要。”

红四军接此指示后即在堰垭、红土坪等地进行整训，传达和学习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并结合红四军中存在的主要不良倾向，反对了军阀主义和“拖队”思想，开始按照官兵一致的原则建立民主制度，克服单纯命令行事的作风，多用会议形式研究和解决问题，并要求部队严守纪律。整训中还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整顿了党的组织。因士兵中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在前委领导下，建立了四个支部，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通过这次整训，提高了部队政治思想水平，使部队中党的组织建设和政治工作建设向前跨进了一步，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

在整训的同时，红四军进行了整编，军以下设第一路指挥部，以王炳南任指挥，张一鸣任党代表，下辖若干大队和中队，共约千人，长短枪三百余支。

完成这些工作后，湘鄂西前委依照中央指示，于一九二九年三月八日向

中央作了报告。报告中除汇报了党的组织和思想工作，群众运动开展情况，县苏维埃政府工作和今后的工作方针外，对中共中央调贺龙去中央工作一事，作了如下陈述：“云卿同志因红军无人负责及路途阻隔之故，暂难来中央工作，这并不是云卿不愿意来江浥（沪），实在是事实的困难。”后来中央同意了贺龙仍留在湘鄂西工作的意见。

三月十八日，鹤峰团防头目王文轩，以湘鄂西民团联防总指挥的名义，纠集桑植团防刘子维、向凤翔和五峰团防孙峻峰等部共三千余人，分数路进攻鹤峰，企图夺取县城，消灭红四军。前委以农民警卫团节节抗击刘子维、向凤翔部，集中红四军全力打击王文轩、孙峻峰部，在距鹤峰二十里的张家坪与敌激战，毙伤敌一部，击毙了王文轩。其他各路敌人闻风而退。

粉碎了这次联合进攻以后，红四军即向桑植发展。四月上旬，进到桑植龙潭坪、土地垭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五月上旬继续向南推进，占领桑植县城。此后，红四军即在该地致力于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努力，桑植的反动武装或被击溃或被逐出境，桑、鹤两县根据地连成一片，湘鄂边苏区初步形成，红四军扩大至三千余人，各大队、中队整编为团。

南岔、赤溪大捷

一九二九年六月底，湘西军阀、湖南警备第一军军长陈渠珍为恢复对桑植的统治，令所属号称一个旅的向子云部进攻桑植。

七月初，向旅周寒之部千余人从永顺经碑里坪、水田坪、水井垭进占南岔。红四军决定让敌人渡过澧水，迫其背水作战。周部占领南岔后，分三路从水滩口、南岔、龚家嘴渡澧水向桑植城前进。红四军以配置于澧水东岸的第二团依托有利地形，节节阻击，诱敌深入；主力集结于桑植城附近待机出击。在红军阻击下，周部进展缓慢，自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始进至吴家坡一带。这时红四军第一、第四团和军部特务连从八斗溪西北高地向敌猛烈反击，周部受创仓皇后退，红四军紧追不舍，周部残余退至澧水，渡河不及大部被歼，周寒之被击毙，红四军缴枪数百支。

向部虽然受到了严重打击，但不甘失败，力图报复。七月中旬，向子云亲率该部两千余人及部分地主武装经桃子溪、赤溪渡再次进犯桑植。红四军决定将向部放进城内，然后围歼。十四日晚，红四军撤离桑植城，将主力隐蔽于城北之梅家山、八斗溪、白家冲一线，另一部至西界、茅岩一带设伏，断敌退路。十五日晨，向部先头部队一特务营从赤溪渡口渡过澧水，九时左右进入桑植城，其后续部队逐次渡河跟进，兵力相当分散。红四军抓住敌人的弱点，迅速集中兵力围歼城内之敌。第四团经高家坪、乌龟嘴进攻东门；第一团自白家冲出击进攻西门；第二团、独立团等部从八斗溪直插汪家坪，截断向部退路并阻击其后续部队。向部遭到突然打击，顿时一片混乱，城内之敌大部被歼，其后续部队见状妄图抢占蛾子坡一线高地顽抗，红四军乘胜猛攻，并以一部经蛾子坡南侧山谷向赤溪渡口迂回，击敌侧背，敌不支，向渡口溃退。赤溪渡口一带水势很急，又逢上游暴雨，河水猛涨，摆渡的船工弃船逃走，向旅残部退路受阻，被红四军压缩于河滩，大部缴械投降，一部随向子云泅水逃跑，溺死于水中。下午四时战斗结束。除因独立二旅未按预定计划设伏，致百余敌人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红四军缴各种枪千余支，

获得建军以来的空前胜利。

南岔、赤溪两次战斗的胜利减少了永顺方向敌军的压力，巩固了桑植根据地。由于群众积极参军和补充了少数俘虏，红四军扩大到近四千人，再次进行了整编。军下设特务营、第一路指挥部及第二路指挥部。特务营营长贺沛卿。第一路指挥王炳南，党代表张一鸣。下设第一团，团长贺桂如，党代表龙在前；第二团，团长文南浦，党代表吴协仲。第四团，团长陈宗瑜，党代表覃甦；第五团，团长伍琴普，党代表汪毅夫。补充团团团长胡海云。第二路（二百余人）指挥覃辅臣。营以下的单位都设了专职政治干部，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为培养干部，在军队和地方选调一批学员，成立了军事政治训练班。训练班由曾在南昌暴动时担任过团长、海陆丰暴动时担任过红二师师长的湘西特委委员董朗主持。

赤溪大捷震动了湘西，使敌军不敢贸然进犯红四军及苏区，并大大鼓舞了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推动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使之迅速得到巩固和发展。赤溪大捷也是自一九二八年红四军创建以来一次巨大考验，为红四军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初建时红军三千人，却不能打败过路的国民党军龙毓仁旅，反被其击溃。此时仅隔年余，兵力也是三千人，却能够歼灭来犯之敌三千余。这雄辩地说明了红四军的成长和战斗力的提高。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已经形成；党在红军中建立了各级政治机关和党团组织，发展了党、团员，充实了红军中的骨干；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党、团员的带动下，部队的政治素质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觉悟大大提高，斗志旺盛。赤溪大捷标志着红四军的建设和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湘鄂边苏区的发展红四军东下与红六军会师

一九二九年八月，为扩大苏区，打击、分化和争取当地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前委率红四军向东南发展，进攻大庸县西教乡大地主熊相熙的反动武装。西教乡是桑植到大庸的必经之地，也是这一带著名的天险。熊家有一支掌握着三百多支枪的武装，并在轿子垭、飞塔坡、轿头、坛子山、鸡爪岩、狮子岭、白马坡等处建有坚固的寨堡，统治该乡数十年之久，在附近有相当影响。他们勾结桑植团防头目陈策勋等，收留、支持被红四军击溃的桑植团防，挑拨、破坏土著武装和红四军的关系，成为发展、巩固桑植、鹤峰苏区的严重障碍。攻打西教乡意义十分重大，战斗任务也异常艰巨。八月七日，红四军分两路发起进攻。为保证战斗顺利进行，贺龙还邀请了与西教乡反动武装矛盾很深、隶属于湖南军阀何键部的吴玉霖团参战。这次战斗非常激烈，到八月十二日晨，激战六天六夜，红军才攻下了全部寨子，熊相熙残部和陈策勋等部全部退往慈利、大庸交界地区。红四军稍事休整后，继续战斗，八月下旬攻取了慈利重镇江垭、九溪等地，江垭团防徐小桐和陈策勋等部东窜。

由于军事上的连续胜利，红四军声威大振。迫于形势，大庸、慈利的一些上著武装首领如周笃方、田少卿等，或表示不与红军为敌，或愿让“防地”。红四军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为湘鄂边苏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时，红四军得悉常德、桃源一带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吴尚部有纠合陈渠珍及湘西团防对红四军大举进攻的企图，桑植的一些地主也乘红四军主力东去的机会发动了骚乱。于是，前委决定返回苏区巩固后方，准备迎击敌人的围攻。红四军回到桑植后立即进行休整、训练，并打击残余的地主武装。

同时，前委大力加强了地方工作，加强根据地建设。此时，前委察觉到前一时期的地方党的建设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较差；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工作不够深入，领导人员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并有少数坏分子混入组织内部为非作歹；有些地方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工作人员以为捉地主一只鸡，烧一所地主房子，打一家土豪就是暴动；在没收地主豪绅财产的斗争中，未组织广大群众参加，所得物资也不分给农民等等。为了坚决纠正这些错误倾向，前委派李良耀、张一鸣、陈昌厚、郭天民等同志深入农村，协助桑植县委加强地方工作，清洗了一批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坏分子，撤换了一些不称职的工作人员，并指导、协助地方干部加紧发展党的组织，积极宣传和发动群众，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桑植苏区的建设向前推进了一步。十月初，蒋介石与张发奎发生战争，双方军队纷纷向澧县、石门、常德一带集中。在前委尚未察明敌军大量集结的意图时，吴尚的第一五四旅阎仲儒部和慈利、桑植的几支团防即已逼进桑植。在这种情况下，前委决定党、政、军组织及革命人员家属撤离桑植城和洪家关，转到桑植北部地区，首先避开强敌，待探明敌情后，再机动作战，收复桑植。当红四军向北转移时，由于侦察工作的失误和等候一支已经暗自脱离革命的小部队，延误了行动时间，因而在樟耳坪遭敌袭击，团长陈宗瑜、贺桂如牺牲，部队伤亡三四百人。前委和红四军转移到了鹤峰地区。

十月下旬，红四军向东北发展，在五峰、长阳地区积极活动。长阳地区的革命斗争是有一定基础的。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宜昌特支即派党员到长阳筹组党部。一九二七年，全县已建立三个支部，成立了工会、农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打击土豪劣绅的活动。大革命失败后，长阳党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领导人大多牺牲，部分党员隐蔽于群众之中或打入团防武装内部准备暴动。一九二八年七月开始开展游击活动。一九二九年六月，长阳县委组织领导了一次暴动，攻破县城，杀敌县长。七月份，暴动武装千余人组成红六军，李勋任军长，八月间遭国民党军第四军张发奎部陈凤诏团进攻而失败，李勋牺牲。红四军来到长阳后，即帮助长阳党组织在茅坪发动武装起义，并以起义的积极分子为骨干组成了一个独立师。十二月，红四军攻克长阳城，协助长阳党组织建立了苏维埃和农民协会。同月，红四军转往建始方向。此后，独立师因遭长阳、五峰团防联合进攻，并在五峰长茅司被伏击，损失很重。

一九三二年二月，中共鄂西特委副书记万涛到达鹤峰，向前委传达了鄂西特委关于红四军与鄂西红军会师的指示。根据特委指示，前委立即安排了湘鄂边地区的工作，组成由汪毅夫为前委负责人兼鹤峰中心县委书记的党组织，领导桑植、鹤峰、五峰、长阳、宣恩五县的工作。同时，在鹤峰留下一个独立团，在桑植留下一支游击队，继续坚持湘鄂边地区的斗争。随后，率领红四军经长阳东下，预期在松滋、公安一带会合鄂西红军。但因经资丘接近渔洋关时，受到川军第二十六师郭汝栋部三个团和长阳、五峰团防的堵截，不得已折向五峰方向，顺势占领了五峰县城。敌军继续进逼，红四军乃返回鹤峰休整，筹划改道东下。此次行动，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大大鼓舞了长阳、茅坪一带革命群众的斗争情绪，长阳独立师也得到了了一定的恢复，并将番号改为独立五十师，由李步云任师长、江山为政委。此时，国民党内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派和以冯玉祥、阎锡山为代表的另一派，两派势力发生尖锐矛盾。双方调集兵力，在中原地区陈兵近百万，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由

于长江流域各省国民党军主力陆续北调，形势对扩大红军和根据地十分有利。前委及红四军抓住这一时机，于三月二十日再次挥师东进，在五峰的湾潭消灭了大恶霸地主孙峻峰所属团防，建立了五峰苏维埃政权。四月初，红四军进至松滋境内，拟逐步肃清松滋各地团防，开展地方工作。这时，国民党军独立第十四旅彭启彪部一个团及附近各县团防共两千余人来犯，红四军遂向澧县地区转移。松滋、澧县、石门反动武装纷纷出动，前来追击。红四军集中兵力在土地垭地区对石门团防罗效之部进行还击，激战七小时，将敌击溃，俘七十余人，缴枪百余支。战斗结束后，红四军再次折回五峰境内，安顿伤员，整理部队。一周之后，红四军第三次向东出动，准备占领公安县城，以了解鄂西红六军的情况。但因敌人决坝放水，部队行动不便，且彭启彪部又尾追而来，红四军遂改变计划，再度进入澧县境内。在澧县，红四军于张家场附近击溃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戴斗垣旅一个营，俘虏数十人，缴枪五十余支，六月十八日，转往公安县的申津渡和松滋县的西斋。七月一日，红六军占领公安县城，为两军会师创造了条件。七月三日，红四军进至公安会合了红六军。

红四军在三次东进历时四个月的战斗中，不仅以积极的战斗行动打击了反动武装，扩大了游击区域和革命影响，完成了与红六军会师的任务，而且还吸收了五六百名工农成分的新战士，改编了从反动部队中分化出来的三四百名战士，进一步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

红四军创建时期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经验教训

一、依靠领袖人物的威望召集的旧式武装，如果不加强党的领导，不在组织上予以整顿，将他们改造成为一支党所绝对领导的、有高度革命自觉精神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革命武装，那么，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红四军一九二八年四月在洪家关和桑植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那时三千余人的武装，经过了两次不很严酷的战斗就溃散了。一九二八年八月石门泥沙之战，当时红四军一千余人，尽管已有有经验的共产党员任军事指挥员，有特委、县委成员作为领导骨干，仍然遭到了惨重的失败。除了敌人相对强大，红四军未防备敌人的不断袭击，以及战术上的错误之外，一打就散的根本原因，仍然是红四军的广大战士在当时还未来得及接受党的教育，部队组织不纯，尚未成为一支有无产阶级觉悟和铁的纪律的红军。

二、加强党的领导，进行阶级教育和必要的组织整顿，旧式武装是可以改造成为革命武装的。

红四军创建初期，汇集了几十支彼此不相统辖、充满矛盾冲突的小股武装。有的是由共产党影响下的部队中失散人员组成的武装，有的是地方实力派拥有的武装，有的是家族的自卫武装，有的是团防之类的武装。其中，有的人曾接受了一些革命影响，有的则带有极浓厚的封建性。这些武装大都无革命目的和革命要求。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一九二八年初投入革命队伍，服从贺龙领导，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或是贺的旧部、朋友、亲戚，或是由于受贺龙的威望影响。有的人企图跟着贺龙升官发财，有的人则是出于对贺龙个人坚信不移。不少人起初并没有什么革命理想和阶级觉悟，但经过长久锻炼和教育，终于成了无产阶级战士。可以说没有中共湘鄂西前委和红四军党组织对这些武装的教育改造，红四军要取得自身的发展壮大和创建革命根据

地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在一九二八年的整顿中，前委加强了对红四军的领导，一批共产党员来到部队成为骨干，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和政治机关，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任命了政治工作干部，发展了党、团员，对部队进行了革命教育，发扬民主，加强纪律，使红四军有了质的变化。尔后，在改造“神兵”工作中，更显示了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的威力。改造“神兵”并将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吸收到红军中来，甚至掌握有一支党所领导的、以伐木工人为主体的、在对敌斗争中能够起到很大作用的革命“神兵”，这在中国革命武装初创时期，也是一个特殊现象。

三、善于利用地方派系武装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敌人，团结可能团结的力量，打击主要反动武装力量，是红四军能够在力量弱小时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开辟和巩固根据地的重要原因。红四军当时的力量不大，要和所有各派土著武装对抗，很难取得胜利，站住脚跟。因此，利用关系，或教育他们参加红军，或联合一些危害不大、拥兵自固的地方武装，以打击最反动的、危害最大的土著武装，就是十分必要的了。例如一九二九年攻打大庸县西教乡反动地方武装熊相熙部，不仅扩大了红四军的声威，巩固了桑植、鹤峰根据地，同时也打击了另一些反动地方武装的气焰，使一些力量较小的武装保持中立或依靠红军。在打熊相熙的战斗中，贺龙利用旧关系调动军阀武装吴玉霖部参战，是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和利用矛盾的一个成功经验。而这方面的经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不多见的。

第四节红六军及洪湖苏区的创建

洪湖地区初期的游击活动

一九二八年二月，周逸群、贺龙等离开石首后，鄂西、鄂中特委领导的几支游击队，继续进行了一些暴动，由于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成果不大，反而暴露了革命力量。李宗仁和唐生智之间的军阀战争结束后，桂系控制了湖北大部，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局面。他们集中兵力对革命力量进行镇压，以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相结合不断进行“清乡”。游击队受到了很大削弱，不少领导同志光荣牺牲，群众斗争受到残酷镇压。至一九二八年夏初，鄂中游击队只剩下二三十人，由鄂中特委书记邓赤中领导在洪湖北岸坚持斗争；石首中心县委的武装也失散不少，余部由屈阳春、段玉林、朱祖光等率领，分散在石首、华容、监利地区游击；公安县委领导的游击队，损失也很大，樊学赐、杨云祥相继牺牲，邹资生率领五十余支枪的队伍，离开公安转到了石首；江陵的陈香波游击队则在白露湖一带继续坚持斗争。这些游击队彼此没有联系，活动范围很小，而且继续受着敌人“清剿”的威胁。

一九二八年五月，周逸群由湘西到达石首，当时正值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大学“清乡”，为了避免和强敌作战，与县委商定后决定将石首游击队和公安游击队转到监利、沔阳交界的洪湖地区。在那里又会合了鄂中游击队及朱祖光领导的华容游击队。这几支武装共有枪百余支，五月二十日突袭沔阳重镇峰口，全歼当地团防，缴枪三十余支，及一批物资弹药，并召开群众大会，处决土豪劣绅，分了财物，进行革命宣传。然后，主动撤至峰口西南的洪湖沿岸活动。

不久，国民党军第十八军派一营兵力协同监利、沔阳、潜江等县的团防前往围攻，游击队向沔西拖船埠撤退，途中敌步步进逼，三战均失利，处境十分危急。周逸群提议甩开敌人，保存实力，北出江陵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荆门、当阳、远安地区游击。但是，各县武装地方观念浓厚，不愿远离本土，有的甚至主张各县武装不离本县。在这种情况下，只得分开活动。石首、公安、华容游击队由周逸群率领转回石首，鉴于敌军还在石首“清乡”，形势严峻，于是将部队编成特务大队，以邹资生为大队长，埋下长枪，分散活动于石首、华容、监利一带，依靠良好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昼伏夜出，镇压豪绅。鄂中游击队回到拖船埠，在该地遭到了优势敌人的攻击，受到严重损失，邓赤中光荣牺牲。五月下旬，设在沙市的中共鄂西特委机关被敌人破坏，书记张计储等十余位负责同志牺牲。正在石首的周逸群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赶到沙市，组成临时特委，并将机关迁往宜昌。六月下旬，经湖北省委批准，以周逸群、万涛、曹壮夫（原特委委员）、钱定生（江陵县委书记）、屈阳春（石首县委书记）、郑焯昌（宜昌县委书记）、邹资生（特务大队长）、段德昌（公安县委书记）、徐国元（宜都县委书记）、杨景堂（监利三区区委书记）等组成新的鄂西特委，周逸群为书记，万涛为副书记。

这时鄂西斗争形势十分危急。自桂系军阀统治湖北以后，各派国民党军在鄂西混战的局面已经大体结束，遂加强了对革命力量的进攻，保卫团、团

周逸群来石首是因为桑植之战失败，与贺龙失掉了联系。据一些老人回忆，周是去上海找到中共中央后被派回鄂西主持工作的。

防、常练队等反动地方武装也普遍扩大并统一编组，打破县界，互相配合，积极对红军实行全面“清乡”和重点“清剿”，在“宁肯屈杀一千，不让漏网一个”的口号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企图彻底摧毁革命力量。而这时党的工作又没有根据情况变化采取相应的措施，仍然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发动暴动，以致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党员、干部牺牲日多，游击队活动地区日渐缩小。面对这种严峻的情况，特委召开会议，对鄂西的形势进行了认真讨论，迅速改变了作法，采取了深入农村、深入群众进行艰苦的隐蔽斗争，恢复和发展党和群众组织的方针，抓住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开展带政治性的经济斗争，如减免苛捐杂税等，在斗争中锻炼群众，提高群众觉悟，为扩大游击队和开辟根据地创立可靠的基础。

自此之后，在鄂西地区，逐渐纠正了盲动主义的错误政策，停止了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情况下的盲目暴动，发动党员在合法的社会职业掩护下，展开秘密工作，以一串十，十串百的方式，由点到面，逐渐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了秘密农民协会、妇女会和少先队等群众团体。游击队的活动方式也作了相应的改变，一般情况下分散活动，配合群众斗争，用隐蔽的方式镇压个别罪恶昭彰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打击敌人的凶恶气焰；当敌人大举“清乡”时，则采取“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根据敌人兵力、地形情况和群众条件，或隐蔽斗争，或突袭敌人，以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斗，鄂西革命力量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稳步发展起来。到一九二九年二月，在监利、华容、石首、江陵、沔阳各县相继恢复和开辟了许多小块根据地，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了秘密农民协会，扩大了游击队。除在监利、华容、石首地区活动的特务大队外，在江陵地区，由段德昌领导的秘密武装先后袭击了马家寨、观音寺、岑河口、郝穴等处的团防，逐步发展到一百余人枪，组成了一支较大的游击队。在天门西乡和潜江地区，由吴新武、姚普生等领导的秘密武装组成了天潜游击队。

此时，原属湘西特委领导的华容、南县、安乡和原属鄂中特委领导的沔阳、天门、潜江、京山、汉川等县的党组织，实际上已由鄂西特委领导了。

鄂西游击总队成立洪湖苏区形成

一九二九二月，中共鄂西特委在江陵沙岗召开了扩大会议。宜昌、江陵、公安、石首、监利、荆门、远安等县党组织都派了代表出席。会议开了两天，传达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并根据“六大”精神总结了鄂西工作的经验教训，作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健全地方党部、彻底纠正“盲动主义”、防止“和平发展”思想等决议。会议特别研究了发展游击战争的问题，确定在特委管辖的大部分地区普遍开展游击战争；在党的组织和基础薄弱的地区，则先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反对苛捐杂税、抗租、抗粮斗争，为开辟苏区和组织武装作准备。

会后，乘蒋桂战争爆发，敌军主力大部撤出鄂西的有利时机，特委立即在秘密工作基础较好的江陵、石首、监利三县发动进攻，将游击队重新编成一个大队，下辖两中队：第一中队以江陵、石首的游击队组编，中队长段玉林，共有四个分队，步枪一百二十支，短枪二十余支；第二中队以监利、沔阳的游击队组编，中队长段德昌，副中队长彭国才，也有四个分队，步枪七

十支，短枪五十支。三月初，两个中队在监利、江陵境内同时行动，十七天作战二十一次，获得重大胜利。在沙岗战斗中，特委委员、游击队大队长邹资生不幸牺牲。三月下旬，第一中队由江陵转至石首，攻克石首县城，缴枪八十支，处死了敌县长，并从狱中救出了七十多名同志。接着又向藕池方向出击，途中在阮家铺子与国民党军第五十师谭道源部两个团遭遇，因敌众我寡，仓促应战，第一中队损失较大。为了摆脱敌人，乃兵分两路，转向石首和江陵地区，一面游击，一面整顿。

监利一带的敌人，在游击大队连续打击下，退缩到几个较大的村镇。五月，第二中队和监利赤卫队共三百余人，进攻监利要镇毛家口，以里应外合的战术，歼谭道源部两个连，缴枪一百三十支。战后，第二中队将一部分枪支支援了第一中队，使第一中队的战斗力迅速恢复起来。

随着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农村的群众斗争也逐渐活跃起来。为了团结和争取广大群众，集中力量打击豪绅地主，特委及时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对待中小商人，采取保护政策，只取缔暴利和高利贷，对正当经营只收一定税金，使其有利可图；明确规定游击战争的当前任务是消灭地主豪绅武装，帮助农民进行斗争。根据这些政策，游击队除战斗活动外，还积极进行群众工作，采用各种方式进行广泛的宣传，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进行革命教育，动员和鼓励他们起来进行斗争。同时，还以自己遵守政策纪律的模范行动去影响群众。这些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游击队所到之处，群众情绪高涨，革命组织扩大很快。在监利、沔阳的下车湾、剅口、柳家集、瞿家湾一带，江陵的白露湖畔、沙岗及其周围，石首北部的冯家潭子、小河口，华容的东山等地，区乡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妇女会、少先队等组织都公开活动起来，并成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筹备处。经过一年艰苦的努力，鄂西形势有了很大变化。特委领导有了很大加强。当时特委有委员九人，主持日常工作的三人，指挥军事斗争的二人，其他四人在下级地方党组织工作。特委机关设宣传、组织两科，工、农、妇、兵运四个委员会及秘书处。特委常委会五天召开一次，全委会两月召开一次，并有两个委员经常在外巡视，与各县党组织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工作中心地区已有宜昌、宜都、枝江、恩施、当阳、荆门、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沔阳、潜江等县的大部或一部分，已经恢复和建立党的县委或特别支部的已有十八个县，有党员二千六百多名。江陵的农村组织已全部恢复，有区委八个，支部二十九个，党员六百，游击战争有很大发展。石首全县党组织也已恢复，有党员三百，游击武装很活跃，攻击团防武装时，有时参加的农民多达几千人。监利也恢复和发展了党组织，有党员五百六十人。由于鄂西特委组织健全，领导有力，工作切合实际，政策顺乎民心，从而使党和群众工作都较快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成为苏维埃政权建立和建设、游击武装发展和扩大的有力保证。

六月，江陵、监利的地主豪绅纠集两县团防，由郝穴和汪家桥分两路向江陵苏区进攻。游击大队集中第一、第二中队的全部兵力迎击，二十二日在青阳宫与敌遭遇，歼敌八十一人。七月，国民党军第五十师一个连到石首苏区“清乡”。第二中队诱敌深入，待敌人接近苏区中心时，依托有利地形，在广大群众协助下，突然反击，将其全部包围歼灭，缴枪七十支，打击了敌人，巩固了苏区。在此期间，国民党驻新堤的江防大队以共产党员程光明为首的七十余人举行兵变，投奔洪湖苏区，参加了游击队。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游击大队得到了相当发展。鄂西特委及时采取措施，加强部队建设，

把游击大队编成鄂西游击总队，由周逸群兼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下辖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王尚武，第二大队长段玉林，第三大队长卢先瑚。各个大队均有三个中队，人枪各三百余，共计人枪千余，形成了一支较强的武装。为训练骨干，特委从部队和江陵、沔阳、监利、石首、汉川等县选调了一批基层干部，成立教导队，归游击总队直接领导。特委还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建立了总队政治部，设立了中队以上各级党代表，在中队以下的分队建立了党、团支部和士兵委员会，以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

鄂西游击总队整编后，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二九年八月，连续攻下古丈堤、天心洲、新广等地，扩大了苏区。此时，蒋桂战争以桂系军阀的失败而告终，湖北境内桂系军阀部队纷纷撤离，蒋系部队及其收编的其他军阀部队控制了湖北。革命武装的发展，苏区的扩大，引起了敌人的惶恐。九月，国民党军第五十师谭道源部和第三十四师岳维峻部以大于游击总队十余倍的兵力，对江、石、监、沔地区进行“清剿”。活动在洪湖一带的第一大队原准备按照总队的指示避开强敌，转到外线，前往华容一带活动，但当他们路经监利二区，应当地党的负责同志请求，攻下了尺八口以后，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不适当地改变原定计划，转回洪湖，在小沙口与强敌遭遇，造成很大伤亡，大队长王尚武及几个中队的党代表牺牲，大队党代表王鹤负伤。与此同时，活动在江陵、石首苏区的第二大队，由于及时转往华容，保存了力量。

特委鉴于形势严重，乃决定由段德昌率领第一、第三大队继续坚持洪湖附近地区的斗争，由周逸群、段玉林指挥第二大队在华容、石首、江陵等地展开积极的游击活动。

根据上述决定，第一、第三大队与当地党组织、群众武装密切协同，声东击西，日以继夜地打击、骚扰敌人。十月，聂家岭一仗击溃敌军一个团，遏止了敌人的进攻。十一月，蒋冯战争紧张，蒋介石将部分部队调出鄂西。第一、第三大队趁此机会，展开反攻，十一月攻克三官殿，歼敌一连，缴枪百余支；十二月又连续攻克杨树峰和谢仁口等地，恢复并扩大了洪湖附近的根据地。

第二大队在华容、石首、江陵地区也用游击战争破坏了敌人的“清剿”计划。敌主力撤出后，石首团防和藕池商团共三百余人，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乘轮船一艘、拖船三只到小河口，协同该地区团防向冯家潭子进攻，第二大队一部及赤卫队在段玉林、朱祖光等指挥下，先退至附近的柴林里隐蔽待机，当团防武装进村疯狂抢劫、一片混乱时，游击队分数路突然出击，打得团防武装溃不成军，纷纷向小河口回窜，企图乘船逃跑，因轮船搁浅，被全部歼灭。是役，第二大队俘敌二百余人，缴长短枪百数十支、轮船一艘。随后又乘胜袭取了江陵之熊家河、马家寨、观音寺等地，逼近沙市，使江、石根据地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为分化瓦解敌人，特委在敌军工作上采取了“投降受赏，来去自愿”的宽大政策，规定：拖枪来降者奖银洋十元，作战被俘者发银洋五元，不愿加入红军者教育释放，并酌发路费。根据这一政策，首先将小河口战斗中的俘虏给以宽待，经教育释放回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促进了敌军的分化，瓦解了敌军的士气，拖枪来归者日多。经四个月的英勇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恢复、发展了根据地。到十二月间，苏区已扩大到江、石、监、沔的大

部分地区，苏区的各项建设工作也日趋健全。游击总队得到了迅速扩大，战斗力有了显著提高。在此期间，汉川党组织领导的游击武装，也从秘密转为公开活动，发展到三百余人，组成了汉川游击大队。

中共鄂西区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革命斗争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下，鄂西特委为了总结两年来的斗争经验，教育党员、干部迎接新的斗争，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下旬在石首县袁家铺召开了鄂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正式代表三十五人，列席四五十人，代表着十二个县的四千余党员。湖北省委也派了代表参加。会议历时九天，广泛、深入地讨论了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等问题，通过了“军事工作问题”、“党的组织问题”、“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农民运动”、“土地问题”、“苏维埃组织”、“职工运动”、“经济问题”和“兵变问题”等决议案，选举产生了周逸群、万涛、段德昌、周小康等九同志组成的鄂西特委。

关于土地问题，大会指出：抗租、减租和反对苛捐杂税等斗争都是走向土地革命的必经阶段。此后进一步的办法是：“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资产、土地”，“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取消苛捐杂税，设单一的农业经济累进税；同时又指出在“土地革命进行中，必须准备与富农的斗争，以防止其反革命性。”

关于党的组织问题，大会指出：“目前党组织上最严重的问题是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问题”，并指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涵义，一部分当然是指无产阶级的分子，如城市的工人，乡村的雇农，一部分是指无产阶级的意识，即所谓无产阶级化，并不是除了发展工人同志外便谈不到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自然主要的是要积极发展工人同志”。此外，大会强调了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对上级指示必须在充分讨论后，密切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对干部的培养要坚决从下层组织选拔。

游击战争和红军工作，是大会讨论的重点，在特委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分讨论。大会指出：“游击战争，是目前农村斗争的主要方式。”

游击战争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肃清反动势力”，贯彻“土地政纲”。

关于敌军兵士运动，大会指出：“兵士不是流氓无产阶级……是属于农民阶级，兵士大多数是因为没有土地而当兵，他们还是希望得到土地返到农村去”。“党在兵运中的总路线是争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向来……要取得兵士群众，首先要注意领导兵士的日常斗争，反对长官打骂，要求发给欠饷，军需公开，都是兵士最为迫切的要求，党要在这些斗争中提高兵士群众的阶级意识”。“反对无条件的兵变主义。无条件的兵变，只是自己消灭自己蕴蓄在敌人军队中的力量，没有别的好处。这一错误，党应坚决的反对。但在下列的条件之下，必须举行兵变：（1）当地工、农斗争有激烈的发展，快要来到暴动的时候；（2）攻击红军或镇压工农的斗争；（3）敌人作战双方都

见 1929 年 12 月《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

见 1929 年 12 月《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

见 1929 年 12 月《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鄂西党的组织决议案》。

见 1929 年 12 月《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

有我们的组织；（4）兵士内部斗争发展，已经引起广大兵士的同情与参加；（5）组织被敌人发觉了”

为了适应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大会还要求积极组织群众武装，对党员和广大群众进行有计划的军事训练。

关于苏维埃政权工作和工人、青年、妇女运动等，大会也都总结了经验，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为贯彻“二大”决议，加强对所属各县的领导，大会确定将鄂西区划为六个巡视区，并于会后立即派周小康等前往巡视，传达“二大”精神。

根据大会精神，鄂西特委对革命形势发展的总趋势也作了实事求是的估量。特委认为：“帝国主义在鄂西势力的增长，军阀战争的扩大延长，豪绅地主阶级的剥削日益残酷，促成经济破产的速度日益加剧”。“豪绅地主的统治在鄂西仍占着优势，改良主义在鄂西绝少有继续发展的可能”。“革命的危机日益加深，群众斗争日益发展，革命的高潮必不可免的快要到来。但不可作过分的估量，因为即使这些现象汇合起来，还不能成为真正的高潮。同时，统治阶级虽说日益走向崩溃的道路，但封建势力还有很顽固的基础存在。主要的要看我们艰苦困难的斗争，正确的策略坚决的运用，和争取广大群众的力量，来推动这一革命新的高潮的迅速到来。”特委的这一判断，实际上表明了对中央关于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论点和由此导致的“左”的路线的不同看法，这在当时是有重要意义的。

红六军和鄂西联县政府成立 为与红四军会师创造条件

鄂西地区党的“二大”以后，特委为贯彻大会广泛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将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中央独立师，以段德昌为师长，下辖两个纵队，共十个中队，有枪一千数百支，人员约五千。第一纵队司令王一鸣，第二纵队司令段玉林。另外，准备将江陵、荆门、钟祥的游击队各编为一个中队；并决定将长阳独立师编为第三纵队（后因故未能实现）。同时，在江陵、石首、监利、沔阳组成县赤卫队。以红军主力向外发展，赤卫队负责保卫根据地。至此，红军及地方武装不仅已具有相当战斗力，而且有了分工，鄂西武装斗争在规模、力量、战略战术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了执行久已确定的与红四军会师的计划，特委派万涛去湘鄂边迎接红四军。

一九三一年一月，蒋、冯、阎军阀正酝酿大战，无暇以重兵与红军作战，形势对红军甚为有利。特委决定集中兵力拔除苏区内部的白点和消灭苏区周围的敌人。但此时湖北省委令独立师第一纵队向沔阳、汉川推进，以使进攻武汉。第一纵队即写信通知第二纵队到洪湖集中。当时第二纵队正在准备向江陵发展，恢复江陵的党组织，以打通江陵、监利、石首的赤色交通线，肃清苏区内的白点，故未执行第一纵队的通知。由于省委夺取武汉等大城市的命令，与鄂西特委的巩固发展方针发生分歧，妨害了军事行动的统一，延误了一个月的时间，直至中央军委巡视员柳克明到了鄂西，指示第一纵队迅速到江陵与第二纵队会合，才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部队集中过程

见 1929 年 12 月《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军事工作问题决议案》。

见 1930 年 1 月《新鄂西》第二期发表的《鄂西政治经济状况与革命形势的发展》。

中，第一纵队自洪湖出发攻克城垵、沱子口，第二纵队从石首出发，攻克郝穴、黄才剅、普济观。二月五日，第一、第二纵队会合于监利汪家桥。

会合后，独立师按中央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以孙德清为军长（孙因病由邝继勋继任），周逸群兼政治委员。纵队以下组织不变，第一纵队纵队长段德昌，政治委员王鹤；第二纵队纵队长段玉林，政治委员许光达。军设前敌委员会，委员七人：孙德清（后为邝继勋）、段德昌、段玉林、徐昌贤（士兵）、张传贤（士兵），王鹤和一位中央将派来红六军负责党务工作的同志；候补委员三人：许光达、李子扬、王一鸣。第一次前委会议决定以三人组成常委会，王一鸣为书记，孙德清为宣传委员，中央派来的同志任组织委员，未到之前由许光达暂任。军部设司令部、政治部等机关，并设教导大队负责培养干部。邝继勋就职后立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积极开展斗争，继续扩大战果。

二月七日，红六军在新观召开万人大会纪念“二·七”，誓师出征。八日，攻占龙湾、熊口、老新口、张金河等重要城镇。十五日占领新沟嘴，消灭新编第五师一个连。十七日占领渔阳镇。二十二日攻克潜江县城，缴获长短枪百余支，俘敌军政官吏及藏在城内的各乡土豪劣绅多人。三月八日，又乘胜攻克郝穴，消灭了独立第十四旅两个营，缴枪一百六十支，俘虏八十余名。接着，十二日在赤卫队及群众协助下攻克观音寺。四月跨江南下，连续攻克藕池、石首和调弦口等城镇。红六军建立伊始，在军长邝继勋、政委周逸群领导下，以迅猛的攻势，横扫了苏区内敌军据点，军威大振。

鄂西特委为适应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要求，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在调弦口召开鄂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鄂西联县政府，由周逸群任主席，下设土地、军事、财经、水利、文化各部及政治保卫局、秘书处等政权机关，并着手整顿和建立县以下各级政权。联县政府还组建了赤卫总队部，周逸群兼任总队长，各县组建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县赤卫队。从此，鄂西地区有了统一的革命政权机关，开始了根据地建设的新阶段。

此时，在鄂西苏区的江陵、石首、华容、监利、沔阳、潜江等县已经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各区、乡革命政权亦已大部建立。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少先队等群众组织都有普遍发展。大部分地区分配了地主的土地，实行了农业统一累进税。农林水利、小型工厂开始创办，福利、卫生机关已经建立，并且有了宣传革命道理的报纸、刊物。全区有小学二百九十二所，学生一万三千余人，儿童团员八万零七百余人，少先队员十四万五千四百余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一万二千余人，赤卫队员（包括一部分脱离生产的游击队性质的赤卫队）近二十万。除根据地外，游击区域已发展到十七个县的广大农村。因为洪湖沿岸地区工作基础最强，割据区域较大，所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们通常又称鄂西苏区为洪湖苏区。

五月，蒋、冯、阎军阀混战开始，鄂西地区国民党军兵力薄弱，地主武装动摇。鄂西特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首先力争早日与红四军会师，使两军主力汇合为一股巨大的力量；进而肃清鄂西地区的地主武装，有重点地打击敌军主力，使根据地稳步发展。根据这一方针，计划以红六军先扫清监利、江陵、石首一带的白点，然后向公安、松滋发展，会合红四军，夺取江陵、沙市，再配合长阳、巴东的游击队进攻宜昌。

但此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被李立三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倾路线基本控制，他们在革命力量发展的有利形势刺激下，错误地认为全国革命高潮已

经到来，企图以红军的进攻配合工人暴动夺取大城市，以争取所谓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湖北省委在这种“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指导下，要求红六军与鄂豫皖红军会师武汉，以争取革命首先在湖北胜利。因而鄂西特委的计划没能实现。

五月，红六军根据湖北省委指示东进，先后攻克了沔阳城、仙桃镇、系马口、汉川城，前锋到达了武汉附近的蔡甸。但因武汉敌军防守甚严，红六军力量相比较弱，又未得到也不可能得到工人暴动、敌军哗变的配合，乃不得不放弃夺取这个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转而向西，攻克峰口，重占江陵之郝穴，进至监利之朱河。此时，红六军由于连续作战的胜利发展到了六千余人。

从一九三一年一月以来，由于当时的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形势作了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估计，并从错误的估计出发，产生了主观主义的“左”倾指导方针，从而给鄂西党及红军造成了一个复杂的局面：鄂西特委主张解决宜昌、沙市、公安、石首、华容、江陵、潜江、沔阳、荆门、钟祥、京山、天门等中小城市，肃清苏区内部残存的敌人据点，而红六军军长邝继勋却主张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首先夺取湖北省会武汉，接受了夺取大城市及中心城市，以取得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战略方针。这种矛盾，在本来比较一致的鄂西党、政、军领导中间造成了极大困难。鄂西特委向中共中央报告：红六军军长邝继勋不尊重特委及红六军前委的指示，英雄主义，独断专行，鉴于部队即将与红四军会师，邝继勋可能难于搞好会师后领导之间的团结，请求中央将其调离。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一请求，在红二、红六军会师后将邝继勋调往鄂豫皖根据地担任红四军军长。

在无法夺取武汉的情况下，特委指示红六军回师执行迎接红四军的计划。六月，红六军进到江南，连克石首、公安等城，会合了红四军。

鄂西特委总结的基本经验

自一九二八年五月，周逸群到鄂西重组特委以后，与坚持斗争的各县及游击队领导共同努力，逐步克服了盲动主义的影响，致力于进行艰苦的以农村为基地、以武装为骨干的秘密工作，组织群众，团结群众，建立和发展农村的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少先队，建立游击武装，发展党的组织。经过艰巨细致的工作，“水浸式”地使秘密武装和根据地发展起来，并寻求战，不断扩大武装斗争的规模，取得了巨大胜利。鄂西特委和周逸群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从鄂西地区具体条件出发，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制定政策策略，一个时期内相当成功地抵制了“左”的干扰。这个时期，鄂西党的组织是团结的，党内生活是活跃的，工作作风也是深入实际和善于调查研究的，能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创造和贯彻了受群众欢迎的政策。

关于游击战争以及游击队和红军的建设。鄂西特委认为：鄂西的游击队的生长有其特殊性，“不如朱毛彭德怀等先有一部分军队作基础，士兵的成分完全是农民的自愿军，干部多半是由实际工作中训练出来的，所以，颇能接近群众……”

见 1930 年 6 月 10 日《中共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

“鄂西游击队的活动区域，没有高山掩护，而且交通便利，敌军调遣进攻非常容易，若无群众掩护则非常危险。当我们初发动的时候，实在没有好多把握，以为武装发展了，目标必大，易被敌人包围。其实，只要有好的群众组织，武装虽多，敌人在军事上亦不易包围……”

“鄂西的游击队……将进步到红军的时期。若遇敌人内部发生冲突，红军的发展是有可能的。不过在目前军阀战争的停顿，军阀帮助民团‘清乡’的时候，游击战争要想有怎样的发展是少有可能的。此时应采取保存实力的原则，避免与敌人正面的冲突，埋伏在群众之中，看清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袭击敌人后方，使敌人疲于奔命，士兵发生动摇，甚至引起兵变。”

“游击战争在原则上是越游击的宽越好，越能发动广大群众，游击队也才能扩大。但运用起来不必这样机械。主要的还是各地方的农村斗争发展为游击战争。只能尽可能帮助邻县发动游击战争，决不可专以游击队去代替邻县的群众斗争。而在事实上假如以游击队去发动邻县的斗争，没有经过斗争的群众也不是怎样欢迎的。群众将要怀疑我们害了他们，结果必然要演成群众与游击队隔离，甚至失败以后群众还要怨恨。但这并不是说游击队要死守一个地方，假如死守一个地方，除了地势很好以外，必然要被敌人消灭，如鄂中游击队死守沔阳（拖船埠），结果归于失败。这是我们不可忘记的教训。”

“游击战争已经发动了，便应在群众中公开起来，农民协会便要在群众中起作用，领导广大群众，实现农村中的口号，决不可‘取巧’、‘怕红’，无端的秘密起来。”

“红军是目前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党必须以各种可能（的方法）在游击当中夺取敌人的武器，以扩大自己的实力，渐渐生长为正式的红军。并在群众中吸收积极忠勇的工农参加红军，以加强红军的质量。”

“目前的战略与策略：（1）随时是进攻的，不是保守的。游击战争只有不断的向着敌人弱点进攻，不断的发动群众向外扩大，才能得到胜利，保守就是坐以待毙的策略，因此要坚决反对上山主义和下湖主义。自然不是说因为军事的策略而不可暂时如此。主要的是要经常和群众中游击，提高群众的勇气，扩大周围的影响。（2）不攻坚不打硬仗，但决不是逃跑主义。敌人所设的坚固防守工事我们不应冒险去攻，徒损失自己。敌人的大部队向着我们进攻，他们是有计划的，我们不当去冲突，应绕道（到）其侧面或后方去袭击。敌情不明，我们也要慎重作战。总之，没有胜利把握的，我们不应冒险去打，但决不是无目的的逃跑主义。有可能解决的反动武装，一定要解决来扩大自己的实力。（3）要取得群众的拥护，要以政治宣传战胜敌人。作战一定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和帮助才有胜利把握，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去袭击敌人，同时要加紧我们的政治宣传，使敌人兵士同情革命，或倾向（到）红军中来。（4）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分散与集中。在策略上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完全要以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来决定。就是要在集中指导下分散游击去发动群众，集中力量去打击敌人。”

“红军的组织和训练：（1）……士兵成分应以工人贫农为中心基础。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红军中的党要特别健全，每一问题，党都要起领导作用。团不另组织支部，可在支部下成立‘CY’小组。目前应适用自愿兵制度，但必须以工人和贫农为中心基础。（2）……因为军队中的主要工作是兵士工作，一切工作都要注意建立在兵士群众基础上，使他们自动的过问纪律、生活、经济这些问题，但要防止极端民主化的现象。（3）政治委员的任务和

工作：党代表应改为政治委员，做一切对内的政治教育，对外的一切宣传工作。特别要能在正确的关系上，来发展兵士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并帮助军官来表示正确的作用。（4）兵士生活要纪律化。红军的每一兵士，不仅是革命的战斗员而且是群众的组织者、宣传者。一切工作和纪律要能使他们自动来拥护，同时，政治部应注意兵士的政治训练，多做开娱乐会等文化工作。”

“每次作战之后，照例应开批评会，其方式先由担负任务之官长报告经过，再互相批评，最后一人做结论。此法颇能增进官兵作战的技术。”

“游击队每中队有巡查队的组织，队员三人，每日更换。由兵士轮流充当。无论官兵犯了纪律，巡查队得干涉之，并于必要时送回部队处罚。此法能维护军纪于无形之中。”

“游击队官长士兵的生活是平等的，军需处的帐目是公开的。士兵委员会得推出代表查军需处的帐目。士兵的伙食由士兵推出代表负责，特务长只负领款发款之贡。”

“游击战争采取分散游击集中指导的原则……各中队分散于各县后，县委负责人得参加军事会议，而县委军事负责人亦得参加，但同时须报告大队部及总队，并随时听从大队部及总队部之调遣。”

“党员军事化与武装工农。由各地的斗争和日常的工作中证明这一工作的重要，各地斗争给我们的工作教训是每个党员都要有军事的知识和技术才能领导游击战争和指挥作战。并且军事是科学的结晶。我们平日工作中、行动中也要完全军事化、军事化的实施：（1）党应有计划地秘密和公开的给每个党员以短期的军事训练；（2）党应派党员入敌人的军校或教导队等学得军事技术；（3）每个同志入军队或团防当兵。”

“武装工农……工人纠察队的组织与训练：工人纠察队的工作只能在秘密路线下去进行。关于使用武装（器）方面，党要派有军事知识的同志去秘密训练，至于巷战及一切动作，要在群众斗争中去演习，平日也可以训练到某地集

中、解散、进攻、防御、放哨等，并可以借体育会等名义练习。农民的武装可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势（式）下进行。赤色区域亦要注意使一般青年农民普遍受相当的军事训练，并要在游击中把农民武装起来，编成赤卫队。非赤色区内也要进行这种组织和训练。注意民团中的工作，夺取民团武装。”

关于农村政策和统一战线。在对待富农的政策上，特委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六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各地都很明显，反豪绅地主的斗争，很容易动员群众。各地富农的态度，目前多是倾向革命的，因苛捐杂税的负担以他们为最重。他们也同样受豪绅的压迫，在目前的过程中，富农是有革命性的，并且在数量上要占重要的地位。建立反豪绅地主的统一战线确是很重要的。自然我们在反豪绅地主的斗争中，同时要准备进行反富农的斗争。不过，目前我们只能积极加强贫农力量，把农运的重心建立在贫农上，事实上不应故意作反富农的斗争，使富农反走向豪绅地主方面去。”在对待中、小商人的政策上，周逸群于一九二九年八月给中共中央

《鄂西特委总结的基本经验》中的引文见 1929 年 5 月 16 日《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1929 年 8 月周逸群给中央的报告《鄂西农村工作》，1929 年 9 月 19 日《鄂西特委（周逸群给中央）的报告》，1929 年 12 月《鄂西特委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案》。

的报告中指出：“事实告诉我们，海陆丰苏维埃区域食盐堆积如山，萍浏苏维埃区域又没有盐吃。

由这些地方就可以知道敌人对于我们除以军队包围外，并用经济封锁政策。鄂西初发动游击战争的时候，远近商家都迁移到大城市去了。当时我们就感觉到若长此下去，敌人（将）用经济来封锁我们，商品的方面固然不容易断绝如象萍浏那样没有盐吃（因为鄂西赤色区域位于长江及襄河之间，而小河道很多，四通八达交通不易断绝），但是，假使商人都裹足不前，农村出产如何能销运出去？那末，江、石、监、沔的棉花将要（堆得）比海陆丰的食盐更高，这样，农民将不拥护甚至反对苏维埃……不久，由实际经验中也就发现了解的途径……今年发动游击战争一开始便下很大决心纠正过去盲动主义的错误。一般小商人见我们态度变了，才敢与我们接近，有一次汪家桥的商人见我们既不筹饷，又不没收他们的钱，反而不安的举出代表来会我，愿意捐五百元以作军饷，并说出很多为难的话，恐怕我嫌少了。但结果还是被我们拒绝了，并很诚恳的向他们解释共产党只没收地主的土地交农民，只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财产，对于小商人，只要不反动，不仅不摧残而且绝对的保护……他们经过几次谈话后表示非常满意，对我们的认识自然与以前不同了，而且替我们宣传各处有关系的商人。须知他们的宣传比我们自己去宣传有效得多，于是附近各地的商人都不怕我们。不仅政治影响扩大而且农村的经济不易被敌人封锁。……我们仔细考虑，过去各地苏维埃之遭经济封锁，或许不是敌人故意封锁，而是我们受农民意识的反映，过分摧残由城市来的小商人。这样自然使商人裹足不前，农村经济不能活动，正所谓作茧自缚。”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和中期，强调建立统一战线的领导者是不多的，能认真总结并推行这个策略的则更少，中央几次“左”倾的错误之一就是不要统一战线，不能正确区别敌我友，不能团结大多数，严重打击了本来可以成为同盟军或暂时同盟军的阶级和阶层。鄂西特委一九二九年就能从实践中总结出这方面的经验，并且在执行中获得很大成功，是难能可贵的。

第五节巴兴归和襄枣宜地区初期的武装斗争

红四十九师和巴兴归苏区的创建

一九二七年冬，鄂西特委所属的巴东党组织进行了掌握武装，准备暴动的工作。

巴东县地跨长江两岸。是四川军阀向湖北扩张势力的必经之地，历年兵来匪往，散兵游勇极多，广大人民深受其害。地主豪绅为保护他们的财产，利用群众保家自卫的思想，纷纷成立大刀会、红枪会等“神兵”组织。巴东党组织乘机派遣党员打入其中进行活动，经数月努力，在江北的坪阳坝、五道垭、甘家坪、牛洞等党和群众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掌握了“神兵”两千余人。黄大鹏、谭联科等几位共产党员担任了各乡大刀会、红枪会的代表或队长，并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神兵”群众的觉悟，从积极分子中发展了部分党员。

一九二八年初，国民党巴东县长高安其，宣布征收军饷二十万元，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党组织抓住这个时机，号召“神兵”起来反抗，组织了百余人的精干的游击队，配备了仅有的数支步枪，由张华甫、黄大鹏、廖景坤等率领，于三月初袭占巴东县城，处决了高安其以下七名贪官污吏，逮捕了一批土豪劣绅。随即成立了巴东人民委员会，以张华甫为委员长，宣布保护长江交通，取消苛捐杂税，以及反对土豪劣绅的主张，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五月，巴东团防张家彩部和反动“神兵”千余人前来攻城。根据当时的敌情，游击队放弃了巴东县城，退回江北，并在镇江寺、东垭口一线打退了张部的追击。以后，张家彩又在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一个团的配合下，向牛洞、甘家坪、坪阳坝一带“进剿”，屠杀革命群众，焚烧农舍民房。革命武装为保卫这一中心区域，动员坪阳坝、甘家坪的“神兵”一千余人，向“进剿”部队反击，在肖子垭毙敌百余人，缴枪数十支。但是由于革命武装对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估计不足，没有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硬打硬拼，以致在坪阳坝战斗中损失很大，“神兵”大部溃散。

坪阳坝战斗失利后，巴东党组织吸取了经验教训，决定立即转变方针，深入群众，进行秘密活动，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积蓄革命力量，待机再起。自一九二八年六月到一九二九年冬，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党的组织重新发展起来。在巴东的后坪、西陵、牛洞、甘家坪、白湾、麦峰、坪阳坝及秭归、兴山边界地区相继建立了党支部，共有党员二百余人，并组成了中共巴兴归县委会。一九二九年冬在鄂西特委代表的指导下，于甘家坪召开了县委扩大会。会议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决定在已有党组织的地区，大力发动群众斗争，重新组织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巴兴归苏维埃政权。根据会议决定，黄大鹏、陈宗培等，组织了一支装备有五支长短枪和许多刀矛的百余人的游击队，突袭了罗溪团防，消灭了全部守军，缴枪三十余支。此役，陈宗培英勇牺牲。

罗溪的胜利，对于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坚持斗争的党员和群众是个很大的鼓舞，许多人踊跃参加游击队。在这种形势下，成立了工农革命军鄂西游击大队，由李子洋、杨显应分任正副大队长，下设两个中队，分别活动于甘

家坪、牛洞、坪阳坝一带，配合地方工作，恢复发展根据地。

与此同时，还在蔡家团防中发展了党的秘密组织，并取得了团防队长的职务。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在蔡家团防向鄂西游击大队进攻的前夕，党组织派人诱杀了团总并处决了蔡家、火峰等地的几个土豪劣绅，将这股团防三十余人改编为蔡家游击队，以周克纯为指挥，王春山、田相应为正副大队长，在蔡家山、观音堂、坪阳坝一带活动。后因麻痹大意遭敌袭击而失败。

一九三一年三月初，鄂西游击大队在黄大鹏、廖景坤等率领下从甘家坪出发袭占兴山县城，全歼城内团防，缴枪十余支。此后，该大队即在兴山、秭归边界的烟敦垭、龚家桥、小龙、阳坡、滩坪一带不断打击团防和反动“神兵”，扩大游击武装，部队发展到两百余人。六月间返回甘家坪，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十九师，以刘子泉为师长，胡荣本为政治委员，下辖四个连。同时，组织了赤卫队等群众武装，成立了以高云景为主席的巴兴归苏维埃政府。

九月，兴山保卫团准备向苏区进犯，红四十九师在赤卫队配合下先发制人，攻其不备，再次袭击兴山县城，击毙敌百余人，缴枪数十支。

十月，川军戴天明旅一个团由巴兴归三县团防配合，在“土铲三尺，鸡犬不留”的口号下，向苏区大举进攻。县委鉴于红军处境不利，遂决定留下部分同志在苏区坚持秘密斗争，红四十九师转移到房县、兴山边界的高桥河、黄连坪、老林湾、花甫岭一带打击小股敌人，开展游击战争。

十一月，敌人“围剿”高潮过后，红四十九师返回苏区休整。师成立了政治部，以潘兆麟为主任，部队编成两个营，以杨显应、谭联科分别担任营长。休整后，部队分五路出动，开展游击战，配合群众斗争。一个月后，苏区逐渐恢复，红四十九师发展到三百余人，一九三一年初，进至罗溪一带开辟工作。

红二十六师和襄枣宜苏区的创建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中共鄂北特委在枣阳县发起暴动，组成了工农革命军——枣阳游击队，由程克纯（祖武）领导活动于枣阳西部的蔡阳铺、璩家湾一带。到一九二八年五月，在枣阳以西的蔡阳铺、璩家湾、乌金店、程家坡、隆兴寺地区和襄阳东部的王家集一带开辟了一块游击根据地，组织了五百余人的赤卫队。此时，游击队发展到三百余人，编成一个总队，以程克纯为队长，李实为党代表。六月，桂系军阀对枣西游击根据地进攻，游击队和赤卫队曾多次组织反击，但未能成功。至十月，游击队因遭敌严重打击而失败，枣西游击根据地丧失。

与此同时，枣阳的党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破坏，保留下来的部分同志，隐蔽在枣阳、襄阳、宜城边界的农村中，进行秘密斗争，并以部分党员打入团防内部作兵运工作，等待时机。一九三一年春，国民党正规军调去参加蒋、冯、阎军阀混战，反动力量相对减弱，鄂北特委决定以枣阳为中心恢复武装斗争。枣阳的党组织立即组织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收集过去埋藏的枪支，成立了襄枣游击大队，在杨秀阡、余益庵、张香山等同志领导下，再次公开发动枣西的革命武装斗争。四月十六日，游击队在当地群众和打入团防内部工作的同志配合下，袭击蔡阳铺的保卫团，将其大部消灭，缴枪数十支。接着，又乘胜进击，消灭了瞿家古城、黄龙垱、璩家湾等地的团防，缴枪百

余支。七月建立了以黄龙垱、璩家湾、蔡阳铺、耿家集为中心的纵横一百余里的根据地，游击队发展到五百余人，改编为红二十六师，以张香山为师长，余益庵为党代表。为了加强根据地工作的统一领导，在中共鄂豫边特委的领导下（这时襄枣宜地区已由中央划归该特委领导）成立了鄂豫边革命委员会，程克纯为主席。并建立了下属的襄东、宜东、枣阳等县苏维埃政权，襄枣宜根据地形成。

第二章

红二军团成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及真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

第一节红四、六军会师公安， 红二军团成立

红二军团成立在曲折的斗争中胜利发展

一九三〇年五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红军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各地红军分别集中组成军团和军，执行“争取革命暴动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直到全国政权夺取的总任务”。要求红军集中力量“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消灭敌人主力”。会议还要求在八月以前无条件地扩大红军五十万，并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和组织序列，以统一军制。鄂西特委派段德昌参加了这次会议。上海红军代表会议后，红六军七月一日攻克公安（南坪）。七月三日进驻西斋的红四军得知红六军攻占公安的消息后，便经申津渡进至公安，七月四日与红六军在公安会师。七日，两军在公安召开联席会议，红四军改称红二军，成立二军前委（会师前红四军是由湘鄂西前委领导的），并开始北渡。红六军自公安出发，攻打弥陀寺，歼敌二百余。此后，两军在斗湖堤一带渡江，红六军在前，红二军在后。在红二军渡江时，敌舰阻扰，被击退。两军全部安全过长江。到达郝穴后，确定进攻监利。红二军攻下了监利的堤头镇，歼敌二百余人。红六军经普济观、太马河向监利进攻，进至刘家铺时，遇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师两个团的顽强阻击，未能实现攻城计划。两军即撤到普济观、沙岗一带休整。“在普济观开二军团前委会，正式成立了红二军团，编成了二军团指挥部”，“开了一个星期的会，研究得很仔细”。经讨论统一了部队的编制序列，红六军的纵队、大队、中队、分队改组成为师、团、营、连、排，并以排为单位成立伙食单位。红二军，原来的路指挥部改组为师，下属团、营、连、排。

红二军团的编制序列和领导人如下：

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前委书记、政治委员（鄂西特委书记由周小康代理），孙德清任参谋长，柳克明任政治部主任（柳系中央代表，在巡视洪湖工作后留鄂西工作）。第二军：贺龙兼任军长，朱勉之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四师及警卫团。第四师，王炳南任师长，陈协平任政治委员，向鲁清任参谋长；师辖第十团，团长张一鸣，政治委员吴凤卿；第十一团，团长覃甦，政治委员汪毅夫；第十二团，团长吴虎臣，政治委员张海涛。警卫团，团长贺佩卿，政治委员吴协仲。第六军：邝继勋任军长，下辖第十六、十七师。第十六师（红六军第一纵队改编），王一鸣任师长，王鹤任政治委员；师辖第四十六团，团长李骑；第四十七团，团长贾鸣钟，政治委员邱鸿禧；第四十八团，团长桂伦，政治委员谭抗。第十七师（红六军第二纵队改编），段德昌任师长，许光达任政治委员；师辖第四十九团，团长刘仁载，政治委员

见 1930 年 7 月 22 日二军军委《关于红二、六军会师前部队作战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见 1961 年 2 月 2 日贺龙《关于一九二七年冬——一九三一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的谈话》。

戴文斌；第五十团，团长张海清；第五十一团，团长陈华山，政治委员段德福。

红二军团在普济观一带尚未全部完成整编工作，即向东北转移。红二军开驻府场，红六军开驻峰口时，继续进行了整编工作。

红军第二军团和军团党的前委的成立，标志着湘鄂西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使湘鄂西苏区的主要武装力量在组织上达到了统一。红六军过去是没有自己伙食单位、分散在群众家里吃饭的游击队式的队伍，红二军的组织编制也比较杂乱，现在都整编成为统一编制的正规红军，这对革命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普济观召开的前委会议还研究了部队建设、行动方针和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

关于部队建设，前委认为，由于红二军和红六军发展历史不同，诞生地区不同，各有其自己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因而确定，要进一步加强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建立和健全各级政治机关，充实工农成分，提高政治素质，严肃认真地整顿纪律，加强团结教育；并要求边打边练，利用战斗间隙，结合实战需要进行军事训练。

关于部队的行动方针和根据地的发展方向，前委决定，要充分利用统治阶级内部分裂的有利时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当时湘鄂西的国民党正规军已大部开赴中原地区参加蒋、冯、阎军阀混战，洪湖地区仅有讨逆军新编第三师李云龙部及独立十四旅彭启彪部分驻于沙市和监利等要点，其余各地只有团防、白极会等反动地方武装防守，出现了有利于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新形势。鉴于湘鄂西各根据地之间及各苏区内部许多地方仍然处在反动势力的控制之下，前委认为，当前决策的关键是：充分利用这一有利的时机，迅速发展与扩大红军力量，进一步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因此决定，首先集中力量以六个月为期，拔除洪湖苏区内部的白点，肃清地方反动武装，以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尔后，逐次开辟敌人统治较弱的襄河北岸的京山、钟祥、潜江、天门等地，再向荆（门）、当（阳）、远（安）地区发展，逐步使湘鄂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实现这个计划，就可北与襄枣宜苏区打通，西与巴兴归苏区打通并联系湘鄂边，红二军团就有了跨襄河、长江的广大回旋地区，踞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战略地位。

根据前委上述决定，各部队于七月下旬分两路向东北挺进。军团主力扫除了龙湾、熊口等白点，然后跨过东荆河解放了潜江县城，基本上肃清了襄河以南潜江县境的反动势力，残敌窜至襄河以北，红军乘胜北渡襄河攻占了天门重镇岳口。国民党军恐红军向东发展威胁武汉，急令其驻汉川的教导第三师及第二十五师一部增援岳口、仙桃一线，纠合当地北极会、大刀会等反动武装拼命反扑，防阻红军。北极会是一种封建会道门组织，也叫白极会，以土豪为骨干，匪首称“老师”，按乡、村组织编练队，胁迫群众参加，蔓延沔阳一带，不断向苏区发动进攻，使东荆河一带革命工作遭到很大破坏。红二军团主力击退敌之反扑后，为了首先巩固襄河以南地区，然后再稳步向外扩大，主动撤至襄河南岸。与军团主力在潜江地区行动的同时，红六军十七师赴沔阳地区打击白极会等地主武装，在杨林尾等地严重打击了反动武装，残敌窜至彭家场等地。战斗中，第十七师牺牲一位团长。至此，洪湖苏区的江陵、监利、潜江、沔阳等县联成了一片，各地的游击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地方武装，也在新的形势下有了扩大和提高。

一九三一年上半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倾路线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过分夸大大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地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此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制定了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将各级党、团、工会领导机关合并组成领导武装起义的行动委员会。规定湘鄂西红军帮助鄂西与鄂西南地方暴动，尔后各路红军向武汉进迫，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中共湖北省委也在六月通过了《湖北政治任务决议案》，认为“湖北是中心区之一”，具备了“革命首先在湖北胜利的可能”，要加紧准备武装暴动，争取革命首先在湖北胜利的前途。

在此期间，鄂西特委由周小康主持，在江陵沙岗的全家渊召开了鄂西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因敌情紧迫，大会只开了三天，即告结束，没有形成决议，也没有进行选举。特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左”倾方针，指责红二军团会师时没有攻取沙市是右倾，违背了中央的集中进攻路线；不同意前委在普济观会议上议定的行动方针，坚决要红二军团攻打沙市。

红二军团经月余战斗行动后，在府场、峰口等地休整了一周，进行了战术、技术训练和未完成的整编工作。由于前委的正确领导和全军上下一致的努力，部队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休整之后，红二军团以突然的动作攻占了荆门县的沙洋镇，并以一部兵力渡襄河向东发展。就在红二军团胜利进展之际，鄂西特委连续来信催促他们向南进攻沙市。红二军团被迫放弃原来计划，回师攻打沙市。

沙市南邻长江，交通方便，是国民党在鄂西的统治中心。守敌为独立十四旅，约两个团的兵力，并筑有坚固的工事。红军九月五日发起进攻。因缺乏攻坚的装备和经验，顽强战斗一昼夜，未能攻克，部队受到很大损失，伤亡达千余人，红二军四师十团团团长张一鸣等英勇牺牲。攻城失败后，红二军团退至周老嘴一带整顿。

此时中共湖北省委行动委员会又令红二军团进逼武汉，配合鄂豫皖、湘鄂赣等地红军实现夺取全省政权的任务。前委为执行上述指示，同时兼顾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决定结合普济观会议确定的方案，以红二军沿潜江、天门、京山地区前进，红六军沿监利、酒阳、汉川地区前进，逐步向东北方向发展。九月上旬，红二军自潜江渡襄河到达永隆河一带。红六军从江陵地区出发，经监利县境时，值江南反动武装大举“清乡”，红六军遂渡江打击“清乡”的敌人，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援与石首、华容二县游击队的密切配合下，先后攻克石首、藕池等城镇，毙敌石首县长以下数百人，缴步枪三百余支、机枪九挺，扩大了江南根据地。

这时，中共中央派邓中夏赴湘鄂西任特委书记及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九月十二日，邓到洪湖地区，当即命令部队返回洪湖附近集结。九月二十日，在周老嘴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共中央要红二军团配合红一、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的指示。讨论中，以周逸群为代表的一些同志认为：置多年艰苦创建的根据地于不顾，驱使红二军团从鄂西奔往遥远的长沙，直接违背了游击战争的原则，也超越了客观的可能性，即使打下来也站不住脚，要求与会同志慎重考虑。但这些正确的意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最后还是决定红二军团自螺山、白螺矶一线渡江，攻占岳阳，截断武（汉）长（沙）铁路交通以配合红一、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并且按照第二次“左”倾路线的要

求，将大部地方武装的人枪编入了红二军团。洪湖根据地仅保留了拥有八十余支枪、三百人左右的武装。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特委决定另行组织民警和红色警备队担负保卫根据地的任务。

为在渡江前使洪湖根据地得到巩固，红二军团决定先攻下监利。邓中夏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中夏到后，立调第二军团回来。九月二十日，中夏赶到周家嘴（周老嘴），召开前委军事会议，全体接受中央所指示的路线（即渡江与一、三军团配合行动之路线）。但在未渡江以前，大家觉得有攻下监利再行渡江的必要。理由：一、鄂西赤色区域不致因红军渡江完全抛弃。二、……攻下监利可以声东击西，乘敌不备以渡江。三、大家估计攻下监利只须三日并可保障全胜。因此决定先攻下监利再渡江。”

监利位于江汉平原，南枕长江，东襟洪湖，是敌人阻塞洪湖根据地南北通路的最大据点，仅保安队就有十六个连队之多，且有国民党军新三师一部驻防。一九二八年以来，红军曾两次攻打监利，均未攻克。这里的群众深受国民党的残害，此次攻打监利，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监利、石首、华容等县群众、赤卫队、游击队支援与配合红军作战的达数万人，担负了送饭送水、运伤员、搜索溃散隐蔽的敌人等任务，积极支前参战。红军自普济观等地出发，九月二十二日拂晓，分三路向监利攻击前进。以红二军四师一部攻占堤头，切断监利敌军与江陵的联系；以红六军十六师一部攻占毛家口，消灭红军背后之敌；以红六军十七师攻占太马河和刘家铺，从正面进攻县城。攻城红军在北郊曾家夹堤、火把堤一线击溃了守敌之后，经几次强攻，突入城内。其时，打入敌军内部任连长的中共党员杨家瑞，率部里应外合。红军攻城得手后，残敌一个营退守城南江堤和大庙顽抗，在红军压迫下，于二十三日晨缴械投降。此役激战一天一夜，歼灭国民党军新三师教导团及监利保安团等共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迫击炮五门。红军也受到了很大伤亡。邓中夏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二军此次攻下监利，死伤太多，枪多于人。”至此，监利全境全部解放，荆江南北，湘北、鄂西连成为一体。二十三日上午，城内男女老少敲锣打鼓欢庆胜利，下午召开了有数万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这是红二军团成立后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精神，加强了两军的战斗团结。

二十四日，鄂西特委及红二军团前委在监利城召开联席会议，对湘鄂西党在目前的政治任务、政权组织、党的组织和军事行动等问题作了全面讨论。会议确定：将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将鄂西联县政府改为湘鄂西联县政府，统一领导鄂西和湘鄂边地区的工作。因邓中夏随红二军团行动，会议决定周逸群专事地方工作，代理湘鄂西特委书记，兼任湘鄂西联县政府主席，周小康改任特委组织部长。因邝继勋调中央另行分配工作，红六军军长由段德昌升任，红十七师师长由许光达继任，李剑如为红十七师政治部主任。同时，根据长江局意见，任命柳克明为红六军政治委员。

九月二十八日，红二军团进至朱河一带准备渡江时，受中共中央派遣的汤慕禹、刘鸣先来到湘鄂西。他们带来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命令部队停渡待命；任命汤慕禹为红六军军长，刘鸣先为洪湖红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二十九日，前委在朱河召开紧急会议。关于人事问题，大家认为段德昌就职仅数日，如此变动对工作不利，根据贺龙提议，决定贺龙专任军团总指挥，总指

见 1930 年 9 月 30 日《邓中夏同志关于二军团行动方向向中央的报告》。

挥部参谋长孙德清改任红二军军长，汤慕禹任总指挥部参谋长，刘鸣先的任命不变。关于部队行动企图则发生了争论。这时虽已得知红一、红三军团已退出长沙转移到了株洲、醴陵、萍乡地区，但邓中夏仍主张：“不管一、三军团是否退去，我们依然渡江。其任务与前不同，前在截断武长铁路并占领岳州，堵住武汉白军，好让一、三军团在湘境内覆灭所有在湘敌人，现在任务在于占领岳州，即长驱直捣长沙，以激起一、三军团的反攻。”这一意见未获与会多数同志赞同。最后决定在中央新的指示未到达前，继续执行原订的开辟襄北和向荆、当、远地区发展的计划，首先集中全力进攻仙桃、岳口，彻底肃清东荆河以北襄河以南地区的反动武装，尔后再以红六军夺取天门、京山，以红二军夺取钟祥、荆门。

十月五日，红二军团分两路向仙桃前进。六日，红二军收复沔阳县城，继于张家场歼敌两个连，乘胜占领了里仁口；红六军经尤拔攻占了彭家场。七日，两军合攻仙桃，歼守敌一部，缴枪二百余支，残敌退守襄河北岸。此次行动，有汉川游击大队编成的中央独立师一部和沔阳赤卫队编成的工农请逆军三千余人积极配合作战，对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汉川中央独立师，是根据长江局指示为执行配合攻打武汉的任务于九月上旬编成的，吴英为师长，黄光一为政治委员。曾奉邓中夏命令留在监利一带游击，镇压反动武装。在打击沔阳一带敌人的斗争中，红军对白极会采取了打击其反动上层，争取下层群众的政策，收到良好效果，被反动势力欺骗、裹胁的群众纷纷脱离白极会，向红军靠拢。

克仙桃后，部队本应北渡襄河进攻岳口，开辟襄北地区。但邓中夏认为北进襄北是“大军冒进，敌情虽然（不）复杂，后方失其联系，亦为军事所忌。又天门、钟祥、荆门等县并非富庶之区，经济只能小解决，不能大解决。因此，决定……不再北进，移师南征。”据此，部队占领仙桃只两日，便退回峰口，否定了在朱河作出的决定。邓中夏只想攻打大中城市，没有乘胜发展胜利，又一次丧失了扩大根据地的有利时机。

红二军团成立后，三个月中，虽有“左”倾路线的干扰，但仍基本肃清了洪湖根据地内部白点，解放了石首、监利、沔阳、潜江等县城和广大乡村，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沉重打击反动武装，广大群众的斗争热情受到了极大鼓舞，鄂西根据地的局面得到进一步发展，苏区纵横达数百里。红二军团和地方武装也在实际战斗中得到了锻炼提高，人员扩大到近三万人，战术、技术也有了进步。邓中夏很重视部队的团结和建设，在政治上开展反不良倾向的斗争，极力保证部队在思想政治上的高度统一。他还经常强调在经济分配和部队补充方面尽可能消灭可以引起不平的现象。红二军在湘西北时，那里吸大烟的现象比较普遍，战斗负、勤杂人员中也有不少人吸大烟，甚至个别干部也吸，此时这种现象已基本消除；红六军存在的极端民主化倾向也有了相当克服。两军团结有了加强，部队建设前进了一大步。

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湘鄂西联县政府成立

为贯彻九月二十四日特委及前委联席会议决议精神，湘鄂西特委于十月

见 1930 年 9 月 30 日《邓中夏同志关于二军团行动方向向中央的报告》。

见 1930 年 10 月 19 日《邓中夏同志向中央的报告》。

上旬在监利城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由周逸群主持，讨论通过了《政治任务决议案大纲》等重要文件，并决定召开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于十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在监利城茶庵举行。会议开得十分隆重，到会代表共八百余人，革命气氛极为高涨。周逸群主持大会，邓中夏、贺龙从前方赶回参加了开幕式，邓中夏作了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决议案，制订了《湘鄂西苏维埃法令》等文件。这些政策法令虽然也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但许多主张和作法，吸取了已往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教训，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比如在军事问题决议案中明确指出：“湘鄂西工农群众经三年斗争之久，有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军人（队），由赤卫队、游击队发展成为红军，扩大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随着革命的发展，红军扩大办法要由志愿兵过渡到民兵制，使广大工农认识到红军是他们自己的军队”，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服兵役是一种义务。要成立赤色警卫队、赤色教导队、赤色守备队、少先队等军事组织，并分别由湘鄂西军事委员会和县、区政府的军事委员会领导，担负肃清根据地反革命，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任务。这样就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赤卫队三结合的人民武装体制。

这次大会，对统一苏维埃区域的路线和策略，加紧土地革命，促进根据地联成一片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大会选举产生了湘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周逸群当选为联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崔琪为副主席，正式建立了湘鄂西联县政府，下辖三十余县。会后，特委还整顿和健全了县、区、乡各级政权组织，制定了工作制度，加强了地方干部的培养。湘鄂西地区政治和经济建设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第二节红二军团南征枝柘坪改编

占领南、华，进攻津、澧杨林寺战斗失利

红二军团在峰口休整一周，加强了军政训练，整顿了各级机关，裁减了勤杂人员和行李马匹，充实了战斗部队，并将汉川中央独立师一部（二百余人）编入红二军团，为再次行动进行了准备。十月中旬，中共中央长江局发来指示，要红二军团渡江南下，在岳阳方面截断武长铁路，配合红一、红三军团第三次攻打长沙。但前委考虑岳阳方向敌人兵力较大，不易得手，乃决心攻占常德牵制敌军，以配合一、三军团进攻长沙。十月十五日，部队自峰口等处出发，红二军由石首渡江经鲢鱼须、梅田湖径取南县；红六军十七师由监利陶家埠渡江，经长岗庙、松木桥向华容攻击，红十六师由调关渡江，首先歼灭了万庾之敌，接着又配合红十七师进攻华容。二十二日，红二、红六军分别占领南县、华容，歼川军新十一师及南、华等县团防共千余人。在红二军团进攻过程中，华容、石首的地方武装积极牵制和打击敌人，予以密切配合，并乘势发展至荷花嘴、三仙湖一带，南、华两县全境解放，取得了南征初战的胜利。

红二军团攻克南县、华容后，因南县、常德间河流湖泊纵横，不便于大部队行动，乃决定以红十六师经黄山头直逼津市，军团主力首先夺取公安，尔后经澧州攻击常德。三十日，红二军占领公安，红十七师攻克藕池，并在闸口歼川军新编第七旅李宗鉴部一部。十一月一日，红军自公安继续向澧州推进，在三汉河歼湘军陈运夔团一个营，四日进抵澧州城下。同日，经黄山头向津市推进之红十六师协同红四师十团，于白洋堤歼湘军戴季韬团一部后，乘胜占领津市。

红二军团突然出现在江南，占领津市围攻澧州，湖南国民党军甚为恐慌。何键一面令陈运夔部坚守澧州，一面令退缩到安乡的新十一师、驻临澧的独立第一旅李国钧部和驻慈利的湖南警备第一军陈渠珍部前往增援。十一月九日，敌援军先后进抵新洲、东山铺一线，一部到达澧水南岸。红军集中主力进攻澧州，一部兵力扼守澧水北岸阻击援敌。相持至十一日，国民党援军相继逼近，红军腹背受敌，情况十分不利。据此，前委决定放弃对澧州的围攻，撤出津市，转而进取石门，准备在石门建立临时后方，作为继续向常德进攻的基地。

十一月十三日，红军攻占石门，抓紧时间进行休整、补充。同时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在较短时间内，先后建立了石门县和磨岗隘、泥沙、子良坪、太平街、南拆坪区苏维埃政府，组建了石门县游击大队，动员了一批工农群众参加红军。

十一月下旬，国民党军进犯。邓中夏率红六军十七师留守石门，贺龙率军团主力迎击敌人。二十一日在夹山寺击溃了国民党军新十一师，二十三日有余氏桥歼国民党军独立第一旅一部，乘势占领了临澧县城，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红军占领临澧后，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蒋、冯、阎军阀混战已经结束，国民党军正大批南调，向各根据地进攻；红一、红三军团没有向长沙进攻。同时，在缴获的国民党文件中得知津市之敌也有向石门进攻的企图。贺龙考虑到国内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必须重新研究部队的行动方针，因此，于二十六日把部队撤至合口，与红十七师会合。在合口举行了

军团前委会议。会上，大多数同志主张将部队经公安、藕池撤回洪湖根据地，准备迎击敌人的围攻。在此之前，周逸群、万涛等也曾数次致信邓中夏，认为红二军团不宜久离根据地，孤军南征，而应该在巩固根据地的同时，逐步向外扩展，要求他迅速率部返回根据地。但邓中夏不顾客观形势的变化，否定了这一意见，坚持再次攻打津市、澧州，以实现其夺取常德的既定方针。

十二月一日，红二军团再次进逼津市、澧州。二日，红六军分两路向津市国民党守军新十一师一部进攻。一路（第四十九、第五十团）由石灰港进攻，因敌人抵抗十分顽强，经过激烈战斗后，才占领了津市街口，但随即遭敌猛烈反扑，被迫退出；另一路（第四十八、第五十一团）经白洋堤进攻，在中渡口为敌所阻，直至当日半夜才渡河接近津市，也因敌人拼命反扑进展困难，经第四十六团及警卫团增援后，始将敌军击退，占领了津市，残敌退往新洲。此次战斗部队伤亡很大，红六军参谋长刘仁载英勇牺牲，同日，红二军以迅猛动作将澧州敌陈运夔部包围，并顽强进行攻击，但因城墙坚固和缺乏攻城装备，再次攻城不克。

蒋、冯、阎军阀混战结束后，蒋介石立即调集十多个师的兵力对红军进行“围剿”，并组建和加强了湖北、福建、江西等省的“剿匪”总指挥部。在“围剿”方法上，也由过去的几省军阀联合“会剿”转为由蒋介石统一组织和指挥的“会剿”，在湖北，分别任命了鄂西、鄂北、鄂南、鄂东“剿匪”司令。以何键为首的湘军，在结束了对桂军的作战之后，也调集主力向红军进攻。十二月初，国民党军第十九师李觉部纠集湘西土著武装、湖南警备第一军陈渠珍部等共两个多师的兵力进攻红二军团。一路陷石门，一路（主力）从临澧向澧州逐步推进，八日晚进抵澧水南岸之停弦渡、万河、宝塔湾一线，其一部并渡过澧水占领了合口。与此同时，敌第十六师彭位仁部则从沅江向南县、华容进犯，新十一师残部自新洲配合第十九师进行的反扑。此外，在红军南下津澧之时，国民党军李宗鉴部乘机重占了公安，威胁红二军团侧后。由于澧州战斗旷日持久不能结束，而且敌援兵已相继赶到，红军不得不自津、澧撤退。十二月九日，至松滋杨林市、街河市一线休整。红二军于十二日重占公安，并以第十二团少数兵力掩护伤病员及物资返回洪湖根据地。本来就极少成功可能的南征至此结束。

在红二军团第二次进攻津、澧期间，国民党军已陆续在洪湖根据地周围集结，监利、潜江、华容县城相继失守，湘鄂西特委要邓中夏立即率红二军团返回洪湖准备迎击敌人的“围剿”。但邓中夏片面强调洪湖地区河流、湖泊太多，不利部队行动，主张红军主力离开洪湖地区，另找地方“创建第二中央苏区”，拒绝接受特委意见。贺龙、段德昌等前委大多数同志，积极支持特委意见，认为洪湖是老根据地，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只要坚决依靠广大群众完全能够打破敌人的围攻，坚决反对红军主力远离洪湖地区的主张。但邓中夏否决了前委大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并将坚持正确主张的红六军军长段德昌调离主力部队，改任湘鄂西联县政府赤卫总队长，以汤慕禹接任红六军军长。于是，段德昌带领一部分伤病员返回了洪湖根据地。

红二军团退至杨林市一带后，洪湖形势更加紧张，特委再次要求红二军团迅速返回洪湖根据地。邓中夏仍然拒绝接受特委的意见，并于十二日、十四日先后两次召开前委会议，不顾前委多数同志的反对，决定以松滋刘家场中心“选择阵地以待敌至”，与其决战。同时，又拟令红六军向松滋等地进攻，创建“第二中央苏区”。当此决策不定之时，他同意了贺龙为解除侧后

威胁，保持洪湖根据地的通路，攻占公安的建议，令红二军攻占了公安城，但红六军仍分置于杨林市、街河市不动，以致延误了时间，未能集中力量作好迎击敌人的部署。

这时国民党军继续向红军进逼。十七日晨，从宝塔市、官桥、石子滩一线发动猛烈进攻，以优势兵力突入了红军阵地，其中一路迂回占领了西斋。红六军因兵力分散，未能击退进攻之敌。十八日，敌一部突入街河市以北地区，另一部接近杨林市，直接威胁军团指挥机关，形成了分割包围的态势。是日晚，军团指挥部向刘家场转移，并命令各部队撤退。红六军四十八团和五十一团各一部约千余人，因被敌隔断与主力失掉联系，返回了洪湖根据地。红二军在公安得悉敌向杨林市进攻，即迅速集中主力驰援。二十日，在谷升寺击退进攻公安之敌后，得悉军团指挥部已向刘家场转移，即经申津渡向刘家场靠拢。二十四日，全军团在刘家场集合，经子良坪、泥沙、赤绥河、南北墩向鹤峰转移。

红二军团南征，共歼敌六千余人，先后解放了南县、华容、藕池、石首、公安、石门、津市、临澧等城镇及广大乡村，取得了很大胜利。但由于邓中夏坚持执行第二次“左”倾路线，没有采取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军事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脱节，以致所占城镇得而复失，而在杨林市地区又进退迟疑，丧失主动，以致遭受重大损失，红军伤亡两千余人，仅红六军减员就达四分之一。对于这种指导的失误，后来邓中夏也有所觉悟。他说：“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完全是盲动主义的立三路线，他的特点是脱离后方根据地，脱离群众，只凭军事行动向中心城市发展”。“渡江以来，我们军事行动的最大错误，在于成了单纯的军事行动”。

红二军团转战湘鄂边，改编为红三军

湘鄂边界山岳连绵，敌人统治比较薄弱，在红二军团南征期间，处于一个相对稳定时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下旬，红二军团转移到湘鄂边的鹤峰一带时，正值隆冬，部队给养匮乏，减员很大，士气低落。此时，原活动于川东石柱、涪陵地区，由甘占元、覃伯卿、张轩等领导的一支部队，共三千余人，有枪两千余支，因受川军王陵基部和鄂西军阀部队的追击，处境窘迫，进入鹤峰地区。这支部队情况相当复杂。甘占元部是从川军第三师中分化出来的；张轩部原为川军杨森所属；覃伯卿部原是中共川东特委领导的游击队，后自行转向鄂西地区。这几支武装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联合了起来，但又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在共产党员覃伯卿的影响下，他们打起“共产军”的旗号，提出劫富济贫的口号，分成第一路（甘）、第二路（张）、第三路（覃）军，准备投靠共产党，投靠贺龙。进入鄂西后，通过哥老会关系，与贺英部取得了联系，想在此获得立足之地。湘鄂边党组织及贺英及时将这一情况报告了红二军团。军团前委在分析这一情况时，认为，这支部队是反革命武装，是一支改组派军队，不可信任，否认了覃伯卿共产党员身分，决定以武力解决。十二月二十八日，红二军团总指挥部以邀请甘、覃、张等赴宴的方式，当场将他们逮捕，并处决了团以上官佐三十余人。二十九日在五里坪将该部全部缴械，除从中挑选千余人编入红军外，其余全部遣散。此举缴获各种枪两千余支，是红二军团在杨林市失败后的一次大的补充。在对这支部队的处理上，军团前委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没有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甚至错杀了共产党人覃伯卿，对以后争取和瓦解土著武装产生了不良影响。

解决甘、张、覃等部后，前委在走马坪开会讨论部队的行动方针问题。由于邓中夏还没有从南征失利的教训中清醒过来，仍然幻想依靠单纯军事行动迅速取得胜利，认为“一俟稍微整顿后，当然应坚决的将全军团坚决（率领）出山再打硬仗”。“不怕敌人如何强大，我们只要将敌人弱点击破，方（就）能解除敌人对我们的包围”。因此，决定二日内红二军出山，十日内红六军出山，第一步先打石门，准备依托五峰、鹤峰，在武陵山区创建根据地。

自杨林市战斗后，何键为加强对湘西的控制，将陈渠珍部编为新三十四师，对其他各土著武装分别封以团或旅的番号加以笼络，还先后编成桑植、湘乡、益阳、岳阳、桃源、慈利、石门、沅陵等县保安大队或保安团，任命第十九师师长李觉为第一区“剿匪”司令，统一指挥湘西国民党军“清乡”。一九三一年一月初，红军向石门进攻时，正值敌人在石门西北乡一带“清乡”。红军进至白沙渡一带，与第十九师二团及新三十四师顾家齐支队遭遇，激战竟日，敌向东南败退。军团命令红六军跟踪追击，红二军经新关占石门断敌退路。次日拂晓，红二军占领石门城。红六军进到瓜子峪、扩市、七家峪一线。因退却之敌在笔架山、油家坪一线高地进行顽抗，双方形成对峙局面。为歼灭该敌，军团乃令红二军自石门北进，协同红六军进行夹击。红二军自石门经新关进至松林峪、白云山一线时，与自新安、合口方向赶来增援的敌第十九师遭遇。敌人除地面部队外尚有飞机数架助战。战至下午五时许，红二军团主力撤出战斗，向磨岗隘方向转移。敌人随后尾追。转移途中，红军在石门群众和赤卫队的积极支援下，于桐子溪、袁公渡、磨岗隘等地进行了顽强的阻击战，红二军一部从九里坡向敌侧翼猛烈攻击，予敌以重大杀伤后，退出战斗。此次在轻敌冒进思想指导下，东下石门，“打硬仗”的行动就此失败。

石门战斗后，红二军团由于伤亡过大，无力进行较大战斗，遂转至五峰、长阳、巴东、建始等地游击，并会合了湘鄂边独立团。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红二军团攻克龙舟坪（今长阳），歼敌千余，恢复了县苏维埃。之后，在各县地方武装配合下，又先后歼灭了长阳、五峰等地几股团防，配合地方工作建立了游击队。但由于湘鄂边地区人力、物力均甚缺乏，根据地人民虽尽全力支援红军，仍不能满足部队需要，加之连续战斗，得不到及时的休息和补充，部队锐减至万余人，处境十分艰难，鉴于以上情况，前委乃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底决定在枝柘坪休整一个月，并派红六军十七师到松滋、公安一带筹集粮食。

红二军团在枝柘坪休整期间，洪湖根据地正处于极其困难的反“围剿”斗争时期，沔阳、潜江、江陵地区几乎全部陷于敌手，根据地遭受了严重破坏和摧残。湘鄂西特委再次发信，批评邓中夏“根本违背国际和中央的路线，实行逃跑主义，不要群众和苏维埃根据地”。在二月十六日的一封信中写道：“二军团走后四个多月没有与赤区取得联系，又正当（敌人）加紧进攻苏区之时，我们只有坏枪数百支，而子弹又非常缺乏，敌人一万余人向我进攻，兵工厂、医院均被焚毁，损失二十余万元，牺牲群众万余人，沔阳群众完全反水，数百里苏区几乎（无）一处不被白军摧残，我们认为湘鄂西党现在遭受了这一严重的打击与困难，完全要你负责。”湘鄂西特委要红二军团立即

见 1931 年 1 月 2 日《邓中夏同志给中央的报告》。

回援洪湖地区粉碎敌人的“围剿”，以恢复根据地。红二军团的广大指战员对洪湖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十分关心，也积极要求回援洪湖。为了确定部队的行动方针，红二军团于三月底、四月初在枝柘坪召开前委会议和党员代表大会。会议争论十分激烈，争论的焦点是在洪湖根据地反“围剿”期间红二军团的行动方向问题。当时有两种主张：一是“上山”，一是“下湖”。贺龙和绝大多数与会者主张下湖，回鄂西参加反“围剿”斗争。洪湖根据地地跨襄河、长江，处于重要战略地位，可依托河、湖、港、汉以及与红军血肉相联的根据地人民的支援，打击敌人。但邓中夏却在敌人“围剿”的恶劣形势下，丧失了对洪湖根据地斗争的胜利信心，继续坚持其上山的主张，死抱着“依山建军向平原发展”的模式，要另创根据地。广大干部、战士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退却逃跑”，坚决要求回援洪湖，经过争论，邓中夏虽然承认了援救洪湖的必要性，但仍片面强调洪湖地区地形不利，要通过另创根据地策应洪湖的反“围剿”斗争。在邓中夏坚持下，最后确定了“开辟荆（门）、当（阳）、远（安）地区，进逼宜（昌）、沙（市），联系洪湖”的“北渡军事计划”。计划说：“本军北渡的主要目的，当然是解江陵、石首、监利、沔阳赤区之围，唯江、石、监、沔赤区现在白军重重包围之中，本军不宜陷入重围，而应采取击魏救赵之计，占领荆、当、远为根据地”。“这样去解江、石、监、沔之围才是正确的”。还说“本军过去未执行很巩固地向前发展的原则，以致轻于脱离后方，已经铸成大错”，“现时不能一错再错，如果此时不顾一切冲入江、石、监、沔赤区，小部‘跑兵’难（虽）可幸存”，“但无地势足资依据”，“而且湖港分歧，大部队难以展开，大部队当然不能藏躲，藏躲是自取灭亡”，“虽然江、石、监、沔赤区危急，无疑本军应当援救，但援救必选稳当方法，方于赤区有益与本军无害”，否则“从井救人，人固不救，求者亦死”。结果洪湖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由于失去了主力红军的支持，损失很大。

枝柘坪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治委员，孙德清任参谋长，柳克明任政治部主任。原红二、红六军分别改编为红七、红八师。红七师师长由孙德清兼任，政治委员为李剑如，下辖十九、二十、二十一团；红八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王鹤，下辖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团。另拟定由洪湖苏区的部队编成红九师；并选出邓中夏、贺龙、柳克明、孙德清等七人组成红三军前敌委员会。

在红三军北上以前，为进一步健全湘鄂边根据地的领导机构，于四月二日在枝柘坪召开了鹤峰、五峰、石门、长阳、桑植五县的党代表大会，组成了湘鄂边分区特委，以周小康任书记。另外，还整顿了各县地方武装，将湘鄂边独立团改编为红三军教导第一师，由王炳南任师长，陈协平任政治委员，董朗任参谋长，在湘鄂边根据地坚持斗争。

见 1931 年 4 月 5 日《红三军经营荆当远根据地的计划》。

第三节红三军转战荆当远， 创建鄂西北苏区

一九三一年四月初，红三军根据枝柘坪会议的决定开始北上。四日在野三关、三兴观等地歼灭守敌川军戴天明旅的段少卿团后，乘胜占领巴东，顺利渡过长江，连克兴山、秭归两城。在巴兴归根据地作短期休整，予当地党和红军以指导帮助后，向东挺进，四月十三日攻占了远安。十八日，红八师攻克荆门，红七师攻打当阳。驻宜昌、沙市等处的川军第二十一军教导师第三旅及鄂军第四十八师补充第一、第二团等部急忙增援。在此情况下，红七师被迫放弃攻城计划，撤至玉泉山、慈化寺一线与敌展开激战，红八师二十二团前往增援，仍未能将敌击退。此时，远安已陷于敌手，红三军乃撤至远安以北地区，以马良坪为中心展开地方工作。不久，敌集中第五十一师范石生部、第六十九师赵冠英部及教导师第三旅郭勋部共十几个团的兵力对红三军发起围攻，企图将红军围歼于远安、南漳地区。五月十一日，各路敌人向马良坪合围。激战竟日，未能将敌击退。当晚，红三军向北突围，经歇马河、保康、大观音堂进入鄂西北地区。红八师二十二团在战斗中被敌人割断，与主力失掉联系，在团长许光达率领下，向西突围，转至房县、兴山交界的九道梁地区。当红军占领远安、荆门之时，本可顺势东下进入洪湖，马良坪战斗失利后，也有可能在此地区游击，逐步向东发展，联系洪湖地区，但由于邓中夏不愿回到近在咫尺的洪湖根据地，又没有根据当时敌情不十分严重的情况，分兵发动群众，创建新的根据地，因而“造成荆当远为根据地，以解江（陵）、石（首）、监（利）、沔（阳）之围”的军事计划未能实现，红三军的北渡也未能给洪湖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以直接、有力的支援。红三军主力向北转移途中，在经过大观音堂时与中共鄂豫边特委领导的蕪山游击队会合，随后攻占了谷城以西的石花街。此时，因洪湖及襄枣宜根据地的红军积极活动，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师补充第一、第二团调往沙洋，第五十一师主力撤回钟祥、枣阳一带，红三军当面敌人兵力相对减少。同时，红三军自枝柘坪出发以来，转战千里，伤亡也很大。前委根据上述情况，决定集中兵力攻占均州，以此为依托，在均州、房县、保康、南漳地区创建鄂西北根据地。鄂西北地处鄂、豫、川、陕边界和武当山区，地形险要，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物产也比较丰富，对建立根据地较为有利。其不利条件是道教盛行，各种封建迷信武装力量甚大，是开展工作、争取群众的极大障碍。红三军前委为争取广大群众，打击坚持与红军为敌的反动势力，决定根据不同情况对“神兵”采取分化、瓦解和争取的政策。同时，对部队进行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寺庙的教育，要求全体人员严格遵守政策纪律，因而受到了道友僧众的欢迎，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部队在石花街休息五天以后，经小店子、草店向均州进攻。均州城垣高大坚固，守敌为第六十九师赵冠英部的一个营。在攻城战斗中，红军发扬了英勇顽强、机智灵活的战斗作风，并争取了一部分“神兵”配合作战。经一昼夜的攻击，歼灭守敌大部，占领了均州县城。均州解放后，红三军抽调一部分干部开展地方工作，同时，继续攻打陨阳，因守敌加强而未攻克。

六月初，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师一五二旅李柱中部纠集鄂豫边悍匪张连三

见 1931 年 7 月 4 日《红三军前委关于区内情况及意图向中央的报告》。

等部向红三军进攻。九日，红三军撤离均州，依托武当山麓的孙家湾、元和观等地的有利地形展开阻击战。十一日，敌在反动“神兵”配合下分三路向元和观、老营宫阵地强攻。红三军为争取主动，给敌以重大杀伤后，于十四日翻越武当山向房县转移，十八日占领房县。

红三军占领房县后，即以各级政治机关为核心，组织大批干部战士开展地方工作，成立以柳克明任书记的中共鄂西分特委，加强了对地方工作的统一领导。在分特委的领导下，红三军上下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根据地发展很快，在东至谷城的草店、石花街，西至门古寺、九峰山，南北自盘水河至大木厂，连绵数百里的狭长地区内，先后建立了十四个区和一百零五个乡的苏维埃政府，拥有人口二十余万，并且建立了赤卫队、红色补充军、游击队等群众武装，以及工会、劳动妇女协会、童子团、少先队等群众组织。以后，分特委又进一步领导群众进行分配土地的斗争，使根据地人民的觉悟日益提高。由于鄂西北苏区的开辟，使红三军结束了前一时期人不歇脚、马不停蹄的流动生活，得到必要的休整和补充。七月间，许光达得知红三军占领房县，即率第二十二团自九道梁到达房县与主力会合。

国民党军为迅速搞掉这块新生的革命根据地，以第一五二旅李柱中部纠集均州、郧阳之张连三、马大脚以及谷城的赵文启等反动地方武装，共约九个团的兵力，自东、北两面进攻房县。七月二十五日，张连三部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集结于石弦、毛塔河一带，七月三十日袭占了大木场，八月一日又进至连三坡等地，企图突袭房县城。当时红军主力正在青峰镇以东地区开展地方工作，房县只有第二十二团一部及军特务营，情况相当紧急。贺龙、邓中夏亲自率部迎敌，并急调红八师一个团增援。战斗持续三天三夜，将敌击溃，毙俘敌营长以下四百余人。因连日大雨，山洪暴发，部队行动困难，未能将敌全歼。

在张连三部向房县进攻时，李柱中、赵文启部也分两路自谷城进犯苏区。红七师及教导团在当地游击队及广大群众武装配合下，于石花街以西地区积极阻击敌人，给敌以很大杀伤。之后，红七师根据当时情况，于八月十四日撤出保康，十八日又将赵文启部阻止于八道河地区，李柱中旅到青峰镇后，亦被阻止在梅花山、斛口河一线。至二十三日，红八师经黄连树、观音堂击敌侧后。敌见势不利，仓皇逃跑，被红军追歼一部。至此，敌人的进犯被粉碎。

第四节 洪湖根据地粉碎第一、 第二次“围剿”

蓬勃发展的洪湖苏区

洪湖根据地随着红二军团成立后军事斗争的胜利，有很大发展。一九三一年冬，根据地幅员纵横数百里，除广大乡村外，还据有监利、沔阳、潜江、石首、华容、南县、公安等七座县城，控制着新堤、沙市间近三百五十公里的长江，成为当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根据地之一。到一九三一年底，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在特委和联县政府的领导下，不论在政治、军事上，还是在经济、文化工作上，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成立后，统一了各级苏维埃的领导，整顿和健全了县、区、乡各级苏维埃组织和工作制度，并从实际斗争中培养了一批与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地方干部。党组织通过苏维埃政府，发动和组织了千百万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斗争。

在土地问题上，一九三一年秋冬，为了克服土地分配中受益面过窄的缺点，根据“没收地主阶级及富农所余出佃的土地，主要的是平均分给无地与少地的农民，中农土地不变”的政策，重新分配了一次，使广大贫雇农分得了土地，从而极大地发挥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是在敌人残酷围攻和封锁下进行的。为了支持长期革命战争，中共湘鄂西党的领导机关采取了发展生产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生产。不仅农业、渔业有了迅速的发展，而且纺织、养蚕、编席、榨油、造船、造纸等手工业，也都恢复和发展起来，为了便于和敌人进行经济斗争，沟通赤白区之间的物资交流，联县政府在一九三一年秋成立了鄂西农民银行，发行了统一的货币，提高了纸币的信用。实行了统一累进税制度，开展自由贸易，进一步活跃了农村集市。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合作社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到一九三一年冬，供销合作社已发展到一百三十余个，接近平均每乡一个。联县政府很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专门设立了文化教育委员会，举办了各类学校，在瞿家湾办有红色书店，并出版报纸和《团的生活》等刊物。妇女有贫妇协会组织，除进行放足、提倡婚姻自由等反封建活动外，还根据年龄大小，分别编入了赤卫教导队、少先队等组织，为一般妇女有组织地参加各项革命工作创造了条件。

在根据地的武装建设上，湘鄂西根据地早已普遍建立了赤卫队和游击队，但由于第二次“左”倾路线采取了集中武装力量向中心城市进攻的错误方针，将地方武装大量编入了正规部队，以致地方武装遭到极大的削弱。当红二军团离开根据地南征后，保卫与巩固根据地的任务全部落在了地方武装的身上。在敌人重重包围、反动势力不断侵扰的情况下，要保卫和巩固这一纵横数百里的广大苏维埃区域，显然存在着极大困难。特别是当红军主力南进后，敌军很快占领了江南新区的公安、南县，并进而控制了华容县城，对革命力量疯狂进行反扑，巩固和保卫新区的任务就更加艰巨了。为迅速恢复和发展为第二次“左”倾路线所削弱了的地方武装，加强群众对敌斗争力量，

见《湘鄂西特委第一次紧急会议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

以周逸群为首的特委和联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 各县集中现有枪支组织“赤色警卫大队”(即游击队)，脱离生产，作为对敌斗争的基于。为便于统一领导和指挥游击武装，在联县政府赤卫总队部之下，设立了江右、江左两个指挥部。以江南的石首、华容、南县、公安等县的三、八、九、十大队组成江右军，由段玉林任总指挥；以江北的江陵、监利、沔阳、潜江等县的二、四、五、七大队组成江左军，由董朗任总指挥。

(2) 以十八岁至三十岁的青壮年编成“赤色教导军”，县组成军，区组成团，乡组成连，配以大刀、梭镖及土枪、土炮等兵器，平时不脱离生产，战时则担负支援与配合作战的任任务。另外，还将其中健壮而有斗争经验者组成挺进队，随时准备参加作战或补充红军。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底，各县的赤色教导军均先后组成。

(3) 将三十岁以上的男子及健壮妇女编成“赤色守备队”，未成年的少年儿童编成少先队、儿童团。平时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战时担负抬运伤员和组织洗衣队、慰问队以及送水做饭等战勤工作。

特委及联县政府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基本上实现了“全民皆兵和一切行动军事化”的要求。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展开了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伟大群众斗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在洪湖西岸建设起了红二军团的后方，创办和扩建了洪湖军事政治学校、兵工厂、后方医院、被服厂等。

洪湖后方医院在一九三一年共有五个。第一、第二医院设在瞿家湾；第三、第四医院设在柳关；第五医院设在邓家庙。病房大都是借用民房和没收地主的房屋。这些医院有的着重收伤员，有的着重收病员，有的主要收轻伤员，有的主要收重伤员。收治的伤病员多时达二千余人。医院有简单的手术室及药房。为了克服敌人封锁造成的困难，医院自制绷带，自制碘酒，用中药代替西药。医生不少是从上海、武汉等大城市来洪湖参加革命的。护理人员中有三分之一是妇女，他们来自贫苦的农民家庭，工作积极性高。医院条件虽简陋，但服务周到，被伤病员称为“伤病员之家”。

洪湖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创办于一九三一年三月，四、五月间开学，学生来源主要是游击队员、赤卫队员，训练内容有“步兵操典”和“步兵战斗条令”等，另每周上一两次政治课。第一期学员于一九三一年九月毕业。当时校长为刘鸣先，政治委员为戴君实，教育长为胡慎已。校址原在监利桥市以北的吴家墩及左家湖一带，刘鸣先到校后，根据特委决定一度迁往监利县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被迫迁至石首焦山河。十二月十日第二期开学，至一九三一年又迁往监利周老咀。后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洪湖军校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学校第二分校，按中央军委一九三一年通过的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学校组织条例改组，实行校长制，下设总队长及军事、政治总教员，负责实施全校的教育训练。除此之外，还设有政治部及总务处、经理处、军医处等职能部门。教育训练内容按中央军委一九三一年通过的草案执行。分校领导干部亦有调整，校长唐赤英，政治部主任鲁易，副主任郑于明，军事总教员李人一，政治总教员周治福，校务主任龚杰。下设第一、二、三(步兵)、四(炮兵、骑兵、工兵)连等军事系学员队，六个月毕业；政治系办短期训练班，两个月毕业。学员共六百人。军校由湘鄂西省军事委员会领导。

在洪湖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中，军校学生起了重要作用。在一九三二年大规模“肃反”中，夏曦错误地认为军校是“改组派和第三党的大本营，军校毕业生分配在红军中，是为反革命派别的基础”，自此军校停办。

粉碎第一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国民党集结重兵，全力围攻各革命根据地，洪湖是重点之一。蒋介石任命第十军军长徐源泉为湖北省“剿匪”总指挥，兼鄂西“剿匪”司令，后改为湘鄂川边区清乡督办，统一指挥第四十八师（徐源泉部）、第三十四师（岳维峻部）、新十一师（张英部）、第十一师（陈诚部）、新三十四师（陈渠珍部）及新编第二旅（刘培绪部）、第十六师（彭位仁部）、新编第三旅（徐德佐部）、新编第五旅（潘善斋部）、新编第七旅（李宗鉴部）、暂编第十九旅（罗启疆部）和湖北警备旅（容景芳部）、川军第二十一军教导师第三旅（郭勋部）等共六个师又七个旅的兵力，以及各地团防、常练队等反动武装向革命根据地发起“围剿”。“围剿”计划分三期进行，重点是洪湖根据地。第一期以江北的潜江、沔阳、监利地区为重点，第二期以江南地区为重点，待彻底摧毁洪湖根据地后，再以全力进行第三期“围剿”。向湘鄂边根据地进攻。他们企图采取“分区重点围攻，步步为营，逐步清剿”的方针，以实现一块一块地摧毁根据地的目的（国民党对洪湖根据地的第一、第二期“围剿”，也就是洪湖根据地军民常说的第一、二次“围剿”）。

十一月，国民党军开始向洪湖根据地周围进逼，控制要点。三日，第十六师占领南县、华容。二十二日，第十军所属新二旅占领监利。接着，第四十八师又先后占领潜江县城、沔阳的张家场和江陵的郝穴、新厂、普济观等地。

特委及联县政府自监利失守，移驻石首之调弦口后，即一面敦促红二军团回师洪湖，一面大力发动群众，利用洪湖地区水网、湖泊、堤岸、苇林等有利地形，采取夜袭、伏击等战术，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向根据地周围迫近之敌。江左军的沔阳大队在赤色教导军配合下，收复了沔阳县城，江陵大队曾四次进袭郝穴。江右军各大队集中全力打击进犯华容之敌，十二月二日攻克华容。但不久，驻岳阳之国民党军第十一师一个团经黑山铺、三葑市再度占领华容，并继续向西北攻占鲢鱼须。这时，集结于潜江、沔阳及江陵地区的敌人，先后完成了围攻部署，驻安乡的新十一师亦蠢蠢欲动，向根据地的大举进攻已迫在眉睫。在此紧急情况下，特委将杨林市战斗后返回苏区的原红二军团的一千余人进行了整编，称新六军，后改为独立团，由段德昌指挥，以此作为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重要力量，增强了根据地人民斗争的胜利信心。

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国民党军分四路发起第一期围攻，企图将红军围歼于柳家集、瞿家湾地区。第一路为第四十八师一四三旅及一四四旅一部，先自潜江沿东荆河两岸由北向南推进，占领浩子口、熊口、龙湾、总口、拖船埠一线，然后向新沟咀、府场地区合围；第二路为新三旅及第一四四旅之另一部，先占沔阳、峰口，接着向镇方山、瞿家湾进攻；第三路为湖北警备

见 1932 年 5 月 28 日湘鄂西省委《省委军事报告》。

见国民党军第十军军长徐源泉《湘鄂川边区剿匪清乡记录》。

旅及第十军特务团，主力自螺山向北进犯，占领朱河、陈家港，并向柳家集合围，另一部自新堤占大丰口，向汉河口进攻，企图打通与峰口之敌的联系；第四路为新二旅，自监利向北进占观音寺，与敌第一四三旅呼应，切断从洪湖到江陵的通路，继向东，经习家河、毛家口向柳家集进攻。

在反“围剿”斗争中，江左军在赤教军的配合下，英勇顽强地打击了敌人。一月二日，沔阳的第五大队一部配合赤教军第五军三千余人，在邵家河、宋新场、二老坡一线坚决阻击了自仙桃向沔阳进攻的国民党军新三旅，四日又集中四千余人反击进占沔阳城之敌，予以重大杀伤。与此同时，第五大队另一部则配合赤教军等群众武装在杨树峰地区阻击进攻之敌，直至一月十三日敌始进驻峰口。大同湖一带的群众武装五千余人，向进占大丰口之敌反击，并一度攻占大丰口。监利的第四大队及赤教军，先后在鸡鸣铺、习家河、毛家口及观音寺等地抗击了自监利进攻的新二旅，并于一月三日集中两千余人袭击了太平桥、上车湾等地的敌据点，在防守朱河的战斗中，亦予敌以重创，并将向柳家集进攻之敌阻止于福田寺达十余日之久，自潜江沿东荆河两岸进攻之敌，在浩子口、左家庙、刘家场、总口等地也都遭到了群众武装的不断打击。

在江右的部队，积极配合江左的反“围剿”斗争。一月上旬，段德昌率独立团在鲢鱼须歼新十一师一个营，继在华容附近歼敌两个连，同时在板桥等地也予敌以重创，迫使华容之敌弃城东逃，于一月十六日再次收复了华容。在这些战斗中，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充实了部队及地方武装。接着，独立团北渡长江，在江陵地区歼灭了进占胡家场的第一四二旅一部，在拖茅铺歼灭了进攻冯家潭子、小河口的第四十八师补充二团数百人，缴迫击炮二门、重机枪二挺，收复了石首北区。

由于红军及广大群众武装英勇顽强的战斗，敌人“围剿”半个多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到一月十七日才占领了监利、沔阳、潜江，并未达到围歼红军的目的。红军江左部队在给敌以重大打击后，留下少数兵力继续在根据地内坚持游击战争，主力则转到外线作战。监利、潜江的一部分武装转到了江陵的白露湖一带。沔阳的武装转到了沙湖及其以东的广大地区，开辟了以沙湖为中心，西起白沙州、黄蓬山，东至新滩口、侏儒山等沿江地带的新的根据地，一部发展到汉川的刁汉湖地区。

国民党军占领监利、沔阳、潜江后，为实现其摧毁根据地的阴谋，立即搜罗土豪劣绅反动分子及常练队、白极会、大刀会等反动武装进行分区“清乡”。在占领区恢复保甲制度，组织铲共义勇军，对根据地人民实施残酷的烧杀政策。根据地干部群众被杀者数以万计，该地的兵工厂、被服厂、医院等遭到破坏，根据地受到了严重摧残。

一月底，国民党军将第一四二旅移至公安、斗湖堤一线，将第一四三旅调驻沙市，企图首先肃清江陵地区红色武装，尔后集中力量将红军围歼于江南的狭窄地带。二月十日，敌人开始向江陵地区进攻。第一四三旅及第四十八师补充第一、第二团占领资福寺、岑河口、郝穴、普济观一线，封锁了长江各渡口。第一四四旅自潜江的浩子口、龙湾一线，新二旅自监利、太马河、观音寺一线，逐步向西压迫。至二月底，汪家桥、堤头及沙岗、胡家场等地相继被占领。在此期间，江陵地区的革命武装曾在龙湾、祝家场、新渊、小河口等地进行了二十余天的顽强战斗，给了敌军第一四四旅以重大杀伤，并一度袭占新场，歼敌补充第一团一部，此后，红军各部队先后转入白露湖、

三湖、荻湖等地坚持斗争。

粉碎第二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在湘鄂西，敌人结束对江陵地区的“清剿”后，紧接着于三月一日发起了向江南地区的进攻，开始了第二期“围剿”。第一四二旅及第一四三旅一部分两路分别由公安、斗湖堤经高何厂、横市向藕池进攻，当日下午进占藕池，并向石首进犯。同时，新十一师主力也由安乡经梅田湖向高基庙进攻，第十一师及新十一师各一部则由南县进攻华容。

红军江右军积极阻击向石首及华容进攻的敌人。独立团集中全部兵力打击向高基庙进攻的中路敌军新十一师，三月六日于梅田湖歼其一部，击退了该路敌军。但进占藕池的敌人六日又进占了石首县城，红军虽于七日组织军校及地方武装万余人向石首反击，但终因敌人兵力过强，未能攻克。此时，敌人倚仗兵力优势，节节推进，江南形势日趋严重。为了应付这种局势，特委在周逸群领导下，在调弦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1）发动江南、江北所有武装力量，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击与牵制进攻之敌，保卫江南苏区，并争取时间恢复江北苏区。（2）由段德昌率独立团渡江，乘敌主力集中江南之机，反击监、沔、潜等地之敌，肃清反动势力。（3）抽调石首、华容、南县等县的干部开辟洞庭湖沿岸地区的工作，建立洞庭湖特区作为坚持江南斗争的依托，构成北有洪湖，南有洞庭，中有华容东山的根据地，以便南北策应，与敌长期周旋。（4）将医院、兵工厂等后方机关以及笨重物资逐步转往洪湖，并组织江南各地老幼群众有计划地向华容东山地区转移。

会后，段德昌率独立团渡江进入监、沔、潜地区。三月二十二日周逸群抵达华容东山九佛岗，具体部署了洞庭特区的开创工作，组成了中共洞庭特区委员会，由孟庆友任书记，直属湘鄂西特委领导。特区武装由江右军第三、八、十三个大队为主体，加上石首、华容、南县部分地方武装组成，由段玉林领导。会后，洞庭特区全体工作人员进至新河一带，开始了开辟洞庭湖区的斗争，计划以层山、新河、团洲等沿湖柴山（苇林）为基地向滨湖各地发展。洞庭湖滨地区的南、华、安各县与湖北的石首、公安等县接壤，与鄂西地区的斗争有紧密的联系。是时，“各地武装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到处袭击敌人的据点，伏击和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扰乱敌人的后方。江右军一部占领了华容东南的注滋口、明山头、乌咀，有力地牵制了华容、南县的敌人。占领高基庙、鲢鱼须一线的敌人，在红军军校和江右军一部的打击下，不得不向后收缩。

三月初，奉命到松滋、公安地区筹粮的红六军十七师，在师长许光达、政委李剑如率领下进至公安地区，拟乘机返回洪湖根据地。九日进至高何厂，九日进攻藕池，因敌顽强固守攻而未克，于十日拂晓撤出战斗，返回湘鄂边。此次行动，虽未能回到洪湖根据地，但打击了敌人，引起了敌人的恐慌。然而李剑如却因此受到了“自由行动”的处分。敌人为巩固后方，以第一四二旅一部扼守石首一带已占地区，抽调主力向公安、江陵地区“清剿”，并将驻松滋之新七旅急调至申津渡、界街河市一线，防堵红二军团部队东进，将潜江地区之新三旅一个团调至沙市东南的岑河口为预备队，以策应各“清剿”部队。

经过二十余日的“清剿”和调整部署后，国民党军于三月二十日转向焦山河、庄家铺及华容等地推进，二十二日进抵华容至焦山河一线。在这种情况下，特委率军校主动撤出调弦口向洪湖转移，江右军一部掩护石首、华容等地群众撤至东山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由周逸群率领到洞庭特区指导该地斗争。

由段德昌率领的独立团进到江北地区后，积极打击反动势力，拔除白点，恢复根据地，收复了翟家湾、柳家集及府场等地，并先后四次克服朱河，歼新二旅二团大部，一次攻打峰口未克。至三月底，洪湖根据地已大部恢复。特委返回洪湖后，即进一步发动群众，肃清残余反动势力，领导群众恢复生产，重整家园。

四月四日，国民党军第一四二旅、新十一师、第十九师等部分三路自调弦口、华容、岳阳向东山地区“围剿”。此时，被敌围在桃花山（东山）的约有军民两万余人，江右军第八大队及华容游击队虽在三葑寺、松板桥等地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但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四月十五日，敌人向桃花山发动进攻，形势极为不利。在此情况下，四月十八日，江右军千余人向塔市驿反击，计划抢占渡口，掩护北撤，但遇第一四二旅阻击，未能得手。四月二十二日，敌军占领桃花山，对干部群众进行血腥屠杀，并将从石首之黄鳝口到天子号长六里的一带民房全部烧毁。为避敌锋芒保存力量，江右党组织除动员有条件隐蔽的群众分散潜回原地外，其余群众及地方干部组织起来，撤往江北。当时渡江突围者约万余人，一部分经塔市驿以西的来家铺渡江到达马家潭子、小河口地区，一部分从砖桥以北渡江，到达监利以东的朱河地区。群众到江北后，联县政府即派崔琪前往慰问，妥善安置他们的生活，并吸收一部分青壮年参加了红军。红军主力转移后，敌人占领了华容东山，对江南地区的重点围攻基本结束。

在敌人全力进攻东山时，敌人在江北地区的攻势有所减弱。在反“围剿”斗争中，根据地武装力量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因夺取了敌人的武器，充实了自己的装备。四月十九日，独立团在老新口全歼新三旅两个营。二十四日又击溃该旅反扑之第一、第三两团，收复了龙湾、熊口等地，缴获各种枪五百余支。同时，以军校学生为主编成的湘鄂西警卫团，在沔阳游击队配合下，肃清了府场、峰口一带敌军，收复了汉河口、大丰口等地，并乘胜向东发展，一度占领宝塔洲。上述作战行动有力地配合了江右地区的反“围剿”斗争。

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斗争，根据地军民终于克服了各种困难，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江右军各大队由不足三百支枪发展到一千五百支枪，独立团也扩大了很多，在此基础上，根据地武装进行了一次整编，将独立团改编为红三军九师，由段德昌任师长，陈培荫任政治委员，以军校学员为。基础编组了湘鄂西警卫团（亦称警卫第一团），以汉川刁汉湖游击队编为酒汉独立团。此外，还成立了一个近五百人的教导团。江左军各大队除抽调一部分充实上述各部队外，余部分别编为各县警卫营。

一九三一年五月，蒋介石和粤、桂军阀之间的矛盾又趋尖锐，徐源泉部第四十八师等部队相继撤离鄂西，调集长沙。红九师乘机向江陵地区之敌进攻。六月初，在三官殿、沙岗、普济观、郝穴、汪家桥等地连续获胜，歼敌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至此，江北根据地除监利、沔阳、潜江等县城外，已全部恢复。江右军在江南地区也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迫敌龟缩于石首、华容等城镇，东山根据地也得到了恢复。国民党对湘鄂西的三期“围剿”以

失败告终。

洞庭特区武装在周逸群和段玉林指挥下，积极袭击敌船，攻其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团防。四月十八日，周逸群率特区机关从桃花山突围去洞庭湖，到达野猫岗，下旬突袭了插旗团防局，镇压了一批土豪劣绅，接着又歼灭了注滋口的团防，缴步枪七十余支，初步建立了特区根据地。此时，敌增兵设防，实行水陆封锁。不久江右军又兵分三路击溃了驻阳罗洲的敌军，摧毁了敌军团部，俘虏了敌团长，歼敌百余人，缴枪二百余支。五月上旬，部队挺进到阳罗洲，在杨林所、阳罗洲、新河等滨湖地区，发动与组织了渔民、樵民的对敌斗争，洞庭特区的工作逐步地开展起来。五月十日，何键急调马昆山旅等部队入湖“清剿”，合围磨盘洲，周逸群自特区向洪湖转移，途经华容贾家凉亭时，遭敌伏击牺牲，年仅三十五岁。

周逸群是贵州铜仁人，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黄埔军校，是黄埔军校进步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参加过北伐战争，在北伐军总政治部任宣传队长，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一九二六年贺龙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周逸群任师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六月贺龙部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周逸群任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三师师长。一九二七年八月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二八年后与贺龙一起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创建湘鄂西工农红军，他先后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红六军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代理湘鄂西特委书记、湘鄂西联县政府主席等职，是红军初创时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坚毅顽强的革命精神，正确地领导了湘鄂西的革命斗争，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望。他的牺牲是湘鄂西革命人民的巨大损失。

周逸群牺牲后，段玉林率江右军一部攻占九佛岗、石华堰等地，歼灭国民党军第十九师李觉部一个团。后据中央分局指示，将江右军八百余人改编为警卫第二团，段玉林任团长，不久又编为红九师二十五团，并从中抽八十六名骨干组成了桃花山（华容东山）游击队。

第五节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在湘鄂西 贯彻洪湖苏区反第三次“围剿”

夏曦到洪湖，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苏联人，一九三一年受第三国际派遣来华）的支持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

四中全会认为，立三路线的实质是“右倾”，是用“左”的方法遮盖了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全盘否定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党为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而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全会认为李立三是“一贯的富农路线”，应坚决地无情地展开反富农斗争。会议还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认为“在革命危机迅速成熟的时候，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因而“要以主要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

四中全会强调，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为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特别要以反对三中全会、反对调和路线的“新干部”和“工人干部”来代替旧干部。决定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和新的领导干部。在四中全会后，中央即派夏曦等到了湘鄂西根据地。

一九三一年三月初，夏曦到达洪湖。二十七日，以夏曦为书记的中央代表机关——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此时，洪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正处在胜利反攻阶段，根据地人民在特委及联县政府的领导下，正在恢复和整顿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夏曦利用这一时机，开始贯彻和推行第三次“左”倾路线。四月十五日，在周逸群缺席的情况下，夏曦主持召开了湘鄂西特委会议，批评湘鄂西党执行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错误，作出了接受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决定自下而上地改造湘鄂西的党组织。六月二十四日，又召开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成立了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崔琪为书记，杨光华、万涛、彭之玉为常委。不久，崔琪因病离职，杨光华代理书记。为坚持贯彻四中全会决议，按照新的“左”倾路线进行工作，中央分局还先后作出了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关于湘鄂西苏维埃政权及群众组织问题、关于农民土地及反富农斗争问题、关于职工运动及关于兵运工作等决议。

通过上述会议，夏曦等在反立三路线和反“调和路线”的旗帜下，全盘否定了湘鄂西党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认为：“在政权工作上，党没有正确的领导苏维埃工作”，“没有真正的苏维埃”。把湘鄂西的土地革命说成是“富农路线”的，提出坚决与富农斗争是目前党在土地问题上的主要任务，要求“彻底平分一切土地”，“加紧反富农斗争”；而在反富农斗争的政策上，又混淆了富农与中农的界限。在经济政策上，他们确定把一切税收落在富农、资本家身上，完全免除贫雇农及城市贫民的负担。这些政策贯彻执行的结果，严重地侵犯了中农利益，破坏了同中农的联盟，扩大了打击面，缩小了团结面，孤立了自己，并且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产情绪和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对苏区的各项工作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湘鄂西的红军和革命群众在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斗争的同时，还为“左”倾路线

见 1931 年 5 月 10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之综合报告》。

的贯彻付出了重大代价。

洪湖军民为战胜水灾而斗争红九师出击襄北

正当洪湖根据地进行各项恢复工作的时候，发生了严重的水灾。一九三一年六、七月间，由于大雨连绵，江河湖泊水势猛涨，长江、汉水等河道的堤防相继溃决。国民党军乘此机会决堤水淹苏区，并枪击抢修堤防的群众，企图置根据地军民于死地。洪湖根据地除华容东山等少数地区外，监利、沔阳、汉川、江陵等地深受水害，一片汪洋。在水灾和敌人围攻破坏的双重摧残下，根据地困难重重。灾区群众一部移往堤上，靠鱼、虾、野菜勉强维持生活；一部外出逃荒，至七月份，全区外出逃荒人口达七十余万，监、沔等县个别地区外逃人口多达当地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许多党员亦随群众一起逃荒，全区党员人数由三万余降到一万三千余人。不少工会、贫农团、赤色教导军、少先队等组织陷于涣散状态。因湖水不断上涨，芦林柴山被淹，敌人乘机“清湖”。洞庭特区游击武装连续在武岗洲、杨家荡等地遭受损失，难以坚持斗争，不得不撤回江北。

面对严峻的形势，久经锻炼的湘鄂西党组织、军队和广大人民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为战胜水灾和反对敌人水淹苏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党组织红军和游击队严密注视敌人的动向，武装掩护群众抢修堤垸，保护秋收的顺利进行，防止了敌人对苏区的骚扰。同时，还组织水上游击队，积极拦截敌人的粮食和物资。因江北到处是水，敌人不便行动，红九师即不断出击，筹措给养，以解燃眉之急。六月十二日，在普济观歼川军第二十一军教导师第三旅郭勋部二百余人，缴枪五十余支；二十九日在郝穴复歼该旅一个营，缴枪一百余支。七月在普济观重创郭旅第九团，缴枪三百余支；不久又歼灭了进入苏区扰乱的土匪四百余人。党组织还发动群众积极寻找蒿根、螺蚌、鱼虾等，以弥补食品之不足；同时组织群众造船捕鱼、抢种杂粮，开展生产自救，并号召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极力节约各项开支，与群众同甘共苦，渡过困难。

严重水灾，不仅给群众生活带来极大困难，也使红军和地方政府的供给十分匮乏。为了减轻根据地的困难和打破敌人的围困，八月二日，中央分局作出了《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规定“九师目前唯一任务就是（在）巩固和扩大苏区的原则下，（在）保存红军基本实力的条件下，图军事上的发展”，决定以红九师主力向襄北出击，发展潜江、天门游击战争，使潜江、天门与监利、沔阳、汉川苏区联系在一起，并尽可能占领天门，巩固这一区域。同时，考虑红九师向北行动，有可能与红三军主力取得联系，湘鄂西临时省委又补充决定：“在能与三军取得联系时，则须与之取得联系，但这是次要任务。派万涛同志转变三军政治路线，接充三军政治委员。”红九师主力，实际只是师直属连队和第二十六团，却要执行几项重大任务，足见任务是很艰巨的。该师的第二十五团则奉命留在苏区，应付突然情况。

万涛、段德昌根据分局和临时省委决定，八月十三日率红九师主力北上。途中，首先歼灭了周家矶、黄家场一线敌军；继又于十七日攻克沙洋，歼敌新三旅旅部及其第二团全部，共二千余人，击毙敌旅长徐德佐，缴获甚多。

见 1931 年 12 月 1 日《湘鄂西省委关于九师行动结论的决议》。

沙洋战斗后，以缴获的武器组成了第二十七团（实有三个连）。

留守苏区的第二十五团为掩护主力行动，八月十四日歼灭了直路河守敌，继又乘胜攻占了莲花寺进逼潜江城；八月十五日在杨家场歼灭新三旅一个营，据守潜江之敌弃城北逃。第二十五团于十八日占领潜江县城。二十四日，新三旅残部会合第三十四师一部进行反扑，第二十五团诱敌深入，并设伏于潜江城下，又歼灭其一部，从而巩固了胜利，恢复了潜江苏维埃政权。

由于湘鄂西党、军队和人民的一致努力，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特别是红九师连续出击得胜，因而部分地解决了根据地的困难，为苏区人民最后战胜水灾、坚持对敌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中央分局由于夏曦的错误领导，在救灾问题上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们为了解决粮食困难，没收了富农的一切生产工具和粮食，又以借债为名平分了中农的粮食，严重地损害了中农利益。在这一错误政策的影响下，逐渐发展到灾民所到之处，不分贫富抢吃一空，致使许多基本群众的利益也受到了严重损害，还加剧了赤白对立，在政治、经济上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反第三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九月初，湘、鄂两省国民党军为配合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利用江北根据地水灾严重，红军无暇南顾的机会，集中驻岳阳的第十九师，驻华容、安乡的新十一师，驻石首、调弦口的新七旅及反动团防、流窜于各地的反动分子组成铲共义勇队、割谷队等向华容东山根据地进进行“围剿”（即洪湖根据地军民所指的第三次“围剿”）。当时在东山地区只有三百余人枪的游击队，在广大群众武装配合下，对敌人的“围剿”进行了顽强抗击，但终因力量十分悬殊，敌人步步深入，游击队即掩护政府机关及部队群众突围转至江北。敌人全部控制东山各要点后，即开始大肆抢割稻谷、掠夺粮食财物，到处挖地拆屋、砍树伐木。群众描述当时的情景是：“唐伯寅（敌第十九师团长）铲共，草木遭劫，马昆山（敌新十一师副师长）清乡，掘地三尺。”被抢掠运往岳阳、华容等地的稻谷有十余万石之多。敌人在大肆抢割的同时，还一方面组织反动政权，采取“四家连坐”、“家族连坐”等方法强迫群众“反水”；一方面组织铲共义勇军、保卫团等反复搜山、清乡，大肆捕杀革命干部和群众，仅二十四、二十五两日就在明碧乡屠杀五百八十人，不少人全家被杀绝。特别是对革命干部及红军家属，手段更为残忍毒辣。如塔市区矾湾乡工会主席刘曙堂被捕后，先被割去耳、鼻，然后挖眼、刮心，最后抛尸江中，并将其未满四岁的女儿用禾叉刺入肚中，挑起沿街示众。在这次“围剿”中，干部及群众被害者达一万余人。

为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争取恢复江南根据地，十月上旬，第二十五团根据省军委指示，会同原江南游击武装渡江进入东山，二十一日拂晓以突然动作歼灭了九佛岗之敌，接着又乘胜击溃了石华堰、毛家巷之敌，并跟踪追击至华容城东的状元街，共毙俘敌二百余人，缴枪百余支。二十三日，第二十五团又在烟墩、大王厂、三郎堰等地，向正在抢谷及残杀群众之第十九师及新十一师各一部进攻。因敌占据高地，拼命抵抗，激战二日未能将其歼灭。此次战斗红军伤亡较大，遂撤回江北，恢复江南苏区的意图未能实现。

为了继续领导江南斗争，临时省委确定将石首、华容等县合并组成江南县，并划江北的监利县属尺八口、陶家市两个区作为江南县的后方基地，划

洞庭特区归江南县领导；将东山游击队组成江南游击大队，由朱祖光任大队长，并以原监利县姜炳炎领导的游击队与之配合。到一九三一年底，群众又重新发动起来，江南苏区开始恢复，洞庭特区武装也发展到了三百余人。

第六节红三军返回洪湖苏区湘鄂 西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红三军返回洪湖苏区后的党内斗争

一九三一年八月中旬，红九师攻克沙洋，从缴获的远安县长告急文书中，得知红三军在南漳地区活动。为迎接红三军主力返回洪湖苏区，万涛决定暂缓东渡，改向荆门发展以联系红三军。但部队进至荆门时，未能得到红三军的消息，遂又北上至仙居，并派人赴南漳与红三军主力联络。在仙居逗留一周，因联络人未回，部队病员不断增多，乃东渡襄河进入襄枣宜苏区，进行短期休整。

此时，红三军正在房县、谷城、保康地区活动，得悉红九师已沿襄河北上，即在青峰镇召开会议，决定主力返回洪湖苏区，留分散各地领导地方工作的各级政治机关人员坚持地方工作；以教导团为基础，吸收地方游击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以汤慕禹任师长，朱勉之任政治委员，辖七十二、七十四两个团共千余人；柳克明留在房县，统一领导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九月中旬，红三军主力自青峰镇出发，在保康附近击溃川军两个团的阻击后，经南漳、荆门等地向洪湖转移。

红九师得悉红三军主力到达荆门地区，乃西渡襄河，于九月二十八日与红三军主力在刘猴集会师。会师后，万涛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及省委指示精神，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吸收红三军团以上干部参加，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给二军团全体同志的信》。信中要求红二军团：一、“立即撤销邓中夏同志机会主义的领导，坚决执行国际及四中全会的路线……中夏同志必须立即离开二军团”。二、“二军团必须立即回（向）湘鄂西原有苏区根据地的方向发展……，巩固与扩大湘鄂西苏维埃区域”。红三军前委根据中共中央及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批评了邓中夏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作出了《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领导的决议》，随即撤销了他的职务，由万涛接任红三军政治委员。

此时，红三军实力为：红七师辖第十九、二十两个团，每团有五个连，并各附先锋队（即“神兵”）一队；师部直辖特务营，有手枪连、步兵连、机枪连（重机枪三挺、迫击炮三门）各一。红八师辖第二十二、二十三两个团，第二十二团有十个连，第二十三团有九个连；师直辖特务营，有手枪连、步兵连、机枪连（重机枪两挺、炮两门）各一。红九师除第二十五团（约有枪一千一百支）外，第二十六团有十三个连，第二十七团有三个连；师直辖手枪连、骑兵连、机炮连各一个。军直辖手枪队，经理部监护大队，政治部政治保卫队一个分队。除第二十五团外，总计红三军共有枪五千支左右。此外军部教导团约有枪千支，留房县。

邓中夏被撤销职务后，在潜江总结了他在湘鄂西地区的工作。邓中夏在红二军团一年多时间里执行第二次“左”倾路线，主要表现在军事上。邓中夏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说：“虽然我们在冒进中曾有几次的警觉和动摇，终究不能并且不敢冲出生立三路线的‘中心城市，论的圈圈以外。”他勇敢地承

见 1931 年 6 月 29 日《中共中央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给二军团全体同志的信》。

见 1931 年 10 月 16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致中央信》。

担了责任，说：“ 洪湖苏区的被摧残，第二军团削弱，都应由我负责。” 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地方工作和部队建设中，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较好地解决了根据地部分群众的反水问题，十分重视红二、红六两军的团结，参与指挥部队作战，打了许多胜仗，领导部队开辟了以房县为中心的根据地。邓中夏从青年时代起就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是中国工人运动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曾领导了长辛店八月罢工，京汉路“二·七”大罢工，开滦煤矿罢工，上海二十二个日本纱厂罢工和省港大罢工，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一九三一年底，邓中夏离开洪湖苏区调上海工作，受到第三次“左”倾路线领导人的不公正对待。后被捕，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就义于雨花台。

红三军在前委会后，为继续完成开展潜江、京山、天门地区工作的任务，从丰乐河东渡襄河经洋溪镇南下，十月二日攻克钟祥，歼守敌一部，留枪一百五十支，组成钟祥游击大队，三日到达京山的永隆河地区。

当时，襄北的钟祥、京山、天门一带仅有国民党军第三十四师、第四十一师及新三旅残部，共约六七个团，配置分散，兵力较弱。红三军根据这种情况，一面积极着手开辟新区工作，以红七、红八师攻岳口，红九师攻张截港；一面建议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迅速派地方工作干部协同部队建立新区政权，并组织运输队，将缴获的粮食物资运回苏区，解决人民群众因水灾带来的困难。五日，红九师全歼张截港之敌约一个营，打通了与洪湖苏区的联系，达到了预定的目的。

但是，以夏曦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执行人，对于红三军在襄北的行动不仅未予以表扬和支持，反于此时制造矛盾，挑起党内斗争，打击军、师的领导同志，以便进一步贯彻第三次“左”倾路线。当时，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成员为夏曦、贺龙、万涛三人。在后方的夏曦不征求在前方指挥作战的贺龙、万涛的意见，窃用主席团名义，于十月八日发出了由夏曦和唐赤英（代贺龙）、彭之玉（代万涛）三人签署的给红三军的训令，训令武断指责说，“第九师出潜江后改变军事计划而冒进脱离苏区，以致江右（左）军不能抽调，而使南岸的苏维埃政权，除石首七区外全体被摧残”，公然推翻了八月初中央分局、省委关于红九师向北行动开辟襄北新区和迎接红三军的决定。还指责红三军在襄北的行动是“没有决心来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巩固的向前发展”，是“表现了第三军的领导脱离苏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训令指责“第三军此次南下竟将各军师政治部及教导团留在后方（房县）”是无意返回供湖。接着又说，“第三军出发没有留下必需的部队来巩固和发展房县的苏区”是不要后方。他们以加强红三军为名，重新指定了红三军前委，把红三军政治委员万涛排斥于新的前委之外，同时迫令红三军立即返回苏区。十月十日红三军回到潜江，并于十二日再克沙洋。

红三军回来后，夏曦即以违抗军委命令的罪名，撤销了万涛红三军政治委员的职务，给红九师领导人段德昌、陈培阴以警告处分。以加强红三军为名，重新指定了红三军前委，调彭之玉任书记，贺龙、唐赤英为委员。十月十五日，杨光华以湘鄂西省委书记名义致信中共中央，说：“省委为要实际转变三军中的政治路线，加强三军的政治领导，要求湘鄂西中央分局派夏（曦）同志暂时去担任政治委员的工作。”夏曦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也说：“以现在的必要”，必须由我去红三军任政治委员。随后夏曦即亲赴前方接任红

三军政治委员。这样，夏曦就先派万涛取代邓中夏，又派彭之玉代替万涛，然后自己委任自己当上了红三军政治委员，实现了其直接控制红三军的目的。接着又以红三军实力不足为借口，把各师师部撤销，将部队编为五个团。为了取消军部对部队的实际指挥权，还特别决定，军部要受省军委会指挥。这样就实际上撤销了红三军军部。这次改编，造成了指挥上的混乱，使相当多的干部降级使用，引起了红三军干部、战士的强烈不满。

夏曦对红三军的错误指责，目的十分明确：一是推卸东山反“围剿”斗争失败的领导责任。由于国民党吹嘘“围剿”东

山的胜利，中共中央来电查询失败原因，他便倭过于万涛、段德昌等红九师领导人。二是挑起党内斗争，打击军队领导同志，便于其直接控制红三军。按当时实际情况，红九师不走，也不可能避免江右地区的损失。何况红九师出击襄北和迎接红三军主力乃是分局、省委的决定。夏曦上述错误做法，加上他对湘鄂西党的工作的错误批评以及推行“左”倾路线所产生的恶果，引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贺龙、万涛、段德昌及潘家辰等同志曾反复据理力争，当面驳斥夏曦等人的无理非难，万涛曾先后两次向中共中央进行申诉。但夏曦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为解决争论，湘鄂西省委于十一月初召开座谈会，十一月二十日又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这些会议，虽对夏曦进行了批评，但没能纠正夏曦的错误，而夏曦仗着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和组织声势，继续坚持错误观点。为了解决问题，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派分局委员宋盘铭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十二月下旬，宋盘铭带着中共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的信返回苏区。中共中央批评了夏曦在具体工作上的一些错误，肯定了红九师接回红三军的行动，认为红三军南下是向国际路线走近了一步，并且不同意取消红三军所属各师师部，指示把红三军整编为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使红三军恢复了七、九两个师，但是在总的路线上，中共中央却支持夏曦，说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以来，夏曦的领导一般是正确的，执行了国际和中央的政治路线，取得了重新分配土地、开展反富农斗争和改造苏维埃等成就。为了贯彻和维护“左”倾路线，指示强调指出：“在苏区阶级斗争更趋紧张的形势下，一部分敌人以至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三主义者、邓中夏信徒，必然会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来作复仇的斗争，来攻击中央分局的整个路线，以至攻击国际与中央。”要中央分局对那些怀疑、不同意、不满和不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同志，予以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对于根据地发展方向，指示指出，由于全国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全国灾民斗争的发展，已使全国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要求湘鄂西党用最大的努力，向武汉近郊发展，以争取和鄂豫皖打成一片，会师武汉。这些指示，虽然解决了湘鄂西党内争论中的几个具体问题，但却从更“左”的方面支持了夏曦，进一步肯定了夏曦在路线上的正确，同时把万涛、段德昌等人对夏曦的批评，提高到了反中央分局、攻击国际和中央的高度。由于万涛等同志不服，分歧仍然存在，分局和省委遂又根据万涛建议，派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士均到上海再次向中共中央汇报，请求裁决。

红三军向襄北出击洪湖苏区的新发展

见 1931 年 12 月 24 日《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的信》。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东北，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下，拱手让出了东北三省，并继续“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湘鄂西地区国民党军积极调整部署和集结兵力，准备大举向苏区进攻。第四十一师、独立三十七旅进占张截港、潜江等地，荆沙方面的川军郭勋等部也积极配合向苏区进犯，根据地形势又趋紧张起来。针对这种情况，红三军决定首先打击川军，尔后对付襄北之敌。十一月上旬，红军在后港、十回桥歼灭了川军第九旅张邦本部和郭勋部各一个营，击退了川军的进攻。随后，折入襄北地区，于十一月十二日攻下皂市，歼灭鄂军曹振武团及武汉保安团各一部，俘获人枪八百余。接着又在天门、京山一带游击，牵制了天门、岳口等处的敌人，稳定了根据地的形势。红三军在襄北活动四十余日，取得了很大胜利，但因夏曦极力纠缠于党内斗争，未能发动群众支前参战，以致红三军与后方联系困难，不少伤病人员无法安置，遂于十二月下旬撤回襄南。

此时，活动于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在黄安地区取得了重大胜利，湖北国民党军将主力调往平汉路以东地区。红三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以主力再向襄北发动进攻。在红三军返回襄南时，敌第四十八师重占皂市，以工兵营驻守，并以特务团近两个营的兵力驻在龙王集，一个营驻在陈家河，掩护应城至皂市间的交通运输。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日，红九师从周家矶出发，由泗港渡襄河，二十日，冒雨袭占皂市，守敌逃往应城。红九师紧追不舍，于二十一日以主力包围了龙王集的第四十八师特务团六个多连和一百多名矿警，以第二十七团包围了陈家河之敌，侦察部队逼近应城。敌第四十八师特务团团团长兼应城县县长蒋作钧派工兵营解龙王集、陈家河之围，行至距龙王集不远的地方，大部被红军歼灭。

被包围于龙王集和陈家河的敌人，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红军一面利用周围高地和房舍逼近敌人，一面向敌喊话，进行争取瓦解工作，并着被俘之敌工兵营长写信劝敌投降。龙王集的敌人坚持了三天三夜后，因粮食、饮水缺乏，向田店方向突围，在突围时大部被歼。陈家河的敌人，在红三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因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不得不派人与红军谈判，在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的条件下，全部投降。

因为遭到红三军的不断打击，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忙调蒋介石嫡系第四师十二旅张联华部从孝感经应城赶往龙王集和陈家河增援。一月二十四日张联华部赶到应城，红九师得悉后，确定用伏击手段歼灭该敌。为了集中力量打好这一仗，红九师除以少数兵力监视陈家河之敌外，集中主力并急调汉川独立团在龙王集至应城之间的周家湾、下毛家贩一带的公路两侧设伏。

一月二十五日拂晓前，第二十六、二十五、二十七团（留第三营继续监视陈家河之敌）同时进入伏击阵地；汉川独立团除一部配置在路南外，其余作为预备队。拂晓时，陈家河之敌全部投降，围困陈家河的第二十七团三营也赶往伏击地参加战斗。

张联华部从应城刚出发，就与红九师骑兵连接触。骑兵连且战且走，敌人则沿汉宜公路不断西进。当其前卫进至下毛家贩时，遭红军猛烈阻击，公路两侧伏兵齐出，敌人被打得乱作一团，重机枪、迫击炮等重武器还未及卸载，进入伏击圈的两个团和旅直属部队即全部被歼，另一个团经黄家滩东逃，下午五时战斗胜利结束。

是役，红军先后歼灭第四十八师特务团、工兵营和龙王集、陈家河的矿警、民团全部，以及第四师十二旅大部，俘敌旅长以下官兵近四千人，缴获迫击炮二十门，轻、重机枪六十余挺，步枪三千余支，子弹数万发。红军伤亡三百余人。这是一次以小的代价换取重大胜利的战斗，是红三军回到洪湖苏区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与此同时，在汉川活动的红七师也先后打下了黄陵矶和侏儒山，歼灭武汉要塞司令钱大钧部一个营，逼近了武汉。

红三军的胜利进攻，给了敌人很大震动，何成浚急令第三十四师、独立三十七旅和川军向苏区进攻。一月二十六日，川军第二十一军教导师第三旅和第三师第九旅共四个团的兵力从沙市进攻江陵、荆南苏区，占领了李家市、熊口、龙湾、老新口之线；独立三十七旅一部由潜江向南进攻，占领了周家矶、莲花寺、直路河，并在总口一带焚烧村庄；第三十四师则从沔阳进攻孙家场、杨林关，威胁洪湖苏区中心。此时，苏区仅独立团支持战斗，情况紧急。湘鄂西省军委急调红七师西上迎敌，红九师沿汉口、宜昌公路向西抄袭独立三十七旅侧后。待红七师赶抵峰口时，第三十四师部队已被独立团击退，情势有所缓和。二月四日，红九师二十七团乘雪夜袭击张截港，歼新三旅一个营，继又连夜袭人潜江，残敌退守策口。此时，原红三军教导团根据湘鄂西省委指示，从房县回到了洪湖，改编为鄂西北独立团，不久又与红三军独立团合编为红八师，随即投入了包围策口的战斗。

敌人为解策口之围，从岳口和沙洋两个方向出动了援军。二月十二日，红八、红九师乘沙洋援敌尚未到达之时，在竹根滩发起攻击，击溃岳口援敌独立三十七旅两个营，策口敌人被迫投降。从沙洋出动的敌第四十八师三个多团，十四日晨向张截港进攻。红九师予以阻击，毙伤敌一百五十余人后，主动撤往灰埠头。张截港、北黑流渡一线的敌人，在红军的军事压力下，相继退走，其他各处敌人未敢轻举妄动。从二月四日到二月十四日的十天战斗中，红八、红九师共歼灭敌人三个营，并牵制了大量敌人，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减轻了敌军对洪湖苏区的威胁。

何成浚决定将湖北全境划为五个“清剿”区，并命国民党军第十军军长徐源泉负责“清剿”洪湖苏区，限三、四两月肃清。徐源泉受命后，确定“首先恢复应城、岳口间交通，后就应城至岳口的大道划为两区，抽十团以上兵力，同时分剿”。

根据上述计划，为打通皂市、天门间的交通，配合泗港、张截港之敌向渔薪河、灰埠头一带“进剿”，敌第四十八师一四四旅三月五日由皂市出动。因适逢大雨，即暂停于皂市以南之文家墩、李家场等处。红三军得悉后，决定歼灭该敌。遂令红九师从渔薪河，汉川独立团从蒋家场向文家墩之敌隐蔽接近，红七师从吴堰岭逼近皂市以钳制敌人。经周密部署，红九师和汉川独立团于六日中午突然向敌军发起攻击，并很快突破敌人阵地，歼敌一部，占领了文家墩、杜家岭。敌旅长韩昌峻率残部退至胡家岭、坡湾一线，构筑工事，负隅顽抗。七日拂晓，皂市的敌军第一四二旅前往增援，当即被红七师及红九师一部击溃，被围之敌不敌红军攻势，战至当日下午，在飞机掩护下向东突围，溃逃中被红军全歼于方家咀、坡湖一带。此役，敌旅长韩昌峻以下两千余人被俘。泗巷、张截港等处的敌军闻风丧胆，纷纷向沙洋、岳口、天门一带撤退，敌人的“清剿”被粉碎。

龙王集、文家墩等战斗的胜利，是红三军运用在长期作战中积累的丰富

经验，抓住了敌人没有群众拥护，不了解红军情况，离开阵地不善打仗的弱点，利用雨天、黑夜隐蔽行动，采取袭击、伏击、围点打援、各个击破的战术，把主力红军、地方武装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把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起来，把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结合起来，发扬吃苦耐劳、英勇果敢、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所取得的。在出击襄北的战斗中，红三军共歼敌两个旅又一个团另六个营，缴获各种枪五千余支。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革命武装力量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发展。洪湖苏区的范围东西达五百余里，南北达二百余里，人口近三百万。文家墩战斗后，汉川独立团编入红七师，红七、九两师都扩充到三个团，红三军全军达一万五千余人，各种枪一万一千余支。洪湖各县均成立有警卫营或连，不少区、乡组织有三五十人的游击队，共有枪二千八百余支。洪湖根据地又建立了川阳、天汉、天潜、荆当、荆南、云孝和钟祥、京山、应城等县的苏维埃政权。然而，这个本可继续发展的的大好形势，因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各方面的影响，不久就开始向不利方向转化了。

这是湘鄂西党政领导机关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分别在汉川、汉阳、天门、潜江，荆门、当阳、云梦、孝感的交界地区和荆门南部建立的县。

第七节湘鄂边、巴兴归、鄂西北及襄 枣宜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自红二军团成立到一九三二年初这一时期，在湖南、湖北两省西部形成了包括洪湖、湘鄂边、巴兴归、鄂西北及襄枣宜苏区在内的湘鄂西根据地。对那些不包括在洪湖苏区之内的较小苏区，后来关向应称之为卫星根据地。各个卫星根据地以中央分局、特委和省委所在地的洪湖苏区为中心，相互支援，相互依存，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

湘鄂边

红四军一九三二年夏东下以后，湘鄂边独立团在当地游击队和赤卫队配合下，粉碎了敌人周燮卿旅、朱际凯团、罗效之团及团防陈策勋等部的多次进攻，坚持了湘鄂边根据地的斗争。一九三一年，红二军团在湘鄂边转战三个多月，在各县地方武装支持下，消灭了长阳、五峰等地团防武装数股，扩大了苏区。四月初，红三军北渡，五峰、长阳、石门等县团防与川军教导师第三旅一部相配合，乘机进攻苏区。五峰、长阳、石门先后为敌占领。

四月二十七日，唐赤英奉湘鄂西中央分局指示，为彻底转变红三军的政治路线，担任代理红三军政治委员职务，来到湘鄂边。由于红三军已经北上，唐赤英便留在湘鄂边指导工作。五月一日，湘鄂边分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唐赤英传达了中央分局的成立及中共四中全会关于“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彻底转变党的组织基础”等决议和指示，并根据中央分局的决定，将分特委改为湘鄂边特委。特委由周小康、董大山、向经武、王炳南、陈协平、陈奇谟、屈国元、杨英、孟朗等九人组成，仍以周小康为书记。

分特委扩大会议后，成立了联县政府，合并了五峰、石门、鹤峰等县苏维埃。在湘鄂边特委和联县政府领导下，重新开展了分配土地的工作，进一步整顿和发展了群众武装，普遍建立和健全了赤卫队、少先队以及青年大队等组织。教导第一师整编为独立团。全团共千余人，王炳南任团长，陈协平任政治委员。五月上、中旬，独立团与汪沛然率领的长阳游击队在五峰小河手板岩与进犯五峰、长阳之敌殷超黑军遭遇，经激烈战斗，消灭黑军“先锋大队”二百余人，缴长短枪百余支（黑军原系杨森残部，一直流窜在湘鄂边地区，是一支专门与红军作对的土匪队伍，故称黑军。后于八月被川军团长赵鹤收编）。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根据地各项工作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但是由于第三次“左”倾路线各项政策的进一步贯彻，在重新分配土地中侵犯了中农利益，对部队内部的改造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做法，未能根据湘鄂边的特点继续执行团结争取中间力量的策略等等，以致严重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自己陷于十分孤立的地位。

一九三一年秋，国民党军开始对各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湘鄂边之敌也乘势向苏区进攻。九月七日，来凤、宣恩的国民党驻军独立第三十四旅罗启疆部及湘鄂边保安部队慈利朱际凯团、五峰彭涟溪团、石门罗效之团，分四路进攻鹤峰。九日，石门之敌占领泥沙，十日又向贺家台进攻。同时，慈利之敌也经铁炉坪向五里坪进攻。中共湘鄂边特委决定以独立团打

见 1931 年 9 月 6 日《湘鄂边特委致湘鄂西中央分局信》。

击石门之敌，以游击队牵制和阻击其他各路敌人。十一日，王炳南率独立团大部进至六峰、大岩关、三路口一线，从正面阻击进攻的敌人，陈协平率独立团二营及石门游击大队出六峰，绕大、小金州向敌后泥沙、新街一带出击。敌人在红军顽强阻击下，伤亡很大，急调驻石门的学学生队及澧州、临澧团防加入战斗，连续数日向大岩关猛攻。至十九日，五峰之敌进占湾潭，独立团被迫撤退，特委及政府机关也离开鹤峰向与桑植交界处的四门岩转移。撤退途中，独立团在四门岩以北的断孤岭伏击追击之敌，全歼一个连。尔后，独立团及游击队分散在五峰、桑植、石门等地坚持斗争。至十月下旬，敌罗启疆旅调往枣阳地区，其他敌军亦相继撤出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告一段落。

罗启疆旅他调后，川军第二十一军三师十九团赵鹤部进驻原罗旅防区。湘军新三十四师三旅周燮卿部进驻桑植。独立团乘敌换防之机，积极出击，先后对仓官峪、陈家河、上河溪、河口等地的敌军进行袭击，取得了一些胜利。十一月，敌换防就绪，又向鹤峰城发动进攻。桑、鹤游击队积极阻击由沙道沟方向来犯之川军，集中独立团在走马坪一带打击石门之敌，迅速击退了该路敌人的进攻，其他各路敌人也相继后撤，敌人再次夺取鹤峰的企图未能实现。

十二月，特委机关自四门岩返回鹤峰，在鹤峰召开了特委会议，决定主动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苏区。十二月底，独立团向五峰、长阳出击，在游击队配合下，歼灭了长阳团防伍伯云部，继又乘胜进击，在枝柘坪一带歼灭了白峪、红峪及五峰团防各一部。一九三二年初，返回鹤峰，向桑植之敌出击。在陈家河战斗中，击溃新三十四师三旅一个团，缴迫击炮二门、重机枪二挺，其他各种枪百余支。接着又转向石门，在南北墩击溃了石门保安团两个营。五月，独立团又击退了长（阳）、五（峰）、巴（东）三县团防的进攻，给敌人以很大打击。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使湘鄂边的局面逐步得到了恢复。

长阳苏区是湘鄂边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一九三一年上半年，革命武装和政权组织均有相当发展。红五十师扩充到五百余人，农民协会开始过渡为正式的苏维埃政府。九月十六日，红五十师在师长李步云率领下于龙潭坪袭击长阳团防章九峰部，歼敌七十余人，乘胜进占了渔阳关。十月，长阳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十一月二十八日，红五十师在庄溪牛弓山伏击川军袁海青团，缴长短枪五十七支。至十二月初，红五十师已扩充到一千余人，枪五百余支，下辖三个团，一团团长江勋南，二团团长汪沛然，三团团长田应涛。

一九三一年二月初，红二军团前委特派员周小康，到长阳听取县委领导汇报。他不顾事实，认定长阳红五十师是仅有形式的武装组织，长阳党组织是执行富农路线的，于是改组了长阳县委和苏维埃政府。三月中旬，邓中夏又派周小康和团长覃甦率领两个营，以突然行动收编了红五十师，把部队分编到红三军教导第一师和长阳县游击大队，并先后处决了红五十师师长李步云，政治委员江山。五月下旬，唐赤英受特委委托，在长阳县委扩大会议上，再次指责长阳党是富农占了领导地位，阻碍了一切政治主张和策略的实现，要彻底改变党的基础。八月一日，宣布解散长阳苏维埃政府。八月下旬，周小康下令逮捕了长巴梯队参谋长曾云轩，并以改组派名义处决于湾潭。在敌人的造谣、挑拨和逼供信式的审讯下，株连到红五十师不少连以上干部和部分地方干部。九月间先后逮捕了五鹤梯队长汪沛然、政治委员贾国香、长巴

梯队长田应涛、政治委员周易等二十余名干部，全部以改组派罪名处决。另外，还有不少干部被撤职或降级。

长阳红五十师是在改造“神兵”、瓦解敌人保安团、组织农民游击队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斗争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次打击，使长阳革命武装力量受到很大削弱。红三军转到巴兴归后，长阳苏区不断遭到敌人进攻，处境十分艰难。到一九三二年春，才在独立团的支持下，于二月份重建了长阳苏维埃政府，三月恢复了枝朽坪、大龙坪、双古墓等区、乡苏维埃，成立了长阳县苏维埃。

巴兴归

一九三一年四月四日，红三军占领巴东县城，进入巴兴归苏区。当时红四十九师在罗溪一带活动，未与红三军会合。红三军领导在巴东接见了巴兴归县委书记胡荣本，委员潘兆麟、宋文明及高云景等。红三军前委决定，将红四十九师改编为红三军教导第二师，仍以黄大鹏任师长，派涂美中任政治委员，周英任参谋长，潘兆麟任政治部主任。全师共编三个营辖八个连。同时拨给了一百八十支枪和部分弹药，留下了数名军事干部和一部分伤病员。并规定教二师与红三军失掉联系时，仍由巴兴归县委领导。不久红三军开始东进。长江上游“剿匪”代总指挥王陵基闻讯后，用八十条木船载川军万余人，于四月二十五日抵达巴东和秭归、香溪一带“追剿”红三军，并对巴兴归革命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围剿”。教二师在跑马坡、朱家山、万仙洞等地多次进行英勇的战斗，但终因力量较弱，未能击退敌人的进攻。为保存力量计，教二师决定摆脱敌人，主力由涂美中率领转移到兴山、房县交界的九道梁一带活动，余部由黄大鹏率领在根据地坚持斗争，并将后方机关全部移驻万仙洞。涂美中率教二师主力到达九道梁地区后，与在马良坪突围后转移至这一地区的许光达率领的红八师二十二团会合，先后在土地庙、店垭一带，铲除敌人哨所，活捉了国民党区长，消灭了兴山县保卫团一个大队，缴枪三百余支，还帮助建立了平渡河乡苏维埃政府。六月二十二日，教二师随第二十二团进入房县与红三军会合。不久即改编为红三军鄂西北独立二团，团长黄大鹏，政治委员余义明。

四月下旬，川军戴天明部张杰团和团防共数千人沿秭归、香溪进至兴山。二十五日进击县委及政府机关驻地小龙，扑空后又围攻红军隐蔽于万仙洞的教二师留守处和伤病员。万仙洞位于巴东和兴山两县交界处的半山腰上，地势险要，国民党《中央日报》曾有“万仙洞有险可守，且无绝粮之虞”之说。红军守洞人员利用有利地形，坚持战斗十八昼夜，杀伤大量敌人。后因孤立无援，寡不敌众，除留守处主任谭炳武、战士龚发舍二人跳岩幸免于难外，二百余人壮烈牺牲。五月九日，原教二师政治部主任潘兆麟在兴山平邑口活动时，被叛徒朱正昌出卖，英勇牺牲于兴山城西门外。十一月初，独立二团自房县返回巴东的甘坪、小龙一带。为了恢复苏区，该团采取多种斗争方式，积极拔除敌“围剿”时建立的据点。一九三二年一月间，在进攻二塘垭史祖惠团防据点的战斗中，团长黄大鹏、第一大队长罗玉清不幸牺牲。后由县委书记宋文明代理团长，胡荣本代理团政治委员，刘奉民任政治部主任，率部

见 1931 年 10 月 5 日《万涛自永隆河给湘鄂西省委信》。

转移到房县阴雨河一带继续坚持斗争。

早在一九三一年八月间，红三军前委听取了涂美中的汇报后，曾写信给巴兴归县委，指出：“巴兴归苏区又小又穷，又是川鄂咽喉，是军阀出入必经之地”，为巩固苏区，“必须向外发展”，“可以与房县、保康赤区取得联系”，同时，还要求迅速解决土地问题，大力扩大红军，改造苏维埃政府”。

十二月下旬，巴兴归县委在牛洞召开扩大会议，贯彻红三军前委给县委的信，讨论通过了《中共巴兴归县委扩大会议决议案》。会后，在小范围内分配了土地，并处决了伪区长陈天道等十六名豪绅地主，同时，由胡荣本、宋文明等率部转至兴山的龙门河、当阳河、茅狐岭、木水坪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击退了兴山团防的进攻，开辟了兴山新六区的工

作。不久，鄂西分特委派胡悌接任独立团团团长。胡悌到职后，以兴山新六区为依托，积极向房县及巴东方向发展，先后击退了房县团防高维耀部和兴山团防贾选成部的进攻。

鄂西北

均县、房县、谷城、郧阳地区的工作，原由鄂豫边特委领导，曾建立过郧房分特委，并有小股革命武装。红三军到达鄂西北后，建立了以房县为中心的苏区，在房县、均县、谷城、保康等地开展了分配土地的斗争，同时，对当地的地方武装进行了整编，进一步严密了组织。红三军离开房县后，苏区工作由以柳克明为书记的鄂西分特委继续领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三日，房县保安团团总陈茂炳乘红军主力撤走之机，勾结土匪武装侵占了房县。红二十五师和地方游击队相配合，乘敌立足未稳，在北峪沟歼灭匪徒三百余人，击溃房县保安团，当日中午即收复了房县。十二月下旬，兴安警备旅刘正增部两个团共千余人，向房县进攻。当敌自谷城经通昌河进至上达河时，红军以诱敌深入之计，主动自房县城撤至马兰。二十九日晚，红二十五师在地方游击队和赤卫队配合下，抓住有利时机，突然集中兵力将上达河之敌包围，经数小时猛攻，将该敌全部歼灭，俘敌旅长刘正增以下九百余人，缴枪千余支。

上达河的胜利，使房县、光化等地的地主豪绅极为恐慌，他们匆忙纠集当地团防及大刀会、白带会等反动武装，企图彻底摧毁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光化保安总指挥余希珍率部三千余人，再次向房县进犯。为避敌锋锐，红二十五师撤至张家湾，敌进占房县县城。接着，红二十五师又撤至上达河。此后，红二十五师在通昌河会合了房县游击大队，于房县四周展开游击活动，准备相机收复房县城。就在这个时候，接到了湘鄂西省委指示，要原红三军教导团返回洪湖根据地，教导团遂从红二十五师中调出，经洋坪、东巩向洪湖地区转移。

教导团走后，鄂西北苏区的武装力量大为减弱，在敌人的围攻下，根据地缩小了三分之二，斗争愈益艰难。四月上旬，分特委决定率红二十五师及房县游击大队和地方干部退出鄂西北根据地转往洪湖。部队经过兴山新六区时与独立二团会合，柳克明遂将独立二团与鄂西北苏区的部队合并，编为红

见 1931 年 12 月 24 日巴兴归《县委通讯》第二期。

三军第四路游击队，全队共千余人，由胡涕任总指挥，胡云任政治委员。合并后，部队即离开巴兴归，经兴山之板庙、远安之洋坪、荆门之沙洋等地转移到了洪湖根据地，在熊口改称为鄂西北独立团。由于革命武装和地方干部撤出，以及“左”倾路线的推行，鄂西北根据地不久即陷于失败。巴兴归苏区虽仍留下了部分地方干部和少量武装，但坚持斗争已十分艰难。

襄枣宜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六日，豫南、鄂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枣阳西乡蔡阳铺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鄂豫边特委，书记为郝久亭。在特委领导下，成立了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下设上地、经济、文化、军事、肃反、裁判等六个委员会，还组织了一个警卫队。指定程克纯（祖武）为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特委还决定以河南省委巡视员曾昭时任红二十六师政治委员。不久，师长张香山、政治委员曾昭时被撤换。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一年一月派赵侗（兴仁）任师长。当时，红二十六师共有五百多人，长短枪四百余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旬，鄂豫边特委曾调红二十六师攻打河南省唐河、桐柏、泌阳等县，计划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但因攻克唐河后未能巩固，匆匆建立起来的红二十七师也旋即失败，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没有实现。十二月中旬，红二十六师在毕店作战失利，遂又返至襄枣宜苏区。

一九三一年年底，在“围剿”洪湖根据地的同时，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师及第四十八师骑兵团纠合各地团防，向襄枣宜根据地发起了围攻。一九三一年一月中旬，第五十一师第三团进攻襄阳黄龙垆苏区，红二十六师在敌人围攻下受到很大损失，根据地的重要区域均被攻陷，内部动摇分子也自首叛变，革命组织几乎全被摧垮，情况异常严重。红二十六师由于组建不久，缺乏经验，在反“围剿”中未能采取灵活的战术，伤亡惨重，师长赵侗（兴仁）就职七天，就在枣阳三区的战斗中阵亡了，参谋长何尚志到职不久也在攻打王义镇时牺牲。以后由程克纯任该师师长。一九三一年二月，程克纯率领红二十六师渡过汉水，转移到南漳地区游击，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部队士气有所提高。后来，由于红三军进至荆当远及南漳、保康地区，敌第五十一师被迫侧重防堵红三军，红二十六师才在鄂北苏区乘机恢复发展起来。此时，红二十六师由余益庵任师长，张慕赛（木千）任政治委员。到八月间，红二十六师已发展到一千五百人左右，地方武装除普遍建立了赤卫队外，还组成了五个游击纵队，各纵队均有枪七八十支，襄枣宜根据地先后建立了襄、枣两个县，以及宜（城）东、钟（祥）北、枣（阳）南三个独立区的苏维埃政府，辖九十多个乡。同时，恢复了襄枣宜边区革命委员会，统一了根据地建设工作的领导。

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万涛及段德昌率红九师北上时，在钟北区与红二十六师会合。会合后，两师协同作战歼灭了钟北数股反动武装，给了敌人以很大打击。在红九师的帮助下，红二十六师建立和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和各级政治机关，红九师的马三光调到红二十六师任政治部主任。红九师在鄂北期间，万涛曾向鄂北的党组织传达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了解了当地革命斗争的情况，红三军回洪湖后，湘鄂西中央分局听取了万涛关于鄂北情况的报告，由夏曦向中共中央发信“请求中央将鄂北特委划归湘鄂西中央分局领

导，以便统一军事行动”。这个请求得到了中央的批准，此后，襄枣宜苏区便正式成了湘鄂西苏区的一部分。

见 1931 年 8 月 27 日《夏曦自湘鄂西（潜江县城）来信》。

第三章 湘鄂西革命斗争的严重挫折

第一节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进一步贯彻第三次“左”倾路线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三十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监利的周老嘴召开了中共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代表一百二十六人，代表二万二千多名党员（包括军队中的党员二千五百三十六人）。

一九三一年底至一九三二年初，中共中央曾数次给湘鄂西党组织发出指示。这些指示，特别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发布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对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湘鄂西的贯彻执行，起了鼓励和推动的作用。湘鄂西中央分局坚决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就是要通过这次大会，在“反立三路线”的旗帜下，进一步在湘鄂西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

在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后的近一年时间里，由于夏曦坚决执行“左”倾路线，使湘鄂西的革命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许多同志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改变这种状况。大会在听取了夏

曦的政治报告后，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七十多人对夏曦进行了严肃批评。特别是万涛等同志，就红三军主力返回洪湖苏区后的争论，指出夏曦的错误，得到了绝大多数代表的赞同。但是，因夏曦有中共中央的第三次“左”倾路线领导的支持，代表大会未能达到大家希望的结果。

这次代表大会的过程，按湘鄂西省委一九三二年三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记述，大致是：大会开幕的当天“下午由夏曦同志作政治报告（共六小时）。……讨论时……政治问题中心完全集中到夏曦同志是主张‘退却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一点上……讨论的三天中完全在闹这些问题。……第四天上午准备做结论，恰好关（向应）同志及魏士筠（尉士均）同志已到会场，当由魏士筠同志对主席团将到中央经过情形做一简单通知，并向大会做通知，及关同志作一补充政治报告，即宣布停止会议。当晚由夏、关同志召集万涛、（杨）光华、崔奇（琪）分头个别谈话，指出反中央分局及派别分子潘家询（潘家辰）企图从中活动，提醒了光华、崔奇二同志，并指出了一些材料，万涛同志完全未表示态度。次日上午，由中央分局……四同志召集主席团及（省委）旧常委……各同志开会，揭发了万涛及潘家询的错误，省委部分同志的错误及（省委）扩大会内容的个别错误，……这次开了一天，次晨召集全体旧省委及全体主席团及各地总代表开一会议，关于同志中进行反中央分局的斗争问题及同志中的错误，由夏曦同志在会议中作一通知，到会同志大部分了（理）解这一内容，而万涛同志在这次会议中的报告，承认错误的态度很不够，在这次会议中又重新指出万涛同志的态度的错误，继续进行大会，先由光华……士骛等同志……向大会报告这一斗争内容及揭发反中央分局的错误，万涛同志在大会报告他自己的错误……当时有一部分同志声明自己的错误，而潘家询同志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还）企图在大会上反攻……”。大会的第六天做了有关“政治问题”的结论。尔后，“国民经济问题报告讨论一天。组织问题、职工问题及选举、闭幕共二天”。

这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前被派到上海再次反映湘鄂西党内争论问题的尉士均，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湘鄂西党内斗争的情况。中央认为需要给夏曦以更有力的支持，即派关向应到湘鄂西参加中央分局的领导工作并担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

尉、关的到来，对代表大会起了扭转方向的作用。尉士均因在中央受了批评，返回湘鄂西途中，关向应又向他做了说服工作。于是转而支持夏曦的错误，在红九师北上、江南失败、红三军南下后的行动等问题上，极力为夏曦的错误辩解。关向应向代表大会传达的中央指示，把万涛等对夏曦一系列错误进行的抵制和批评，说成是“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大多数代表慑于中央的结论不再向夏曦作斗争，一些人并且跟着反对万涛等同志，随后又接受了夏曦所作的政治结论，通过了他所起草的《政治决议案》。

夏曦对于持续了数月之久的党内斗争作了结论。首先，他肯定了中央分局成立后开始的“真正的国际路线的转变”和工作成绩，特别是纠正“立三路线”的成就，其次，他按照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央支持夏曦的指示信的精神，认定与他作斗争的同志，一部分是“阶级敌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立三主义者”、“邓中夏信徒”，他们“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作复仇的斗争”；另一部分是因为工作遭受部分失败就到党内寻找失败的负责者的人，他们对整个领导的正确性发生怀疑，实际上是失败情绪的表现；还有一部分是“对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没有正确的了解”的人，他们与“立三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没有分开。第三，他专门给万涛重新作了结论，说万涛改变中央分局和省委关于红九师行动的决定，助长了军事冒险行动；不仅不在党内揭露自己领导红九师脱离苏区的错误，反而团结一部分人和反党分子向中央分局作“复仇的斗争”，企图使临时省委与中央分局对立，动摇党和红军的领导，“完全是反党行动”，“只有帮助反革命的意义”。第四，他把潘家辰定为反党分子，指责潘家辰主张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进行有系统的反中央分局的斗争。对于与会代表对他的批评，在他所作的结论中，唯一接受的是，“在潜江失败以后，在潜城谈话会中，发生了红军主力移到另外一个苏区的主张，这是绝对错误的，这是完全在困难面前发抖的机会主义的动摇，与没有征服困难的坚决性的表示。当时前方同志（特别是夏曦同志）没有能在原则上揭露这种抛弃洪湖根据地的右倾的提议而给以严厉的无情的打击，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在客观上帮助（了）右倾提议的影响”。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万涛等对夏曦的批评不够准确。事实是，将红九师置于襄北依托鄂北山区支持洪湖的建议是段德昌提出的。在当时江陵、石首、潜江、监利、沔阳、汉川水灾严重，襄河两岸多成泽国，百分之七十的群众外出逃难，给养无着、交通困难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项切合实际的措施。当时红军也只适于施行小后方和无后方作战，在襄北建立一定的后方工作，以便从洪湖地区难以得到支援时仍能进行胜利的战斗，有什么不好呢？联系后来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三军退出洪湖地区过程中夏曦的决策，可以看到他的这条结论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是很大的。

在夏曦指责红九师“冒进脱离苏区”和红三军主力自房县南下行动中的所谓错误等问题上，大会之后（二月二十五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只认为他“解决不当”；并把在讨论如何克服水灾困难、巩固和发展苏区时与他不同的意见一律斥为“冒险政策”或“右倾路线”。

大会的政治决议百分之百接受了中共中央在《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提出的“左”倾冒险主义观点。在对革命形势的估计方面，大会决议的基本论点是：

“因为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入，和中国革命的高潮，……反苏战争的准备与瓜分中国、直接的公开压迫中国革命运动，是目前帝国主义国际策略之中心”。“中国工农苏维埃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的武力，作更广大武装冲突的整个历史阶段，摆在我们面前了”。“在帝国主义者加紧压迫中国和经济总危机形势之下，苏维埃和红军得到伟大的胜利……国民党在革命高潮的基础上，宣告破产了，他正在进行第四次围剿苏区，作最后的挣扎（同时准备着新的军阀战争）。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弱点依然存在着，但是已经大大的向好的方面改变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转变到有利于工农方面了，现在革命形势的特征是反帝潮流与土地革命的汇合，是农民运动与城市反帝斗争日益开展与配合，工人运动的向前发展，将更推动这种发展的形势，而走到武装暴动的道路，而且各个苏维埃区域走向汇合的形势，已经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主要和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造成了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优越条件，因而过去不占领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基于这种认识，决议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扩大苏区，将零碎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争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

这种对革命形势不切实际的估计和由此而产生的对革命中心任务的错误规定，在实质上与“立三路线”一样是急于要夺取中心城市，妄想革命速胜；他们要求立即把各个苏区联成一片，其目的也是为了迅速夺取中心城市。

大会还根据中共中央“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苏区联系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上下游及京汉铁路的形势”的决定，在决议中进一步肯定了一九三一年提出的，以最大努力和鄂豫皖苏区打成一片，会师武汉的方针，以此作为湘鄂西苏区的基本发展方向。大会以后的各项工作，尤其是红三军的军事行动，完全是按照这个精神进行的；而中央分局更是不断强调向应城、云梦、孝感方向发展的“新的巨大意义”。但这一带靠近国民党统治中心武汉，交通发达，敌人重兵聚集，反动统治较强，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条件下，企图迅速夺取这样的区域，无疑是不正确的。

决议还为准备粉碎敌人“围剿”制定了一个“进攻的战略”，要求在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反革命“围剿”苏区的总任务之下，集中力量向敌人展开“胜利的进攻”，使红军的行动更加“积极化”。“左”倾的领导者没有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敌人以优势兵力进攻的条件下不知道实行必要的退却，以各种手段去打击、消耗敌人，为战略反攻创造条件，而是一味要求红军去与敌人决战；在紧张而残酷的斗争中，不知道利用战役、战斗间隙使红军作必要的补充休整，而是要求红军不停地作战。他们认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向敌人作“坚决的进攻”，反革命就必然遭到惨重的失败。他们企图用这样的“进攻的战略”，既粉碎敌人的围攻，保卫、巩固苏区，又扩大苏区，以至与友邻苏区打成一片。

对于过去湘鄂西区党的工作，决议说：“错误在于执行国际路线和反立

见 1932 年 1 月 9 日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定》。

三路线没有深入”，“立三路线与立三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实质，还远远没有肃清”。“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从今以后，必须无情的来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保证国际路线的彻底执行”。对于攻击国际与中央，攻击中央分局路线的分子，必须给予最严厉的打击。

关于土地问题，决议要求根据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土地政策在老苏区继续“彻底平分土地”，“在新苏区要立刻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富农土地亦在没收之列），平均分配给贫农中农（工人自愿亦分给之），同时党必须领导平分一切土地，在基本农民群众拥护之下即实行之”。决议确定“苏维埃运动中的阶级路线”是“党和工人阶级依靠贫农联合中农与富农作坚决的斗争”。显然，这种路线是不符合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的。

另外，大会还按政治决议提出的任务通过了关于职工运动、土地经济及财政问题和组织任务等三个决议案，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和苏区的若干重要工作，如渡过灾荒、加强对外出灾民的领导、巩固和扩大主力红军、游击队以及瓦解敌军等等，也分别确定了方针和任务，并选出了以杨光华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省委员会。这三个决议，在指导思想上当然也体现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精神，但对某些具体任务和要求的确定，是合乎当时湘鄂西的情况的，如修复堤防、恢复生产、动员群众参军、扩大游击战争、准备反“围剿”、加强群众工作，等等，都是迫切需要的，与会代表表示赞同。

这就是中共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情况。

自红三军主力返回洪湖苏区后，湘鄂西党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争论至此告一段落。在这场斗争中，以夏曦为首的“左”倾领导人在中共中央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支持下，继过火批评邓中夏之后又打击了一批站在正确方面的负责干部，并且以党代表大会决议的形式，从组织上肯定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从而全面确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对湘鄂西党组织的统治。会后，“左”倾路线变本加厉地在湘鄂西推行，使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也濒于毁灭的边缘。这次代表大会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其影响是巨大而久远的。

第二节红三军争夺襄北、保卫 洪湖苏区的斗争

瓦庙集战斗

在中共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加紧了贯彻错误路线的步伐。一九三二年二、三月间，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通过了几个决议和决定，以

布置和指导反第四次“围剿”。在这些文件中，“左”倾领导硬把红三军在襄北取得的巨大胜利拉来证明“左”倾路线的“绝对正确”。同时又指责红三军，说他们的行动还没有“万分积极化”，没有在占领潜江之后马上去进攻沙洋，说他们“等待防御，以主力作牵制行动”等“错误”还没有完全纠正过来，斥责主张红军主力在必要时进行灵活的游击战的同志们“因循守旧”、“保守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批评“企图以乡村包围城市”的宜昌特委“右倾”。要求继续采取进攻的战略，动员红军和群众的一切力量乘胜展开进攻，争取“不断的新胜利”，强调“转变到大规模平地战、城市战，为夺取中心城市而斗争”。他们认为，扩大红军、扩大襄北七县苏区的土地革命，与鄂豫皖苏区打成一片，对击破敌人“围剿”，巩固原有苏区有决定胜负的作用。并且根据这个精神为湘鄂西苏区的整个工作规定了三项主要任务，即：（1）

用二分之一的力量扩大襄北七县的土地革命；（2）消灭苏区内部和周围的反革命军队，扩大红军；（3）组织武昌、汉口、宜昌、沙市；长沙、岳阳等市工人和应城盐矿工人的罢工斗争。

不难看出，这些决定乃是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错误的战略方针的具体化，其内容除对个别工作提出的原则要求外，大都是不正确的。从此，红三军就被迫不停顿地强攻硬打，在战略上一步一步地深深陷入了被动局面。国民党军在文家墩遭到红三军的严重打击后，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七日，徐源泉重新修订了进攻计划：以第四十四师两个旅及一个补充团为“进剿”部队第一支队，第四十一师和第四十八师各一个旅为“进剿”部队第二支队，以重新组编之第一四四旅、独立三十七旅和新三旅主力为总预备队，集中不下十五个团的兵力逐次“清剿”皂市、天门之线以西的襄北地区。

三月二十九日，“进剿”部队两个支队共八个团由皂市沿汉宜公路及其

指 1932 年 2 月《湘鄂西中央分局为拥护红军胜利继续击破敌人第四次“围剿”发起广大群众运动的通告》，1932 年 2 月 29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目前时局估计及湘鄂西党与红军紧急任务决议案》，1932 年 3 月 5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扩大襄北及荆南新苏区决议案》，1932 年 3 月 14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中央苏维埃对日宣战和红军胜利后，湘鄂西党与红军、苏维埃的紧急任务决议》，1932 年 3 月 15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为执行扩大战争扩大苏区告地方及红军中全体同志书》。

从 1931 年反第三次“围剿”之后，湘鄂西苏区领导机关对于敌人可能进行的新围攻就有相当警觉，并不断进行准备打破第四次“围剿”的宣传。当国民党军在 1932 年 1 月下旬对洪湖苏区发动进攻时，湘鄂西中央分局便以为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已经开始，并且根据这个估计，在 1932 年 2 月发出“通告”，号召“继续冲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因此，在历史上，湘鄂西的党政军民就把 1932 年 1 月下旬到当年 9 月这一段时间统称为反第四次“围剿”时期。其实敌人对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全面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到当年 7 月才开始，7 月以前的军事行动不包括在第四次“围剿”，战役的范围之内。

南侧并列西进。同日，驻岳口的独立三十七旅主力进至天门，准备协同驻天门之新三旅一个团相机出动；驻沙洋之第四十一师一个团进至多宝湾，威胁红三军侧背。在这个期间，红三军根据中央分局“乘胜争取不断的胜利”，“打下京山，扩大新苏区”的指示，以一部强攻京山城，伤亡很重，没有成功。以后，红七师到襄南寻机打击川军，肃清苏区内部白点；红八、红九师在京山、天门境内，汉宜公路两侧地区活动。红七师尚未在襄南开始战斗，军部发现敌人将要大举进攻，即命令留一个团在张截港保障襄河两岸交通，主力向红八、红九师靠拢，准备在灰埠头、梵进寺一带集结全军主要力量共七个团迎击敌人。然而，红七师尚未到达集中地点，迎击敌人的战斗就开始了。

三月三十日上午，敌军先头部队在瓦庙集以东和梅家湾、卫家场附近与红军侦察警戒分队接触后，抢占了瓦庙集、梅家湾一带村庄。红八、红九师随即进入战斗，红八师在左，红九师在右，背靠猴迹山、佛祖山、西龙尾山，从瓦庙集西北、西面和西南各高地和梅家湾、卫家场以西地区全线向敌猛烈进攻，并以一部插入敌军两个支队的中间地区。敌人发现红军主力，立即转入防御，在所占村庄和丘陵地上拆屋砍树，紧张地构筑工事，设置鹿砦和壕沟障碍，顽强抵抗。敌机也不断轰炸、扫射，战斗十分激烈。三十一日下午，红七师主力进入战斗，从阮家沟向东攻占了何家湾、张家湾、戴家河，同时，红九师一部也进至敌军左侧后，基本上形成了对敌第二支队的合围。但因敌人兵力大，且利用工事固守，红军虽然将敌分割为以瓦庙集和梅家湾为中心的两个集团，不断发起集团冲锋，仍不能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敌人看到红三军全力投入战斗，打如此之硬战，与历来情况迥然不同，因而认为这次战斗不但对第十军，即对整个湖北都“关系弥巨”。因此，从三十一日起就一面要被围的敌军坚守待援，并尽力设法“系留”红军，一面积极调动军队增援。四月一日，徐源泉亲率第一四四旅一个团及第十军特务团由应城赶到皂市。同日，新三旅一个团经石河市增援敌第二支队，阻止了红三军在戴家河附近的发展。被围之敌乘势向红军反击，妄图恢复两个支队的地面联系，但未能得逞。二日，敌第四十四师师长肖之楚率领师补充第一、第二两团携给养、弹药由皂市西进。红军得知敌人援军将至，即以一部绕至汉宜公路北侧山地。三日上午十时，当肖之楚部到达钱家场附近时，红军突然出击，将其团团包围，敌军龟缩到钱家场，利用村庄及其附近有利地形，筑工事顽强抵抗，红军猛攻不下，双方成相持之势。同日，驻钟祥和沙洋的敌军第四十一师一个旅进至永隆河，驻天门之敌独立三十七旅主力占领渔新河和灰埠头。五日，敌第一、第二支队又乘红军一部东调打援之机，各以三团之众发起反击，危及红军打援部队翼侧。战斗旷日持久，形势日趋于红军不利，红三军遂主动撤出战斗，敌军也向东退去。

此役，敌人先后投入十一个步兵团及若干特种兵共二万余人。红三军以劣势兵力连续战斗，前仆后继，英勇冲锋，即使在战斗进行中补充的新战士，也打得十分出色，表现了高度的坚定性和牺牲精神。襄北群众在给养和战勤方面全力支援红军，给了红军以很大支持，因而使敌人受到了一定的打击：被全歼的建制部队为一个营，伤亡约二千人，飞机一架被击落。

但红三军本身的消耗更重，伤亡不下二千人。由于当时根据地人力缺乏，“左”倾机会主义者又基本上不许补充俘虏，因此兵员十分困难，弹药则更难补充。敌人深知这次消耗战给红军造成的损失，徐源泉在评价这次战斗

时说，红三军“历年所得之于国军之兵器及弹药，耗于斯役殆尽，而肃清鄂中区匪患之成功，实基于此役”。可以看出：瓦庙集战斗使红三军受到了很大削弱，增强了敌人的反动气焰。可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反而夸耀这次战斗的成就，说“象这样七天七夜持久的剧烈的战斗，是在中夏路线领导下的二军团所绝没有的事”，“是执行国际路线在中央分局领导下的红三军大转变的成功”。

张家场战斗

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间，在瓦庙集战斗的前后，红四方面军在皖西发动攻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自然要吸引国民党军以更大兵力去对付鄂豫皖苏区。因此，当时东面的敌人很难马上向洪湖增兵，支援第十军恢复攻势，而第十军在恶战之后，也需要整顿。在西线，川军配合鄂军再次夹击洪湖苏区的计划还只是在酝酿中。一方面，川军的基本方针是保持地盘，保存实力，因而行动不甚积极；另一方面，川军不得不以相当兵力驻在宜昌、沙市及监利以上的鄂西沿江各县对付地方革命武装。当时，中共湘鄂边特委、湘鄂边独立团加强了五峰、长阳和巴东江南地区的斗争，连续进击该地区内的团防，恢复和建立了县、区苏维埃政权，发展了当地游击队；中共宜昌特委领导的游击队，在荆门、当阳、远安、松滋、枝江、宜都、公安地区也比较活跃，那里的局面在四、五月间也有了新的发展，在上述地区活动的两个游击大队扩大了一倍以上，达到三百数十人，公安、松滋两县也组成了游击队。这些革命力量加上在荆门、当阳地区活动的鄂西北独立团（由红三军第四路游击队改编而成），对川军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看出，瓦庙集战斗之后，敌人的攻势可能有一个停顿，但这只能是短暂的间隙。然而“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不能正确地估量形势，确定斗争方针。他们继续发展中共湘鄂西区四大决议的观点，说整个红军及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已日益接近各个苏区联成一片的形势；襄北地区在土地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已日益巩固；在军事上，襄北之争将马上转变到以云梦、孝感、应城、应山、安陆为中心的京汉路之争，因此，“要用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进攻。他们不顾部队的疲劳和减员，一味要求继续进攻。部队如果休整三天，便被斥为右倾机会主义。他们认为瓦庙集战斗没有能够歼灭敌人的原因：一是红三军存在着弱点；二是鄂豫皖苏区红军和游击队没有起到直接牵制和配合的作用。因此，他们以省军委主席团名义，发布“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令红三军按照正规战和阵地战的要求加以改造，要它“转变到大规模作战的各种准备”，“如城市战、堡垒战、大规模的平地战”，反对“游击主义”，“准备到攻打大城市及可以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必要限度”。同时又向中共中央和鄂豫皖中央分局申述“马上使两个苏区打成一片是十二万分的必要”，要求两区在打通前就尽可能取得一致的行动，要求鄂豫皖中

见徐源泉《收复鄂中鄂西匪区暨兵工筑路建设沙市市政纪略》。

见 1932 年 5 月 28 日《湘鄂西省委军事报告》。

见 1932 年 5 月 16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击破敌人围剿扩大革命战争决议》。

指 1932 年 4 月《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

见 1932 年 4 月 18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鄂豫皖中央分局信》。

中央分局把根据地发展的基本方向选在安陆、云梦、孝感一带，并要求红四方面军主力到京汉路西活动，与红三军协同消灭鄂军主力，使两区红军主力会合，造成大江以北整片苏区的局面，然后再与长江南岸的“湘鄂赣”打成一片，包围武汉，以利于中央苏区夺取赣州、吉安和南昌，开始“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这个主张不久即为中央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所肯定。鄂豫皖中央分局也发来电报通知：四方面军先以一个师过京汉路西配合湘鄂西红军行动，其余四个师以上兵力在五月二十九日集中商城，六月十日可到京汉路西。这都对湘鄂西“左”倾机会主义领导坚持其错误方针起了鼓励作用。事实上，鄂豫皖红军也未能实行这个计划。

在国民党军从瓦庙集一带退回天门、皂市、应城一线不久，红三军便按中央分局的既定方针进逼敌占城镇，红九师深入应城、云梦、孝感地区活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主力红军与游击队相配合，连续进行了许多战斗，如袭击应城、隔蒲潭，围攻京山等等，都没有获得显著战果。

在根据地的建设和扩大方面，自一九三二年一月中共湘鄂西区“四大”以后到当年四月这段时间，大致还保持着发展的势头，特别是在襄北新区。但因各项工作执行的是“左”的政策，苏区是不稳定的。这个时期，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把外出灾民作为扩大根据地的“一支伟大力量”，而灾民中侵犯中农甚至贫雇农利益，加剧赤白对立的情况，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克服，早已实行的“左”的土地政策及开展反富农的斗争，发展到驱逐反动家属出苏区、消灭富农以至损害基本群众的利益，打击了正当的商业活动，这些都为以后的斗争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而客观上为敌人的“围剿”、封锁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月，国民党军转取主动，对襄北苏区展开攻势。当时襄北苏区以刁汉湖区工作基础最好，游击队、赤卫队不断出现在汉宜公路东段和襄河沿岸，破坏敌人交通，袭扰敌人据点，配合红三军行动，迫使敌第十军不得不将补给线向北移往云梦——隔蒲潭——应城之线。敌人为了保持运输通畅，摆脱刁汉湖区红色政权的牵制，解除游击队对其侧后的威胁，发动了对该区的“清剿”。敌人正规军二十个团在滨湖各县保安团和清乡会配合下，一部进湖，大部沿湖封锁，四方“兜堵”和防止主力红军增援。从五月二日开始到月底结束，先进攻湖区东部，再转向西部，先进行“清剿”，再大肆“清乡”。湖区各游击队在予敌人以有力打击后安全转移，但人民群众受害甚大，湖中散洲尽成焦土，沿湖农村大批被烧，居民被杀死、溺死者达五千余人。

对于国民党军这次进攻，以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确定的对策是“全力消灭进攻之敌”，“集中力量与四方面军配合消灭四十一、四十四、四十八师及夏斗寅之一部”。红三军本此精神，以一部协同游击队连日阻击敌“清剿”部队，主力于五月二十三日向出动到张家场一带防止红军增援刁汉湖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师一三二旅及一个补充团进攻。当日上午，敌由皂市进至文家

见 1932 年 6 月 5 日《中央致各苏区军事训令》。其中关于湘鄂西的红三军和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的任务有下述规定：“红三军除以一部兵力巩固洪湖根据地外，主力应积极在襄北发展配合红四军消灭徐源泉，肖之楚主力，造成鄂中一片苏区，与鄂豫边苏区打成一片”。“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除以二十五军巩固皖西北新发展的苏区外，主力应向西行动，扩大与巩固鄂东苏区，以一师兵力过京汉路配合红三军消灭徐源泉、肖之楚等主力，造成京汉路两旁孝感武胜关间比较巩固的新苏区，必要时可重新进攻黄陂，威胁武汉，调动进攻湘鄂西的力量，求得战争的解决，以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

墩附近，红三军一部抓住时机，从四面发起进攻，消灭其先头一部。敌急忙布置侧方掩护，边打边走，奔至张家场及其附近村庄固守起来。这时红军由各方赶到将敌包围，发起猛烈进攻。红九师仅二十五日一天就连续进行了八次顽强的冲锋。因敌依托工事和强大火力坚守，未能解决战斗。二十九日，第四十四师一三一旅和补充一团由皂市来援，在城隍庙附近遭红军打援部队一部阻击。敌分三路沿皂市、天门大道及两侧展开进攻。红军暂时西撤，待敌进至文家墩时，又以有力部队向其侧方猛攻，予敌杀伤甚重，迫敌转入防御。当日，被围在张家场的敌军，为配合援军的行动向西北反击，夺回了两个小村庄，因敌增援部队和被围部队相距不远，三十日上午，第十军特务团又由皂市来援，歼灭敌人已不可能，红军主动撤退。自二十五日起，在天门东南乾驿、斗埠头地区进行“清剿”的敌第四十一师、第四十八师、独立三十七旅的部队共五个团，陆续向天门及其以东的芦家口一带集中，准备增援被围于张家场之敌。因遭红军阻击、袭扰，至二十九日始有一部到达天门。当三十一日敌以四个团向柳河出动时，红三军主力已经撤走。这部分敌军的行动未起多大作用。

这次战斗，持续达八昼夜，国民党军伤亡八百余人，第一三一旅旅长于兆龙被击伤。红三军伤亡一千五百余人。这是瓦庙集战斗后又一次极为激烈的战斗，同样也是一次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对于这种不能歼灭敌军的作战，夏曦不仅不检查指导上的失误，反而错误地认为是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破坏造成了失利。他说：“张家场之战，（红七师参谋长）赵奇（赵炎）不执行命令，放弃李家场，以致被我们围困（在）张家场一星期之敌突围而逃。”还说：“这些反革命分子在军事上阴谋是很多的。”

数次伤亡重大的战斗，加上张家场战斗前开始的第一次错误肃反，大大挫伤了红三军的元气。同时，由于战斗不利，也影响了襄北新区的巩固。天汉地区的游击队、地方干部和大批群众，在张家场战斗后，迫于敌人的压力和残酷烧杀，纷纷向西撤到了灰埠头一带。

新沟嘴战斗

就在这个时候，川军在鄂军迭次要求下，乘红三军全力争夺襄北的机会，分四路由后港、江陵、沙市、监利等处进犯洪湖革命根据地。六月初，第一、第二两路敌军——第二十一军教导师第三旅和第三师第九旅共五个团占领了下蚌湖、浩子口、周家矶、潜江一带；第三路敌军——第二十一军第四师范绍增部三个多团占领了张金河、龙湾、老新口一带，并有继续深入之势；第四路敌军——第二十一军独立二团团团长佟毅指挥的两个团进攻陈沱子口。红军只有省军委警卫团、地方武装和军校的学生队阻击进攻之敌。

因为襄南苏区情况紧张，红三军主力即从襄北撤回。红七师从荆南方面出川军侧背，红九师（欠第二十五团）经黑流渡渡过襄河。六月九日，红九师隐蔽地进到新沟嘴，在当地群众和赤卫队的帮助下，连夜构筑工事，设置障碍物。在红九师未到之前，军委警卫团已从张金河、老新口一带退到新沟嘴，并在当地准备防御。此时红九师主力 and 该团主力即配置在新沟嘴附近，该团一部则配置在东荆河北岸的渔洋镇附近，红九师一个团和师属、团属的

见 1932 年 7 月 8 日《夏曦给中央的报告》。

骑兵连作为第二梯队。

由于红三军连续打了几次消耗战，部队弹药很缺，红九师还向赤卫队和群众借来了大批长矛，准备必要时进行肉搏战。

次日，在部队一面继续加强防御准备，一面恢复体力的时候，夏曦由后方到达，他要红九师立即向老新口进攻。经段德昌具体分析了放弃有利阵地去进攻敌人设防村镇的不利条件和等待敌人进攻我们的既设阵地的有利条件之后，夏曦才同意了红九师的作战计划。但过了两天，敌人还不进攻。因为苏区内部严重缺粮，红九师从襄北返回时，又只带了五天给养，再等下去就要发生粮荒，段德昌乃派一小分队到老新口袭扰诱敌。六月十三日晨，范绍增部果然来了。红军警戒分队奉命不作坚决抵抗，敌人临近即向后退，以纵敌之骄。

敌军先头部队居然拼命追赶，多路纵队沿东荆河南岸河堤冲至障碍物前，企图破坏障碍一拥而入。这时，红军的自动火器突然开火，步枪也进行齐射，予敌严重杀伤。紧接着发起阵地前的局部反击，将敌人赶到了原警戒阵地附近。后来敌人的后续部队赶到，才稳住了阵势。后敌人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又发动了两次冲锋，都没有成功。红军在战斗过程中，一面由第一梯队消耗、杀伤、疲惫敌人，一面令隐蔽在新沟嘴以东、东荆河岸边的骑兵，利用河堤遮蔽，由渔洋镇附近的分队以火力掩护，插向敌人侧后。在敌人最后一次冲锋被击退时，骑兵正好抄到了敌人的侧面，红军正面部队乘势全线出击。敌人两面挨打，混乱溃逃，红军跟踪追击至老新口以西，生俘敌三千余人，缴枪二千五百余支，其余三路川军不战而退。与此同时，红七师在浩子口，下蚌湖一带截击撤退之敌，歼灭了敌第九旅的一部。

六月十四日，从天门、岳口出动的鄂军六个多团到达渔薪河和黑流渡，皂市之敌亦蠢蠢欲动，妄图乘红三军主力在襄南之际，重新控制襄河北岸要点，进攻襄北部队，策应川军，但在听到川军大败的消息后，已动之敌急忙撤回，未动之敌不敢再动。

新沟嘴战斗，再次显示了人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和重要性。由于灰埠头一带群众，把从襄河敌人粮船上夺来的军粮分给红军一部分，红军才可能返回苏区内部作战；由于根据地群众严守秘密，敌人才中诱兵之计，这次战斗也显示了地方武装和主力红军相配合的作用。从川军大举进犯时起，红军军校的学生队和地方武装便在陈沦子口顽强抵抗敌人，在南面掩护周老嘴、新沟嘴，使敌范绍增、佟毅两路敌军不能会合，为新沟嘴战斗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次胜利不仅削弱了“围剿”军的西翼，也制止了襄北敌军的进攻；不仅保住了荆南、江陵、潜江苏区，而且使荆门、当阳一带党的组织乘势扩大了部分新区。但“左”倾机会主义者无视这个事实，依旧顽固地贯彻既定方针。红三军在新沟嘴战斗后，只得再去逼近应城、皂市，围困京山，执行没有成果的“进攻战略”。

第三节湘鄂西苏区第一次 “肃反”及其恶果

一九三二年夏天，正当敌人加紧进攻襄北地区的时候，湘鄂西第一次大规模的“肃反”开始了。这次“肃反”与“左”倾领导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纠缠在一起，诬害了大批优秀干部。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同苏区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在这前后，中央还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多次发来内容涉及“肃反”的指示。关于当时湘鄂西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中共中央笼统地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和“机会主义派别、两面派”对党、对中央分局和国际路线的“进攻”。说在湘鄂西“苏区内还隐蔽着不少反革命派别——国民党、改组派、北极会、硬肚会等”，湘鄂西的党组织“还未开始有系统的大的破获”，应该“健全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和工作”，“很好利用鄂豫皖苏区肃反的经验”，“发动群众先发制人的迅速消灭”反革命组织，“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肃反工作”。要求在党内斗争中加紧“肃反”，加紧反对机会主义。

这些观点恰好迎合了湘鄂西“左”倾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和宗派主义分子的思想。他们认为，革命势力愈发展，反革命势力愈团结；湘鄂西苏区自执行国际路线以来，阶级斗争日益紧张激烈，阶级敌人看到自己地位的根本动摇，必然较之以往更积极地团结他们的力量，利用一切方法，在各种革命组织中加紧反革命活动。因此，反革命阴谋的扩大，是丝毫不足为怪的。根据这种“理论”和中央苏区“富田事变”、鄂豫皖苏区“肃反”的经验教训，湘鄂西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大大地“警觉”了起来，并把“利用鄂豫皖的经验，将肃反造成群众运动”定为同反革命团体作斗争的“主要原则”。自从中共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他们便对“肃反”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将革命阵营中的路线、策略之争，思想认识问题，一般的违反纪律现象，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由于不可抗拒的因素或他们指导错误造成的失利，甚至生活作风问题，都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联系起来，把清洗革命团体中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员、处理营私舞弊分子等工作，也纳入了反“改组派”斗争之中，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极度夸大了暗藏敌人的力量。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湘鄂西地区的大规模“肃反”，一开始就采取了扩大化和逼供信的做法，并且愈演愈烈。

湘鄂西地区“各种反革命组织”的线索，是一九三二年五月发现的。起初，红军在襄北捉到了一个名叫张锡侯的国民党军官，他供出自己是“统一国民党”的成员，并与天汉县军事部和游击队的某些人有勾结，准备五月十八日在苏区暴动；接着又从关向应在吴堰岭（红三军军部驻地）对违反群众纪律的红八师特务队长的审讯中，获得了所谓红三军中的“改组派军事委员会”的情况。据供，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红八师二十四团参谋长邓希禹、

见 1932 年 1 月 21 日中共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的信——关于湘鄂西党目前组织任务》。

见 1932 年 7 月 8 日《夏曦给中央的报告》。

见 1961 年 4 月 18 日至 20 日贺龙谈话记录——《关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湘鄂西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的若干问题》。

红八师特务队长朱寿谦、红八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红八师二十四团一营营长谢锡章、红七师二十团团团长刘庶植、红九师参谋黄正金、红九师二十七团参谋长李孝侯、红八师二十四团政委谯继汉是改组派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于是保卫机关逮捕了有关人员，尔后又根据从这些人中逼出的口供，继续捕捉其他人员。如此步步株连，涉及的范围愈来愈广，人数愈来愈多，几乎遍及湘鄂西各个根据地。各级保卫机关也就不断在地方上和红军中一批一批地逮捕各级干部，以及某些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轻率地给他们戴上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帽子。而且自从发现了“反革命组织”在各地的“线索”之后，“肃反”便成了湘鄂西党组织最紧迫、最突出的斗争任务。在采取逮捕、审讯、处决行动的同时，反复地动员群众检举有嫌疑的人，号召反革命组织成员自首。地方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其他革命工作则几近全部瘫痪。在红三军中，甚至当进行战斗之时，也得奉命展开“火线肃反”，从战场上将一些指战员逮捕起来。为了加强这种错误的斗争，省政治保卫局也换上了“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认为能够坚决执行其“肃反”路线的负责人。

负责“肃反”的各级政治保卫局，有独立的工作系统，实际上不受各级党委的监督，只要有夏曦或某几个“肃反”人员的决定，就可以捕人、杀人，甚至捕杀高级干部。杨光华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承认：“逮捕重要分子系由中央分局负责同志与省委常委中少数负责人和省保卫局长共同决定。”他们每捉到一批人，便非刑拷打、逼问口供，然后就以供词作为判罪和再去捉人的根据，从不作任何甄别工作。

主持“肃反”的人员沿着逼供以至诱供、指供和轻信口供的错误做法越走越远，大大夸大了反革命组织的力量，几乎把所有的不良现象和缺点错误都认作是反革命分子的蓄意破坏。他们认为整个湘鄂西苏区的党、政、军、群各级领导机构中都有“改组派”或“第三党”、“托陈取消派”、“AB团”、“罗章龙派”、“国民党”等“反革命组织”和“秋自主义者”，而这些组织的成员又都加入了“改组派”和“新共产党”，并且控制了许多革命组织的领导机构。他们的结论是：分局和省级党政群领导机关中除了几个高级领导人和少数事务人员外，都是“反革命”或“反革命嫌疑分子”；宜昌特委和涪阳、江陵、川阳、天汉、天潜各县县委都是清一色的“反革命”；江南、潜江、监利各县县委和襄北特委，除个别人不是反革命，或系“嫌疑分子”外，其余都是“反革命”；京山、荆门、云孝县委书记和大部分区委书记，各县保卫局人员都是“反革命”；差不多每个地方党的支部中都有反革命组织；省军委参谋部的七个科长，红三军的参谋长，红八师师长，三个师的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三个师政治部的组织、宣传科全体人员，大部分的团长、团政委、团参谋长，大部分营长和一些连长，后方军事部门的大部分负责人，多数县的军事部长、游击队长，也都是“反革命”。他们污蔑若干地区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他们以“肃反”不力和肯定有“反革命”阴谋破坏为由，解散了江陵、沔阳、川阳等县的县委

除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起草的文件外，从现在掌握的其他历史文献、敌伪资料、老同志回忆录和对老同志的访问记录中找不到反革命组织和政治团体在湘鄂西苏区存在的确实证据。

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认为存在，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党内派别。

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认为存在，实则根本不存在的一种“反革命组织”。

见 1932 年 12 月 19 日杨光华《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

会。他们觉得什么人都靠不住。甚至说在湘鄂西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始人，已经英勇牺牲于洞庭湖区的周逸群同志是湘鄂西“改组派”的最高领导人，而且正在为国民党策划对苏区的围攻。

因为“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认定湘鄂西的党政军群干部几乎都是“反革命”，所以在这次“肃反”中干部队伍损失极其严重，许多地方机关和部队的干部，前一批被捕不久，新提拔的一批又被捕，一直捕到根据地失陷。他们认定柳克明从房县、兴山带回的部队中有很多“反革命”，一次就逮捕了那个部队里的绝大部分连以上干部。直到最后洪湖苏区只剩下江陵沙岗附近那一小块地区的时候，夏曦还根据一些根本不能成立的理由，逮捕了刚刚由湘鄂边退到洪湖苏区的、以周小康为首的湘鄂边特委和独立团的一批干部。对于这种本来极为错误的大肆逮捕，“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总结时还作为工作成就加以肯定，说虽然反革命“改组派”不断以新的分子代替被捕的，以保持其组织的存在，但除少数首领外，其余的都没有漏网。对于被捕人员的处理，因为不准军队中营以上干部、地方上区委书记以上干部“自首”，所以除少数基层干部、战士和群众在“自首”之后得到开释，另一小部分人被判劳役外，大部分人均被处死。这个不准区委书记和营以上干部“自首”的“决定”，是由夏曦主持制定的，“只中央分局、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和省政治保卫局长、红军军政委知道”，对其他人一律保密。

在这次“肃反”中牺牲的主要领导干部有三种，即最初创造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的、曾经到过苏联留学的，以及历史上曾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包括被党派往国民党军队工作过的干部。其中，党政机关的负责人有湘鄂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委员万涛，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湘鄂西省委委员、沔阳县委书记冯纯，湘鄂西省委委员刘蜡喜，湘鄂西省委候补委员蓝育才，湘鄂西省委候补委员、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省监委委员、省苏维埃副主席刘革非，湘鄂西省监察委员、党校校长、湘鄂西省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侯蔚文，湘鄂西省委监察委员、汉阳县委书记黄秋松，湘鄂西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湘鄂边特委常委、湘鄂西省委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徐彬，《红旗》编辑毛简青，湘鄂西省委发行部长陈克昌，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均，湘鄂西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湘鄂西银行行长戴补天，湘鄂西省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才，湘鄂西省苏维埃经济部长栩栩，湘鄂西省苏维埃土地部副部长陈祖培，湘鄂西省苏维埃财政部长王恩平，湘鄂西省苏维埃司法部长朱子贞；红军中的领导干部有省军委委员、红三军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克明，湘鄂西省委委员、红七师政委彭之玉，红七师政委王鹤、李剑如，参谋长赵炎，省军委委员、红七师参谋长周容光，省军委委员、红八师师长段玉林，参谋长胡慎己、吴丹人，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周子服，湘鄂西省委委员、红九师政委孙子涛，参谋长张应南、胡梯，政治部主任刘鸣先、吴凤卿等。此外，还杀害了江陵、川阳、石首、天潜等十余县的县委书记、部分常委和区、乡干部，大批军队中的团、营干部，以及部分基层干部。在党的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及以前反对过夏曦错误的领导干部，在这次“肃反”中基本上均被处决。夏曦认为“这次肃反胜利，完全是四中全会湘鄂西成立中央分局一年以来与立三路线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胜利的结果，（党的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则）

见 1932 年 12 月 19 日杨光华《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

是深入和总结这一斗争的关键”。在这一点上，曾经在第一次大规模“肃反”期间主持过湘鄂西省委组织部工作的阿森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的更加清楚。他说：“他们（按：指湘鄂西的“各反革命派”）的联合组织与联合战线大概是发端于今年一月间湘鄂西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的前后”。“当执行国际路线之夏西（曦）及（宋）盘铭一时离开省委所在地时，就在改组派的领袖万涛领导之下召集省委扩大会议，扩大会议对立三路线一字不提，对立三路线的积极执行者邓中夏的错误一字不谈，扩大会议的中心是在反对夏西（曦）的旗帜下来反对国际路线，反对执行国际路线的中央分局，把省委与中央分局形成对立状态。在扩大会议时，各反革命派已经采取联合战线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这一联合战线，在四次大会时更加明显”。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既已认定同夏曦作斗争的干部一部分是阶级敌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邓中夏的信徒等等，那么，进一步给他们定罪和予以清除，自然就成了“左”倾思想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

这次“肃反”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无可弥补的损失。

（一）大批优秀干部受到了错误的处理和迫害，严重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和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二）乱捕、错杀造成了一种人人自危的心理，使党、政、军、民全部革命组织陷入严重的恐怖气氛中，窒息了党和红军各级干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由于把许多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党内的意见分歧都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实际上取消了党内民主，取消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助长了“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的专断作风，阻碍和打击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

（四）把“肃反”工作当成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不停地逮捕干部，使洪湖苏区的地方工作大都陷于停顿状态，大大妨碍了对敌斗争，为打破第四次“围剿”而提出的各项任务流于空谈。

但是，湘鄂西的党组织，特别是红三军，经住了这个打击。当时，外有强敌压境，内部大肆捕杀，情况危急万分。然而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并没有丧失革命胜利的信心，依然忠于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忠于革命事业，相信困难一定能克服，真理一定会胜利。因此，他们虽然眼看着与自己同艰苦、共患难的战友不断遭到诬害，明明知道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虽然由于怕被当作“好吃会”、“兄弟团”等反革命组织活动看待，不敢在一起吃东西，不敢谈心，长期生活在恐怖的气氛中，却仍然立场坚定，百折不挠，视死如归，艰苦奋斗。

面对这种情况，当时有些人提出了疑问：怎么许多出生入死创造红军、创造苏维埃的人会忽然成了反革命呢？对于这样的问题，夏曦的回答是：“他们建立根据地就是为了消灭根据地，建立红军就是为了消灭红军！”并且指责对这种“肃反”抱怀疑或反对态度的同志们具有“极不正确的右倾情绪”和“对肃反不坚决的机会主义观点”。他们认为“肃反”方针的正确性是无

见 1932 年 7 月 8 日《夏曦给中央的报告》。

都是“左”倾分子认为存在，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反革命外围组织”。

见《访问钱瑛部长的记录》。

见 1932 年 7 月 8 日《夏曦给中央的报告》。

见 1932 年 6 月 19 日湘鄂西省委《关于同湘鄂西反革命团体斗争和纠正肃反中的错误的决议》。

可怀疑的，说：“改组派”等“反革命组织”的破获，“正是阶级斗争进展之过程”，正是表明“党走向健全化，苏维埃、红军日益巩固”¹²；这种大规模的“肃反”，不仅“没有形成恐怖心理”，而且大大鼓舞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红三军在“肃反”过程中还能打连续八昼夜的持久战，还能在新沟嘴歼灭川军的一个多旅，就证明“肃反”的正确。因此，这种“肃反”必须肯定为执行国际路线的另一项伟大的成功的转变。“左”倾路线统治的中共中央也支持他们的观点。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与省委的指示信中说：“我们认为湘鄂西党在这次肃反工作中所执行的路线，一般是正确的。而且正因为湘鄂西的党能够坚决执行国际与中央的指示，能够依靠在湘鄂西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热烈拥护上，所以它在肃反工作中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次肃反的胜利，是湘鄂西苏区进一步发展与巩固的最有力的保障，并且给湘鄂西党造成了更顺利的深入国际与中央的路线到群众中去的顺利条件”。同时，还告诫湘鄂西的党组织对于有些可疑的“反革命分子”不得敷衍了事。由于有中央的支持，夏曦等自然就更坚决地把这种“肃反”一次再次地进行下去了。

见 1932 年 7 月 8 日《夏曦给中央的报告》。

第四节 洪湖苏区反第四次“围剿”失败

国民党军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开始 敌军进攻襄北苏区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不顾“九·一八”、“一·二八”以来日益深重的民族灾难，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之后，随即召开了“庐山会议”，决定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蒋自任总司令，调集五十万大军向中国工农红军发动空前规模的第四次“围剿”。

为了解除对武汉的威胁，国民党军首先以主力向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进攻。六月底，将向湘鄂西苏区进攻的军队划为左路军，以何成浚兼任司令官，徐源泉为副司令官兼总指挥。划入左路军序列的有洪湖地区及其周围的全部鄂军、湘军和长江上游“剿匪”代总指挥王陵基所指挥的川军，包括第十三师、第十九师、第三十三师、第三十四师、第四十一师、第四十四师、第四十八师、第五十一师、第八十二师、新三旅、新七旅、独立三十四旅、独立三十七旅、独立三十八旅、第二十一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三师、第四师、教导师第三旅、独立一、二团等部队，总共约有十余万之众。

除了军事部署，蒋介石还特别强调政治进攻和经济封锁，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在政治上重新划分了“清乡”区域，以大地主、大豪绅担任各区正副“清乡委员长”和各县“清乡委员”；设立行政督察专员“综理辖区内各县、市行政及剿匪清乡事宜”，直隶蒋的总部。那些专员又都兼任各区保安司令，指挥区内所有反动地方武装。国民党通过这些入积极组织、整顿民团、保安队，构筑土寨、碉堡、望楼，推行“十家联保”、“连坐法”、“通行证”制度和各县联防等。在经济上，他们严禁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可供军用的物资，特别是食盐、布匹、煤油、医药等物输入苏区，违者以“资匪通敌”论罪，也不准从苏区购买或运出物资，违者以“通匪利敌”论罪。同时，他们还加强了对军队的法西斯控制，除普遍设立政工机构，颁行“通匪治罪条例”、“连坐法”而外，还以蒋介石名义直接向各军、师派出联络参谋和巡察参谋，加强内部监视。

七月初，徐源泉拟订了“左路军第一期剿匪计划”，强调“步步为营、稳打稳进”，企图首先集中主力“肃清”襄北，并占领襄南之潜江、荆门一部分地区，将红三军主力歼灭或压迫至长江、襄河之间。据此，他们以第十三师六个团，第四十四师六个团，第四十八师五个团和第四十一师一个团，独立三十七旅三个团共二十一个团编为四个纵队，另以六个团编为总预备队，向襄北苏区进攻，令川军第一纵队（教导师第三旅郭勋部和第九旅主力共五个团的兵力）、第二纵队（第四师四个团和第九旅一个团共五个团的兵力）向襄南苏区进攻。其余部队，担任游击、堵截、佯攻、牵制任务。

六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决议要求，“必须向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消灭敌人在一方面的主力，以根本击破敌人的‘围剿’计划。各苏区的红军必须更有计划的互相呼应，互相配合，坚决执行中央最近军事计划，以造成占领南昌包围武汉的形势”，并提出了“一寸苏区的土地不被国民党军队蹂躏”的口号。

在国民党军“围剿”即将开始之际，红三军主力再次进至京山、应城、

皂市之间地区。七月二日，以红八师围攻京山城，红三军主力集结于京山东南地区待机。

七月十五日，襄北敌第一、二、三纵队由景家墩、皂市、白马庙之线出动，自东南向西北齐头并进，寻找红三军主力决战。次日，敌第四纵队由岳口向张截港、泗港推进，企图控制渡口，敌机轰炸灰埠头、张截港的浮桥，协助地面部队。为避敌锋芒，红三军撤离京山，向西转移。敌跟踪西进。红三军掉头向东，一部撤至襄南，一部转至敌侧，一部进至京山、应城、皂市、安陆之间地区，以牵动敌人。

同时，襄北的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积极配合红三军作战，有力地发挥了侦察、牵制、扰乱、迷惑敌人的作用，加上广大群众的坚壁清野，给敌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威胁。敌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在给何成浚的报告中承认：“军队经过时，几至人烟绝迹，问留少数妇孺，凡有询问均盲无所知。军队过去，赤卫队复出而滋扰，避难良民（按：指外逃地主、豪绅等）纵欲回乡组织铲共团体又恐军队他调无所保障，亦多畏缩不前。”面对这种情况，敌军以一部继续进攻，于二十四日占领潜江。主力则一面追寻红军，一面在团防和土豪、劣绅的配合下，分区“清乡”——挨家挨户清查户口，搜捕、屠杀革命干部和群众，诱骗胁迫党、团员秘密自首，建立保甲，组织“铲共义勇队”、“民团”、“保安团”，以期建立反革命的血腥统治。

到七月底，留在襄北的红三军部队鉴于敌人兵力强大、密集且注重构筑工事掩护，很难寻得在野战中歼灭敌人的机会，决定转到襄南打击川军。他们由马良附近渡河，突破了敌第十三师一部和均州南漳保康“剿匪”司令张连三部的阻扰，进到了荆门东南地区。三十一日，在军委警卫师配合下，在曾家集、范家集、沈家集、半边街一带与川军郭勋部接触，激战到八月三日，因敌援军赶到，未能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遂撤退到熊口、莲花寺之线，与在该地的红三军其余部队会合。红军撤退时，川军跟踪追击进占浩子口、周家矶一带，控制了西荆河，切断了洪湖中心区与荆南苏区的联系，形势极为不利。

军委警卫师是新沟嘴战斗后，七月间由鄂西北独立团和军委警卫团编成的，下属两个团，共五个营兵力。该师曾在马良、沙洋附近活动，后转至周家矶、熊口一带继续对川军作战。

红三军向南转移后，在襄北活动的红军只剩下了天汉、天潜、京山、钟祥等县的几支游击队，国民党军基本上控制了钟祥、京山、皂市、天门、沙洋之间地区，并且在襄南占领了一个新的进攻出发点。

在鄂军大举进攻期间，川军除配合襄北敌军行动外，还纠合当地团防对处于其后方的荆门、当阳、松滋、枝江、宜都、公安等县进行了残酷的“清乡”，当阳、荆当、公安、松枝、枝宜等县的革命斗争，除荆门北山地区外，均于七月份先后失败，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牺牲达五六百人。八月以后，在宜昌特委领导下，各地才逐步恢复工作，建立秘密组织。

敌进犯洪湖根据地中心区，反“围剿”失败

由于红军没有打破敌人对襄北的围攻，敌人的重兵从北面和西面逼近了

这些县是湘鄂西党组织为了当时工作和领导的便利而区划的。除公安外，都不同于各县历来管辖范围。

洪湖苏区中心区域。红三军在辗转作战中伤亡很大，又在“肃反”中损失了许多有经验的干部，实力大为减弱。洪湖苏区内部粮食十分缺乏，不利大军作战。这些都给湘鄂西的军事斗争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但即使如此，局势也还没有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只要坚决抛弃“左，倾的军事路线，停止错误的肃反，也还能把洪湖根据地的基本革命力量保存下来。可是，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此时在战略指导上，又由冒险进攻走上了单纯防御的道路，号召“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命令红军构筑碉堡准备固守，并打击怀疑这种作法的高级指挥员，要求地方党委带领地方武装在强敌进攻时固守市镇，处罚没有执行这种错误指示的地方党委。

敌人在攻占襄北、荆南和潜江后，便积极准备大举进犯洪湖根据地中心地区，发动“第二期进剿”。八月十日，徐源泉将“进剿”军区分为左翼军和右翼军。左翼军包括由第三十四师、第四十八师、独立三十八旅、第十军特务团编成的第三纵队和由第四十一师、独立三十七旅、新三旅主力编成的第四纵队，由徐亲自指挥。右翼军为由川军组织的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由王陵基指挥。第十三、第四十四两师在襄北“清乡”，并作为总预备队。此外，所有驻襄南的敌军及在华容一带的湘军第十九师等部均担任堵截任务。在长江，则有国民党海军军舰往返梭巡，防止红军南渡。

徐源泉的企图是，以左翼军集中于杨树峰、沔阳、唐家场地区，由东北向西南进攻，逼近洪湖；以右翼军首先推进到莲花寺、上车湾一带堵截，等左翼军三面控制了洪湖附近地区之后，再从西面配合，合力围攻洪湖，将红三军和湘鄂西领导机关消灭在洪湖、长江之间。

八月十一日，敌人开始调整部署，向进攻出发地区集结。在敌尚未部署就绪时，夏成为取得粮食、物资，以便在洪湖根据地中心区内部作战，命红三军七、八两师向沙市、草市进攻，警卫师和红九师在熊口地区防止敌人进攻。据此，红七、八师于夜间绕道穿过郝穴、资福寺之间地区，八月十三日猛扑沙市、草市。王陵基一面要江陵、沙市地区的两个团和当地保安团固守，一面急令驻岑河口、资福寺、丫角庙、后港、拾回桥等处的三个团火速增援。红八师顺利袭入草市，毙伤敌五百余，缴枪数百支，后留少数部队在草市打扫战场，主力进至市区南部并向江陵派出警戒。红七师进攻沙市，因敌工事坚固，火力强大并有电网掩护而没有成功。下午，敌人援军赶到，配合守敌在军舰和飞机的支援下猛烈反扑，隐蔽在草市市内的一部分残敌也同时出击，红军再战不利，当日夜间退出战斗，撤回龙湾、熊口地区。

此次向敌人设防城市的进攻本没有什么胜利的把握，尽管消灭了一些敌人，牵动了部分川军，但于大局毫无补益，相反，红三军遭受了相当的损失，搞粮食的目的也未达到。战后，川军很快加强了对沙市、江陵的防护，也加强了对红军的封锁。

敌左翼军八月十八日开始动作，至二十日，控制了白庙以西的整个东荆河北岸地区。同时，由鄂东调至蔡甸一带的敌第三十三师也进入了汉川、汉阳境内，控制了侏儒山及其西南地区。这时红军在东荆河以南的部队只有监利、沔阳两县的警卫营和军委警卫营，湘鄂西根据地首脑机关所在地受到了直接的威胁。

面对这种情况，红三军的领导同志提出了集中主力转到外线机动作战、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正确意见。贺龙指出，只要我军主力转往外线实施机动作战，就可能迫使进攻苏区之敌后撤，粉碎敌人的“围剿”。但是，夏曦

从单纯防御的思想出发，不同意这个建议，认为防守与钳制敌人应兼顾，决定两路分兵：以地方部队在根据地内分兵把口，并急调红七师和警卫师主力固守东荆河南岸地区，归夏曦直接指挥；以红八、红九师和警卫师一个团，由贺龙、关向应率领到敌后去，先给川军以打击，然后转到襄北打击鄂军，以钳制敌人。

正当红七师遵照夏曦的决定向东南调动时，八月二十四日，敌人第三纵队占领了东荆河以南的要点峰口和府场等地。红七师仓忙向府场和预备堤之敌进攻。由于敌人已经作好工事，进攻失利。同时，敌人的第四纵队先头部队也进到了西面的渔洋镇。夏曦又令该师与警卫师主力占领新沟嘴、杨林关的既设阵地，抗击敌人，以掩护翟家湾一带的分局和省委等后方机关。

红八、红九师穿过川军的封锁线进至万里镇、么口地区，威胁川军后方，致使进到周家矶、浩子口一带的川军不敢继续东进。徐源泉为保障侧后安全，乃改变原定计划，调第四纵队主力从莲花寺附近西渡东荆河进入了原划归川军作战地带内的直路河、老新口之线。八月三十日，红七师一个团夜袭老新口之敌，但没有成功。

敌第三、第四两纵队造成了对新沟嘴、杨林关的包围形势后，三十一日晨，即以第四纵队两个旅由西向东进攻新沟嘴，以第三纵队之第一四四旅由东向西进攻杨林关。红七师主力和警卫师主力在新沟嘴与敌激战，敌人在猛烈火力掩护下突破红军阵地，红七师因伤亡过重不得不撤退，第二十一团在杨林关撤退不及被敌合围，大部牺牲，少数分散突围。红七师主力退到周老嘴后，仍奉命协同警卫师主力作固守“决战”。部队新败，士气不高，当日下午再次被强大敌人击败，在退往分盐的途中，被敌骑兵追击，又散失了很多。红七师在三十一日这一天的苦战中，共损失了一个多团的兵力，师政委鲁易、三个团长和一个团政委英勇牺牲。这是红七师在单纯防御作战中受到的最严重的损失。警卫师也损失很大。

在夏曦单纯防御、固守决战的原则指导下，留在洪湖中心区的部队第一仗就碰了钉子，但是他丝毫不觉悟，尔后便完全陷入了应付主义。九月二日，将警卫师主力和军委警卫营大部在柳关并入红七师，重新编成三个团，仍令该师在福田寺、太平桥、柳关，沔阳警卫营在小沙口、翟家湾等处分兵把口。九月三日，敌第三、第四纵队四个多旅分三路进攻，小沙口、翟家湾、柳关相继失陷。由新任命的红七师政治部主任、代理师政委朱勉之率领防守柳关的红七师二十团大部损失。以夏曦为首的分局和省委领导人当天跑到了红七师主力那里。

敌人占领小襄河南岸要点后，立即进攻洪湖沿岸地区。整个洪湖中心地区，除了红七师主力所在的福田寺、太平桥和白露湖附近地区，以及朱河周围四五十里地区外，到处都是敌军。苏区后方机关和人民群众因为没有应付这种严重情况的足够准备，在敌人灭绝人性的烧杀、破坏之下，损失惨重，仅伤病员就有二三千人落入敌手，隐藏在洪湖苏区的数千支枪和数十门迫击炮均被敌军搜去，所有医院、兵工厂等全被焚毁、破坏。

怎样确定今后的斗争方针呢？被敌军四面包围着的夏曦，感到在此狭小地区很难立足，于是决定：（一）令在襄北活动的红三军部队开回洪湖中心区域或在襄河边牵制敌人；（二）于最短期间发动游击战争；（三）由他自己带红七师突围到另一县扰乱敌人，留监、沔两县警卫营（都扩编为警卫团）、各区游击队和省委机关在洪湖湖区坚持。

这个决定曾报告苏区中央局。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中央军委和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同志接到这份电报时，当即复电，指出：“敌以重兵围紧鄂西苏区，红三军应立即集结全军力量机动的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它的这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牵制其它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如因顾虑苏区被敌侵入而分一部兵力去堵，不仅兵少堵不住，对于决战方面减少兵力，损失更大。上次将三军分两部行动是不利的。尤其在目前国内战争条件下，红军与敌人作不能消灭他们的持久战，更不利。现在中心区只有四五十里，七师与八、九两师都应迅速设法利用黑夜、小道避免战斗，偷出敌人重围圈外集结一起，选择适当地点，准备相机打击敌人，一面并发展新苏区。中心区内外线应广大发展游击运动战，困扰敌人，而不应照分局计划，八、九师回来，七师到另一县。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我们以及分进合击的最好机会。”这个指示所阐明的思想与夏曦的指导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个重要指示，两个多月以后，即到了十一月间，红三军已经转移到陕南的竹林关时，夏曦才告诉了贺龙和关向应。

夏曦在作出上述三项决定后，因情况紧张，即令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和红七师师长王一鸣带红七师主力先行出发，向西转移，他和省委的一些领导人留在当地处理“改组派罪犯”和安排打游击。九月四日晨，红七师主力行至监利、毛家口、观音寺之间，遭到由监利到陈沱子口、鸡鸣铺的川军一个营阻击，驻习家河之监利保安团也闻讯出动参与战斗。红七师一部被迫折返，一部（约二个营兵力）转到了江陵的张金河。九月七日，敌军第四十一师占领了朱河。夏曦率军委警卫部队、红七师的其余部队和一批地方干部也转到了江陵的张金河。在转移途中，由于车湾及监利之敌出击，又受损失。渡河时有不少人落水，到达江陵地区时，总共只剩下了一个多团兵力，枪不满千支，而且由于将无线电台丢掉，从此就与中央和友邻根据地失去了电讯联系，以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及时向中央报告、请示工作，也得不到中央指示。幸好这时江陵苏区尚属安定，使红军在这里得到了一个体整的机会。到敌后去牵动敌人的红三军主力，八月二十二日夜从浩子口、高家场之间沿小路穿过西荆河到达万里镇，进攻么口未得手，即深入荆门境内。这时，川军以一部兵力固守周家矶、么口、后港、荆门及江陵、沙市，集中八个团追击红军，鄂军第十三师和第四十四师亦配合堵击。红三军为了设法分散川军力量，击其侧背，以达到调动进攻洪湖中心区敌军之目的，在荆门地区活动了十多天，并在黄金殿歼灭了归川军指挥的土匪崔二旦部七百余人，但未能给川军以有力的打击，遂决定以本军四个连和当地地方武装编成荆当远独立团，继续坚持该地区的斗争，主力渡过襄河到鄂军的侧后活动。九月中旬，红三军主力转到京山地区时，襄北的革命力量已经被敌人摧毁殆尽，鄂军主力已经进入了洪湖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其第十二师和第四十四师则占据了襄北的主要城镇，打击鄂军的有利时机已经错过。夏曦采取两个拳头打人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精疲力竭、消耗殆尽，另一个拳头也没能牵动敌军主力。

红七师在江陵地区集结后，根据夏曦的指示，由浩子口、长湖之间的小路穿过敌人的封锁区转到了荆门地区，以后又与在襄北活动的红三军主力会合。

敌人控制洪湖沿岸地区后，便大举进行“清剿”。留在监、沔两县的地方武装和地方干部，因敌情日益严重，不得不分头突围。其中监利警卫团及地方干部共约二千人，在突围战斗中损失了一部，余部由省苏维埃主席崔琪

率领突围至黄歇口一带。沔阳警卫团在突围中损失更大，由千余人减至百余人。该团向西转移途中，先会合了潜江警卫营的一个连，后又与监利警卫团会合于黄歇口附近，随即一起转到了江陵沙岗。此时，先后退到江陵地区的还有荆门警卫营、潜江警卫营、沔阳游击队、省军委警卫部队和江陵地方武装——江陵警卫营与各区游击队。在红七师转到外线之后不久，由湘鄂边退出之湘鄂边独立团及党政机关也于九月中旬到达江陵地区。这些革命武装的会合，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岑河口、资福寺等地的川军增加了，鄂军第四十一、第四十八师和独立三十八旅也陆续向白露湖附近移动，准备进行围攻。看到这种情况，夏曦遂将江陵警卫营、沔阳警卫团、军委警卫部队等编为一个团，与湘鄂边独立团合编为下属两个团的独立师，并令其进攻郝穴和汪家桥等地。但这些战斗只是打了一些消耗战，都没有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十月上旬，各方敌军同时向红军进攻，很快就占领了龙湾等地。夏曦乃率独立师及潜江、荆门两警卫营沿着红七师走过的小路向西北突围，途中在三汉河附近与川军第四师十二旅三十六团遭遇，独立师歼敌先头营并乘胜追至浩子口附近，后因敌援军赶到，被迫退出战斗。在摆脱敌援军追击时，夏曦、王炳南（独立师师长）率领的独立师一团和二团一部（约一个营兵力），与卢冬生（独立师政委）率领的其余部队失去联系。以后王炳南部转到大洪山，在六房嘴与红三军会合，编入了红七师，卢冬生部在丫角庙附近安排了伤员后，组织随军撤退的地方干部和群众一同转往荆当远地区，其中一部分被吸收参加了红军。在独立师突围时，曾有大批群众和地方基层干部扶老携幼跟随红军。他们指望与红军一起行动，以免遭受敌人的蹂躏。但是夏曦对随军行动的群众和地方干部却采取了不负责的“卸包袱”的态度，既不把具备条件者吸收进部队，也不作任何安置，而是设法甩脱，使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很大的损害。独立师走后，其余部队在敌人的进攻下，也相继突围转移。一批地方干部和由沔阳、监利、江陵等县地方武装组成的独立营共七百多人，由崔琪率领转往华容东山。省委书记杨光华将省委警卫分队交给江陵县委书记李家芬，指定李代理省委书记，自己去了中央。其余部队，或分别转往公安、长阳、枝江地区，或留当地坚持斗争，后来均失败。

此时，由宋盘铭、贺炳炎率领的襄北独立团（八月中旬以后由襄北的几支游击队编成）一部到潜江、江陵、监利地区活动，因敌人正在“清乡”，红军一日数战难以立足，遂折返襄北。后大部编入红三军。

至此，洪湖苏区的革命武装除了少量分散的游击队外，均被迫退出了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失败。

第五节湘鄂边、巴兴归、襄枣宜 苏区和洞庭特区的丧失

一九三二年，国民党军在大举进攻洪湖苏区的同时，对湘鄂边、巴兴归、襄枣宜苏区和洞庭特区也频频发起攻势。这些规模较小的革命根据地，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工作严重脱离群众，打击了干部，丧失了战斗力，在洪湖苏区丧失前后，也相继失败了。

但是，这些地区的党、政、军、民，在长期被敌人分割包围和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苏区虽然失败了，但武装力量有的转移了，有的潜伏起来了，革命的火种是永远扑灭不了的。

湘鄂边

一九三二年六月，国民党军长江上游“剿匪”代总指挥王陵基，一面配合徐源泉部“围剿”洪湖苏区，一面派第二十一军第三师七旅十九团团长赵鹤率所部及宣恩、建始、恩施等县团防共三千余人，从恩施等地出发，分两路进犯湘鄂边苏区，次第进占鹤峰之麻水、中营、北佳坪及鹤峰城等地。在敌人进攻前夕，湘鄂边独立团第三营曾袭击官店口，焚烧了敌人的给养，但未能达到阻敌进攻之目的。敌军进攻开始后，独立团为执行湘鄂西省委“不使一寸土地为敌蹂躏”的指示，即由第三营配合第二游击梯队第五大队共四百余人和少数赤卫队进攻水池子，因敌众我寡失利。此后，湘鄂边特委及独立团后方机关转移至桑植境内。

在敌人进攻的严重时刻，六月二十五日，原湘鄂边独立团团长贺炳南等因与特委有矛盾，策动第一游击梯队袭击特委，特委常委、桑植县委书记兼第一游击梯队政委杨英及特委干部十余人被害，桑植县苏维埃及游击队武器被缴，仅特委书记周小康率少数人脱险。这一事件不仅使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而且使特委不能继续依托桑鹤边界之四门岩、五道水一带山区坚持游击活动，给湘鄂边的革命斗争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局面。

七月十七日，独立团全部及第五游击大队共千余人袭击天星寨之敌。在向敌军接近时，因一营过早暴露，全团未能同时展开投入战斗，激战六小时，该团主动撤离，到燕子坪整顿。之后，独立团在留驾司附近的龙潭阻击向燕子坪进犯的敌人，再次失利。后又转到石灰窑击敌，虽歼敌两个连，但未牵动敌军主力，乃被迫转至堰垭一带。八月初，独立团掩护特委、联县政府等地方机关，转移至五峰、长阳一带活动。在五峰境内，独立团与罗效之部、赵鹤部先后作战多次，在百年关击溃川军赵鹤部一个营并攻占了渔洋关，但始终未能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扭转被动局面。同时，由于频繁战斗，部队实力日渐减弱，加之敌人烧杀抢掠，以及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不良后果，对继续坚持斗争都极为不利。因此，九月六日，湘鄂边特委在五峰湾潭白果湾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放弃湘鄂边。九月中旬，在特委领导下，独立团与特委、联县政府等地方机关共千余人，经石门之大小金洲，松滋西斋、磨盘洲、公安马家嘴等地，北渡长江，退向洪湖苏区，在江陵沙岗附近与夏

见 1932 年 5 月 2 日《湘鄂西省委关于湘鄂边特区及独立团工作决议》。

曦率领的中央分局机关和洪湖苏区的部分地方武装会合。

独立团转移后，留在湘鄂边苏区内坚持斗争的地方干部和党员，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先后失败。只有贺英等率领的小股有组织的游击队，仍在坚持斗争。

游击第一梯队袭击湘鄂边特委后据守在云头山，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被敌朱际凯团攻破，贺炳南被俘后自杀，梯队领导人贺佩卿、王湘泉突围后，收集少许人进入深山隐蔽。一九三三年一月，贺佩卿、王湘泉被贺龙召回，不久被处决。

巴兴归

一九三二年四月，以鄂西北独立二团三百余人与红二十五师、鄂西北苏区地方武装合编的红三军第四路游击队共千余人，在柳克明率领下，由兴山新六区东下，进入洪湖苏区。留在巴兴归苏区的县委书记胡荣本及宋文明、高云景等，集中留下的鄂西北独立二团人员及各区、乡武装共一百二十余人，枪二十余支，编成两个游击队，坚持斗争。后因环境更为险恶，乃决定向洪湖苏区转移。为迷惑敌人，将部队改名为川东游击队。从沿渡溪出发，途中，在茅狐岭与敌兴山保卫团及在叱溪与敌白带会两次作战，虽将敌击退，但游击队伤亡与被打散者亦很多，胡荣本、高云景均负伤，部队只剩五六十人。后敌兴山保卫团又发动进攻，川东游击队被迫折转，于八月回到了小龙。这时，根据地已全部被敌人占领，游击队弹尽粮绝，难以为继，胡荣本、宋文明等同志遂决定转至甘坪，再图发展。转移途中又遭敌人袭击，部队冲散，高云景牺牲。八月二十七日，胡荣本、宋文明被叛徒出卖，先后遇害，巴兴归地区的革命斗争遭到失败。

襄枣宜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中共中央派沈宗源到鄂豫边区推行四中全会路线。一九三二年一月，鄂豫边特委由南阳移至襄枣宜苏区，并在此召开中共鄂豫边地区代表大会。一月二十五日大会开幕。当日，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师三一团进占耿集，会议所在地受到威胁。沈宗源当即解散了大会，并集中苏区内的红军和七百余名赤卫队员进攻耿集之敌。由于未从当时当地红军的情况出发，死打硬拼，结果两仗均失利，损失很大。沈宗源发生动摇，遂召集特委会议决定“总退却”，拟“向北游击，造成唐桐泌新赤区和与鄂豫皖直接取得联系”。这一决定作出后数日，苏区周围敌军并无大的动作，进至耿集的敌人且向东北之熊集、梁集开去。据此，二月二日特委又开会，决定停止“总退却”，并将鄂豫边特委改组为鄂豫边临时省委，沈宗源为书记。二月二十一日，敌第五十一师和独立三十四旅各一部进攻苏区，红二十六师在杏山作战失利。二十二日，鄂豫边临时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临时省委主要力量移至白区。会后，沈宗源把大批干部分配去白区工作，他本人不辞而别，转回中央。留下来的干部领导人民群众继续坚持斗争，先后歼灭敌第五十一师两个连、独立三十四旅一个连，攻占了敌人后方补给点——东津湾，

见 1932 年 3 月 17 日《鄂豫边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开辟了唐河、枣阳边境的马武山和钟祥以北的新区。为

了统一作战指挥，红二十六师改编为第一路游击军，五个地方游击队合编为第三路游击军，共有枪八百余支，一千三百余人，另有几支小游击队共三百余人，枪二百余支，统属边区总指挥部。四月，成立了山南、山北赤区游击队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山南（枣阳三区、襄阳二区、宜东、钟北）、山北（襄阳一、三、四区及枣阳其他各区）县、区游击队和赤卫军坚持斗争。经过这些努力，局面得以初步稳定。但由于苏区内部的重要市镇，如枣西的璩家湾、黄龙裆，钟北的丰乐河、长寿店等均被敌人占领，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四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均到了襄枣宜苏区，带来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鄂北（襄枣宜钟）苏区及九军二十六师工作的决议》，并改组了临时省委，王君恩为书记。四月八日，临时省委召开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彻底执行国际路线”，“检阅平分土地，向隐藏富农作斗争”以及“加紧肃反工作”等问题。会议要求第一、第三路游击军“争取大小的、继续不断的胜利”，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在讨论发展方向时，长期在当地工作的领导干部主张向毗连苏区的大洪山地区发展，以便向南可与钟祥北部新区连成一片，向北可以作为坚持老区斗争的依托。但尉士均认为这是丢弃原有苏区向山区退却，指责主张向大洪山区发展的同志是“邓中夏式的退却逃跑主义者”，坚持中央分局决议所指出的“二十六师的任务，目前是巩固苏区打击敌人，而不是向外发展”，“绝对不容许脱离根据地和分散游击”的错误方针。

为了贯彻“左”倾路线的方针政策，尉士均还坚决主张“改造党、改造苏维埃、改造红军”。他对贯彻第三次“左”倾路线不力的或非劳动人民出身的党、政、军各级主要干部，都看作是阶级异己分子，加以撤换。他指挥红军去硬攻强固白点峪山、王家集等地，白点未克，反使红军遭到很大伤亡。但尉士均不仅未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吹嘘这是所谓“进步”，是“战斗力提高”，是执行不断进攻路线的“胜利”。事实上，这时第一、第三路游击军每人只有三四发子弹，与强攻硬打的战法根本不相适应，先后作战二三十次均无所获，部队伤亡达五六百人之多。

五月上旬，敌第五十一师及独立三十四旅的部队共六个团另二个营围攻苏区。第五十一师从襄阳、宜城一线向东，独立三十四旅由枣阳之土桥铺、新集一线向西，两面夹击。这时苏区已缩小到只有方圆四五十里的一块，而且其中还夹有几个白点。尉士均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一方面命令红军分兵把口，作消极防御，不准向外游击一步；另一方面抓紧进行“肃反”，对怀疑这些政策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六月上旬，苏区大部地区已为敌人严密控制，革命力量受到了空前削弱。第一、第三路游击军在消极防御中消耗到仅存一百七八十人枪，被迫撤到马武山一带游击。省委也丧失了根据地坚持斗争的信心，一些同志逃到白区，尉士均返回洪湖苏区，在第一次“肃反”中被杀。

六月中旬，第一、第三路游击军返回原苏区，出敌不意地消灭了几个团防局，又收拢了一些敌人围攻苏区时被打散的人员，恢复到三百余人。六月

在许多文件中，都称红九军指挥部，但实际上红九军的指挥机构从未成立起来。后来的总指挥部，实际上是鄂豫边省军委和具体负责军事指挥的一些同志的统称。

十五日，由于警戒疏忽，在枣阳朝阳寺被敌第五十一师一五一旅包围，原红二十六师政委吴首青、政治部主任马三光等牺牲，部队损失很大，剩下的一部撤到了钟祥，与在当地活动的一支游击队会合，编为鄂北游击队（荆钟游击队）。至十月，与红三军一部及贺炳炎、宋盘铭领导的襄北独立团一个营合编为新的襄北独立团，在钟祥、随县、京山交界地区坚持斗争。该团一九三二年底在反敌“围剿”中受到重大损失，全团只剩下五百余人。接着，一九三三年二月，又受重创，锐减至一百六七十人，游击于京山、天门、应城等县境内。四月，该团转往洪湖地区，曾克周老嘴、熊口，消灭了两个保安中队和独立三十八旅一部，扩大到四百多人。下旬，该团拟转往江南会合红三军，在监利车湾附近被敌第三十四师、第十九师、独立三十八旅各一部和当地保安团队包围，被迫退入湖中，在敌炮艇轰击下，大部牺牲。团长陈天和率十五人突围至调弦口，又遭敌第三十四师部队袭击，全部遇难。

洞庭特区

当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洪湖地区之时，洞庭特区游击大队曾多次打退了敌第十九师与团防的进攻，胜利地坚持着洞庭湖地区的武装斗争。一九三二年六月，游击大队乘湖区水涨积极活动，岳阳受到威胁。湘阴、沅江、岳阳三处敌军进湖“清剿”，主力指向特区政府所在地五港洲一带。游击大队迅速转至苍梧台，隐蔽在墨山铺西南杨家当附近丛林中，准备沿墨山、大荆湖继续向明镜湖、碧云寺转移。这时，敌人从水陆两面夹击杨家当，游击大队英勇还击，歼敌数十名，夺船十二支，转往墨山。游击大队长李华在战斗中牺牲，胡友光继任大队长兼政委。就在反“清剿”斗争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从江北传来命令，中央分局指出特区一些领导干部和党员是“改组派”，要求区委立即逮捕处决。一些被诬陷的同志为表示对党的忠诚，在征得区委同意后，冲入敌阵与敌人英勇搏斗，壮烈牺牲。退出洪湖地区的湘鄂西省苏维埃主席崔琪，率独立营由石首来家铺附近渡江，击退敌人阻击，经华容东山，于十月下旬转移到了洞庭特区，特区武装增至近千人，枪六百余支。崔琪抵洞庭特区后，在华容磨盘洲召开特区区委会议，决定大力加强组织，扩大武装，发展洞庭湖区的斗争。会议刚结束，敌第十九师即由华容等地分三路来攻，激战终日，部队向东洞庭区转移，途中崔琪不幸牺牲。区委收集部队数百人，由熊同寿、胡友光领导，继续在五港洲、杨林所一带坚持斗争。十一月，敌军一千五百余人“清湖”，围攻杨林所一带。游击大队经顽强战斗将敌击退，本身亦受重大损失，伤亡百余人，大队长熊同寿牺牲。此后，特区游击大队在与敌第十九师及地方反动武装作战中，又有两次失利，区委负责人吴文喧、孟庆友等同志先后牺牲。在一九三三年三月的一次战斗中，区委会和游击队损失极大，胡友光负伤被俘。战斗结束后，少数突围的同志重整旗鼓，坚持斗争，至四、五月间，又发展为有长短枪三十余支的一支队伍。后于八月中旬，在南县、益阳、沅江团防的大举“清湖”中，最后失败。

第六节红三军转往湘鄂边

红三军主力由洪湖中心区转至襄北后，国民党军立即调动第五十一师一五一旅及第四十四师两个旅跟踪追击，第四十四师另一个旅和独立三十四旅在京山、钟祥之间和平林店、历山之间，协同安陆、应城、京山、钟祥守敌对红三军进行堵击。自一九三二年九月开始，红三军在旧口、应城、安陆、随县、枣阳之间盘旋打转，时分时聚，忽东忽西，与追击堵截之敌四个多旅周旋，敌军数次围攻、夹击都未得逞。这时，红三军因为没有根据地，在伤员安置、物资供应和人员补充各方面都发生了困难，战斗力也更为减弱。即令如此，指战员艰苦奋斗，仍在客店坡、五谷台、佛儿岭、双洞口、观音堂等战斗中给予敌人以相当打击，而且完整地保存了骨干力量。

十月，洪湖苏区全部丧失的消息传到了红三军。红三军与洪湖苏区是血肉相连的，为了战胜敌人保卫苏区，红军和苏区的人民同生死，共患难，浴血奋战，坚持斗争达五年之久。此时，广大指战员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无不满怀悲愤，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即打回洪湖苏区去。而夏曦不仅无视广大指战员的这种革命激情，而且竟于与红三军会合后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第二次“肃反”。由于他已经失去了在洪湖苏区坚持斗争的信心，却又怕承担抛弃苏区的责任，因而既不敢回，又不敢走，只是带领红三军在大洪山一带往返游荡。

十月中旬，正值红三军将敌第五十一师一个旅和第四十四师主力拖到钟祥东北地区的时候，红四方面军从广水以南越京汉路开始向西转移。由于红三军不知红四方面军的到来，虽然两路红军曾一度都活动于大洪山区，但没有取得联系。

到了十月下旬，红三军发现红四方面军已从大洪山区西去时，中央分局才在随县王店开会研究部队的行动方向。会上，个别同志主张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多数同志则主张恢复洪湖苏区，并重新组成湘鄂边特委，带一部分部队去恢复湘鄂边苏区。但夏曦却以红四方面军可以离开鄂豫皖苏区，我们也可以离开洪湖苏区为理由，决定红三军全部转往湘鄂边。这时，红三军的战斗力已大大减弱，襄河两岸还有敌人的重兵把守，大部队要由襄、樊以南西渡汉水直插湘鄂边很困难，因而不得不绕道经豫西南、陕南去湘鄂边。

自从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以来，红三军夜以继日地行军作战，体力、弹药消耗很大，人员不断减少，加之继续“肃反”，部队的组织极不健全，政治机关的干部几乎没有了。以这样的疲惫之师，在反动统治严密的白色地区长途远征，其形势之险恶、任务之艰巨是可以想见的。

豫西南地区反动势力是相当强大的，民团、土匪、大刀会、红枪会极多，大部分村庄筑有土寨，反动武装胁迫群众，盘踞村寨，与红军为敌。

十一月初，在敌军攻袭甚急的情况下，红三军从随县以北越过桐柏山进入河南。敌人以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不断组织追、拦、堵、截，特别是反动地方武装频繁进行袭扰。红军行军时，他们从四面八方前来纠缠，红军只得交替掩护，边打边走。红军宿营时，他们紧闭寨门，不让红军进村，为避免伤亡，又不便强攻，只好露宿野外，睡不好觉，吃不上饭。当时正值严冬时节，部队缺少御寒被服，更给生活、作战增加了困难，体力不断下降，伤病人员日益增多。十一月九日，红三军遭敌第十五路军马鸿逵部第三十五师一三旅和泌阳、方城、南阳等县反动武装连续袭击，且战且走，夺路疾行，十日，

在苗店、郝砦等地经过几次激战才打退了追击之敌。由于敌情制约和地理情况不熟，在打退追击之敌后，红三军接着强行军百余里，由南阳以北之石桥镇涉过白河，经南河店进入伏牛山区。苗店之战，红三军损失很大，掉队、伤亡人员很多，红八师师长覃甦壮烈牺牲。

进入伏牛山区以后，红三军虽然每日行程不下百里，仍不能摆脱敌人。为转变被动局面，十一月下旬，红三军在临进西峡口时，以一个团于觉村附近设伏，打退了敌第十五路军马英才旅的追击。接着，又在陕南的武关与敌第六十四师刘镇华部一个团遭遇，经激烈战斗，将其击溃并全歼其一个营，以后情况才告缓和。

武关战斗之后，红三军从俘虏口供中得知，红四方面军正向西安前进，敌人麇集关中平原，竹林关、漫川关一带敌人兵力比较空虚。红三军遂从武关附近折而向南，穿过竹林关，经照川街、漫川关，在洵阳、安康之间渡过汉水，经神河街、牛头店翻大巴山进入四川，沿鄂川边境继续南下，在大昌镇歼敌川军一个营和保安团一部，接着越过巫山，抢渡长江，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攻克巴东县城，十二月底到达了鹤峰县境。

在这次长途转战的过程中，夏曦继续进行第二次错误的肃反。在这次“肃反”中，湘鄂西省军委委员、军委参谋长唐赤英，红七师师长王一鸣及许多负责同志惨遭诬陷杀害。坚持“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认为，“在过去立三路线的时候……洪湖军校就是改组派及第三党活动的大本营”。第一次“肃反”中虽已粉碎了“改组派”的组织体系，但是从军校毕业学员中补充的一些军事、政治负责人是“改组派”分子，他们又把“改组派”组织恢复了起来，“破坏阶级路线以及涣散军事组织”。在这次“肃反”中，又有许多曾在军校学习、工作过的同志无辜被捕、被杀。

两个月内，红三军行程约七千里，途中只休息了两天半时间，粉碎了敌人的追堵拦截，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完成了远征任务。部队减员达三分之一以上，由一万四五千减至九千人左右；弹药消耗殆尽，每条步枪所余子弹平均不到三发；干部的损失更为严重，伤亡病故，加上“肃反”捕杀，原来富有经验的军政干部所剩无几，党政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状态。

在红三军进行远征的同时，卢冬生率领的独立师一部，于十月三十日在远安东南之庙前与荆当远独立团会合。会合后，独立团编入了独立师，使独立师充实到千余人。该师活动于远安、南漳地区，协助当地党组织建立了南（漳）（远）安县苏维埃政府和南安游击队。十一月中旬，独立师到达当阳境内，准备经荆门之大瓦山返回洪湖地区。十一月二十日，在团林铺、沈家集一带与敌第四十八师一四四旅遭遇，作战失利，遂改变返回洪湖的计划，退至兴山、远安和宜昌交界地区。十二月间，在水田湾打退了川军和当地保安团的三路围攻。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克兴山县城，得知红三军已抵湘鄂边，乃决定前往会合。二十七日，从秭归以东的黑岩子南渡长江，奔往鹤峰。二月初，与红三军会师于走马坪。独立师走后，留在南漳、远安地区的南安游击队，不断与当地保安团进行战斗，但因势单力薄，三月间在强敌围攻下失败。四月，敌军在远安、当阳一带大举“清乡”，苏区全部丧失。

见湘鄂西省委 1932 年 6 月 19H《关于同湘鄂西反革命团体斗争和纠正肃反中错误的决议》。

见 1934 年 9 月 15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

第七节红三军在湘鄂川边的艰苦斗争

红三军恢复湘鄂边 夏曦解散党、团组织，继续“肃反”

一九三二年末，红三军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湘鄂边。当时因国民党四川军阀发生内讧，川军第二十一军驻湘鄂边的部队已全部西调，其他国民党军队尚未到达，当地只有湘军新三十四师一部和保安团队。十二月三十日，红三军乘虚攻占鹤峰城，全歼当地保安团三百余人，军部进驻毛坝。

一九三三年一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毛坝举行会议，贺龙、关向应按王店会议精神提议恢复湘鄂边苏区，以鹤峰为后方向比较富庶的湘西发展；首先占领桑植，为部队取得一个适于休息整顿的地区。夏曦同意恢复根据地，但借口部队内部不纯，无法整理，反对整顿红三军。他认为湘鄂西苏区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大批“改组派”的破坏；主观上的错误主要是“反机会主义斗争不彻底和对反革命之党的警觉性异常不够”，以及军事“战略上个别的错误”，因而主张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并继续“肃反”。贺、关均不同意夏曦的主张。贺龙提议停止“肃反”或把“肃反”停止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反革命时再议。虽经力争但未被采纳。不久，在红三军占领桑植后，夏曦未经分局集体讨论，就擅自决定“清党”（审查党员，重新登记）。

毛坝会议后，中央分局调红九师政治委员陈培荫任鹤峰县委书记兼游击第一大队政治委员，调红九师警卫营发展地方武装，开展鹤峰地区工作。红三军一月八日向桑植出动，击破朱际凯部的阻击，于十三日占领县城，主力继续推进到瑞塔铺、南岔，一部活动至江垭。

此时，国民党湘西土著军阀新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一面加强戒备，一面致信红三军，愿以让一部分地盘为条件，与红三军达成和平共居协议，企图在红军和国民党主力军之间保存实力。红三军师以上领导干部一致认为，目前部队极度疲惫，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与陈渠珍达成暂时妥协，可以获得一个休整与发展的时机。但夏曦坚决反对，他认为那是“革命不彻底”的办法，并令红三军立即向陈渠珍部进攻。

对转至湘鄂边的红三军，蒋介石急电下属“督飭所部，淬砺精神……迅速依限肃清”。何键派第十九师师长李觉赶赴常德“督战”，令新三十四师和永顺、慈利等地保安团进犯桑植。一月二十日，红七、红九师向进至桃子溪之敌新三、四师三旅进攻，因部队非常疲劳，未经整顿，子弹奇缺，在敌强大火力下败退。二十六日，敌军兵分两路向红军发起攻击，红三军被迫于二十八日撤出桑植，转往鹤峰毛坝。

这次战斗，是红三军回到湘鄂边后的第一次大战，关系重大。打这一仗不仅在策略上不利，而且由于战斗失利暴露了红三军的弱点，助长了敌人的气焰，失掉了本来可以作为依托的桑植。后来夏曦也不得不承认其决策的错误。他在湘鄂西中央分局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过早进攻桑植的错误是由于忽视了自己的弱点（从洪湖失败出来，经过一、二次肃反，部队没有整理）和轻视了敌人的力量。……桑植是占领了……但是被周曼卿打败出来。”可是，他接着又说：“在作战中，七、九两师师长、政治委员是改组派分子，阴谋破坏，特别是段德昌。”又把失败的原因归咎

于“改组派”的“破坏”。

一月下旬，中央分局又在毛坝召开扩大会议。夏曦进一步提出了继续“肃反”，解散党、团组织和“创造新红军”的主张。贺龙、关向应、段德昌、宋盘铭等同志一致反对，特别是在解散党和“创造新红军”的问题上给予了有力的驳斥，夏曦深为不满。

不久，红三军军部由毛坝移到走马坪，独立师也由江北到达。二月上旬，中央分局在此地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发展鹤峰周围苏区和整编红三军的决定。会后红三军缩编为七、九两师，以叶光吉、盛联均分别任红七师师长和政治委员，段德昌、宋盘铭分别任红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独立师一部充实两师，一部编为教导团，卢冬生任团长，关向应兼政治委员。同时，调出许多红军人员去做地方工作；部队加强了纪律教育。此后，红三军的组织纪律性大为提高，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

按照发展鹤峰周围苏区的决定，从四月起，红九师在建始官店口和鹤峰鄠阳关一带，红七师在宣恩和鹤峰、麻水一带，军机关、直属部队在巴东之金果坪一带，发动群众，建立了区乡苏维埃，组织了游击队，分配了土地，并先后击败了恩施、宣恩、建始等地团防和由湖北保安处长范熙绩指挥的湖北保安团的进攻。

五月六日，坚持战斗在桑鹤边界地区的贺英领导的游击队在鹤峰的洞拓湾遭国民党地方武装夜袭，为创建湘鄂边根据地和红军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贺英在抗击敌人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同时被敌人杀害的还有贺龙的二姐等人。贺英的部下徐焕然等整顿这支队伍组成鹤峰县游击第四大队，以后编入了红七师。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到六月间，湘鄂边苏区已拥有鹤峰、宣恩、恩施、建始、巴东、长阳及五峰、鹤峰、石门、慈利、桑植边界地区共约二十多个区、一百多个乡，包括清江以南广大地区，人口约十万。除湘西外，大体已达到一九三一年时的规模。各县普遍建立了游击队，共有七八百人。

鹤峰、建始、巴东、宣恩边界地区，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红军处境十分艰难。部队食粮全靠外出打土豪解决，有时不得不以野菜充饥。为了夺取粮食和在交通不便利的条件下把粮食运回，常常要与反动武装作殊死的斗争。因为物资供应困难，由冬至夏，部队一直是穿着从洪湖带出来的夏服，山区夜间气温降低，许多人只好睡在玉米壳或玉米杆堆垛中。病员日渐增多，药品又十分缺乏，非战斗减员不断增加。由于“肃反”和伤亡、病故等原因，人员一再减少。七月间，教导团解散编入了红七师。

但是“左”倾领导却无视这些严重情况，仍把主要精力用于“肃反”。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开始的第三次“肃反”中，捕杀了湘鄂西省委委员、省军委会主席团委员、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和湘鄂边特委委员、原独立师师长、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两位对创建湘鄂西红军和根据地有杰出贡献的领导干部，以及原湘鄂边独立团中的大批干部。接着，五、六月间又开始了第四次“肃反”，逮捕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九师政委宋盘铭，捕杀了红七师政治委员盛联均和师长叶光吉，以及其他许多干部。这次“肃反”一直延续到一九三四年夏天，使红三军的战斗力又受到了严重削弱。

段德昌，一九〇四年生于湖南南县。一九二四、二五年在南县、华容从事反帝民主运动。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入黄埔军校学习，为“中国青年革命军人联合会”重要成员。后经周恩来介绍入中央政治讲习所，

一九二六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营长、第六军五团党代表。北伐战争中任第八军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攻克武昌的战役。战后任第三十五军一师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受中共中央派遣赴沙市一带发动秋收起义，十一月任公安县委书记。此后便同周逸群、贺龙一起开创湘鄂西根据地，建立红军。在第二、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他对“左”倾路线，特别是错误的军事方针，进行了有力的抵制和批评。他是一九二八年后湘鄂西地区历届党委成员和最负盛名的红军优秀指挥员。他出生入死，历尽危难，没有牺牲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却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陷害。

到达湘鄂边后，夏曦对“肃反”中被捕人员和嫌疑犯除大批杀害外，还采取了留用和开除军籍两种办法。留用人员被组成两种连队，编入各团，一种由原来的部队干部编成，当时人们称为“改组派连”，一种由原地方干部编成，当时人们称为“主席连”。“改组派连”或“主席连”，驻军时担任警戒、背运粮食，作战时担任最艰巨的任务。这些连队的同志为了通过考验取得党的信任，英勇奋战，任劳任怨，表现了最强的战斗力。那些被开除军籍的人，多是打过土豪、分过田地的贫苦农民，对部队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家乡又为国民党统治，离开部队就无处存身。尽管他们苦苦哀求，但最后还是被赶走。

事态的发展并未到此为止。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金果坪开会，夏曦不顾许多负责同志的坚决反对，悍然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的决定。关于采取这一措施的理由，夏曦说：党和苏维埃的干部十分之九都是“改组派”，党的活动已为“改组派”所利用，第一次进行的清党，实际是由“反革命分子”经手恢复了“改组派”组织，因此，“改造党已不能依靠旧的干部”，必须解散党的组织。与此同时，他还在群众中公开宣布省苏维埃是“反革命”分子把持的团体和“过去省苏维埃政府之罪恶”，决定“重新组织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来领导湘鄂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宣布过去省苏维埃政府和县苏维埃政府及其发布的命令完全无效”。

按金果坪会议决定，除了由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人组成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外，湘鄂西地区地方和军队中的党、团组织均被解散，军队中的政治机关实际上也被取消。从此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红三军没有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大大削弱了党的领导、政治工作和思想教育，扼杀了部队中的民主空气，严重打击了战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损害了部队的革命热情和作战能力，削弱了地方工作和对敌斗争。

对于夏曦主持的湘鄂西地区的错误肃反，在一九三二年第一次大规模进行的时候，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的中共中央曾经给予肯定，但到了一九三三年夏天，甚至中央也感到是过头了。七月二十三日，中央根据洪湖苏区丧失之后得到的情况和湘鄂西中央分局交通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初送到的报告，向中央分局发出了一封指示信，其中对“肃反”和由此所导致的其他重大错误作了严肃的批评。中共中央不同意中央分局“以为‘湘鄂西苏区的失败’是因为‘党、苏维埃和红军的大多数干部是改组派，’”。中央认为“这种见解是不正确的，夸大的。事实上改组派只是少数”。由于“过多估计敌

见 1934 年 8 月 4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及 1934 年 9 月 15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

见 1933 年 2 月 6 日《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

人的力量，首先把苏区内反革命派看作是‘了不起’的力量，结果在肃反中犯了许多错误，有许多地方党部因肃反而放弃了日常党的工作，放弃了反对，围剿，的群众工作”，继而“由于不相信群众，把党和团完全解散，重新整理……要宣布省苏维埃政府的罪恶……所有这些，都是不可容忍的现象，如不坚决纠正和克服这些现象，那么，对于苏区的巩固与发展有莫大的威胁”。遗憾的是，这封信未能送到湘鄂边。

烧巴岩会议恢复湘鄂边苏区的斗争失败

在红三军恢复湘鄂边苏区期间，蒋介石任命徐源泉为湘鄂边“剿匪”总司令。一九三三年六月初，徐源泉组织湖北保安团指挥官张刚率领的三个保安团和新三旅、第四十八师一四二旅、独立三十八旅、石（门）澧（县）保安团、慈利保安团，以及新三十四师教导旅、第三旅等对红军围攻。当时红三军正忙于“肃反”和解决吃饭问题，对于敌人的进攻事先并不知道，更无防备。六月九日晨，红三军一部于背运粮食时，在宣恩长滩河突然与敌张刚部遭遇。红军当即发起进攻，战至下午，将敌击退，消灭了敌先头部队一部，无意中推迟了敌人的行动。至七月中旬，敌军集中不下十四个团的兵力开始对红三军进行“围剿”：湖北省三个保安团和新三旅从西面，独立三十八旅、第一四二旅从东面，新三十四师一部和湖南省几个县保安团从南面，分数路进犯，至七月底，相继占领了宣恩之洗马坪，鹤峰县城和麻水、鄂阳关，巴东之金果坪等地。红三军未能打破敌人的进攻，转至宣恩、恩施、鹤峰交界地区。

在敌人进犯期间，中央分局于七月二十四日，在宣恩的烧巴岩召开会议，研究斗争方针。会议决定：“开辟新苏区，赤化宣恩全县，组织来凤、龙山、咸丰、利川一带农民游击战争”；巩固现有苏区，“领导现在苏区的群众，广泛展开游击战争，号召群众参加武装斗争”。

对于开辟新苏区的方法和政策，贺龙、关向应主张：首先建立若干工作基点，然后由点到面，有步骤地展开工作，发动群众；对地主豪绅按其罪恶大小、财产多少，对反动团防按其反动程度，区别对待，对“神兵”武装则尽力进行争取、瓦解，以免在新区树敌过多，给工作造成更多的困难。夏曦又批评这是“革命不彻底”的方法。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夏曦才不得不放弃他的错误主张。

七月底，贺龙、关向应率军部及汤福林（段德昌被捕后继任红九师师长）指挥的红九师向西行动开辟新区；夏曦带领卢冬生（叶光吉被捕后继任红七师师长）指挥的红七师在鹤峰苏区坚持斗争。

军部及红九师到龙山、来凤、咸丰、利川、宣恩境内后，打击团防和土豪劣绅，扩大红军，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利川、咸丰、宣恩交界地区的忠路、小河、活龙坪一带建立了工作基点，把黑洞一带的“神兵”争取过来编成了特科大队。

开辟新苏区的工作正在进行，敌人又围拢来了。十月，敌新三旅和张刚所部保安团联合向红九师进攻。军部及红九师在湖北、四川、湖南边境往返流动，寻机作战，多次战斗都未打好，十二月上旬转至鹤峰之石灰窑。夏曦

见 1933 年 7 月 24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巩固发展湘鄂这新苏区，争取革命胜利的任务的决议》。

率领的红七师，这个时期也进行了频繁的战斗。先在新塘、威风台两次进攻敌军失利，后转至慈利县境，在五里坪、铁炉坪击溃敌朱际凯团，歼其一个营。八月中旬，奔袭五峰敌独立三十八旅留守处，得手后经渔洋关袭入松滋之磨盘洲，摧毁松滋县政府，俘敌县长，缴获了一批物资。八月下旬，由松滋返回鹤峰途中盲目强攻西斋，守敌第三十四师一二旅姜宏模部一个团向红七师反击，数小时后，该旅另一个团也从斯家场赶来增援，红军伤亡三百余人，经过苦战退出战斗。八月下旬，在澧县大堰埡、王家厂、石门太平街等地又连遭澧县、石门保安团和鄂军的攻击和截击，直到迟至鹤峰的南北墩时才摆脱了敌人。九月中旬，敌第四十八师一四二旅和独立三十八旅分布在苏区境内之官店口、红土溪、麻水、鹤峰城以西一带“清乡”。九月十六日，红七师在鹤峰太平镇附近与敌独立三十八旅遭遇，将敌击退。以后该师即在鹤峰苏区周围“傍着苏区活动”，至十二月上旬与红九师会合。此时，红三军已减至三千余人。夏曦带领红七师单独行动的这一时期，没有执行烧巴岩会议的决定，抛弃了“巩固苏区”的任务，红七师的行动着重于外线远途奔袭，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没有与保卫根据地斗争结合起来，“没有组织秘密组织与游击战争”，而且在东下松滋时还将苏区大部分游击队及地方干部编入了红七师，回来以后又将鹤峰游击大队也编入了红七师。按夏曦的说法，这样做的原因是，“觉得没有可靠的干部，怕游击队不能巩固，枪支武装了反动团防”。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苏区群众在对敌斗争中失去了依靠和领导。还由于红七、红九两师分开活动分散了力量，以致发展和巩固根据地的计划都未能实现。

在徐源泉指挥敌军进攻湘鄂边根据地同时，蒋介石还阴谋对红三军进行了一次诱降活动。一面制造谣言，在报纸上刊登贺龙“接受”招降的假消息，挑拨红三军与其他红军部队的关系；一面派人到红三军诱降。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人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对此事作了如下记述：“去年十二月蒋介石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作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在龙山县茨岩塘）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蒋介石错误估计了贺龙的政治坚定性，企图利用红三军的困难处境消灭这支红色武装的阴谋遭到了破产。

红三军游动在湘鄂川边界

红三军两个师会合以后数日，进至咸丰大村。中央分局于十二月十九日在大村举行会议，决定“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放弃“恢复湘鄂边”的口号。当时与湖北、湖南、贵州联界的四川西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配置有川军第二十一军刘湘部独立第二旅（驻西阳、秀山，旅长田冠五）、边防“剿匪”司令周化成部（驻黔江）、第五师十三旅一部（驻彭水，旅长达凤岗）。第五师十三旅其余部队在邻近的涪陵。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二

见 1934 年 9 月 15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

日，红三军突袭黔江，先击溃了大路坝、中坝和城郊的守敌，接着于黄昏攻占了县城，歼敌一个团大部，周化成率残部约二百人逃窜。但同以往一样，红三军全部遣散了俘虏，因而没有得到人员的补充。战后红三军在黔江休息一周。这期间因为夏曦企图“于巩固的军事占领”以后再行开辟新区工作，所以没有发动创造新苏区的斗争。后来，敌第二十一军十三旅、独立第二旅及团防反扑，第二十一军一师一部进至龚滩，十二月二十九日，红军主动退出黔江，转回咸丰、利川境内游击，在咸丰之活龙坪附近安置了伤员，并留军部便衣队长刘汉清、副官花顺桃等负责掩护。后来，刘汉清等以伤愈人员为骨干在这一带组成了一支游击队，活动于咸丰、利川、石柱、黔江地区，打击团防、土豪，扩大部队。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日，驻利川之敌新三旅一个团大部出动到忠路，企图进攻红军，县城一时空虚，红三军乘机袭占了利川，俘敌百余，缴枪百余支。事后，驻石柱和云阳的川军两个团进至鄂川边界布防，第二十一军十三旅两个团在湖北保安团、新三旅配合下发动进攻。红三军在利川、咸丰、宣恩、万县边界地区与敌周旋，一月十五日，在宣恩之倒筒塘进攻湖北保安团未得手，后转往湖南龙山境内。此时，因陈渠珍与贵州军阀王家烈发生冲突，陈部主力调往黔境，湘西兵力减弱，红军得以在龙山境内休整了半个月。后来，湖南敌人集中永顺、桑植、大庸等地部队向红三军进攻，红军在龙山、永顺、桑植、大庸、慈利五县境内游击，由于部队弹药极少，很难进行有效的战斗，打了几仗，也未能打开局面。此后，中央分局决定回到西、秀，“创造鄂川边成为一游击中心区域”。四月初，红三军转往利川、咸丰一带，四月七日，在利川十字路会合了刘汉清组织的游击队。这支游击队三月份曾在利川之寒婆岭打垮敌新三旅一个营，俘敌百余人，获得了补充，壮大了力量，遂改编为鄂川边独立团。

从一九三四年一月到四月初，红三军的行动，如后来夏曦所说的那样，是“无目的无前途的流浪”，“党自己的工作陷于麻痹和消极状态”。因此，创造新苏区的计划又未能实现。关于这一阶段的行动，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检讨说：“大村中央分局会议，虽然决定了企图占领西、秀、黔、彭作为新的根据地（的）策略路线……但是当时仅只有一个军事上的计划，并没有整个的党的、红军的、群众的工作布置，并没有实际的转变，并且在黔江退出以后，党对于巩固红军和发展的企图，就没有明确方向了……”

红三军自一九三三年初转移到湘鄂边以后，进行了一年多艰苦复杂的斗争，但由于错误路线的领导，部队由九千余人锐减到三千来人，真是濒于覆灭的边缘。如果不是全体指战员对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的胜利抱有坚定的信念，早就坚持不下去了。

即使是在这样严重的局势下，夏曦仍然念念不忘“肃反”。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六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制定了一个《关于肃反总结与清党的决议的报告大纲》，对“肃反”和清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目前肃反方针”作了说明。三月十七日，以湘鄂西中央分局成员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人名义向中央送去了一个基本上属于“肃反”问题的报告。这两个文件产生于湘鄂

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属割据黔东，投靠湘西军阀陈渠珍。陈渠珍派兵入黔支援，与王家烈的部队战于铜仁。
见 1934 年 8 月 4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

西地区的大规模“肃反”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的时候，其内容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领导上在这个方面的思想。

一、“湘鄂西‘党苏干部十分之九是改组派’”。“改组派占据了党、苏维埃、青年团、工会以及红军的政治机关”。

“反革命的阶级成分，最大多数是地主富农，（他们）隐蔽在苏维埃运动内部来使苏维埃运动失败”。“反革命（在湘鄂西）的大联合——改组派，造成了清一色的系统”。湘鄂西的反革命组织有改组派、第三党、托派、陈独秀派、秋白主义者、罗章龙派和AB团。他们分别以周逸群、万涛、胡慎已、唐赤英、刘鸣先、潘家辰、侯蔚文、李剑如、张昆弟等为首领。而这些反革命组织又都加入了“改组派”，并用“新共产党”名义活动。其“主要来源为改组派、第三党、国民党、托派四部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留苏回国来此之最大部分暴露出参加改组派、托派，尤以步兵学校学生几无例外”。

二、“改组派的主要阴谋是，破坏共产党的组织，企图把共产党组织腐化为国民党”；“变苏维埃政权为国民党官僚政权”；“把红军变成国民党军阀式的军队”；“私通敌军，玩弄军事失败的阴谋”；“使红军、苏维埃运动脱离根据地，丧失根据地”。

三、“改组派”同共产党的斗争“表示出了两个政治路线的对立”。“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常常成为反革命的有力助手。”

四、“湘鄂西苏区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共产党的地方组织”，过去的苏维埃政府为“改组派”所把持，“红三军在政治上还没有完全巩固”。因此，“在旧的基础之上改造队伍是无用的”，必须解散湘鄂西及红军中的党和青年团组织，举行清党、清团，重新登记党、团员，“重新建设布尔什维克党”；宣布过去的苏维埃政府不是真正的苏维埃政权，要建立以夏曦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为重新建设苏维埃政权，实现苏维埃的一切法令而斗争；在红三军中要为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斗争，“建立新的政治系统和共产党的组织”。

五、“中央分局与改组派坚持斗争的路线是正确的”。过去发生过的错误，“主要是对于反革命的警觉性的不够，群众教育工作的不充分和对于‘左’倾错误没有坚决纠正”。如对“粉碎改组派的上层组织，还表现了个别的迟缓”；“在政治上揭露改组派整个反革命阴谋不够”，“拿刑事的法律的方式代替同反革命派别的思想斗争”，“很少用教育的方法去夺取改组派下层群众”；“滥用刑罚”，“助长了恐怖情绪”；“没有吸收广大群众参加”，“命令代替了自下而上的批评与群众运动”，“甚至干部也不敢发表意见”；“有（以）肃反代替一切反机会主义斗争与（维护）一切军纪风纪的倾向”。

六、“要在坚决纠正这些错误之中加紧向改组派的进攻”。目前的方针是：“加紧与一切改组派的传统习惯作斗争”；“清洗党员、团员、苏维埃工作人员，清洗红军（纯洁）成分，彻底揭露反革命下层组织”；“用阶级教育的方法，夺取受欺骗被压迫加入改组派之分子”；“吸收广大群众参加……与改组派一切斗争的活动，教育群众，使群众团结在党的路线周围”；“在实际工作中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充分的发展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发动群众的政治的社会的活动，尽量用教育方法纠正错误，并且严格的把普通的错误与反革命的活动分开”。

从上述的“左”倾领导者的思想及其在这个时期的实践可以看到：他依旧认为极“左”的“肃反”路线是正确的，没有认识到由于对暗藏反革命力

量的极端夸大，从而导致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和措施，不但不能真正纠正，而且会继续发展。例如，因为他认为负责清党、清团的领导干部是“改组派”，他们借机恢复了“改组派”组织，所以不仅重新登记的党、团员遭殃，还使“左”倾领导更加感到需要彻底揭露根本不存在的“反革命下层组织”和消灭他认定为“改组派”领导人的干部。宋盘铭在第四次“肃反”之初被捕，红七、九两师分开活动期间，曾被贺、关释放，但在红三军占领黔江以后，夏曦还是将他杀了，并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宋是“最可恨的”。对于红三军退出黔江后“无目的的流浪”期间，部队中增长失望情绪，夏曦归咎于“改组派残余又复活动”，因而又“逮捕了改组派残余十多人”，而且还准备要进行第五次“肃反”。因此，这种错误的肃反若不纠正，是不会为红三军带来重大转机的。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湘鄂西顽强的推行了三年多，其结果是根据地丧失了百分之百，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多，红三军中许多人已经感到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见 1934 年 9 月 15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

第四章

红三军转战鄂川黔边界， 创建黔东苏区

第一节 十字路会议鄂川边 独立团的建立和发展

为了改变困难处境，一九三四年四月中旬，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十字路开会，研究行动方针。鉴于鄂川边独立团工作很有成效，会议重新肯定了大村会议精神，并于四月十四日作出了《关于发展鄂川边区苏维埃运动任务的决议》，决定把鄂川边游击区域扩大到利川、石柱、黔江、咸丰、宣恩几县区域，提出了开展农民运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纲领。即“（1）取消租课，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平均分配给贫雇农、中农和兵士。（2）反抗一切苛捐杂税。（3）没收地主富豪粮食分配给没有饭吃的穷人。（4）取消一切高利贷。（5）增加工人工资。（6）取消保卫团、夺取地主武装，组织赤卫队、游击队和红军。（7）逮捕和杀戮土豪劣绅。（8）优待红军家属和保卫伤病战士。（9）推翻国民党政党（权），组织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10）反抗帝国主义，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在其他政策和策略上，决议规定：一方面要与地主富农的影响作斗争；另一方面对“个别出身地主富农阶级的分子，过去和现在曾经参加过农民斗争，对群众有很好的影响，他们愿意来参加苏维埃运动接受苏维埃政纲，我们亦不应当拒绝与之合作”。一方面要提高农民的觉悟；“另一方面，要顾及农民种种落后守旧的心理，绝不是威力可是强制（解决）的，而是（要）用教育的方法”。“对于他们的迷信神仪，我们不应该提倡，但亦不应采取非难轻蔑的态度”。“只要有农民群众的地方，都应当设法打进去工作……即令这种组织带着守旧的反动的色彩。但是“不应该赞扬他们去扩大这些旧的组织，而应该以革命的农民委员会去代替这些旧的组织”。对于“杂色武装”，“如果这种队伍尚在坚决的与统治阶级的军队对抗，而且能吸引一部分群众……我们亦可以与他们订立临时的军事合作……推动这种队伍的下层群众的革命化”。为了贯彻实行这个决议，中央分局决定组成以冯义友为书记的鄂川边区工作委员会，要求这个委员会把在农民委员会和独立团中建立党支部作为最主要的任务；要善于运用公开与秘密的工作方式，按斗争的发展情况，组织几个中心区的工作等。

这个决议虽然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及第三次“左”倾路线，但在实际工作的具体作法上，无疑是有了一些进步。

作为开展鄂川边界游击战争主要力量的鄂川边独立团，按照十字路会议的决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这个团的基础是红三军安置在活龙坪附近的四十多名伤员组织的游击队。这些伤员在安置地区宣传动员群众，吸收群众参军，打击土豪劣绅，打击小股团防，争取团丁反正，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装备自己，组成了两个游击大队。改编成独立团后，在团长刘汉清、政治委员花顺桃、参谋长陈云武领导下，积极活动，扩大部队，建立秘密政权组织，并且合编了红三军安置在鄂西边界地区的其他伤病员建立起来的小游击队，以及由王怀廷领导的游击大队，不断得到了发展。

王怀廷领导的游击大队，也是由红军伤病员组成的，很快发展到六七十

人。四川“神兵”朱兴武等一百三十余人，受四川军阀武装排挤进入利川小河，见游击队发展迅速，要求参加。后不久有两股土匪武装共二百三十余人也要求加入。王怀廷为尽快扩大革命武装，同意收编他们。但约定，不得进行迷信活动，服从党的领导，遵守红军纪律，一切听从指挥，并派去了做政治领导工作的人员。五月间，由于这些迷信、土匪武装故态复萌，纵兵抢劫和进行迷信活动，王怀廷遂邀独立团将其首领解决，部众编散，王怀廷部同时编为独立团第四大队。七月，独立团扩大到七八百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独立团发展很快，给敌人以一定打击，斗争很有成绩。但因为时间较短，对吸收的各种不同情况的人员，未及进行有力的改造工作，内部存在着不纯、不稳定的因素。七月七日，钻进革命队伍的“神兵”头目王文成杀害了团政委花顺桃，关押了团长刘汉清。参谋长陈云武幸免于难，带队由利川向南游击，又为怀有野心的独立团干部毛子英诬为“改组派”枪杀。毛子英自任团长，将部队带往咸丰中部。七月十六日，在高洞子附近之大水坪与湖北保安第一、第二团遭遇，部队损失一部。三十日，又被追击之敌打散，再次受到损失，剩下二百余人。紧接着，八月一日又受到敌人打击，部队仅余一百多人。半月之内，独立团损失了十分之八。在部队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刘汉清逃出敌手，重新掌握了独立团。不久，毛子英叛变，两次引团防进攻独立团，均为独立团打败，毛子英也被抓获。之后，独立团又在刘汉清领导下，逐步恢复发展起来。

一九三四年秋冬，独立团继续坚持活动在咸丰、利川、黔江、石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围剿”军，与红三军主力开辟黔东苏区相呼应，部队发展至近千人，成为后来组建红二军团五师的基干力量。

第二节红三军创建黔东苏区

十字路会后，红三军计划首先进攻彭水，尔后向西阳、秀山、黔江发展，以实现“以鄂川边为游击中心区域，创造新的根据地”的决策，遂进至酉阳境内，一面稍事休整，一面打击团防、土豪劣绅，侦察敌情。五月八日，红三军冒着大雨，从百里之外奔袭彭水，于次日上午攻入彭水县城，歼敌第二十一军十三旅一个营，俘敌四百余人，缴枪三百余支，士气大振。由于人少枪多，又全部释放了俘虏，乃将所得武器抛入乌江。当红三军正准备攻取酉阳时，夏曦认为“彭水面山背水，易攻难守，敌人打来难以应付”，一心避战，因此又轻率地抛弃了十字路会议的决议，命红三军西渡乌江，进入贵州。五月十四日，红三军到达贵州的后坪县境，旋又进至婺川之干水坝。这一带敌军压力虽然不大，但人烟稀少，经济落后，部队给养极度困难，于是又经德江之泉口司向沿河县城逼近。驻沿河之敌为黔军第三师蒋丕绪部第一旅傅恒中部。傅闻红军压境，即率主力撤走，只留第二团彭镇璞部一部驻守。五月三十一日，红三军与彭团接触于乌江西岸，敌稍作抵抗即退至江东。六月一日，红三军渡江占领沿河县城。敌军弃城绕道经淇滩逃往婺川方向。红三军入黔，贵州军阀、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十分惊恐，急忙致电蒋介石和刘湘求援。六月二日电文说：“黔省各县，素称贫苦，驻军复杂，力嫌单薄。贺匪善以利诱，恐被煽惑。而职部大部兵力均在西防。该匪若稍得逞黔北，后患何堪设想。拟恳请刘湘总司令转飭川省追剿部队，不分畛域，协同会剿，以期合歼。”但是，刘湘在酉阳、秀山一带的部队自保尚且困难，又能派多大兵力到贵州帮助王家烈呢！

黔东地区是一个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地形险要，封建迷信势力很大的山区。红三军到黔东后的主要活动地区，即后来黔东苏区所在的沿河、德江、印江、松桃等县和酉阳、秀山边界一带，处于湘、川、黔接合部武陵山区。武陵山脉的主峰梵净山就在印江东南部。湍急的乌江横贯这个区域的西部，既是区内唯一的重要水路，又是一大天然障碍。这一带耕地、人口均少，居民为汉、苗、侗、土家等民族，人民群众饱受国民党压榨，极为贫苦，革命要求强烈。敌方军事力量也比较薄弱。那时黔东敌军在铜仁、江口有第二师柏辉章部两个团，在沿河、婺川境内有反王家烈的黔军第三师蒋丕绪部第一旅及第四旅（杨畅时部），在印江有反王家烈的黔军第八师廖怀忠部数百人（后移往松桃）。这些军阀部队，人员不充实，战斗力不强，且互有矛盾，名义上属王家烈节制，实则“各守门户，毫无联络”，“大都采取守势，不敢迎击”。这些条件对当时红三军从事开辟根据地的工作和整顿生息是比较有利的。

这时，夏曦由于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败，已由“左”倾冒险转为悲观消沉。红三军的领导同志及广大干部战士，对

错误路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到达黔东前后，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等坚决反对再继续无目的的游荡，主张在红三军中恢复党团组织、政治机关和创建根据地，并重建了军政治部。

六月十九日，红三军进驻沿河之枫香溪。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此召开会议，决定创建黔东苏区。会后立即召集有关领导干部对整顿部队与创建苏区等工作进行了研究和布置。

接着，红三军配备了部分团的政治委员和连指导员，恢复了军党务委员

会和被解散了一年多的党团组织。对这方面的工作，关向应作了巨大的努力，起了重大作用。到九月间，全军已有四百六十三名党、团员，其中大部分是重新登记的，少数是新发展的。部队的其他组织建设工作也有所改善，提拔了一批干部，办了两期干部大队，培训学员四百余人。

如前所述，红三军中的清党、解散党团组织、取消政治机关，是在远征到湘鄂边后不久开始的，到红三军进入黔东恢复党团组织，重建政治机关，历时一年多。起初，在红三军中，七、九两师的清党工作是由盛联均和宋盘铭负责的。

后来，中央分局说他两人是改组派。盛联均“利用清党来提拔改派分子，打击真正的党员。宋盘铭则对清党消极与形式的执行，他把改组派组织又恢复起来”。“当时改派残余又团结起来成立了军委，以宋盘铭为书记”。因而“第一次清党...

...流产了，.....党的组织也停止了活动，当时就以肃反为中心，清党也迟缓和”。一九三三年三月下旬，中央分局决定“以关向应、贺龙、卢冬生三同志为（红三军）清党委员会委员”，并“以一个月为限”进行“清洗”，而实际重新开始清党是在红七、九两师分开活动以后。“分开活动期间”（一九三三年八月至十二月）贺龙、关向应所率部队中“军部各部、处及九师各部、处大部分已清党完毕”。“当时夏希（曦）在七师没有清党”。“直到退出黔江在西库休息时期（一九三四年二月）才加紧清党工作（由中央分局委员分途去清）”。红九师在一九三四年二月间“初步登记完毕”，红七师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初步登记完毕”。因为“肃反”中党员、干部首当其冲，有些同志拒绝重新登记，加上对参加过“改组派”，即使只是被“改组派供过，没有事实证明”的党员也都不允许登记，所以，在红三军进入黔东后登记党员的工作并未结束，而且是在枫香溪会议上布置的工作之一。一些应予登记的党员和在“肃反”中被错误开除的党员的党籍，是在一九三四年九月“肃反”停止以后才逐渐得到解决的。在党员“初步登记完毕”之前，有的单位已有党的组织和一些活动（如军部的党支部），但全面恢复党组织，是在经营黔东期间。至于政治工作机构的情况，中央分局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给中央的报告上说：“政治系统在第一次肃反中被破坏了的，如政治部和政治处在（第）一次肃反后只剩少数的次要工作人员。在六房咀的时期，政治人员虽然增加了些，但是很少的。在（第）二次肃反中政治系统完全破坏了，到桑植后才开始补充指导员，以及到鹤峰苏区的时期，在清党的过程中准备了一部分政治工作人员，可是在党的解散后，这个工作又停顿了”。“在（第）三次肃反以后，党组织解散了，因之党的工作及政治工作是完全停顿的”。“一直到现在才全部恢复了政治制度与政治机关的工作，但还是不健全的”。“红三军各师的政治处，准备改成政治部，各团在红军扩大中准备建立政治处”。同停止“肃反”一样，重新登记党员、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也

见 1934 年 9 月 15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但 1935 年 1 月 27 日《任（弼时）政治委员在二军团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说，1934 年 11 月以前，红二军团只有二百一十三名党团员。据判断文内引用数字可靠性较大。

本段中引文见 1934 年 8 月 4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1934 年 9 月 15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和 1933 年 3 月 24 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中共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清洗条例》。

都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和反复的斗争。

枫香溪会议以后，红三军在加强内部建设的同时，大力开展了创造黔东苏区的工作，每师组织了一个宣传队，专作地方工作，并抽调若干分队作为建立地方武装的基础。计“从红军中调出参加苏维埃工作的约一百人，参加独立团、游击队的约近三百人”。还派了一批干部到冉少波领导的“神兵”中做改造工作。为了培训地方干部，举办了政治训练班，吸收本地干部学员一百五十余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致贵州印江、德江、婺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草案》、《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工农自卫队的任务及章程》、《没收地主豪绅之粮食财产之条例》和《雇农工会的斗争及其组织方法》等一系列文告。红三军除了打击敌人、掩护地方工作外，每到驻地便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建立雇农工会和贫农团，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苏维埃和地方武装。

红三军为劳动人民求解放的实际行动和严明的纪律，对广大群众产生了深刻影响，博得了广泛的欢迎和拥护。对此，国民党沿河县邮政局长戴德初给贵州省邮政局的报告中曾有颇为生动的叙述。报告说：红三军攻克沿河县时，县邮政局“局长……偕同家小逃出战区……甫……至大龙坡下，共匪千余已由捷径包围而来……遂与家小暂避入山。殊匪到达该地，即行宿营，局长所藏林外即为贺龙军部所在，……后恐被人察觉，又乘黑夜逃上山巅……次日该匪仍不移动，时有牧牛小孩突来山上，见其手持一纸，阅之知为匪宣传标语——红军之任务及纪律——见有保护邮政及邮差一条，于是毅然下山，亲谒贺龙，当将避难遭遇一一面诉，贺军长以为系受片面宣传之误会，情极可原，将局长随带各物验检之后，遂令所部勿得留拦，至此始得安然回局，所有票券款项均无损失……该匪内部组织异常严密，命令贯彻，士卒强悍，官兵享受一律平等，纪律之佳，出人意外……该匪所过，专擒军政、税收人员及区团富豪教士，而于贫苦工农、失业游民则给资赠产……买卖公平，一般小商，莫不大获其利。其于宣传工作，尤为注意……人心归附，如水下倾”。“该匪用其愚民主义，处处牢笼无产阶级，联络神匪，并宣传欢迎白军士兵参加红军。以故神匪归者络绎不绝，闻风响应者，各地皆是”。

由于黔东地区广大人民受贵州军阀和封建势力残酷压榨，革命热情很高，加上红三军工作细致深入，各项工作进展比较迅速。一个多月的时间，沿河、德江、印江、酉阳等县的各级苏维埃政权便先后建立了起来。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在沿河之铅厂坝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代表一百三十五人，通过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扩大红军及地方武装问题决议》、《优待红军家属条例》、《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草案》、《关于苗家问题决议》和《肃反条例》。选出了以贺龙、关向应、夏曦、卢冬生、朱绍田、孙秀亮等八十人组成的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贵州人民开天辟地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权。

地方武装的发展也比较快，到六、七月间，已先后成立了沿河、德江、印江、黔东、川黔边等五个独立团，共一千五百余人。此外，还成立了十个游击队，共四百余人。自卫队也普遍组织起来，放哨守卡，自动捉拿坏人。同时，还在沿河的小井吸收了“神兵”司令冉少波为首的千余“神兵”，将其编为黔东纵队，由红三军军部直接领导；九月又将黔东纵队和各县独立团合编为黔东独立师，由贺炳炎任师长，冉少波任副师长。

黔东的“神兵”是一九三二年当地贫苦农民为反抗国民党军阀和地主豪绅残酷剥削压迫兴起的，先在德江、印江、沿河、务川等县组织，后来遍及黔东大部分地区，仅沿河就有万余人。曾进攻德江、印江、沿河县城，声势很大。虽在国民党军队镇压下失败，但在群众中仍有较大影响，还保存了部分组织。冉少波率领的“神兵”接受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对于开创和保卫黔东苏区，建立当地地方武装，壮大红军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关于枫香溪会议后创建黔东根据地的情况写道：“在红军占领的区域，我们才去的时候，群众还跑兵，经过宣传以后，群众才回家，我们就去组织农民小组。组织以后，就开群众大会，成立乡苏维埃。乡苏维埃成立以后，就开始没收上地、分配土地、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大约快的七、八天，迟缓的两星期，我们就可以将（在）驻地范围建立乡苏维埃，分配土地，成立游击队。”由此可见，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十分紧张，进度也是比较快的。

在建立黔东苏区的斗争中，夏曦也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在地方工作方面。

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的交通到达沿河地区，带来了中央五月六日的指示信、中共五中全会决议和全苏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央根据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春了解的情况，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肃反”中的错误给了“严厉的指斥”。指示信说：“你们在肃反中犯了不可容许的严重错误，以肃反工作代替了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代替了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极大的罪恶”，“除了你们自己少数人外，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而将反革命的力量夸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以至（致）使你们终日陷入疑神疑鬼的恐怖生活着（中），这种恐怖遂造成了你们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中心的根本错误！……这样的肃反如继续向前发展，可以走到你们自己少数人也互相怀疑、猜忌与不信任的结果。我们绝对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这种估计完全是不正确的，夸大的！事实上改组派只是极少数……如果我们能够有系统的作反改组派的斗争，在群众中彻底揭露他们的阴谋和罪恶，及时肃清这些分子出领导机关，开除动摇分子的要职，说服被反革命分子与动摇分子所欺骗的群众，使他们相信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那未改组派便不会有这样大的影响，给我们这样大的危害。照你们那样的估计，不但在党的路线上和对群众方面要发生严重的错误，而且使人不能正确了解湘鄂西失败的原因，同时会把自已在这个期间所犯的各种最主要的错误掩盖起来”。

“由于你们不相信群众……所以你们也就不能吸收广大的群众来参加红军，及不能将已吸收来的‘从组织上巩固起来’，而形成枪多人少的怪现象。你们因专门肃反而放弃了日常的群众工作、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冲破敌人‘围剿’的工作，你们是脱离群众的！这也就说明了你们为什么不能击破敌人‘围剿’及固守新创造的苏区的主要原因！而最不能容忍的是‘要宣布省苏维埃政府的罪恶’，这样你们不是反对钻入苏维埃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而简直是攻击与污辱苏维埃制度，破坏苏维埃的威信！这完全（是）由于你们过分估计反革命的力量，由于失败情绪的反映！”

“由于你们不正确的估计，……竟武断的解散了一切党和团组织，无理由的怀疑与不信任一切党员和团员群众，举行重新登记……这实际上（是）你们拒绝了到处建立我们党的基础与繁殖我们党的工作，而陷入目前无党的

状态，这不但不能保证党的改造，而且是破坏我们党的威信，使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领导成为不可能。”

“由于你们不相信群众，不相信自己的同志……而陷于盲目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中不能自拔，因此造成你们现在没有任何决心与信心，来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而到处无目的无前途流浪着，过着游击的生活，虽是你们目前有着极端顺利的环境，特别是川东和湘西！”

中央指示接着要求：

（一）“坚决纠正你们的错误的肃反路线，立即恢复党内的经（正）常状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恢复和建立各级党和团的组织”；

（二）“尽量的扩大红军，加强红军的战斗力，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与军事技术”；

（三）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机关……吸引群众来参加苏维埃的工作……使他真正成为群众的，有威权的政府”；

（四）“坚决开展反对不相信群众力量的无情斗争，立即发动广大群众……建立一切的群众组织……坚决实行土地革命”；（五）“立即将游击主力转变为创造新的湘鄂川边苏维埃根据地的基本力量，立即停止那种无目的无前途的流浪的游击生活”。八月初，中央分局开会讨论上述指示和五中全会决议，表示完全接受中央的批评，通过了《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并将五中全会决议、中央指示信和中央分局的决议向干部作了传达，初步批判了夏曦的错误领导。中央五月六日指示，对纠正湘鄂西“肃反”等错误起了积极作用。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思想上、政治上揭示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湘鄂西地区党的领导人不相信广大群众和广大党团员，极端夸大暗藏的反革命力量，从而把“肃反”的错误发展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在当时的条件下，也不可能把“肃反”同第三次“左”倾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联系起来，夏曦对错误的认识，自然也是肤浅的，在某些地方还达不到中央指示的深度。对于从红三军撤到湘鄂边以后的领导，他认为“自金果坪会议以后至十字路会议这一时期，党的工作就逐渐走到不正确的道路”。言下之意是，此前还不是不正确的。在“肃反”问题上，他认为“与反革命改组派作了斗争，这是正确的”，“错误是以肃反工作代替了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政治思想上的斗争”，完全没有触及把大量的忠实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并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这个“肃反”的核心问题。如果不是贺龙保下了一些同志使其免遭杀害，情况还会更惨。对于滥施捕杀军队和地方干部造成的恶果，在中央分局九月十五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概未提及，而且依然说，唐赤英、王一鸣、刘昌运、汪洋、李人一、李强、齐素卿、周小康、陈协平、杨英、段德昌、王炳南、宋盘铭、陈培荫、叶光吉、盛联均、沈子祥、吴玉堂、周海成等同志是“改组派”。照此逻辑，“肃反”在这个方面的错误不过是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改组派”。尽管如此，在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中连续进行了两年多的错误肃反，到此终于停止了，原计划还要进行的“第五次肃反”也取消了，这总是深得人心，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从此以后，党内、军内长期存在的人人自危情绪开始减轻。

黔东地区国民党军力量不大，王家烈还要以其主力对付其他贵州军阀和湖南的陈渠珍，他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除了反动政府和团防之外，驻军不多。红三军进入黔东后，王家烈除向蒋介石、刘湘告急，还到黔西南与国民党军阀、第二十五军副军长犹国才协商共同“防共”，并命其第

二旅旅长李成章率第二、三、九三个团进驻思南、江口一线，以防红军夺取铜仁或深入贵州腹地。但因其部队战斗力不强，又要保存实力，提防其他军阀，所以进攻不大积极。红三军进入黔东后，进行过几次规模不大的战斗，如三打沿河、两打淇滩和攻打冉家祠堂、木黄等战斗，共约歼敌千余人，缴枪五六百支，形势比较稳定。到一九三四年九月，黔东苏区拥有印江、德江、沿河、松桃、西阳五县部分地域，纵横近二百里，人口十万以上，并建立了特区党的工作委员会和青年团工作委员会，发展了部分新党员，建立起了十七个区革命委员会，六十七个乡苏维埃，分配了土地。

但是，由于总的路线还没有根本改变，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还没有彻底清算，苏区还是不很巩固的。当时，在土地问题上，仍旧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群众也未深入发动起来，党内、军内对于“肃反”仍然存有戒心，恐怖情绪并未完全消除，在红三军主力南下接应红六军团时，由于敌军李成章等部的进攻，苏区西部又丧失了部分土地，至红二、红六军团会师时，苏区缩小到南北六七十里，东西三十里，十二个区，人口减至三万余人，新建的地方武装缩小了一半。

尽管如此，黔东苏区的建立，对红三军来说还是万分必要的。红三军自一九三二年八、九月间退出洪湖苏区时起，基本上是过着流动的生活，虽然数次企图恢复和建立苏区，但都没有实现。因为没有苏区，部队失去了可靠的后方，伤员安置困难，人员得不到补充，疲劳时无安定的休整场所，物资消耗难得补给。黔东苏区的创建，结束了这种状态，解决了一些困难。红三军在黔东这段时期，补充了近两千名新战士，队伍壮大了，也进行了比较充分的休整。这些情况，以及“肃反”的停止，党团组织的恢复，政治工作机构的重建，无疑都是重大的、正确的转变。黔东苏区的建立，也为

基本总结

湘鄂西根据地及红二军团从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三四年秋七年的斗争历史，有许多经验教训，其中不少与全国其他根据地及红军大致相似，然而这个地区及其红军革命斗争的发展、挫折、成功、失败，也有其特有的经验教训。

(一)

鄂西（包括鄂中的一部分）地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较好的革命工作基础。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虽然遭到了严重摧残，但在鄂西的影响仍然存在。所以，在湖北、湖南举行秋收暴动时，鄂西的暴动此起彼伏，给了敌人一定的打击。然而，由于敌人的强大和当地党组织执行“盲动主义”路线，暴动武装大都失败了，只有少数小游击队坚持着艰苦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夏，周逸群来鄂西重组特委，克服“盲动主义”影响，将党的主要力量投入农村，以秘密工作方式为主，隐蔽地建立工作基点，积极积蓄力量，“水浸”式地稳步扩大割据区域，待国民党军阀混战，正规敌军减少，反动力量相对削弱之时，猛烈展开武装斗争，拔除“白点”，连结各块较小的农村割据地区，迅速形成了一片革命根据地。同时，逐步集中各地游击队，组成了几支颇有战斗力的武装，并在斗争中，不断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正确解决了农村中阶级路线，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巩固、扩大了农村中的统一战线，稳定了根据地的经济，创造出了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恰当地制订了宽待俘虏的政策，从而连续取得武装斗争的胜利。依据这些经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形成了一系列决议，进一步推动了鄂西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紧紧依靠群众，很快把游击武装建成为一支正规红军——红六军，在紧靠敌人统治中心——武汉的水网地区建立了洪湖苏区。

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地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影响比较薄弱，但在那里贺龙有着特殊的威望和影响，有能迅速吸收一批现成武装的有利条件。那里也有不利的方面，主要是要按照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推翻反动政权的路线开展斗争，仍然存在许多困难。因此，红军及根据地的创建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起落。然而，由于在实践中能够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经过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阶级教育，加强对军队的改造工作，提高红军的军政素质；同时，对不同背景的土著武装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打击和孤立反动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团结教育可以合作及改造为红军的进步力量，党领导的武装就站稳了脚跟，并逐步扩大，建成了湘鄂西又一支主力红军——红四军，在省区边界敌人统治薄弱的贫瘠山区，建立了湘鄂边苏区。在创建洪湖、湘鄂边根据地的同时，党在巴兴归、鄂北（主要是襄枣宜）等地区创立红军和根据地的工作，也各有其特殊的经验教训，但这些经验教训大体上与“洪湖”和“湘鄂边”两种类型的情况，可以说大同小异。从这几个地区这一时期斗争的经验教训中，可以得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即凡能从实践中认清了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作出正确的阶级估量，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包括正确的作战方针、原则），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就能够因势利导，使革命斗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即使遇到错误路线的干扰，也能绕过暗礁，

避免最终的失败。

（二）

湘鄂西根据地的革命斗争，自一九三一年秋到一九三一年春总的形势是比较好的。虽然各地区情况不同，发展不够平衡，但根据地建设大体上都是在湘鄂西特委有关决议和政策精神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一时期，各地区坚决执行特委的土地政策，土地革命有了很大发展，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充分调动了翻身农民的积极性，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战争，并且激起了广大农民直接投身革命战争的热情。但到一九三一年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领导人错误地断定湘鄂西苏区“富农路线继续存在与发展”，“明明白白是富农路线的统治”，积极实行“加紧反富农斗争”和“彻底平分一切土地”的“左”倾政策，使湘鄂西的土地革命走上了邪路。此后的土地革命扩大打击面、到处树敌，孤立了贫雇农，破坏了根据地的建设。这是根据地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湘鄂西的地方武装，多是在农民武装暴动中建立起来、在残酷的反“清乡”、反“围剿”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它是组建与扩大主力红军的基础，又是夺取和保卫政权的重要力量。游击队、群众武装与正规军相结合，构成了新型的苏区武装力量体制。红二军团的成立，是湘鄂西苏区革命武装发展壮大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过渡的阶段性标志。但在红二军团南征时，为集中力量攻打中心城市，几乎把洪湖苏区地方武装都编入了正规红军，以致反“围剿”、保卫洪湖苏区的担子全部落在了新组建的少量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身上，洪湖苏区的武装斗争一度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前一阶段的正确的政策和作战原则仍然在发挥作用，洪湖地区的地方武装还是充分利用河湖港汊和部分山区的有利地形，凭借良好的群众条件，灵活地进行游击战，有力地打击“围剿”军，并在斗争中得到了发展，又建立起了一支正规红军，为恢复和保卫苏维埃政权，写下了人民战争的光辉篇章。而在同一时期，红二军团则由于执行立三路线攻打中心城市任务和错误的作战方针，军事行动与根据地建设脱节，与群众斗争脱节，以及主力红军使用方向不当等原因，遭受了严重挫折。到一九三一年夏季以后，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领导，在“反立三路线”、“拥护国际路线”的口号下，虽然全部否定了湘鄂西红军创造的成功经验，但在“左”倾路线还没有完全控制红军的时候，红三军尚能在襄北等地灵活机动作战，从而取得巨大胜利。到了“左”倾领导人为加快推行冒险主义的步伐，加紧控制红军，挑起党内斗争，打击军队和地方主要领导干部，要求完全肃清“游击主义”，“准备到攻打大城市及可与帝国主义作战的必要限度”的时候，湘鄂西的武装斗争便几乎完全脱离了正确轨道，从而结束了兴盛的局面。

对这一阶段湘鄂西革命斗争的主观指导进行正误比较，是很能发人深省的。

（三）

以中共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为标志，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湘鄂西

得到了全面贯彻，为时不长，根据地就全部丧失了。失败的原因，最根本的是错误的肃反摧毁了根据地和红军赖以克敌制胜、坚持斗争的基础。湘鄂西的“肃反”错误之所以发展到极端的程度，第一，是“左”倾领导对根据地中暗藏的敌人和革命团体的不纯程度作了极为错误的估计，夸大了打入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力量；第二，是不注重调查研究，不注重证据；第三，是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第四，是怀疑一切，从“肃反”发展到对党内群众概不信任。总之，在“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心目中，可以信赖的人是极少的。这既是他们执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的思想基础，更是造成“肃反”错误的思想基础。此外，“肃反”又是在敌情严重、斗争残酷和深入“反富农斗争”，盛行唯成分论，以及强调把右倾作为主要危险加以反对的政治气氛中展开的，客观环境利于滋长一种以极“左”的角度看待各种矛盾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势必使错误恶性发展。湘鄂西的“肃反”，虽然也同全国其他根据地一样，是在当时中共中央的总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有其显著特点。一是打击面宽。湘鄂西各根据地、军队、地方机关和人民群众中无一例外都开展了“肃反”运动，“左”倾统治所及之处，无不深受其害。二是时间长。大规模“肃反”持续了两年多时间，虽然区分为四次，但间隙很短，或者没有间隙。三是由“肃反”错误发展到解散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机关，大大削弱了党的领导，导致了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的大倒退。四是革命的骨干力量损失惨重。大批领导干部被错杀，而且以反第四次“围剿”期间战斗十分紧张频繁的时候捕杀的数量最大。军队的领导机关被严重削弱；地方党委、政权机构几乎被全面摧毁。各级地方领导机关，完全没有力量有组织地动员、率领群众进行反“围剿”，失败之后则更少领导群众做恢复工作的，以致苏区全部沦为白区，隐蔽斗争也很少得以坚持下来。这当然也同红军和各级地方机关仓卒撤退，缺少坚持斗争的有力措施有关。但为害最甚、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摧残革命骨干，整垮了党的组织。这种情况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是比较少见的，是湘鄂西革命斗争史上最惨痛的教训。

湘鄂西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遭受严重挫折的直接原因是作战失利。而作战失利则是执行“左”倾军事路线的结果。在反第四次“围剿”以前，“左”倾路线错误估计形势，重新捡起立三路线时期已经破产了的夺取大城市的方针，急切地要与友邻区域打成一片，然后一起攻占大城市，开始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一九三二年七月以前，“争夺襄北，向平汉路发展”实际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红三军必须为实现这个企图在一个固定的作战线上执行速决的进攻战略。这就限制了红军打运动战、游击战的长处的发挥，束缚了红军灵活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自由；并且逐步失去了主动权。而在这个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彻底失败、敌人大举围攻苏区中心区域之际，“左”倾领导又改取单纯防御战略，在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彻底失败之后，仓忙实行战略转移，实际上是逃跑。“左”倾领导在战略上，对于是持久战还是速决战，是歼灭战还是消耗战，是集中兵力还是分散兵力，是决战防御还是单纯防御等一系列问题，所要求或实际造成的都是后者，他们强加于红三军的战略战术，同当时“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根本不相适应，这当然不能打破“围剿”。

红三军建立黔东根据地，同在湘鄂西创建根据地的情况大不相同，条件并不及那些地区好，但实践证明，只要认清新区的具体情况，从客观实际出

发，制定恰当的方针、政策，并且允许结合实际灵活运用，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正确对待中间力量，抓紧时间发动群众，局面是能够迅速打开的。这些，在原则上又和创建湘鄂西根据地的经验相同，所以，可以说湘鄂西这方面的经验也是带规律性的。

第二部分

红六军团坚持湘赣 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和向黔东转移

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是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由湘赣革命根据地（湘赣苏区）的地方武装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赣苏区）的部分地方武装发展壮大组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武装，为保卫和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英勇斗争。

湘赣革命根据地处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地区，包括江西的永新、莲花、宁冈三县的全部和湖南的酃县、茶陵、攸县、醴陵，江西的萍乡、分宜、宜春、峡江、安福、吉安、万安、泰和、遂川、上犹、崇义等十多个县的大部或一部。

这个根据地，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等领导湘鄂赣三省边界地区的平江、浏阳等县的农民武装、萍乡的工人武装和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举行秋收起义。在敌强我弱和革命处于低潮的条件下，毛泽东率领起义队伍进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位于湘赣两省边界地区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随即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过艰苦努力，到一九二八年三月，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四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队伍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地区，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五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成立，领导宁冈、遂川、永新、莲花、酃县、茶陵、攸县等县的革命斗争。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红军和这个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多次打败江西、湖南两省国民党军的进攻和联合“会剿”，使根据地日益巩固、不断扩大。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战斗胜利，根据地发展到拥有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部，以及遂川、酃县、茶陵和安福、吉安等县各一部，并形成一整块地区。十二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由平江起义部队编成的红五军主力也来到了井冈山地区。

在井冈山的斗争胜利影响下，根据地周围各县群众的革命斗争日益开展，土地革命的武装斗争之火在全国各地燃烧起来，此落彼起。

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首先是军事的斗争，面临着艰巨的建军任务。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到达永新三湾村时，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对部队实行了整编，即三湾改编。第一次实行把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或排设党的小组，营、团建立党委，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部队中开始实行民主制度，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并把对部队开展政治教育作为建军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斗争中，毛泽东还提出：军队不仅要打仗，还要担负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以至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任务。一九二八年三月至六月，又先后规定了军队的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密切了军民关系。

在建设主力红军的同时，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一九二七年十月以后，根据地各县都有了一支或数支或大或小的地方

武装，即县、区领导的脱产的赤卫队或游击队。不脱产的群众性武装也先后发展起来。

井冈山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从广泛开展的游击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九二八年五月，毛泽东总结这些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随着战争的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包括边界特委）领导人以后又提出了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作战原则，这主要有：“对湘取守势，对赣取攻势”，即避强击弱，“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强敌跟踪，用盘旋式打圈子政策”等。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领导人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所总结出来的这些原则，对红军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是同深入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党、建政，建立各种群众组织以及武装群众等各项建设工作紧密结合的。从一九二七年十月开始，各县党的组织陆续得到恢复，党员数量也有很大发展，许多乡或村建立了党的支部，支部之上为区委、县委，县委之上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在县、区、乡成立了各级工农兵政府即苏维埃政府，县之上有边界工农兵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边界各级政府领导下，根据地普遍分配了土地，办法主要是以乡为单位，没收一切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这个办法虽然存在某些缺点，但在当时战争极其频繁的情况下，既能迅速分配土地，又能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故颇受广大群众欢迎。在总结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年多土地革命运动的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先后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和一九二九年四月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使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有了依据。此外，还制定了商业政策、经济政策和俘虏政策等等。

一九二八年十月，毛泽东在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现状，阐明了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指出：“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益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十一月，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进一步就军事问题、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党的组织问题、革命性质问题、割据地区问题等，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这样，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发展，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坚持武装斗争，深入农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井冈山斗争的经验，从井冈山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全党全军的宝贵财富。

湘赣边界地区的地方武装，在毛泽东等率领主力红军挺进赣南、闽西之后，在特委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同广大群众一起，保卫和扩大了根据地。这些地方武装，在斗争中发展壮大，逐步发展为湘赣苏区的主力红军。

湘赣边界地区的地方武装和红军，直接继承了井冈山斗争的伟大战果，并能基本上依据毛泽东等提出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原则开展斗争。这就是湘赣边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和红军能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第一章

湘赣边地方武装在井冈山 斗争的基础上坚持斗争 湘东独立师成立

第一节 湘赣边地方武装保卫 根据地的斗争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赣边界地区的攸县、茶陵、酃县、遂川、永新、莲花、宁冈等县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普遍组织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这些县的农民自卫军共有枪近千支。大革命失败后，这个地区各县的党的基层组织和农民运动遭到严重破坏，农民自卫军的枪支，除遂川保存六支、莲花保存一支外，都被豪绅地主缴去。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进至井冈山地区，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湘赣边界地区的斗争，在毛泽东领导和主力红军帮助下，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各县的党组织先后恢复，革命政权也先后建立起来。毛泽东在建设主力红军的同时，十分重视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建设。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发给永新的党员积极分子五支枪，成立了以刘作述为队长的永新赤卫队；十一月，主力红军攻占茶陵城，发给茶陵的党员积极分子五支枪，成立了以谭家述为队长的茶陵赤卫队；一九二八年一月，毛泽东指示遂川的党员积极分子取出保存的六支枪，成立了遂川赤卫队；莲花的党员积极分子取出保存的一支枪，成立了一支有十余人的以陈竟进为队长的莲花工农赤卫队。一九二八年初，毛泽东又发给他们八支枪，这支武装就扩编为莲花赤卫队。随着斗争的发展，其他各县和各县的区，也都相继组织了赤卫队。有的县还在城区组建了类似赤卫队的工人纠察队。主力红军从作战缴获中不断发给各县、区赤卫队一些枪支弹药，各县、区赤卫队也从作战中夺得了一些武器补充自己。此外，还有工农暴动队，这是以乡为单位组成的不脱产的群众性武装，以梭镖、鸟枪、土炮（松木炮）等为武器，任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乡政权。遇有敌情，则帮助主力红军或赤卫队作战。赤卫队的干部多数在主力红军办的教导队受过训练，有的是从主力红军调来的。各县、区赤卫队都有自己的军事根据地：在永新有小江区、万年山区和天龙山区，在莲花有上西区，在酃县有青石冈区和大院区，在茶陵有邻近永新大亚山的道坪地区，在宁冈和遂川分别为毗连井冈山的茅坪地区和黄坳地区。永新、莲花、茶陵、宁冈四县边界的九陇山区，是这四县赤卫队共同的主要军事根据地。赤卫队虽然武器数量少，质量差，弹药奇缺，但他们在党的领导下，遵循毛泽东的游击战原则，依靠人民，依托根据地，和豪绅地主武装作战；在主力红军作战时，则积极袭扰敌人，配合行动。在频繁的战斗中，赤卫队的战斗力日益增强。一九二八年内，根据地各县的分田运动先后如火如荼地展开。人民群众为了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大批地参加了赤卫队，各县、区赤卫队不断抽调人员补入主力红军。由于主力红军的大力帮助和根据地人民的

积极支持，至一九二九年初，根据地地方武装已有很大发展，共有九百余支枪，其中除分散在地方工作人员手中的百余支外，宁冈赤卫队有枪一百

八十支，遂川赤卫队有枪一百一十支，永新赤卫队有枪二百余支，莲花赤卫队有枪一百余支，茶陵赤卫队有枪六十余支，酃县赤卫队有枪八十余支。

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民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取得的巨大胜利，使敌人非常震惊。从井冈山革命火炬点燃的第一天起，国民党反动派就千方百计地要扑灭它，先后发动了多次进攻和“会剿”，但都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所击败。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在其第二次“会剿”失败后，就开始策划举行第三次“会剿”，计划调集六个旅约三万人的兵力，分五路进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时，加紧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

红四军前委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开始，就领导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反第三次“会剿”的准备。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前委召集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举行联席会议，进一步讨论反“会剿”的方针和部署。针对当时的敌情和严重的经济困难，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战略，以红五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根据地，以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先求打破敌之封锁，解决经济困难，在敌“会剿”开始后，则在外线积极展开活动，配合内线部队作战，打破敌之“会剿”，巩固和发展根据地。

一月十四日，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于遂川县的大汾、左安间突破敌防，转到外线，向崇义、大余进击。敌人以三个旅对红四军实施追击和截击。红四军被迫沿赣粤边和闽赣边向吉安之东固前进。后因情况变化，同时鉴于赣南、闽西地区更利于红军和革命力量发展，红四军遂决定在那里展开游击战，发动群众，与当地党和游击队相配合，开辟新的根据地。中国革命事业从此得到更大发展。这一广大地区，以后发展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红四军主力离开不久，一月二十五日，“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约三个旅，在炮火掩护下，向井冈山阵地发动猛烈进攻。红五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英勇抗击，艰苦奋斗四天四夜，终因敌众我寡，井冈山阵地被突破。红五军被迫向大汾方向转移，接着进至赣南地区。在主力红军先后离去后，根据地军民和地方武装面临严重的斗争任务。但是，根据地已经有了健全的党的组织和政权机关，各县都有一定数量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地方武装。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经过土地革命斗争锻炼，政治觉悟和斗争热情很高，特别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四军前委和边界党组织在这里制定的正确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深入人心，鼓舞根据地人民坚持斗争。一九二九年一月以后，湘赣边界地区的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在这个基础上，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的领导下和主力红军以及邻近根据地斗争的配合下，为保卫和发展根据地，展开了英勇斗争。

国民党军占领井冈山不久，抽调第十四旅和第三十五旅共四个团，向九陇山进攻。防守九陇山的部队，是永新、茶陵、宁冈三县的赤卫队。九陇山纵横六十余里，森林茂密，山势陡峭，只有三个山口可通山下。永新、茶陵、宁冈三县赤卫队在永新赤卫队队长刘作述统一指挥下，利用地形，构筑工事，扼守山口，并在阵地前布满三角钉（把竹枝削尖，用桐油和砂子炒过，三个一组，钉在地面）及鹿砦等障碍物阻击敌人。国民党军以猛烈炮火，掩护步兵一再冲锋。三县赤卫队居高临下，顽强阻击，阵地毁而复修。激战三日后，

红五军主力约五六百人到井冈山会合了红四军后，部队改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但改编不久，红四军主力就挺进到了赣南，第二十团在单独活动中仍称红五军。

由于子弹耗尽，敌人始得乘机从宁冈县的蔡家田突破。国民党军攻入九陇山区后，一面放火烧山，一面严密封锁所有通往山下的道路隘口。三县赤卫队难以突围，遂利用深山密林，暂时就地坚持斗争。时值严冬，连日雨雪纷飞，三县赤卫队风餐露宿，仍然斗志昂扬，坚决地展开了游击活动。到旧历除夕，敌警戒松懈，三县赤卫队才乘机分路突围。永新赤卫队转移至和山、万年山地区；宁冈赤卫队转移到茅坪、大陇一带；茶陵赤卫队在突围的当夜，以百里急行军于拂晓前到达茶陵县的界首，突袭茶陵挨户团，缴枪数十支。

国民党军为继续寻机歼灭湘赣边界赤卫队等地方武装，彻底摧毁根据地，采取了军事“清剿”和白色恐怖政策。他们疯狂叫嚣：“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在人口不满两千的井冈山上，杀害群众九百余人，并烧毁房屋三百七十余栋，抢去耕牛四百零八头。红军有百余名重伤病员在小井村未及撤走，被敌人全部杀害。

湘赣边界地区的革命群众，对敌人的残酷烧杀进行了顽强斗争。他们扶老携幼隐蔽深山密林，忍饥耐寒，结草而居。各县、区赤卫队，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热情帮助下，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出没在敌军后方，破坏交通，截获辎重，捕捉敌军零散人员，打敌哨所。入夜，则以少数人员隐蔽进至敌据点附近，鸣枪放火，困扰敌人。在根据地军民的坚决斗争下，敌人的“清剿”不但没有得逞，反而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就在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了新的混战。一九二九年二月，李宗仁和蒋介石之间的战争，其序战首先在湖南开始，三月正式爆发。湖南省境内的国民党军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江西省境内的国民党军感到红四军主力活动的威胁，不久，进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先后撤走。

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乘敌人后撤时机，领导各县、区赤卫队积极打击敌人，恢复了井冈山、九陇山军事根据地，并大力整顿党和政权组织，发展革命武装。当时特委考虑到，“边界赤卫队没有统一的编制和统一的指挥，武装力量分散，如果各县的反动武装比较联合的来进攻，或小部正规军来打，我们就无法应付”，“为要应付当时的政局，消灭地主阶级武装”^①，决定从永新、宁冈各抽调六十支枪（人多于枪，下同），从莲花抽调五十支枪，从茶陵抽调四十二支枪，连同原红四军第三十二团（袁文才、王佐部）余部和红五军留下的人员，集中编成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以袁文才、王佐部编为第一营，余为第二营。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成立后，即以井冈山、九陇山为中心，在各县、区赤卫队配合下，先后出击宁冈县的砦市、古城，茶陵县的和尚庄，永新县的潞江、陇田，连续取得胜利。宁冈、莲花两城也先后为边界红军和赤卫队收复。

湘赣边界各县地主豪绅，对边界地区红军和赤卫队的活动非常恐惧，在国民党正规部队无力顾及的情况下，慌忙拼凑永新、茶陵、酃县、宁冈四县靖卫队、保安队组织联防“会剿”，向九陇山地区进攻，边界地区红军和赤卫队利用敌人各自企图保存实力、行动不统一的矛盾，集中力量，首先打击宁冈靖卫队。一战获胜，歼其大部。其余各县地主武装，惧怕被歼，先后撤退。

红四军前委和毛泽东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十分关切。红五军进至赣南会合红四军后，红四军前委于四月十一日在零都召开前委扩大会

① 见 1929 年 5 月 20 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报告》。

议，为加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力量，决定红五军返回湘赣边界地区活动。五月二日，红五军到达宁冈县的茅坪。根据地人民对红五军的到来极为兴奋。湘赣边界特委为加强红五军的战斗力，打开斗争局面，根据红四军前委的指示精神，将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编入红五军，使红五军的战斗力得到增强。

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红五军重返湘赣边界地区十分注意，这时，蒋桂战争以李宗仁、白崇禧部的失败而基本结束。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遂即调集部队，向湘赣边界地区发动新的进攻。五月中旬，湖南国民党军第一五五旅由茶陵，江西国民党军第三十五旅由永新，从东西两面实施合击，企图将红军消灭于宁冈附近地区。在敌军突然进攻的情况下，湘赣边界特委决定红五军首先退往酃县附近，然后根据情况，“或右出拿山回永新，或左出茶陵回小江”，寻机歼敌。红五军进至酃县附近后，因情况变化，继续南下，进至粤北的仁化、南雄等地，开展游击战争。

敌军合击扑空后，将部队分散在宁冈、茶陵、永新、莲花诸县城及重要交通线上的据点，实行“清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因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已编入红五军，武装力量大为削弱，对敌人的分散“清剿”无法组织有力反击，因而大受摧残。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对群众基础较好的永新县的小江区、东南区等，大烧大杀，房屋被烧光，东西被抢掠一空。对群众基础较差的地区则采取软化手段，宣传什么“自首不杀”、“参加挨户团不杀”等，以欺骗群众。特委根据当时形势，决定对敌斗争的政策是：一、集中赤卫队广泛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敌人的分散部队；二、武装中心区域的人民群众，教以游击战术，配合赤卫队作战；三、能隐蔽的区域，在符合革命利益的条件下，尽可能隐蔽；四、对要求迁避的群众，加紧宣传揭露敌人的欺骗阴谋，然后协助迁移，并在这些群众中建立秘密工作。这一政策的执行，使边界对敌斗争的形势逐渐好转。

一九二九年七月，红五军由粤北返回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先后收复遂川、宁冈两县城。地方武装同时收复莲花县城。不久，特委指示红五军往安福筹粮筹款。红五军在开进途中，同江西国民党军第十二师的工兵营和部分靖卫队发生遭遇战，继而攻打安福城，返回途中又同江西国民党军第七十团发生激战。经过这几仗，红五军干部伤亡较大，但也沉重打击了敌人的猖狂气焰，“振奋了群众的勇气”，湘赣边界地区的斗争形势进一步好转。

特委为了便于作战，决定乘此时机对永新、莲花、宁冈等县赤卫队进行整编和训练，赤卫队因而得到加强。整编以后，各县赤卫队采取“统一指挥，分散游击的战术”，挺进到根据地的边缘地区积极活动。

八月六日，驻永新的国民党军以四个营开往宁冈向红五军进攻。红五军领导人考虑有必要取得湖南省委的领导，决定前往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这时，王佐率少数人留下，仍在井冈山及其附近活动。八月十一日，红五军离开莲花，十七日到达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万载。敌军乘机先后占领莲花、宁冈两县城。特委继续领导湘赣边界地区军民坚持根据地斗争。

与此同时，红四军在闽西地区接连打下龙岩、永定两城，并在白沙战斗和第三次攻打龙岩城的战斗中，取得歼敌一个旅又一个团的胜利。蒋介石害怕红四军在闽西发展，决定调集闽粤赣三省敌军举行“会剿”。原驻永新、

见 1929 年 8 月邓乾元《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报告》。

莲花、宁冈三县的第十二师部队全部调走，一部留驻赣南，大部调往闽西，参加对红四军的“会剿”。对湘赣边界地区，蒋介石命令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派兵接防。因张发奎于九月在宜昌宣布反蒋，正率部经湘西向广西前进，何键忙于调集部队对付，根本无力顾及。这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已完全没有敌正规部队，只有挨户团、保安队、靖卫团等反动地主武装，分散防守各城镇。

湘赣边界地区地方武装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对挨户团、保安队、靖卫团展开猛烈进攻，首先收复莲花、宁冈两县城，后集中全力进攻永新守敌靖卫团。这是边界各县中最强大的一支反动地主武装，共有四个大队，枪四百余支，配置在永新城及附近地区。永新赤卫大队和该县西北特区赤卫队、暴动队共约千余人，向县城西北约二十余里的敌人重要据点黄门坊进攻。守敌为一个大队，一百余人。据守数所高大房院，进行顽抗。赤卫队施行火攻，将敌大部歼灭。

攻克黄门坊后，特委为发展胜利，于十月上旬召开攻打永新城的会议，确定永新、莲花、宁冈三县赤卫大队从北、西、南分三路直扑县城；永新西北特区赤卫队、暴动队埋伏于城东北的虚皇山、月岭一带，东南特区赤卫队、暴动队埋伏于城东南的东华岭一带，分别担任追歼逃敌和堵击可能从安福、吉安来援之敌的任务。十月三十日晨开始攻城。永新靖卫团害怕被歼，大部弃城逃窜，一部缴械投降。湘赣边界特委旋即迁至永新城。从此，永新就成为湘赣边界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

边界地方武装的节节胜利，引起反动统治阶级的很大震动。蒋介石在第十二师大部进入福建以后，又调来第五十师，部署在赣江以西和袁水流域。何键在张发奎部离开湖南进入广西后，由于威胁减轻，赶忙抽回许克祥部独立第三旅，于十一月初分两路向湘赣边界地区进攻，一路由茶陵攻莲花，一路由酃县攻宁冈，企图占领两城后，配合第五十师的一个团从安福合击永新。当时莲花城只有莲花赤卫大队一个中队驻守，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遂弃城撤往九都。十一月四日，独立第三旅以两个营向九都急进。莲花赤卫队、暴动队和革命群众约千余人，利用有利地形，埋伏于峙陇陂口，待敌人完全进入伏击圈后，用步枪、鸟枪、土炮，居高临下四面围攻，敌人伤亡很大，狼狈逃回莲花城。此役共缴枪七十多支，子弹数千发。就在这时，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合张发奎部对粤军发动进攻，并迅速进入广东境内，直逼广州。蒋介石为了援救粤军，急忙向广东调集部队。在此情况下，独立第三旅奉命退出湘赣边界赶往韶关，驻江西的鲁涤平部第五十师主力 and 第十八师的一个旅也奉命向粤北开进。由于湘赣两省敌人正规部队调走，各县反动地主武装屡遭赤卫队打击，无力组织进攻，湘赣边界地区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局面。

第二节西路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

湘赣边界地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过一九二九年一年的激烈斗争，以永新为中心包括永新、莲花、宁冈等县的广大地区已经得到了巩固。这个根据地和在它的东面和南面的、属中共赣西和赣南特委领导的根据地已基本连成一片。这三个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湘赣边界的永新、莲花、宁冈三县赤卫队，有一千余支枪，五千余人。这时，以赣州为中心的赣南各县仅有国民党军第十二师三十五旅；以吉安为中心的赣西各县仅有第五十师一四八旅的两个团和第十八师五十四旅的一个团。湘赣边界、赣西、赣南各县地主反动武装虽有五千余支枪，但力量分散，战斗力不强。这种形势，要求湘赣边界、赣西、赣南三个根据地建立统一领导，以集中力量，加强斗争，争取更大胜利。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红五军主力返回到湘赣边界地区。红五军转往湘赣根据地后，与黄公略领导的湘鄂赣边支队合编，人数有了很大增加，编成了五个纵队。十二月，红五军军部率两个纵队到萍乡、攸县、茶陵等地活动，接着，又进到吉安、遂川等地开展游击战争。这时，中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也来到了这个区。

一九三一年一月，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界特委。为了发展这个地区的革命斗争，并准备夺取赣江流域重镇吉安城，根据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的建议，在遂川雩田圩举行两特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集中湘赣边界和赣西的地方武装，成立红六军。湘赣边界永新赤卫大队的大部和莲花、宁冈赤卫大队各一部，即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会议并对两特委合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但因认识不一，未能作出决定。雩田圩会议的一个错误决定是：把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并对井冈山地区的革命斗争有过贡献的袁文才、王佐仍视为上匪，决定予以武力解决。会后，红五军根据会议决定和湘赣边界特委的请求，在永新城以武力解决了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袁文才当场被特委负责人杀害，王佐闻变逃跑，落水身亡。袁文才、王佐被害后，其残部中的一些人，便与反动地主武装相勾结，盘踞井冈山的大小五井等村庄，与我为敌，给根据地的斗争造成了一定困难。在此以前，湘赣边界特委的王怀、朱昌谐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特委党委、曾任红四军第十师党代表、茶陵县委书记的宛希先。这些错误行动，在革命队伍内部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正当赣西地区党内在如何进一步发展革命形势的问题上发生分歧的时候，红四军前委率红四军主力回到了江西。根据赣西特委的请求，前委于二月六日至九日在吉安县的陂头召集红四、红五，红六军军委和赣西、赣南特委举行联席会议（通称“二·七”会议），详尽地研究了湘赣边界、赣西和赣南地区的斗争形势，决定将三个特委合并，组成中共赣西南特委，统一领导赣西南地区的斗争。

“二·七”会议的一些决定中，虽然也存在某些“左”的倾向，但总的、基本的方面是正确的。“二·七”会议前，赣西、赣南地

赣西特委当时主要领导吉安，吉水，安福、万安、泰和等县党的组织，活动中心为吉安的东固和延福地区。赣南特委当时活动中心在雩都。

红五军军委负责人（红五军领导人）未出席会议，系委托红六军军委负责人（军长黄公略、政委刘士奇）同时代表红五军军委参加会议。

区存在着不重视分配土地、不重视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不注意积极武装工农群众等现象，影响到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与发展。湘赣边界的情况，虽然和赣西、赣南地区不同，但在分配土地和政权建设等方面也有些问题急需解决。“二·七”会议批判了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认识，确定了彻底分配土地、建立革命政权和积极武装工农群众，为赣西南特委的中心工作任务“二·七”会议后，红四军根据会议精神，曾先后决定攻打吉安和赣州，均因敌情变化或情报不准确，未能实现。二月中旬，红四军和红六军第二纵队在水南、值夏地区歼敌一个旅。接着，红四军围攻赣州未成，便进至南雄、信丰等地，开展群众工作。六月转到了闽西。红五军于会后不久转到了湘鄂赣根据地。

一九三一年三月，中共赣西南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确定了赣西南地区党组织的主要斗争任务是：第一，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工农兵政府；第二，发动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第三，积极武装工农群众，扩大地方武装；并以夺取吉安、赣州，进而夺取江西全省政权为总的斗争目标。赣西南特委分设东、南、西、北四路党的行动委员会。原湘赣边界地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各县和安福、以及吉安县属赣江以西地区，划为西路行委领导范围。

西路行委领导的地区（下简称西路地区），除吉安西区外，早就建立了工农兵政权（苏维埃政府），但当时有些县、区、乡、村政府工作效率不高，主动性不够，有的只知照转党的决定，有的甚至混进地主、富农和投机分子。因此，行委决定通过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大力进行整顿。各级代表大会在“撤换不称职的违反贫苦工农利益的委员”、“选举真正代表贫苦工农利益的群众领袖做委员”的口号下，进行民主选举，选出了各级政府委员。经过这次整顿，政府成员比较纯洁了，工作效率也有一定提高，从而更加密切了政府同群众的关系。这时，原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根据赣西南特委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指示，改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西路办事处。

西路行委和西路办事处根据赣西南特委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指示，领导群众开展了分田运动。在西路地区，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占有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六十到八十（逐川百分之八十，永新、茶陵、酃县百分之七十，宁冈、莲花百分之六十）；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雇农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二十的中农，仅占有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二十到四十。较普遍的租率为农民、地主各半，亦有地主得百分之六十的。西路行委领导的原湘赣边界各县，在一九二八年，曾经普遍地分了土地，但由于战争激烈，敌我进退频繁，多数地区分田果实未能巩固。此次分田，根据广大群众的意见，仍采取“没收一切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原则进行。具体办法是以乡为单位，确定每人平均亩数，然后按照各耕户原有耕地的数目，抽多补少，不久又提出抽肥补瘦。这次的分田运动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效果，它不仅使无田或少田的农民都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实际利益，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而且起

除西路行委领导地区已见上文外，东路行委以宁都为中心，领导乐安、永丰、宜黄、南丰、广昌、石城、瑞金、会昌等县党的工作，南路行委以赣县为中心领导于都、寻邬、安远、大庾、信丰、南康、上犹、崇义、龙南等县党的工作；北路以内延为中心，领导新余、分宜、宜春、峡江以及吉安、吉水各一部党的工作。兴国、万安、泰和以及吉安、吉水的河东地区等地党的工作由赣西南特委直接领导。这四个行委，以后都改为分委。

到了“争取群众，发动斗争”的动员作用。

分田以后，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革命热情显著提高，纷纷要求组织起来，保卫革命政权和土地果实。地方武装和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军事组织——赤卫军、少年先锋队（下简称少先队），在原有基础上飞跃发展起来。二十至四十岁的男女工农群众大都参加了赤卫军，工农家庭的十六岁至二十岁的男女青少年大都参加了少先队（年龄界限各地不完全相同）。赤卫军、少先队的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侦察、传递情报，救护、转运伤员；当敌人进攻时，积极扰乱敌人后方，或直接配合红军和游击队作战。赤卫军的武器是鸟枪、梭镖和土炮。少先队的武器主要是梭镖。他们农忙时从事生产劳动，农闲时进行训练。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这时多数仍称赤卫大队或赤卫队，有的称赤色游击队。由于根据地内比较稳定，他们多活动在边沿地区，进行打击敌人，发动群众的斗争。一九三一年七月，永新、莲花、宁冈赤卫大队和吉安西区赤卫队奉命编为红二十军第三纵队。不久，永新、莲花等县又组织了新的赤卫大队。

在此期间，赣西南特委在整顿革命政权、分配土地和发展群众武装等方面，基本上执行了前委的正确指示，因此，整个赣西南地区革命力量得到迅速发展，根据地也得到进一步巩固。但是，赣西南特委组成不久，在领导思想上就表现了某些“左”的倾向，把夺取吉安、赣州进而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的长远斗争目标，当作当前的行动纲领，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地组织和领导革命群众和地方武装，在没有或只有很少的主力红军参加的情况下，连续八次攻打吉安城。西路地区和赣西南其他地区的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不怕困难，不怕牺牲，高举红旗，英勇攻击，多次冲到吉安城下，给敌人造成很大威胁，但终于未能攻破吉安城，徒然受到很大伤亡，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一九三一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使第二次“左”倾路线即李立三路线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立三路线不承认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具备了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只要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高潮，达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建立全国革命政权。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还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赣西南特委接受立三路线以后，在攻打吉安的行动上，更加一味蛮干，提出“誓死拿下吉安”的口号，使这一行动具有更大的冒险性。赣西南特委中的一些人，站在极“左”的立场上，打着立三路线的旗帜，提出“赣西南特委犯了农民意识，保守主义，割据观念错误”，大反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并将赣西南地区的党团组织合并，组成江西省行委，李文林为书记。

在此期间，红四军和红五军都得到很大发展，并分别组成红一军团和红

赤卫军、少先队当时编组情况：赤卫军，每县编一个师或一个军，每区编一个团，每乡编一个营，每村编几个班至一个连；少先队，县编总队，区编纵队，乡编大队，根据人数多少，下分若干中队。他们以村或乡为单位，农闲时每周操练或上课半天，区、乡定期举行会操。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是：手中武器的使用和保管以及步法、卧倒、散开和利用地形地物等基础动作。政治训练，采取连队政治指导员和党的负责人不定期作报告等方式，讲解政治常识和时事。

三军团。这两个军团会合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转战至赣西南地区，并打下了吉安城。江西省行委和红军中的一些人，继续坚持贯彻执行立三路线，要红军攻打南昌、九江。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这种“左”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经过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这种“左”的错误基本上得到纠正。赣西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在总前委领导下继续得到发展。

第三节湘东地区地方武装的斗争 湘东独立师成立

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为了争夺地盘和更大的统治权，混战连年不断。一九三一年夏，阎锡山、冯玉祥联合李宗仁、张发奎等反对蒋介石，发生了空前规模的混战。从五月开始，阎锡山、冯玉祥所部同蒋介石的部队在豫鲁地区的平汉路、陇海路、津浦路沿线展开大战。六月，李宗仁、张发奎所部由广西进入湖南，一度占领长沙，与站在蒋介石一边的湘军和粤军发生激战。李、张部被击退后，蒋介石调集更大兵力对阎、冯作战。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除留驻必要力量外，也被抽调北上，参加中原大战。这次混战，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百万以上，时间持续半年之久。反动统治阶级内部这种不断的分裂和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同时也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造成了有利于革命和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新形势。

湘赣地区的革命斗争在这种形势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九三三年三月，红五军由赣西地区返回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不久，打下了平江、修水、万载等县城。五月，在赣西南地区活动的红六军来到萍乡地区，打下了萍乡县城，占领了安源。湘东地区的革命斗争这时更是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七月下旬，由红五军发展组成的红三军团乘湖南国民党军主力南下追击李、张联军之机，在平江地区击破敌人的拦阻，一举攻入长沙，占领十天。由闽西进至江西南昌附近的红一军团，得知红三军团从长沙退出并受到湖南国民党军的追击，为了援助红三军团，由江西进到湖南，在浏阳文家市歼敌一个旅，接着会合红三军团，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从八月底开始，红一方面军包围长沙近半月之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主力红军的这些活动，给湘东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以很大鼓舞。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湖南省委为了加强对湘东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湘东特委，以张启龙任书记，并将原属湘鄂赣特委领导的浏阳、万载、宜春和原属西路行委领导的莲花、茶陵、攸县以及安源特区委领导的醴陵、萍乡、株洲等县划归湘东特委领导，建立湘东革命根据地。八月一日，中共湖南省委将上述决定报告了中共中央。

原属中共湘鄂赣特委领导的浏阳、万载和宜春等县，早就建立了工农革命武装和小块根据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浏阳及其附近各县农民自卫军就有了很大力量。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并撒播了革命的种子。一九二八年春，浏阳东乡的革命群众在金狮冲成立了浏东赤卫队。一九二九年十月，在红军帮助下，以大光洞和萤火洞为中心，建立了浏阳第一区工农兵政府。原在粤汉铁路长岳段任工人纠察队队长的王震带领近二十名党员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团体骨干，于一九二九年六、七月间从武汉返回家乡浏北，先后成立湘鄂赣边第十八、十九两区委。一九二九年底，两区委利用从地主家夺得的四支枪，以粤汉铁路、安源工人纠察队队员和参加过北伐战争、秋收起义、南昌起义的战士为骨干正式成立了区联队（游击队）。一九三二年二月旧历年关，区联队举行年关暴动，打开有百多名靖卫团守卫的北盛仓，缴枪十一支。三月十八日，中共浏阳县委根据湘鄂赣特委的指示，举行了全县起义。这次起义，使浏北的革命形势进一步得到发展，北乡的区、乡工农兵政权都建立起来。革命武装也有相当的发展，北乡的区联队扩编成浏阳游击第一支队。与此同时，浏阳东乡的赤卫队扩编成浏阳游

击第三支队。四月，浏阳县委在东乡的狮子山庙内召开全县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接着，便在浏东、浏北一些比较巩固的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分田斗争。一九三一年七月，主力红军第一次打长沙时，平浏等县都组织了庞大的农民赤卫军；协助主力红军作战，仅浏阳一县就组成六个赤卫师。浏阳游击队也前往参战。浏阳游击第一支队，在八月初退出长沙回师浏阳的途中，于焦溪岭击溃浏阳挨户团，缴枪三十余支。这时，浏阳第一支队已发展到三百余人，一百余支枪。在此期间，万载的黄茅地区和宜春的慈化地区的革命斗争和地方武装，也都有所发展。

划归中共湘东特委领导的莲花、茶陵和攸县，原是西路地区的一部分。这时的莲花赤卫大队和永新、宁冈等县的赤卫大队一样，是编组红六军、红二十军后重新发展起来的。茶陵的地方武装在一九三一年春再次组成赤卫大队，在县委领导下活动于茶陵县城周围，发动群众，袭扰敌人。一九三一年五月二日，茶陵赤卫大队冒雨奔袭由茶陵进到严塘的敌挨户团一个中队，将其大部消灭，缴枪三十余支。并乘胜于九日攻占高陇，消灭挨户团一部，缴枪十多支，将茶陵革命政权的地域推广到洣水东岸。八月，为配合主力红军再次进攻长沙，茶陵赤卫大队又会同莲花和永新赤卫大队攻打茶陵县城，将茶陵、攸县、耒阳、安仁和衡阳五县挨户团联防部队大部消灭，缴枪二百余支，占领了县城。这次战斗的胜利，使茶陵县的革命政权扩展到全县，茶陵赤卫大队也得到了发展，扩编为游击第二纵队。在此期间，邻近莲花的攸县部分地区革命力量也有了发展。

醴陵和萍乡大部分地区，原属中共安源特区委领导。大革命失败后，这一带革命群众的武装斗争虽然经过多次起伏，但革命力量始终存在，醴陵游击队活动在醴陵、萍乡一带。一九三一年五月，红六军攻占安源，安源煤矿工人在红军的帮助下组织了工人武装纠察队。红六军转移后，这支工人武装转移到醴陵的农村地区，同那里的革命力量会合，共同进行斗争。湘东革命根据地就是在上述基础上建立的。中共湘东特委成立后，湘东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在特委的领导下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三一年九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转向江西行动。在转移途中，连克株洲、醴陵、攸县、萍乡等县城和安源工矿区。红一方面军东进经过醴陵时，考虑到主力红军东进后，敌人必将向湘东革命根据地进攻，毛泽东以总前委名义写信，责成袁德生、谭思聪、张启龙、王震，负责集中部分地方武装，编组成一支半地方性的主力红军，命名为湘东独立师，以保卫和发展湘东革命根据地，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在此之前，中共湖南省委曾提出集中湘东各县部分赤卫队编组一个独立团。湘东特委遵照总前委的指示，加紧了独立师的组建工作。

一九三一年十月，湘东独立师在萍乡县的大安里正式编成，刘沛云为师长，茶陵县委书记谭思聪为政治委员兼师委书记，马赤为师参谋长，王震为师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团。浏阳游击第一支队为基础，连同浏阳游击第三支队、万载游击队编为第一团，团长张维，政治委员田可平；茶陵游击第二纵队为基础，连同宜（春）萍（乡）游击队、醴陵游击队编为第三团，团长谭家述，王震兼政治委员；安源工人纠察队编为师部特务连。各团直辖四个连，全师约八百余人，近五百支枪。

独立师成立不久，因谭思聪抵制立三路线，被撤销师党委书记职务，由王震担任师党委书记，又因王震对立三路线强攻萍乡计划执行不力，其师党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职旋即被免。

湘东独立师是仿照红一方面军的组织制度建成的。在连队建立了党的支部，师、团成立了党的委员会和政治机关，实行了政治委员制度，并且努力遵照古田会议确立的建军原则来建设部队。当时，虽然武器装备较差，但因为它是一支人民的革命武装，所以，有着坚强的战斗力。

湘东独立师成立的第二天，就在萍乡县的新店，全歼由芦溪来犯的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一个营，缴枪二百余支。不久，又在南坑击退国民党军第十九师五十七旅的一个团，歼其一部。

总前委和毛泽东对湘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十分关心。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峡江给湘东特委写信，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明确指出了在土地和资本问题上应采取的正确政策。关于政治形势，信中说：“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并强调指出：“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进攻革命”。关于对土地和资本的具体政策，信中说：“对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彻底的平均分配，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对于资本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只）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反革命和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则只能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但是，这封信对湘东特委的工作实际上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经过中共三中全会，立三路线已经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得到纠正，但是尚未传达到湘东地区。以石青为书记的湘东特委（张启龙这时已调离），仍然依据立三路线的计划，组织了湘东南起义，提出：“战争紧急总动员，实行湘东南起义，打到南昌，直下九江，会师武汉，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任务；把党、青年团、政府和群众组织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领导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把湘东特委改为湘东行动委员会（简称湘东行委）。把根据地内基础较好地区的革命群众，按军队体制编为纵队、支队、大队、小队，仅莲花一县就编了五个纵队，分向茶陵、攸县、醴陵、萍乡等县出击，以策应当地群众的起义。

湘东独立师根据湘东行动委员会的指示，首先向萍乡出击。因萍乡守敌力量比较强大，攻城未成，于是转向攸县方向进攻。在攸县老漕泊歼敌一个挨户团，接着南下攻克茶陵、安仁两县城，歼敌两个保安团，然后回师攻打攸县城。守备攸县城的国民党军第十九师五十五旅一个多营和攸县保安团凭借坚固工事防守，且有洣水、攸水阻隔，湘东独立师久攻不下，又向北去打醴陵。十一月二十五日进到攸县的皇图岭附近时，发现醴陵、攸县、衡山三县保安团和皇图岭守望队共七百余人，据守皇图岭及其周围的麻子坡、郭家山、梁子坳、马拦前南山等高地，企图阻止红军向北行动。湘东独立师查明敌情后，于第二天清晨在革命群众配合下以第三团向皇图岭攻击，第一团向皇图岭以南和东南一线高地攻击，经过四个小时战斗，将敌全部歼灭。第二天，当湘东独立师准备继续北上进攻醴陵时，国民党军新三十一师突然赶到皇图岭北侧发起进攻。在强大敌人的压力下，湘东独立师遂停止了策应湘东南起义的行动，退回湘东革命根据地的莲花地区。

湘东南起义，组织和动员了群众，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除武装斗争之外，根据地的各项经常工作陷于停顿，且过早地暴露了革命力量，给湘东地区以后的革命斗争增加了一定的困难。

第二章 配合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 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

第一节 配合红一方面军粉碎 第一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十月，在土地革命战争深入发展的形势下，全国革命根据地增加到十余块，红军主力部队已发展到十多个军七万余人，地方武装三万余人。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即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活动的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四万人。革命力量的发展严重地威胁着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蒋介石在取得对军阀阎锡山、冯玉祥的战争胜利之后，集中力量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企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红军，并把进攻重点置于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

十一月上旬，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次“围剿”开始。正在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进行群众工作的红一方面军，在总前委领导下，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主动向赣江以东的崇仁、宜黄、永丰、新淦之间地区，继而向根据地中部的东固、龙冈地区转移。十一月下旬，蒋介石决定增调兵力，重新部署进攻。为此，命令在武汉地区休整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

师）迅速经萍乡、莲花、永新至万安、泰和地段，东渡赣江，向兴国及其附近集结，参加对红一方面军作战。这样，国民党军预定参加对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围剿”的兵力，总数已达十一个师又两个旅，共十万余人。

湘东革命根据地和西路地区互相连接，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翼侧。十一月二十四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代表总前委给赣西行委和湘东特委（行委）发出指示信，通报了第十九路军的调动情况，并明确指出两个根据地在配合反“围剿”中的斗争方针和任务。指示信说：“报载六十师三团从鄂南开动完毕，六十一师继续开拔，从遂川、莲花方面进攻赣西”，“敌人一到永新、安福、泰和、吉安等地，赣西行委就要指导各地群众，实行牵制扰敌，同时对进到吉安之敌，要想尽方法去牵制他，务使蒋、蔡、罗、李四师

不能渡过河东”。并指出赣西行委对于湘东特委和周围其他地区，“亦不能在此紧急时候，断然划分区域不加指导”。

根据总前委的上述指示，湘东和西路地区军民为配合红一方面军反“围剿”作战，对过境的第十九路军进行了坚决而广泛的阻击战。湘东独立师得悉第十九路军抵达萍乡境内，即从莲花地区北上，以灵活的游击战迎击敌人。湘东行委和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也紧急动员起来，领导广大群众在第十九路军必经的道路上，掀起了大规模的破路活动，拆除桥梁，挖断隘路，设置各种障碍以迟滞其行动；同时进行坚壁清野，凡是敌人能够利用的各种物资都隐藏起来，连吃饭使用的碗、筷都沉入了水塘；妇女、儿童和老弱群众

蒋、蔡指蒋光鼐、蔡廷锴，蒋、蔡两师指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的第六十、第六十一师，但实际上，蒋光鼐当时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任第六十师师长，戴戟任第六十一师师长。罗，指罗霖，罗师指第七十七师；李，指李觉，李师指第十九师。

都有组织地疏散隐蔽到深山里；赤卫军、少先队都动员起来，配合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作战。

十二月初，第十九路军从萍乡地区进入莲花境内。莲花地方武装在模范少先队配合下，于城北梅州地区，以突然袭击的行动，将行进中的敌第六十一师辎重部队击溃，活捉敌营长以下官兵三十余人，缴获弹药四十箱，骡马二十余匹。接着，湘东独立师又在莲花县的蓉山口截击敌行军纵队，歼其一部。十二月十二日，第六十师向永新前进，湘东独立师在千余革命群众配合下，在永新县城以西凭借有利地形，突然袭击敌先头部队，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之后，湘东独立师又继续尾击敌人，于永新县的莲花坪地区歼灭其后卫一部。与此同时，赣西行委领导西路地区广大群众和地方武装，也展开了积极的作战行动，以小部队分散游击的办法，从正面拦阻敌人。两个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积极配合，东西呼应，再加上赤卫军、少先队和广大群众昼夜不停地沿途袭扰，使第十九路军遭受极大困难，行动甚为迟缓。当第十九路军一部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到达指定集结地——兴国地区时，红一方面军已经歼灭了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以及第五十师的一个多旅，活捉了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粉碎了第一次“围剿”。

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罗霖部）在吉安地区，第十九师（李觉部）在袁水流域，由于湘东和西路地区军民的频繁袭扰，在第一次“围剿”期间，始终不得不停留在这些地区，湘东和西路地区军民完成了总前委赋予的牵制任务。

一九三一年一月初，湖南国民党军为解除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红军对长沙的威胁，集中第十五、第十六和新三十二等师，向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进攻。在湘东地区只配备了第十九师的三个团（第一一、第一一二、第一一四团）及当地反动地主武装，分散驻守于酃县、茶陵、攸县和醴陵四县。在广大湘南地区，兵力更为薄弱。湘东行委根据这种情况，决定湘东独立师挺进湘南，开展群众工作，筹粮筹款，相机迎接由广西北上的红七军，并配合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红七军本来在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一九三一年十月，根据中共中央六月十六日指示信，“坚决的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向着广州的西、北江发展”，离开右江根据地远征。这一冒险行动，不仅丧失了右江根据地，而且使红七军遭受严重损失。在危难之际，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红七军领导人，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改变原定计划，率领部队到江西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湘东独立师接受任务后，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作战方针，首先向西佯攻攸县，诱使茶陵敌人北援攸县，然后南下，于一月二十九日出敌不意在茶陵的严塘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五十七旅一一四团一个营的大部，第二日又袭占了酃县城，全歼守敌一个保安团。湖南国民党军领导人何键一面急令湘南警备司令段珩指挥驻茶陵、安仁地区的第五十六旅一一二团及邻近各县保安团、挨户团等驰往资兴、永兴各县严密防堵，一面命令第五十七旅旅长陶柳指挥第一一四团和第五十五旅一一一团跟踪“追剿”，企图将湘东独立师歼灭于湘南地区。独立师巧妙地甩开了尾追的敌人，并乘防堵之敌尚未赶到的有利时机，于二月三日在资兴县的彭公庙将县保安团击溃，占领了资兴县城，六日又击溃永兴挨户团，占领了永兴。

湘东独立师本拟在湘南地区发动群众，展开工作，并联络红七军。但这

时，追堵的敌人都已赶到，并开始反扑。同时，也得不到红七军的消息。湘东独立师遂决定放弃原定计划，避开茶陵、酃县间的敌人防堵阵地，沿茶陵、安仁两县边界北返。二月七日撤离永兴时，遭敌袭击，师政治部主任田可平牺牲。湘东独立师于茶陵县的界首击破湘敌两个团的防堵，二月上旬，回到了莲花县境内。

湘东独立师在湘南行动中，打击了敌人的反动统治，歼灭了一部分敌军和地方武装，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广大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情绪，同时使部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二月中旬，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议和中共中央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会议精神传达到湘东地区。湘东行委认识到立三路线的危害，明确了组织湘东南起义是不对的，于是取消了领导起义的行动委员会，恢复了各级党的组织，原湘东行动委员会改为湘东南特委。由于情况的变化，此时湘东南特委管辖的范围，事实上主要为株萍路和袁水以南地区的原湘东特委所属地区，株萍路和袁水以北地区事实上仍属湘鄂赣特委领导。

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湘东独立师在莲花进行了整训。在此期间，湘东南特委抽调莲花、萍乡、攸县和茶陵等县游击队各一部组成了湘东独立师第二团，团长彭年，政治委员谢国瑜，并将湘东独立师改名为湘东南独立师，全师辖三个团共一千五百余人。

第二节 会合红七军配合红一方面军 粉碎第二次“围剿”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积极调集兵力，准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国民党军第五路军为此经萍乡、宜春兼程前进，预定于一九三一年三月上旬进到永丰、吉水地区，参加对红一方面军作战。这时，红七军已进到湘粤边境地区，正夺路北进。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苏区中央局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央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统一领导各苏区的工作。湘东南根据地和西路地区的工作，从此便由苏区中央局领导。

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作战，湘东南独立师决定以主力向株（洲）萍（乡）铁路和袁水流域出击，迟滞第五路军的东进；以一部兵力（第三团）由王震带领到湘南迎接红七军。

一九三一年三月，湘东南独立师第一、二两团在师长刘沛云、政治委员谭思聪率领下到达萍乡、宜春一带时，正遇国民党军第五路军过境。湘东南独立师在当地党和地方武装密切配合下，集中一定兵力，利用有利地形，在敌前进道路上节节阻击，同时以部分兵力，分散在敌行进纵队的侧方，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袭扰敌人，使第五路军行动异常迟缓，直到三月下旬才到达指定位置。这样，就给红一方面军准备反“围剿”争取了一定的时间。

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挺进湘南之前，红七军在粤北乐昌强渡武水时被敌截为两段。渡过武水的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八团一部，由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直向赣南前进。被阻于武水以西的军直属队和第五十八团另一部整编为第五十八团，由军长张云逸率领，在地方党的帮助下，以后也顺利地渡过了武水。第五十八团渡过武水后，即迅速隐蔽地向湘赣边地区前进，三月九日攻占酃县城。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这时已进到酃县附近。三月十四日，在酃县的十都圩附近，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与红七军第五十八团胜利会合。两军会合后，决定迅速返回湘东南根据地，准备配合红一方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

湖南国民党军为了围歼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和红七军第五十八团于酃县地区，急忙调集新三十一师的独一旅两个团和第十九师的一个团，以及茶陵、酃县挨户团，在茶陵县的湖口圩和沔渡之间防堵红军北返。同时，令湘南警备司令段珩率领两个团和当地反动地主武装进行追击。红军识破敌人阴谋，以神速动作，进到茶陵县的浣溪渡西渡洙水，向茶陵县城方向佯动，调动了防堵的敌人回援茶陵。红军于是乘机东渡洙水，进入根据地的茶陵尧水东北地区，打算继续向高陇前进。回援茶陵的敌人发现红军东进，赶忙分路追来，其中由第十九师的一个团及茶陵、攸县、安仁三个保安团各一部组成的一路，已进到茶陵县的严塘及其东北地区，并将绕过尧水，向高陇对红军实施追击。得知这个情况后，红军决定在高陇和严塘之间，选择有利地形，歼灭敌人于运动中。

二十四日清晨，红军返回到李家村、北岸和石阜陂地区时，敌先头部队已进到垅上。红军即由现地展开，红七军第五十八团抢占坑上通高陇大道东侧的前山和花棚里一线高地，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由北岸绕过南岸抢占大道西侧的鸛鹤岭。这时，敌人已抢占笔架山东侧鞍部和将军山，并以一部兵力向鸛鹤岭前进。第五十八团首先以一个连由当地赤卫队员领路，经将军山东

南坡的丛林隐蔽前进，从敌人侧后突然发起冲击，一举突入将军山敌人阵地。第三团也击溃了向鹧鸪岭前进的敌人，趁势向将军山突击，协同第五十八团主力消灭了将军山的敌人。与此同时，第五十八团以两个连利用丛林隐蔽，沿马王山东麓向笔架山迂回，顺利地消灭了笔架山东侧鞍部的敌人。这时，进到封垅口和垅上之间的敌后续部队，企图上笔架山建立阵地，阻止红军发展。笔架山北坡，不仅山势陡峭，而且树木茂密、荆葛交缠，不易攀登。敌人刚爬到山腰，攻占将军山的部队即以猛烈的火力射击敌人，主力则迅速插到封垅口以西，切断了敌人的退路。迂回部队也从笔架山东侧鞍部沿北坡展开，侧击敌人。在红军猛烈突击下，敌伤亡很大，纷纷溃退，夺路向严塘逃窜，红军俘敌团长陈汉雄以下一百余人。

这次战斗中，茶陵赤卫队在敌人侧后积极活动，当地群众为红军带路、烧水、做饭、照顾伤员，并积极捕捉敌人散兵，对保证战斗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

将军山战斗后，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和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回到莲花。这时，湘东南独立师师部和第一、第二团也回到莲花，师长刘沛云调走，由李天柱继任。湘东南根据地的党、政府和人民群众，对于将军山战斗的胜利和红七军第五十八团的到来非常高兴，举行了欢迎大会，热情慰问，踊跃当兵，七八百名青壮年补入红七军，并帮助解决了服装，使红七军部队得到了很好的休整，并增强了战斗力。红七军派干部、送武器给湘东南独立师，两支部队相互团结，亲如手足。

一九三一年四月初，蒋介石集中二十万兵力，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开始第二次“围剿”。同时以一部兵力对中央

苏区周围地区实施“清剿”。其对赣江以西地区的“清剿”部署是：第七十七师和第四十七师的一个旅从吉安、泰和、万安一线向赣西南地区进攻；第五十二师依托清江、峡江、安福等城，向赣西南的北路地区（即北路分委领导的地区）进攻；第十八师五十四旅配置在宜春、分宜一线，担任袁水南北地区的“清剿”任务；第十二师三十四旅和第十九路军的一个团分驻赣县及其周围地区，“清剿”赣南根据地；湖南国民党军新三十一师则由西面进攻湘东南革命根据地。

在国民党军“围剿”开始以前，红一方面军总部曾指示湘东南独立师和地方武装，在完成阻击敌第五路军任务后，即与西路地区和遂川、万安、泰和地区的地方武装密切配合，监视赣江之敌，并积极向吉安行动，钳制敌人。湘东南特委根据当面敌情和红一方面军总部指示的精神，决定湘东南独立师和红七军第五十八团联合行动，在赣江以西广大地区，展开广泛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坚决粉碎当面敌人的“清剿”，并积极钳制赣江沿岸的敌人，以配合红一方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

湘东南独立师和红七军第五十八团进入西路地区后，即与在西路地区坚持斗争的红二十军会合，组成河西临时总指挥部，张云逸为总指挥，红二十军政治委员曾炳春兼任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同时组成中共河西临时总前委，滕代远任书记，统一指挥三支部队的行动。当时红二十军辖两个团，在西路地区活动的为第一七五团，其另一个团（第一七二团）在北路地区活动。这

滕代远是红三军团政治委员。1931年春，被苏区中央局派往湘鄂赣苏区执行临时任务，返回途中，因敌人对中央苏区正进行第二次“围剿”，赣江交通受阻，暂时停留在西路地区。

时，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已向西路地区发起进攻，并先后占领了吉安县的永阳、举州、车陂和敖城等地，逼近永新县境。河西临时总指挥部根据当时情况，决定向第七十七师侧后突击，首先歼灭永阳守敌，然后向吉安方向发展进攻，威胁敌军后方，切断敌军赣江交通。

四月四日，红军全力围攻永阳镇第七十七师第二三旅，由湘东南独立师和红二十军第一七五团从东、北两个方向突击敌人，红七军第五十八团为预备队。进攻发起后，湘东南独立师一举突破敌外围阵地冲入镇内。这时，敌倚仗优势火力，凭借民房，拼命抵抗，阻止红军发展，同时集中主力向第一七五团疯狂反扑，一度迫使第一七五团后退，给红军的进攻造成很大困难。在这紧急时刻，担任预备队的第五十八团投入战斗，首先击退了敌人的反扑，接着与湘东南独立师协同作战，将敌全部击溃，收复了永阳镇。

永阳战斗后，查明了吉安城及其附近敌驻有重兵，同时，得悉红七军主力由李明瑞、许卓率领正经遂川北进，遂改变计划南下接应，不久，与红七军主力在永新县的天河会合。

会合红七军主力后，河西临时总前委和临时总指挥部决定，几支红军一起北出安福地区，寻找有利战机，继续打击河西之敌，配合红一方面军作战。这时，河西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改由李明瑞担任。四月十三日，于安福县蒙岗岭，击溃了由安福城出扰的敌人一个团，乘胜将安福城包围。敌人紧闭城门固守不出，等待救援。红军虽然在兵力上占优势，但由于城墙坚固不易强攻。于是，河西临时总指挥部决定，对安福城实施佯攻，吸引驻在阜田的敌第五十二师一五四旅前来救援，然后诱敌至预定作战地区，集中力量歼灭之。十四日拂晓，红军向安福县城发起攻击，第五十二师一五四旅果然从阜田来援，红军主动后撤，预伏于安福西南的廖塘桥、古田地区，十五日，第一五四旅跟踪追来。当进至预定作战地区时，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和红二十军第一七五团，立即以猛烈火力从正面阻击，红七军第五十五团和湘东南独立师从左翼向敌后迂回。当迂回部队进到指定地区，正面阻击部队便立即开始出击。敌人腹背受到攻击，乱作一团，狼狈向东溃退。红军士气高昂，在辽阔的田坝中合围敌人，激战至黄昏，全歼第一五四旅的一个团，毙、俘敌八百余人，缴枪数百支。接着，转移至分宜、宜春地区打击敌人。

湘东南独立师和红七军等部队在统一指挥下，并肩作战，给了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和第五十二师以重大打击，破坏了敌人的“清剿”计划，牵制了河西（赣江以西）的敌人，有力地配合了红一方面军的作战。五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开始反攻，十五天内横扫七百里，五战五捷，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赣江以西的国民党军，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纷纷紧缩阵地转入守势。此时，湘东南的茶陵、攸县和酃县等地国民党军兵力比较薄弱。河西临时总指挥部遂决定留第一七五团于西路地区活动，湘东南独立师和红七军乘反“围剿”胜利的巨大影响，向湘东南地区的敌人发动进攻，以求扩大根据地，并使部队得到补充。六月十日，红军于茶陵地区击破茶陵、安仁等县九个挨户团的联防；歼其两个团，乘胜占领茶陵城。湖南国民党军急调第十五师第四十四旅、新三十一师第三旅从株洲、醴陵前来。红军以一部兵力活动于茶陵县的黄石铺地区，诱敌先头部队第四十四旅向茶陵城，主力则经茶陵县的界首墟西进，于十三日进占安仁，当第四十四旅和第三旅向安仁扑来时，红军间道北上，于十四日占领攸县，接着连夜南下，十五日再占茶陵，十六日克

酃县。国民党军在红军忽而北上，忽而南下，避实击虚的神速行动下，疲师失地，莫知所措，不得不停止于安仁、攸县地区，请求增兵。何键又抽调第十五师、第十九师和新三十一师各一部，加强攸县、安仁、资兴和永兴等城守备，限制红军活动；同时令酃县、宜章、汝城各县反动地主武装，协助第四十四旅和新三十一师第三旅进攻。红军鉴于敌人兵力增多，乃主动放弃酃县，返回莲花地区，胜利地结束了湘东南战役。

湘东南行动结束后，红七军和红二十军（不含第一七五团）先后奉命调往中央苏区。红七军为了帮助湘东南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建设，留下了教导队（当时名河西教导队）和许多优秀干部。红七军在湘赣边地区三个多月的艰苦斗争中，行动积极，英勇顽强，对保卫根据地和配合红一方面军作战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节 湘赣省委成立配合红一方面军 粉碎第三次“围剿”

湘东南革命根据地和赣江以西的西路、北路、南路地区，经过粉碎国民党军第一、第二次“围剿”的斗争，革命形势有了很大发展。这几个地区，在战略上同处于中央苏区的翼侧，在反“围剿”中，担负着配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

作战的共同任务。为了在行动上更加协调和完全统一，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以湘东南革命根据地和西路革命根据地为基础，将湘东南、湘南两特委和赣西南的西路、南路、北路三个分委所管辖的区域合并成立湘赣省，建立湘赣革命根据地（湘赣苏区），并成立中国共产党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统一领导这个地区的革命斗争。一九三一年七月底，王首道、甘泗淇、张启龙等奉苏区中央局命令来到永新，召集湘东南特委、西路分委举行联席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关于成立湘赣省委等决定。八月一日，中共湘赣省临时省委和省苏维埃临时政府组成，以王首道为临时省委书记，袁德生为省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十月八日至十五日，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莲花县花塘村召开，选举王首道、林瑞笙、甘泗淇、张启龙、袁德生、刘其凡、李朴、李孟弼、王震、刘锋、罗启厚等十一人为省委委员，以王首道为书记，正式成立湘赣省委。省委下设：北路（新余、分宜、清江、峡江和宜春五县），南路（上犹、崇义、万安、信丰和大庾五县），湘南（耒阳、安仁和郴县三县）三个特委，直辖永新、安福、吉安、莲花、茶陵、萍乡、攸县和酃县等八个县委以及遂川、宁冈两个临时县委。全省共有区委五十个，支部六百个，党员两万余人。随后又召开了湘赣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袁德生任主席。

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成立的时候，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已经开始。

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趁中央红军苦战后未得休整和兵力分散之机，迅速调集三十万人的兵力，自任总司令，对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蒋介石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企图一举击破红军主力，压迫于赣江而消灭之。在湘赣苏区周围，使用七个师约六万余人的兵力配合行动。其部署是：第四十三、第七十七、第二十八师和第十二师三十四旅放在赣江沿岸的安福、吉安、泰和、万安、遂川和赣县一带，第十八师在袁水的新余、分宜和宜春地区，湘军主力第十九、第六十二和第六十三等师（新三十一师改为第六十二师，新三十二师改为第六十三师）布置在资兴、酃县、茶陵、安仁、攸县和萍乡等地。国民党军企图首先用封锁的办法来限制湘赣红军策应中央红军的作战，并相机以机动部队突袭和侵占湘赣苏区中心区域，陷红军于不利地位，准备在进攻中央红军得手后，再增添兵力围歼湘赣红军。

湘赣临时省委一成立，就领导全区军民立即投入了配合中央红军反对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斗争。为了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决定将原红二十军的第一七五团编入湘东南独立师，并将湘东南独立师改名为独立第一师，将西路地区的独立团改为独立第七团，由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统一指挥。同时积极整理地方武装，设法增强其战斗力，对敌展开作战。遵照中共中央“以主力向东南发展”的指示，八月间，独立第一师进至遂川地区，打击反动地主武

装，并寻求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作战，以求通过胜利的战斗发展和巩固遂（川）酃（县）宁（冈）苏区，进而与上犹、崇义苏区连系起来，使湘赣苏区成为中央苏区西侧的坚强屏障。

正当独立第一师在遂川地区积极展开活动时，九月十六日，国民党军第四十三师乘机以一个旅从安福侵占了省委所在地永新城。独立第一师即奉命北返。虽然攻占永新的敌人只有一个旅，且比较孤立，但湘赣红军这时在兵力和技术装备上，都还没有具备强攻的条件，因此决定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对侵占永新的敌人采取封锁围困，迫使敌人退走，以求在追击中歼其一部的作战方针。独立第一师在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的密切配合下，逐步把敌人压缩在城内，断绝敌人补给线，不让敌人外出抢粮。白天组织枪法好的人打冷枪，夜里则在城垣四外鸣枪、放炮（土炮、纸炮）和吹号袭扰敌人。同时，以抵近喊话和放风筝等方式散发传单，对敌展开政治攻势，动摇瓦解敌人。国民党军在根据地广大军民的围困和打击下，外无援兵，内无粮草，饥饿、恐慌和疲劳与日俱增，士气颓丧，最后不得不弃城突围，向安福逃窜。独立第一师和独立第七团跟踪追击，在安福独立营的配合下，于金田附近的东溪消灭了部分敌人。

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重兵包围的严重情况下，运用隐蔽、佯动、声东击西等手段，造成敌人的错觉，灵活机动地往返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避强击弱，速战速决，接连取得莲塘、良村、黄陂等战斗的胜利，缴枪逾万。最后，在国民党军不得不实行总退却时，又取得在老营盘歼敌一个旅、方石岭歼敌一个师的胜利，到九月十五日，完全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

九月二十八日夜，独立第一师在安福县的州湖地区得到吉安县委关于敌人一个挨户团进占永阳的报告，便连夜出发前往永阳，会同独立第七团、安福独立营、河西教导队、当地游击队和暂留湘赣苏区活动的红三军团特务营消灭这股敌人。二十九日上午，独立第一师进到吉安县的田东地区，经过紧急会商和战斗动员，即向敌展开进攻。独立第一师经东头院、西陇消灭西溪敌人排哨，从西面向永阳攻击；独立第七团经大田消灭新塘的排哨，从中间突入永阳；安福独立营经西坑、郭瓦首先控制中州徒涉场，然后从东面进攻永阳；红三军团特务营和地方游击队，首先占领陇陂市，进迫胡家，阻止敌人涉禾水南逃；河西教导队为预备队。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才发现永阳之敌并非挨户团，而系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的一个团，在永阳以南五里的南江口还有该师的另两个团。但该师曾在第二次“围剿”中遭到中央红军的歼灭性打击，人员多系刚补的新兵，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且占永阳不久，并无坚固工事依托，遂决定继续打下去。经调整部署后进行猛攻，同时，以一支精干小分队直插街东河边，破坏浮桥，切断敌人退路。敌见退路已断，十分恐慌，先后撤出阵地，企图从中州徒涉禾水向南逃跑。但出街不远，即被安福独立营打回。继而拥向西跑，到胡家、东头院，又被红三军团特务营和地方群众武装顶了回去。这时，敌人一面用机枪向红军和游击队猛烈射击，一面向镇内退却，企图依托房屋和简易工事负隅顽抗。独立第一师主力迅速突入镇内，与敌人展开激战。敌人在红军三面攻击下，纷纷缴械投降。一部分敌人不知道浮桥已被破坏，拥向河边，少数掉进河里淹死，其余均被活捉。整个战斗，仅用了两个多小时。敌第二十八师一个团全部被歼。红军俘敌团长毕卫汉以下近千人，缴枪八百余支。

永阳镇战斗，行动快，时间短，收获大。虽然战斗规模不算大，但却是

湘赣苏区红军游击性运动战的一个典型战例。这次战斗，打击了进攻湘赣苏区的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进一步巩固了红色区域。

永阳战斗后，独立第一师返回永新县城休整。这时，接到茶陵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报告，得知湖南国民党军第六十三师（陈光中部）一八八旅进攻茶陵苏区，并占领了洮水。根据中共湘赣省委指示，独立第一师迅即向茶陵出击。十月二十一日，部队到达洮水附近，与茶陵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取得联系，了解了敌情。这时，夜幕已经降临，决定乘夜色昏暗，由当地赤卫队员带路，向洮水秘密接近，于拂晓开始攻击。二十二日拂晓前，独立第一师各部队进到进攻出发位置。此时，敌人正在沉睡。独立第一师乘机发起攻击，敌人不知虚实，非常慌乱。独立第一师勇猛冲杀，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将第六十三师的第一八八旅击溃，俘二百多人，收复了洮水。至此，围攻湘赣苏区的国民党军先后撤退。

十一月初，独立第一师奉命护送以袁德生、王震为首的湘赣省代表团东渡赣江，前往江西瑞金出席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把代表团护送过河以后，根据省委的指示进到赣南，在南路特委领导的上犹和崇义等地开展工作。

上犹和崇义地区，早就有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四军路经此地，由毛泽东在这里给地方党布置工作后，这里的革命斗争有了进一步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以上犹和崇义为中心的苏区。独立第一师到达这里以后，先克上犹，继克南康县的塘江，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第十二师三十四旅和当地地主武装。同时，积极配合当地党和政府，深入发动群众，展开土地革命运动，整顿地方武装，派干部、送枪支，组建了赣南独立团。独立第一师在地方党帮助下也得到了补充，部队扩大到二千八百余人，并筹款十万银元，解决了服装与经费的困难。

第四节 军民密切配合，粉碎国民党军 对湘赣苏区的“围剿”

当湘赣苏区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作战还在进行的时候，震撼全国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派兵占领了辽宁省省会沈阳。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迅速沦陷。全国人民立即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救亡运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继续进行内战。但由于对中央红军的“围剿”连遭惨败，在暂时不可能集中更大兵力的情况下，未敢贸然立即对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发动新的大规模“围剿”；便调集兵力向湘赣、湘鄂赣和赣东北等苏区进攻，企图首先剪除中央苏区的翼侧屏障，创造进攻的有利条件，然后集中全力进攻和摧毁中央苏区。

十一月初，国民党军集中十个师连同地主武装共约八万人“围剿”湘赣苏区。第十一、第十四、第四十三、第五十三和第七十七共五个师配置在赣江沿线，第十八师和第五十九师配置在袁水沿岸地区，第六十二师和第六十三师配置在攸县、茶陵地区，第二十八师和第十二师的第三十四旅配置在遂川、万安和赣县地区。国民党军企图以东面的主力部队首先侵占苏区的城镇和交通要道，构筑碉堡，将苏区割裂封锁，然后实行分区“清剿”。

这时，独立第一师正在赣南，帮助上（犹）崇（义）苏区进行发展工作，留在永新、莲花一带基本苏区的只有一些地方武装，力量比较薄弱。

中共湘赣省委查明敌军企图后，连续召开几次党委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布置应敌工作，随后还制定了“关于实行战争总动员，冲破敌人围剿，巩固苏区”的决议。省委明确指出：在目前敌人有计划地进攻湘赣苏区的严重形势下，党的紧急中心任务是实行群众总动员，集中一切力量冲破敌人的围攻。省委并决定由林瑞笙、李朴、冯建元、刘锋、袁任远组成临时前敌委员会（以下简称临时前委），以林瑞笙为书记，统一指挥湘赣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省委还将独立第七团和由湘南游击队改编的红色警卫团组成独立第三师，师长冯建元，政治委员甘泗淇，政治部主任袁任远；下辖两个团，一个直属连。第一团由独立第七团编成，团长罗发桂，政治委员刘锋；第二团由红色警卫团编成，团长侯梯云，政治委员赵克强；全师共八百余人。同时，急调在上犹、塘江一带活动的独立第一师迅速北返，同独立第三师一起对敌展开作战。

十一月中旬，国民党军对湘赣苏区的“围剿”全面展开，第七十七师由吉安经安福进占莲花，第十四师进占永新，第二十八师又占永阳，第六十二师和第六十三师也开始由攸县、茶陵向苏区推进。

中共湘赣省委根据敌人的活动情况，断定敌人“主要的策略是首先集中力量占据县城及交通要道和重要村庄，建筑坚固工事以图死守阵地，经常派出部队到各处骚扰，实行稳打稳扎、逐渐推进的策略；同时实行捕捉革命群众，抢劫谷米粮食，奸淫妇女，大烧大杀的白色恐怖政策；另一方面，欺骗压迫群众组织守望队、义勇队，利用 AB 团及豪绅地主家属富农等通消息，带路搜山捉人”。其目的在彻底摧毁苏区。为了击破敌人的罪恶企图，省委决

见 1931 年 12 月 18 日《中共湘赣省委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

定“我们应敌的根本策略是，坚决执行动员群众的进攻路线，加紧宣传鼓动工作，揭破敌人的欺骗阴谋，坚决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实行四面八方的骚扰敌人，围困敌人，保障乡村政权，巩固作战的后方，灵活运用游击战争，实行各个击破敌人”。

临时前委根据省委指示，积极指挥部队，在群众配合下对敌展开斗争。临时前委鉴于敌军初入根据地，行动弱点尚未暴露，主力红军独立第一师又远在南路地区，决定首先展开广泛的游击活动，袭扰疲惫敌人，给敌人行动造成困难，待主力红军集中后，再寻找有利战机，对敌人实行各个击破。据此，各县地方武装立即深入国民党军驻地附近，广泛展开游击活动。临时前委则率独立第三师进到莲花附近，积极袭扰围困第七十七师，河西教导队掩护省级机关转移到永新县的澧田后，也在永新县城周围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

十二月初，国民党军第十四师一个营伙同永新保安队进犯澧田，妄图摧毁湘赣苏区省级机关。临时前委决定，集中兵力伏击进犯之敌。独立第三师奉命连夜从莲花赶来，会同河西教导队埋伏在澧田以东富家垄地区，并派出永新警卫连及部分群众武装，于富家垄以东六里的洋埠监视敌人。当敌人来攻时，永新警卫连始终保持与敌人接触，节节佯退，诱敌深入。国民党军进入伏击圈后，红军猛扑下去，激战三个小时，将其全部歼灭。当第十四师师长周至柔率主力一部前来增援时，战斗早已结束，湘赣省级机关也安全转移到永新县的黄岗地区。国民党军扑空后，兽性大发，对苏区群众实行血腥镇压，将澧田镇的五千多间房屋全部烧毁。

十二月上旬，独立第一师赶回永新县的文竹，与独立第三师会合。两师会合后，临时前委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首先击破莲花第七十七师，然后再回师永新对付第十四师。

十二月十一日，红军与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二三一旅一个团战于莲花九都；十八日又在浯塘击溃该师一个营。正当红军步步紧逼莲花守敌时，驻守永新的第十四师，由于受苏区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的围困袭扰，同时震惊于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于江西宁都起义，准备从永新向吉安撤退。临时前委闻讯后，即率独立第一、第三两师兼程东进，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赶到永新以北的钱市街，准备在西面的猪婆岭高地伏击该敌。一月三日，国民党军第十四师果然由永新经钱市街撤退。红军原计划打敌后尾，但由于埋伏在固塘的游击队纪律不严，一发现敌先头部队，即开枪射击，暴露了目标，致使第十四师得以及早展开主力，占领钱市街两侧有利地形，布置火力反击。伏击计划遭到破坏后，红军本应迅速撤出战斗，但当时却认为撤退的敌人兵无斗志，决定继续打下去。各师师长、政治委员亲率部队向敌冲锋。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给了敌人很大杀伤，但仍不能扭转战局，最后不得不下决心撤退。在这次战斗中，临时前委书记林瑞笙负伤，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谭思聪、独立第三师第一团政治委员刘锋、湘赣省委委员罗启厚等光荣牺牲。

谭思聪系湖南省茶陵县人，生于一九〇八年，十八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茶陵县游击队的创始人之一，曾跟随毛泽东坚持井冈山斗争。他先后担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常委，赣西南特委委员，湘东特委委员，湘东独立师政治委员等职。他斗争坚决，机智勇敢，在领导茶陵人民和湘赣边人民开展革命斗争中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在钱市街战斗中，他为了掩护红军主力安全撤出战斗，率领部队阻击敌人，在激战中不幸牺牲。年仅

二十四岁。

钱市街战斗后，红军昼夜兼程西进，直逼莲花，寻机消灭莲花地区的第七十七师所部，彻底打破敌人的“围剿”，并恢复被占领的苏区。

一月十日，独三师于莲花的清水、黄陂歼灭了第七十七师两个连；十一日，独一师于莲花九都击溃第七十七师第二三一旅，歼其一部；二十七日，独三师于莲花上、下海潭给予第七十七师一个营以歼灭性打击，俘四十余人，缴枪四十余支，机枪两挺。正当红军积极扫除莲花守敌的外围据点，并进逼莲花城下时，湖南国民党军危宿钟部，在莲花、萍乡地主武装配合下，进至萍乡的新店里。为了解除围攻莲花守敌时的翼侧威胁，三十一日，独一师会同萍乡警卫营、赤少队进攻新店里之敌，经两小时激战，全歼该敌，俘一百四十余人，缴枪五百余支，机枪两挺。接着，一场以主力红军为主体的、有广大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参加的、对莲花守敌的围困战猛烈展开。

经过一个月的围困斗争，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被迫龟缩在莲花城内，后方交通完全断绝，给养十分困难。在苏区军民昼夜袭扰之下，惶恐不安，处境十分狼狈。该师在吃尽苦头之后，不得不于三月二日弃城突围，逃往萍乡。至此，敌人对湘赣苏区的这次“围剿”被粉碎，湘赣苏区被敌占领的地区全部得到恢复。

第五节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根据地建设

中共湘赣省委成立后，在领导全区军民积极对敌作战的同时，展开了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根据地建设和肃反等工作。

在中共湘赣省委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已经通过一九三一年一月举行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条“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在组织上，则错误地认为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并以积极拥护和执行其错误路线的分子“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随后又制定了许多包含有严重“左”倾错误的具体政策。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成立，第三次“左”倾路线继续发展。这条“左”的路线和“左”的政策，对中共湘赣省委的领导工作不能不产生影响。

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查田运动

湘赣苏区的一些地区，虽然经过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一年两次分田，但由于强大敌人的不断进攻，地主阶级的捣乱破坏，群众思想上有顾虑，以及经验不足，使苏区的土地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一九三一年十月，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湘赣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先后召开，作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重新彻底分配土地的决议，以求进一步解决苏区的土地问题。

十月中旬开始了分田运动。重新分配土地的领导机关，是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土地委员会，并由农村中的雇农工会、贫农团协助进行。在这次重新分配土地中，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湘赣省委的决定，特别强调了阶级路线，在步骤上也是首先发动群众划分阶级。一般地仍按人口平均分配，对富农则要求以劳动力为标准。经过四个多月的斗争，永新、莲花全县和吉安、茶陵等县大部分地区，都重新分配了土地。一九三二年夏，在边沿地区和南路、北路以及萍乡、攸县等县的部分地区，也分了土地。由于各地区条件不同，平均每人分得的土地也不等。在分配土地的同时，还没收了地主的房屋、衣物、家具和牲畜，分给了贫雇农。红军及其家属分了好田，实行了红军公田和苏维埃政府公田制度。贫苦的老弱孤寡也分了一份土地。通过这次重新分配土地，使苏区的基本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果实。但是，在这次分配土地中贯彻执行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驱逐豪绅地主家属出苏区”等错误政策，对地主不给以生活出路，对富农打击过重，同时侵犯了中农利益，从而扩大了打击面，过多地树立了敌人。

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红军公田和苏维埃政府公田，是在苏维埃政府控制下的一部分公共土地，由当地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以义务劳动的形式耕种，收获的谷物，作为补助红军给养、救济红军家属、安置残废军人、慰劳红军以及其他公益事业之用。

一九三二年秋，湘赣苏区遵照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指示，展开了查田运动。在查田的具体工作中，又发生了“查三代”、“查五代”的错误，有些地区把一些贫雇农查成中农，把一些中农查成富农，甚至把一些本来属于基本群众和同盟军的人也当成阶级敌人。重新分配土地运动中已经发生了的“左”的错误有了进一步发展。

肃反运动

湘赣临时省委和湘赣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从一九三一年八月起，在苏区党政机关和红军中展开了大规模地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肃清内部反革命分子是革命斗争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中共中央对革命内部隐藏的阶级敌人，作了过分夸大的估计，制定了过“左”的肃反政策。湘赣临时省委和省委，对本地区的干部情况也没有作认真的调查研究，盲目地接受了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错误指示，认为湘赣地区的党、政府和军队中都有反革命“AB团”分子活动；在组织上按照当时中共中央的规定，设立了脱离党委集体领导、脱离群众监督的肃反机关；在案情审理上，又采取了逼、供、信的错误办法，使肃反工作发展到乱捕错杀，不少优秀干部受到错误处理。据不完全统计，到一九三一年底，全省已处决了一千二百一十人，造成党内极为痛心的损失。尤其对与富田事变有牵连的西路地区，错误更为严重。在一个短的时间内，出现了人人自危、相互猜疑的混乱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湘赣省委虽然对这种作法发生过怀疑，并在某些具体措施上有所缓和，但是，在当时中共中央的错误政策下，肃反工作中的错误，没有也不可能得到纠正。一九三二年春，袁德生、王震出席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回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肃反工作的正确指示，苏区中央局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中，也指出了肃反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湘赣苏区在肃反工作上的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才得到暂时的纠正，释放了被关押的六百余人，被错判死刑的酃县县委书记张平化等得到了保护。

一九三二年底，由于各种原因，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又重新搞起来了。一九三三年二月，苏区中央局听了湘赣省委委员刘士杰的口头报告，认为湘赣省委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的错误，决定改组省委，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就搞得更“左”了。这时，湘赣党、政府和军队中的一些领导干部，也被错误地作为肃反对象予以逮捕审讯，有的甚至被杀害。在肃反运动中，湘赣地区被杀害的领导干部有：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省委常委、职工会书记刘其凡，湘赣军区政治部主任于兆龙，红军学校政治委员曾毅之，省委委员李孟弼，新独立一师政治委员陈韶，红八军第二十三师师长杨茂等。

肃反扩大化原因很多，客观上，当时革命根据地处于反革命势力包围中，敌人确实不断派密探、奸细打入革命阵营内部，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革命队伍内不得不时时处于高度警惕中，难免有时就扩大了敌情的严重性。主观上，也是最主要的，首先是中共中央的“左”倾路线和错误肃反政策的影响。其次，省委和肃反领导机关在思想上存在主观主义，在认识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加上逼供信的审讯办法，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严重恶果。肃

反扩大化伤害了许多优秀干部和进步人士，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开展革命竞赛，加强根据地建设

一九三二年春，湘赣省委乘敌人新的“围剿”尚未开始的有利时机，领导全省军民，通过革命竞赛的方式，在许多工作上造成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使根据地建设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扩大红军方面，党和政府通过各种群众团体，运用报刊、集会、演戏、个别访问和新兵回乡串连等方式，向广大群众讲清革命形势和扩大红军的意义，动员大家自觉地积极地参加红军，武装保卫分田果实，保卫工农革命政权。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党和政府又进一步地在各种革命组织间，在县、区、乡、村间，开展扩大红军的竞赛。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拥军优属条例，及时制定和颁布了补充条例，规定：因参军而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其田地由政府组织群众帮助耕种，并免除一切捐税；红军家属买东西可以享受优先和九五折的待遇；全省实行无代价优待红军劳动日和建立红军公田等制度。由于党和政府扩大红军的号召，和及时采取了这些有效措施，掀起了苏区人民的参军热潮，到处出现母送子、妻送郎和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事例。从一九三二年三月到六月的三个月里，就有六千七百四十一人参加了红军。大批有觉悟的工农青年参军，使湘赣苏区的武装力量在短时期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苏区的英雄人民，不仅将自己的亲人送去当红军，并且从物质和精神方面尽一切可能来关怀和帮助自己的子弟兵。他们踊跃地交送红军公粮，做军鞋，经常组织歌舞队、洗衣队和补衣队等到红军部队里进行慰问。红军住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同亲人一样地给红军让房子、借家具，帮助摊铺，烧茶送饭，争着替战士洗补衣裳。扩大红军和拥军优属的群众运动，既从人力方面增强了红军，也从政治方面巩固和鼓舞了红军，并且使红军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加密切了。

在发展生产方面，广大农民在重新分配土地以后，生产积极性进一步高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深耕细作，改良种子，兴修水利，开垦荒田，兴办了石膏、造纸、木材和樟脑等适合当时环境的小型厂矿。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省苏维埃政府积极帮助群众集资开办了各种生产与消费合作社；在边沿地区设立秘密的货物交换所，与白区商人建立了贸易关系，用根据地剩余的工农业产品——竹、木、煤、棉花、猪肉等，换回当时苏区无法生产的药品、食盐、布匹、文化用具等必需品。为了解决食盐的不足，还组织群众熬制硝盐代用。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创办了工农银行，加强了全省的财经领导，并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开展了厉行节约运动。各级党、政机关普遍裁减冗员；少发或不发办公费用；群众团体一律经费自给；任何机关不准请客；禁止用粮蒸酒、熬糖或作米果。机关干部日食两餐，一干一稀；干部不分职位高低，规定每人每日发伙食费三分（但经常不能保证）。

在文化教育方面，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先后创办了工农夜校八百余所，列宁初级小学七百余所，高小五所，女子职业学校三所，妇女半日制学校二百零四所，识字班两千五百余个，剧团三十多个。列宁室、读报组、识字牌、黑板报、演戏团和歌舞队，各乡各村都普遍地建立了起来，深受群众欢迎。与此同时，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还组织群众大

力开展了卫生防疫工作。

在党和政权的建设方面，各级党组织结合中心任务，积极进行了党的发展工作。仅在一九三二年的三月到六月，就发展党员六千四百余人。省委开办了党校，培养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并将大批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表现忠诚勇敢的工农分子提拔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一九三二年夏，省委所属组织进行了调整，南路、湘南两特委，改为河西、湘南两道委，北路特委改为分宜中心县委。省委共辖属两个道委、一个中心县委、一个白区区委（长湘区）和十个县委（永新、莲花、茶陵、吉安、萍乡、安福、宁冈、攸县、酃县、遂川县委）。各级政权机构也都进行了组织调整，并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不良倾向的斗争，健全了各种业务工作和工作制度。雇农工会、妇女会都有了很大发展。反帝大同盟会员发展到十二万人，互济会会员发展到十五万余人。

第三章 湘赣军区和红八军成立配合 中央红军的进攻作战和 粉碎第四次“围剿”

第一节 湘赣军区和红八军成立

湘赣红军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战斗，数量有了很大发展，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到一九三一年底，独立第一师发展到近三千人，枪二千多支；独立第三师八百多人，枪六百多支。各县都组建有独立团或独立营、警卫营（连），有的区、县还另组建有游击队，这些地方武装已发展到五千多人，枪一千五百多支。赤卫军、少先队等群众性武装也有很大发展。湘赣红军及地方武装的发展壮大，迫切需要加强统一领导。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在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先后成立。袁德生、王震在瑞金期间，中革军委讨论了湘赣红军的建设问题，认为湘赣苏区不断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发展较快，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区，而且与中央苏区仅一江之隔，加强统一领导，将能更有效地牵制赣江以西的国民党军队，配合中央红军作战。因此，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湘赣省军区（以下简称湘赣军区），统一指挥各种武装力量。一九三二年初，袁德生、王震等由中央苏区返回湘赣苏区的中心永新县，开始了湘赣军区的组建工作。二月上旬，在永新县城召开了由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三师和群众代表参加的誓师大会。会上，由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王震宣布了中革军委关于成立湘赣军区的命令，并号召广大军民奋勇杀敌，用胜利捷报庆祝军区成立。

当时，军区总指挥部设在永新县城，张启龙任总指挥，甘泗淇任政治委员，李天柱任副总指挥，杨茂任参谋长，于兆龙任政治部主任，徐杰任供给部部长，卫生部部长戴稻生、政治委员邓永文。同时，组织了四个分区指挥部：第一分区指挥部，指挥李天柱（兼），政治委员苏杰，管辖茶陵、攸县、莲花、萍乡四县地方武装；第二分区指挥部，指挥莫文骅，政治委员徐建，管辖新余、峡江、宜春、分宜四县地方武装；第三分区指挥部，指挥刘子奇，政治委员张平化，管辖酃县、宁冈、遂川三县地方武装；第四分区指挥部，指挥刘克云，政治委员肖五仔，管辖上犹、崇义、赣县、南康四县地方武装；永新、安福、吉安三县地方武装直属军区领导。此外，军区还直属有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冯达飞，政治委员李朴，教育长杨茂，政治处主任袁任远。军区直接指挥的战斗部队有红色警卫团、永新独立团、安福独立团、泰和独立团、遂万泰游击队、湘南游击队和醴陵游击队。

二月中旬，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湘赣红军独立第一师和独立第三师在永新县里田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以下简称红八军），全军共两个师约四千人，枪二千八百多支。当时没有设立军的领导机关，而以独立第一师师部兼军部，独立第一师师长李天柱，政治委员王震兼代红八军军长、政治委员，谭家述兼代参谋长，袁任远兼代政治部主任。红八军刚成立时，名义上编入红三军团建制，但因活动范围主要在湘赣苏区内，所以，红八军实际是由中革军委和湘赣军区双重领导。

五月，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决定以茶陵县地方武装为主，从军区

直属队和独立第一师各抽调一部，加上湘南地方武装，合编为新的独立师，谭家述为师长，曾毅之为政治委员，谭牛山为政治部主任。全师共两个团，八百多人，枪五百多支。六月，又在上犹县营前镇组成独立第十二师，以叶长庚为师长，魏恒为政治委员，童山为参谋长。该师刚成立时，只有五百多人，主要是赣南的地方武装和红七军在崇义留下的部分伤病员。组建后，先后在上犹、崇义、南康、赣县等地开展游击战，发动群众，扩充兵员，不久就发展到一千八百多人，编为三个团（即第三十四团、第三十五团、第三十六团）。十月，在上犹鹅形战斗中，由于师政治委员魏恒没有听取第三十五团团团长、代理师长田海清（师长叶长庚患病休养）的意见，指挥部队与数倍于红军的敌人硬拼，致使战斗失利，部队损失五百多人。后来，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向上犹、崇义大举进攻，独立第十二师再次受损失，不得不退出赣南，向北转移，在遂川县与红八军会合。从此，独立第十二师配合红八军作战，归红八军首长指挥。

湘赣军区成立后，根据中共湘赣省委指示，加强了红八军的组织建设和军政训练，使红八军的战斗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为了巩固和发展湘赣苏区，具体规定了各独立团、营和县区游击队等地方武装的战斗任务和配合地方工作发展苏区的方向：永新地方武装应向泰和关背方向发展；宁冈地方武装应努力肃清残匪，并与酃县苏区取得联系；吉安地方武装应向吉安县城逼进，并向泰和方向发展；安福地方武装应向安福县城逼进，同时应向吉安方向发展，并与北路苏区取得联系；北路地方武装应向袁州及沿赣江各县发展；莲花地方武装应向萍西、攸东发展；萍乡地方武装应向宣风、芦溪发展，努力与湘鄂赣苏区连成一片；攸县地方武装应向攸县县城逼进，并努力与茶陵苏区取得联系；茶陵地方武装应努力恢复原有苏区并向西河及十八团发展；酃县地方武装应与茶陵打通；遂川地方武装应与酃县打通，同时积极向遂川县城逼进，并努力与上犹、崇义苏区贯通起来；上犹地方武装应北向遂川，南向赣县、南康发展，求得与信丰苏区联系起来；崇义地方武装应完成全县政权，并向桂东发展。其目的，是要通过地方武装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把北路苏区、上崇苏区和以永新、莲花为中心的基本区连系起来，使湘赣苏区成为连成一片的巩固的苏区。

随着湘赣苏区武装力量的发展，加之战斗频繁基层干部伤亡很大，各部队急需补充大量干部，以支持和扩大武装斗争。为了解决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干部问题，加强和扩大了工农红军学校第四分校（以下简称红军学校），以加速基层干部的培训。这个学校是湘赣省委成立后不久，以原河西教导队为基础组建的。过去，河西教导队招收学员较少，改为红军学校后，军区抽调一些干部，又从地方调进一批干部，充实了领导和师资力量。当时，红军学校主要培训红军和游击队中的连、排干部及班长，每期三百至四百人，学习时间为六个月，分为政治队、步兵大队和特科队，课程有军事课和政治课。省委和军区的领导经常去讲课。红军学校从开办之日起，就严格按照毛泽东在井冈山办教导队的方针和古田会议决议精神治校。以“育人以严，教人以战”闻名于湘赣苏区各部队。在两年多时间里，共开办五期，以千余名学员补充了部队，对加强红军的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发展壮大，需要大量的武器弹药补充和装备部队，仅靠从敌人手里缴获是不够的。于是军区领导决定，以莲花九龙冲修械所、永新赤色修械所和红三军团留在湘赣苏区的修械所为基础，在永新县

建立了一个二百多人的兵工厂，修理各种枪支，制造手榴弹，翻造子弹。几个月后，便可每天制造万发子弹、数千枚手榴弹。由于湘赣苏区几乎全部是农村，修理制造枪支弹药需要的钢材、铜、铁、锡、洋硝等原材料奇缺，兵工厂经常派人翻山越岭，冒着生命危险到白区去购买。一旦被敌人查获，采购员就要惨遭杀害。在物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军区还建立了被服厂，用土布制作红军服装。同时，将北路医院与九龙山红军医院合并，迁往永新黄冈山区，成立了湘赣军区红军后方医院，下设九个休养所，可接收伤病员五六百人。为了让伤病员早日重返前线，医护人员精心护理，在缺乏西药的情况下，采用草药、土方进行治疗。

湘赣军区和红八军的成立，对于湘赣苏区武装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对于巩固和发展湘赣苏区，对于配合中央红军作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节 配合中央红军在赣江、抚河流域的进攻作战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和接着对湘赣苏区发动的“围剿”先后被粉碎后，被迫在较长时间内处于守势。在此期间，先后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坚决要求奋起抗日，曾依附于大资产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也开始改变政治态度。形势对革命运动非常有利。但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的中共中央，过份夸大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否认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否认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并断定中间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继续主张“打倒一切”。在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治纲领的同时，积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把革命的胜利放在夺取中心城市的基点上，要求当时技术装备薄弱的红军，冒险攻打国民党重兵把守或设防坚固的中心城市，企求以此达到所谓“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

在这种“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夺取赣州、吉安、南昌、九江等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把中央苏区和湘赣、湘鄂赣等几个苏区连成一片，争取革命在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首先胜利。一九三二年一月，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坚决攻取赣州，以赣州为中心向北发展。随后，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湘赣省委，“必须在加紧发展苏区的阶级斗争，扩大与巩固苏维埃红军的基础上，积极的发展红军胜利的进攻，消灭敌人新的进攻，争取湘赣区与中央区、湘鄂赣区（连成）一片的苏区，争取赣州、吉安、南昌等中心城市，扩大湘东南苏区”，并指出“这是你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省委必须以真正进攻的路线去执行这些任务，来完成国际及中央所指出的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

中央红军于二月四日开始围攻赣州。

湘赣省委遵照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指示，以湘赣红军主力红八军向南行动，配合中央红军围攻赣州；以地方武装向北即向袁水流域发展，以求与湘鄂赣苏区的斗争取得联系；以群众武装配合群众运动发展湘东南地区的土地革命斗争。

当时，在赣州以北的峡江、吉安、万安一带，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五个师。中央红军围攻赣州战役开始后，这些部队即沿赣江西岸地区南下，援救

见 1932 年 3 月 14 日《中央给湘赣省委的信》。

赣州。红八军进到遂川以北地区后，即以独立第一师在关背地区，独立第三师在藻林地区积极活动，侧击南下增援赣州的敌人。红八军的积极行动，虽然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但由于兵力过少，终未能拖住敌人。中央红军攻打赣州，历时三十三天，不仅城未攻克，反遭很大伤亡，红八军也是“徒劳往返”。

赣州战役后，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决定将中央红军组成东路军和西路军，分别在赣江两岸活动，尔后，“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夺取吉安、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四月初，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的西路军西渡赣江，进入赣南的上犹、崇义地区。

为了配合红三军团在河西地区的作战，红八军奉命继续在遂川以北地区活动。红三军团进入上犹、崇义地区后，粤军即以十二个团的兵力向红三军团发动进攻，蒋军则以两个师驻在遂川向南策应。红三军团击退粤军的进攻以后，在赣江西岸遂万泰地区敌人兵力比较雄厚的情况下，转向湖南的汝城、桂东地区进攻，打算沿湘赣边罗霄山脉的西侧北上，进入湘赣苏区，汇合湘赣苏区的革命力量，进攻吉安等中心城市，完成向北发展的任务。五月十日，红三军团占领桂东，逼进酃县。红八军在遂川以北地区未能展开有力活动，于是返回永新地区，打算西出攸县、茶陵，沿苏区西侧南下，接应红三军团。

六月初，红八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首先向攸县网岭的守敌发起进攻，攸县警卫连为前导，红八军主力由宏市渡过攸水对网岭实施迂回包围。敌人受到前后夹击，败退窜进松林。红军奋勇追击，俘敌二百余人，缴枪一百余支，大部敌人向新市、小集方向逃窜，红军乘胜进攻新市、小集，敌人退据攸县城内。红军攻城未克，回军攸县苏区。

六月下旬，中央红军的东、西路军奉令分别从福建和湘赣边地区向赣南回师，七月上旬，在南雄、水口地区取得击溃粤军十五个团的胜利。在此期间，蒋介石调集兵力，开始了对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却仍然要求中央红军继续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的的进攻作战。中央红军根据当面敌情，两次正确地改变了西渡赣江、北进同敌军主力决战，进而夺取吉安的原定计划，并于八月中旬发起乐安、宜黄战役。

这时，湘赣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共有十个师，其中第十一师、第十四师、第四十三师在吉安、泰和地区，第五十二师在安福地区，第二十八师在遂川地区，第十八师在宜春地区，第六十二师在萍乡地区，第十九师在醴陵地区，第十五师在攸县地区，第六十三师在茶陵、酃县地区。集中在吉安和赣江西岸地区的国民党军，受到中央红军行动的牵制，未敢妄动，而在湘赣苏区西线的湘军第十五师、第六十三师等部，为了策应赣江以东的国民党军，却频频发起进攻，相继占领了攸县的官田和茶陵的湖江等地，并继续向苏区的纵深推进。

为了打击进犯的国民党军，遏阻其进攻，红八军首长决定集中兵力首先打击进占官田和东塘等地的第十五师，然后视情况变化，再集中兵力打击第六十三师。

八月六日，红八军由莲花隐蔽出动，当夜到达攸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皮佳，进一步查明了敌情，得知官田之敌为攸县保安团，东塘之敌为第十五师的第八十五团。于是决心首先进攻官田，预期歼灭这股敌人后，再攻歼东塘之敌。红八军和攸县地方武装分数路开始行动。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三师迅

速向官田正面推进。攸县游击队、赤卫队二百余人由鸾山出发，经满江、昭村向官田运动；攸县警卫营第一连绕道新田、杨家墩，埋伏于下寒婆坳，阻击官田西面东塘之援敌；第二连直插大陂，埋伏于官田南面之桑梓坳，以堵住敌人的退路。

七日拂晓，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三师到达官田正面的窑冲，隐蔽在山林中，其他各路队伍也相继到达指定地点。这时，官田守敌尚未起床。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三师乘机从官田桥上、桥下突然发起攻击。敌人仓皇应战，一面还击，一面溃逃。驻扎在官田学校里的两个中队，登上学校后山，负隅顽抗。红八军立即派出一个排追击。敌人登山后迅速展开，阻击红军追击分队。由于敌众我寡，该排战士大部牺牲。这时第八十五团从东塘驰援官田。在这紧急关头，红八军首长迅即派出一个加强连继续追歼登山溃逃之敌，主力则转向果子冲，与扼守下寒婆坳的攸县警卫营第一连会合，阻击东塘援敌。敌溃逃之两个中队，在红军追击之下，企图渡河南逃，刚至官田河滩，就遭到在桑梓坳的攸县警卫营第二连的攻击，加强连也从后面尾追而来，前后夹击，该股敌人全部在河滩上缴械。此时东塘援敌已蜂拥而至，与红军预置在下寒婆坳和果子冲两侧的部队发生激战。红军利用山高、路窄、谷深的有利地形，将第八十五团前锋第一营截成数股，先后予以歼灭。这时，第八十五团主力和第十五师其他部队先后赶来，红八军首长考虑到敌已集中，不利于继续在这里寻机歼敌，遂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返回攸县苏区。

这次战斗，击毙敌人约三百人，俘敌二百余人，缴枪四百余支，子弹数万发。

红八军在攸县苏区稍事休整后，便转移到茶陵县的高陇地区，隐蔽集结，寻机歼灭湖江方向的第六十三师的部队。后发现进占湖江的敌人已筑好工事，不利强攻。因此决定诱敌出击，在运动中消灭。八月十九日清晨，红八军以一支小分队袭击驻土里屋的警戒部队，引诱敌人，主力则在光明、小关和光启之间集结，积极准备战斗。当天下午，敌第六十三师三七八团从腰肢出发，经湖江向高陇前进，寻找红军作战。敌人认为在高陇一带活动的只是少数地方武装，既不侦察，也不派出侧翼警戒部队，而成一路纵队沿大道前进。当先头部队进到黑家屋东面的小高地附近时，遭到红军沙子岭警戒部队的射击。敌人即就地展开，以一部兵力抢占狮子摇岭，另以一部占领黑家屋南山。红八军独立第一师第一团主力和独立第三师趁敌立脚未稳，从凤凰岭和石背岭向狮子摇岭突击。第一团另一部同时向五佛桥迂回，断敌退路。第二团从高陇附近的小关跑步前进，从右翼向敌侧后谭家屋和南路运动。第三团也从沙子岭正面展开进攻。独立第三师和第一团经过激烈的反复争夺，消灭了狮子摇岭敌人，攻占了狮子摇岭及其以西一带高地。敌人在失掉了这些高地以后，顿形混乱，企图向湖江逃跑。就在这个时候，红军两翼迂回部队已经插到了五佛桥、马家屋和黑家屋地区，完全包围了敌人，又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将敌第三七八团大部歼灭，并击溃了由湖江来援的敌人。

官田、高陇两仗的胜利，打击了湖南国民党军的猖狂气焰，暂时稳定了湘赣苏区西线的形势。红八军为了能同赣江以东的中央红军的进攻作战取得比较密切的协同，九月初又返回遂万泰地区活动。

乐安、宜黄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中央红军乘胜向北发展，夺取抚州，进而夺取南昌，实现江西的首先胜利。这时，原在赣江西岸的国民党军第十一师、第十四师已调往赣江以东。中革军委命令红八军在

赣江西岸地区向北进攻，威胁樟树、南昌，求得大量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

湘赣军区首长根据上述任务，决定留独立第十二师在遂川、万安和泰和地区活动，湘赣军区总指挥张启龙和红军代政治委员王震率领红八军由遂川地区北上袁水，调新独立师到安福地区活动，保障红八军侧后安全。这时，国民党军第十八师配置在宜春、分宜和新余地区，第五十二师据守安福，第四十三师在吉安一带担任赣江防务。九月中旬，红八军进到袁水附近，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决定强攻分宜城。

分宜城位于袁水北岸，驻有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第五十二旅旅部及两个营。九月十五日，红八军抵达分宜境内，在松山召开了军事会议，部署攻城。十九日，红八军和地方武装共六千余人，分数路向分宜城开进。独立第一师第三团和分宜、新淦两县游击队从冶元出发，经土田、罗家等地，在分宜城的袁水上游渡河；独立第三师第一团从苑坑出发，经洋田、肖公庙，在分宜城的袁水下游渡河，定于二十日拂晓前到达指定位置，待机分别攻打西门和东门；北路独立第七营和新峡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埋伏在北门外；独立第一师第一团驻白芒作为预备队；独立第三师第二团主攻铃岗岭。

铃岗岭位于袁水南岸，与分宜城隔河相望，是分宜城外的制高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红军攻占分宜的必争之地。铃岗岭守敌有一个连，筑有三道掩体工事。二十日黎明，独立第三师第二团从岭南端对敌军展开攻击。敌人居高临下，依托工事，拼命抵抗，红军数次攻击受挫。在此情况下，王震当机立断，将独立第一师第一团调来参战，并亲自上山指挥。经过激烈争夺，将敌一个连全部歼灭，占领了铃岗岭。这时，敌第五十二旅旅长易振湘急忙派人至新余、宜春令所属各部火速来援，同时亲率一部兵力由南门渡河，向铃岗岭反扑，企图夺回阵地，当敌人进至半山腰时，遭到猛击，败回城内。

红军巩固铃岗岭阵地后，从北麓下山，向万年桥前进。万年桥坐落在东门外，横跨袁水，长近二百米，是南北两岸交通咽喉。敌人在桥头筑有碉堡，火力封锁很严。红军奋勇攻击，摧毁了桥头堡，冲过了万年桥。南北两岸部队汇合后，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对分宜展开攻城战斗。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反复攻击，但因城墙高厚，敌火力很强，激战半日，始终未能攻取。下午三时，敌援军分别从新余、宜春进抵分宜城郊。红军腹背受敌，形势十分严峻，遂于下午五时撤出战斗，向袁水南岸转移。

分宜战斗，红八军伤亡近四百人，军代政治委员王震负伤，独立第三师第二团政治委员赵克强牺牲。战斗失利后，红军中一些经不起艰苦斗争考验的人离开了部队，加上天气炎热病号增加，红八军减员二千余人。北路苏区也受到敌人严重摧残。

分宜战斗后，红八军在分宜以南地区稍事整顿，转向赣江、袁水两河相交的三角地带，先后占领了新余县的横板桥，新淦县的廖圩和三湖等镇，并俘敌朱耀华师的团长张超。国民党军为防红八军东渡赣江威胁樟树、南昌，急将对付中央红军的第十一师、第十四师各一部，调来新淦、峡江一带，加强河防；同时以第十八师、第五十二师各一部分分别从分宜和安福南北对进，企图断红军退路，聚歼于袁水、赣江三角地带。红八军及时发现敌军企图，见处境不利，迅速向苏区转移。并于安福以北地区击溃了前来截击的第五十二师一个旅。

第三节 配合中央红军粉碎 第四次“围剿”

一九三二年十月，湘鄂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主力红军，在未能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情况下，先后实行战略转移。此后，蒋介石便调集兵力，加紧部署，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与此同时，国民党军也加紧部署对湘赣苏区的“围剿”。

中共湘赣省委领导全省军民实行战争总动员，加紧了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动员与组织群众，征集与编组武装力量，筹集资财，巩固后方。

在深入的思想工作基础上，重新整顿了赤卫军组织，将湘赣苏区十八岁至四十岁的青壮年男女，统一编成赤卫军。每人一件武器，每五人配有一副担架，直接参加战斗或担任战场勤务。四十岁以上和不满十八岁的老少男女也都组织起来，为红军烧茶、送饭、洗衣，并帮助赤卫军维持社会治安。在“机关军事化”的口号下，省、县两级所有机关工作人员，也都编成机关赤卫队。

在征集新兵和组织武装力量方面，从七月到十月已动员五千五百余人参加了红军。为加强湘赣红军的领导力量，更有效地配合中央红军作战，十月，中革军委派蔡会文、肖克到湘赣苏区工作，于二十五日到达永新。十一月初，红八军在吉安县天河村进行整编，正式组成军的领导机关，由蔡会文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并兼红八军政治委员，肖克任红八军军长，李达任参谋长，袁任远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将新独立师编入红八军，使红八军扩大到三个师五千余人。原独立第一师改为第二十二师，师长谭家述，政治委员王震；新独立师改为第二十三师，师长杨茂（后叶长庚），政治委员谢国瑜（后袁任远）；独立第三师改为第二十四师，师长戈勇，政治委员胡楚父。还对地方武装进行了扩编，除独立第十二师外，抽调茶陵、莲花、萍乡等县独立营各一部，于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纪念日）组成新的独立第一师，以侯梯云为师长，陈韶为政治委员，全师共六个连约六百人。至此，湘赣苏区的武装除各县游击队外，有一个军、两个独立师、五个独立团和七个独立营，总共一万三千余人，六千四百余支枪。

为了筹集资财，省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向土豪筹款，发放革命公债，开展群众性的节省三个铜板运动，减少冗员，节衣缩食，反对贪污浪费，压缩经费开支，铸造银币，征收土地税、营业税等，使作战经费得到了解决。在粮食供应方面，也采取了新的措施，根据可能的作战方向和作战地区，按照统一补给规定，建立了兵站勤务；同时发动群众，每人储藏一斗谷子（每个党、团员储藏两斗谷子），分散储藏起来，使红军的粮食供应得到可靠的保障。各兵工厂、修理厂的工人也开展革命竞赛，投入紧张劳动，制造弹药，修理枪支和制造各种军需器材，供给红军。

省苏维埃政府领导全区人民实行了戒严。对所有通向白区的重要道路、山卡、隘路以及要地都设立了哨所；全区使用统一口令和通行证；各城镇街市建立巡查制度，检查伙店旅馆，彻底清查户口；限制嫌疑分子的行动，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全区还实行了坚壁清野，将重要作战物资都转入山区隐蔽。

十一月初，中共湘赣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永新县城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政治、党的建设、扩大红军、红军与地方武装等七项决议，总结了一年

来的斗争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推动了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十一月中旬，进攻湘赣苏区的国民党军共十个师八万余人完成了“围剿”部署：第六十二师由茶陵，第十五师由酃县，第二十八师及粤军第一师由遂川，第五十二师由安福，从西南、东南、东北三个方向进犯湘赣革命根据地，企图围歼红八军于永新。位于吉安、吉水的敌第二十三师，位于峡江、清江的敌第四十三师，位于宜春、分宜、新余的敌第十八师，位于萍乡附近的敌第六十二师，位于攸县附近的敌第十九师，充作第二线部队，担任防堵任务。其中安福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已全部展开于吉安县的曲赖、官田和安福县的金田、利田一线，所部第一五四旅十一月十五日袭占了吉安县的敖城。

这时，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中央红军遵照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决定先敌行动，“择敌人弱点击破一面”，粉碎敌人“围剿”于其大举进攻之前。一九三二年十月至一九三三年一月，先后发动建黎太战役和金溪资溪战役。这时，中革军委再次命令红八军进入袁水流域，积极开展活动，打通与湘鄂赣苏区的联系，与湘鄂赣苏区的红十六军的行动相呼应，配合中央红军向北发展。

当时，湘赣军区负责人对湘赣主力红军的行动方向存在几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湘赣红军主力红八军应坚决执行中革军委命令，向北发展，进入袁水流域，夺取袁水、赣江一带中心城市，以求实现江西革命首先胜利；第二种意见认为，红八军应向北发展，但不必渡过袁水，仅在罗坊、桃圩一带游击即可；第三种意见认为，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红八军向北发展，或进入袁水流域，或仅在袁水以南、赣江以西、油田以北一带游击，都是不适当的。因为袁水流域的敌人是较强的一路，共有三个师十八个团，并筑有坚固工事。而红八军当时能集中的兵力仅有二千八百余人、步枪一千一百余支、迫击炮两门、重机关枪四挺，要想跨过袁水攻破敌人工事，并消灭或击溃敌在三四个小时内即可到达的援兵，是没有胜利把握的，且有前后受敌的危险。如不渡过袁水，虽然没有危险，但活动范围小，红八军力量不能充分发挥，对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的作用亦不大。所以，持第三种意见的人主张先打击正面之敌第五十二师，再向遂（川）万（安）泰（和）边界游击。因为遂万泰地区的敌人，正规军只有第二十八师，战斗力较弱，地主武装也较少。同时，那里群众条件很好，党的工作有一定基础，利于红八军发展。如果红八军进入该地，便可截断赣江交通，使遂万泰地区之敌受到威胁，吉安、赣州之敌受到牵制，这样便实际地配合了赣江以东中央红军的行动。经过充分讨论和分析，军区决定按第三种意见行动，遂命令红八军先打击当面之敌第五十二师，各独立师、团和地方武装，推进到湘赣苏区的边沿地区积极活动，牵制敌人，配合红八军作战。

十一月十六日，红八军开始向东行动，首先插至敌第五十二师一五四旅后方官田一带活动，企图迫使该敌后撤。因该敌未动，红八军又迂回北进，准备袭击安福，调动该敌。二十日，红八军由西江经江口、莲花坪、市田到合东，二十一日又由合东进至洋溪。同日，安福县城之敌到严田骚扰。二十二日红八军攻击严田，不料敌人已于二十一日晚撤至利田。据此，红八军立刻进攻利田。利田之敌约一团，凭借坚固工事据守。红军强攻不下，杀伤敌人百余人，即撤出战斗，向洋溪转移。红八军这一行动，使敌后方受到威胁。敌人一面命令利田守军坚决拦阻红八军向安福前进，一面将进到敖城的第一五四旅撤回官田。在这种情况下，红八军立即放弃袭击安福的计划，回头攻

击官田。红八军前卫部队与敌接触后，整个部队迅速展开，第二十三师、第二十二师分别从正面、左翼攻击敌人主力，一部在右翼钳制敌人，经两小时战斗，将敌击溃，缴获步枪四十余支，毙、伤敌三百余人。官田战斗后，红八军开至永新高桥，转入训练。十二月十二日，部队正在开大会，接到报告：驻安福金田之敌第五十二师一五六旅一个营进犯左坊。红八军立即赶往左坊。敌撤至离金田十里的桂林坊，红八军追至桂林坊，经四十分钟战斗，将敌击溃，击毙敌营长严惠荣，俘敌连长以下六十余人，缴步枪五十余支。

在红八军于利田、官田和桂林坊等地展开作战的同时，其他方向的敌人在地方武装积极活动的牵制下行动迟缓。敌第五十二师由于遭到红军不断打击，又得不到其他方面的敌军的配合，遂退回原阵地，暂时转入守势。

红八军击退敌第五十二师的进攻后，于十二月十五日转移到遂川、万安、泰和地区，在这个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敌人，以配合中央红军的作战行动。同时，帮助地方政府恢复了遂川以北，永新以南的衙前、五斗江、黄坳和高家圩整片地区，帮助群众展开了土地革命斗争，组织了地方武装，发展了党的组织。部队利用间隙进行了整训，军事技术得到显著提高。此时在军队建设上也发生过一些错误，如不切时宜地强调正规化，将三大任务改为单一的打仗任务，过分强调首长个人权威，削弱了党委集体领导。实践证明，这些是脱离实际的，行不通的。于是，又改变过来，仍然以毛泽东提出的建军原则为准绳。

一九三三年二月，国民党军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也加紧了对湘赣苏区的钳制行动。二月十六日，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三个团由遂川进至潞田，湘敌进至大院，粤敌进至藻林，准备合击红八军于黄坳、上七、下七、横石等地。正当红八军进至衙前、高家、牛田一带，准备寻机各个击破敌人的时候，中革军委命令红八军再次北出袁水，会合湘鄂赣苏区的红十六军配合中央红军作战。这时，湘赣苏区北线的国民党军已调整了部署，第七十七师接替了宜春、分宜和新余防务，第二十七师接替了峡江、新涂防务，第十八师转驻安福。第五十二师、第四十三师继第十一师、第十四师之后，已调至赣江以东。为了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三月九日，红八军兼程赶到新余以西地区。红八军本拟在此渡过袁水与红十六军会合，共同行动，打击敌人第七十七师或萍乡地区的第六十二师，因找不到渡船，遂于次日经横板桥沿袁水右岸到河坪上，准备从这里渡过袁水。由于左岸有国民党军及地主武装把守，红八军两次强渡都没有成功。于是改变行动计划，直逼赣江并袭占了新淦县的三湖、廖圩和界埠，接着在该地区展开了积极活动。由于红八军的活动严重地威胁了敌人赣江交通，因而牵制和调动了敌人，及时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反“围剿”的决战行动。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取得了黄陂、草台岗两战胜利，缴枪逾万，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在这次反“围剿”中，虽然毛泽东因抵制错误路线已被迫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但因毛泽东的正确的军事思想在红军中有深刻的影响，而“左”倾军事路线还来不及完全贯彻，中央红军仍然根据毛泽东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作战，加之有周恩来、朱德等的正确指挥，所以取得了胜利。

三月下旬，位于湘赣地区的国民党军向湘赣苏区再次发动进攻。经中革军委批准，红八军停止在袁水流域的行动，回师永新，待机歼敌。

四月三日，湘敌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建绪到达茶陵县城，统一指挥敌湘、赣、粤各军，分三路合击湘赣苏区的中心区域永新、莲花。五日，敌第六十

三师进攻莲花，接着占领苍山口。第十五师于三月下旬进占宁冈，陷七溪岭、龙源口之后，进攻永新，一度占领永新县城。第二十八师也由遂川向永新推进。在这种形势下，湘赣军区首长认为，湘敌第十五师和第六十三师比较靠拢，易于协同行动；而赣敌第二十八师则远在遂川、万安及泰和地区，比较孤立，且战斗力不强。决定以红军学校学员和地方武装各一部在永新、宁冈边界积极活动，牵制湘敌；红八军则直下遂川地区，寻机歼灭第二十八师。

敌第二十八师师部及第一六五团驻在遂川县城，第八十三旅旅部及第一六六团驻在县城东北的零田圩。红八军决定首先歼灭零田圩之敌。四月四日，红八军从永新县的烟江出发，经牛田、碧江洲、新江等地，于六日晚到达零田圩附近。七日凌晨，红军向零田圩守敌发起攻击。敌人固守工事及房屋进行还击。激战两小时后，敌第一六五团之一个营、一个机枪连及师迫击炮营由遂川县城赶来增援。红八军遂以一部兵力监视零田圩守敌，以主力打援，经半小时猛攻，将增援之敌全部歼灭。接着，红军集中兵力打击敌第一六六团，敌人扼守工事，拼命顽抗。红军从四面强攻碉堡及村庄，并与敌展开村落争夺战。一位十九岁的红军看护员，拾到敌人遗弃的一把圆锹，躲在巷子口，打伤了敌人一个连长，缴获了他的驳壳枪并将其捕捉。经过教育和争取，这个连长说服了四十多个国民党士兵向红军投降。但是尽管红军战斗中英勇顽强，因缺乏攻坚技术，战至下午三时半仍未攻下。这时，红八军已伤亡三百五十多人，其中有三名师职干部负伤，再战不利，遂撤出战斗，向上盲转移。这次战斗，俘敌百余人，毙伤敌二百余人，缴获迫击炮四门，重机枪两挺，步枪一百二十余支。

当红八军在遂万泰地区积极活动的时候，湖南国民党军第六十三师和第十五师，先后占领莲花、永新，并直出关背、坳头，企图在广东国民党军第一师和江西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配合下，合围红八军于遂川、万安、泰和地区。红八军首长识破敌人企图，迅速绕道返回永新县的牛田地区。第十五师和第六十三师合围红军计划未成，侧背又受到红军的威胁，于是分别退回宁冈和莲花地区。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遭到失败，在湘赣苏区也一再遭到挫折和打击，对湘赣苏区的进攻也就基本停止了。

第四节 九渡冲战斗和棠市战斗的胜利

一九三三年四月中旬开始，进攻湘赣苏区的国民党军改取固守据点，步步蚕食，稳扎稳打的政策。其目的在巩固现有阵地，然后寻机发动进攻。

面对新的情况，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决定，发动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活动，袭扰疲惫敌人，对深入莲花的国民党军第六十三师实行严密的坚壁清野，加紧围困，迫其调动，以利主力红军在运动中予以歼灭。据此，以吉安、永新独立团编成的警卫师对付宁冈的第十五师；以分宜、新峡独立团（营）编成的独立第二师牵制北线敌人；以萍乡、莲花、攸县各独立团编成的独立第三师，在莲花地区积极活动，袭扰和围困第六十三师；以独立第一师深入永兴、安仁和资兴地域游击，吸引入赣湘敌；红八军和独立第十二师以及茶陵独立团在红八军首长统一指挥下，集中行动于莲花地区，寻机在运动中歼敌。

第六十三师在苏区军民围困下，交通断绝，物资供应日益困难，五月一日，被迫派出四个营又一骑兵连，强行通过苏区，前往茶陵接运物资。红八军首长得知这个情况后，决定乘该敌返回时在九渡冲地区实行突袭。

九渡冲，又名九路冲，两边山岭重叠，一条大路从山谷间穿过，是侧击敌人比较理想的地方。红八军首长命令茶陵独立团进到茶陵和莲花交界的雷打石、界化陇地区，监视敌人，并派人到茶陵城侦察敌军的动静。五日，敌人开始返回高陇地区。红八军即由莲花的尧坊、神泉进到田南、棠市和茶陵县的墨庄地区，隐蔽集结，准备战斗。六日下午五时，敌人押运大批辎重成一路纵队进到界化陇九渡冲地区，并沿大道向莲花方向前进。监视敌人的茶陵独立团首先与敌打响，依托背屋后背和帐顶山一线高地，阻击敌人。敌人凭借兵力和武器的优势，以两个营的兵力进攻茶陵独立团。独立团英勇战斗，坚守阵地，牵制了部分敌人。另一部分敌人进到花竹、木鱼坳一带。红八军由墨庄、棠市分两路赶来，第二十二师在花竹附近展开，向新泥岭、背屋后背和帐顶山攻击前进，第二十三师和第二十四师在大打冲展开，向木鱼坳攻击前进。

这时，敌人先头两个营已占领了新泥岭、背屋后背、木鱼坳等高地，并正在围攻坚守帐顶山上的茶陵独立团，掩护部队和物资通过九渡冲峡谷。红八军进攻部队利用茶陵独立团吸引住敌人兵力和火力的有利形势，迅速地攻占了新泥岭到木鱼坳高地，将敌压到九渡冲和界化陇之间的谷底。接着，红军居高临下，全力猛扑下去，打到黄昏，将敌人的掩护部队两个营完全消灭，缴获了全部辎重。

在红军攻歼敌翼侧掩护部队时，敌后卫两个营沿谷底大道向北急进，抢占了官城堂、楼梯湾和白路岭一线高地，等待增援。

红军将敌掩护部队的两个营歼灭后，以少部兵力控制界化陇北侧和盆形里一带高地监视敌人，主力转移到界化陇、段家坊和楼下屋一带。当时，红八军及各师领导对第二天是否继续打下去有不同意见。第二十二师政治委员王震认为，我军有取得胜利的充分条件，因此坚决主张继续打。红八军首长最后同意了意见，即乘夜调整部署：第二十二师由盆形里地区向楼梯湾进攻，独立第十二师和第二十四师一部由界化陇向官城堂敌人进攻，第二十四师主力由背屋后背经梦中岭和铜鼓坪向灵龟仙敌人侧背攻击，第二十三师为军预备队。七日晨六时十分，红军开始进攻，冒着敌人猛烈的火力，利用

丛林很快地接近了敌前沿。敌人见红军来势迅猛，十分恐慌，大量投掷手榴弹。红八军第二十二师以勇猛和神速的动作，乘手榴弹爆炸烟雾弥漫，首先突入敌人阵地。接着，独立第十二师也打了上去。楼梯湾、官城堂守敌在红军猛攻下大部被歼，一部向白路岭逃跑。这时，第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集中第一八七旅和第一八九旅各一部共两个多团，从莲花来援，第一八七旅已进到白路岭、灵龟仙、王坳和灯盏形一带，第一八九旅进到桐木坳和马墩地区。红八军首长认为敌援兵刚到，尚未全部展开，遂命令第二十二师紧跟溃退之敌向白路岭、王坳方向攻击前进。同时用预备队第二十三师在第二十二师右翼投入战斗，向王坳攻击。第一八七旅在白路岭、王坳和灵龟仙拼命抵抗，妄图阻止红军。在红军正面进攻部队和迂回到大叶石高地的第二十四师前后夹击之下，终于抵挡不住。与此同时，第一八九旅的反扑也被红军击退。敌人全线溃退。红军全面转入追击，将敌第一八七旅大部消灭于锁子冲深沟里，残敌狼狈逃回莲花。

红八军在六、七日两天战斗中，毙伤敌副旅长钟钟山以下五百余人，俘敌千余，缴获步枪近千支、重机枪二十五挺和大批辎重。这是红八军成立以来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五月十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八军全体指战员和湘赣苏区工农群众，嘉奖九渡冲大捷。电文说：“捷报传来，欣悉。在共产党进攻路线的领导下，击溃白军六十三师，俘获过千，是湘赣省的空前胜利，是在河西战线上严厉的打击了敌人的四次围剿，配合了中央红军的伟大胜利，特电贺勉。”

在敌人溃退的时候，第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带着几十个残兵路经莲花县的浯塘，群众和地方武装高喊“活捉陈光中，并开枪射击，陈光中险些被群众俘获。陈光中逃回莲花城后，恼羞成怒，于五月八日拂晓，派出一个营和莲花县的地主武装保安团第四中队包围浯塘，进行大屠杀。敌人见人就杀，每杀一个人，割掉一只耳朵，拿到陈光中那里去领赏。从早上一直杀到中午，来不及躲避的一百零八名革命群众被残害。农民刘清华的媳妇正怀孕也被杀死了。小女孩彭允仔头上被砍了一刀。保安团第四中队队长地主恶霸刘国安，把捉住的三个青壮年赤卫队员，绑在他父亲坟上，枪杀祭祖。敌人还在浯塘到处放火，将全村财物抢掠一空。敌人的残暴行径激起了苏区人民的无比仇恨。浯塘惨案发生不久，全村就有二百余名青壮年参加了红军。

第六十三师在九渡冲失败后，处境更加困难。湖南国民党军为解决第六十三师夏衣、弹药和其他物资的供应问题，于五月二十八日又组织了一支庞大的运输部队，欲强行通过茶（陵）莲（花）苏区。这支运输队以第十五师的四十三旅为前卫，第六十三师补充营为本队，第十九师的五十五旅为后卫，押解数百民夫，挑着物资，由茶陵前往莲花。当天晚上进到高陇，二十九日继续前进。由高陇到莲花有两条路，经九渡冲的道路要通过十多里长的狭谷，不便搜索和展开，第六十二师的部队又在这里遭到红军伏击，而经彭家祠、棠市到莲花路程虽远，但地形比较开阔，便于大部队运动和展开。敌人侦知红八军于九渡冲战斗后已转移到永新，因此决定走这条路。

得知敌人的行动计划后，红八军首长当即部署兵力，准备伏击。参战的有红八军三个师、独立第十二师和茶陵独立团。五月二十九日，红八军和独立第十二师在敌人从高陇出发的同时，从永新的水口出动，向棠市方向急进，准备宽正面的从南向北截击敌人的行军纵队，消灭敌前卫部队，夺取物资。下午二时许，红军分两路翻过梅花山，第二十二师和独立第十二师进到长牛

岭和刘庄地区，第二十三师和第二十四师进到棠市东山后面。茶陵独立团在墨庄、三斗星一带监视敌人。预期先把敌人的队形打乱，然后趁混乱之际各个予以歼灭。在红军主力进到长牛岭、刘庄和棠市东山时，第四十三旅大部已过湖边村，红军第二十三师和第二十四师遂以多路队形向该敌发起攻击。第四十二旅主力怕遭到歼灭，撇下后面部队向莲花方向逃去。第六十三师补充营听见打响，即强迫民夫挑子向塘下集中。后卫第五十五旅一部抢占大坳上，主力抢占三斗星。第四十三旅后尾部队，在红军第二十三师和第二十四师的突然打击下顿形混乱，纷纷向陇大冲方向溃退。这时，红军第二十二师一部在进攻三斗星时遭到敌人的激烈抵抗，独立第十二师及时增援上来，并在茶陵独立团配合下攻占了三斗星，敌后卫第五十五旅的大部向彭家祠方向退走。与此同时，红军第二十二师主力经过连续猛烈攻击，击溃为掩护辎重而在大坳上拼命抵抗的敌人，夺取了大坳上阵地，敌抛弃全部辎重，向船形里、黑牛坳溃退。红八军第二十二师、第二十三师和第二十四师在击破当面敌军抵抗后，向西猛追溃退之敌。这时，在莲花以南活动的红军第二十四师第七十团的两个连自动赶来参战，在斑竹坳一线展开，堵住了敌人的退路。在红军猛烈追击、分割包围和猛打猛冲之下，到下午六时，黑牛坳、船形里和陇大冲地域的敌人全部被红军消灭。

这次战斗，红军俘敌团长以下千余人，缴步枪五百余支，重机枪四挺，电台一部，军衣两万余套，胶鞋万余双和其他大批军用物资。六月二日，朱德、周恩来致电肖克、蔡会文，嘉勉棠市大捷，电文说：“你们在积极进攻路线下，以百战百胜的英勇，连续消灭敌人，活捉敌团长来纪念五·卅，这表现了你们的英勇与光荣、……方面军全体战士对于你们的胜利，表示热烈的庆祝。方面军要与你们共同努力，全部打碎敌人大举进攻，好迅速实现江西首先胜利。特电贺勉。”

九渡冲战斗和棠市战斗，是红八军成立以后取得的两次重大胜利的战斗，它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湘赣苏区军民的斗志，同时也使红八军得到了补充，武器装备得到改善。这两次歼灭战，给湘赣苏区的斗争造成了更有利的形势。

第四章 红六军团成立配合中央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

第一节 红六军团成立向西线 国民党军进攻

一九三三年夏，蒋介石集团不顾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于是年三月至五月相继占领热河和察北、冀东等地，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势，继续集中兵力进攻红军，加紧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发觉过去使用的“长驱直入”与“分进合击”的战略战术对红军无能为力，于是改取持久战略与堡垒主义，在根据地周围筑碉构堡，加强军事和经济封锁，阴谋以此逐渐消耗红军的力量，步步紧缩革命根据地，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革命根据地的目的。

蒋介石准备了百万兵力，其中进攻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五十万。用来进攻湘赣苏区的约十万，主力是国民党西路军第一纵队的六个师和一个补充总队。六月下旬，国民党军西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进驻莲花后，将兵力部署作了调整：第十五师配置在宁冈的耒市、古城、新城和茶陵县的石龙以及酃县地区；第六十三师在莲花及其附近地区；第十六师由湘鄂赣地区向莲花和茶陵县的高陇地区调动；第二十八师（两个旅）在遂川和万安地区；第二十三师担任赣江防务，分布在泰和和吉安地区，第十八师布置在安福和峡江地区。此外，国民党军西路军第二纵队的第七十七师、第六十二师和第十九师各一部驻守在湘鄂赣和湘赣苏区之间的新余、宜春、萍乡和醴陵一带，协同第一纵队对湘赣苏区进行“围剿”。刘建绪根据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总方针，决定首先巩固现有阵地，由点到线地建筑碉堡，完成对湘赣苏区的封锁，限制红军机动，然后在国民党军主力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的时候，再以第十五师、第十六师和第六十三师担任主要突击，由西向东进攻湘赣苏区。

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军民都面临着严重的反“围剿”斗争。

这次反“围剿”，在敌人重兵进攻和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的情况下，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确实存在不少困难。但是，如果能够正确地总结前一时期作战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军事原则去指导战争，敌人的这次“围剿”仍然是可以打破的。

在这次“围剿”之前，中共临时中央已经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中央在瑞金举行五中全会，使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得到进一步贯彻。当时，“左”倾路线统治下的中共中央对全国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在敌人加紧准备对中央苏区举行第五次“围剿”的时候，不是要求中央红军加紧进行反“围剿”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在这次“围剿”中，国民党军开始编组有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进攻的主力军）和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以后又编组了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同时编组了西路军（总司令何键）。西路军的主要任务是“围剿”湘赣苏区和湘鄂赣苏区，同时负有阻止中央红军向赣江西线机动的任务。

准备，而是继续要求中央红军实行所谓“进攻路线”，并将中央红军主力第一、第三军团分开，实行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在敌人开始“围剿”以后，先是要求中央红军继续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在进攻一再受挫以后，又转而采取军事保守主义，命令中央红军实行消极防御，进行阵地战和堡垒战，致使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日益陷于被动。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错误指导方针，也影响了湘赣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中共苏区中央局于二月解散原湘赣省委，组成以刘士杰、陈洪时为首的新省委以后，湘赣苏区“左”的错误，特别是肃反工作和查田运动中“左”的错误更有了发展，造成干部和群众思想混乱，甚至在政治上出现了危机。五月，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委员任弼时担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任弼时六月来湘赣苏区后，团结了干部，纠正了查田运动中的若干错误，在肃反工作中对国家保卫局的权力有所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左”倾路线在湘赣地区的恶性发展。但是，当时由于中共中央在继续加强错误路线的贯彻，因此，湘赣省委在路线上的错误，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纠正。一九三三年六月中旬，遵照中革军委指示，湘赣苏区主力红军和湘鄂赣苏区主力红军一部在永新县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

军团组成初期，中革军委将湘鄂赣苏区的红十六军改编为红十六师，打算将其调归红六军团建制，但没有实现。军团所辖部队，实际是由湘赣苏区红八军改编的红十七师和由湘鄂赣苏区红五十二师改编的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当时没有军团领导机关，暂由红十七师首长统一指挥。红八军改编为红十七师后，师长肖克，政治委员蔡会文（兼），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李朴。以原第二十二师改为第四十九团，团长曾开福，政治委员胡楚父；第二十三师改为第五十团，团长李崇，政治委员谢国瑜；第二十四师改为第五十一团，团长田海清，政治委员苏杰。

红十八师的第五十二团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浏阳、宜春、万载、平江、铜鼓和修水各县游击队发展起来的。一九三一年，这些游击队组成湘鄂赣红军独立第一师和独立第二师，一九三二年冬，合编为红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两师改称为红五十二师和红五十四师。后来又将这两个师合并编为红五十二师。这个师奉中革军委命令改编为红十八师后，由湘鄂赣军区副总指挥严图阁兼师长，徐洪为政治委员。全师一千三百余人。七月底，徐洪率红十八师南渡袁水，到湘赣苏区与红十七师会合。当时保留红十八师番号，未设师领导机关，并将部队缩编成为一个团，由徐洪任团长，苏劳任政治委员。

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准备即将完成的时候，中革军委于七月二十六日发布了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作战纲领。纲领规定：红军应“首先迅速给河（赣江）西湘敌和闽西闽敌以打击，目的在消灭其主力，建立在抚河以东、赣河以西的两条作战线，来辅助方面军的主力作战，以造成战略攻势和与敌决战的有利条件”。为此，命令红六军团于第一阶段（九月底以前），在永新、宁冈、莲花和茶陵地区机动地消灭敌西路军第一纵队的实力，以消灭湘军第六十三师和第十六师为主；第二阶段，以一个师北渡袁水，与留在湘鄂赣苏区活动的另一个师会合，威胁樟树和南昌，并消灭“围剿”湘鄂赣苏区的敌西路军第二纵队的实力。

七月二十九日，中共湘赣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

不久，红十七师政治部主任改由王震担任。

的决议和中革军委的作战纲领，作出了紧急决议。规定：“目前放在湘赣党前面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坚决执行党的积极进攻路线，动员、组织、武装最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配合红军积极的进攻，求得在最短时间以内，首先消灭对湘赣苏区进攻的湖南敌人，来夺回莲花、宁冈、茶陵、攸县，恢复上（犹）、崇（义）苏区，巩固与扩大湘赣苏区，打通与中央和湘鄂赣苏区成为一片，消灭湖南工作的落后，以便利向北发展，来完成江西革命首先胜利。”

由于任务重，时间紧，红六军团迅速开始了进攻行动。

省委和军区为了增强红六军团的力量，采取了许多紧急措施：首先在苏区军民中进行了紧急战斗动员；先后将独立第十二师和补充师编入红十七师；撤销了警卫师和独立第一、二、三师的番号，改为警卫团和独立第一、二、三团，将精简下来的机关人员补充到战斗部队中去；将赣南、遂川和酃县三个独立营合编成独立第四团，派到上犹、崇义地区去牵制南线敌人；同时，动员赤卫军模范师的营和连集体参军，六月到八月内，就有四千二百余人加入了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并动员群众储备了三万担粮食。

七月底，红六军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挺进到莲花、宁冈、茶陵地区进逼敌人，企图引诱湘敌脱离阵地，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第一纵队主力，以完成中革军委所给予的作战任务。红军多次袭扰茶陵县的尧水、高陇、清水、马礁首、石龙和莲花等地的敌人，并一度切断了茶陵、莲花间和茶陵、攸县间的敌人交通，同时以两个团插到攸县、醴陵和萍乡之间，准备打击由湘鄂赣地区南调的敌第十六师的后续部队，但均没有获得战机。

红六军团迫于任务和时间的要求，八月中旬，又集中兵力向莲花和茶陵地区的敌第十六师进攻，并决定强攻茶陵县梅花山地区的雪花坳敌第九十五团的阵地。十八日晨，红十七师由木冲到达雪花坳附近。第五十团和第五十一团埋伏在龙海潭下面的小山里，准备阻击退却之敌，第四十九团担任主攻。红军在向雪花坳前进时，突然在水果坳发现敌增援部队，遂立即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出敌不意地走小路抢占了一个山头，在激战中歼敌一个排，很快接近雪花坳。雪花坳前面有一片开阔地，半山腰有个亭子，驻扎很多敌人。红军决定采取强攻硬夺的办法，首先攻占半山亭。于是，调来第五十一团一部分兵力和第四十九团一起攻坚。当红军通过开阔地时，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半山亭周围的地堡群利用机枪封锁了路口，前后、左右和上下，形成了一道很强的交叉火力，阻止了红军前进。红军没有重武器，仅有的一门迫击炮也因弹药不足而发挥不了多大作用。战至下午，仍然无法把敌人的火力压下去，红军伤亡很大。这时，指挥员命令再一次强攻半山亭。敌人设防严密，火力很强，还有飞机配合，红军一次又一次顽强地冲击，都没有成功，伤亡达三百余人，被迫撤退。

这次战斗失利的原因，主要的是受了“左”倾路线的影响。红十七师是为“坚决执行党的积极进攻路线”和作战任务而强攻雪花坳的。指挥员也有责任。一方面侦察不力，没有做到“知己知彼”，战前，虽然对敌情进行了侦察，但只知道半山亭里敌人较多，对敌人的整个兵力部署、装备及火力配备没有摸清，就盲目地发起强攻；另一方面指挥不当，敌人采取“坚守的方针”，而我军不顾客观条件，单凭士气高昂，拼命强攻，特别是当通过开阔

补充师是中央红军第三军团的补充师，这个师共四个连，是由红三军团在上犹、崇义的留守人员及归队战士组成的，1933年8月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编入红十七师。

地伤亡很大而又不能前进时，仍然命令部队冲锋，造成了更大损失。另外，雪花坳山高路陡，地势险要，敌人占据有利地形，筑有坚固工事，兵力较多，武器精良，易守难攻，也是重要原因。

红六军团鉴于当面敌人采取了坚守的方针，于是转到敌军兵力比较分散的宁冈和酃县地区，寻机打击敌第十五师。九月一日，红六军团进到宁冈以西的下水湾、大夫坪地区后，第十五师迅速收缩阵地，并急调驻茶陵县石龙的第四十五旅来援。除在宁冈县的大龙和酃县各留一个营和保安团队固守外，主力都集中到著市与古城两地对红军作战。红军于九月中旬和下旬，先后在大龙地区、古城以南的茅坪和塘南地区与敌第十五师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斗。这几次作战，红军虽杀伤敌数百人，但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本应改变策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作战。但是，红六军团鉴于中革军委没有改变红六军团的作战任务，又决定于十月中旬，北上进逼醴陵，威胁萍乡，并以独立第三团到萍乡县的老关破坏敌人的铁路交通，寻机歼灭敌人。醴陵和萍乡各有敌军一个团，且有坚固的工事。红军一到这个地区，敌人便急从长沙和宣风抽调四个团赶来增援，连同原有的两个团组成两个“攻剿”支队，分由第六十二师师长陶广和第十九师师长李觉指挥。十月十五日，敌人在飞机掩护下，由萍乡和醴陵出动，企图合击红军于萍乡以南地区。十五日九时左右，红六军团在萍乡以南的麻山附近与由萍乡出动的敌陶广支队遭遇，激战竟日，相持不下。十六日晨，红军集中兵力向敌左翼朱家峰阵地猛攻，计划将该阵地突破后，再向西发展，全歼陶广支队。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由醴陵出动的李觉支队赶来，并向红军侧翼攻击，陶广支队也乘机反扑。红军因遭敌夹击，处境不利，撤出了战斗，返回永新地区，结束了向西线敌军进攻的行动。

红军在西线进攻时期，中革军委和湘赣省委为红六军团规定的作战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时限，对于仅有六千多人的红六军团来说无疑是过重过紧，无法完成的。红六军团在执行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既对敌人的可能动向认识不足，又对敌我力量缺乏正确估计，所以在莲花、茶陵、宁冈和萍乡广大地区积极奋战两个多月，仅予敌人一定打击，没有取得较大的胜利。

九月二十五日，敌人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并于九月二十八日占领了中央苏区北方门户——黎川城。中央红军随即奉命向黎川以北敌占领区的堡垒地带展开进攻。

国民党军西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为了配合赣江以

东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将第七十七师调驻遂川和万安地区，加强南线和赣江守备，将第六十二师的第一八六旅调往安福，接替已调往新余、上高地区的第十八师的防务。

十月底完成上述部署后，十一月初也向湘赣苏区发动了进攻。以位于石龙、墨庄地区的第十六师和第十五师的第四十五旅担任主攻，以第十五师主力和第六十三师在南、北两翼策应，企图由中央突破，首先占领梅花山，打开湘赣苏区的西方门户，然后向湘赣苏区中心永新推进。

从十一月一日起，敌第十六师每日以少数部队向红军阵地进行试探性进攻，红六军团决以全力迎击该敌，一面指示防守梅花山的茶陵独立团和警卫团的一部，继续加强工事，严密注意敌人的行动；一面调红十七师进至梅花山的高坑地区，同时急令正在执行迎接干部西渡赣江任务的红十八师赶回参战。为了打好这一仗，各师、团都在阵地上进行了战斗动员，号召全体红军

战士英勇杀敌，坚决保卫梅花山和湘赣苏区。

八日八时，第十六师和第十五师的第四十五旅近五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梅花山阵地猛烈攻击。茶陵独立团等部队顽强抵抗，守住了阵地。红十七师在战斗打响后，跑步赶来参加战斗，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战斗持续到中午，敌人仍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时，敌第十六师师长彭位仁下令组成“敢死队”，并晓喻全体官兵：“攻上梅花山，人奖大洋五十元，敢死队的加倍。”下午三时，第十六师在炮火掩护下，又一次强攻梅花山阵地。以“敢死队”为先锋，约两个团的兵力尾随其后，高声呐喊着蜂拥冲击。红军一部固守工事，主力在侧后适当地点隐蔽，准备反击。位于五佛岭的红十七师第五十团一营的两个连，以坚决的突击，全歼了“敢死队”。接着，红军主力乘胜反击，敌全线溃退，毙敌近千，俘敌八百余人，狠狠打击了敌人的气焰。这个方向的敌人暂时停止了进攻。

十二月中旬，以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为团长、红十七师政治部主任王震为副团长的湘赣苏区代表团，赴江西瑞金出席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红六军团奉命护送代表团去赣江东。十四日，红六军团从永新出发，经关背到达遂川县的桥头，红十八师留在桥头掩护，红十七师绕大岗坑进到万安县的潞田，当晚派第五十一团护送代表到花生渡过河。

十五日拂晓，零田圩敌第七十七师四六一团来潞田截击执行护送任务的红十七师第五十一团。红军发现敌人向潞田前进，即以第四十九团占领天胜庵西北高地，第五十团占领高平庙高地，利用敌人过去在这里构筑的工事，阻击敌人。同时，急命返回到镜台的第五十一团经读堂、下石向黄牌下西南高地迂回，断敌退路，全力歼灭该敌。

九时，敌人以一部兵力控制黄牌下西南侧小高地，主力分两路向红军阵地进攻。在红军猛烈的火力打击下，敌人多次攻击被打退，伤亡很大。这时，红军第五十一团顺利地迂回到黄牌下，切断了敌人退路。敌人龟缩到墩子上和圩口几个村庄里，凭借房屋固守，等待援兵。红军乘机转入进攻。第四十九团主力从正面直扑圩口，另一路向墩子上包围，同时以一支小分队插向罗家伢和虎行山，防止敌人向西南方向逃窜。第五十团也从高坪庙向圩口、墩子上攻击。红军一面进攻，一面喊话，争取敌人投降。在红军的打击和争取下，一部分敌人缴枪投降了。敌团长气急败坏率残部在墩子上负隅顽抗。红军对敌形成包围之后，到下午，红十七师第五十一团一个营突入敌阵，各路红军对自己面前的敌人一冲而上，敌人纷纷缴械投降，除少数得以逃脱外，均被红军消灭。

这次战斗，俘敌团长李春光以下六百余人，缴获各种枪五百余支。

潞田战斗后，红十八师返回永新，监视西线的敌人，红十七师沿赣江北上，到吉安和安福地区活动，配合中央红军在赣江以东永丰地区的作战。

第二节 红十七师北上行动红十八师 坚持湘赣苏区的斗争

一九三四年一月，蒋介石镇压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即调整部署，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举行新的进攻。在湘赣苏区，西线敌人于一月中旬攻占了红军的梅花山阵地，并继续向永新推进。一月十四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六军团和湘赣军区领导人：“1.现蒋介石主力正围攻延平、古田的十九路军，敌于摧毁该敌后，即转而进攻我中央区。2.我中央区红军主力拟即向东进展，打击蒋敌的右侧面，同时要河西红军即（隔）出南浔路，钳制蒋敌，使其（不）能增兵侵犯中央区。3.第十七师应速向宜春、分宜地段渡过袁水，北出配合第十六师向南浔路、永修一带行动，并与独立师取得联络。”红六军团于是以红十七师北上，红十八师坚持湘赣苏区的斗争。

当时，红六军团驻在安福县的丰田、古江一带。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后，立即派出侦察部队，在北路地方武装的协同下，侦察袁水沿岸的情况，选择渡河地点，同时，进行了战斗动员和一些必要的物资准备。省委和军区将莲花独立团和北路独立营补入红十七师。一月二十四日，红十七师四千余人，从安福县花车出发开始北上。二十六日拂晓，在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配合下，于分宜县以东的肖公庙击溃了敌沿河设防的保安部队，涉渡袁水，兼程向奉新县的黄沙地区疾进，准备到那里首先和红十六师会合。

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得悉红十七师北渡袁水，急忙命令已转移到安福地区的第十六师北渡袁水跟踪追击。同时，将正在“围剿”湘鄂赣苏区万载县小源（今称仙源）地区的第十八师的五十二旅和第六十二师的第一八四旅抽出，由第十八师师长朱耀华统一指挥，兼程东进，进行堵截，阻止红军北上。红十七师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披星戴月，夜行晓宿，以最快的速度，通过丘陵、平原，进入赣西北大山区。二月二日，进到了宜丰、修水间的黄沙。

黄沙位于赣西北九岭山脉南麓，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这里是湘鄂赣红军的游击根据地，群众基础、地形条件都比较好。红十七师连续数日急行军，十分疲劳，决定在黄沙休整，等红十六师会合，然后继续北上，共同执行破坏南浔铁路的任务。由于不知道红十六师的具体位置，红十七师派出联络人员四处寻找。

三日上午九时，朱耀华率两个旅从潭山市分两路赶到黄沙，向红十七师进攻。敌第十六师也追到了黄沙东南地区。红十七师即以少数兵力对敌第十六师警戒，集中主力与敌朱耀华部作战。在战斗中，五六架敌机三次由南昌飞来临空助战，轮番对红军阵地狂轰滥炸，俯冲扫射。红十七师全体指战员临危不惧，坚定沉着，凭据临时构筑的野战工事，顶住敌人的进攻，并不断组织反击。经过六小时激烈的阵地争夺战，到下午四时，红军又组织了一次猛烈的攻击，突破了第一八四旅的阵地，迫使敌人退却。这时，敌机又一次飞来助战，红军巧妙地利用缴来的敌陆空联络讯号，诱使敌机越过我军上空，转而对开始溃退之敌轰炸扫射，使全线敌人陷入混乱。红军乘机攻击，敌全线崩溃，红军全线追击。这次战斗，歼灭第一八四旅一个营，打死打伤敌近千人。敌旅长钟光仁负伤。红军缴获各种枪四百余支和许多军用物资。

黄沙战斗的胜利使红十七师暂时摆脱了敌人的尾追与堵截，冲开了前进的道路，为会合红十六师继续北上争取了时间。更重要地是，红军在这一仗

中，虽然伤亡四百多人，但打出了威风，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锻炼了自己，同时也支援和鼓舞了正在艰苦奋战的湘鄂赣根据地的军民。

黄沙战斗后的当夜，红十六师由六十里外的九仙汤地区赶到黄沙。红十六师是湘鄂赣苏区的主力部队，师长高咏生，政治委员温锦惠，全师三个团共一千六百余人。时值寒冬，战士们大部分还没有穿上棉衣，有的赤脚着草鞋，生活非常艰苦，但战斗情绪很高，士气很旺盛。两师会合后，红十六师领导详细介绍了湘鄂赣苏区的情况。当时，湘鄂赣苏区内及周围共有国民党军六个师又五个旅，其中国民党军西路军第二纵队的第十八师、第五十师、第六十二师和补充第二总队，分别部署在高安、上高、铜鼓、修水、万载和萍乡地区；第三纵队的第二十六师和第三十三师在鄂南地区；暂四旅在瑞昌，独立第三十六旅和独立第四十三旅在德安和南昌之间；第十九师两个旅在平江和浏阳地区。湘鄂赣苏区军民在中共湘鄂赣省委领导下，正在紧张地反对国民党军的“围剿”。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各个重要城镇，并沿大的河流和主要道路建立了坚固的据点和封锁线，把湘鄂赣苏区割裂成大小十多块不相连属的地区。根据这种情况，红十七师和红十六师领导认为：两师会合后，敌人必然转移兵力寻找我军作战。因此决定：在向南浔路挺进的途中，要力求迅速隐蔽，避免和敌主力纠缠，消灭沿途妨碍我军行动的小股敌人；同时，深入动员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我军在敌区的政策，并以高度的积极性和坚韧性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根据中革军委指示，两师集中行动统由红十七师首长指挥。

二月六日，红十七师和红十六师由黄沙向北开进，经靖安县的塘埠、罗溪，十日晚渡过修水，十五日到达瑞昌县的大、小坳地区。红军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的方法，先后扫除了武宁县的横路，瑞昌县的王家铺、洞口源等地敌据点，消灭了部分保安部队，摧毁了一些反动政权；同时打了土豪，救济了群众，向群众宣传了党的政策，扩大了党的影响。由于红军行动秘密迅速，十四日通过横路后敌人才发觉红军是向南浔路挺进。

蒋介石企图利用红军远离根据地的机会，把红军消灭在修水和富水之间的狭小地区，急令暂四旅、独立第三十六旅、第四十三旅沿瑞昌、岷山、德安、永修铁路线加强戒备；令第二十六师位于武宁地区的一个旅和第五十师的一五旅沿修水南岸布防，防止红军南下；并以第十六师全部以及第五十二旅、第一八四旅、第一八五旅和第二十六师的两个旅共八个旅兵力，跟踪追击，寻找红军决战。

在敌重兵尾追的情况下，红军留第十六师于大、小坳地区牵制尾追之敌，掩护红十七师执行破路任务。红十七师于十七日黄昏抵达中革军委指定的德安县马回岭车站附近，准备破坏铁路。此时发现敌人增调了重兵，戒备严密。红军地形生疏，加之雨夜泥泞昏暗，又缺乏破路器材和经验，没有完成破路任务。这时，国民党军从四面压来，想把红十七师消灭在马回岭以西地区。红军必须迅速撤离，否则就有被消灭的危险。于是，红十七师立即返到德安县的九渡源和上、下陶庄一带山区，准备寻机再去破路。到二十日，国民党军追击部队第十六师已赶到德安县的叶家铺和张甫田地区，其他追击部队也兼程前进；瑞昌的暂四旅和德安的独立第四十二旅同时出动向红军进攻；暂四旅已与红军警戒部队接触。

红十七师领导鉴于敌人八个旅都围了上来，和红十六师的联系又被敌人切断，处境极其不利，于是决定迅速摆脱敌人，跳到修水以南地区。当时，

南面只有敌人一个旅，兵力少、空隙大。当天夜里，红十七师利用雨夜，秘密摆脱敌人，翻越秦山，到达陈山脚下。第二天，又利用敌军间隙，急行军一百一十里，到达了修水岸边的永修县柘林镇附近。修水是江西五大河流之一，这里是下游，河宽水深，不能徒涉，柘林附近的船只全为保安队控制，红十七师派出的一支二十余人的侦察队，化装成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的先遣部队，向对岸的保安队长喊话，要来了三只船，渡过修水，昂然直入柘林，先解决了柘林镇公所的武装，并命令他们为红军准备粮秣，在修水上搭了浮桥。这样，一枪未放，红军全部活捉了列队欢迎的土豪劣绅和保安部队，突破了敌修水封锁线。至此，红十七师粉碎了敌人合围红军于修、富两水之间的阴谋。

红十七师渡过修水后，除敌朱耀华指挥的三个旅尾随红军追击外，国民党军第十六师和第十九师、补充第二总队各两个团都赶到高安县的村前和高、万载地区，防止红军南返湘赣苏区，妄图将红军置于没有根据地依托的情况下加以消灭。二十六日，红十七师转移到修水县的石溪，根据中革军委命令暂作休整。三月一日，朱耀华指挥的三个旅跟踪而至，进攻红军，敌第十六师和第十九师也步步逼进。这时，红十七师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行军作战，已减员五百余人，部队非常疲劳，但又不能继续在石溪停留，因此，党组织及时地在部队中进行了思想动员，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的光荣传统，克服困难；动员干部党员发扬阶级友爱精神，起模范作用，帮助战士打草鞋、背枪、值勤、抬扶伤病员。当日，红军甩开敌人，继续向西转移，去幽居革命根据地寻找中共湘鄂赣省委。红十七师于二日进至修水县的来苏，下午四时许，与在这里防堵的敌第五十师接触，红军且战且走，战至夜晚，共打垮敌人六个连，到了来苏渡，摆脱了敌人，胜利地通过了武宁水封锁线。接着，红军以百里夜行军，于三日凌晨到达漫江宿营。当时，红军不知道第五十师的一个旅已进驻漫江附近的大榎、山口一带，只了解到敌碉堡群里有保安队数百人，战斗力不强，因此，除留少数人警戒外，大家安然入睡。上午八、九点钟，敌先头部队约四个营的兵力赶到漫江，实施偷袭。首先袭占了第五十团的警戒阵地，然后向漫江街第五十团驻地发起攻击。处于疲劳沉睡中的红军战士，闻声而起，很快投入战斗。后经第四十九团和第五十一团英勇反击，将敌全部击溃，歼敌一个营，缴枪二百余支，恢复了原来的阵地，并夺回了被敌人掠去的辎重。这次战斗给红军以血的教训：疏于戒备，没有派出侦察和及时掌握敌第五十师的动向，进驻漫江后，又未切断敌碉堡电话线，使敌人能用电话通报情况，给敌以可乘之机。

漫江战斗后，红十七师经复源、港口向湘鄂赣苏区进发。五日，到达中共湘鄂赣省委所在地——铜鼓县的幽居，找到了湘鄂赣省委，受到省委和当地军民的热情欢迎。根据地虽然遭受敌人多次严重的摧残，军民生活极端困苦，但是他们还是将自己仅有的红薯丝和笋干送给红十七师，给红十七师让房子、搭草棚、送铺草，帮助侦察警戒。根据地党、政、军、民的热情慰问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使红十七师全体人员深受感动。这时，红十六师也突破敌人的包围，回到了幽居。

红十七师和红十六师本拟遵照中革军委三月五日的电示，在这里进行两个星期的休整，然后待命行动。但是这时，敌人新的进攻又开始了。由于消灭红军的计划一再落空，蒋介石电斥国民党军西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刘膺古指挥无方，各部队作战不力，要刘查报贻误战机的指挥官，予以严惩，并一再

督令加紧向红军进攻。刘膺古赶忙调集五个师的兵力，向幽居发起新的进攻。敌以第十九师的第五十六旅，第二十六师，第五十师的四个团在西、北和东北三个方向防堵，以第十八师师长朱耀华指挥的三个旅，第十六师和第十九师的三个团由东、东南和南三个方向进攻，预定在七日拂晓开始攻击。红军察知敌人的进攻计划后，在中共湘鄂赣省委领导下，对当前的形势和行动方针进行了慎密的研究，认为敌人此次进攻，兵力多，部署严密，而幽居革命根据地地域小，人口少，粮食极端困难，不利于红军在内线作战，因此决定放弃休整计划，趁北面防堵的敌第二十六师部署还未就绪的时机，迅速向北突围，经修武崇通革命根据地（即位于修水、武宁、崇阳和通山四县交界地区的一小块根据地）向鄂南革命根据地机动，会合红三师。七日晚，红十七师又同红十六师一起，由铜鼓县的上、下杉出发，昼夜兼程向北急进，在修水县的塔台击退敌第二十六师一部的截击，又在古市岭打退了敌第二十六师和第五十师一部的追击，跳出了敌人的包围，于十日进到了以九宫山为中心的修武崇通革命根据地。这时，得知鄂南革命根据地已被敌分割，大为缩小，且湖泊遍布，有富水、长江障碍，机动困难。红三师仅有八个连，不足千人，分散活动于山区、湖沼地带，身着便衣，行动隐蔽，难以取得联系。而修武崇通革命根据地，这时也缩小到纵横不足四十里，人口仅有两千的一块狭小地区，粮食十分困难，既不利于久停，也不便与进攻之敌周旋。红十七师和红十六师的领导经过慎重研究后，认为向南行动，虽然面对敌第二十六师和第五十师在修水县的大源、横岭巷、港口卢和徐家庄一线的拦阻，但如设法摆脱敌人，向幽居和小源地区靠近，对部队的回旋机动较为有利。因此，决心南下，并得到了中革军委的批准。

十一日，红军向南行动。出发前，召集干部研究了行动方案，确定利用敌人空隙前进，避免与敌决战，如遇大敌拦堵，即掉头北上，使敌人由拦堵变成尾追，待甩开了敌人，然后再转向敌兵力薄弱的西南方进击。十二日，红军前进到修水县的沙龙桥以南，与敌第二十六师遭遇，即按照预定方案，红军转向通城县的塘口前进，再经金港和塘埠，到达水源，把敌第二十六师和第五十师甩在后边。十五日，红军由水源向朱溪厂前进。这时，得到个错误情报，说敌第十九师也被甩到后面去了，前面没有敌人的主力。加之连续两天顺利行军，便麻痹大意起来，放松了对前方的侦察警戒。其实，敌第十九师仍然在前面。红军在修水县的沙湾（龙门厂北）突然与敌遭遇，开始还认为是保安团，主动发起进攻，结果越打敌人越多，才知道是敌第十九师第五十七旅等四个团在这里堵截。红军猛打猛冲，企图夺路南下，但由于敌先我占领了有利地形，多次攻击，都没有成功，伤亡较大，还牺牲了几个重要干部——第五十团团团长李崇、第四十九团政治委员胡楚父和政治处主任曾杰等。红军被迫撤出战斗，西向平江的虹桥转移。虹桥是老苏区，群众基础好，红军到达后，老百姓纷纷送吃的、用的，看望伤员，倾吐想念之情。红军在虹桥补充了给养，并把红十七师在龙门厂战斗中负伤的百余名战士分散安置在群众家里。次日继续西行。在离开虹桥二十余里处，红军发现敌人尾追，马上折向西南，黄昏后又改道向南急进。十六日晚，在平江县嘉义、献钟之间的祠坪渡过汨罗江。十七日进到浏阳县的浏阳坳。浏阳坳是连云山的主峰之一，没有人家。当晚，红军就在这个周围数十里渺无人烟的浏阳坳大山上露宿，掬饮泉水，宰食马肉，采集野菜充饥。

红十七师和红十师的领导，利用在浏阳坳休息的短暂时间召开了会议，

对当时形势和下一步行动计划，再次进行了研究，认为：红十六、红十七两师已损失很大，红十七师减员一千三百余人，第五十团已拆散，编入第四十九团和第五十一团，且极度疲劳，必须尽快摆脱敌人，争取主动，依托根据地与敌人斗争，否则将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因此，决定红十六师暂回幽居，坚持湘鄂赣苏区的斗争，红十七师迅速返回湘赣苏区，并报经中革军委批准。

十八日，红十六师和红十七师分开行动。红十七师继续南下，敌第五十七旅等四个团尾追，敌第十六师第五十二旅、第一八四旅、第一八五旅、补充第四团以及独立第三十二旅，向万载和萍乡县的宣风、芦溪地区急进，企图阻止红

十七师南返。二十日，红十七师在桐木遭敌补充第四团堵击。红军边打边走，一昼夜行程一百五十里，终于摆脱了敌人。二十二日四时左右，红十七师在萍乡县的宣风和芦溪间的珠亭山附近强渡袁水，突破了敌第三十二旅的拦堵阵地，打垮了敌人的反击，胜利地回到湘赣苏区，并会合了红十八师。接着，进到永新县的黄岗、象形和花溪地区。

在红十七师转战湘鄂赣地区的同时，红十八师和湘赣苏区广大人民，为了保卫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反“围剿”斗争。

红十七师北上后，国民党军西路军第一纵队乘机加紧了对湘赣苏区的进攻。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和配合中央红军作战，在全体军民中进一步地加强了战争动员，把江西军区独立第三团、茶陵独立营、永新独立营和公略警卫营编成红十八师第五十三团，团长谭家述，政治委员余导群。同时，又把安福独立营两个连补充到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这样，红十八师就有了两个团近两千人，并组成师领导机关，由徐洪任师长，王震任政治委员（王震去瑞金开会时，由甘泗淇代理），龙云任参谋长，方礼明任政治部主任。经过扩编和补充，加强了红十八师的力量。湘赣军区抽调红军学校一部和军区警卫部队联合防守永新和宁冈两县交界的新、老七溪岭，并监视宁冈敌第十五师；将红十八师配置在潞江地区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同时命令各独立团和各县地方武装，深入敌占区，积极展开游击活动，破坏交通，袭扰打击敌人。

二月一日，敌第十五师根据刘建绪的命令，开始向湘赣苏区发起进攻。五日夜，敌第十五师师长王东原率第四十四旅和第四十三旅各一个团及迫击炮连，袭占了七溪岭侧后的龙源口。六日，敌两面夹攻七溪岭阵地。红军学校第四分校和军区警卫部队以少敌众，节节抗击，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七日，敌军攻占了永新县秋溪附近的柞源北山和葡萄岭的红军阵地。下午二时，红十八师由潞江赶来，给敌以很大杀伤。

敌第十五师在占领龙源口诸阵地之后，暂停下来建筑碉堡，囤积物资，准备下一步向永新县城进攻。这时，红十八师根据上级指示，以第五十二团在永新烟阁地区构筑工事；以第五十二团配合红军学校和军区警卫部队各一部在永新城南的东华岭地区构筑工事，准备抗击敌人进攻。二月十八日，敌人向东华岭阵地进攻，红军防守部队英勇抗击，终因众寡悬殊，被迫于当晚

江西军区独立第三团，系由江西军区独立第七师改编而成，于1934年1月奉命调至湘赣苏区活动。

红三军军长黄公略于1931年8月4日在吉安县东固地区作战中牺牲。根据地人民为了纪念他，于同年8月15日以吉安、吉水两县的部分革命根据地为主，连同永丰、泰和、兴国三县的部分革命根据地建立公略县，全县共十一个区，四十一个乡。公略警卫营是公略县的一支革命武装部队，1934年初调来湘赣苏区。

撤出永新城，向石灰桥地区转移。

敌第十五师占领永新县城以后，以一部兵力防守县城和维护永新、宁冈间的交通，主力则继续寻找红十八师作战。与此同时，莲花敌第六十三师、安福敌第六十二师的一八六旅和永阳敌第二十三师都开始筑碉向前推进，紧缩分割湘赣苏区。由于强敌压境，加上执行了“堡垒战术”、分兵把口、单纯防御等错误的命令，红军陷于被动地位，湘赣苏区日益缩小，斗争日益困难。

尽管如此，红十八师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仍然进行了积极的战斗，打击进犯之敌，保卫湘赣苏区。三月七日，在永新城南十里的自在亭伏击了敌第四十三旅；十八日，在永新县城以北的高车岭击退了敌第四十四旅的进攻；十九日，反击进占永新县潞江附近五马岭的敌补充第一总队，均取得胜利。红十八师在频繁的战斗中，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保住了花溪、黄岗和石灰桥一整块地区，为红十七师返回湘赣苏区准备了立足点。

红十七师北上行动，在湘鄂赣苏区红十六师的配合下，连续行军作战达两个月之久，驰骋三千里，历尽艰辛。由于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指挥机动灵活，先后与敌人四十六个团的围、追、堵、截相周旋，打垮敌人六个团，消灭了两个团，胜利地回到了湘赣苏区。这次行动，牵制、调动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但是，中革军委要红十七师北上的决定却是错误的。因为，这一行动的目的，是切断敌人战略交通运输线，威胁南昌，牵制、吸引赣江以东的敌人重兵，从而配合中央红军向北发展和反击敌人第五次“围剿”。而南浔路及其附近地区敌人驻有重兵，红十七师和红十六师仅有五千余人，并且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使自己暴露于敌人重兵把守的地域，事实上无法完成破坏南浔路威胁南昌、吸引赣江以东敌人这个重大任务。红十七师和红十八师分兵的结果，不仅使红十七师本身受到了削弱，而且湘赣苏区由于防守力量薄弱，在强敌进攻下，也遭到了极大损失，根据地日益缩小，给以后的斗争增加了很大困难。

第三节 沙市战斗的胜利

红十七师胜利返回湘赣苏区后，刘建绪企图趁红军极度疲劳且又严重减员，迅速发动进攻，歼灭红军于禾水以北、袁水以南地区。他除以第二十三、第六十三等师继续建碉，加强封锁湘赣苏区外，并令尾追红十七师的第十六师接替第十五师在宁冈和永新地区的防务，把第十五师全部集中于永新城，准备随时发起进攻。

为了对付日益逼进的敌人，三月底，中共湘赣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形势和红六军团的作战行动。会上，湘赣军区代司令员王震传达了中革军委的指示。王震在中央苏区向中革军委汇报工作时，中革军委负责人当面指示，湘赣红军的作战必须构筑碉堡阵地和实行短促突击，并具体规定了阵地构筑位置和工事的构筑方法。王震在中央苏区时，也曾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湘赣的斗争情况十分关心，听了王震的汇报后，启发说：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堡垒对堡垒你们摆得满吗？你的司令部摆在哪个堡垒上？接着就指示说，不能那样打，还是应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歼灭战，找敌人的尾巴或者腰部打，还是要用那个十六字诀。王震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也同时传达了毛泽东这个指示。会议在讨论红六军团当前任务时，以陈洪时为首的一部分人主张以强攻手段夺下永新，然后广泛构筑碉堡阵地，坚决贯彻中革军委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的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少数人认为红六军团当时减员较大，主张休整一下再打；而多数人认为：红六军团虽然经过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减员较大，但保存了骨干力量，军队杀敌复仇的意志高昂，又有根据地人民的积极支援；当面敌人第十五师骄傲轻敌，而且国民党军由永新到莲花和由永新到安福的交通还没有打通，敌人可能作长距离的运动，容易在行动中暴露弱点。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既无休整的可能，也不能硬攻敌有重兵防守和坚固设防的永新城，应该充分发挥红军长处，利用敌人弱点，积极寻找有利战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省委书记任弼时积极支持多数人的意见，同时严厉批判了强攻永新城的错误主张，并说服了主张避战休整的人。这种打运动战的正确意见，最后为会议通过，成为红六军团打击敌第十五师的作战方针。毛泽东的指示，对这次会议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但是，当时与会者还没有能够从战略高度去理解，因而这一指示没有也不可能使红六军团从根本上改变对错误路线的执行。

根据当时情况判断，敌第五十师可能首先打通由永新到莲花的交通，然后向黄岗和花溪地区进攻。于是，红六军团领导率领干部到永新通往莲花的大道上现地勘察地形，选择战场，预定了在沙市地区以伏击手段截击敌人的作战方案，并报告了中革军委。

三月三十日，中革军委复电同意在沙市地区部署歼敌，并指出：“我十七、十八两师主力应先在适当地区隐蔽，待敌后梯队到，即一齐猛攻，解决敌人，先头部队如已发觉我军，（突击队）不应待敌展开，即行猛烈短促侧击其前梯队，使其后梯队赶不及。”

四月四日，红军通过在永新城里的秘密组织，得到敌第十五师在城内做干粮、抓民夫，准备五日向沙市进犯的消息。沙市位于永新县城以西，距城四十五里，是通往莲花的必经之路。永新到沙市的大路，南侧为禾水，北侧由永新到澧田段，为地势比较险峻的大山，由澧田到沙市段，近路处为丘陵，树木茂密，便于隐蔽。敌人从永新城里出来，只能成一路纵队，队伍必然拉

得很长，比较好打，如果集中兵力打击敌前梯队，速战速决，敌后续部队将来不及增援。于是，红六军团连夜由黄岗、花溪开向沙市至澧田大路以北三四里的地区，潜伏在丛林杂草之中，准备伏击敌人。拂晓前，各部队均按时进到了指定位置：红十七师第五十一团在沙市东北，第四十九团在乌宗南面，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在汉山附近，这三个团，集中在沙市到涂下垅四里多正面的阵地上担任突击，打击敌人先头部队；红十八师第五十三团在谭家村后山和悦义亭之间，红军学校在禾水南岸的江背和南城地区，第四十九团一营为军团预备队，在乌宗附近，准备担任侧翼迂回任务。侦察部队和作述区、象形区游击队，共同在澧田和沙市之间沿途设置了六个递步哨，哨所在利江口、指路牌、肖汉、井上、大花岭和打鼓塘。递步哨的任务是：当敌人先头部队接近哨所时，即放地铳或手榴弹，向指挥所报告敌先头部队到达地点。军团指挥部的作战计划是：集中力量打敌人前卫旅，待敌先头部队到达沙市、澧田之间的时候，即以三个团同时并肩出击，从一翼突击敌人行军纵队；以第五十三团和红军学校在澧田西面禾水两岸占领有利阵地，阻止敌后续部队增援和先头旅回窜。

五日拂晓，国民党军第十五师和第十六师的第四十七旅共四个旅，以第四十七旅为先头，从永新城出发，成一路纵队向澧田前进。这天，刚下过雨，道路泥泞，且又浓雾弥漫，敌人行进速度缓慢，敌人根据情报，认为红军主力正在赣江西岸及其附近地区活动，加之前几天敌第十六师一路平安地从茶陵到了永新，因而放松了戒备。七时左右，第四十七旅进到澧田村，停止在澧田及其东北的高地阳春岭一带，构筑工事，掩护第十五师向沙市前进。第十五师前卫第四十三旅的先头部队，十时许进到沙市以东小高地。这时，红军第五十一团和作述区游击队首先向敌人先头团猛烈开火，杀伤和压制了敌人，接着就向敌行军纵队进行突击。敌军先头团还未构成战斗队形，火力无法发挥，仅半小时，就被红军击败。与此同时，红军第五十三团占领了谭家后山与和丰亭阻击阵地，红军学校也在江背北侧展开，以火力将敌第四十三旅和后续部队割裂开来，使敌后续部队无法救援。红军第四十九团和第五十二团听到第五十一团与敌打响，便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这时，十余里的山冈上，到处是枪声和红军战士的喊杀声，打得敌人措手不及，队伍大乱，狼狈逃窜。敌第四十二旅旅长侯鹏飞见行军纵队全面遭到红军突击，急忙率领旅直属部队和后卫第八十六团占领大路北侧的王坳、练屋里一带高地，负隅顽抗，等待师的后续部队前来增援。当第五十一团击破敌先头团后，军团即以预备队投入战斗，与第五十一团协同沿大路北侧高地向东攻击，第四十九团主力和第五十二团集中突击扼守在王坳、练屋里高地之敌。红军士气高昂，越战越勇。国民党军仓促占领阵地，来不及构筑工事，仓卒应战，指挥失灵。仅三四十分钟，红军就将王坳、练屋里高地之敌歼灭。到下午一时许，干净彻底地歼灭了敌第四十三旅。少数敌人跑到禾水以南，也都被红军学校和地方武装消灭了。

在红军猛攻敌第四十三旅的时候，敌第十六师四十七旅和第十五师的后续部队，向第五十三团发起疯狂进攻。第五十三团全体指战员为了保障主力顺利地消灭敌人，团结一致，坚守阵地，顽强阻击。敌人受地形限制，难以

湘赣革命根据地人民为了纪念作战牺牲的红三军第九师政委刘作述，将澧田、沙市区改名为作述区。刘作述系永新县澧田人。

全部展开，发起的五次冲击，都被打退。第五十三团胜利地完成了阻援任务。

沙市伏击战，速战速决，打得干净利落。整个战斗仅用两个小时，就全歼了湘敌第十五师第四十二旅，俘敌第四十三旅旅长侯鹏飞、旅参谋长赵楚卿和第八十五团团团长徐本桢以下一千余人，毙敌六百余人，缴获步枪二千余支，以及许多其他武器和辎重。

沙市伏击战胜利后，红六军团鉴于澧田尚有三旅六团敌人，立即将主力转移到沙市、澧田间以北七八里的山地待机。下午，约两旅敌军向红军进攻，红军奋勇反击，与优势之敌在稀疏的丛林里恶战，最后将敌击溃，敌退澧田固守，红军停止进攻，此役即告结束。

沙市伏击战，是红六军团在劣势的情况下，贯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以劣胜优的一个成功战例。当时，红军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处于劣势，能一举歼灭敌人一个旅，是很不容易的。这次战斗胜利，给深入湘赣苏区的敌人以沉重打击，挫败了敌人企图消灭红六军团于禾水与袁水之间的狂妄计划，暂时缓和了湘赣苏区的紧张局势，振奋了红军和群众的斗志，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沙市战斗后，红军士气高涨，群众情绪高昂。四月十五日，敌第六十二师由安福向莲花开进，准备在安福与莲花之间修筑碉堡封锁线，分割湘赣苏区。敌第六十二师一八六旅奉命进驻距莲花县城二十多里的田里（属安福县境）。红六军团得知敌人企图后，决定红十七师、红十八师一齐出动，乘敌立足未稳，集中兵力打击敌第一八六旅。红军绕道先敌到达田里，预伏于神龙山东南麓及其附近村庄里。上午十时，第一八六旅经青石桥到达田里，红军分几路突然向敌发起进攻。敌人来不及展开成战斗队形，很快即被击溃。红军乘胜追击，经两小时激战，毙伤敌三百余人，缴枪二百多支。后溃逃之敌分别占领了田里西北及东北一带高地固守。红军与敌所占高地之间全是水田，泥泞难走，不便进攻。红军几次诱敌来攻，敌人只是以重机枪、迫击炮向红军射击，不敢下山。停晚，红六军团首长考虑到敌援兵将来，便率领部队转移。

第四节 金华山和松山单纯防御战

沙市、田里战斗相继取得胜利，意义是重大的。但是，在敌人重兵进攻下，湘赣苏区的反“围剿”形势仍极其严峻。

国民党军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将第六十二师的第一八四旅拨归第一纵队战斗序列，同时请求蒋介石增调援军加强第一纵队。国民党军西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把第六十二师一八六旅由安福调到沙市地区，辅助第十五师构筑由澧田到沙市、潞江的碉堡封锁线，安福防务由第一八四旅接替；令补充第一总队沿潞江至苍山口之线建碉；第六十三师除修建良坊、路口、洋溪至田里一线碉堡外，还在铁冠岭、蔡家坪、陈山一线构筑前进阵地；第十六师构筑由永新到澧田和由永新到新城的碉堡。国民党军企图以隐扎稳打，步步为营，处处建碉，层层封锁，节节“进剿”的战术，逐渐消耗红军人力物力，逐步紧缩对湘赣苏区的包围，将红六军团压迫和封锁于花溪至石灰桥一带狭小地区，待援兵到达后，与红军决战。

这时，中央红军在错误路线领导下，正在继续执行单纯防御、短促突击的作战方针。中革军委指示湘赣军区及红六军团也要贯彻这个错误方针，以阵地防御战来保卫永新平坝子，打败湘敌进攻，配合中央红军作战。而湘赣苏区的领导人在思想上也不愿离开永新平坝子，想保住这一小块根据地。在这个方针和这种思想指导下，红六军团从这个时候起的一个时期内，就完全遵照单纯防御路线的一套战略战术原则进行作战了。

湘赣苏区军民在省委提出的“为保卫苏区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口号下，进行了紧急动员，接着在花溪、象形以北的九重门、公公山、天龙山地区和永新城西北的高汶、台岭上、钱市街地区以及永新城以东的石灰桥、金华山和永新北面的松山诸地，广泛构筑碉堡工事，准备以阵地防御战阻止敌人的进攻。五月下旬，国民党军在永新、莲花间的碉堡封锁线已经基本建成，援兵独立第四十六旅已经到达峡江地区，第五十三师正由赣江以东向安福调动。为了进一步分割湘赣苏区，敌人将第十六师和第六十二师的一八六旅共四个旅的兵力，集中到永新地区，准备向石灰桥进犯，打通与吉安的联系。湘赣省委和军区获悉敌军企图后，立即将省委机关及后方机关转移到永新东南的牛田地区。同时命令红六军团进至石灰桥地区，阻击敌人。红六军团以一部兵力占领金华山、茶子山等既设阵地。同时，以少数主力部队协同永新模范赤少队（约二百余枪）控制永新城以北的仰山、月岭、虚皇山和埠前诸阵地，主力集结在石灰桥地区，准备抗击东进的敌人。

六月三日拂晓，国民党军第十六师三个旅，在永新城郊东华岭的第一八六旅策应下，向红军的金华山阵地发起猛攻。红军冒着大雨，依托工事，顽强抗击优势之敌，打退了敌人多次冲击，一直激战到中午，敌人才爬上茶子山和马岭等前沿阵地。这时，红六军团集中三个团的兵力，在红十七师首长指挥下，乘敌立足未稳，实施猛烈反击，将敌人打回到东华岭的进攻出发地，毙伤敌副旅长李国强、团长唐肃以下官兵三百余人。

六月中旬，援敌第五十二师进到了安福和安福县的金田地区，积极准备向永新县东北的怀忠方向进犯。国民党军第十六师由于遭受红军在金华山地区的坚决抵抗，不能进展，便于六月二十四日改变进攻方向，除留一个旅控制禾水南北重要据点外，将两个旅和第六十二师一八六旅转移到禾水以北，向红军防守力量薄弱的仰山、左岭、月岭、埠前和虚皇山等阵地进攻，并于

当天分别占领了上述地区，企图从这里迂回到红军金华山阵地侧后的交通要点石灰桥，同时策应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师的进攻。

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师和第十六师及第一八六旅，东西对进，相距近三十余里，不仅在战役上已取得密切配合，而且在战术上也可取得协同。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继续在永新地区作战是不利的。但是，红六军团不仅没有及时转移，实行机动作战，相反，却错误地采取了分兵防御的作战方针，企图同时阻止东西两面敌人的进攻。

六月底，红六军团留红十八师控制金华山阵地，以少数部队和地方武装扼守钱市街以东高地，继续阻击国民党军第十六师和第六十二师一八六旅的进攻，主力红十七师转移到神功山和松山地区，阻击敌第五十三师西进。红十七师进到松山地区后，以经过补充恢复建制的第五十团防守神功山，第五十一团防守松山，第四十九团一部控制香炉山，一个连防守观音座莲，主力集结于丰塘为军团预备队；红军学校沿怀忠通金田大路北侧一带小高地担任战斗警戒；军团指挥所在金鸡坡，观察所在香炉山。

七月一日上午九时，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师开始进攻，在炮兵和飞机的支援下，首先集中兵力攻击红军的神功山阵地，主力在虹桥展开，从正面进攻，一部兵力迂回到桂林坊，从翼侧攻击神功山东麓。敌以优势兵力宽正面进攻，红十七师第五十团及全线前沿部队，在敌人优势兵力和火力的猛烈攻击下，顽强奋战，对当面之敌反冲击，打退了敌人多次疯狂攻击，不仅杀伤了大量敌人，还缴获许多武器弹药。战斗到黄昏以后，红军始撤出战斗，向南转移到永新县的高桥头地区。

七月二日十时，国民党军转向第五十一团防守的松山阵地进攻。敌主力以神功山为依托，经宁家、下边攻击松山东山头，另以一部兵力经南田、上塘向红军学校警戒阵地进攻，占领怀忠、下木栅，接着从红军左翼迂回松山西山头。守在东山头上的第三营和机枪连，顽强地顶住了正面敌人的多次猛烈冲击，并向敌进行了反击。西山头上的第一营，也给迂回之敌以重大杀伤。战斗到下午四时，第五十一团由于遭受敌人的两面攻击，形势不利，撤出战斗，转移到香炉山阵地。防守观音座莲的第四十九团的一个连，也同时撤到丰塘归建。

七月三日中午，占领松山的敌人分两路向香炉山进攻，敌人数次进攻被打退后，下午二时再次发动猛烈进攻。红军第四十九团和第五十一团待敌人冲到香炉山脚下时，发起反击，歼敌一部，缴枪九十多支，将敌人压回到松山。但此时敌第二梯队已向松山运动，准备组织新的进攻。于是，红军即撤出阵地，向南转移到永新东乡的高桥。当晚，红十七师南渡禾水，回到金华山和梅田地区。

在敌第五十三师进攻香炉山阵地的同时，敌第十六师攻占了钱市街以东红军阵地。

敌第十六师乘红十七师向南转移时，于三日晚占领禾水以北的南田地区，四日拂晓，又南渡禾水向金华山阵地进攻。

红六军团在金华山地区三面受敌，处境十分不利，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予敌一定打击后，于四日下午转移到永新县东南的牛田和津洞地区，准备恢复和依托井冈山地区，继续坚持斗争。

金华山、松山战役历时一个多月，红六军团全体指战员，在党的领导下，发扬英勇顽强、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给了敌人重

大杀伤。地方武装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也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湘赣苏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作战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不畏艰险，千方百计支援红军作战，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金华山、松山战斗由于执行单纯防御路线，结果是失败了，不仅没有实现保卫永新平坝子的计划，反而削弱了红六军团，使根据地进一步缩小，斗争形势更加严重。

第五章 红六军团西征——执行中央 红军长征先遣队任务， 由湘赣转移到黔东

第一节 胜利突破堡垒封锁线

一九三四年夏，红六军团由于执行“左”倾路线的错误作战方针，在金华山、松山地域实施消极防御作战连连失利，湘赣苏区的斗争形势日益恶化。敌军主力已深入苏区腹地，原有的整片苏区，已被八个师的敌人包围并分割成若干小块。敌人一面在苏区周围和中心区域以及交通要道加紧赶筑封锁碉线，一面积极调整部署，集结兵力，准备与红军决战。这时，红六军团已被迫转移到永新东南的牛田、津洞狭小地区，在敌人重兵包围和严密封锁下，处境十分不利。

湘赣省委和军区为了摆脱被动局面，虽然也曾决定，乘敌人决战准备尚未完成之际，以红六军团主力迅速恢复以大小五井为中心的井冈山原有根据地，然后，依托井冈山向南发展，在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遂（川）、万（安）、泰（和）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聚集力量，为最后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准备条件。并依上述决定展开了积极的活动。但这些行动，只能是暂时地缓和湘赣苏区和红六军团的处境，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斗争局面。在整个苏区被敌包围、分割，交通要地被敌占领，而且各路敌军都已打通联系取得协同的严重情况下，红六军团期求在湘赣苏区内部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已无希望。与此同时，中央红军也由于错误作战方针的指导，屡战受挫，各路敌军已逼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区，根据地日益缩小，形势日益严重，中央红军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已没有可能。

在这种严重形势下，红军本应及时地转变战略方针，尽可能保持红军的有生力量，以便到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战机，歼灭敌人。可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在战略转变和实施突围的问题上，采取矛盾态度：一方面开始了退出苏区的准备，一方面又要“用一切力量捍卫苏区”，命令红军“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继续同敌人拼消耗。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七月二十三日训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转移到湘中创建新的根据地。

训令中说：“中央书记处及中革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并说，作出这个决定的主要考虑是：“……红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在苏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资的供应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是使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的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湘中地区作战，“给湘敌以致命的威胁，迫使他不得不进行战场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署，这将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训令中，对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的路线、行动步骤以及到达地域都作了具体规定，要求“六军团由黄坳、上下七地域敌工事守备的薄弱部分突围，第一步到达湘南桂东地域，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第二步应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第三步向新化、溆浦

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二军团 切取联系”。

在这个训令中，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红六军团实施战略转移的目的并未全部透露。实际上，不仅是要红六军团到湘中创建新的根据地和联络红三军，更重要的，是要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先遣队，由湘赣苏区先期突围，深入湖南，调动敌人，摸清情况，探探路子，在湘中地区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以便中央红军在尔后向贺龙、夏曦、关向应领导的湘西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时，有一个立足之地。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训令还明确规定：“留在现苏区的应为省委、省苏、军区及各分区、地方党政组织。地方的独立团（营）和游击队，担任继续发展游击战争、捍卫苏区。”同时决定，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以任弼时为主席，肖克、王震为委员组成军政委员会，为红六军团西征行动的最高领导机关。训令要求一切准备工作统限八月中旬进行完毕。

湘赣省委和军区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训令进行了慎密的研究，认识到，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挺进湘中创立新的根据地，是一项十分艰巨的战略任务。红六军团在这个战略行动中，先是要打破敌人的重兵包围，接着要在盛夏时节进行长达几千里路的远征，远征中必将遭到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和自然界的无数险阻，且孤军深入敌区，脱离根据地作战，只有经过血战，击败敌人，以坚强的毅力冲破重重困难，才能完成任务。根据这些行动特点，省委和军区领导红六军团进行了周密的行动准备。

为了鼓舞士气，作好思想准备，红六军团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任弼时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立新的根据地”动员报告，从政治上、战略上解释新任务的重大意义，号召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团结一致，依靠群众，发扬红军英勇顽强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他根据部队可能出现的思想动向，特别提出要防止在战略转变关头可能出现的惊慌失措和消极动摇情绪。

在思想动员和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组织上加强了政治机关。并根据新任务的特点，在全军团开办短期训练班，集训了政工干部；又从地方抽调二百五十名干部，组成随军工作团，作为创建新根据地的骨干力量。工作团在西征途中，在政治机关的统一领导下负责宣传、组织群众，扩大红军，维护纪律，处理战俘和筹粮筹款等工作。

湘赣省委和军区尽最大的努力为红六军团补充兵员，充实武器装备。通过调整机关缩减与合并直属部队，清理医院伤病员，动员战士归队等，挑选出青壮精干人员近三千人和枪五百余支补充红六军团，对不能随军行动的老弱病残人员进行了妥善安置。红六军团经过补充与整顿，由六千八百多人增加到九千七百多人，枪三千七百多支，红十八师增编了第五十四团，并从红军学校调出大批受训学员，将部队各级正副职干部全部配齐。

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部队进行了紧张的行动准备工作，打草鞋，做干粮，补充弹药，进行着装演习，实施行军、侦察、警戒训练等。

湘赣省委经过详细研究，确定了湘赣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总部署。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湘赣省委临时常委会，以陈洪时、旷光明、谭余保、姚原德、旷逸爱、王用济、张云逸等七人为常委，以陈洪时为书记。按照当时苏区被分割的情况，调整了县委组织。同时，组成

红二军团，即红三军。

了湘赣军区新的领导机构。由于原定来湘赣苏区任军区司令员的张云逸途中生病未能到职，改以彭辉明任湘赣军区司令员。对留下坚持斗争的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团的活动范围和作战任务，作了调整。

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对突围行动进行了认真周密的研究。认为，黄坳、上下七地段山大路险，敌人的堡垒线已经构成，不便大部队运动，由此向西突围，容易遭受宁冈之敌的堵截和永新之敌的追击，且易过早暴露我军的行动企图；遂川以北的衙前、五斗江一线，敌兵力比较薄弱，间隙较大，封锁碉线也未全部构成，从五斗江到桂东长达二百多里的纵深内，虽然尚有数道封锁碉线，但防守部队多是反动地方武装，战斗力不强，地形也便于我军迅速运动，又不致过早暴露我军西征的企图。因此，确定红六军团首先在衙前到五斗江地段上突破敌人内层封锁线，然后，沿湘、粤两敌结合部的间隙地带穿越，不分昼夜地向西急进，从行进间一鼓作气地突破五斗江到桂东之间的其他封锁碉线，冲出敌人包围圈，进到桂东以南地区，尔后行动根据情况再作决定。为保障红六军团顺利突围，决定以留守苏区坚持斗争的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等四个团担任掩护任务，分别在永新、安福、莲花以及万安、泰和等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

牵制北线和东线敌人；调在桂东活动的独立第四团北上，查明南线敌情并接应红六军团。

八月初，敌人对湘赣根据地的封锁碉线，除南部黄坳、五斗江、衙前一线尚未完成外，其余封锁碉线均已基本完成，敌人的机动作战兵团开始秘密调动：第十五师向五斗江及其以东地区集中，第十六师向黄坳、息镛一线机动，第六十二师向永新以南的龙源口、峨岭仙地区调动。位于南康地域的粤军余汉谋部，也奉蒋介石的命令北进。湘、粤两敌企图一俟部署调整完毕，即向红军发动全面进攻，首先歼灭红六军团，摧毁湘赣苏区，尔后再向东配合主力进攻中央红军。红六军团发现这个新的情况后，向中革军委建议，乘敌南线部队正在调整部署，封锁碉线尚未构成，尤其是敌第十五师尚未到达衙前、五斗江地域的有利时机，提前于八月上旬突围，并将部队隐蔽推进到遂川以北的横石和新江口一带便于机动的地域。

红六军团的建议得到中革军委的批准后，遂即派独立第五团渗入赣江沿岸万安县的下东和沙塘一带活动，伪装红六军团，侦察赣江水势，并扬言红军主力将分三路东渡赣江，以迷惑敌人；又于八月五日派出一部兵力，以突袭手段，攻占了敌内层封锁碉线上的重要支撑点衙前，建立了突围的翼侧掩护阵地。接应部队独立第四团赶到后，八月七日下午三时，红六军团在军政委员会领导下，告别了长期哺育它的湘赣苏区人民，离开了红军以鲜血建立起来的湘赣苏区，开始了英勇的西征。

在独立第四团的接应和掩护下，红六军团由横石、新江口地域出发，以突然行动，首先在遂川以北五斗江以东的溪口，突破敌人正在抢修的衙前至五斗江的封锁碉线，再经下长隆、枫树坳、官坑连续突破敌遂川至黄坳、遂川至七岭的封锁碉线，八日袭占藻林，全歼守敌地方民团，九日攻占左安。红六军团不顾盛夏酷热，昼夜兼程，一鼓作气在猴子岭又突破敌寒口至广东

到 1934 年 7 月止，敌在湘赣苏区周围和根据地中心区域，共构筑封锁碉线十五条（其中纵线十条，横线五条），碉堡、土寨共两千多座。在这些封锁碉线中，除南线的黄坳、五斗江、衙前一线尚未构成外，其余封锁碉线均已基本完成。

桥的封锁碉线，于八月十一日进到桂东以南的寨前圩，当晚派出前卫第五十三团占领沙田，并将寨前圩到沙田之间二十余座碉堡全部摧毁。至此，红六军团胜利地突破重围，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这次突围是很成功的。红六军团这支只有九千多人的部队竟然能在八个多师且装备精良的敌人重兵包围和严密封锁下，撕开它的防线，冲出重围，而又保持了自己部队完整无损，充分显示了这支部队的英勇善战；也充分证明，军团在战役指挥上，从突围前对敌情的掌握和分析判断，到突围方向的决定，突围时机的选择，各项保障措施的组织，以及突围行动的指挥，都是正确的。红六军团的突围，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迫使它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

红六军团的胜利突围，在敌人的战略西线打开缺口，湘赣两省敌军大震。蒋介石急令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及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派出主力部队联合出击，追歼红六军团。何键急派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率第十五师、第十六师、第六十二师等三个师及补充第一总队，昼夜兼程实施追击。当时，刘建绪采取的紧急对策是，尽一切力量，首先巩固湖南省防，确保其后方安全，然后再组织“围剿”。因此，他急令第十五师和第十六师轻装前进，日夜兼程对红六军团实施侧击和堵击，力图把红军堵在湘境之外；并令段珩旅并指挥胡风璋部以及湘南地方武装，全力火速布置桂东汝城等湘边防务，以阻止红军深入湘南。还令第七十七师指挥第二十八师一个团及鲍刚旅在遂川以东沿赣江西岸统筹配备沿江防务，严防红六军团东渡赣江会合中央红军。

红六军团到达寨前圩后，利用敌人兵力尚未集中的有利时机，进行了短暂休整，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大会，庆祝突围胜利，并作了进一步的战斗动员。在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和主要干部的任命。肖克为军团长兼红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治委员兼红十七师政治委员，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兼红十七师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十七师政治部主任；龙云为红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为政治委员，谭家述为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部队再次进行了轻装。

红六军团考虑到：突围后，敌军必将派重兵组织“追剿”，而桂东地区虽是游击区，但距湘赣敌军主力很近，便于敌人对我实施包围，且便于与封锁包围湘赣苏区的敌人取得密切协同，对红军极为不利。因此，决定放弃在湘南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计划，迅速行动甩开敌人，直奔第二步目标。于是以急电报告中革军委，并对独立第四团的行动予以部署后，于十二日夜由寨前圩出发，取捷径向郴州方向急进，十二日进到桂东以南的田庄地区。

这时，刘建绪判断红军“有继续西窜扰乱湘边之势”，紧急布置了对红六军团的“会剿”：以第十五和第十六两个师，并列摆在桂东及其东西一线地区，由北向南压迫红军；着段珩旅并率湘东南五个保安团，在汝城、资兴、郴县之间，以彭公庙、青要圩、渡头司、滁口、文明司一线大山为主阵地，凭借险要地形，构筑工事，堵击红军。电请南路粤军派部队北上配合，企图将红六军团困歼于桂东、资兴以南，汝城以北山区。刘建绪为了完善这个作战部署，还派出得力部队坚守汝城，迫使红六军团由汝城以北向西行动，进入他预设的战场；并在作战区域大量派出侦察、密探和实行坚壁清野，封锁桥梁要道，给红军行动制造困难。但是，刘建绪的这个作战计划是脱离实际的，他根本没有搞清当时红军的准确位置，误认为红军还远在桂东以东的高

坪圩地区，实际上红军早已进到汝城附近，当他于十六日还在紧急频繁地调动“会剿”部队时，红六军团早已越过他预定布设的防堵阵地进抵郴县城下，把“会剿”部队远远甩在了后边。刘建绪的“会剿”计划，从出台到收场，前后只有三天，就不战自破了。

第二节 抢渡湘江，转战湘桂黔边

红六军团以迅雷之势越过郴、宜公路，二十日袭占新田县城，全歼守敌保安团，缴枪一百六十支。在连日进军中，红六军团发现湘敌后方兵力极为空虚，在郴、宜公路以西广大地区，除部分县城有保安团少数武装防守外，没有发现敌军正规部队的踪迹，红军所到之处如人无人之境，判断敌人在湘江沿线也很少有重兵防守。为了争取先机，“减少将来渡湘江的困难”，红六军团决心以强行军直奔湘江，在零陵附近地区乘虚抢渡。这个决心于二十日报军委后，部队即开始行动。此时，湘敌刘建绪发现红军“有向祁阳、零陵间偷渡湘江西窜之样”。他认为：前有湘江天险拦阻，后有重兵“追剿”，如再取得桂、粤两军的配合作战，这正是歼灭红六军团的极好时机，遂即决定：“以聚歼该匪于湘江右岸为目的”，组织对红六军团的围歼行动。从八月二十一日起，以湘江为目标围绕着抢渡与反抢渡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双方都在紧急调动部队，抢时间，争速度，以夺取先机之利。

在湘江兵力极度空虚的情况下，何键和刘建绪为了调集部队解决燃眉之急，抽出警卫省会长沙的警备部队和大量地方保安部队，防守湘江，还将长沙、萍乡、醴陵地区部分列车以及茶陵、醴陵、萍乡、湘潭、宝庆等县的汽车全部集中，由西路军交通处控制，用来紧急输送作战部队。他们把第十九师段珩旅由郴州以汽车运到祁阳，连同就近调来的朱帮纪、王见龙、袁建谋、唐肃等部共六个团，统归段珩指挥，在归阳至零陵地段上，沿湘江北岸并列展开，抢先占领沿江有利地形，构筑阵地，堵击红军，将长沙警备部队独立第三十二旅从长沙以汽车运至宝庆，并指挥保安第六区晏国涛部共四个团，担任老埠头至绿埠头地段湘江左岸防备；令第十五师紧随红军尾追，由南向北压迫红军于湘江右岸地区；将第十六师以汽车运至常宁及其附近地区，准备从湘江右岸侧击红军，并防止红军向东突围；从湘鄂赣边刘膺古防区调出补充第二总队何平部（两个团）到宝庆待命；电请桂军派兵出全县、零陵，粤军派兵出宜章配合作战。这样，湘、桂、粤三省总共计划动用二十八个团的兵力，采取联合行动，企图围歼红军于零陵附近地区。此外，刘建绪还把前敌指挥部迁到衡阳，下令将零陵至归阳沿湘江一线所有船只一律拉往北岸，并断绝水上交通，着各防守部队组织游击队远出湘江右岸游击，迟滞红军前进。为了不使红军利用零陵城作为渡河点，刘建绪着段珩旅派出一个营死守零陵。

红六军团二十一日由新田出发，在道路崎岖难行的大山区，三天行进二百四十里，于二十三日二十四时赶到零陵以北的蔡家埠地区。这时，才发现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敌段珩旅及保安部队已先我一天到达湘江，并已沿江展开，敌追击部队第十五师已进到阳明山地区，桂敌第十九师及广西民团两个团正分向道县、零陵前进，零陵到归阳沿江一线所有船只已被敌拉往左岸，这一带江面宽阔且连日降雨，江水暴涨，不能徒涉。在这种情况下，按原定计划抢渡已不可能。因此，红六军团当机立断，决定放弃在零陵地区抢渡湘江的计划，迅速向东南转移，进入阳明山山区，准备在该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阳明山为中心的根据地，求得暂时立足。二十四日红六军团在分水坳地区击退了追敌第十五师，二十五日进入阳明山后，发现这里地瘠人稀，十分荒凉，且区域狭小，大部队活动甚为困难，不便建立根据地。这时，中革军委也致电红六军团，除通报了“敌人拟于零陵地区与我决战”的重要情况

外，还指示红六军团立即行动，转移到阳明山以南地区，给追敌第十五师以打击，然后在道县以北地区渡过潇水，尔后“经道县、全县地区进到城步，或不经全县而经湘、桂边境转至新宁、巫山地域”。红六军团根据军委通报的重要敌情，决定先在阳明山山区与敌兜圈子，相机甩开敌人，然后再按照军委的指示行动。二十六日，红六军团连夜东下阳明山，拂晓进到白果市，全歼当地反动武装，并捣毁国民党阳明山特别区公所，活捉了曾任阳明山县县长的奉明托。当敌人发现红军东移而赶来白果市时，红六军团已由白果市急转南下，进到石家洞地区，打退了敌第十六师的追击，并利用夜暗在永安圩附近秘密穿过敌第十五师的防堵部队，于二十八日进到嘉禾县的广发圩。敌人遂由北而南追来，红六军团急转西上，连续急行军三天，于八月三十一日乘虚在道县以南的薛家厂安全渡过潇水，把追击之敌远远甩在后边。敌人追又追不上，堵又堵不住，打又打不着，被红六军团牵着鼻子兜了一个大圈子，走了上千里路，一无所获，反而搞得昏头转向，疲惫不堪。刘建绪企图在零陵地区围歼红六军团的计划，在红军忽东忽西、飘浮不定、机动灵活的行动下，以失败而告终。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对前线战况大为不满，严厉斥责了追堵部队，并将作战不力的第十六师师长彭位仁等军官撤职查办。

早在红六军团准备在零陵附近抢渡湘江时，桂军判断：红军如不能在零陵一带过江，则有可能转入广西，由上游渡过湘江。桂军十分惧怕红六军团进入广西或在广西建立根据地，因此，采取了积极配合湘军行动，借助湘军的力量把红六军团阻止于广西境外的对策。红六军团从阳明山南下到达嘉禾地区并向西急进时，桂军连夜进行了紧急的调动：令第十九师驻守兴安的第五十五团前出到湖南道县的蒋家岭；调黄沙河的第五十六团前往道县；将全县的第五十七团派往江华；调柳州地区第二十四师部队北上增援。此外，还动员了桂林、平乐、柳州三区民团在湘桂边界地区加紧修筑工事、设置路障、哨卡，企图将红六军团堵在广西境外。

红六军团在道县、江华间穿过敌军接合部，安全渡过潇水后，绕过道县、寿佛圩桂军第十九师主力的防守地域，经达村、高明桥于九月二日拂晓进到蒋家岭时，遭桂军第五十五团一个营及民团的阻击。军团前卫第五十二团当即展开向敌发起攻击，激战四个小时，将敌击溃，在向纵深发展时，防守道县和寿佛圩的桂军第十九师主力前来增援。为避免腹背受敌，红军遂撤出战斗，向北经清水关进入广西，当晚占领文村（今文市）。红六军团判断：位于蒋家岭地区的敌第十九师主力部队，很可能对我尾追不舍，如不给敌以严重打击，将对以后行动不利。因此，决定主力继续前进，以后卫第五十三团全部及第五十团一个营，在文村地区占领有利地形，迎击该敌。下午，桂敌第十九师两个团在师长周祖晃的率领下，连同湘敌第十六师一部追来，在三架飞机的支援下，连续发起数次猛烈攻击，均被击退，伤亡惨重。后卫部队完成阻击任务后，当晚撤出战斗追赶主力。敌遭此打击后，便不敢贸然行动。为红军尔后抢渡湘江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当红六军团进入广西灌阳县的文村时，湘敌刘建绪根据早已过时的情报，误认为红军还在湖南道县以西的高明桥。他判断：“红军在黄沙河上流渡河之公算为多，下流为少，不出东安之白沙、大庙口趋新宁，便出梅溪口趋城步。”因此，选定黄沙河地区为预设战场，开始调动部队，企图歼灭红六军团于黄沙河地区。这个作战计划在九月三日由中革军委以火急电报通报给了红六军团。军委在电报中明确指出：“在黄沙河附近或在全县地域渡河

是不利的，因敌人占优势，地形不良，且临大河”，“六军团应力求于全县、灌阳及全县、兴安间渡河前进。应在全县以南之陈家卫、石塘、咸水口、山枣司进至西延山地取得休息”。“你们再迟应于六日晨到达西延后，可停止休息，严密警戒，并继续侦察向横路岭、城步的路线”。红六军团从军委电报和自身派出的侦察中了解到：湘敌主力正向黄沙河地区调动；桂军第十九师已被红军甩在后边，又不敢贸然追击；第二十四师正由柳州向广西北部调动，但尚未到达；全县、兴安两城只有少数民团常备大队驻守，全县至兴安之间一百多里的湘江沿线无兵防守；这正是乘虚抢渡湘江的极好时机，遂于四日从石塘地区出发，按照军委指定路线，经麻市直达湘江江畔，在凤凰嘴之董家堰，利用一条卵石滚水坝，未发一枪一弹安然渡过湘江，并径直西上，进入西延山区，刘建绪在黄沙河地区虽陈有重兵，却是鞭长莫及；桂军虽然发现了湘江防堵部署上的漏洞，紧急调动部队企图弥补，但为时已晚。

红六军团胜利渡过湘江后，在鲁塘地区打退了刚由阳朔乘汽车连夜赶来的桂军第二十四师第七十团的追击，经洛江、油榨坪、大埠头（今资源县）于九月八日到达车田。这时，接到中革军委的补充训令：“目前敌人企图当我军在城步地区及由城步北进时消灭我军”。“估计到上述条件，七月训令中，关于在新化、溆浦之间山地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在目前是不利的”。“目前六军团行动最可靠的地域，即是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六军团应努力在这一地区内，最少要于九月二十日前保持在这一地区内行动，力求消灭敌人一旅以下的单个部队，并发展苏维埃运动和游击运动”。尔后，“应沿湘、黔边前进，经绥宁、通道到贵州之锦屏、天柱、玉屏、铜仁，然后转向湘西之凤凰地区”。最后“在凤凰、松桃、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其后方则背靠贵州，以吸引更多湘敌于湘西北方面”。十分明显，中革军委补充训令的主要意图，是要红六军团放慢向湘西进军的速度，暂时停留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积极行动，打击敌人，吸引与调动大量敌人，以策应即将突围长征的中央红军的行动。

这时，湘军为了加强沿赣江及湘南地区的力量，防止中央红军向西突围，已将前敌总指挥刘建绪调回湘赣边地区，敌第十五师、第十六师亦相继解除追堵任务调回湘赣边地区。追堵红六军团的湘军部队，改由第十九师师长兼代湖南保安司令李觉负责指挥，所辖部队包括：第十九师第五十五旅，独立第三十二旅，补充第一、第二总队，晏国涛部以及湘黔边区“剿匪”军谢明强团。桂敌由第七军军长廖磊率领，除第十九师外，又将第二十四师调来执行追堵任务。这样，湘、桂两军用于追堵红六军团的兵力约计十五个团。该敌正分路由武冈、新宁和西延、龙胜地区向城步方向急进，并出动飞机配合行动，企图歼灭红军于城步山区。根据上述情况，红六军团决心迅速行动，乘敌尚未到达城步以前，首先进入城步以西地区，跳出敌人预定的合围圈，然后寻机歼敌，求得在城步、武冈、绥宁地区暂时立足。于是，由车田出发向西急进，十一日到达城步以西的丹口地区，并继续向西北前进，准备在绥宁以南的安岳山、桐油坪、赤坡地区展开，侧击由城步向绥宁方向前进的湘军，但没有得手。十四日，红六军团又准备绕至绥宁以西地域，突击由绥宁西进的湘军，但当前卫红十八师刚过绥宁县的小水时，湘军第五十五旅突由绥宁方向袭来，并占领小水、驾马一线有利阵地，将红六军团截为两段。红军不得不改变计划，以红十七师从行进间突破敌驾马阵地夺路南下，十六日在通道县的菁芜州地区会合红十八师，十七日乘虚袭占了通道县城（今县

溪)。敌人围歼红军于城步地区的计划再次破产。

红军袭占通道后，何键判断红军“必经黔东北窜，图与川匪会合无疑”。于是，电令李觉率部穷追入黔。李觉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尾追红军外，主力经靖县、广平向锦屏地区急进，企图在锦屏以西沿清水江一线展开，拦阻红军。这时，黔军也正向黔东地区调动，桂军也尾随追来。鉴于这种情况，红六军团如继续活动于城步、绥宁地区，将会给湘、桂、黔三省敌军以调整部署和构筑坚强防堵阵地的时间，对红军尔后行动造成极大困难。因此，经军委批准。红六军团即由通道兼程向贵州前进，九月十七日黄昏进到靖县的打乌团、三里驿、哨田和新厂地区。这时，位于靖县以南中央桥地区的湘军补充第二总队何平部两个团以为红军经长途跋涉非常疲劳，不敢应战，于十八日分路向新厂扑来，企图与尾追部队配合夹击红军，并为湘、桂两军主力向清水江地区机动争取时间。

湘敌补充第二总队突出孤立，且兵力不大，红军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杀一个回马枪，消灭这股敌人，争取行动自由，再向黔境转移。遂命令已出发的部队跑步返回新厂，以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首先抢占岩崖山主峰和金线吊葫芦两个制高点阻击敌人，保证主力展开。八时，敌集中力量向金线吊葫芦阵地攻击，连续三次猛攻，都被第五十二团打退。第五十二团一个连，在敌人猛烈炮火轰击和连续冲击下伤亡很大，全连只剩下指导员和七名战士，但仍然守住了阵地。十时左右忽然下起大雨，敌见从正面攻击不能成功，就利用迷蒙大雨作掩护向西迂回，企图从第五十二团左侧后袭占岩崖山主峰。这时，已经作好准备的红军主力，利用敌人脱离阵地、火力组织不严的有利时机，向迂回的敌人发起反击，红十七师沿岩崖山北麓向东出击，猛攻敌人翼侧，红十八师主力也赶到了岩崖山地区，会同第五十二团从正面居高临下突击敌人，战至黄昏，将敌全部击溃，毙伤敌四百余人，俘敌二百余人，缴获长短枪四百支。敌遭此歼灭性打击后仓皇逃回靖县。

第三节 冲破湘、桂、黔三省国民党军的围堵，到达黔东苏区

当红六军团尚在城步地区时，敌军判断：红六军团必经黔东北上，去沿河、秀山地域与贺龙、夏曦、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会合。于是湘、桂、黔三省军阀各派代表在贵州紧急会晤，协商“会剿”红六军团的行动。三省军阀相互矛盾各有打算：广西军阀力求把红六军团“送”的更远一点，以免威胁广西；湖南军阀则极力阻止红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合，以免增加湖南的困难；贵州军阀惧怕红六军团入黔，想借湘、桂两省军队的力量阻止红六军团进入贵州或是把入境的红六军团逐出贵州；但在对付红六军团上是一致的。经协商，湘军派七个团，桂军派第七军两个师共四个团进入贵州，与黔军联合行动“围剿”红六军团，三省部队由桂军第七军军长廖磊统一指挥。

新厂战斗后，红六军团于九月二十日在黎平以北的谭溪地区击退黔军周芳仁部第七团的阻击，乘胜进入贵州的清水江流域，准备按照军委的电报指示，“经清江、青谿、思县到达省溪、铜仁、江口地域与红三军取得联络”。清水江流域是苗族、侗族聚居区。苗、侗两族人民长期以来遭受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军队的欺压与蹂躏，民族隔阂很深，每当反动军队到来，苗、侗群众，人人手执利器，成群结队地把守山寨，以防洗劫。红六军团为了取得苗、侗两族人民的支援，顺利通过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全军团深入开展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号召全体人员兄弟民族群众广泛进行宣传，严令部队严格遵守苗、侗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做到秋毫无犯，并对山寨寨主或土司头人大力进行争取工作。红军每到一地，部队大都在野外露营，不进民房；处处尊重苗、侗两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不违禁忌；用了逃避在外的群众的东西，都原地留钱，并留信感谢；红军医生主动上门为群众看病，不收报酬；对生活极端困难的贫苦群众，给予慰问和救济。红军沿途张贴布告，散发传单，人人进行宣传活动，向苗、侗两族同胞说明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红军的本质和光荣使命，揭露敌军残暴罪行和反动本质。苗、侗两族同胞在红军的耐心宣传和实际行动的影响下，深深感受到红军纪律严明，待人和气，买卖公平，对群众利益秋毫无犯。红军主张民族平等，行动上切实平等待人，使深受民族压迫的苗、侗族同胞有史以来第一次享受到了平等的待遇。他们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中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进而消除了误解，红六军团取得了苗、侗两族广大群众的热切拥护和积极支援。不少群众主动为红军带路，积极为红军传递消息，热情接待过路红军，有的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收留红军掉队人员，并帮助他们寻找部队。九月二十三日红六军团进到清江县（今剑河县）南嘉堡的里格地区准备北渡清水江时，苗、侗两族人民积极为红军指引渡口，收集船只，绑结木筏，架设浮桥。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全军团二十四日顺利渡过清水江，进到大广地区，前卫伸到八挂河。

二十五日，红六军团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进，但当部队进至凯寨、孟优地区时，遭到湘军独三十二旅及第五十五旅的堵击。由于敌先我到达，占据了有利地形，完成了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构筑了较完整的野战工事，红六军团虽连续攻击给敌以重大杀伤，但未能突破敌军阵地。这时，桂军第十九师又从天柱县的盘杠方向急速增援，西面又有黔军王天锡的部队，如继续打下去，对我十分不利，且沿 阳河一带敌已有准备，而镇远以东又不能徒涉。

因此，决定退出战斗返回大广，准备改由大广西进或南渡清水江再沿江而上，相机北渡 阳河。傍晚，红六军团由凯寨、孟优地区出发，连夜回师。但二十六日晨抵达大广时，与先我到达大广的尾追之敌桂军第二十四师遭遇。敌军已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且完成了战斗准备。红六军团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又在崇山峻岭中经过整夜急行军，部队疲劳饥饿，正欲翻越大广坳的坳口时，突然遭到敌人猛烈袭击，军团领导考虑到前有桂军堵击，湘军也很可能从凯寨、孟优追来，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当即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摆脱敌人，向西转移。遂令前卫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和第五十四团从大广以西大山进入战斗，掩护军团主力转移。两团向敌发起猛烈进攻，战斗十分激烈。军团主力在红十八师的掩护下，安全转移。第五十二、第五十四两团完成掩护任务准备撤出战斗时，后路被敌军截断，遭敌包围。红军战士经过顽强拼杀，终于打开缺口，冲出重围。第五十四团因撤出稍晚，损失较大。这次战斗红军共伤亡一百四五十人，第五十四团团团长赵雄英勇牺牲，两名团政委负伤。战后，第五十四团因减员较大，暂时撤销建制，分别编入第四十九、第五十一、第五十二及第五十三团。大广战斗，红六军团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给桂军第二十四师以重大打击，军团主力也得以安全转移。

红六军团在大广摆脱敌人后，经高丘、良上、报京、施洞口于三十日进至黄平县的瓮谷垅。这时，湘、桂、黔三省敌军分两路追来。一路由廖磊亲自率领桂军第十九师和湘军李觉部第五十五旅及独三十二旅，沿三穗通往镇远的大道平行追击；另一路由覃联芳率领桂敌第二十四师和湘军补充第一总队，紧随红军尾追。敌人企图以黔军王天锡率领的第一、第五、第六和特一团等四个团在施秉至黄平一线从正面堵击，以北路敌军在三穗、镇远、施秉一线由北而南压迫红军，在敌尾追部队配合下，将红六军团歼灭于镇远以南 阳河与清水江两河之间。但是，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红六军团于十月一日选择战斗力薄弱的黔军为突击对象，在滥桥至东坡地段上抢渡大沙河，于行进间一举突破黔军防堵阵地，并乘胜袭占旧州。红六军团在旧州不仅缴获了数万银元的巨款和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还收集到一张约一平方米大小的法文贵州省地图。这对从进入广西就以中学地理课本代替军用地图的红六军团来说，如获无价之宝。在军团长肖克的亲自主持下，经一名称薄复礼的法国传教士的热情帮助，将该图全部译成中文。这张地图，在后来红六军团转战黔东和最后与红三军会师的行动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红六军团袭占旧州后，接着向乌江急进，准备在孙家渡及其以北地区寻找有利渡场渡过乌江，彻底甩掉追堵之敌，然后再向北联络红三军。但是，中革军委不同意红六军团西渡乌江。当红六军团于十月四日进到乌江江畔的猴场（今草塘）时，接到军委命令：“桂敌现向南开动，红三军部队已占印江。六军团应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在中革军委再三催促下，红六军团不得不放弃西渡乌江的计划，于五日由猴场掉头向东北前进，准备经石阡附近进入江口地区，再与红三军取得联络。

然而实际情况是，敌人没有任何部队向南开动，对红六军团的追堵不仅没有放弃，相反正在策划新的更大规模的围歼，敌军判断：乌江有黔军凭险扼守，红军难以西渡，必经余庆、石阡去印江与红三军会合；在西、北两面有乌江天险阻隔的条件下，只要可靠地封锁石（阡）、镇（远）大道，就很有可能在这一地区围歼红六军团。于是廖磊、李觉等敌军指挥官在镇远紧急会商，决定由黔军侯之担部五个团严密防守乌江，以入黔的湘、桂两军主力

封锁石、镇大道，堵住红军去路，以桂军第二十四师、湘军补充第一总队及黔军四个团沿施秉、余庆一线展开，由南向北压迫红军。敌人总共动用二十个团的兵力，企图将红六军团围歼于石阡以西地区。按照这个作战计划，敌军星夜紧急调动部队：湘军第五十五旅、独三十二旅及谢明强团推进到石阡及其附近地区；廖磊率第十九师部署在大地方、铁厂、平贯一线；桂军第二十四师、湘军补充第一总队及黔军第五、第六、第十三团和特一团由施秉地区推进到余庆一线展开。

三省敌军经过精心策划，张开大网等待红六军团到来。而红六军团对敌人这个作战计划事先毫无觉察。

十月七日，红六军团按照红十七师、军团部、红十八师顺序东进，准备到石阡县的甘溪大休息，然后利用夜晚越过石、镇大道。在红军东进的同时，桂军第十九师也经石阡以南的白岩河向甘溪前进，寻找红军作战。十时，红六军团前卫部队到达甘溪，捉到敌两个侦察员，得知桂军第十九师已接近甘溪。情况十分紧急，第五十一团前卫营在周球保营长指挥下，不待命令，抢先行动，将部队沿甘溪街头展开，迅速做好迎击敌人的准备。但是，负责指挥前卫行动的军团指挥员，却没有抓住战机，迅速指挥前卫部队抢占有利地形，夺取主动，以掩护军团主力展开或转移，也没有将此紧急情况向行进在本队的军团首长报告。直到十二时左右，桂军第十九师已全部展开，并抢占了甘溪东北的白虎山和群宝山一线高地，居高临下向红军发起猛烈进攻时，第五十一团和第四十九团还没有得到行动命令，被迫仓促投入战斗。第五十团也从行进间展开，抢占了羊东坳及其附近高地，以猛烈的火力突击敌人，积极支援第五十一团和第四十九团的战斗。在红军顽强阻击下，敌人先后两次冲击均被击退，不得不调整部署重新组织进攻。以一部从正面猛烈进攻，另一部利用河沟凹地隐蔽向甘溪西街接近，向红军翼侧发起攻击，并突入红军阵地，在青龙嘴高地展开激烈的阵地争夺。在前卫部队被敌切断的情况下，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青龙嘴高地附近的第五十一团和第四十九团的两个团部及机枪连等四百余人冲出敌人的包围，由甘溪东南的杜脑山高地向石阡以南大地方转移。防守甘溪的第五十一团和第四十九团部队，在敌人包围和猛烈攻击下，坚守阵地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给主力部队机动争取了时间，但损失很大，仅第五十一团第三营（前卫营）伤亡即达两百余人。

敌人在正面进攻受阻后，即以主力分两路向龙骨吨和泥东坳迂回，企图打入红军纵深，侧击红军运动中的主力纵队。但直到这时，军团领导还没有搞清前方情况，因此，迟迟不能定下决心，当发现敌人逼近主力纵队时，才仓促派出红军学校占领龙骨吨和老车土等高地抗击敌人。军团领导认为，红军从战斗发起就处于被动地位，继续打下去也无取胜把握，决定退出战斗向南转移。遂令第五十团接替红军学校，继续阻击敌人，掩护军团主力向甘溪东南的大地方转移。军团主力部队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下，在大土村以南深山密林中披荆斩棘，开拓通路，终于摆脱当面敌人到达了大地方。在开路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身先士卒，奋不顾身，起了重要作用。第五十团完成掩护任务后，利用夜暗撤出阵地寻找主力，但退路被敌切断，与主力失掉了联络。

红六军团由于未能击破敌人，从而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约二十个团的包围之中。在红六军团的北面石阡至白沙一线，为湘军李觉的第五十五旅、独三十二旅以及湘黔边“剿匪”第一团（谢明强团）等共五个团；东面为廖

磊亲自率领的第十九师（两个团）把守石、镇大道；南面施秉至余庆一线为桂军第二十四师、湘军成铁侠第一补充纵队及王天锡率领的黔军一部（约八个团）；西面在乌江对岸为侯之担部（五个团）。军团领导考虑到，甘溪一仗部队被敌截断且损失较大，又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处境极为严重；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决定不与敌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尽量避免无益的消耗，采取灵活的游击动作，在石（阡）、镇（远）、余（庆）之间，利用崇山峻岭，深林密布便于隐蔽行动的有利条件与敌周旋，寻找敌人间隙或薄弱部分冲出包围，迅速转入黔东苏区与红三军会合。八日，红六军团主力进至红庙，打退了桂军第十九师的追击，然后向南转移，又在石、镇大道间的路腊遇敌堵击，无法穿过敌军封锁线，经激战后方摆脱敌人，十日到达黑冲。为了避免遭敌袭击，遂离开道路，利用绳索，翻越了悬崖峭壁的滴水岩。十一日到达紫荆关一带，发现施秉一线地区有敌重兵防守，难以向南突围，遂绕道北行，经马溪、走马坪到河闪渡，准备西渡乌江。但发现黔军万式炯团在乌江西岸防守，渡江未成，又折向东，经瓮溪司于十五日到达朱家坝，准备经板桥渡过石阡河，前往印江会合红三军。当前卫第五十二团到达板桥附近时，遭湘敌堵击。十六日，军团决定向白沙、甘溪方向转移。当进到龙塘、关口一带时，又被湘军第五十五旅唐伯寅团及独三十二旅和黔军一部堵截，经激烈战斗将敌击溃，军团主力继续向甘溪方向转移，但红十八师直属队一部及后卫第五十二团进到十二山至柏杨附近时，被敌切断，与军团主力失掉联络。军团首长一面调第四十九团接应，一面派人传令红十八师师长龙云率第五十二团坚决打退敌人，尽快冲出包围，追上主力，第五十二团的战士们英勇顽强，与敌奋战几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又缺乏正确领导与指挥，最后弹尽粮绝，失败。第五十二团团团长田海清遭敌杀害。师长龙云被俘，遭军阀何键杀害。

红六军团在敌包围圈中艰苦转战的日子里，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这里山高路险，地瘠人稀，条件十分艰苦，加上敌人疯狂的围、追、堵、截，环境极为险恶，斗争十分残酷。红军战士往往是饿着肚子不分昼夜地行军打仗，没有鞋穿，赤着双脚在深山密林中与敌周旋，在悬崖峭壁上攀登，在林间草丛中栖身。由于体力消耗过大和极度疲劳，又得不到起码的饮食补充，再加缺医少药，不少战士身患疾病，部队减员剧增。当时中央代表任弼时身染重病，他坚决拒绝了战士们用担架抬他，手拄木棍和大家一起步行，抱病指挥全军行动。在艰难的日子里，这里的人民群众给了红军以有力的支援，即使在白色恐怖下，不少群众仍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带路，引导红军突围，掩护红军伤员，细心为红军伤病员治伤治病，帮助掉队的红军战士寻找部队，有的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的屠刀下抢救红军战士脱险，充分体现了红军与人民群众的骨肉之情。

十七日，红六军团由石阡以西的国荣出发，午前重抵甘溪，决心乘敌不

第五十二团被敌切断后，在红十八师师长龙云率领下，于17日突出重围，向白沙方向转移。由于敌人追堵，被迫转向晏家湾一带，准备经川岩坝北上印江，寻找红三军。当进至黑滩河一带时又被敌重兵包围。第五十二团的战士们在困牛山区殊死战斗三昼夜，弹尽粮绝，团长田海清牺牲。龙云率二百余人突出重围，经石阡县的国荣、中坝、镇远县的都坪，25日进至石阡与岭巩两县交界的龙头坳（今岭巩县龙田区）。与黔军金祖典团遭遇，战斗中龙云负伤，27日被当地反动武装俘去。在敌严刑审讯下，龙云坚贞不屈。后由于叛徒出卖，敌得知龙云真实身份，即由岭巩押送到镇远。王家烈为向国民党西路军“剿共”总司令何键邀功，将龙云押送湖南。在长沙龙云被何键杀害。年仅二十六岁。

备，利用夜暗向东冲出敌人包围。当天中午经杜脑山、卧水，黄昏前到达干河坝。这时，石、镇大道间的平贯只有谢明强团一个营，马厂坪没有敌军。红六军团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以警卫营抢先占领马厂坪并控制了向东去的大峡谷谷口，主力部队利用夜暗在当地老猎人的指引下，鱼贯东行，从一条没有道路的大峡谷中（当地群众称老窝沟）向东突围，穿越石、镇大道。这时，湘军第六九四团及谢明强团各一部先后赶来截击，在红军掩护部队坚决阻击下，激战至午夜被击退。天亮前，军团全部穿过峡谷，终于突破敌军包围。

甘溪战斗中，首先突围的红十七师第四十九团和第五十一团各一部，在军团参谋长李达的率领下，临时组成特务团，在大地方附近越过石、镇大道，经地印、客楼、闵孝于十一日到达江口县的茶寨，又从德旺以北绕过梵净山，经过多方调查了解，终于十五日在沿河县的水田坝（又称铅厂坝）与红三军会合。李达向贺龙等红三军领导人详细汇报了红六军团的情况与危险处境后，贺龙等领导对红六军团十分关切，不顾湘西敌军陈渠珍部及黔军的拦阻，于十月十六日亲率红三军主力和李达所部兼程南下，迎接红六军团。

甘溪战斗后，与主力失掉联络的第五十团，由于退路被切断，无法去大地方寻找主力部队。在甘溪接受掩护任务时，军团首长曾明确交待过：“如在大地方找不到主力部队，可去印江找贺龙。”于是，他们决定直奔印江。由团长郭鹏、政治委员彭栋才率领，在一个十分熟悉道路的向导引导下，凭着国民党出版的半张报纸，在平贯与河口之间乘隙通过石、镇大道，经东坪地场（今和平乡）、大坝场、德旺，于二十三日行至梵净山山脚的木根坡时，通过号音联络与前来接应红六军团的贺龙和李达所率部队会合。

红六军团主力越过石、镇大道后，从敌军间隙中兼程前进，经尧寨、冷家榜，于二十日击退湘军第一一 团与黔军一部的阻击，在公鹅坳通过石（阡）、江（口）大道，继经茶寨、德旺、缠溪、慕龙，于二十三日到达印江木黄。二十四日，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主力及李达部队从芙蓉坝、锅厂到达木黄，两军胜利会师。红六军团从一九三四年八月七由湘赣苏区突围西征，连续行军作战近八十天，跨越敌境五千多里，战胜了湘、粤、桂、黔四省敌军的围、追、堵、截和自然界的无数险阻，历尽千辛万苦，付出重大代价，终于与红三军会师，胜利完成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为中央红军向湘西实施战略转移，起到了侦察、开路的先遣队的作用。红六军团与红三军胜利会师，结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为以后发展湘鄂川黔边区的革命斗争，以及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三四年八月，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后，留在湘赣苏区继续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有五个独立团和各县游击队共五千余人。这些部队在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省军区的领导下，面对国民党军六个正规师、五个保安团和众多的反动地主武装，毫不畏惧，英勇战斗，主动出击，积极牵制、袭扰敌人，有力地掩护了红六军团的突围行动。接着，在敌人重兵“清剿”下，湘赣苏区地方武装由于未能及时地实行战略转变，在一段时间内，仍然采取正规战的作战方针，分别在永新、安福和遂万泰等地一些小块苏区抗击敌人的进攻，致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一九三五年二月虎头岑一仗，虽然给了敌人以很大杀伤，但自己也伤亡很大，湘赣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不幸牺牲，苏区也被敌全部占领。不久，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投敌。在这危急关头，原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临危不惧，挺身而出，率领部队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并亲

自联络四十多名游击队干部，在莲花县棋盘山举行会议，组成了中共湘赣省临时省委（谭余保任书记）和游击司令部。这次会议，对稳定湘赣苏区的斗争局势，继续坚持游击战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九三六年国民党军先后调走，湘赣边地方武装趁机集中部队，在原苏区群众的配合下积极行动，先后袭击吉安的油田和安福的洲湖等重镇，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他们赤胆忠心，坚贞不屈，顽强战斗三年多，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山整编时，湘赣地方武装尚保留三百多人，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开赴抗日战争前线。

基本总结

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这一时期的历史，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同强大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壮大历史。

红六军团是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产生的，是在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后，由赤卫队、游击队逐渐发展壮大组成的。在坚持湘赣革命根据地斗争这一历史时期内，即从一九二九年一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它经历了赤卫队、游击队坚持根据地斗争阶段；湘东独立师和湘赣地区军民配合红一方面军反对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阶段；红八军成立，配合中央红军的进攻作战和反对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阶段；红六军团成立，配合中央红军反对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阶段；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任务，从湘赣到黔东阶段的艰苦斗争。面对强大敌人，红六军团部队以小敌大，以弱敌强，英勇奋战，取得了许多战役战斗的胜利。组成红六军团的各部队也由赤卫队、游击队发展为正规兵团，由湘东独立师成立时的八百余人，发展到红六军团西征开始时的九千余人。在这个时期内，红六军团部队经历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歼敌正规军和地方武装数万人，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红六军团在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任务以前，主要活动在湘赣革命根据地（湘赣苏区），是这个根据地唯一的一支主力红军。湘赣革命根据地从产生的那天起，就处在国民党军的包围之中。湘赣红军经常面对十倍以至十几倍于己的敌人。在战略上，敌人是进攻的，红军是防御的。战争形势是“围剿”与反“围剿”的长期反复。湘赣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十多个革命根据地之一，是一个重要战略区。它与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隔江相望，但由于赣江沿线敌人经常驻有重兵，两个根据地交通往来十分困难，湘赣革命根据地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战区。红六军团部队担负着保卫和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的艰巨任务。湘赣革命根据地处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翼侧，是它的西方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在中央红军的历次反“围剿”和其他重要战役行动中，红六军团部队都担负着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的重大任务，行动于一个辅助作战方向。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密切协同，息息相关。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取得胜利，进攻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或迟或早会调整部署；湘赣红军作战给予敌人的打击愈大，能拖住更多的敌人，就更利于中央红军的作战。红六军团部队在其发展过程中，在建军和作战上，不仅能比较及时地得到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而且可以得到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红军总部的具体指示和帮助。同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苏区中央局的错误的军事路线和作战方针，对湘赣地区红军的斗争也要发生严重影响。湘赣红军作战的艰巨性就在于：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担负着保卫、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和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的双重任务。这种对中央红军的作战既有战略上的配合，也有战役上的配合，与中央红军的作战行动既依存又独立，是这一时期湘赣革命根据地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

红六军团部队在这一时期内的建军和作战，有极其丰富的经验，主要是：

一、及时地实行从游击军向正规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土地革命战争是一场持久而残酷的战争，红军只有战胜强大敌人，才能保存和发展自己，才能创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单有游击兵团和游击战争，

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游击兵团必须发展为正规兵团，游击战必须发展为正规战，即必须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湘赣地区的游击队（包括完全脱产的赤卫队），是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主力红军扶植下发展起来的，主力红军离开湘赣边界后，正值全国军阀混战迭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抽不出更多力量对湘赣地区组织大规模进攻，湘赣边界地区各县、区赤卫队、游击队，这时主要作战对象为反动地主武装。在赤卫队、游击队积极活动下，根据地仍然保持着发展势头。在对敌斗争中赤卫队、游击队得到很大锻炼，战斗力有很大提高，数量也有很大发展。湘赣边界地区的赤卫队、游击队尽管有一部分先后同赣西和赣西南地区的地方武装一起，组建了属于红一方面军建制的红六军和红二十军，仍然保持有相当数量，而且继续得到发展，有的游击队已发展为游击支队或游击纵队，从游击队向正规军转变有了现实可能性。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赤卫队、游击队这时也基本上是这种情况。一九三一年秋，蒋介石取得对阎锡山、冯玉祥战争胜利后，便集中力量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湘赣地区周围敌人的正规军不断增加，进攻的规模也日益扩大，湘赣地区组建正规兵团的任务便十分迫切了。湘东独立师成立，便是这种转变的开始。在地方武装广泛发展的基础上，根据斗争需要，以后发展为红八军，继而发展为红六军团。与此同时，也开始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实践证明，这个转变是正确的及时的，对湘赣地区的革命斗争是非常有利的。

在由实行游击战的游击部队转化为实行运动战或以运动战为主的正规部队的过程中，湘赣地区对赤卫队、游击队等地方武装不是采取绝对集中的办法，而是采取逐渐地和部分地集中的办法，使各县、区始终保持有充分力量继续发展游击战争，还注意采取首先协同行动然后实行合编，以及不破坏其建制、不更换其干部的办法，因而转变比较顺利，至于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作为一个正规兵团必须具备的战术技术和军事行政管理能力的提高，则主要依靠实战中的锻炼。湘东独立师组成后，就处在频繁的战斗中。红六军团部队通过对战役战斗的经验教训的不断总结，辅之以战斗间隙的整训和开办红军学校对基层干部的培养等，部队军事素质日益增强，成为一支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部队。

二、依靠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群众战争的威力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群众的积极支援，有了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的群众，有了广泛存在的群众武装积极参战，红军虽弱小，仍能战胜强大敌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群众，经受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战争的洗礼，觉悟很高，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这个地区以后，便普遍地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红六军团就是从这种广泛存在的群众武装的基础上产生的，与根据地人民有着血肉联系。根据地人民对红六军团部队则是关怀爱护，无微不至，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总是竭尽全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支援红军。每遇敌人进攻，根据地人民除了为红军送情报、送粮食、抬担架，对敌人实行坚壁清野外，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和县、区地方武装积极对敌展开斗争，实行游击战，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主力红军也很重视发挥群众战争的威力，有计划地利用群众性的游击战，迷惑敌人，疲惫敌人，借以制造战机。对侵占根据地城镇的敌人，主力红军往往使用一部分力量，协同赤卫队游击队和其他地方武装，在广大群众密切配合下，不分昼夜地实行围困袭扰，使敌人日无宁日，夜不安枕，小部

队不敢外出，大部队又找不到红军。红军主力则在群众掩护下从容地准备战斗，一旦发现敌人的失误和弱点，出现战机，就集中力量狠狠地予以打击。一九三一年九月侵占永新城的国民党军第四十三师一个旅弃城逃走，一九三二年一月侵占永新城的国民党军第十四师的撤退，三月侵占莲花城的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弃城逃走，都主要是红军实行群众战争，长期对敌围困的结果。一九三三年五月，侵占莲花的国民党军第六十三师，在根据地人民和群众武装的围困下，交通断绝，物资供应日益困难，不得不派出部队通过根据地去茶陵接运物资，因而给红军造成了有利战机，红八军先后在九渡冲和棠市两仗各取得歼敌千余人的重大胜利。

在无根据地条件下作战困难很多，更须重视群众的作用。红六军团西征，就是从有根据地条件下的作战转变为无根据地条件下的作战。红军是为全国人民的利益而战斗的武装集团，加以国民党统治区阶级矛盾尖锐，群众所受压迫很深，他们与红军心连心，红军是完全能够得到群众的帮助的。红六军团西征途中，每到一地，都抓紧时间做群众工作，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宗旨，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处处关心、爱护群众利益，将没收的土豪的粮食和财物分给贫苦群众，模范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因而取得了沿途群众的支援。不少群众为红军当向导，腾房子，买粮食，传递信息，照顾伤病员。在侗、苗两族人民积极帮助下，红军在南嘉堡顺利渡过清水江。甘溪战斗后，红六军团主力转战在崇山峻岭中，不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带路，引导红军突围。红六军团西征取得胜利，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群众的支援是重要条件之一。

三、根据实际情况，机动灵活地实行运动战

经验证明，红军战胜敌人的最有效办法，就是采取运动战，或者说主要是采取运动战。湘赣红军无论是在湘东独立师时期，还是在红八军或红六军团时期，都是在敌强我弱条件下作战。对于敌人的进攻，在根据地，红军首先避开其锋芒，让其深入，然后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发现敌人的弱点，造成敌人的过失，以求得战机；在敌占区，则更要善于避实击虚。红军由于技术贫弱，在总的兵力对比上处于很大劣势，必须集中兵力，求得在战役战斗上的优势，坚持以打运动中之敌和立足未稳之敌为主要作战目标，而且口不能张得太大。红六军团在沙市战斗中，一举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旅，就是打运动中之敌。当时国民党军虽有四个旅，兵力上占优势，但它成一路纵队前进。红军利用根据地地形便于实施伏击和阻击，而不利于敌人展开的条件，以一部兵力阻击敌人主力，集中兵力攻歼其先头旅，动作迅速果敢，因而取得胜利。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一个团侵占永阳镇，湘赣红军独立第一师（湘东独立师）乘其立足未稳，会同地方武装，连夜实施包围，一举予以歼灭。一九三二年一月钱市街打国民党军第十四师的作战，虽然敌人也在运动中且立足未稳，但由于红军兵力不足，张口过大，而且打早了，虽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但终未能达成预期目的，不得不撤出战斗。

红六军团部队在实行运动战中，基本指导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具体战役战斗中，则是按照敌我变化着的条件，机动灵活地采取行动。当敌人分路扑来寻求红军作战时，红军就同敌人打圈子，待发现敌人的弱点和错误，就迅速集中兵力反击其一路。红军用这种方法，在将军山给了国民党正规军的一个团和三个保安团以歼灭性打击。第二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一个旅由安福向红军进攻，急于求战，红军利用其轻敌冒进的

弱点，以诱伏手段，在廖塘桥重创了敌人。第四次反“围剿”之前，湖南国民党军为了策应赣江以东的国民党军，分路向湘赣革命根据地进攻。红军以奔袭手段在攸县官田歼其一个团，接着迅速转移兵力，在茶陵高陇歼灭了湖南国民党军另一个团，从而稳住了西线形势。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第十五、第六十三、第二十八师企图合击红军于永新地区，红军则以一部牵制敌第十五师和第六十三师，主力直下遂万泰地区，寻求第二十八师作战，给了该敌以重大打击，同时也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合击阴谋。

运动战役有固定的作战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是为着打，走是为了创造战机，有时则是为了恢复主动。在战略转移中，对于追击截击和阻击的敌人，必须抓住战机，实行主动的放手的攻击战。这时的打是为了走。红六军团从湘赣向黔东转移中，在广西北部，敌人两个师紧跟追来。红军在文村占领有利阵地，给了追敌以有力打击，迫使敌人不敢冒进，因而争得了渡过湘江的必要时间。在湖南新厂，红军抓住追敌湖南国民党军补充第二总队（相当一个旅）力薄势孤的弱点，给了该敌以歼灭性打击。到贵州镇远地区时，前有湘、桂、黔三省敌军防堵，后面追兵已经接近，南面又有大河障碍，红军选定西面贵州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地段，进行坚决突击，以战斗打开了前进道路。在战略转移中，只有把走建立在打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预定计划，达到预期目的。

四、在作战指导方针上，坚决反对“左”的和有的两种错误倾向

战争指导路线和作战指导方针正确与否，关系战争的胜败，也关系战役的胜败。湘赣红军从游击队时期起，基本上能遵循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作战，故能不断取得胜利。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受到“左”的和右的战争指导路线和作战指导方针的影响。一九三二年在立三路线指导下，赣西南地区和湘东地区分别组织了攻打吉安和湘东南总起义的冒险行动。一九三二年，中共中央在王明路线领导下，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湘赣红军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进攻作战，进行了艰苦努力。九月，红八军奉命进攻敌人坚固设防且地形不利于进攻的分宜城。红六军团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一再进攻占领既设阵地的湖南国民党军的主要集团，继而红十七师远出南浔路，深入敌人重兵屯集之地，这些都是在“左”的指导路线和指导方针下作出的错误行动，给部队造成程度不同的损失，有的损失很大。这种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来源于政治上的“左”倾冒险主义，其特点是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敌人，在具体战役战斗上，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实施进攻。沙市、田里战斗后，红六军团遵照中革军委指示，采取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企图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以保住永新平坝子，这是在右的军事指导路线下作出的错误决策。红六军团从一九三四年五月到七月，在狭小地区内处处设防，以堡垒对堡垒，并在金华山、松山地区同敌人展开激烈的阵地战，结果使苏区大部丧失，部队陷于更大被动。红六军团有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优良传统，在当时条件下，对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错误指示思想上没有认识，行动上也不可能抵制，但在执行过程中，红六军团仍然能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在可能和允许的范围内的必要机动，因而减少了损失。

五、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

红六军团在它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努力遵循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不断加强部队建设。在湘东独立师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

队的建军原则，已经通过古田会议确立了。组成红六军团的各部队坚决贯彻了这个决议，为了保证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服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使部队真正成为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六军团在部队中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坚决执行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内部实行民主主义，建立了良好的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

红六军团部队的绝大多数成员，是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而参军的农民。这种情况决定了部队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和坚定的革命意志，同时也决定了部队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广泛存在。因此，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就成为迫切任务。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把对部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经常性工作，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方法，开展革命理想教育、路线政策教育、形势时事教育、反错误倾向教育，还随时随地用敌人压迫残害人民和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人民的血淋淋的事实，对部队进行教育，激发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使部队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思想领导和旺盛士气。

红六军团很重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的组织生活严格，下级组织坚决服从上级组织，党员坚决贯彻党支部的决议，党的组织和党员密切联系群众，党员在工作中事事带头，生活上吃苦在前，战斗中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官兵关系密切，尊干爱兵蔚然成风。干部以身作则，凡要求战士和下级做到的，领导干部首先做到，哪里情况危急，领导干部就出现在哪里。全军团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阶级友情十分深厚，愈是困难，愈是同甘共苦，患难相助。

在党的坚强领导和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影响下，红六军团有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为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不怕流血牺牲，不怕艰难困苦，作战英勇果敢，机智顽强，拖不垮，打不散，在形势十分险恶、困难十分严重的反“围剿”和“北上”、西征中，都能排除万难，战胜敌人，胜利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第三部分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 斗争和红二方面军长征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黔东根据地胜利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从此，这两部分红军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和肖克、王震等同志的领导指挥下，结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十月二十八日，两个军团由黔东向湘西进发，歼灭了湘西军阀陈渠珍部的主力，恢复与发展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接着又于十二月中旬，向常德、桃源展开攻势，钳制与吸引了敌人十几个师的兵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遵义会议后，红二、六军团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战术思想指导下，经过英勇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并发展壮大了自己。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国民党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了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争取在运动中寻机歼敌和创建新的根据地，红二、六军团决定主力实行战略转移。

红二、六军团主力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即转战于湖南、贵州、云南广大地区，坚持长江以南的革命斗争。一九三六年三月底，到达贵州、云南边境的南北盘江之间地区时，奉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命令，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七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会师后，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正式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在甘孜，红二方面军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之后，红二方面军即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并在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进行了甘南战役。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地完成了伟大的长征。

西安事变后，红二方面军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地进行了抗日战争的准备。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师，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第一章

红二、六军团创建和保卫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第一节 红二、六军团黔东会师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红六军团和红三军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胜利会师。这次会师，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红六军团长途转战，极度疲劳，减员很大，处境困难，迫切需要和红三军会师，进行休整，以利再战。红三军，由于夏曦的错误领导长期得不到纠正，也迫切希望通过同红六军团会师，沟通与中共中央的电报通信，在中央指导下纠正正在路线、方针以及党和军队建设等方面的错误。会师，为解决两军建设中各自存在的迫切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对两军的团结极为重视。会师后，两军指战员欢欣鼓舞，热情相助，表现了高度的无产阶级友爱精神和党性原则。红六军团由湘赣革命根据地进到地形、民情、风俗与江西不同的湘黔边区，对与这一带人民有密切联系的红三军有着依存心情，为团结战斗奠定了良好基础。会师后，军团政治委员王震立即向贺龙详尽汇报了部队的情况，请求指示。贺龙指示红六军团当前要抓紧三件事：第一是睡好觉和吃饱饭；第二是洗澡、理发和洗衣服；第三是打草鞋。要他们好好地恢复体力，整理组织，准备继续战斗。红三军指战员也尽一切可能保障红六军团休息好，给他们筹粮、送肉、送盐；拿出自己的草鞋筋子，帮助他们打草鞋。同时，还给部队配了部分乘马，拨了一部分轻机枪。红六军团对于红三军的热情帮助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深为感动。红三军对带来了朱、毛红军光荣传统的红六军团，思想上也有钦慕之情。在红六军团的帮助下，红三军加强了党团建设和政治工作，开始恢复了部队中党团员的党籍、团籍。但由于党团员还不到部队人数的十分之一，连队中还没有党、团支部，有的两个连队成立一个党支部。师团政委都是新提拔的，工作能力很弱。指导员缺少一大部分。政治工作系统还未建立。部队中“肃反”恐惧仍然存在。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任弼时和肖克、王震从大局出发，将富有政治工作经验的红六军团政治部和红三军政治部合并为红三军政治部，并把保卫局完整地调给了红三军。同时，还选派一些干部给红三军师、团一级政治机关。在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领导下，红三军的各级政治机关和各种政治工作制度逐步健全了，并陆续启用了被错误处理撤职的干部，恢复了被错误开除出党的党员的党籍，加强了党支部的建设。

十月二十六日，两军在南腰界举行了庆祝会师大会，会上，任弼时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报告了当前的形势和部队的任务。贺龙讲话对红六军团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两军提出了加强团结的要求。他对红六军团说：“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你们到这里后，想休息一下。按说这是应该的。可是，蒋介石这个卖国贼不让我们休息，这里的根据地是新近才开辟的，不很巩固。”他说，“同志们，可靠的根据地在我们的脚板上！今天休息，明天就出发。”他勉励大家再接再厉，英勇奋斗，去开辟新的局面。关向应、肖克、王震也讲了话。他们的讲话，都要求加强两军的团结，并发出了新的

战斗号召。

会师时，红三军有四千四百多人，红六军团有三千三百多人。从此，来自两个战略区的两支红军，结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完成新的更重大的政治、军事任务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第二节 策应中央红军长征， 发动湘西攻势

战略决策

在红三军和红六军团黔东会师时，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失败。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冲破敌人第一道碉堡封锁线，撤离江西苏区，开始向西实行战略转移。鉴于上述情况，任弼时和两军领导人对整个战争形势和自己的任务，以及今后行动方针，立即进行了审慎研究，认为：刚刚退出江西根据地的中央红军，正与优势敌军作战，夺路向西转移，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应积极行动，密切配合。

在会师前两天，即十月二十二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电令红六军团：“向印（江）、松（桃）间前进，会合我十七师之一部，在该地与二军团确（取）联络，并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域建立苏区，发展游击战争。”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和部队的现状，两军团领导人决定红二、六军团集中去军委指定的地区。二十五日，两军团领导给中革军委的电报中说：“贵州苏区在印江、沿河间，……以枫香溪、惟（谯家）铺、云（铅）厂坝为中心，南北一百里，东西六七十里，人口[不足二十]万，西靠乌江，东、南、北均系徒涉场很小的小河。粮食很缺乏。地方武装有独立师约千余人，两个独立团[各约二]百余人，五游击队三百余人。数日前，黔敌三个团进至[印江苏区]中心，现未退。”……“湘西之敌：除陈渠珍师外，另有杨其昌、廖怀中、雷鸣九共计四团，保安三四团，分驻凤凰、乾城、桑植、龙山、麻阳、永顺、辰溪等县”。“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主力由松桃、秀山问伸出乾、松、凤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此后，两军团领导人曾在南腰界再次开会，进一步研究当面的情况和今后行动方针。贺龙说，乾城、凤凰“那里是陈渠珍的老窝子，活动很困难。陈渠珍是很恶的”。他提出去湘西北。任弼时问：“去打得赢么？”贺龙说：“一个军团去不行，两个军团一块去打得赢。”此次会议一致决定不去乾城、凤凰地区，两个军团集中去湘西北创建根据地。

十月二十七日，两军团领导人联名致电朱德、周恩来，报告新的决定。电报说：“1.我二（两）军团明日（二十八日）向龙潭前进，到西阳、龙山、永顺、保靖、永绥间，用秀山附近民众根据地，且向凤凰、乾城发展。2.我们不直接向乾城、凤凰，有于（下）原因：A.凤凰、乾城、松桃……（土著）武装多，且极强，经常可动员万人，系受陈渠珍节制。”B.敌人一部“十一和二十七日即进到乌罗司，……如向凤凰、乾城，有被敌侧击之虑”。

根据两军团集中进军湘西的方针，经中央代表任弼时和两军团领导决定，整顿了组织：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军团长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原红三军的第七师改为第四师，师长卢冬生，政治委员方理明，参谋长韩克西，师辖：第十团、第十二团。原第九师改为第六师，师长钟炳然，政治委员袁任远，副政治委员廖汉生，参谋长周天民，师辖：第十六团、第十八团。红六军团军团

见 1960 年 11 月 22 日王震谈话记录。

长肖克，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谭家述，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暂时编成三个团：第四十九团，第五十一团和第五十三团。由于任弼时是中央代表、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原是南昌起义的代总指挥、红二军团军团长，关向应是党中央委员，他们在党内、军内威信高，所以，这时虽然没有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但在实际上，以贺、任、关等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已经形成了。红二、六军团从此即由贺、任、关统一领导与指挥。

为了迅速执行新的作战任务，红二、六军团抓紧进行了两天的休整与准备，对黔东根据地的工作作了安排。将原黔东独立师撤销，兵员分别充实到红二军团的四、六两师。另以地方武装和两个军团留下的伤病员组建新的黔东独立师，在黔东坚持游击战争，策应主力向湘西发展。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发动了攻势。

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关于集中两个军团向湘西北行动的意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对湘鄂川黔边的地理、社会情况和敌我形势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之后决定的。当时，黔东苏区对于红三军的整顿和两军团会师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两军团集中在那里，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给、人员补充都很困难，地理情况对于大兵团回旋作战也不理想。所以，两军团不宜继续久留。而凤凰、乾城（今吉首）、永绥（今花垣）、保靖诸县，为湘西军阀陈渠珍统治的中心地区，不仅驻有重兵，而且土著武装极多，枪支不下数万，受“湘西王”国民党新编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节制。这一地区，早在清代就实行屯防制，在凤（凰）、永（绥）、乾（城）、松（桃）、古（丈），修筑了一千一百多座碉堡和一道长达一百多里的边墙。国民党政府又新筑了许多碉堡。同时，这里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以苗族、土家族居多。长期以来，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挑拨离间和反动宣传，苗、汉两族间的隔阂颇深。红六军团如果单独进入这一地区，必将遇到很大困难，不能立足。两军团领导人把四周的地形、民情、经济条件及敌情统一作了研究后认为：湘西澧水上游区域，最宜建立革命根据地。永顺、桑植、龙山、大庸一带，属湘鄂川黔边界地区，经济虽然落后，但共产党的影响比较大。那里过去是贺龙领导的部队活动地区，有比较好的群众关系。贺龙在这个地区人熟地熟，有利于红军的发展。这里各派势力复杂，除国民党外，还有“神兵”、土匪，他们之间矛盾很深。陈渠珍三个旅和四个保安团，约万余人，加上被川黔军阀赶出来而投靠陈渠珍的杂牌军，如杨其昌、车鸣骥、雷明九、廖怀中等四个旅（实际四个团）约四千余人，兵力不大，战斗力也不强，有利于红军向这个地区展开战略进攻。同时，也只有向湘西进军的胜利，才能牵制、调动湘鄂两省敌人，策应中央红军转移；才有利于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恢复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打开新的局面。

但是，中革军委对于红二、六军团的现状和湘西的情况缺乏了解，不同意红二、六军团的建议。十月二十八日，红二、六军团在行军途中收到了中革军委十月二十六日给任弼时、肖克、王震的电报，指示：“A.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应仍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B.六军团应速以军委屡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再延迟。”

红二、六军团领导人慎重考虑后，二十八日即由夏曦、贺龙、关向应、任弼时、肖克、王震联名复电中革军委，着重陈述两军分合的利害关系，并再次建议集中行动。电报说：“1、根据总司令部及我们所得谍报，敌五、一

两支队在松桃、秀山间，三十四师龚仁杰旅在茶洞防。松桃之木岩河船只少，不能徒涉，且敌必有防备。2、六军团除五十二团外，计三千三百余；除留伤病员三百余外，只存三千。二军团、独立师三千九百余，卫戍及伤病员二百余，枪三千七百余。二军团每支枪子弹不过十发。3、在敌我及地方情形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集中行动，以便消灭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4、今天两军进至……马黄井才接到军委二十六日指令，因敌情地形关系，明日仍继进到……板溪洼、分水岭一带。”

十月三十日，红二、六军团到达川东的酉阳，守城之川军旅长田冠五率部弃城逃跑，部队顺利地通过了酉阳。此时，陈渠珍害怕红军返回湘西，急派龚仁杰、周燮卿和杨其昌三个旅共万余人，从永绥和保靖向北行动，企图阻止红军进入湘西。红军先经湖北省咸丰的百户司渡西水向湖南省龙山县招头寨前进，将敌人向北牵动。当陈渠珍部进到招头寨南的贾家寨时。红军突然掉头东进，于十一月七日占领了湘西北咽喉要地永顺城。

红二、六军团在永顺进行了七天休整。在这期间，部队加强了战斗动员，抓紧了各项战备工作，准备迎击陈渠珍部。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给红二军团以上干部作了关于政治工作的报告，介绍中央红军政治工作经验。张子意召开了总支书记和组织科长会议，讲了夏曦的错误。红二军团普遍进行了党员登记，建立和健全了基层党支部。

在永顺，两军团领导人召开会议，着手解决夏曦的问题。会后，肖克、任弼时、王震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作了报告。电报说：“夏曦同志领导中央分局，所以离开湘鄂西苏区，是执行了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曾使党遭到先后取消党、团，取消红军中政治组织和苏维埃及群众组织的取消主义”。“肃反中，十分之九的连以上军事、政治干部当反革命拘捕了。因他的错误领导，使湘鄂西苏区受到损失。在逃出湘鄂西苏区后（当时夏成领导部队逃出，对后方武装和地方工作毫无布置），每日忙于逃命，完全没有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心”。“直到现在还是继续实行退却逃跑路线。……最近三军到白区配合和迎接六军团时，敌进入苏区。夏曦领导独立师脱离苏区逃命，以致这块新苏区缩小”。“分局关向应、贺龙……对夏的领导早已不满。……经过会议，始终没有承认他政治路线的错误。因此，我们认为他不能继续领导，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并提议贺龙为分革军委会的主席，肖、任副之”。

中共中央书记处于十一月十六日复电任、肖、王、贺、夏、关，提出：

“（一）依据你们的来电及我们所有的材料看来，中央认为，二军团的政治领导在离开湘鄂西后，曾有如下之主要严重错误：（1）没有创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坚持的决心。（2）肃反方面的，在反革命活动面前走到了乱捉乱杀的严重状态。（3）对于党与群众组织缺乏信心，并走到了取消党与群众组织的道路。

中央指出这些严重错误，绝不抹杀二军团领导在三年来没有得到中央经常指导状况下的艰苦奋斗，保存了红三军的有生力量，并在湘川黔边建立了新的游击根据地及部分的苏区。因此，在对过去的错误的斗争中，二、六军

团的领导者必须在中央的路线周围团结一致，努力为创立湘川黔边新的苏区的任务而斗争。

（二）为集中与加强对于湘川黔苏区的领导，中央决定创立湘川黔边省委，以弼时为书记，贺、夏、关、肖、王等为委员……二军团长由贺龙同志任之，政委由弼时兼。六军团长、（政委）为肖、王。两军团均直受军委领导，但在两军共同行动时，则由贺、任统一指挥之。为加强现有苏区之地方武装及游击战争之领导，组织黔川湘边军区，司令员及政委由贺、任兼任。当贺、任随二军团行动时，应指定军事及政治的代理（人），以保证对于地方党、苏维埃之领导。”

龙家寨战斗

红二、六军团进入湘西，使湘鄂统治者十分震惊。国民党第十军军长兼湖北省主席徐源泉急令驻湖北藕池的第三十四师开赴湖南津市、澧州地区，阻止红军向东发展。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也严令陈渠珍派兵“堵剿”。根据何键的指令，陈渠珍在凤凰召开“剿匪”会议，成立了“剿匪指挥部”，委派龚仁杰、周燮卿为正副指挥官，指挥龚仁杰旅、周燮卿旅、杨其昌旅和皮德沛部共十个团一万余人，分四路向永顺进攻，企图乘红二、六军团立足未稳之际消灭之。

红二、六军团如何对付当面之敌，打好进入湘西的第一仗，是能否立足湘西，进而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关键。两军团领导分析了敌我情况，认为湖南何键的部队正被中央红军吸引在湘南，湖北徐源泉部大部分散在鄂西施南和洞庭湖滨的津市、澧州一带。当面敌人只有陈渠珍这一股。该敌在数量上虽然占有一定优势，但内部派系复杂，指挥不够统一，官无规束，兵无严纪，战斗力不强，且深为群众痛恨。红二、六军团虽然只有八千人，但士气高，而且两个军团指挥统一，团结一致，力量集中。同时，对这一带地形比较熟悉，有利于机动作战，且可得到群众支援。因此，红二、六军团领导认为，有条件在这里消灭这没敌人，而且也必须消灭这股敌人，才能在湘西打开局面，站住脚跟，并乘胜发展攻势以策应中央红军的作战，遂定下了歼灭陈渠珍十个团的决心。

十一月十三日，红二、六军团接到中革军委电示：“现我西方军（即中央红军——编者）已进入宜、郴之线，湘敌全部被调来抗击我西方军，二、六军团应乘此时机，深入湖南西北去扩大行动地域。”同日，陈渠珍部逼近永顺。红二、六军团决定主动撤出永顺，向敌示弱，诱敌尾追，寻机歼灭之。陈渠珍部误认为红军怯战，立即跟追。红二、六军团一面以一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且战且退，时而丢弃几支枪和一些物资，骄纵敌人，一面边走边看地形，选择有利伏击、侧击敌人的地点和时机。第一次拟在永顺城北附近设伏，但因敌军主力没有离开城市，追来的只是一部分，容易收缩固守，乃决定继续北撤。第二次准备在吊井岩打，但因战场容量小，最多只能消灭敌军两个营，也没有急于打。后又在瓢沙和塔卧等处设伏，均因地形不利于大量杀伤敌人而作罢。敌军因为连日追击均未遇到坚强的抵抗，越发骄怠，一直紧跟到永顺城北九十里的龙家寨。最后红二、六军团看中了以龙家寨为中心的十万坪谷地。此地南北长约十五里，东西最宽处约四里，谷底平坦，村庄较多，可容纳大量敌军。村中多是木板房子，没有坚固的建筑物，利于攻击，

不利防守。谷地两侧，林木茂密，山势较缓，既便于隐蔽，又便于多路同时出击，是一个理想的伏击战场。十六日凌晨三时，红二、六军团伪装继续北撤，撤至十万坪谷地东北隘口时即摆开了伏击阵势。贺龙、任弼时率红二军团团部和四师部署在毛坝附近；红六师部署在杉木村后山，堵住谷口。红六军团十七师（两个团）和十八师（一个团）埋伏在毛坝以南谷地东侧的山林里。下午四时左右，龚仁杰、周曼卿两个旅进入伏击圈。当他们准备在碑里坪宿营时，红六军团突然从翼侧向周曼卿旅发起猛烈攻击，红二军团则从正面猛攻敌前卫龚仁杰旅。周旅和龚旅在运动中突然遭到红军猛烈冲击，兵多摆不开，枪多不能发扬火力，无法构成防御体系，红军仅用两个多小时就把这两个旅大部消灭。接着即向其余敌人追击，追了十多里后发现杨其昌旅在把总河构筑工事，企图顽抗。红六军团五十一团和红二军团十八团，当即迅速展开夜战。第十八团从右侧攻击，第五十一团从正面攻击，不到两小时，即把杨旅大部消灭。红军留下一个团打扫战场，主力星夜向南继续追击。但因红六师师长钟炳然指挥追击不力，残敌逃脱。十八日红军重占永顺。

这一仗是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俘敌两千余人，缴枪二千二百多支，给了陈渠珍部以歼灭性打击。之所以如此，从战略上讲，是时机抓得好，作战方向选择得好；从敌情上看，是陈渠珍部战斗力不强，打击的是薄弱之敌；从战术上说，采取了诱敌上钩的办法，红军连日撤退，示之以弱，敌则步步前进，将骄兵怠，越来越麻痹。此外，就是地形选得好，攻击时机也抓得好，敌刚进入伏击圈，立即出其不意地猛打猛冲，使敌军措手不及。再就是两个军团第一次在一起打仗，都能自觉地服从指挥，协同一致。夜间攻击杨其昌旅，是红二军团的十八团和红六军团的五十一团联合进行的，他们在肖克的指挥下并肩攻击，都打得很好。这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改善了红军的装备，争取了战略展开和发动群众的时间。这一仗，是红二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及红六军团西征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转折点，是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黔苏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

龙家寨战斗后，红二、六军团为了执行中革军委十月二十六日关于去乾城、凤凰地区的指示，留下红四十九团的三个连于永顺、保靖展开游击活动，保护伤病员，钳制敌人，主力乘胜南下，准备渡过西水，给陈渠珍部以更大的打击，争取在永绥、乾城、松桃和凤凰建立新的根据地。部队进到西水北岸王村时，因敌人已有防备，遂放弃渡过西水之计划，转而折向东北，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攻占了庸县城，歼敌朱华生旅一部。接着又占领了桑植城。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来电指示：“我西方军已过潇水，正向全州上游急进中，你们应该利用最近几次胜利及湘西北敌情空虚，坚决深入到湖南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我西方军。首先你们应前出到湘敌交通经济命脉之沅水地域。主力应力求占领沅陵。向常德桃源方向应派出得力的游击队积极活动”。“为巩固新的苏区，留下二军团一部分及随六军团行动的党的干部来完成这一任务。二军团主力及六军团全部应集结一起，以便突击遭遇的正规部队”。

红二、六军团根据这个指示，由任弼时、王震、张子意带领红六军团的四十九团、五十三团和红二军团的十六团及随红六军团行动的原湘赣苏区的地方干部留在新区，恢复和建设革命根据地。贺龙、关向应、肖克带领红二军团主力和红六军团的五十一团继续发展攻势。

十二月初，红二、六军团主力由庸城南下，七日进袭沅陵。原计划夺取

这个城市，然后进入湘中，直接威胁在湘南防阻中央红军的湘军的侧背。但由于沅陵国民党守军四个团已有准备，袭击没有成功。

关于沅陵之战，红二、六军团后来在军事总结提纲中指出：

“一九三四年攻下大庸后，应立即进攻慈利，直抵常桃，然而放弃了这一有利的行动，以执行军委的指示为词（军委当时的指示是二、六军最好能占领沅陵），不分析战争的结果，去攻毫无胜利把握的沅陵（当时已知沅陵有周矮子二团，戴季韬二团，城防是有相当的准备的，去打沅陵极少把握。然而有的同志觉得，不打下来去威逼一下也有作用，但没有想到如果在慈、石、常、桃方向求得胜利，在战略上配合中央红军在湘黔的活动，作用是要更大的），以致这次行动得不到丝毫结果，并且延迟了向常、桃活动的时间，致湘军将在一定的时间内，毫无顾虑的追击一方面军（湘军由湘南开始向中央区红军追击，一直追至新厂才折而北进）。”

“沅陵的行动是不对的，不久事实证明了，在我们由沅陵折回向常、桃时，沅溪河之捷，取下桃源，逼近常德，陶、章等师立即由新厂北调增援常德、桃源。”

攻击沅陵没有得手，红二、六军团即迅速改变计划，决定顺沅江东下，乘虚进击常德、桃源之敌。此时，中革军委不同意红二、六军团主力东出常、桃，十二月十四日电示红二、六军团：“主力仍应向沅江上游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钳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如辰州附近不便渡河，可改于保靖附近南渡至泸溪、乾城、凤凰地域活动。对桃源方向只须派一支队去活动，以钳制与迷惑湘中之敌。”但红二、六军团接到这个指示的时候，部队已经开始行动，只能按原计划继续东进。

沅溪河战斗

在红二、六军团转向常德前进的时候，国民党军独立三十四旅奉蒋介石的命令，由湖北黄肢乘轮船赶到常德、桃源一带布防。旅长罗启疆认为他的部队弹药充足，装备精良，极为可靠，决定以所谓“决战防御”与红军在常德外围决战。他把第七一团放在桃源北面的沅溪河，把第七二团放在陬市、河洑地区，让第七三团驻守桃源，旅部直属部队协同当地保安团担任常德城防，企图以此来消耗和疲劳红军，保持常德和桃源两城不失，使红军不能威胁长沙。

罗启疆旅各团在部署上相距数十里，不利于及时支援。红二、六军团抓住敌人这个弱点，决定首先奔袭沅溪河，消灭第七一团，尔后再各个击破其他两团。

十二月十五日下了一天雨，夜间特别黑暗，道路泥泞难行。就在这个敌人认为“不便于军队行动”的时刻，红军以夜行百余里的速度急进到了沅溪河附近。

十六日拂晓，红军先头部队第十二团从行进间一举突入了沅溪河西山的敌人阵地。国民党军很快发现突入阵地的红军兵力不大，而且没有后续部队，当即集中兵力进行反扑，战斗非常激烈。第十二团没有立住脚，撤了下来。

引自《二、六军团黔东会师后至渡金沙江这一斗争阶段中军事上的总结提纲》。

即国民党军旅长周燮卿。

国民党军留下两个连防守，团的主力离开阵地，进行反冲击，企图把后撤的红军消灭在阵地之前。在这紧急关头，红四师后续部队和红六师十八团赶了上来。红四师师长卢冬生抓住敌人脱离阵地的有利时机，首先以师警卫连、侦察队和迫击炮连占领有利地形，阻止敌军对第十二团追击，然后迅速组织第十二团和第十八团向敌冲击，打得国民党军迅即瓦解，拼命南逃。这时，由桃源赶来增援的敌第七二团两个营的先头部队，刚到浯溪河南边，就被溃退下来的部队冲乱，不战自溃，和第七一团的溃兵混在一起，狼狈向常德逃跑。红军第十七师五十一团肃清街西阵地上残存的敌军两个连后，主力猛打猛追，占领了澧市，直取河袱。河袱敌守军第七二团一部和从常德来援的独立三十四旅教导队向红四师发起了冲击，战斗一时呈胶着状态。入夜，红军同敌反冲击部队继续战斗，红十七师五十一团从左翼包抄，红四师和红六师十八团从正面攻击，敌军不支退入常德，红军占领了河袱。留在桃源的国民党军第七二团的一个营，也从沉水南岸缩回常德。这次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团另两个营，击溃一个团。十七日，红军包围常德。十八日，红军第十八团、第五十一团占领桃源，并派出一个营渡河向益阳游击。

浯溪河战斗，是一个漂亮的由奔袭转为进攻的战斗。红军所以能用大致相等于敌军的兵力歼灭敌人，从敌军方面看，主要是指挥官骄傲狂妄，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把一个旅分散在浯溪河、桃源、河袱和常德四个点上，每点力量都不强，而且互相难以及时支援；从红军方面看，主要是高度发扬了不怕吃苦，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从百里之外奔袭，突然猛攻敌人最突出的阵地，在突破敌前沿浯溪河阵地后，主力又迅速向纵深发展，致使敌指挥官来不及反应，即一举把撤迟、增援的敌人消灭了。

常德市有近十万人，是湘西的政治、经济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地位非常重要。此时，城内国民党军只有一个保安团和独立三十四旅的残部，因此，对红军的胜利极为震惊。何键害怕红军攻下常德，南渡沉江，进取益阳、安化，逼近长沙，一日数电向蒋介石告急：“共军围攻常德甚急，势难固守，请飞兵救援，”他还向徐源泉求援，要求“迅令在澧之部队，向临澧、鳌山夹击”²²；同时，急令在湘南同中央红军作战的湘军第十九师、第六十二师和第十六师兼程北进，回援常、桃。“令陈渠珍部迅出大庸”。蒋介石也命令在江西省的第二十六师乘火车、汽车驰援常德。徐源泉则害怕红军向湖北发展，威胁长江交通，自行改变蒋介石命令他率部入川与中央红军作战的决定，把他的第四十八师、三十四师、五十八师、新三旅和暂四旅等部，摆到湘鄂边境和湘西。在中央红军进到贵州省的时候，国民党军李云杰和李韞珩两个纵队共四个师也转到了湘黔边境，防堵红二、六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合。

实践证明，红二、六军团不避违背中革军委指示之嫌，乘虚进击常、桃之敌，是一项正确的、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它更及时、更有力地达到了中革军委指定的“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之目的”。

在红二、六军团进到常、桃地区时，中央红军已经进入贵州省东南部。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作出决定，改变了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计划，“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根据这一决定，朱德在二十日给贺、任、关、肖、王发出新的指示：“A.因我二、六军团积极行动，何敌正调动约四个师的兵力向你们

引自 1934 年 12 月 18 日何键致蒋介石巧已电。

前进。但十六师、六十二师一时尚赶不到。B.我西方军现由黔边前进，拟先消灭黔敌，钳制湘敌，然后北进配合你们行动并发展苏区。C.二、六军团目前应留在常德、桃源及其西北地域积极活动，并派出两个别动队分向益阳、辰州两方向活动，以迟滞湘军向我前进。如郭敌先经常德或桃源向我出击，则我二、六军团应消灭其单个部队。当湘敌十九师主力及十六、六十二两师已到达常德、桃源附近时，我二、六军团应重向永顺西进，以后则向黔境行动，以便钳制在芷江、铜仁之薛敌部及在印江、思南之黔军。”

根据红军总部这一指示，红二、六军团主力在常、桃地区活动了十天，广泛宣传抗日反蒋主张，没收分配土豪劣绅的财产，积极动员群众，扩大红军，吸收了数千名工农分子加入红军，并筹得大批物资、钱款。二十六日占领了慈利县城。

二十七日，朱德电示贺、任、王、肖：“A.湘敌俟其十六、六十二两师及徐源泉部到达地域之后，即实行向我进攻。B.关于二、六军团行动，……军委有以下指示：（一）二、六军团不应在慈利久停，应乘敌人分进合攻之先，转向永顺行动，在慈利只应留下游击部队以吸引敌人。（二）对辰州方面仍应派出游击队以迟滞敌进，并（以）便于二、六军团主力在永顺、大庸、沅陵地域寻求翼侧机动。”遵照这一指示，红二、六军团主力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初返回大庸、永顺地区休整，并寻求有利战机打击敌人。至此，湘西攻势胜利结束。

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任弼时红二、六军团会师后这一时期的斗争作了总结。他说：“自从我红二、六军团会合，在中央和军委指挥之下，进到湘西北一带地区之后，党即决定在这一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不到两个月时间，的确我们在湘西北创立了一个新的形势，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上是有极大意义的。

我们英勇善战的二、六军团，坚决地执行了党的进攻路线，在短短的两个月中，给了陈渠珍以致命的打击，打败了朱疤子和刚由江西调来进攻我们的罗启疆部，总共击溃了敌人十五个团，消灭了四五个团的有生力量，接连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城市。特别是我们进攻辰州，包围常德，给了湖南敌人和进攻我中央野战军的敌人的总后方以很大的威胁，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野战军的行动。在红军胜利影响和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慈利的工农群众都踊跃起来革命，到处撑起红旗，组织游击队。普遍建立了工农的临时政权，现在从洗车河到溪口有四百多里，从桑植以北到永顺的石堤溪以南有二百四十五里，这一地区已经成为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了。

这一区域有四五十万人口，群众的斗争已经从打土豪进到分配土地、消灭封建势力的最高阶段。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从国民党军阀长期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得到了切身的基本的利益，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大大提高。首先表现在群众热烈地参加红军，使我们的主力红军扩大一倍以上；其次是创立了大批的独立团、营和游击队，正在同地主武装进行残酷的武装斗争。各地群众都积极地分配土地，组织工会、贫农团，建立赤少队的组织，为保卫革命

即朱际凯，湖南省慈利一带的国民党团防头子。

应是湖北省黄陂。

政权和已得利益而坚决斗争。”

引自任弼时《关于粉碎敌人大举进攻最后的彻底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前面党的紧急任务》。

黔东特区的斗争

在红二、六军团进军湘西的前夕，两军团领导认为，在红军主力离开后，黔东的党组织仍应“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因此，组成了黔东特委，调红六军团宣传部长段苏权担任特委书记；重新组建了黔东独立师，调红六军团五十三团团团长王光泽担任师长，段苏权兼任政治委员。独立师由黔东独立团、德江独立团、川黔边独立团和红二、六军团留下的三百多名伤病员组成，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共三个团，约八百多人，各种枪四百余支。

黔东独立师成立后，立即由南腰界出发，向西南前进，吸引敌军，掩护红军主力向湘西进军。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独立师返回苏区中心时，苏区大部分地区已为黔军占领，只有黔东特区革委会副主席秦育青领导的各区、乡游击队在瓦厂坝、铅厂、白石溪、谯家铺一带坚持斗争，处境十分困难。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发现黔东独立师返回，急令正在追击红二、六军团主力的李成章、王天锡两部迅速返回黔东，与川军配合包围独立师。十一月上旬，黔、川国民党军共十个团、一个旅从四面向黔东苏区进攻。独立师和游击队同优势的敌人苦战十余天，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消灭了部分敌人，保卫了根据地的中心区域，策应了红二、六军团主力的进军。但自己也伤亡较大，而且弹药缺乏，给养困难。为了摆脱优势敌军的包围，保存有生力量，黔东特委决定，除部分兵力留在根据地钳制敌人外，独立师立即向梵净山转移，依托那里的有利地形坚持游击战争。十一月十日，黔东独立师进入梵净山张家坝至护国寺一带。

由特区革委会副主席秦育青率领的特区保卫队和特区机关人员，十五日从白石溪去梵净山，途经枫香园时，遭到敌人伏击，在转向湘西寻找红军主力途中，又多次受到敌军夹击、堵截，伤亡很大。此后在四川秀山县境的百岁、坝芒一带，再次遭到敌军阻截，最后只有少数战士脱险。

黔东独立师进入梵净山后，拟以护国寺为中心开辟游击区。以第一团驻守山脚的烂泥沟，第二团驻守苏家坡，第三团驻守大园子，师部设在护国寺。他们抓紧时间构筑简易工事，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的斗争，想方设法收集粮食和其他物资，多次打退了敌军的进攻。十一月二十三日，黔军李成章、柏辉章两部和印江、江口两县民团向梵净山的黔东独立师发动了进攻和“清剿”。独立师激战一天，歼敌百余人，但自己也损失严重，处于粮断弹缺和被困的境地，难以在梵净山立足，遂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晚，越过梵净山顶峰向北突围，去湘西寻找红二、六军团。二十五日凌晨，在梅邑遭当地民团和乡丁拦截，经过激战打退了敌人，政治委员段苏权负重伤。二十六日，在贵州松桃近驾又遭当地民团的夹击，牺牲战士二十多人，第三团团团长马吉山英勇牺牲。鉴于敌情严重，师长王光泽将负伤的政治委员安置在秀山县群众家里，然后率部复入四川秀山县境。十一月二十八日，到达川湘交界的大板场时，再次受到民团的伏击。这时，独立师已经无力再战。为保存力量，王光泽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向湖南方向突围，寻找主力。在突围中，团长宁国学牺牲，王学泽被俘，于十二月二十一日英勇就义。最后，黔东独立师只有极少数人分散找到红二、六军团。黔东特区也只有小股游击队在坚持斗争，成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游击区域。

黔东独立师和游击队与超过自己数十倍的敌人战斗了一个月之久，完成

了钳制敌人、掩护主力的任务。黔东苏区人民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在红二、六军团挺进湘西北和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湖北的红军鄂川边独立团曾积极活动与之配合。这个团是由一九三三年底建立的游击队发展起来的，经过一年多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到一九三五年春节时，发展到四百余人。二月中旬，由于川军和鄂军新三旅的“围剿”加剧，独立团决定撤往湘西。十九日，从鄂川边境的李子溪出发，经利川、恩施、咸丰、宣恩到达湖南省龙山县的石牌洞，于二十七日在永顺县龙家寨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合。后来编为红二军团第五师十二团。

鄂川边独立团独立地坚持了一年多的游击战争。他们紧紧地依靠鄂川边土家、苗、汉族人民，打破了鄂军新三旅、保安团和川军达凤岗旅、周化成保安团等部的轮番“围剿”，平息了内部叛乱，牵制了部分鄂军，配合了红军主力作战，求得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最终胜利地回到了红二、六军团主力的怀抱。鄂川边独立团和鄂川边人民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很大贡献。

第三节 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准备反“围剿”

龙家寨战斗后，红军第四十九团即分散在永顺、保靖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龙家寨建立了县临时政权——革命委员会。从此，开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湘西攻势的胜利，红军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三县和龙山、保靖、慈利县各一部分地区。这里是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四省的边界地区，国民党的统治较弱。桑植在一九二八年就建立过工农兵民主政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曾进行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群众基础比较好。这里有崇山峻岭，便于开展游击战争。东部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有利于红军取得物资和人员补充。在战略上，这里是进攻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的侧背，革命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可以威胁湘鄂国民党军阀统治的中心长沙和武汉，有效地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基于上述情况，中央同意红二、六军团在这里创建根据地。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发出第一号《通知》：“（一）根据党中央电示，在湘鄂川黔边成立新的临时省委，为这个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以任弼时同志为省委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肖克及张子意、刘士杰（后叛变）等同志及少共省委一人为省委委员。（二）根据中央（革）军委电示，在湘鄂川黔边区成立军区，以贺龙同志为军区司令员，任弼时同志为军区政治委员。”当时红六军团司令部就是湘鄂川黔军区司令部，贺龙在前方期间，王震兼任军区代司令员。此外，还成立了湘鄂川黔边区革命委员会，贺龙任主席，夏曦、朱长清任副主席。

从此，原中共湘鄂西分局、军委分会和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都自行结束。省的领导机关先设在大庸，后于十二月十日迁至永顺县塔卧。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作出了《关于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今天中国苏维埃革命最有基础的地区是在江西和四川，把这两个基本区域联成为整个的一片，是争取一省几省革命首先胜利不可分离的当前的战斗任务。我红二、六军团是负着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最重大的责任。为着江西和四川两个基本苏区迅速的连成为一片，迅速夺取反动统治的中心城市；为着开展和掀起湘鄂川黔苏维埃革命的巨潮，使得这一地区的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得到解放；为着我红二、六军团有着巩固的根据地，来实行他所负担的历史任务，省委决定在湘鄂川黔边区创造巩固的新根据地。”

这时，湘鄂两省国民党军陆续地调到了根据地的周围，严峻的反“围剿”即将开始。省委鉴于这种情况，明确地提出：于建设根据地的同时，加紧反“围剿”的准备工作，以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反“围剿”的斗争，将迅速准备粉碎敌人“围剿”的条件作为党和红军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围绕这一中心的具体工作，主要是：建立各级临时政权，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进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和组织地方武装，广泛地进行战争动员等等。但当时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情况是：自红二军团退出湘鄂边苏区以后，原根据地的革命组织已被敌人破坏；地主武装和土匪很多，活动非常猖獗，加上国民党军“围剿”的威胁，群众顾虑很多，情绪也不稳定。而且临时省委和红军部队干部缺乏，一时满足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红六军团连续几个月行军作战，减员

很大，相当疲劳，需要休整和补充。在红二军团内部，由于夏曦的错误所造成的恶果，也需进一步清除。所有这些，再加上建设根据地的摊子刚刚铺开即面临敌人“围剿”的威胁，这就使得各项工作的开展都格外紧迫和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号召党和红军：面向群众，深入群众，解释党的政策和主张，了解群众每一细小的要求与意见，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发扬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以最大的决心抓紧开展各项工作。

政权建设

到一九三五年春，根据地的县、区、乡各级临时政权都陆续建立了起来。建立了临时政权的地区是：永保县（原永顺县、保靖县各一部）革命委员会，下设塔卧、瓢沙、勺哈、盐井、对山寨、大坝、猛岗、城市等九个区，三十八个乡苏维埃政府。郭亮县（原永顺县东北部地区，为纪念遭到国民党杀害的中共湖南省委的负责人郭亮而命名）革命委员会，下设龙家寨、毛坝、官坝等三个区、九个乡苏维埃政府。大庸县革命委员会，下设大溶溪、西溪坪、新桥、轿子垭、茅岗、大坪、沅石坪、东北市、西市、南市、教市、溪口等十三个区、六十八个乡苏维埃政府。桑植县苏维埃政府，下设县城、朱家台、上河溪、利福塔、珠矶塔、瑞塔铺、何家坪、洪家关、新街、岩垭、陈家河、张家坡、两河口、双溪桥十六个区，五十一个乡苏维埃政府。龙山县革命委员会，下设兴隆、石牌、茨岩、水田、农东、红岩、招市、茅坪等八个区，五十二个乡苏维埃政府。桑慈联县革命委员会。宣恩县苏维埃政府，下设道沟、高罗两个区，辖十四个乡苏维埃政府。鄂川边区的咸丰等地也建立了三个乡苏维埃政府。

建立党组织

在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的领导下，深入乡、县的工作队积极抓了党的组织建设。早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龙家寨大捷后，就成立了龙家寨乡党支部。这是湘鄂川黔边区的第一个党支部。不久，周围的杉木、新寨、碑立等乡也相继建立了党支部。后又建立了中共龙家寨、塔卧、瓢沙等区委。接着成立了中共永顺县委。十二月二十四日，永顺县划为永保、郭亮两县。中共永保县委，下有九个区委。中共郭亮县委，下有三个区委。中共大庸县委，下有六个区委。中共桑植县委，下有十五个支部，中共龙山县委，下有八个区委。

省委很注意本地干部的培养，在建政过程中，积极选拔了一批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县、区、乡党政领导工作。为了培养干部，当时在塔卧办了红军学校，由省委委员张子意负责，王恩茂任教务处长。数百名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在这里学习后回去担任了党的领导工作。在红校还办了一个上干队（高级干部队），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

土地革命

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保靖、郭亮、大庸、桑植、永顺等县的土地，也

绝大部分为地主豪绅所有。如大庸的地主、富农不到全县人口的百分之十，却占有全县将近三分之二的土地和山林，大庸的“八大家”，桑植的“八大诸侯”，永顺的“六大家”，都是当地著名的拥有大量土地的土豪劣绅。塔卧约有田地九千亩，为瞿、田、丁几家豪绅所有。广大劳苦农民只有很少土地或完全没有土地，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备受佃四主六、佃三主七、甚至佃二主八、佃一主九的高地租剥削。高利贷剥削也极为残酷，“滚滚”息、“跟斗”息在这一带极为普遍。如桑植县洪家关大土豪谷得志，专以放高利贷掠夺钱财，他放的债谷，一石要还两石，甚至三石。如债户不能如期偿还，他们便使用“三年不打网，鱼在潭里长”的恶毒手段，最后以“八斗九年三十石”的所谓“利息”，将债户的全部家财掠为己有。地方当局更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据保靖县政府和财政局档案统计，各种税捐竟达二百四十九种之多。大小军阀和各派恶霸势力，对农民的剥削压榨更为残酷，或强迫农民种植鸦片，纳款买枪；或以保家、保寨为名，制造械斗；或抓丁派工，修筑寨堡。农民稍有反抗，即遭残害，被割头挖眼者有之，被截肢断脚者有之。广大劳苦群众在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的压榨下生活极端痛苦，迫切要求民主，要求土地，他们在红军节节胜利的革命形势鼓舞下，经过教育和发动，积极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人民政府和红军首先领导群众捉拿土豪劣绅，把他们的粮食财物没收，分给贫苦农民，接着分配他们的土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湘鄂川黔边革命委员会颁布了《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主要内容是：豪绅、地主、军阀、官僚、大私有者的土地、房屋、财产、用具须一律没收（但地主兼商人的，其商业和与商业相关的店铺、住房、财产等不没收）。富农的土地应该没收（但富农兼商人的，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店铺、住房、财产不没收）。凡是雇农、贫农及农村工人、苦力一律平均分得土地。中农土地是否拿出来与雇农、贫农平分，以中农群众自己的意见来决定。富农按劳动力与人口混合原则分坏田，豪绅、地主及其家属全家不得分配土地。土地分配方法：以乡或村为分配土地的单位，雇农、贫农、中农、农村工人、失业独立生产者，应按照人口，将田地好坏、多少均匀进行分配，但中农须按照自愿的原则。

《条例》对红军干部、战士怎样分配土地作了具体规定：红军干部、战士本人及其家属分配土地与贫农、中农一样，但须分在附近或离红军家属住地不太远的地方。长期在红军中服务的红军干部、战士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分子，在他们坚决为工农利益作战的条件下，不论指挥员、战斗员本人及其家属均有分配土地之权。但被开除军籍者，则应收回其土地。

十二月十六日，省委又制定了《分田工作大纲》。《大纲》指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与阶级觉悟，动员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战争，巩固与发展新的苏区的主要条件。……摆在全党面前的紧迫任务是继续开展和深入农村的阶级斗争。求得这一广大区域迅速赤化与巩固发展，迅速动员更广大的群众参加快要到来的新的决战，是目前工作中心一环。我们要用最大的努力求得在最短期间（十二月份），将基本区域内的土地完全分配好。”《大纲》重申“中农的土地是否平分，必须特别集合中农，征求大多数中农的意见，由中农表决”。要求“巩固工人、雇农、贫农与中农的亲密联盟”，“同时要防止把富农当地主，中农当富农，而进行消灭富农、动摇中农的倾向”。

根据分田大纲，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全面展开。各县都召开了干部会议，

举办了土地革命训练班，深入学习分田政策和布置分田工作。区乡先后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分田政策。乡成立贫农团具体领导群众划分阶级、丈量土地，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田。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心区域的塔卧、龙家寨、刘家寨、瓢沙等区以及靠近红军驻地、工作较好的一些乡村都完成了分配土地的工作。

随着红军湘西攻势的胜利，根据地迅速扩大，土地革命需要在更大范围展开。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省委书记任弼时在第二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强调指出，“彻底分配土地是完成战争动员不可分离的任务”，要求“各地方党应抓紧这个基本的斗争，求得迅速解决新区的土地问题”。土地革命运动在根据地内迅速全面地展开后，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取得了较大成果。例如，到一九三五年农历年前，大庸县的天崇、官尹、北固、北社、罗塔、西庸等区的六十余个乡、镇普遍做到了插牌到户，所种的油菜、小麦等青苗，均归分田户所有。据该县六区七十一保的统计，共分配了土地十五万一千九百余亩，约占全县田亩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六，得田人数约九万五千余人。

省委在这次分田中，接受了过去的教训，对民族工商业采取了保护政策。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规定：凡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店铺、住房、财产等不没收。同时，放弃了过去驱逐地主豪绅家属出根据地的错误做法。这种改变，对活跃根据地的经济，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和孤立敌人，以及稳定社会秩序，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分田过程中，也沿用了过去那种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对中农土地倾向于打乱平分的过“左”政策。虽有少数地区的领导干部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对中农采取了团结的方针，对其土地没有打乱平分，但多数地区还是按打乱平分政策办了，并且在划分阶级成分时一般定得偏高，结果在总的方面还是扩大了打击面，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后来，省委为了纠正工作中的偏差，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又颁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只能削弱富农，而不应该消灭富农，必须反对侵犯中农利益与消灭富农的倾向；各地要细致地正确地划分阶级；对那些介于富农和中农的疑似成分，以及没有把握判定的成分，必须报告上级批准；中农的土地不经本人同意不能平分。但由于省委没有认识当时党的政策本身的过左性质，因而在政策思想上还存在矛盾，在同一决定中又提出反对所谓“富农路线”，并且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做法当做错误的东西而加以反对。所以，这次纠偏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过“左”政策所带来的全部问题。

扩大红军

随着土地革命的进行，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提出了在三个月内扩大一万二千名新战士的任务。根据省委决定，前方后方，党政军民共同努力，广泛开展了扩大红军的运动。当时，红军的各级机关和连队，都分别组织了扩大红军工作队和小组，并发动红军干部、战士随时随地地深入到群众中去，采取口头、标语、戏剧等宣传方式，动员群众参加红军。这时，分散在永保、郭亮、大庸、桑植各县执行任务的第四十九团、五十三团和十六团，都积极进行了扩红工作。各级政府，则坚持给红军战士家属分好田，做好对红军家属的优抚工作，并明确提出了“保卫分粮分田胜

利果实”、“工农武装上前线”的口号，动员群众参军。当时群众参军相当热烈，涌现了不少母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报名的动人事迹，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响起了“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都欢迎……”的歌声。大庸县的郑家坪乡，先后有九百多人参加了红军。此外，红军还对龙家寨、语溪河等战斗中的俘虏兵进行了改造和争取工作，动员他们参加红军。由于采取了地方全面动员和个别扩大、改造俘虏相结合的扩红方法，到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两个军团共扩大了四千多名新战士，各部队的兵员大为充实。同时还以少数主力红军作骨干与一部分地方武装合编，组建了第十一团、五十团、五十四团，以收编、改造的李吉宇部“神兵”二千余人为基础，成立了第六师十七团。此外，军区还扩建了红军学校第四分校，由王震兼校长。建立了几所医院、被服厂和小型兵工厂。

地方武装也发展很快。永保县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组织起一个独立团，开始只有一百多人，不到一个月，就发展到五百多人。郭亮县组织起一个独立营，共有二百多人。大庸县组织起一个七百多人的独立团和一个县游击大队，各区也都有了游击队，人数一二百不等。桑植县和龙山县组织了一个龙桑独立团。另外，还组织了慈利独立团、龙山独立营和永（顺）沅（陵）独立营。各县都建立了赤卫队、模范营等群众武装组织。地方武装人员，大部分是自愿参加的农民，少数是收编的“神兵”和土匪。省委和军区很重视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多次从主力红军中抽调干部到地方武装中去建立党的组织，进行政治的和军事的教育与训练，并注意加强对收编的“神兵”和土匪的改造。为了统一对地方武装的领导，还在军区之下成立了两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乐尚连（后叛变），政治委员先后为袁任远、刘亚球，下辖大庸、慈利两县独立团和游击队；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先后为马赤、刘子奇，下辖永保、郭亮、龙山、桑植等县的独立团、营及游击队。地方武装的成长，大大增强了对敌斗争的力量。

清剿地主武装和土匪

湘西地主武装和土匪很多。从清朝末年农民反清运动兴起，这个地区就出现了众多的“袍哥会”、“兄弟会”、“天地会”等民间武装社团。后来，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些武装社团相互仇杀、火并，逐渐分化，有的成为镇压农民的地主私人武装，有的成为抢劫农民钱财的土匪，还有一些社团，如一部分“神兵”坚持反对官府、豪绅的压迫。陈渠珍不仅拥有相当多的正规部队，还网罗了永顺、大庸、桑植等地许多掌握武装实力的土豪劣绅，给以资助，组织团防；同时，还以收买利用等方法，纵匪养匪，与土匪相勾结，形成了军阀、豪绅、土匪三位一体的反动统治。肃清地主武装和土匪，巩固后方，是当时建设根据地，准备反“围剿”的一个极其重要、艰巨的任务。龙家寨战斗胜利后，虽然消灭了一部分地主武装，收编了一部分土匪，但封建反动势力和土匪的活动仍然很猖狂，对根据地地方工作的开展和战争动员妨害极大。一次，任弼时率领省委机关人员由大庸的丁家溶回塔卧，行至温塘附近，突然遭到大股土匪的袭击，红四师第十一团用了两个连才把土匪打跑。针对这种情况，省委指示：“首先应采取坚决的军事上的进攻，动员广大工农群众，配合红军、游击队去猛追猛打，消灭他们，绝不能采取放任与防御政策。同时应采取政治工作，号召民团与土匪士兵回家打土豪分田地，

发动他们的家属、亲戚、朋友去宣传邀他们回来，派人到他们中间去工作。对于俘虏应分别清楚，其首领或阶级异己分子应公开枪决；被欺骗的工农分子应优待他们，从政治上去瓦解他们的组织。这里，‘杀土匪’、‘剿匪’的口号，以及不分阶级，不分首领，捉到便杀的办法，只有帮助敌人，巩固敌人阵地。特别是对于被豪（绅）地主欺骗与压迫而向我们喊‘捉’喊‘杀，或打土炮的群众，我们应该以同志的态度去争取他们，说服和领导他们与我们一起去进行武装斗争”。“在分田时，他们中间工农出身的士兵应同样分得土地”。根据省委指示，军区立即组织清剿，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打开了一些地主武装和土匪所固守的寨堡和山洞，缴枪两千多支。如新寨坪的弄塔大地主王金礼和国民党塔卧区区长张奎全，欺骗部分群众，储备了可供一百多人吃一个多月的粮食，携带四挺机枪和六七十支长短枪，进入永保县瓢沙、车坪交界处的趴水洞里，与人民为敌。他们作恶多端，血债累累，群众恨之入骨。军区组织游击队和少赤队并派出少量红军部队，经一个多月围攻，把这股反动地主武装全部消灭。但是，由于这个地区的地主武装和土匪特别多，根深蒂固，盘根错节，非一次围攻所能奏效。加之主力红军忙于对敌正规部队作战，留在地方活动的少数部队和地方武装当时又偏重于边缘区的斗争和向外扩大新区，土匪和地主武装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同时，由于一些地方在土地革命中没有认真贯彻省委的政策，不给地主以生活出路，过重地打击富农，侵犯了中农利益，对于一些与共产党和红军有统战关系的人，也作了不恰当的处理，打击面过宽，树敌过多。所以，随着国民党军“围剿”的日益逼近，地主武装和土匪的活动越来越猖獗。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红二、六军团回到大庸以后，加紧了组织建设和战术技术训练。红二军团恢复和充实了军团、师两级司令部。团司令部都委任了参谋长，增配了参谋人员。通信能力也得到加强，团以上指挥机关都装备了有线电话，师单独行动时也可携带无线电台。司号员过去是使用国民党军队的号谱，这时一律改用自己新编的号谱。同时，还加强了地面侦察和对敌军无线电电信的破译力量。在军事训练方面，抓紧了部队的战术、技术演练。印发了红六军团带来的由刘伯承等同志翻译的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及其他军事材料，编写和印发了《湘军的战术及其对策》，翻印了部分湘鄂川黔边的地图，组织指挥人员学习使用地图。在这些活动中，军团参谋长李达起了重要作用，他既组织领导，又当教员讲课，言传身教，堪称师表。另外，又从红六军团抽调了一些干部到红二军团任师、团领导和营、连长，并在全军上下加紧了扩红和筹粮工作。

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于一月四日发出了关于地方战争动员的指示。并于一月六日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具体地布置了战争动员工作。任弼时在会上作了报告，说明了当时战争的形势和粉碎敌人“围剿”的迫切性，以及取得胜利的条件，提出了争取反“围剿”的胜利是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的口号，要求动员、组织和武装广大工农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在群众中造成一个一切为着战争胜利的热潮；加强对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的领导，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消灭根据地内的地主武装和土匪，镇压反革命活动，巩固后方。这次会议，推动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及反“围剿”斗争准备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为了筹集粮食和财物，党、政府和红军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在根据地内向商人征收累进税，向地主罚款，向富农捐款等。同时，省、县、区各级政权也都建立了粮食委员会、粮食保管委员会以及财政机关，统一各地财政，实行

预算制度，开展了反贪污浪费的斗争。

丁家溶会议

丁家溶会议是在两军团领导人会议的基础上召开的，其目的是要纠正夏曦的错误。在这之前，红二、六军团会师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就曾详细地研究过夏曦的问题，任弼时积极支持贺龙和关向应的正确意见，并召开两军团主要领导人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初步批判。此后，在红军攻占永顺县城时，又开会作了进一步批判。但这两次会议都很仓促，没有解决问题。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对红二军团来说，已经成为深入战争动员的当务之急。因此，在建设根据地和准备反“围剿”的同时，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再次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在大庸的丁家溶召开了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计划通过这次会议，使夏曦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丁家溶会议集中地批判了夏曦在根据地建设、“肃反”、建军和建党等方面的严重错误，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都发了言，省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任弼时做了总结发言。任弼时在一月二十七日的总结发言中首先指出：“红二军团过去有他的光荣的成绩，他在湘鄂西的时候，曾经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取得了很多次伟大的胜利。”他说，夏曦的错误是：“一、最明显而基本的错误，是看不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力量和作用。……他不相信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认为共产党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竟走到公开地解散党和团的组织，取消党所领导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中政治组织和工作，公开走上了取消主义的道路。二、夸大反革命力量，形成错误的肃反路线，造成党和部队中的严重现象，……在反革命活动面前，惊慌失措，认为部队中连长以上的干部，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改组派，逮捕的在二千人以上。……夏曦同志同样认为，湘鄂西地方党、苏维埃区、县、省级的干部，也有百分之八九十是改组派。……夏曦同志不能正确估计反革命，夸大反革命组织力量，而采取扩大化的、简单化的错误的肃反路线，这正是帮助反革命达到破坏党、政府和红军的阴谋，上了反革命的当。……在这种恐怖与不信任，以肃反为中心的下面，没有人敢说话，或自动去工作，人人觉得有被人认为是改组派而遭拘捕杀头的危险。这种情况的严重的确可以走到自己解体的危险前途。三、由于不信任群众，不相信红军力量，在敌人进攻面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没有决心创造苏维埃根据地，使红军长期过着流荡游击生活。……在黔东算是建立了一个小的游击区域，但没有真正去巩固它。……因为没有创造新的苏区，所以我们红三军，没有后方依托，只好东奔西走。打了仗，伤兵只好沿途寄居在群众家里。人员减少，得不到适时补充，弄成枪多于人的怪现象。部队疲劳的时候，也得不到一个安全地方休息、整理训练。这样就使红军受到不应有削弱。以上一切，都是夏曦同志过去所犯错误的实质。这不是什么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一条有系统的、与党中央路线完全相反的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路线。”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当时省委未能认识到夏曦主要是坚决执行党的第三

引自《任政治委员在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引自《任政治委员在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次“左”倾路线而犯了严重错误，而把夏曦的错误和所谓“北方落后论”，“罗明路线”相提并论，因此，在这次会议中，有些批评不够中肯。任弼时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我们与夏曦同志的斗争方法也有错误。”

丁家溶会议精神，最后落实到了清除夏曦的错误在红二军团造成的严重恶果、加强红二军团的建设上面。任弼时在会议总结报告中指出，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红二军团的成绩主要有：

（一）党的基础初步地建立，党的生活开始走向健全化的道路。去年十一月以前，党团员只有二百一十三名，现在除十一、十七两团外，有党员七百零三名，团员四百一十三名，三个月中党团员增加了四倍。现在各个伙食单位都有了党的支部组织。

（二）开始恢复系统的政治工作。在二、六军团会合时，二军团各师团无政治机关，连队中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建立起来，现在已系统地建立起来了，虽然还不完备。其他如司令部、供给部、卫生部等，也在开始建立系统的工作。

（三）指战员的积极性正在发扬，肃反扩大化造成的恐怖现象逐渐消失，战斗员的胜利信心大大地提高了，所以取得了龙家寨。大庸、浯溪河几次战斗的胜利，创造了广大的新苏区。

（四）部队扩大了一倍以上，战斗力增强了。虽然我们还说不上是铁的红军，但是正在向着铁军的道路前进。

接着他说：如果看不到这些成绩，那就是机会主义；然而仅仅讲成绩，而不看到自己的弱点，这对工作转变是无益的。据最近的考查，现在红二军团的部队中还存在着以下严重的弱点：

（一）对于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在部队中还不了解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甚至轻视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以为“政治工作不能打仗”，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形成一种不尊重政治委员制度，反抗政治工作路线的危险倾向。这种错误与过去取消政治机关是有连带关系的。

（二）对新战士的力量估计不足。如某团长说：“新兵带是好带，只是打仗就没有用。”有一排长说：“老战士提走了，要我带新兵我就请假不干。”这与过去不相信群众的错误是有关系的。要晓得这些新战士是贫苦农民出身，他们是具有消灭阶级敌人的决心的，只要我们从积极方面加紧对新战士的军事政治训练，又有老战士作里面的骨干，新战士同样是有战斗力的。

（三）提拔干部中非阶级路线的影响还没有肃清。不按干部的成分和政治觉悟程度与工作能力，只凭自己相信得过，甚至是以地方观念来提拔干部，这是极错误的。同时，还有一种对新干部不信任的倾向，这也是有害的。

（四）不了解我们已经是正规的红军，不是过去的游击队了。我们不但要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意志下行动，而且要在它的战术意志下去进行战斗。我们检查部队中的军事技术工作，则可看到还有许多战士不会打手榴弹，不会刺枪。在慈利，某营担任游击，打了一千四百多排子弹而没有打死几个敌人，这可以看出我们军事技术上的弱点。但在我们提出要努力提高军事技术的时候，有的同志还说什么“我们已经不错了”。狭隘的经验论调

还在那里阻碍我们工作的转变。

（五）在敌人新的大学进攻面前产生了新的动摇。如有个别同志以为：“打朱疤子、周矮子是有把握，但与湖南、湖北的敌人打仗就没有多大把握了。”这种不相信自己力量，缺乏战争胜利信心的状况，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

（六）我们的政治机关最近一个时期是作了一些工作的，但对于展开思想斗争，克服我们部队中的一切错误倾向，是没有能够尽到应有责任的。这是很大的弱点。

关于红二军团当前建设上的紧急任务，任弼时说：

由于我们的胜利，敌人不得不向我们举行新的大学进攻。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这一战线上，我们是处在进攻西方军和四方面军的敌军的侧面和后方，在配合各方的作战当中，红二、六军团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迅速粉碎敌人对我们的大学进攻，争取粉碎五次，围剿，的胜利。

我们二军团当前的建设任务应当是：

（一）以最高强度来提高军事技术。要作到短期内每个战士都很纯熟地使用手榴弹，会刺枪，会射击。班排长还要学会使用机关枪。干部要特别努力学习新的战术。这里必须反对保守主义和狭隘经验论，还要反对政治工作人员不学习军事和军事指挥员不学习政治的错误倾向。

（二）建立巩固的无产阶级骨干和加强党的领导。在扩大红军时要注意多吸收工人、雇农，提拔干部要特别注意工人、雇农，发展党的组织要做到部队中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党团员。要确立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关，加强连队中支部工作的领导，来建立经常的坚强的系统的政治工作。

（三）加紧战士的阶级教育。要保证每个战士具备红军读本中的基本常识，并且了解目前形势和党的主张，坚决为苏维埃事业流血到底。这必须经过党的组织、政治机关、报纸、列宁室等，进行系统的有计划的工作，提高指战员的政治素养。

（四）健全军事行政机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司令部、供给部、卫生部等军事行政机关，必须健全自己的组织，人员不齐的马上调齐，工作应有计划性、系统性。要严格纠正过去供给部工作中的混乱状况，杜绝贪污现象。各部门和机关应提高和发挥其工作能力，使首长不致忙于事务，而专力于部队整个工作的思索与实施。

（五）扩大我们的部队，创造新的师、新的团。要努力在短时间内使部队扩大一倍。同时应加紧干部的培养，加强新战士的教育训练，最大限度地巩固新扩大的力量。

丁家溶会议，在红二军团的历史上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会议，这次会议以后，红二军团有了明确而又具体的建军目标。在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等人的领导下，红二军团逐步地克服了会议指出的弱点，消除了肃反扩大化、简单化所造成的不正常现象，指战员的革命热情得到了发扬，革命斗争的信心大大地提高了。

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给任弼时并转省委的电报指出：“（甲）关于夏曦同志的错误，中央在你们同二军团会合后，曾明确指出，但并未说这种错误已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乙）最近期内夏（曦）同志在实际工作中新犯的错误，应该指出批

评，在领导机关内部开展斗争是应该的。但你们所采取的组织结论，是不恰当的；（丙）反倾向斗争的主要目的，是在教育犯错误的同志及全党同志，而并不是在处罚这一同志。在苏区内经常发生‘左’的极端与惩办主义必须防止，尤其在开始纠正错误的肃反路线之后，只有这样，才能发扬同志们的积极性到最高度；（丁）湘鄂西（应为湘鄂川黔——编者）苏区目前是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环境，领导机关内的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戊）夏曦同志必须继续在领导机关内工作，以同志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说服与纠正他的错误……”。任弼时和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根据中央这个指示和中央书记处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指示的精神，即“绝不抹杀二军团领导在三年来没有得到中央经常指导状况下的艰苦奋斗，保存了红三军的有生力量，并在湘鄂川黔边建立了新的游击根据地及部分苏区”的精神，对夏曦采取了团结教育的方针，继续保留了他的湘鄂川黔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和省委委员的领导职务。一九三五年五月，又任命他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

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旬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末的两个多月中，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和红军的领导者在建设根据地、准备反“围剿”的工作中，由于采取了坚决和敌人作斗争，积极实行土地革命，贯彻执行正确的建军原则和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相结合，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的方针，坚定地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披荆斩棘，英勇奋斗，所以，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事建设、土地革命、战争动员以及纠正夏曦的错误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而使湘鄂川黔苏区的党和红二、六军团得到了生息和发展，积蓄与壮大了革命力量，鼓舞了广大劳动群众的革命热情，不仅为根据地建设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同时，也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第四节 粉碎国民党军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围剿”

战略转移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国民党军对红军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开始了。

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为了确实保障其追击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的侧后安全，阻止红二、六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合，抓住红二、六军团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的弱点，以强大力量在较短时间内将其消灭于湘鄂西部边境地区。

国民党军的“围剿”，在军事上采取了分进合击、严密防堵、攻堵结合的手段。在政治上，一方面对人民群众进行反革命的欺骗宣传；另一方面，收买、接济和利用土匪、地主武装，在红军根据地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在经济上，则实行封锁政策，企图断绝红军与外界的贸易关系，严禁药材、食盐、布匹和粮食等物资输入红军根据地。

湘、鄂国民党军根据他们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三日达成的作战协定，将进攻部队编组成六个纵队：陈耀汉纵队（第五十八师、暂编第四旅）由新安、石门向桑植进攻；郭汝栋纵队（第二十六师、独立第三十四旅）由慈利沿澧水北岸向大庸进攻；李觉纵队（第十九师和四个保安团）由龙潭河沿澧水南岸向大庸进攻。这三个纵队是主要进攻部队。南面的陶广纵队（第十六师、第六十二师、新编第三十四师），以第六十二师主力经过军大坪、四都

坪进攻大庸；第十六师的三个团和新编第三十四师一部进攻永顺。徐源泉纵队（第四十八师、新编第三旅）和张振汉纵队（第四十一师、独立第三十八旅）由来凤、龙山地区向塔卧推进。国民党军合击的第一步目标是大庸。他们打算首先把主力迅速推进到江垭、溪口、断架山、四都坪、大坝、茨岩塘这个环形线上，建立堡垒，完成封锁线，然后逐步压缩包围，寻求红军主力作战。在防堵方面：湘军以陶广纵队的一部及几个保安团把守沅江沿岸及沅陵，防红军南下湘中；鄂军以第三十四师分布在渔洋关、五里坪、鹤峰、太平镇之线，封锁通向长江的各主要道路；在西南，将李云杰、李温璠两个纵队和第九十二师、新编第八师共六个师兵力放在铜仁、秀山、酉阳地区和乌江沿岸，防堵红二、六军团向西与中央红军会合。国民党军用来直接进攻和封锁红二、六军团的兵力，共有正规军十一个师又四个旅，约十一万人。此外，还有一个保安旅又四个保安团和每个纵队配有的两队作战飞机。

此时，红二军团已发展到六个团约六千五百人，红六军团已发展到五个团约有五千二百人，两个军团共约一万一千七百人。此外，新组织的地方武装有三千余人，军区机关、学校、医院和兵工厂共约一千一百五十人。

双方主力部队的兵力相比，国民党军占有十倍的优势，且地主武装和土匪很多。而根据地各项建设工作刚刚展开，基础尚不巩固。所以，整个形势是很严重的。但也存在一些有利于红军而不利于国民党军的条件。在国民党军方面，他们内部有矛盾，指挥不统一，何键蓄意消灭陈渠珍的势力，兼并湘西。而陈渠珍则极力拥兵自保，害怕自身再受损失，对与红军作战态度消极。何键和徐源泉之间，也是勾心斗角，各图保全私人势力，争向蒋介石要求“主剿”红二、六军团的职权，并争夺对郭汝栋第二十六师和罗启疆独立三十四旅的指挥权。国民党军这种明争暗斗，势必影响他们的统一指挥和作战计划的实施，造成许多可为红军利用的间隙和机会。此外，湖南国民党军，大部分经过追击中央红军的长途行军作战，士气低落；湖北国民党军不善于山地作战，客观环境也给他们带来很大困难。在红军方面，中央红军在贵州和四川广大地区积极活动，吸引了蒋介石的主要兵力。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国民党军不可能把新的部队增调到“围剿”红二、六军团这方面来。红二、六军团本身比会师时有了很大发展，兵员增加了，装备也有所改善，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大大加强，两军团之间和部队中官兵之间的团结更加牢固，斗志也很旺盛。此外，从领导方面看，两军团已建立了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核心的领导，指挥更统一了，行动也更一致了。这都是红军能够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

红二、六军团回到大庸后，曾专门讨论了反“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贺龙认为：主力“伸出去打比在里头打好”，可以先到“张家湾、丫子口、黄石。能打就打，不能打，过石门、澧水也可以。我们像一只拳头伸出去，可以威胁常德、桃源，他们的部队一定要往回调。我们在这期间，打上一两个好仗，就可以粉碎敌人‘围剿’。”然而，贺龙“伸出去”的主张没有得到通过，最后仍决定在根据地里头打，并制定了反“围剿”的具体方针：

“第一，利用广阔游击区域，最大限度地集结主力，依据决战防御战略战术原则，抓住敌人的弱点，在敌分进移动当中，选择有利时机，进行坚决的突击，以达到各个击破，

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有生力量，破坏其合击计划，一直到完全冲破敌人的‘围剿’。

第二，以主力部队之一小部配合新创立的地方部队（独立团营、游击队），肃清新区内部的一切地主武装，掩护地方党及政府深入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分配土地，并在敌人翼侧活动，迷惑敌人，分散敌人，以配合主力进行决战。

第三，争取在胜利中来保卫新区的巩固发展，但不是去死守一个城市或地区而限制主力行动，消耗自己有生力量。

在不利条件下，采取主动的退却，避免战斗，移动主力寻找新的机动。

这一策略方针的目的是在于钳制和吸引住周围大量敌人，使其不能抽调去进攻正在艰苦奋斗中的（向）四川转移的中央野战军，同时依靠中央野战军和四方面军胜利的配合，以及白区群众斗争的配合，争取在有利的革命形势发展的基础上，来击破敌人对我们的‘围剿’”。

根据这个方针，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致电朱德，报告了战役部署并请示了可能转移的地区。主要内容是：“我们认为要在击溃敌两路和消灭敌主力六团至八团有生力量条件下，才能击破敌人现有力量之围困。利用现在广阔新区寻求在运动中突击封锁，应首先侧击由沅陵前进之湘敌主力陶（广）、章（亮基）部队，求得迅速转移地区，各个击破敌人之目的。现集中二、六军团主力于大（庸）、永（顺）之间待机。以五二团位置溪口向慈利游击，钳制李部，以四九团在龙（山）、永（顺）、保（靖）地区钳制陈渠珍及龙山之敌，以十六团一营位置桑植”。“我们若能在永（顺）、大（庸）、沅（陵）地区迅速顺利地击灭敌人陶（广）、章（亮基）部队，则转移地区，争取侧击西进（之）敌是最有利的局势。否则，大（庸）、桑（植）、永（顺）城市均有被敌占领可能，我主力将被迫转移至永（顺）、桑（植）、龙（山）较小地区进行战斗。二、六军团后方广大地域以龙（山）、来（凤）、酉（阳）、秀（山）为适当。但敌追剿第一路李、王两师将进驻于酉、秀封锁线，为割裂二、六军团与野战军联络，将来封锁线有延伸至彭水或龙、来之可能。其次是龙（山）、来（凤）、恩（施）、宣（恩）地区，唯靠近长江。究在何地区为适宜，请决定电示”。

这时，中共中央已在贵州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央委员会，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和军委在得知湘鄂敌人的联合作战计划后，于二月十一日致电红二、六军团，作了非常重要的指示：

“（甲）关于目前湘鄂的敌人向你们进行的‘围剿’，是用了何键的全部兵力及徐源泉、郭汝栋等部。情形是很严重的。但在你们正确与灵活的领导下，是能够打破的。目前，南京政府的统治正进一步崩溃，全国革命斗争是增长不是低落。一些苏区及红军虽然遭到暂时的部分的损失，但主力红军存在，游击战争是发展着，四方面军正在向川敌进攻，我野战军正在云贵川广大地区活动与你们相呼应。新的胜利正摆在你们与全国红军面前。

“（乙）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

引自 1935 年 9 月 29 日《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报告纲要——任弼时政委在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引自 1935 年 1 月 11 日《二、六军团关于反对敌人“围剿”的作战部署向朱德同志的请示电报》。

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要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

“（丙）当目前敌人尚未急进时，你们可以向陈渠珍进攻，但须集结五至六个团行动，对陈部作战亦不可轻敌。

“（丁）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带。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

“（戊）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夏、肖、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问题及红军行动方针。”

上述指示，从根本上改变了“左”倾的战略战术原则，不仅明确提出了红二、六军团反对敌人“围剿”的基本原则，并且给予了红二、六军团在执行这一原则时，可以按照实际情况灵活处置的主动权。同时，还正式确定了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军事上统一的集体领导机构。

二月初到三月中旬，国民党军队按照筑堡推进的政策行动，非常谨慎、缓慢。二月八日，东面郭汝栋纵队的一个旅进到慈利之溪口东南地区，对大庸造成威胁；南面陶广纵队在军大坪、王村地区原地未动。因此，红军临时改变原来的部署，将集结在永顺、大庸和四都坪之间的主力调到东面，在溪口方向迎击郭汝栋纵队。溪口战斗是反“围剿”的第一次重要战斗，对粉碎敌人“围剿”有重要意义。但这次战斗因为部队仍然存在消极防御的思想，发现敌人就匆忙正面迎堵，战斗准备不够充分，部队组织不够严密，执行扼阻任务的部队未能按照预定时间占领有利地形，担任突击任务的部队兵力也不够集中，结果战斗没有打好，第十八团政治委员熊仲卿牺牲。此后，红二、六军团即返回大庸、永顺之间准备打击陶广纵队。但这时陶广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削弱、排挤陈渠珍势力方面，并未向红军发动攻势。而红二、六军团却一直盯住这股敌人，以四个团兵力在军大坪以北地区与陶广纵队第六十二师对峙，进行持久防御。直到三月十三日，陶广纵队第十六师一部和两个保安团由王村渡白河（酉水）北犯时，这四个团才转到西南方向与北犯之敌作战。十四日，红军首先在高梁坪击溃两个保安团，接着又给赶来增援的湘军第十六师两个团以重创，歼灭其中一部。这次战斗，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因敌人主力尚未深入即从正面迎击，同样没有达到歼灭敌人之目的。这时，从正面进攻的郭汝栋纵队和李觉纵队，趁红二、六军团主力远为王村附近的机会，向大庸县城急进。红军为迟滞郭汝栋纵队的行动，派红四师十一团和大庸独立团与该敌保持接触，予以阻扰，后于大庸附近之子午台战斗后，放弃了大庸城。这次战斗中，郭汝栋纵队的一个排哗变，向红军投降。红军放弃大庸后，李觉纵队五个团继续西犯，企图与军大坪、王村北犯的陶广纵队夹击红军于石堤溪地区，然后再会同陈渠珍新编第三十四师进攻永顺。郭汝栋纵队也从大庸西进，企图从温塘和仙街铺渡过澄水，进袭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所在地——塔卧。此时由三官市向西进犯的陈耀汉纵队，正兵分两路，迅速向桑植推进。新由湖北襄阳调到来凤、龙山地区的张振汉纵队，已进到了茨岩塘、准备向龙家寨、塔卧前进。国民党军的战役企图是，首先将红军压缩到永顺、桑植和龙山之间的狭小地区，然后集中主力决战。

后坪战斗

高粱坪战斗后红二、六军团主力即转移到大庸与永顺之间的龙爪关、石堤溪地区进行休整，补充兵员，准备再战。这时，中革军委湘鄂川黔边分会鉴于四面的敌人正在逐渐逼近，红军在内线活动的范围日益缩小，决定组织一个战役，扭转这种不利的趋势。“战役计划是，集中主力八个团，首先在后坪（大庸城西约二十里）地域，在运动中击灭李敌。估计李敌覆灭后，陶、章不敢急进，（我军再）以一部扼澧水以阻郭敌，主力隐蔽转移于桑植。击灭陈（耀汉第五十八师）、张（连三暂四旅）部队，进击和逼退郭敌，然后转移石堤溪、永顺之线，迎击陶（广）、陈（渠珍）两敌，这样各个击破敌人，粉碎‘围剿’。整个战役计划中，以击灭李敌为重要关键”。

后坪附近的鸡公垭在澧水渡口西岸，是大庸县城通往石堤溪、永顺县城的咽喉要道。三月二十日，红二、六军团以一个团扼守后坪东面的鸡公垭高地，主力隐蔽在附近地区，计划抓住李觉纵队主力渡过澧水立足未稳的时机，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将其歼灭于鸡公垭与澧水之间的河谷里。这天午后下雨，李觉纵队进到澧水东岸就停止了。当时分析敌人可能发觉了红军的企图，同时，也考虑到部队要休息，就把主力撤至阵地后面约十五里之龙爪关一带的村庄，只留第五十三团在后坪担任警戒。

二十一日拂晓，李觉纵队先头部队两个团渡过澧水，并于七时左右占领了鸡公垭高地，加紧构筑工事，准备进行防守。红军第五十三团一面向上级报告，一面向敌人发起攻击，很快攻占了垭口南面的山头，但在继续向垭口以北主要山头发展时，部队受阻。

这时奉命赶到崇山山麓团子园、娘娘坪地区的红军主力，立即以第十七师五十一团沿山脊向垭口北面的敌人进攻，但在攻下一个山头以后，也被敌人的猛烈火力所压制。接着，第四师（欠第十一团）通过第五十一团的战斗队形继续进攻，在攻下第二个山头向主峰发展时，又被敌人新投入的一个旅所阻。此时，红军调整部署，一方面以第六师（欠第十七团两个营）接替第四师，继续突击主峰上的敌人阵地；另一方面，以第五十一团和第十二团一部沿崇山山脚向大庸所之敌渡河点实行迂回。迂回部队发展顺利，很快就攻占了大庸所，消灭了一部分敌人，并破坏了澧水上的浮桥。红军正面进攻部队虽然打得十分英勇顽强，也取得了很大胜利，但因在山脊上展不开兵力并受到主峰东面敌人火力的猛烈侧击，一直战斗到黄昏也未能攻占主峰。而此时郭汝栋纵队的第一五三团却增援到了澧水东岸，李觉纵队的预备队第一九团也从龙盘岗徒涉澄水，向红军翼侧运动。红军见情况不利，即于黄昏后撤出了战斗。这次战斗，仅毙伤敌约五百人，而红军却伤亡了七百余人，特别是干部损失很大，红六军团宣传部副部长刘光明、第五十三团政治委员刘志高和第五十团政治委员周志斌英勇牺牲。

这次战斗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一、“对敌估计上的错误，认为敌已经发觉了我主力，因此影响到我们的决心，没有将主力位置于后坪，而向后撤退十余里”。二、“部队中游击主义的传统”¹的

引自 1935 年 9 月 29 日《冲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报告纲要——任弼时政委在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影响，第五十三团没有按时占领鸡公垭。三、领导思想上害怕敌人继续深入，急于求战，在敌人已经占据了有利的阵地时，没有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迅速改变自己的作战计划，却不顾红军火力弱和地形不利等条件，强攻硬拚。

后坪战斗后，陈耀汉纵队乘虚进占桑植城，并以一个旅前出到桑植西北的陈天河。郭汝栋纵队经温塘渡澧水进占了罗塔坪。李觉纵队及陶广纵队的主力进至石堤溪，一部转到永顺城。陶广纵队之另一师推进至农车、洗车。张振汉纵队进占茨岩塘，向红军医院、学校、兵工厂、被服厂所在地龙家寨逼近。国民党军五个纵队合拢上来，各路离苏区中心塔卧、龙家寨仅五十里至一百二十里的路程。这时，地主武装和土匪活动更加猖獗，苏区地方工作受到很大摧残，力量较弱的地方武装也有些损失，红军主力部队在溪口、高梁坪和后坪的连续战斗中，也伤亡较大。当时两个军团只有约九千余人，处境比较困难。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和军委分会认为：“在塔卧、龙家寨狭小地区内同强大敌人决战是于我们不利的”¹，遂决定：

“第一，暂时放弃塔卧、龙家寨基本地区。

“第二，集中全部主力，以地方武装之大部编入主力，充实和增强主力的战斗力量。

“第三，击破敌人封锁线，从敌人之侧翼后方坚决突击敌人，来击破敌之包围封锁与合击计划，以开展新的胜利的局面。”²

三月二十二日，任弼时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报告请示：“根据目前情况，我们决心争取这一地区的巩固，以与西方军配合。正集中全力在保持有生力量条件下，首先求得侧击郭敌。必须取得两次伟大胜利，方能保持新区的巩固发展；否则，二、六军团将被迫退出新的地区。目前我们与西方军活动是呼吸相关的，西方军放弃桐梓、遵义，是否将转移于贵阳以西地带？万一二、六军团被迫转移，就目前情况只有渡长江到（南）漳、兴（山）、远（安）边为便利。因为乌江、西水、沅江均无渡过条件，（恩）施、鹤（峰）逼近鄂敌主力，不能立足。这种预定的方向，是否适宜？对此动作，请给予指示。”

四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指示：“目前你们那里胜利的可能还是存在的，仍应尽力在原地区争取胜利。至于现在提出以后可能转移地区的前途问题，我们认为是适当的。如果渡江对于你们不成一个困难问题时，我们同意你们渡江的意图；但这只是你们认为在原有地区不利于作战，且红军主力非转移地区不足以保持有生力量时，才可实行。”³

省委和中革军委分会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实际情况，决定迅速转移到外线作战，并立即加紧了战略转移的准备：将地方武装编入两军团，以扩充红军的主力；红军学校的干部回部队加强对部队的领导，地方政府干部集中随部队行动；兵工厂的设备立即疏散隐藏；医院里的伤员，团以上干部带走，营以下的分散隐蔽在民间。四月十二日，省委和红二、六军团退出塔卧、龙家寨中心区域，开始战略转移。

¹ 引自 1935 年 9 月 29 日《冲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报告纲要——任弼时政委在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² 引自 1935 年 3 月 22 日《二、六军团向中革军委报告敌军情况及我军部署》。

传达、运用遵义会议精神战略反攻

撤离塔卧、龙家寨之前，红二、六军团曾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的摘要。中革军委分会当即在塔卧附近的三家田村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由肖克传达了决议的精神。决议中关于转移行动问题的原则，对红二、六军团的行动起到了及时的指导作用。决议指出：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必须是“坚决的战斗的”，而不是“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要把战略方针“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准备于必要与有利时机争取真正反攻的胜利”，“对不必要的与敌人无隙可乘的战斗，则是应该避免的，而对于必要的与敌人有隙可乘的战斗，则是不应该避免的”，不应该错误认为“一定要达到了指定的地区，放下行李，然后才能反攻消灭敌人”，而应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行动与方针”。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都经历过严峻的突围和战略转移行动，所以，对于遵义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总结出来的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规律，感到非常正确和亲切，决心坚决地、自觉地用它来指导这次战略转移行动。

陈家河——桃子溪战役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二日，红军离开塔卧，拟经万民岗、陈家河、仓官峪，从香溪（秭归东南）北渡长江，到湖北西部的南漳、兴山和远安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鄂军纵队司令兼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急令其第一七二旅由桑植出发，沿澧水西进，并限于十二日进抵两河口、陈家河地区；第一七四旅开往陈家河转向万民岗地区；陈耀汉则亲率师直属队到周家峪，居中策应，企图与西面的张振汉纵队打通联系，截击向北机动的红军。十二日下午，红二、六军团先头部队第四师第十团与陈家河之敌接触，消灭了敌军一个警戒分队，俘敌数名，并迅速抢占了蒋家垭北侧的田家坡高地。

陈家河是个小盆地中的小集镇，位于桑植县城西六十里，在澧水东岸，周围高山环绕，有小径通往仓官峪，是红军向北转移的必经之路。红二、六军团从俘虏口中了解到敌人的具体部署。得知敌只有一旅，刚到不久，工事还没有完全做好，并且分散配置在陈家河、铜关槽、庙凸、张家湾和澧水南岸的蔡家坪等高地。第五十八师的其他部队还远在桑植。桑植到陈家河之间只有一条悬绕山腰、下临深谷的乱石小径，敌人增援和撤退都很困难。陈家河这个旅突出孤立，而且战斗部署分散。同时，由于他们以往多在北方平原地区活动，也不善于在山岳地区作战。而红军方面十一个团都集中在一起，力量大大超过敌人，并且控制了田家坡高地，利于展开兵力和火力；特别是广大指战员有打一个大胜仗，争取反攻胜利，以保卫艰苦缔造的革命根据地的强烈愿望，斗志非常高涨。因此，军委分会主席贺龙抓住这个有利战机，明确提出：“我们要走，也要打这一仗再走。”

十三日凌晨，红二、六军团在田家坡及其西北地区展开，准备攻击陈家河西面的庙凸和陈家湾山上的敌人，使敌陈家河、铜关槽大山上的主要阵地暴露出来，然后再各个歼灭铜关槽和蔡家坪、澧水两岸的敌人。十三日八时，正当红军准备发起攻击的时候，部署在庙凸山上的国民党军约一个营，沿着

山脊向红军第五十一团阵地发起了进攻，企图先声夺人，破坏红军的部署。红军立即抓住这个有利的机会，将攻击的敌人放到了手榴弹有效杀伤距离内，突然开火发起冲击，趁敌混乱和回窜之机，一鼓作气攻占了庙凸、张家湾和吴家湾三个山头。从这些阵地向陈家河逃窜的敌人，也被红军从两翼伸出的部队全部消灭在山下的河谷里。战斗中，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在率部冲锋时负伤。

与此同时，红二军团主力徒涉澧水，向蔡家坪和玛瑙台的敌人进攻。红六军团主力和红四师一部向铜关槽敌人主要阵地突击，第五十一团预备队第三营则沿大路直插陈家河，捣毁了敌第一七二旅旅部，破坏了敌人的指挥，割裂了澧水两岸敌人的联系，并在澧水河边击毙了敌旅长李延龄。战斗到下午二时，全部消灭了澧水南岸蔡家坪和玛瑙台的敌人。扼守铜关槽大山的国民党军四百余人，利用山势高峻、地形复杂的有利条件顽强抵抗，战斗非常激烈，红军一直奋战到黄昏，才完全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一七二旅。

在陈家河战斗刚刚打响的时候，陈耀汉即亲自率领第五十八师直属部队及第一七四旅（欠三四八团）由桑植增援陈家河。当进到两河口时发现第一七二旅已被歼灭，迅即掉头南逃，企图向塔卧的郭汝栋纵队靠拢。十五日下午四时，肖克率领红六军团行进至离桃子溪还有十里路时，发现河里水浑，判定一定有部队通过，于是令部队加速向桃子溪前进。路上听老乡讲，桃子溪刚才到了国民党军队，后面还在继续来。肖克立即决定投入战斗。红六军团在离桃子溪八里的叉路上把三个团展开，第四师十团也全部投入了战斗，把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敌人慌忙撤退，红军继续攻击，战斗到晚上八、九点钟胜利结束，陈耀汉的师部、一个旅（欠三四八团）和山炮营全部被消灭。红二、六军团以前没有缴获过山炮，这次一下缴获了两门（其中一门，现在军事博物馆展览），大家非常高兴。

至此，国民党军第五十八师除三四八团得以幸免外，其余全部被歼。红军乘胜收复了桑植县城和永顺、大庸县的部分地区。敌各路“围剿”军见第五十八师覆灭，纷纷后退和收缩。张振汉纵队由茨岩塘逃回龙山，再往来凤；暂四旅向郭汝栋纵队靠拢，集中固守塔卧；湘军主力则分别集中于大庸、永顺、王村和沅陵等地。敌人开始由进攻转入防御，由主动转入被动。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决定在原地区坚持斗争，发展已经胜利开始了的反攻行动。这时，红二、六军团在战略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陈家河——桃子溪战役的胜利，是在遵义会议所确定的军事思想指导下所取得的。这次胜利证明了中革军委二月十一日和四月五日的指示是英明的、正确的。这次胜利与反“围剿”第一阶段的情形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在反“围剿”第一阶段，红二、六军团为什么未能在东南方向上击破敌人的进攻？任弼时在总结反“围剿”的经验和教训时指出：

“第一，我们在这一时期当中，虽然一般是依据中央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新的作战方针，但是对转移到敌人翼侧后方隐蔽集结，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发生过失和弱点，使我们在决战中取得胜利的指示，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因此，在大庸、溪口未失去以前一个时期内，我们集结在大庸附近等待敌人前进，从正面远出迎击，而没有坚决采取转移到敌人之翼侧后方迷惑敌人，使敌人发生过失和弱点（当时情况可伸出到以黄石为中心的的地区活动），寻求打击消灭敌人的机动，而这是我们当时能够阻止

敌人前进，破坏敌人分进计划，一直到在东南战线上击破敌人进攻的最适宜的策略。

“第二，后坪战斗是改变当时敌我阵势的关键一仗。当时大庸失去后，李纵队向后坪、石堤溪推进，陈纵队、郭纵队、陶纵队有同时分向桑植、温塘及永顺配合推进之形势。我们如能击灭李纵队，可逼使郭纵队固守大庸，停止陈纵队及陶纵队之急进，再转移我主力于桑植地区，迎击陈纵队或陶纵队，仍然可乘胜击破东南面敌之进攻，因为当时在兵力、地形、天候上，我们处于优势地位，有大部分以至全部消灭李敌的可能。但因对敌估计上的错误，认为敌已发觉了我主力，因此影响到我们的决心，没有将主力位置于后坪而向后撤退十余里。还有部队中游击主义的影响，未按时移动部队占领阵地，致使我们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敌人乃得以继续进占桑植、永顺，逼进塔卧、龙家寨基本苏区。

“第三，地方部队（独立团、营，游击队，赤少队等）未能完成消灭新区内之地主武装及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的任务，并且受了部分损失，而日形减弱。这就使一部分担任守卫地方和钳制敌人任务的主力不能完全使用到前方，而地主武装反日形猖獗，破坏交通联络，摧毁一部分地方党和政府的组织与工作，使我们动员的范围日益缩小。地方上参加战争的群众动员不能适应前线上的要求，主力部队在连续战斗中不能及时得到人员的补充。地方武装不能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来有力配合主力行动的弱点，直到现在仍然是存在着的。”

红二、六军团在被迫放弃塔卧后，为什么能够很快就取得陈家河——桃子溪战斗胜利呢？肖克指出：“这次战斗能取得胜利，是敢于丢掉包袱，转到敌人侧翼，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就打好了”。“这次战斗的经验：抓住了运动中的分散的敌人；敌人没有同我们作战的经验；敌人有些轻视我们，认为我们退出塔卧是失败了，所以放大胆猛追。敌人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敌人主动向我进攻，两个团相距五、六里，不好配合。我们抓住有利机会，打运动战”。红二、六军团认真地总结了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从而更好地领会了遵义会议精神，从陈家河——桃子溪战役起，转变了单纯防御的战略思想，形成了新的作战方针。

四月下旬，军委分会“利用掌握战争主动权的优势地位，采取了坚决反攻敌人的策略方针。在这一方针下，决定以主力远出（到）东面敌人的侧后方——伸出到江垭、慈利之线，调动敌人离开基本苏区，并求得在敌人远距离运动

中，抓住敌人之过失，给以新的胜利的打击”。计划在红军到津、澧地区后，主力即隐蔽集结于石门南乡，寻机消灭沿澧水回援的湘军，同时，在澧水以北广大地区积极发动群众、筹粮、扩大红军，开辟东部新区。

四月底，红军主力进占江垭，伸出到慈利城北，造成夺取慈利、石门，进攻津市、澧县，以及北渡长江的态势，使东南方面的湘鄂军队后方交通完

引自 1935 年 9 月 29 日《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报告纲要——任弼时政委在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引自《肖克同志关于湘鄂川黔及长征中几次战斗经过谈话记录》。

引自 1935 年 9 月 29 日《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报告纲要——任弼时政委在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全处在红军的威胁之下。

湘军害怕红军东取津市、澧州，切断它的后方补给通道，主力被置于无用武之地；鄂军则害怕红军乘虚渡江进入湖北腹地，损害其自身利益。因此，湘鄂敌军都力图自保，各行其事。湘军第十九师及第十六师慌忙向慈利、潭口地区撤退，以防止红军东取津、澧和南攻常、桃。湖北军阀徐源泉则命令张振汉纵队和第四十八师于五月初退守长阳、渔洋关、五峰、鹤峰之线，防堵红军北渡长江。在塔卧地区的郭汝栋纵队，见湘鄂军队纷纷退守，也不敢停留，连忙跟在湘军后面向东撤退。这时在红军根据地内，只有湘军第六十二师和新三十四师各一部，以及新由西阳调来的第十五师一个旅和一些地方保安团队。

关于红二、六军团进一步行动问题，军委分会认为，当面的敌第十六师和第十九师部队集中，行动谨慎，不易下手。同时，考虑到继续东出，易被敌人切断归路和丢掉桑植，于是五月上旬就返回了永顺、桑植、龙山地区，计划寻机消灭根据地内部的敌人，并力争将敌第十六师和第十九师再次向西调动，在石堤溪、大庸之间于运动中消灭。

随着红军主力西返，刚走不远的鄂军返回了原来的阵地，郭汝栋纵队也放慢了东退的速度，敌第十九师和第十六师回到大庸后就停止不动了，所以，红军原定在石堤溪、大庸之间打击敌人的计划没有实现，袭击塔卧也没有得手，只在永顺、塔卧之间的茶陵坡歼灭了湘军第六十二师解运粮食弹药的一个营。显然，如果红二、六军团东出更远些，到达津市、澧州地区，或晚一些西返，湘、鄂军队就有可能后撤得远些，郭汝栋纵队也将退出苏区。

军委分会鉴于红军主力西返未能造成有利于全局发展的形势，对主要作战方向做了重新考虑。原来为了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红二、六军团自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进入湘西后，一直是遵循着对湖南敌人采取攻势，对湖北敌人采取守势的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红军曾经取得了许多胜利。而现在，中央红军已经在五月八日渡过了金沙江，当面之敌湘军比较集中，战斗力较强；鄂军则分散薄弱，战斗力较差，陈家河、桃子溪战役证明比较好打；同时，湘、鄂军队在态势上也为红军分割，指挥不够统一，有可为红军利用的矛盾。因此，军委分会决定改变主要作战方向，实行对湖北敌军采取攻势，对湖南敌军采取守势的方针。五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主力进逼龙山、来凤，以诱使鄂军第四十一师出战。然而，湖北军队自从第五十八师被红军歼灭后，就将其主力分别缩守在施南、宣恩、黔江、咸丰几个城市和来凤、李家河地区，加强堡垒工事，极少主动出击，不利于红军集中作战，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灵活地采用了外线作战的手段，诱使敌人离开堡垒，与之进行运动战。

忠堡战斗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夜，红军突然以一部分兵力在鄂军战役纵深内包围了宣恩县城，强攻可以俯瞰全城的南山铜鼓堡，同时另以一部兵力切断了宣恩、恩施间的大道，佯攻城北的重要外围据点椒园，消灭守军一个营，主力则隐蔽集结在城南二十里处，准备打击可能由来凤、李家河地区前来增援的敌军。

驻守宣恩城的敌军，只有第四十八师的一个团和一个保安团。徐源泉在

恩施得知红军攻占铜鼓堡以后，害怕宣恩失守，恩施难保，长江交通遭受威胁，急忙命令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带领李家河、来凤地区的守军主力驰援宣恩。六月十二日，即围城第三大，张振汉以第四十八师的一四四旅（三个团）、保安第五团和新三旅的一个团为右支队，由李家河经冉大河、三叶台西进；以第四十一师的一二三旅为中间支队，由李家河经关口、老叉口、韭菜园西进；以第四十一师直属队和第一二一旅为左支队，由来凤经甘家沟、三堡岭西进，向忠堡方向行动。张振汉非常谨慎，他认为红军主力远在宣恩附近，距忠堡百里以上，而他的部队到忠堡只有四五十里，红军即使和他们同时行动，也要到黄昏才能赶到忠堡附近。为防止红军袭击，他命令其三个支队，必须在下午四时前赶到忠堡集中，并在黄昏前做好工事，完成防御准备，六月十三日一起北进。同时，为了预防万一，他又命令他的部队，如果在途中和红军遭遇，即就地停止前进，由行军队形变成战斗队形，面向北方组成三道阵地的纵深防御。他的司令部之所以跟随左支队前进，目的就是为防备这一着的。

然而，张振汉没有料到，红军在他们出发的前夜，就查明了张振汉给徐源泉的报告，知道了这个增援计划。贺龙、任弼时根据敌情和道路距离，立即决定留下一个团继续积极佯攻宣恩城，监视和迷惑敌人，红二、六军团主力在十一日前半夜秘密出动，分两路急驰忠堡。为争取适时赶到忠堡以东截击敌人，红二军团参谋长李达在行军途中分别给各师下达了任务。命令先头红四师，务必及时赶到韭菜园西面，截击敌人右支队。该师经过一百三十里的急行军，于十一日下午三时赶到了忠堡东北黄牛棚附近。这时，张振汉的右支队主力已经进入忠堡。中间支队已进到韭菜园西侧，左支队先头部队也通过老鸦关，距离忠堡都只有几里路。红四师为了不让敌人完全进入忠堡或靠拢起来，主动向敌行军纵队发起攻击，消灭敌右支队后卫一部，并且在忠堡东面四里的构皮岭击溃了敌左支队的先头部队，将其大部压迫在构皮岭的山凹里。接着，即以一部分兵力占领了忠堡与构皮岭之间的高升塘的有利阵地，抓紧构筑工事，阻止忠堡敌人回援。接着，红军第六师很快赶了上来，迅速从第四师左翼投入战斗，向构皮岭之敌人侧后迂回，攻占了老鸦关东侧的高地，切断了敌左、中两支队的联系及左支队向来风的退路。

鉴于敌人兵力较强，红军是处在敌人中间分割包围歼敌的复杂情况，贺龙、任弼时决定先集中兵力遏止敌人右、中两支队的增援并完成对敌左支队的包围，然后再相机调集力量歼灭被围的敌人。当天夜里，贺龙一方面命令红四、六两师加强阵地，坚决阻止敌人突围和增援，另一方面调十七师参加战斗。该师五十一团及时占领了忠堡北山，严密监视忠堡敌人的行动并向咸丰方向警戒。第四十九团则在十三日天明时，从忠堡和构皮岭之间向南穿插，攻占了构皮岭南山，并和红四、六两师取得了火力联系，完全包围了构皮岭地区的敌人。

这时，国民党军已经开始了解围行动。忠堡的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向红军第五十五团的阵地攻击，企图攻占忠堡北山，威胁红军第四师的侧背，掩护构皮岭的敌人突围。韭菜园地区的第一二三旅，也向红军第六师老鸦关阵地猛烈攻击，企图恢复与师部的联系。东、西两处国民党军多次攻击都被红军打退，伤亡很大。忠堡的国民党军在几次攻击失利后停了下来。韭菜园地区的第一二三旅，为免遭被歼的厄运，也在天黑前跑回了李家河。至此，红军就基本解除了敌人增援的顾虑，为集中兵力彻底围歼敌第四十一师直属部队

和第一二一旅创造了条件。

十四日晨，红军集中了第十团、十六团、四十九团、五十一团和第十八团一营共四个团又一个营的兵力，在迫击炮和山炮（即四月间陈家河战斗缴获的陈耀汉纵队的山炮）人力支援下，从四面同时向构皮岭的敌人进行向心突击。国民党军由张振汉亲自督战，两千多人密集在一个不大的山凹里，利用巨石、田埂、房屋和工事拚命顽抗，争夺非常激烈。战斗从清晨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才把被围的敌人全部消灭，击毙了敌师参谋长，活捉了敌纵队司令张振汉（张振汉被俘后，表示愿为红军服务，受到了红军的宽待，被任命为红军学校高级班战术教员。长征至延安后，中央送他回了湖南）。

经过两昼夜的奋战，红军共歼灭敌人一个旅、一个师部和一个特务营，并给了其他六个团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次战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在作战指导上，敢于大胆地突入

敌人的战役纵深围城打援，迫使敌人离开堡垒阵地，与红军打运动战。在战术动作上，侦察周密，运动迅速，坚持了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原则；正确地划分了作战阶段，灵活而适时地变换主要作战方向和使用主力。特别是广大红军指战员，疾行一百三十余里，连续艰苦奋战两个昼夜，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这种无比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是取得胜利的最基本的原因。

围困龙山

忠堡战斗后，红二、六军团又开始了龙山围困战。围困龙山的依据是：

“第一，敌人在半个月至二十天内增援部队没有到达的可能（鄂敌在忠堡惨败后，一时不能增援；湘敌因粮食困难，亦不易远道进援）。

“第二，守城部队（一团白军及一个保安团，只一千四五百人）及城内居民共约万人，没有存粮（居民依靠逢场买米），至多只够维持十天到半月的供养。

“第三，守城部队炸弹极少，工事不甚坚固，在地形上我们容易接近城垣地带，可以施行坑道破城。

“第四，龙山城攻下后，来风孤立，可能逼退驻守来凤之敌。我们若能取得龙山、来风（两城只距十五里），在地理及其他条件上最适宜作我们基本根据地地区。”

围城战斗从六月二十二日开始，持续了三十五天。在这期间，省委根据根据地已经向北推移的情况，重新调整了行政区划，将红军所控制的桑植、慈利各一部地区合并，以空壳树为中心成立了慈桑县；在新占领的地区，以茨岩塘为中心成立了龙山县，以沙道沟为中心成立了宣恩县，并在该地区初步发动了群众，吸收了一批新战士，休息整顿了部队。

在作战方面，红军起初曾用坑道作业配合袭城行动，但没有成功，以后即着重进行了打援战斗。七月三日，红六军团在永顺洗车线上之小井击败增援龙山之陶广纵队一部。战斗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李朴阵亡。七月十日，红二军团在来凤、龙山间的象鼻岭击退增援的鄂军独立第三十八旅。七月十五日，红六军团在咸丰、来凤线上的胡家沟，打击了增援龙山的黄新纵队（五个团），红军第十八师参谋长马赤、第十七师四十九团政治委员段培钦阵亡。这三次打援，或阻止了敌人前进，或仅给敌人以杀伤，都没有达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最后对龙山城又进行了一次袭击，也没有成功。故后，任

弼时政委在总结时说：

“经过三十天围困，城内居民饿死的日多，敌守兵已把菜叶、草根食尽。但最后我们未能困开龙山城而撤退，原因和教训是什么？”

“第一，是敌飞机最后能每日供运少数粮食，将毙之敌得以苟延。我们对这一点事前没有能估计到，而对空射击技术又太差，未能阻止敌机降低到三百米以内的投掷粮食的动作。

“第二，我们坑道作业技术太差。我们挖掘的地道已经超过了城角还不知道，被敌人从城内掘毁。

“第三，我们未能及时利用最好时机袭城（有一晚通夜大雨，城墙周围敌之照明灯均熄灭）。最后袭城时，我们动作与技术上差。

“第四，在困城时，对城内守兵及居民的宣传号召，未能达到发动白军士兵及居民暴动哗变的要求。”

贺龙后来指出：“围龙山，主要是想消灭陶广、陈渠珍的。那仗未打好，围城也未围好。……原来围城、打援、休整，后来改为围城、休整、打援，是个被动的，分散了。”

由于几次打援都没有大量歼灭敌人，致使敌来凤守军得到了加强，陶广纵队又集中十个团继续增援龙山。这时夺取龙山、来凤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红军遂于七月二十七日主动撤围。在围困龙山战役中，红军第六师参谋长向国登阵亡。

撤围的第二天，红军连夜南下，打击增援龙山的陶广纵队。次日九时，红十七师和红四、六师在招头寨以北地区与陶广纵队遭遇。激战一天，阻止了敌人的前进，但部队伤亡较大，红十七师师长苏杰、五十团政治委员方振声、五十一团团团长黄林阵亡。

板栗园战斗

在红二、六军团围困龙山时，蒋介石为了加强对红军的“围剿”，决定将从江西调到利川的第八十五师拨归徐源泉指挥，并另从江西湖口调第二十六路军的一个师接替第三十四师的防务，让鄂军集中作战；同时，命令湘、鄂军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红军。这时，徐源泉的兵力虽然得到了加强，但因他的部队屡遭红军打击，已经丧失了进攻的勇气，他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将部队推进到湖北边界，防止红军再入鄂西。因此，他于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先后命令驻太平镇的第三十四师两个团和驻高罗的第四十八师一个旅推进到沙道沟地区，驻小关的第八十五师开到李家河。另外，命令驻高罗的暂四旅以一部兵力占领水田坝，驻来风的第一二三旅占领李家河，以掩护其第八十五、第三十四师和第四十八师的开进。

红二、六军团在徐源泉发出开进命令的当天，就明悉了他调整部署的计划。军委分会在分析了这个计划后，认为：敌第八十五师新到鄂西，对当地各方面的情况都不熟悉。他的运动道路小而崎岖，大部分处于深狭的谷底，两侧则是高山密林，侦察搜索和展开都很困难。同时，他们从纵深向前运动，

引自 1935 年 9 月 29 日《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报告纲要——任弼时政委在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引自 1961 年 6 月 5 日《贺龙元帅谈红二方面军情况记录》。

戒备可能比较疏忽。鄂西其他敌军都分守在几个县城和较大的集镇上，点与点之间空隙很大，这很有利于红军的进出。因此，军委分会决定：集中主力，再一次进入鄂西敌人的战役纵深，利用第八十五师的弱点，以伏击或截击手段将其歼灭于运动之中。

红二、六军团的行动是分两个步骤进行的。第一步是麻痹敌人和破坏敌人整个开进部署。八月二日，鄂军由太平镇、高罗和小关等地开始行动。同一天，红军由龙山之兴隆街突然向北进到沙道沟附近。红军这一行动，造成了徐源泉的错觉。他认为红军企图打击由太平镇和高罗向沙道沟前进的第三十四师或第四十八师的一四二旅，便立即命令这两路部队停止行动，严加戒备。第八十五师认为红军是向北行动，并且沙道沟距离他们的运动道路也较远，所以，仍然按照原计划行动，于当天下午进到了宣恩以南的上洞坪。来凤的第一二三旅也占领了李家河。这样，红军就取得了进入鄂军战役纵深和前出到第八十五师翼侧的有利条件。

第二步是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八月三日晨，第八十五师贸然继续前进。这时，红二、六军团主力突然改变行动方向，从高罗和李家河之间楔入敌人纵深，沿山间捷径向西南疾进。十一时，红二军团赶到了第八十五师必经的板栗园东侧的利夫田谷地。这个谷地处在板栗园与李家河之间，长约十五里，宽不足一里，北侧山上森林茂密，利于隐蔽，南侧山上岩石裸露，陡峭难攀。红军因取得了先机之利，即以红四师和红六师成一个梯队埋伏于谷地北侧之安家坡山上，待机歼敌。

这时，敌第八十五师（欠一个团）刚进到利夫田西北约七八里路的板栗园。由于红军行动迅速，隐蔽良好，该师完全没有觉察到红军的伏兵。他们在板栗园见到赶集的人很多，并接到从李家河返回的侦察分队报告：“李家河街上很安静，李家河的友军住在碉堡里。由板栗园到李家河，沿途有钓鱼的、打柴和种地的老百姓。”敌师长谢彬据此判断：“地方很平静，红军距离尚远，前面又有友军占领坚固阵地掩护，现在第一要着，就是尽快地赶到目的地。”遂继续按第五一 团、特务营、师司令部和第五 五团的行进次序，沿谷地道路向李家河前进。

十二时左右，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完全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红四师首先向敌开火，将敌前卫第五一 团紧紧地压制在谷底，接着发起多路突击，一举将第五一 团的大部歼灭于三灵沟、潭家岩地区。这时，敌第八十五师特务营和第五 五团两个营见状匆忙展开，企图抢占红军伏击阵地西面的莫家坡大山，以稳住阵脚。贺龙当即命令红六师迅速抢占莫家坡制高点，歼灭向上攀登的敌人。红军第六师先敌占领了山头，并沿山脊配置了兵力和火力。当敌人进到距离山顶三四十米处，红军突然开火，猛冲下去，一举将敌人三个营全部消灭。这时，红军后续部队第十七师也赶了上来，从第四师左翼投入了战斗，和红二军团一起攻击退守谷地南山的敌军。战斗到二十三时，红军夺取了巴里核山，歼敌第五 五团一个营，击毙了敌师长谢彬。是役，全歼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师部、两个团和一个特务营，俘虏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九百八十余支，迫击炮六门，弹药六百多箱，银元六万多块。战斗中，红二军团四师十二团参谋长周竟成阵亡。

这个战斗，是一个在敌军战役纵深内以伏击手段速战速决歼灭敌人的范例。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坚决执行了中革军委新的作战方针，掌握敌情准确及时，战场选择比较适当，抓住了敌人的弱点，相对集中了红军的兵力，并且

在作战手段上，机动灵活，声东击西，造成了敌人的错觉。

自五月中旬军委分会决定对湘军取守势，对鄂军取攻势的方针，到板栗园战斗胜利结束，前后仅两个多月，红二、六军团先后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一、第八十五两师的主力，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实践证明，军委分会的决定是很及时、很正确的。

板栗园战斗后，红二、六军团返回了根据地，八月八日，又在芭蕉坨一举击溃了陶广纵队的十个团。

此次，红军连续作战的胜利，不仅使当面的湘、鄂敌军丧失了进攻的信心和勇气，并且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利用湘、鄂军队“围剿”红二、六军团的计划。在第八十五师被歼之后，蒋介石即命令湘、鄂军队转入防御。至此，湘鄂川黔根据地军民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这次“围剿”。

东进津市、澧州、临澧、石门地区

一九三五年八月，在湘、鄂军队全面转入防御的同时，蒋介石用以对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根据地实行新“围剿”的军队陆续向湘西、鄂西地区调集。

红二、六军团虽然取得了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但根据地并没有完全恢复。新创建的根据地和边缘地区，还有许多反动的游杂武装在活动。在龙山、桑植之间新开辟的地区，人口稀少，物产贫乏，群众工作也不够深入。红军在补给上遇到了很大困难，部队急需的粮食、兵员和冬装都无法在现地区得到解决。同时，以现有的地区，对付国民党军更大规模的“围剿”，回旋余地较小。这些情况，迫切要求红军迅速行动，积极地去创造打破敌人新的“围剿”的有利条件。

军委分会在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红二、六军团应该抓住敌人原来的“围剿”已被粉碎，新的“围剿”尚未到来的有利时机，由反攻转入进攻，集中主力到敌人后方去，以发展反“围剿”的胜利，并为反对新的“围剿”创造条件。具体到哪个方向去，早在围困龙山城时省委和军委分会就讨论过，认为：北有长江天堑，鄂军封锁了各条主要通道；南有沉江、澧水，湘军主力集中在那里；西面敌军虽然薄弱，但那里是大山区，人口稀少，贫穷落后，物资缺乏，不利于红军大部队活动；东面敌人远后方虽然有洞庭湖和长江险阻，但那里是湘、鄂军队接合部，石门、津市、澧州地区敌军兵力空虚，而且人口稠密，十分富庶，对红军作战行动、物资补给和扩充兵员都比较有利。据此，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除红十八师留在苏区外，红二、六军团主力立即东出，乘胜向敌人兵力薄弱的津市、澧州地区突击。根据这个决定，领导机关分为前后两摊，前面一摊领导打仗，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负责；后面一摊领导苏区地方工作和军区后方工作，由肖克和省委副书记张子意负责。主要是加强根据地的党、政、军建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区。肖克分管军事并兼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

经过计划、准备，红二、六军团主力在贺、任、关、王率领下，于八月二十日向敌人发起攻击，开始了东出战役行动。从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先后占领了石门、澧州、津市和临澧等城市，消灭了部分国民党守军，控制了津市、澧州广大地区，直接威胁到常德及长江沿岸部分县、市，迫使国民党军把新“围剿”战役展开地域从江垭附近向东收缩了二百余里。

八月底和九月上旬，红二、六军团派出得力的工作团和工作队，分头在到达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反封建斗争，没收和分配土豪劣绅的财产和粮食，积极宣传抗日反蒋的主张，扩大红军和赶制冬装。仅半月时间就扩大新战士三千多名，基本备齐了全军的被服，筹集了一些药品和其他物资，以及十四万多块银元，并在苏区东部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

在这期间，红二军团第四师根据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正向这一地区开进的情况，曾以第十一团防守津市，并掩护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率领的工作团筹粮筹款、扩大红军，师部率第十团和第十二团向湖北省公安县方向发展。当部队进至清水塘时，与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部遭遇，经激烈战斗，打垮了敌军的进攻，遏止了其继续前进的企图，为红二、六军团主力继续在津市、澧州地区开展地方工作争取了时间。这次战斗中，红四师代政治委员廖汉生负伤。

红二、六军团东出津市、澧州，攻击敌人后方，是一次正确的战役行动。这一行动不仅使红二、六军团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得到了很大补充，为反对敌人新的“围剿”取得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争取到了较充裕的准备时间，同时也为苏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和农村各项群众工作，打击根据地内部的反动武装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这期间，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党政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清剿当地土匪取得很大成绩，红军的干部训练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仅经过红军学校第四分校培训的老战士、班长和团以上干部就有八百三十多名。所有这些，都为反对敌人新的“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在石门的磨岗隘，红二、六军团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总结反“围剿”斗争，任弼时代表省委和军委分会作了总结发言。他说：

“我们的胜利：

“第一，我红二、六军团进入湘西北地区，在极短促的时期当中，共经过大小战斗三十次，前后与我们直接作战之敌计有八十六个团。除依城或据点困守之一部，即在沅陵、塔卧、龙山、宣恩共约十个团外，均被我军击败，前后占领过七个县城。

“第二，我军前后共计缴获敌步枪约一万支，生俘敌约八千余人，缴获敌轻重机关枪约一百五十余挺，无线电五部，山炮二门，子弹约一百二十万发，生擒敌纵队司令兼师长一、师参谋长二、团长三、营长及营以下官长二百余，击毙敌师长一、旅长二、团长五、营连排长百余，敌伤亡兵力在一万以上。

“第三，我二、六军团与十倍于我们的强大敌人半年多的艰苦战斗，不但没有被敌人消灭，也没有减少和削弱，而且比以前扩大一倍以上。在这一过程当中，除成立十八师和十一及十七团并且成为有力的战斗部队外，我们还成立了有战斗力的独立团、营和游击队。

“我们胜利的意义：

“第一，由于我们积极的胜利的行动，不独钳制住了敌人六个纵队兵力，使其不能进攻中央野战军，而且继续把进攻或预备进攻中央野战军的一部分敌人吸引了过来，使中央野战军与四方面军胜利地会合，并还有大量的进攻中央野战军、四方面军及进攻中央苏区、湘赣和湘鄂赣苏区的敌人正在被我们调动，或者将要被调动过来。这在配合主力红军与其他苏区上，是尽了我们的力，完成了历史任务的。

“第二，我们从艰苦流血奋斗中保卫了新开辟的苏维埃版图，有些城市与村镇虽然因战略上的关系被放弃，现在还被敌人暂时占领着，但是开辟龙山、桑植这一块新苏区，……仍然是我们胜利进展中的根据地，我们保卫着这一基本新区，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中有其重要历史意义，它使江西、四川两大苏维埃基本区域的联系具备了基础巩固的桥梁。

“第三，我们这种战胜强大敌人的英勇果敢的奋斗精神和取得的成功，再一次在全中国和世界的民众面前表明红军是一种不可摧毁的力量，证明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给了那些对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前途表现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者以迎头的痛击，将要更加推动和兴奋起全国革命斗争的浪潮。

“我们能够获得这样伟大胜利与成功的原因：

“第一，是由于我们红色战斗员、指挥员的英勇果敢、不怕艰苦、坚决奋斗的牺牲精神和我们干部的组织创造才能。我们因为要抓住有利的时机消灭敌人，时常在一天之内行军八十至一百二三十里，来同强大敌人作战。最后一个时期，因为遇到粮食的绝大困难，在作战中每天只能得到一两餐稀饭，个别的部队甚至两天只吃一餐饭，还是不疲倦地同敌人顽强作战。

“第二，是因为有新区和游击区域群众的拥护和热烈的参战。我们在敌人翼侧行动和作战当中，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在龙山、来凤，宣恩和咸丰地区扩大三千新战士，在江垭地区扩大一千余，最近在津市、澧县和石门扩大三千以上。群众还自动帮助我们运送伤员、侦察敌情和带路。

“第三，是由于党省委和军委分会一般的正确估计和依据全国革命形势，来灵活运用中央及军委关于粉碎敌人“围剿”新的战略战术方针，特别是退出塔卧以后。”

第二章 长征

红二、六军团（一九三六年七月以后两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为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三月，即从湖南桑植到贵州盘县，这一阶段是以争取在湘黔滇创建新的根据地、继续坚持和发展江南革命斗争为目的的战略转移；一九三六年三月至同年十月，即从盘县到甘肃的将台堡，这一阶段是奉命渡江，北上抗日，与中央红军会师陕北，为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而斗争。

第一节 转战湘、黔、滇，争取 创建新的根据地

重要的决策

在红一、四方面军已经转移到四川的西北地区之后，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胜利发展就成了长江以南——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最重要的柱石。从地理位置看，由于它处于长江中游，北临武汉，南接长沙，对红一、四方面军的配合作用和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威胁都很大。因此，蒋介石决心在“追剿”中央红军的同时，调集大批军队，组织新的“围剿”，企图打击、消灭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认为前次“围剿”失败，主要原因是只使用了湘、鄂两省的地方军，而且指挥不够统一。因此，这次“围剿”军的组成则以曾和中央红军多次作战的中央军嫡系、半嫡系军队为主。从一九三五年九月初开始，他一方面以原有湘、鄂两省参加“围剿”的兵力，共约八十六个团，巩固和增强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封锁线；另一方面由鄂、赣增调孙连仲纵队三个师及一个独立旅、樊嵩甫纵队四个师，共约四十二个团，到五峰、澧州、石门、慈利之线准备进击。同时，还调汤恩伯纵队两个师（十三个团）到长沙、岳阳防守，调第一二师、第一三师配置在利川、宜昌作预备队。为协调“围剿”的部署，在湖北宜昌设立了行营，由陈诚代蒋介石统一指挥。此外，在经济上则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实行了更加严密的封锁，以造成红二、六军团补给上的更大困难。敌人的计划是：以原来的“围剿”军在以大庸、永顺、龙山、来凤、鹤峰、走马坪为前沿的袋形阵地上筑碉固守，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南、西、北三面实行防堵，限制红军机动；以新调来的孙连仲纵队和樊嵩甫纵队为进攻部队，从津市、澧州及其以北地区由东向西推进。妄图将红二、六军团逐步压缩、聚歼于龙山、永顺和桑植之间。

九月初，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对反“围剿”的作战方针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当时各方面的条件。认为面临的敌情是空前严重的，同时也认为：“日本正在企图（占领）华北，白区反帝斗争高涨，宁粤冲突呈现紧张”；“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会合，并开始突破敌之封锁，进入成都、雅安附近活动”¹；红二、六军团已有很大发展，并积累了粉碎敌人“围剿”的经验，增强了粉碎“围剿”的信心；东征的胜利，开辟了新游击区，筹集了资财，发动了群众，壮大了自己，整训了部队，这都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一致确认，反“围剿”的困难虽然增多了，但在原有苏区还是具备粉碎敌人“围剿”的条件的。当时，拟定的作战方针是：“在一、四方面军东进川陕地区配合下，依据原有苏区及东部游击区，抓住有利时机击破东面急进之敌，破坏其向西逼退我军包围于龙山、桑植、永顺狭小地区之计划，再寻求机动，在运动中击灭其他方向之敌。”²

在国民党军新的大规模“围剿”即将开始的时候，红二、六军团为了争取主动，九月上旬，自动撤离津市、澧州，集结在石门西北的维新、仙阳、大兴、磨岗隘一带，寻机破敌。

但是，国民党军新的“围剿”战略有了很大改变，他们不再是长驱直入，

¹引自任弼时《红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报告大纲》。

急进猛追，而是逐段筑碉，交替前进，采取持久战略和堡垒主义。自红二、六军团撤离津市、澧州地区之后，国民党军一直是日进三五里，边筑堡、边推进，企图逐步紧缩对红二、六军团的包围，最后再寻找有利时机，与其主力决战，以达到彻底消灭之目的。这期间，红二、六军团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曾在苏区东部的白沙渡、分水岭地区寻找战机，但未能如愿。相反，国民党军对红二、六军团的堡垒封锁却越来越紧，红军能够活动的地域在一天天缩小，情势日益危急。而这时，红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通信早在七、八月间即已中断，根本无法取得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处在一个要根据实际情况独立进行决策的紧要关头。就在这个时候，九月二十九日，红二军团电台突然收到中革军委电台的联络信号。当时，任弼时及其他领导人非常高兴也非常警惕，当即用密码致电周恩来：“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来电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第二天，即收到朱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张国焘共同签署之回电，电称：“二十九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弼时同志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委员。一、四方面军六月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

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以后，中央曾对电台的配备进行了调整。原负责中革军委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的电台调整到红军总部，后来被坚持分裂活动的张国焘所把持，因此，中革军委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的电台以及所用密码也被张国焘控制。九月三十日，以朱德、张国焘共同签署的回电虽讲“一、四方面军六月在懋功会合行动”，但实际上，此时张国焘已经指挥红四方面军南下，中共中央已经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当时，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和电台调整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对原中革军委电台实际已为张国焘所控制也一无所知，还以为与中革军委的电信联络已经恢复。

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于十月上旬，对红二、六军团的行动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并致电朱德、张国焘说明：因红一、四方面军未有东出计划和湘鄂川黔苏区东部地形不利，以及其他主观方面的原因，在当前敌情下继续活动在不宽广地区来打破敌人新“围剿”是困难的；建议主力转移到黔东石阡、镇远、黄平地区活动，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和敌人进行运动战，积极创造条件，转入反攻，争取在那里创建新的根据地。十月十五日，朱德、张国焘复电，对红二、六军团的行动指示：“在狭小地区内固守为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可轻于尝试。远征减员必大，可否在敌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堡垒，以进攻路线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之。”接着，十月十九日又指示：“取守势最失策，远征损失大，可否在赤区外围和附近地区诱敌，各个击破之。”此电还说明两电是一些建议，如何行动为宜，由红二、六军团按实际情况决定。

接到朱德、张国焘的上述指示后，红二、六军团于十月十七日和十月二十二日，先后在石门的渡水坪和热水溪召开军委分会会议，进一步对行动方针进行了讨论，但未能作出最后决定。

这时，红二、六军团的行动有三个方案可供选择：一是突围后转移到石、镇、黄地区；二是突围后在现在苏区附近活动；三是继续在现有狭小地区内防守。十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从磨岗隘陆续回到桑植中心地区后，于十一月四日，在桑植县刘家坪召开了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联席会议。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它的最大功绩是，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地决定了战略转移的方针，完成了从战略防御向战略转移的转变。这次会议，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认为：敌人从九月开始组织的第三次“围剿”，规模比前两次更大，兵力由第二次“围剿”的八十多个团增加到了一百三十多个团，并且已经完成了对苏区四周的封锁线；湘鄂川黔根据地虽然经过一年的建设，但地主武装和土匪还没有完全消灭，群众也未得到充分发动，后方还不够巩固；苏区面积不大，且东有洞庭，北有长江，南有沉江、澧水，西面是大山区，不利于大兵团机动；由于经济落后加之国民党军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实行了更为严密的经济封锁，兵员、物资，特别是粮食的补充和供应极为困难；红四方面军已经退到西康和四川边界，红一方面军也已渡江北上，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苏区已陷于比较孤立的地位。会议认为，在上述情况下，继续坚持在根据地内进行反“围剿”斗争，确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而突围之后若不远去，敌人进入根据地，依托现有之碉堡阵地对我军作战，我军虽可能取得一些战术上的胜利，但难以取得战役上的胜利，这样也就不可能创建新的根据地和恢复原来的根据地；若长期没有根据地作依靠，在绝对优势的敌人面前转来转去，势必日益困难，力量被削弱，甚至可能招致最终失败。根据上述分析和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的精神，会议决定，坚决突围远征至湘黔边，争取在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从刘家坪一带出发，向石阡、江口转移

刘家坪会议后，红二、六军团即根据会议决定，部署转移行动。为了加强主力部队，新组建了红五师、红十六师两个师部又五个团：即红五师的十二团（由鄂川边独立团编成）、十五团（由龙桑独立团和龙山独立团合编成），红十六师的四十六团、四十七团（由红十八师的五十二团、五十四团改编）、四十八团（由龙永独立团和永顺独立团合编）。同时，还由机关裁减部分人员补充了主力部队。上述部队均随主力行动。留下红十八师（辖五十三团和新组建的五十二团）在龙山、桑植、永顺地区进行游击战争，负责掩护主力部队的转移行动及地方组织的秘密工作；如斗争条件确实不利或红二、六军团主力继续西进，则可向黔东转移，与主力会合。当时估计，在红军突围后，敌重新部署追堵，我有短时间间隙可利用，决定逐步向湘黔边转移（不直接走到），尽量避免部队减员。拟先进至湘中沅、资两水地区，进行补充、筹款、扩大抗日反蒋宣传，发动群众斗争。当敌尾追部队接近时，争取在广大堡垒稀少地区集中力量击敌于运动中。先打击尾追之蒋系主力樊嵩甫纵队，尽可能避免进入桂粤边境。

根据上述部署，十一月上、中旬，红二、六军团所属部队集中在桑植地区，进行战略转移前的各种准备。首先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到下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说明当前形势，提出以运动战打破敌人“围剿”的战斗任务；并进行革命战争特点的教育，坚定部队的胜利信心和决心，为实施广泛机动作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其次，对部队中的老弱妇女儿童、重伤员、重病员

以及医院、兵工厂等不便于长途行军的人员和单位都作了妥善安置；吸取中央红军及红二、六军团以往长途远征的经验教训，坚决精简了行装，每人只带三天口粮、两双草鞋。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贺龙代表军委分会下达突围命令。当晚，红二、六军团即告别湘鄂川黔根据地，从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为了迅速突破敌人的澧水和沅江防线，红军日夜兼程疾进。先头部队红十七师四十九团于二十日夜到达大庸和溪口之间澧水北岸的张家湾，第四十九团团长王烈亲率一营，乘着木排、竹筏，奋勇抢渡，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对岸敌人的工事，控制了渡口，搭起了浮桥。后续部队有的通过浮桥，多数从张家湾上、下游不远处找到的徒涉点，强渡了澧水，从而，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在战斗中，团长王烈、湘鄂川黔少共省委书记周玉珠不幸牺牲。强渡澧水之后，红二军团四师和红六军团侦察队及红十六师即兵分两路向沅江进发。两支部队不顾疲劳，兼程前进，连续行军一百五十余里，于二十日晚分别抢占了沅江北岸的洞庭溪和大宴溪，迅速消灭了渡口两岸的敌人，控制了沅江江面。随后，红六军团侦察队和第十六师又俘虏了乘三条船到大宴溪布防的敌军一个营，共三百余人。至此，红军胜利地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红二、六军团渡过沅江以后，立即按预定计划展开。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红二军团四师占领了辰溪，五师占领了浦市，六师占领了淑浦。红六军团东渡资水，十六、十七师分别占领了新化、兰田（今涟源）和锡矿山，军团部进入了新化城内。这样红二、六军团就控制了湖南中西部广大地区。

红二、六军团占领这些地区后，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广泛进行了抗日救国宣传，并积极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早在八月间，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就接到了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八月二十六日，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王震、张子意曾共同署名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为号召全国民众保卫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卖国罪魁蒋介石的宣言》，号召一切反日反蒋的民众、团体、军队联合起来，组织统一的革命战线。宣言的发表，是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策略路线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指明红军的任务是：作为中坚力量去组织和团结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与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斗争目标进军。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等主张深得人心，红二、六军团进到湖南中西部地区后，动员群众的工作很快便产生了效果。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直接主持统一战线工作。他在新化，不仅注意工农的工作，而且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妇女中的工作，都很有成效。他还起草了一个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用红六军团政治部名义发出。布告说：“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蒋，消灭卖国巨寇……大家起来救国，胜利终归我们。”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极为不满，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有着极大的义愤，一经红军宣传和发动，许多学生和青年，踊跃地参加了各种救亡活动和抗日团体。在这期间，共建立了三十八支“抗日游击队”，有队员一千七百多人；还建立了“抗日大同盟”、“抗日义勇军”等组织。有着革命传统的锡矿山工人组织了一支名为“抗日救国先遣队”的武装，其中许多人后来都参加了红军，同时，部队也得到发展，红六军团在

新化一带扩大了一千多人，红二军团在辰溪、溆浦扩大了二千多人。

红二、六军团每到一地，都抓紧时间发动贫苦农民，搜捕土豪劣绅，没收和分配地主的谷子和财物。群众看到土豪劣绅受到了应有的惩办，又分到了粮食财物，都非常高兴，革命精神随之奋发起来，很快形成了一股投奔红军闹革命的热潮，纷纷参加红军。两个军团在城市中严格执行了“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他们初到时，因为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市面上的商业活动停顿了；后来经过红军宣传，又看见红军只没收“盐运局”的财产，对一般私营企业一个也没有动，商人纷纷开市，照常营业。在筹款和收集物资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共筹得数万银元。红二军团还在辰溪截获了敌人的运输船只，仅布料就缴获了两万多匹。

红二、六军团长驱直入湖南中西部，宣告了国民党军企图聚歼红军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的计划彻底破产。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迅速改变了战略部署，很快组成了对红二、六军团的“追剿”军，以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追剿”部署是：以樊嵩甫纵队四个师和李觉纵队三个师为“追剿”主力，樊嵩甫部经慈利渡沅江向新化、溆浦追击，李觉部由沅陵、泸溪向辰溪、溆浦追击，以陶广纵队三个师和郭汝栋纵队八个团进至沅江西岸，为堵截部队，以汤恩伯纵队两个师（十个团）防守长沙，并作预备兵力。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留下孙连仲和徐源泉的部队对付红十八师和防止红二、六军团主力返回。

十一月三十日，国民党军李觉纵队的第十六、十九、六十三师先头部队，从西北方向赶到了溆浦、辰溪附近。此时，这三个师突出、分散，有利于红军攻击。但是，由于红军指挥机构“对敌估计上的错误，认为敌不能迅速追进，未估计到敌新‘围剿’部署已成，兵力集结易于转为‘追剿’部署”，因此，红二、六军团进到湖南中西部后，主力散布过宽，一时收拢不及，错失了消灭敌人的有利机会。及至部队收拢时，樊嵩甫纵队四个师也从柳林汉和桃源过了沅江，分两路向溆浦、新化间前进。十二月六日，红二、六军团主力四师、六师和十七师转到湘军侧后，准备在湖南坡、大水田地区侧击樊嵩甫纵队的右翼，不意该敌已先一天通过，进到了马鬃市、东坪一带。而李觉纵队却利用红二、六军团主力向东北伸出的机会，乘虚袭击溆浦。这时，溆浦城内驻有红二、六军团后方机关，情况危急，王震当即率领红十六师驰援，指挥部队抗击李觉纵队，相持一夜，于七日撤出战斗。至此，国民党军主要“追剿”部队七个师都已经接近了红二、六军团。在西面陶广纵队三个师和郭汝栋纵队八个团正沿沅江向南伸展，东面汤恩伯纵队两个师也正由岳阳、长沙向宝庆急进，企图通过正面追击和两翼迂回的布势将红二、六军团限制和消灭在沅江和资水之间。

面对这种情况，红二、六军团遂按预定计划向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依据朱德、张国焘关于首先向东南，再求西进之电报指示，为了尽量调动和疲惫敌人，使敌主力远离红二、六军团预定到达的地区，转移行动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手段。十二月十一日，两军团由溆浦潭家湾、底庄、桥江等地出发，兵分两路，连续九天向东南急进，造成东渡资水的形势，把追击的国民党军全部吸引了过去。二十一日，红二、六军团进到湘南之高沙市、洞口地区，桂军也开始北调，这时红二、六军团遂转向西进。二十二日，在瓦屋

塘攻击陶广纵队的第六十二师，想从这里打开西进的道路。但因国民党军已做好防守准备，没有成功，部队伤亡三百多人，红五师师长贺炳炎右臂负重伤（后截肢）。于是，红军改道南取武阳，绕过陶广纵队，经遂宁、洪江间的竹舟渡过巫水，转向北进。时值严冬大雪，地处高山峻岭，部队忍受着寒冷和饥饿，沿着山里的崎岖小径兼程急进，在江西街和托口再次抢渡沅江，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进到芷江以西的冷水铺地区，把追击和迂回的敌人全部甩到了后面。红二、六军团在驻地过了新年，总结了突围一个多月来的工作。

此时，樊嵩甫纵队的先头部队才过榆树湾，而郭汝栋纵队主力尚远在麻阳附近，距离红二、六军团都在四天路程之外。汤恩伯纵队在金屋塘即停止前进，准备开回宝庆防范广西军阀。尾追红二、六军团较紧的只有李觉纵队和陶广纵队，其中以章亮基之第十六师最为积极，正从芷江向晃县前进。红二、六军团根据在湘黔边争取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总任务，于一月三、四两日，以一部分兵力西取晃县和玉屏，作为临时后方，并以少数部队向北活动迷惑敌人，主力则集中在晃县、龙溪地区待机反击尾追之敌。

四日，李觉派保安第十二团一个营首先渡过沅水，占领新店坪、便水地区，担任警戒，架设浮桥，以保障主力渡河。五日六时半，李觉纵队第十六师从岩田铺、裴家店地区沿芷晃公路西进，拟经便水、波州向晃县追击，第十九师和第六十三师（各欠一个旅）同时由竹坪铺、芷江地区出发，在第十六师后跟进，相距约一天路程。

红二、六军团察觉到李觉纵队动向后，决定抓住机会，集中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先头部队。计划将敌第十九、六十三两师隔绝在沅水以东，集中兵力打击渡过河来的第十六师。红二、六军团五日八时由龙溪口、晃县地区出发。红六军团于十四时半，在上坪、对河铺之间与已超过新店坪的敌第十六师先头一个旅遭遇，战斗十分激烈。十六时，红二军团赶到，第四师向敌先头旅右翼实施突击，第六师按原计划向便水敌渡河点迂回。这时，敌第十六师另一个旅也渡过沅水，进到了新店坪地区。红六师进到新店坪西北地区就为敌人所阻。战斗到六日三时，进展很慢，而国民党军第十九师和第六十三师却相继增援上来。在这种情况下，红六军团第十七师的五十一团从敌人左翼突入了敌人纵深，处于敌右翼的红十六师曾全力以赴，给予策应，打得非常英勇，但因为缺少后续力量及时地巩固与扩大胜利，结果在敌人援兵的猛烈反击下，被迫退回原地。这次战斗打成了消耗战，红军伤亡一千多人，第四师参谋长金承忠，第十一团团团长覃耀楚牺牲。便水战斗没有打好，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战斗计划不周，没有估计到敌人正面三个师来得这样快，也没有预料到陶广纵队会向龙溪口方向迂回，原想只打敌一个师，结果发展成为打敌人三个师。再就是两个军团动作不够协调，进入战斗和撤出战斗都缺少配合。此外，在整个部署上，对翼侧保障没有充分给予重视，也给战斗带来了不利影响。便水战斗后，陶广纵队又从托口向红二、六军团背后的晃县发动进攻，情势极为不利。在此情况下，红二、六军团即继续向西北转移，途中在田心坪歼灭黔军一个营，击破了敌人的阻截，于一月九日和十二日先后占领了江口、石阡，胜利地完成了进抵石阡地区的任务。

在此之前，留在根据地执行掩护任务的红十八师，在主力突围的前夜即向西南方向行动，吸引了湖南敌军。主力转移时，他们又调头北上，威逼龙山、来凤，牵制湖北敌军。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被敌十多个团围于

龙山之岩塘地区。指战员浴血奋战，于二十五日杀出重围。此后，二十八日在桑植的苦竹坪、鹿耳口地区，又遭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六个多旅围攻，奋战两昼夜始突出包围圈。十二月二日，转移至龙山招头寨，又与敌鏖战十多个小时，于三日脱离战斗。在转战中，师参谋长刘风、第五十二团团团长樊孝竹先后牺牲。此时，红十八师只剩下了一千二三百人，处境十分艰难，师领导根据军委分会的指示精神，决定放弃坚持根据地斗争的计划，向湘黔边转移。为便于战斗，将第五十二团和省委警卫连合并为一个营，撤销了第五十二团的番号。经过湖北省西南部和四川省东部，转移到了原来的黔东根据地。此后，在南腰界休息一天，又继续前进，连续走了二十五天，战胜了敌人的多次堵截，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九日赶到江口，归还了红六军团建制。

在这期间，有一次红二军团电台和红军总部通报时，突然有一个不知呼号、不知所属的电台插进来呼叫，经互相询问，才知道是军委三局王净局长亲自上机呼叫红二、六军团。通报情况后，他随即发来一份明码电报，大意是：弼兄，我们已到陕西保安，密码“豪”（“豪”是周恩来的化名）留在老四处……电报说明党中央已到陕北，而原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用的“豪”字密码本留在了红四方面军，因为没有密码本，所以红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仍不能直接联络。

突破乌江

按照原定计划，红二、六军团向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目的在于争取在这里创建新的根据地，以继续发展革命形势。但是，由于便水之战打成了消耗战，部队伤亡较大，没有能够创造出有利的局面；樊嵩甫纵队、郭汝栋纵队、陶广纵队、郝梦龄纵队以及广西军阀部队共十五个师的兵力，都围拢上来，红军处于不利地位；以石阡、江口为中心的地区的居民稀少，经济落后，粮食十分困难，不利于大部队久留；从地形看，这里山河纵横、机动不便，也不适于进行运动战。此时，朱德、张国焘也来电指示：“在未给敌严重打击时，不宜久停一处……应离敌军较远活动，但勿入大荒野地带，敌兵力虽多，亦能进退自如，主动在我……”“乌江上游障碍太多，下游障碍较少，黔南、黔北均少大山大河障碍，给养亦不困难……同意西打驻黔蒋军，但须取进攻姿态……”据此，军委分会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九日在石阡召开会议，检讨了突围以来的战斗行动，分析了当面的形势，决定放弃在石、镇、黄建立新苏区的计划，继续西进，争取在贵州西部创立根据地。

从石阡到黔西，最主要的问题是能不能顺利地渡过乌江。为了顺利地抢渡乌江天险，红二、六军团利用敌人调整部署的机会，在石阡、江口地区休整了七天，进行政治动员，并扩大了八百多名新战士；同时，还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任弼时传达了不久前才收到的由朱德、张国焘转来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致二、六军团电：《关于目前形势和党和策略路线决议案》的内容摘要。这些活动对于统一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胜利抢渡乌江、进军黔西起了很大作用。

抢渡乌江之前，朱德、张国焘电示：“应以佯攻贵阳姿势，速转黔大毕地区，群众、地形均可作暂（时）根据地。”为迷惑敌人，红二、六军团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在龙溪附近突破敌人第二十二师封锁线后，立即向南挺进，连克瓮安、平越，并在马场坪击退了敌第九十九师的截击，西取

洗马河和龙里，先锋直逼贵阳。这时，国民党军主力大部在红二、六军团东面和北面，贵阳及其东南地区兵力比较薄弱。所以，当红二、六军团逼近贵阳时，国民党军第九十九师和第二十二师急忙向贵阳收缩，加强防守。这样一来，国民党军在贵阳以西的乌江防备相对减弱，给红二、六军团西渡乌江造成了可乘之机。但与此同时，遵义方面的国民党军约三个师兵力，却开始了行动，企图南渡乌江进行截击。红二、六军团为了把这部分敌人滞留在乌江北岸，突然来了个大转弯，从北面绕过贵阳，向西北急进，奔袭扎佐、修文，在扎佐全歼敌一个保安团，造成了经息烽北渡乌江的态势。此时，国民党军由于害怕红二、六军团走中央红军的老路，渡江北取遵义，连忙在乌江北岸加紧布防，并命令在四川南部的第三十三师和第六十六师向遵义集中。在此情况下，红二、六军团就解除了右翼的顾虑，遂再改变方向，星夜向西秘密急进，直取贵阳以西的乌江渡口鸭池河。

鸭池河是黔西北数县通往贵阳的主要渡口。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红二、六军团抓住敌人向贵阳收缩、贵阳以西乌江防务空虚的有利时机，以红六师为先导，迅速奔袭镇西卫，抢占鸭池河渡口。同时，从各师抽调一百二十多名侦察员，组成较强的侦察队担任先锋，连夜急进，于二月二日凌晨到达茶店，歼灭了小股守敌。这里距鸭池河渡口仅十多里，侦察队得手后即迅速向鸭池河老街渡口奔去。天明，红二、六军团主力也相继赶到，当即以猛烈的火力压制对岸的敌军，并迅速夺取船只，开始渡江。当日下午，红二、六军团全部胜利地渡过了乌江。至傍晚，国民党军第二十三师和九十九师才赶到了乌江东岸，而这时红军已经占领了黔西。

在黔西、大定、毕节争取建立新的根据地

一九三六年二月初，红二、六军团到达黔西地区时，各方面的条件都很有利。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长征曾经过这里，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广大群众有良好的影响。红二、六军团来到这里，当地人民非常欢迎，许多人主动给红军带路、通报敌情，踊跃参加红军。而蒋介石在同一年搞掉了贵州军阀王家烈以后，即以其亲信吴忠信主持黔政，他极力排挤以至消灭地方实力派，加深了敌人内部的矛盾和分裂。其部队所到之处，抓兵拉夫、封船派马、贩烟放赌、勒索钱财，搞得贵州人民生活十分困难，民怨沸腾，民变蜂起。许多民变武装和黔军残部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对开展武装斗争，发展和壮大红军极为有利。这时红二、六军团收到朱德、张国焘来电：“关于你们行动有二：1.在黔、滇、川境广大地区与敌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之一部，争取（建立）根据地与我们配合作战；2.入川……与我们会合作战，一、三军（团）亦可出陕南配合，……目前你们战略，当以第一项为宜。”军委分会研究认为，黔、大、毕在地形、群众、粮食与敌我力量等条件上均为有利，在全国革命形势激烈开展条件下，红二、六军团应继续在长江以南活动，在该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因此，红二、六军团占领黔西县城后，即实行战略展开：第十八师在黔西方向担任钳制任务；第四、六、十七师集中起来，往东北迎击急进的国民党军万耀煌纵队；第五师和第十六师西取大定和毕节。二月五日，第五师从黔西出发，进军大定。当日，在行进中击溃敌宋醒保安旅一个营，夺取了重要通道西溪河桥，抵达大定县属之甘荫棠。六日凌晨，继续向大定县城推进。上午十时，

红五师在欢迎群众的簇拥下列队开进大定县城。大定解放之后，当时在毕节的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即派地下党员到大定与红军联系。根据当时情况，任弼时、王震、夏曦等讨论决定，立即向毕节进军。二月九日，红十六师进至毕节西北山时与敌发生战斗，全歼保安团一部，在地下党的密切配合下，很快占领了毕节县城。入城后，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会见了邓止戈以及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等毕节反蒋武装负责人。至此，红二、六军团胜利地完成了由石、镇、黄向黔、大、毕的转移。

在贵州地下党的配合下，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很快展开。一九三六年二月八日，于黔西成立了中共川滇黔省委，并建立了根据地的政权机关——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任弼时、关向应、王震、甘泗淇等出席了成立大会。会议宣布贺龙为革命委员会主席，陈希云为代主席，朱长清为副主席。革命委员会颁布布告宣告：“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政府的中坚支柱，是川滇黔边区广大民众的临时革命政府。”同时，详细阐述了红二、六军团来到黔、大、毕的宗旨，明确指出：“我红二、六军团为着挽救中国之危亡，数年来与蒋介石进行不断的流血的艰辛的战争，此次转战数千里进入川滇黔边，担负着扩大抗日反蒋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神圣的光荣的责任，在川滇黔边创造抗日的苏维埃区域与广大抗日的红军，联合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势力共同挽救中华民族之危机。”同时，还宣布了临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各级革命政权；组织民众抗日武装力量；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以及保护、发展工商业，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等。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红二、六军团领导又不失时机地组织工作队，深入城乡建立县、区、乡各级革命政权组织。大定成立了拥护红军委员会，毕节建立了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并建立了一个党的区委组织。在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黔西北先后建立了九十五个乡和村的苏维埃政权。

在建立各级革命政权的同时，红二、六军团十分注意加强地方武装建设。首先以中共贵州省工委掌握的三支武装力量（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部）为基础，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席大明部编为一支队，周质夫部编为二支队，阮俊臣部编为三支队，为加强领导，红二、六军团决定派红六军团民运部长李光清、第十八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廖明及团政治处主任欧阳崇庭分别担任一、二、三支队的政治委员，邓止戈为“贵州抗日救国军”参谋长。此外，还广泛组织了地方游击武装。每队一般有一百多人，也有的二十几人。象这样的游击队在黔西、大定、毕节三县共有九十多个。在王震亲自关怀下，还建立了一支苗族武装——苗族独立团。

在“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改善民众生活”、“实行土地政策，没收地主阶级和一切卖国贼、汉奸的土地财产分给雇农、贫农、中农、士兵、失业者和难民”的方针指导下，各级革命政权建立后，立即宣布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并领导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使许多穷苦群众第一次吃上了饱饭，穿上了新衣。通过打土豪、分浮财，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激发了群众的觉悟。为了巩固根据地和刚刚建立的红色政权，各级革命委员会都“以最严厉之手段”镇压一切反动分子和企图反抗的豪绅地主以及潜入革命队伍的奸细。许多欺压群众，作恶多端，死心塌地与红军为敌的反动分子受到了应有的制裁。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红二、六军团还充分利用这一时机，休养生息，

加强训练，扩大兵员。由红十六师开办了干部训练班，分批抽调班、排、连干部，在毕节附近的茶亭、海子街、朱昌等地，进行队列、射击等基本军事训练。通过训练，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扩大红军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总共扩充新战士五千多名，组建了红五师第十四团。

在根据地建设中，红二、六军团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贵州省著名进步人士周素园是清末秀才，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一九二五年退出军政界。当红二、六军团快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他走，他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红二、六军团到达后，政治部的同志在他家里发现许多马列主义书籍，并且圈圈点点，阅读认真过。有关同志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王震和夏曦，他们当即登门走访。当问及他为什么看马列主义的书籍时，他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说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王震和夏曦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不赞成？”他说：“赞成，完全赞成。”任弼时也亲切会见了周素园。红二、六军团还请他出来担任了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司令员。抗日救国军很快就发展到一千多人。因为他和云南的龙云、孙渡等上层人物相识，当时为了能在这里站住脚，红二、六军团领导人曾请他给龙云、孙渡写信，他欣然接受。他在信中把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向龙云、孙渡作了详细说明，并说：“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道灭虢，史有明鉴。”由于周素园的信，再加上肖克、王震也给孙渡写了信，并建议两军签订停战协定，所以，孙渡就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这种态势，有利于红二、六军团侧重对付东面来的敌人和在黔、大、毕地区进行休整。红二、六军团最后撤出毕节时，周素园以五十六岁高龄跟随红军长征，抵达延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任八路军高级参议，一九三八年返回原籍，建国后曾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副省长。毛泽东称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红二、六军团进入黔西和在黔、大、毕地区建设根据地，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和不安。他迅速把正在四川对红四方面军作战的万耀煌纵队调到贵州，并从南京飞抵贵阳亲自布置“围剿”，命令贵阳行营主任顾祝同指挥五个纵队，即万耀煌纵队、樊嵩甫纵队、郝梦龄纵队、李觉纵队和郭汝栋纵队进攻红二、六军团，以郭思演纵队、孙渡纵队从东西两面防堵，以川军杨森、李家钰部沿长江布防。红二、六军团刚刚占领黔西时，万耀煌部已占其北面的打鼓新场（即今金沙县），先头部队进抵军事要地三重堰，郝梦龄部紧随其后，第九十九师及第二十三师逐步向鸭池河靠拢。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红二、六军团为了巩固和扩大占领的区域，创建川滇黔新的根据地，二月五日黔西会议后，贺龙、肖克亲率主力红四、红六、红十七师向三重堰方向迎敌，留红十八师驻守黔西，严守鸭池河渡口和烂泥沟并继续开展地方工作。

二月六日，万耀煌纵队本队到达三重堰。此间，肖克率

红十七师到牛场（今定新乡），贺龙率红六师主力到大协厂，一部到新开田，红四师在沙窝。当时估计万耀煌部可能南移，红六师和红十七师便到樱桃坪以北设伏，但万耀煌部停止于三重堰，未能打成。二月十日，红二、六军团为了调动敌人，创造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条件，以红十七师深入敌后，

占领了打鼓新场，战斗中红十七师师长吴正卿阵亡。红二军团的主力绕到三重堰敌人的北面，计划在三重堰东北地区歼敌，然而万耀煌并没有因为红六军团占领打鼓新场而后顾，却乘红二、六军团主力转向东北方面、正面兵力薄弱的机会，突然于二月十四日袭占了黔西县城，把被红军阻于乌江东岸的敌第九十九师和第二十三师接应过了鸭池河。二月十七日，红二军团进到大定。十八日，敌万耀煌、郝梦龄两个纵队即向大定进攻。黄昏时，红六师于黄家坝重创郝梦龄之先头部队第五十四师，缴获轻机枪一挺，长短枪六十余支，但未能阻住敌人，大定于十八日失守。国民党军的逼近已直接威胁到毕节。此时，红十七师在肖克率领下从打鼓新场撤到了大定的六龙场，次日转到将军山，计划在此阻滞敌人，以掩护毕节的红军休整补充和根据地各项建设工作。

将军山位于大定县城西面，数十个巍峨的山峰从南向北一字排开。清毕公路从这里蜿蜒穿过，是大定通往毕节的门户。二月十九日上午，红十七师进到将军山、七家田一带。前卫团刚上公路，就发现一股敌人由大定沿公路接近七家田。肖克当即命令第五十五团及第五十一团从公路东侧攻击运动之敌。前卫第四十九团十分机智，听到后面枪响就停止了前进，从公路西侧插了过去，左翼部队也有一部穿过公路，对敌形成了强大压力。经过激烈战斗，仅一个半小时就将万耀煌苦心经营的、从袭占打鼓新场、进犯黔西到攻占大定一直冲在前面的，拥有六个连的敢死队全部歼灭。红二军团的四师十一团一个营和五师的一部也参加了这场战斗。这次战斗，缴获敌人步枪三百余支，轻机枪九挺，毙敌一百余人，俘敌三百余人。战斗结束后，肖克和红十七师师长刘转连登上将军山，看到远处敌人正在大定城外集结，当即命令红十七师占领将军山，构筑工事，转入防御。敢死队被歼后，万耀煌纵队便龟缩于大定城不敢冒进。直到二十五日，郝梦龄纵队进至锅厂，威胁红十七师将军山阵地北侧，万耀煌纵队才向将军山反扑。先以轻重火器向红十七师阵地射击，然后以多路队形发起攻击。红军居高临下，隐伏战壕，待敌进至预定距离时，才一齐开火，发起冲击，一直把进攻之敌赶到山脚下。如此反复数次，终使敌人进攻企图未能得逞。红十七师控制将军山，形成了在毕节、大定地区建设游击根据地的东面屏障。二十六日，敌人又向将军山大举进攻，此时红十七师完成阻击任务后，正逐步向毕节撤退。当撤到离将军山二十里的响水河西岸时，肖克发现河对面公路上敌人正向响水开进，便命令第五十一团迅速出击，一举歼灭了敌人的先头部队，将敌阻滞于响水河东岸。是日黄昏，红军撤出战斗向毕节转移。

在红六军团激战将军山的同时，红二军团直属队和红六师进到了鸡公山，红四师到了沙树坪。二十日，红军估计黔西甘荫堂之敌第九十九师可能增援大定万耀煌部，即设伏于羊场、乌溪西，争取歼灭援敌之一路。后因敌原地未动，故当晚撤回六龙场。二十三日，红军判断樊嵩甫纵队本日可到飘儿井，决定以红二军团出飘儿井以东迎击，但因敌已先到飘儿井，红军即改变原定部署，转赴打鸡阁、坝子寨一带待机，二十六日到了毕节城。

红二、六军团在黔、大、毕地区英勇作战，虽予敌以沉重打击，但由于红军进入黔西以后向东北方面的行动过迟，未能抢先占领三重堰等军事要地，对敌万耀煌部的急进估计不足，其他四个纵队的敌军也已逼近，致使黔西、大定在数天内得而复失，从而失去了以黔、大、毕为基础继续创建新根据地的可能。将军山之战先是对敌的歼灭战，后又进行了成功的防御战，最

后在撤退中突然实施反击，也连续取得胜利，对于保住毕节，赢得时间，保证部队从容转移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未能扭转不利的局面。

二月二十七日，中共川滇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共同研究认为，在黔、大、毕地区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未能给敌以致命打击，东面敌占黔西、大定，三路靠拢，逼近毕节城（地形上毕城不利），周围约一百二十个团的敌人包围线（圈）内之活动范围狭小，而（且）短期内地方工作基础薄弱，给养条件困难”，决定自动退出毕城，放弃在这一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

乌蒙山中回旋战

红二、六军团在黔、大、毕时，朱德、张国焘曾电示：1.目前时局将有大变动，日在华北将努力夺取北端五省；2.你们即可单独行动，暂不宜渡江，即在黔、滇、川、湘、鄂广大地区作运动战，争取建立你们的新根据地。”红二、六军团军委分会根据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新形势，本着争取建立新根据地的方针，在继续于黔、大、毕活动已经不利的情况下，决定首先转移到黔南的安顺地区，争取在那里创立临时根据地，准备于时局大变动时，再东进到湘黔边境活动。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红二、六军团退出毕节，进入了乌蒙山区。当时，因敌人十个师又一个旅全在后面和左侧后，不能直接从毕节去安顺，遂沿毕节、威宁大道向西前进，计划将敌人向西调动，造成敌人的疲惫和错觉，然后再突然摆脱敌人，折向东南去安顺地区。这时，蒋介石也在多方调动兵力，其意图是：将红二、六军团压迫和消灭在金沙江右岸、毕威大道以北地区。但各派军阀矛盾很多，各有打算。云南军阀龙云不仅害怕红二、六军团西入云南，也害怕蒋介石施“假道灭虢”的故伎，以致落得同贵州王家烈同样的下场。所以，取保守云南的态度，把孙渡纵队全部放在昭通、威宁地区防堵，企图与追击军造成夹击之势，逼迫红二、六军团北走四川。四川军阀害怕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共图川西，杨森和李家钰等部数十个团，也取消极态度，只是在川南和沿江地区防堵。贵州蒋介石亲信顾祝同则以万耀煌、樊嵩甫和郝梦龄三个纵队沿毕威大道及其两侧的平行道路向威宁方向追击；以李觉纵队由织金方向、郭汝栋纵队由大定方向向水城、威宁截击，阻止红二、六军团南出。顾祝同企图利用川、滇军队严密防堵的形势，以重兵从东、南两个方向向红二、六军团压迫，以达消灭红二、六军团于金沙江以东之滇、黔、川边境的目的。

三月二日，红二、六军团进到野马川。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带两个警卫员到一个在毕节新编入的部队检查工作，在七星关趟水渡河时，不幸溺水牺牲。夏曦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他早年即和毛泽东等人一起从事革命活动，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活动家。他在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期间，由于推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给党和红军以及苏区建设造成了严重损失，但自丁家溶会议受到批评后，已有悔改表现，并为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对他的牺牲，任弼时曾电告朱德、张国焘，表示“殊为深痛”。

在野马川地区，红二、六军团鉴于李觉、郭汝栋、郝梦龄三个纵队都已转到东南，截断了去安顺的道路，于是改变行动计划，继续西进，准备到妈

引自任弼时《红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报告大纲》。

姑地区折向南行，赶到李觉、郭汝栋纵队前头，经狗店子进入滇东的南北盘江之间地区。但当红二、六军团于四日到妈姑、回水塘地区时，李觉纵队已经进到水城、威宁之间，南进道路又被截断。而追击的敌人，这时也接近了红军的后卫，其中，樊嵩甫纵队的先头部队竟前出到了红二、六军团左前方的朱歪地区。

红二、六军团面临的情况是，继续南进已不可能；如原地停留则有被敌包围的危险；向西走，在昭通、威宁地区的孙渡纵队威胁又很大，唯有西北方向的川军主力远在金沙江沿岸，情况较为有利。因此，红二、六军团又改变路线，向西北奎香、彝良方向行动，将敌追击和截击的部队尽量向西北方向调动，使其敞开南面或东面的道路。

红二、六军团向西北一动，敌人误认为红军要经彝良、盐津北渡金沙江，樊嵩甫、万耀煌、郝梦龄三个纵队急忙转向西北追击，川军也派第一二三师南出川滇边之白水江岸牛街地区堵住红二、六军团的去路。八日，贺龙、任弼时估计敌樊嵩甫纵队的第二十八师可能向红军逼近，因此以红二军团四师和红六军团十六师、十七师从奎香回转到以则河、法冲之线以北山地伏击该敌，以五师到恒底游击，钳制敌樊纵队第七十九师。但敌第二十八师并未全部向红军逼近，到以则河的只有一个侦察连和一个步兵连。这部敌人被红军伏击全部歼灭。此战俘敌数十人，缴获长短枪一百余支。以则河战斗后，红二、六军团急速返回寸铁坝、奎香地区，经乌沙寨、放马坝以东向镇雄前进，至牛场又向左转入深山，循山中小径向东南绕行，拟从镇雄以南脱出敌人包围，经杨家湾穿过毕威大道去安顺。

这时，顾祝同狂妄地认为，在他指挥的大量军队追堵截击之下，红二、六军团已经疲惫不堪、走投无路，企图消灭红二、六军团于镇雄西南大山之中。因此，急令追击军全部东调，命令樊嵩甫纵队尾追红二、六军团，郝梦龄、万耀煌两纵队转向镇雄截击，积极寻找红二、六军团主力决战。他还不顾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的大量减员和疲惫，命令他们迅速经威宁北转，向朱歪、安耳洞地区攻击红二、六军团，并指定郭汝栋纵队在万耀煌纵队左翼加入战斗。但李觉纵队取消极态度，其部队仅沿毕威大道向毕节巡弋。当红二、六军团通过镇雄西南大山的时候，郝梦龄纵队和万耀煌纵队的第九十九师已经到达镇雄城，万耀煌纵队的后梯队第十三师也正经得章坝向镇雄前进。三月十二日，红二、六军团拟经得章坝向杨家湾前进，红四师已在驻地集合。此时，第十一团从坝柳送来万耀煌部的两名逃兵。他们供称：万耀煌正亲自率领第十三师经得章坝向镇雄前进。贺龙、任弼时看到了俘虏，了解了情况，当机立断，决定改变原定计划，令红四师第十一团在左，第十二团在右，速向得章坝方向迎敌；红六师在第十一团左侧平行前进，准备侧击来敌。出发一小时后，红四师与敌接触，并迅速发起了攻击。左面第十一团二营突进了敌人的警戒阵地，消灭了敌人两个连。右面第十二团冲进了敌人的司令部，敌纵队司令兼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在溃乱之时只身逃走。位于第十一团左侧之红六师也对敌进行了顽强攻击。正在行进中的敌人被拦腰截断，首尾不能相顾，完全失去控制，乱作一团，四处溃散。此次战斗，红军俘敌二百余人，毙伤敌营、连长以下一百二十余人，缴获轻重机枪七挺，长短枪数百支，弹药三百余挑。在这次战斗中，第十八团政治委员余秋里，用自己的身体掩护该团团长成本新（后改名成钧），左臂负重伤（后来截肢）。由于敌第十三师主力逃脱，郝梦龄纵队及第九十九师又由镇雄折回增援，因而

红二、六军团未能歼灭更多的敌人，经得章坝南进的道路没有打开。十二日晚，红二、六军团改向西行，第二天，在财神塘地区，又同敌郭汝栋纵队遭遇。与此同时，在红二、六军团后面的郝、万两个纵队也跟踪追到安耳洞以东地区，与红六军团接触；南面之敌李觉纵队在水塘堡和赫章地区，距红二、六军团甚近，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北面樊嵩甫纵队也在红二、六军团来路上寻找红二、六军团踪迹。敌人越聚越多，包围也越来越紧。而红二、六军团经过长时间连续行军作战，非常疲劳，机动能力受到影响。军委分会一方面充分地估计了面临的困难，在部队中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并减轻了一些驮担和重装备，以提高部队的运动能力；另一方面，又看到敌人主力不仅被调到了红军的北面 and 东面，敞开了南面的通路，而且也被红军拖得疲惫不堪、懵头转向。于是，果断地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手段，从郭汝栋和樊嵩甫两纵队之间向西北方向突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第三次进到奎香地区。红二、六军团跳出敌人包围之后，立即兼程南进，在昭通、威宁之间穿过孙渡纵队的防线，直趋滇东。

红二、六军团这次历时近一个月、辗转千数百里的大回旋战，是在云贵高原之乌蒙山中进行的。这里人烟稀少，是一个多民族杂居且少数民族居多的地方。他们在一年前共产党及红一方面军革命活动的影响下，对红军有一定的认识。红二、六军团到达该地时，部队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得到少数民族的支持和帮助。因此，虽然当地群众生活贫困，红军还能在公平买卖的前提下，取得最低限度的给养，保持部队的基本生活和机动能力。但在摆脱敌人围追堵截的战斗中，有时为了调动敌人或避免不利的战斗，不得不紧急改变行动方向；有时为了创造有利条件，不得不日以继夜地强行军。因此，伤病员常常得不到最起码的休息和医疗，安置也很困难。在黔、大、毕地区吸收的大批新战士，由于缺乏锻炼和教育，加之战斗频繁，掉队落伍的很多。党组织在部队中不间断地进行了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撤出毕节时，党委提出了继续在黔滇边争取创造新根据地的政治任务，给红二、六军团一切人员和一切行动树立了一个明确而具体的奋斗目标。行军作战中，及时地交代当前情况，解释行动性质，做到让大家心中有数，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保持坚强的斗争意志。同时，在全体指战员中，广泛地组织群众性的思想互助和体力互助，特别是加强了对新战士的帮助。党员、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任劳任怨，吃苦在先，战斗向前。这些政治思想工作及当地人民的积极支援，使红军自始至终地保持着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旺盛的战斗意志，从而胜利地完成了这场艰难而复杂的回旋作战任务。

三月二十二日，红二、六军团进抵滇东宣威东北的来宾铺、徐屯一带。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考虑，按原计划去安顺地区已无可能，遂决定在滇黔边之南北盘江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当晚，他们得知宣威只有滇军刘正富部一个旅守城。为了给创建根据地打开局面，并取得人员和物资的必要补充，决定以红六军团为主，红二军团配合攻占宣威城。当即命令红五师到陡山坡阻击郭汝栋纵队，红六师到石丫口集结待机。夜间，敌派搜索分队到来宾铺地区活动，红六军团警戒部队迅速投入战斗，将其击溃。二十三日拂晓，刘正富旅出城，占领了虎头山阵地，并以此为依托向来宾铺推进，首先与红六军团直属部队接触。战斗打响后，红四师、红十六师、红十七师也都参加了战斗。红十六师一部曾突入刘正富的旅指挥所，后因孙渡纵队的鲁道源、龚顺壁两旅增援上来，红军多次攻击，未能奏效，遂于当晚

撤出战斗。这次战斗计毙敌四百余人，刘正富旅受重创。红军伤亡亦重，共牺牲三百余人。第十一团政治委员黄文榜、第十二团团长钟子廷、第五十团政治委员段兴寿、第十六师组织科长唐辉、第十七师组织科长罗辉英勇献身。来宾铺战斗后，红二、六军团继续向南转移，于二十八日进到了南北盘江之间的盘县、亦资孔地区。

第二节 胜利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一九三六年三月底，红二、六军团到达盘县、亦资孔地区时，国民党军李觉纵队进至郎岱；郝梦龄纵队进至北盘江沿岸的白义河、铁索桥、茅坪坡渡，与在白层的郭思演纵队沿北盘江东岸联合布防；樊嵩甫纵队和郭汝栋纵队集结于水城、上城；滇军孙渡纵队进至白龙洞、迤后所一带，与红六军团对峙。极度疲惫的国民党军，企图在上述地区进行整顿，然后对红二、六军团进行新的围攻。

红二、六军团在胜利地进行了机动灵活的乌蒙山中回旋战和来宾铺战斗之后，现在又造成了较为有利的形势。当面敌人的数量大为减少，双方兵力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周围国民党军一线部队只有樊、郝、郭、李等纵队和滇军孙渡纵队共五十多个团，而且所有追击之敌都被红军拖得减员很大，疲惫不堪，士气沮丧。距红二、六军团最近、行动比较积极的只有孙渡纵队，但其兵力单薄，不敢单独冒进。而红二、六军团还具有相当于桑植出发时的实力，并且在运动战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进入滇黔边境后物质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士气旺盛。此外，牛栏江以东，南北盘江之间广大地区，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反动统治比较薄弱，地形和政治经济条件，也利于红二、六军团活动。军委分会根据上述分析认为，有在盘县以南兴义一带建立根据地的可能；同时，还考虑即使此着不成，也可利用全国正在兴起的抗日救亡高潮和正在发展的蒋介石与两广军阀之间的矛盾，挥师向东，与敌周旋，求得存在和发展。这样，在江南保存一支红军主力，无疑将对以后全国革命局势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然而，几天前，在三月二十三日，朱德、张国焘曾给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发来电报：

“一、我们自动放弃天芦，已进占道孚、炉霍，即取甘孜、瞻化、雅江，现懋功、丹巴、崇化、绥靖仍在我手。

二、一、三军（团）、二十五军近过黄河，在汾水黄河间活动，二十六军仍在陕北苏区。

三、刘湘、邓锡侯、刘文辉部在天芦、灌县、威茂一带防我反攻，孙震（前田部）进绵阳、平武、松潘，李家钰约九（个）团在会理、西昌一带及金沙江沿岸阻隔你我会合要道，薛岳周吴部十八（个）团驻雅安州泸定，李韞珩六个团驻康定，有开团（？）驻雅安说。

四、因你们善用机动战，已将你处敌军陷入严困状态中。李觉部早图调回湖南，已伤亡过半。万师受打击清整。裴郝师均叫苦。樊纵队亦疲劳，似滇军肯积极，敌大部似落在你们五、六天后，如趁此时过金沙江尚有可能。李家钰九个团分散甚宽，战斗力亦不强。

五、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江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前，设法渡过金沙江。

（1）在蒙昭一带渡河，该处渡船多，但须先抢到手。经会理、盐源到雅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

（2）第二渡河区在绞平渡，鲁车渡渡河亦可，但船少。

（3）源（元）谋龙街亦可渡。

（4）如上述三处不能渡河时直经禄劝、武定、元谋，进姚安、大姚、盐

丰一带设法渡河，到华平（坪）、永北（胜）一带更为稳妥。

（5）若西上即到邓川、鹤庆、丽江，过维西、中甸、阿子经德荣、定乡，可到巴安与我们会合。

六、此道即暑天亦应多备冬衣。

七、过金沙江后即休息整理缓进。

八、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接应你们。

九、如果你军并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滇黔边行动亦好。”

因为这份电报对红二、六军团是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还是仍留在滇黔川边活动没有肯定的意见；又因此事关系到红二、六军团今后的战略行动和中国革命的大局，需要慎重对待，所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没有匆忙作复。为了弄清朱德、张国焘来电的意图，曾反复进行讨论研究，并致电朱德、张国焘进行磋商。

三月二十九日二十四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致电朱德、张国焘，请求决定红二、六军团的行动：

“一、我军自离开毕节后，在彝良、镇雄地区直至进入滇境之先的不（长）时期内因粮食缺乏，气候奇寒，居民房屋稀少，急行军和多半时间露营，故部队已相当疲劳，减员亦颇大（以则河、得章坝及宣威城北战斗共伤亡千人左右，落伍、开小差总共有二千人左右），惟近日又在恢复中。

二、在目前敌我力量下（即包括敌之樊、郝、万、郭、孙、李等纵队），于滇黔川广大地区内求得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认为还是有的。

三、我们渡河技术是很幼稚，但如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通过在春水未涨之前，未（或）不至感到大的困难。

四、最近国际和国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甚明了，及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即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岸活动是否孤立和困难，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以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抑或应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并望在一、二天内电告。

五、我军于昨二十八日进占盘县、集结在盘县、亦资孔之线。”

朱德、张国焘三月三十日及时给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回电：

“一、依据国际国内情况，民族革命高潮在生长，苏维埃运动有些发展，但不能过分估计。蒋敌虽削弱，亦不能计算他在何时崩溃。

二、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汇合同北进，亦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尽力策应。

三、在困难条件下可在滇黔川广大地区活动，但须准备较长期的运动战。

四、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

这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才弄清，朱德、张国焘“复电虽未肯定决定，但其意是以北渡为妥，故最后决定北渡金沙江与主力会合”。军委分会经过慎重研究，最后决定渡江北上，并争取经普渡河在元谋渡江，沿华坪、永北北进。当时还作了一个预案：万一过不了金沙江，就向澜沧江方向进行游击活动。后来的实践证明，红二、六军团渡江北上，符合当时党和红军提出的战略方针，适应了全国正在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

势。

一九六一年，贺龙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为什么过金沙江？第一个电报有争论，叫我们准备生姜、辣子、衣服等，我们不同意。第二个电报指出了五个渡口。第三个电报命令渡江。这是有命令才走的。一部分同志不愿过，理由只有一个，革命，南边也要放一个。你讲二、六军团（在金沙江以南）能否有发展？利用军阀矛盾，利用广大区域，四川、湖南、湖北、贵州都可以去嘛。湘江、沅江都挡不住我们。……最后一个命令才过江的。”

肖克回忆这段历史时也说：“这时我们对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闹分裂反中央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我们还想在滇黔边站住脚，虽然查明来包围这地区的敌人比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少了，但也还在五十个团以上，时间久了敌情也可以变化，是否能站得住；是个未知数。总司令部要我们北上抗日，我们从当时整个国内形势看，认为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经军委分会的考虑，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与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

抢渡金沙江

红二、六军团北上抗日的方针决定后，在盘县林整了三天，扩大了七百多名新战士，进行了思想动员、组织整顿和物资准备工作，并在部队中普遍传达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大纲》。三月三十一日，红二、六军团离开盘县，开始了长征的第二阶段。两军团在平彝附近冲破了滇军孙渡所部防线后即分两路行动，红二军团在右，经沾益、寻甸，红六军团在左，经曲靖、马龙向普渡河渡口急进。这时，蒋介石迅速调整了部署：组织了滇黔“剿匪”军总司令部，以龙云为总司令，令滇军迅速组织追击堵截，樊嵩甫、李觉、郭汝栋各纵队也向滇东追击，顾祝同则飞到昆明代蒋介石坐镇指挥。

四月六日，红六师攻占寻甸。龙云估计：红二、六军团有可能沿红一方面军的路线从元谋渡江北上，因此，急令张冲率滇军近卫第一团、近卫第二团、工兵大队、警卫营从昆明赶到普渡河铁索桥两岸防堵。同时，急派督训处长芦汉赶到杨林，要孙渡纵队加快追击速度，配合张冲率领的部队，滞留红军于普渡河东岸，待兵力集中后，将红二、六军团歼灭于普渡河以东，功山以南地区。孙渡受命后，即从杨林分两路追击：以第七旅为一路，从寻甸、羊街尾追；以第一旅、第三旅为一路，由孙渡亲率，经嵩明直插款庄地区，与张冲部相配合，形成对红军的合击之势。

四月八日，红二军团前卫四师抢渡普渡河时，渡口已被张冲部封锁，铁索桥上的桥板均被拆除。红四师大部于拂晓前在铁索桥下游不远处涉过普渡河，接着向敌军控制的制高点音翁山发起攻击。战斗中，师政治部主任肖令彬阵亡。同日，红六军团从可郎出发，拟继第四师之后渡过普渡河。当红十七师进至款庄、小松园时，突然遭到孙渡纵队第一旅和第三旅四个团的拦阻。敌人先期占领阵地，在优势火力和蒋介石派驻昆明之多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掩护下，向红六军团发起攻击。红六军团在不利的情况下，被迫向东边战斗

引自 1961 年 6 月 5 日《贺龙元帅谈红二方面军情况记录》。

引自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边转移。战斗从上午十时一直进行到下午五时。这时，红四师渡过普渡河的部队也奉命从对岸折转（从红六军团右翼绕过），肖克当即令其先行归还红二军团建制。接着，红六军团也退出战斗，转到可郎西北之胡家村。

这时，形势已不利于红二、六军团在元谋渡江北上。西面普渡河受滇军阻击，柯渡以东滇军龚顺壁旅也追得很紧，只距一日的路程；柯渡以北金沙江沿岸，川军杨森、李家钰部正在巧家、宁南、蒙姑、盐场各要点加紧布防；按照蒋介石指令行动的李觉纵队、郭汝栋纵队已进到马龙、曲靖之线，樊嵩甫纵队正由宣威向沾益疾进。

四月八日下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紧急磋商，决定放弃从元谋渡江的计划，改由滇西金沙江上游渡江。当时，红二、六军团在调整部署中，遇到的最大威胁就是滇军龚顺壁旅，如若不能阻止他的追击，任其进至可郎附近，红二、六军团将困于方圆不足几十里的狭小区域，甚至陷入四面被围、前后受敌的危险境地。四月九日凌晨，贺龙、任弼时命令已于七日进至甸尾、可郎一带的红六师立即返回六甲，坚决阻击龚旅，掩护整个部队行动。

六甲，左傍贾白山，怪石嶙峋，右侧山峦起伏，灌木丛生。四月九日九时左右，红六师在师长郭鹏、政治委员廖汉生率领下全部折返六甲地区。前卫第十八团刚到六甲的石腊它丫口，就和龚顺壁旅遭遇。该团当机立断，立即以第二、三营在正面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第一营迅速抢占了左侧之制高点，并向敌人发起冲击。龚顺壁旅见势不妙，立即调集兵力，在炮火支援下与红军拚死争夺，两军形成了拉锯战。敌人倚仗猛烈的火力掩护，企图以一个团攻占右面的高山，以一个团攻占左面的丘陵。这时，红六师师长郭鹏、政治委员廖汉生已令第十六团占领左面山峰，控制了制高点，第十七团在后布成第二道防线。敌人连续发起几次集团冲锋，均被红六师击退。接着，第十八团也在团长成本新和政治委员杨秀山率领下向敌人发起了反冲锋，给敌人以严重打击。

当日下午，战斗益趋激烈。红军的弹药越来越少，战士们一面收集阵地上敌人丢弃的枪支弹药，一面堆砌滚木擂石，构筑工事，准备对付敌人更疯狂的反扑。这时，敌机数架突然飞临，向红军轰炸扫射，敌军趁势向红六师发动了全面进攻。在紧急关头，贺龙派红五师一部前来增援，出其不意，从左翼突然发起攻击，敌军顿时乱了阵脚，全线后撤到七甲。

六甲阻击战，歼敌四百余名，给敌人以重大打击，迫使滇军再不敢紧追。红六师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师长郭鹏、第十八团政治委员杨秀山、参谋长陈刚都负了伤，该团三个营长伤一亡一，九个连长伤亡八人。这次胜利，为红二、六军团调整部署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从而为实施由滇西金沙江上游渡江的计划，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月九日，红六军团从胡家村，经鸡街、大古村向柯渡转移。敌孙渡纵队尾随紧追，红军一面阻击，一面前进。当夜，全军团到达柯渡与红二军团会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认为能否甩开滇军主力，争取数日机动时间，是渡江的一个重要问题。经过周密考虑，他们认为：在强敌围追堵截的不利形势下，灵活机动，抓住时机，抢在樊嵩甫、李觉、郭汝栋三个纵队围拢上来之前佯攻昆明是上策。现红二、六军团四面皆有敌人重兵，唯有昆明兵力较弱（只四个团），同时，龙云部倾巢出动，把注意力放在了普渡河方向，为红军向昆明佯攻造成了有利条件。

“攻其所必救”。龙云势必调回他的主力一部或大部去保卫昆明，这样红军就可减轻或摆脱敌人的纠缠，即刻掉头加速西进，预期可能争取三至五天的机动时间，以保证部队渡过金沙江。于是，佯攻昆明的行动就迅速决定了。

四月十日凌晨，红二、六军团开始行动，以急行军掉头南下，巧妙地穿过孙渡、张冲两部间隙直奔昆明。红二军团六师在前，以第十八团为前卫，当日进抵昆明以北的阿子营、羊街和鼠街一带，并派小部队到距昆明三十余里的厂口、沙郎附近活动，造成了即将进攻昆明的态势。十一日，第十八团相机夺取了距昆明四十里的富民县城，全歼了守敌。当晚，红二军团全部到达富民城内及附近地区集结。红六军团也以连续的急行军，经过羊街、可郎、平地，于十一日上午九时到达了富民的赤白街（赤鹫）。由于红二、六军团出敌不意突然进至昆明近郊，又摆出了要攻城的阵势，顾祝同、龙云仓皇失措，惊恐不安。是日，昆明全市紧急戒严。龙云一面调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守城，一面急电张冲和孙渡回救昆明，正当滇军主力慌乱地从普渡河回救昆明时，红二、六军团又突然向滇西挺进，从而使敌人完全陷入了被动应付的地位。

四月十二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致电朱德、张国焘，报告了普渡河之战和改变由元谋渡江的经过情况，以及决定向巨甸前进，设法在该地渡江的计划，请予接应。

红二、六军团在富民、赤鹫渡过普渡河后，前面已没有敌正规部队堵截，后面的追兵也被甩得很远。为了缩短进军时间，争取早日渡江，贺龙、任弼时将红二、六军团分为左右两路，不顾敌机的骚扰轰炸，日夜兼程西进。两军团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日行百里，所向披靡。左路红二军团连克楚雄、镇南、祥云，于四月二十日前全部到达宾川。右路红六军团连占盐兴、牟定、姚安、盐丰，四月二十日到达宾川与红二军团会合。会合后，两军团于二十三日占鹤庆，以破竹之势横扫了滇西。

由于龙云对红二、六军团判断错误，说红军没有炮，打不了碉堡、城市，在红军接近云南的时候，他即责令各县迅速构筑碉堡，修理城垣，把重要物资均运往碉堡和城市之中，由各地民团、警察守备，所以，红二、六军团每下一城，都缴获甚多，吃的穿的，无所不有，虽然日行百里，但体力强壮，情绪高昂。红六师袭占祥云时，俘民团千余，经过教育审查和争取，大部参加了红军。

这时，国民党军仍想迫红二、六军团于金沙江边决战，顾祝同、龙云一面令孙渡、李觉、樊嵩甫纵队跟踪尾追，一面令郭汝栋纵队从元谋以北渡江，向华坪、永北急进，以便抢先控制金沙江北岸，前堵后追，围歼红二、六军团于金沙江南岸之鹤庆、丽江地区。然而，由于红二、六军团进军神速，这一计划同样化为泡影。到达鹤庆后，军委分会召开会议，确定了渡江部署：以红四师为前卫首先渡江，以红十六师担任掩护，最后渡江。

四月二十四日，红四师从鹤庆出发到丽江，二十五日抵石鼓，沿江寻找船只，动员船工并组织工兵、民工赶扎竹筏和木排。红二军团主力和红六军团则于二十六日先后到达石鼓。石鼓是金沙江上游的重要渡口，也是通往康藏地区的重要门户。石鼓到上游的巨甸相距一百二十里，金沙江由北向南湍湍而下。在这个地带，红二、六军团前卫部队和后续部队共找到七只船，还有自制的竹筏、木排，动员了二十八个船工，开设了木瓜寨、木取独、余化达、格子、土可等五个渡口。从二十五日夜开始起渡，人员全部乘船或竹筏、

木排，马匹则涉水泅渡。到二十八日黄昏，一万七千人马除一只船翻落江中外，全部顺利渡过了金沙江。

滇军刘正富旅风风火火地赶到江边，见红二、六军团已经过了金沙江，又看见红军写下的大幅醒目标语“来时接到宣威城，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啼笑皆非。

朱德、张国焘得知红二、六军团已胜利渡过金沙江，四月三十日发来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黔滇万里转战的红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

红二、六军团渡江后，蒋介石气急败坏地乘飞机至金沙江边的宾川、鹤庆、丽江一带巡视，立即决定追歼红二、六军团于金沙江、大渡河之间，令驻雅江之李韫珩部向康南推进，南北夹攻，截断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联系。

为策应红二、六军团渡江，红三十二军（原中央红军第九军团）由道孚南下，击溃敌两个团后进占雅江，阻止了李韫珩部南进。此时追击的国民党军疲惫不堪，无法克服藏区物质条件和高原气候、地形方面的困难，滇军、湘军为保存实力也不愿人康远追，所以都相继停了下来，改为防堵红二、六军团南返。孙渡纵队防守金沙江南岸；郭汝栋纵队防守华坪、永北；樊嵩甫纵队防守盐源、盐边；川军李家钰部防守西昌、会理；原驻川西的蒋系薛岳部防守大渡河之线，对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采取封锁态势。至此，敌人南北夹击红二、六军团的计划彻底破产。

翻越雪山

自四月二十五日开始，红二、六军团从石鼓至巨甸地段陆续渡过了金沙江，进入中甸地区，两军团分别抵达格罗湾和吾竹地区进行休整。在休整中，普遍向部队介绍了藏族地区的情况，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教育，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各项政策规定，用实际行动体现中国工农红军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以取得藏族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保证顺利通过藏民区，早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抗日。同时，要求部队为翻越雪山作好思想上和物资上的准备。

中甸地区，位于滇西北，属康藏高原。这里人烟稀少，贫穷落后，当时还是封建农奴制社会。居民主要是藏族，一般都信奉喇嘛教。

红军进入康藏高原后，虽然前无强敌堵截，后无重兵追击，但由于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民族信仰、语言文字、生

活习惯等特殊情况，再加上与蒋介石和地方军阀相勾结的上司、领主武装的阻拦，翻越雪山、通过藏民地区，便成为一场特殊的战斗。

二十九日清晨，红二军团前卫第四师，以第十二团为先头部队，开始向哈巴雪山进军。雪山，海拔五千三百多米，山势陡峭险峻，终年积雪，从金沙江狭谷到雪山顶峰，俨然几层天地，从下到上，气候有春夏秋冬四季感觉。红四师从格罗湾开始登山，中途曾遇小股藏族反动武装袭击，第十二团政治委员朱辉照在战斗中负伤。击退反动武装后，部队又继续前进，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攀登才翻越了雪山，于三十日到达了中甸县城。随后，红二军团直属队和五师、六师，红六军团十六师、十七师、十八师也分别于五月一日、三日先后翻越了哈巴雪山，分别到达中甸县城及其附近地域，以及距中甸县城

五十里的南坝一带。在此，全军及时总结了翻越雪山的经验。

中甸，是一座只有几百户人家的荒僻山城。城外有一座喇嘛寺，名为归化寺，僧侣很多。当红军到来时，受到国民党欺骗宣传的藏族群众大都躲进了山林。归化寺的最高统领松本活佛令僧众紧闭寺门，防范红军。为顺利通过藏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要求红二、六军团切实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藏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寺院，严守纪律，等措物资一律实行现金交易，公平买卖。在这里，红二、六军团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任弼时报告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关向应总结了部队自刘家坪出发到中甸这一阶段的工作。为了公开申明红军的正确主张，红二、六军团还以贺龙主席名义颁发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布告》，说明了红军“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之目的”；阐述了红军的性质和纪律；申明了红军的政治主张。红军还十分注意做统一战线工作，争取藏族中上层人物的同情与支持。归化寺院内负责保管青棵和跳神用衣的喇嘛夏拿古瓦，看到红军的行动不象国民党说的那样，便自愿要求当代表与红军谈判。五月一日，夏拿古瓦等主动到红军驻地会见贺龙。为表示对红军的尊重，他们向贺龙敬献了哈达。贺龙热情接待了夏拿古瓦及其他代表，从交谈中，贺龙得知寺院对红军尚存有疑虑，当即向代表作了明确的解释和答复，宣传了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并请夏拿古瓦带回了以他个人名义致八大老僧的信件。信的内容是：（一）贵代表前来，不胜欣幸。（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侵犯，并负责保护。（三）你们须即回寺，照安生业，并要所有民众，一概回家，切不要轻听谣言，自造恐慌。（四）本军粮秣，请帮助操办，决照价付金。（五）请即派代表前来接洽。

与此同时，红军发出了“严禁入寺庙”的告示，通令全军指战员不准进入寺庙。为保证寺内安全，红军还派出卫兵到寺院大门站岗。

红军正确的政策，严明的纪律，对待藏民的热情、真诚，及时消除了归化寺大小僧人的疑虑，他们都愿意为红军通过藏区尽力。

五月二日，贺龙等一行四十余人应邀进入归化寺作客，受到全寺僧众的热烈欢迎，掌教八大老僧及三十余名喇嘛迎接贺龙一行进入大寺“直仓”（佛厅）。归化寺还破例为贺龙一行举行了“跳神”仪式（一种宗教仪式，每年冬月举行，以庆祝丰收，祈祷吉祥如意）。在“跳神”仪式上，贺龙将写有“兴盛番族”四个大字的锦幛赠送给归化寺，祝愿藏族人民繁荣昌盛。这四个大字充分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深得藏族各界人士的赞同。八大老僧当即表示拥护红军，愿为红军效力。五月三日、四日，归化寺及喇嘛、商人、富户打开仓库，出售了三万余斤青棵和大量的盐巴、红糖。两天中，红军共筹集粮食约十万斤。夏拿古瓦等人更是为红军日夜奔忙，作了许多工作。红军在进行物资准备的同时，积极进行了政治思想工作，为通过藏区、进军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作好思想准备。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十六师举行了连以上干部参加的活动分子会议，明确提出红军当前的任务，是要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过雪山、草地北上，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创建西北根据地。同时指出了红二、六军团党团员目前的任务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等重大问题。红六军团政治部召开了军团直属队和红十七师的政治干部会议，王震报告了目前形势和任务，张子意讲了关于民族政策问题。

中甸休整，为红二、六军团继续进行艰苦的长征作了一定的思想和物资

准备，但筹集到的粮食、衣服、救急药品、火镰等物资仍很不足，因此，部队只好提早行动。五月五日，红二、六军团分为两个纵队由中甸出发。红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得荣、巴塘、白玉，红六军团为右纵队，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向甘孜前进。红二军团在去甘孜的路上，翻越了三座大雪山，红六军团在瓮水、那坡也翻越了两座大雪山。为保障部队胜利地通过雪山地区，红二、六军团根据翻越哈巴雪山的经验，在艰苦的行军中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动员和细致的组织工作。如通过雪山前派人深入居民访问，取得通过雪山的知识；认真分析了每个同志的身体情况，发动党团员和体力强壮的同志帮助体弱有病的同志；强调各级干部亲自作好收容工作；运用一切牲口驮运伤病员；教育部队严守雪山行军纪律等等。虽然经过种种努力，但因高山缺氧，饥寒交迫，仍然有许多干部、战士倒在了雪山上。

红二、六军团在北上的艰苦行军中，为争取藏民支援，沿途张贴布告，说明取道川康北上抗日的目的，并请藏民吃饭，开茶话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凡取用藏民的粮食，均按价留下银元和信件；严禁骡马闯放青苗，切实保护群众利益。由于红军正确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严守纪律，秋毫无犯，深得藏民的拥护，许多藏民向红军献哈达，送糌粑、酥油、牛羊，出售粮食，自动给部队带路，并用牦牛驮送红军掉队人员。

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反动宣传和少数藏族上层反动分子对红军的仇视，红军在通过藏区时，也遇到反动藏骑的袭扰。红二军团五月七日在桥头、六月二日在仁波寺、四日在巴塘以南的金沙江边，曾数次与藏族反动骑兵接触。在桥头战斗中，红四师参谋长汤福林、第十二团参谋长高利国阵亡。

甘孜会师

翻越雪山之后，红六军团五月三十日离开稻城，六月三日，在理化以南的甲洼与远道前来迎接的三十二军胜利会师。

为了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到来，红四方面军总部曾专门对部队进行了动员和布置，要求各部队大力开展迎接红二、六军团的组织准备工作。徐向前在动员会上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有搞好，要接受教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会后，各部队广泛地进行了迎接会师的政治动员和各项准备工作，热烈展开了赶制慰问品的活动，如捻毛线，织毛衣、毛裤，缝制皮衣等。在地方群众中，也普遍地进行了欢迎红二、六军团的宣传教育。

红二、六军团为了迎接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也对部队进行了团结友爱、遵守纪律的教育，要求会师后主动搞好团结，不利于红军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红军团结的事不做，大力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宣传中央红军在陕甘的胜利，宣传三大主力红军西北会师的美好前途，并号召指战员努力向英雄的红四方面军学习，从而为两军会师做好了思想准备。

六月七日，红六军团到达理化，休整几天后，十三日继续北进，十七日

进至新龙，受到了红四方面军四军的列队欢迎，并开了联欢大会。二十二日，部队到达甘孜的蒲玉隆，在这里又受到了红军总司令部首长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同志的迎接。六月三十日移驻甘海子。红二军团于六月初经巴塘北进，十九日进至白玉县城，三十日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与红三十军胜利会师。七月一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

此时，中共中央发来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情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上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者，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红二、六军团的到来，受到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沿途贴满了“欢迎横扫湘鄂川黔滇康的二、六军团”，“欢迎善打运动战的二、六军团”等巨幅标语。藏民群众也夹道欢迎。红二、六军团所到之处，群众载歌载舞，“耶莫！耶莫！”之声不断。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筹集大量的粮食、牛羊，腾出了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房子，准备了柴禾，烧好了开水，为红二、六军团准备了很好的宿营和生活条件，并且在自己也很困难的情况下，给红二、六军团指战员赠送了许多毛衣、毛袜。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两支兄弟部队之间深厚的阶级情谊和团结一致，使红二、六军团指战员深受感动。

七月二日，在甘孜举行了庆祝两大主力会师的盛大联欢会。朱德总司令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此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荒无人烟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他接着介绍了甘孜地区的情况，并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央去年带着一方面军胜利地通过草地，到达了抗日前哨阵地——陕甘地区。现在，陕甘边根据地巩固、扩大了，红军也壮大了。”朱德总司令的讲话，给了全体指战员以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接着，进行了文艺演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剧团演出了《迎亲人》和《红军舞》等精彩节目。

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后，朱德、刘伯承向红二、六军团的领导传达了张国焘的反党行径和党中央同张国焘斗争的情况以及在斗争中应遵循的方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等对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极为愤慨，毅然站在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上，从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愿望出发，坚决而又有策略地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展开了斗争。

六月二十三日，红六军团到达蒲玉隆时，朱德总司令就来到这里与肖克、王震等会了面，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七月一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率红二军团到达甘孜之甘海子，也会见了朱德总司令。

在这两次见面时，朱德总司令都详细地介绍了有关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等阴谋活动的情况。在会见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时，还拿出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的决定，以及中央严令张国焘率部北上的电报给他们看，并说，由于张国焘的错误，使红四方面军南下以后受到了严重挫折，最后退到了这里——西康的甘孜一带。经过党中央一再批评督促以及我和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及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斗争和要求，张国焘才被迫取消了非法中央并同意北上，但他还是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他反对中央的问题并没有

完全解决，“此时，我们的工作是做团结工作”，就是“如何想办法会合中央”。朱德总司令和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谈话后，刘伯承也来与贺龙、任弼时作了深谈。他说：“对张国焘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

从上述谈话中，红二、六军团领导得知朱德、张国焘发出的要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与他们会合北上北进的电报，虽是两人签署，但动机截然不同。朱德的意思是：“想把你们那边的力量拉过来，不然我们很孤立”，“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而张国焘则是妄图控制红二、六军团，以继续与中央对抗。当红二、六军团先后到达甲洼、绒坝岔、蒲玉隆、甘孜等地时，张国焘便立即对红二、六军团进行分化拉拢，如向红二、六军团派“工作组”煽动对党中央不满，散发反对党中央、批判“毛、周、张、博”的文件，宣扬他的右倾分裂路线等等。但是，红二、六军团领导对张国焘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贺龙说，在绒坝岔，任弼时就给甘泗淇写了信，要求对张国焘指示发来的文件一律不准下发。贺龙看了张国焘派人送来的《干部必读》小册子后，也严肃地说，“张国焘分裂中央是错误的，这个材料不能发”，还立即电话通知红二、六军团各部队“把接到的小册子统统收起来”。王震说：“甘孜休息时，张国焘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去谈话，送给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说我们勇敢、能打。”当时，张国焘想把红六军团拉过去。王震对张国焘说：“我们这个部队是井冈山的，是毛主席领导成长的，不能反毛。”张国焘还向任弼时提出，召开红二、四方面军联席会议，企图以多压少，迫使红二、六军团就范。任弼时当即以“谁来作报告，如果有不同意见，结论怎么做”为由拒绝了他。后来，张国焘又想换掉红二、六军团师以上的四个政治委员，也未能得逞。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甘孜会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红二、六军团的到来，增强了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力量，对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引自 1960 年 11 月 9 日《朱德委员长谈红二方面军渡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前后的经过情况纪要》。

引自 1960 年 11 月 9 日《朱德委员长谈红二方面军渡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前后的经过情况纪要》。

引自 1960 年 11 月 22 日《王震部长谈二、六军团会合后，在湘鄂川黔边革命斗争和长征、过金沙江等问题纪要》。

第三节 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通过草地

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组织红二方面军及干部任职的命令。命令说：“决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织二方面军，并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兼二军政治委员，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一副政治委员，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治委员。”第二军下辖：第四师，师长卢冬生，政治委员洗恒汉；第六师，师长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第六军下辖：第十六师，师长张辉，政治委员晏福生；第十七师，师长贺庆积，政治委员汤祥丰；第十八师，师长张振坤，政治委员余立金；模范师，师长刘转连，政治委员彭栋材。第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袁任远，政治部主任李干辉。第三十二军下辖：第九十四师，师长肖新槐，政治委员幸世修；第九十六师，师长王尚荣，政治委员谭友林。红二方面军的建立，使红二、六军团又得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

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任弼时在朱德的建议下，跟随红军总部行动。他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的双重身分，亲自去做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人的工作。同时，与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干部广泛进行交谈，了解思想情况，努力增强团结。他还向中共中央建议，在红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开一次中央会议，交流思想，统一认识，加强党在策略路线基础上的团结一致。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和红四方面军领导的一致赞同。任弼时的上述行动，为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后来徐向前在回忆这一情况时说：“任弼时同志高度评价两军会合后的团结气氛，积极地为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而努力”，“实事求是，珍重团结之情，溢于言表”。

七月二日至十日，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向甘南进发。继红四方面军之后，红二方面军也组成两个梯队，于七月十一日由甘孜的东谷出发，在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跟进，拟经日庆、西倾寺、阿坝、包座等地向哈达铺地区前进。这时，刘伯承根据朱德的指示，来到红二方面军指导工作。部队行动之前，认真地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准备：一是深入地进行思想动员，反复讲明通过草地的具体困难和有利条件，号召大家发扬团结友爱精神，克服困难，坚持北上与党中央会合；二是积极筹集粮食、衣服、草鞋和帐篷等物，尽力做好物质准备。

甘孜北上，经过的最艰苦地段是人迹罕至的大草原。举目望去，荒野一片，不见村庄，不见人烟，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部从终日行进于荒凉的原野，有时还蹒跚于深草泥坑。这里，地处高原，空气稀薄，天气多变，忽而晴空万里，忽而阴云密布，忽而大雨淋漓，忽而风雪交加，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克服很大的困难。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粮食奇缺，尽一切可能寻找可以食用的东西，力争不因饥饿致死，是面临的最严重的斗争。部队从甘孜出发时，虽经多方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但只筹集到七八天的粮食。原计划十天后即可到达阿坝，由于沿途得不到粮食补充，条件十分恶劣，干部、战士体

二军、六军即红二军团、红六军团。

力异常虚弱，走了二十多天才到达目的地。开始，每人每天尚能分到三两青裸粉子，后来，连这一点最低的需要也很难保证了，只得以野菜、牛羊皮和牛羊骨来充饥，有的把草鞋上的牛皮筋烤焦或煮熟吃了。最困难时，甚至连野菜、牛羊皮也无从取得，致使不少干部、战士含着野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维持部队的生存，尽力减少减员，领导上明确提出了“粮食就是生命，粮食就是政治”的口号，动员全体同志严格地节约粮食，互相调济，彼此帮助，优先照顾伤病人员。七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六日，部队先后到达阿坝，在这里全军上下一齐动员，积极筹措粮食，但因居民稀少，粮食有限，所得无几，远远不能满足部队需要，无奈，只得忍着饥饿，继续前进。从阿坝到包座，有一大段水草地带。这里，到处是沮洳地和腐烂的野草，地面松软，污水四溢，部队行进中，一步一陷，拖泥带水，极为艰难。一旦不慎陷入泥沼，往往会愈陷愈深，以至泥水没顶，丧失生命。特别是一些低洼处，野草丛生，腐烂有毒，腿脚刺破浸水后就会浮肿溃烂。如若误饮毒水，更有致命危险。部队艰苦跋涉，历时六天才走出这段险恶的地带。在过草地的那些日日夜夜里，可以说，每个红军指战员，每时每刻都处在为维持生命、争取生存的斗争之中。所以，当走出草地，看到了村落，看到了群众，看到了田野，看到了牛羊，每个干部、战士都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发自肺腑的喜悦心情，仿佛从死亡的世界又重新回到了人间。

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为了保证部队顺利地通过草地，共同北上，中共中央于七月二十七日决定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同时，各级党的组织在部队中不间断地开展了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明确提出了“走出草地就是胜利”的战斗口号，使部队在艰难困苦中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强调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要想方设法，解决饥饿问题，战胜困难，坚持前进；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为人表率，与战士同甘共苦；动员干部、战士发扬高度的阶级友爱和团结互助精神，争取胜利。此外，还大力加强了收容工作，尽量不使伤病的干部、战士落伍掉队，以保持部队的实力。

在通过草地过程中，中共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曾于八月三日致电西方野战军（即红一方面军）和各军团、各军领导人，部署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电报说：红二、四方面军“不日全部集中阿西、巴西、包座以北，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配合一方面军消灭甘肃敌人，求得三个方面军大会合，发展西北抗日新局面”。电报要求：迅速“向全体指战员宣布此项消息，号召全体指战员准备以热烈的同志的精神欢迎他们”。任弼时也于八月九日在救济寺发出了给贺龙、关向应、肖克、甘泗淇的信，对红二方面军的同志应当如何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促进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合提出了要求。信中说：

“我这次随朱、张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进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同志谈话，大家对党的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的问题。陕北同志亦同样是认为迫切需要的，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我对陕北同志建议召集中央全体会议（一、二、四方面军靠近和会合时），已得到他们的同意。现国际正讨论这一问题，大概是可能批准这一会议的召集。我现在正在这边同志中要求他们将来在六中全会上（作）很客观、

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根据目前的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重新估计过去中央的领导。六中全会应着重在目前形势与战斗任务的讨论，对粉碎五次围剿斗争经验只需在主要问题上提出原则性的讨论，而应避免一些枝节不甚重要，而且争论也无良好结果的小问题。

“此外，我已向总政治部提出并已得同意，立即在二、四方面军开始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在四方面军中应消除一切成见和不好的印象。须有良好的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准备，以期在大会合时三个方面军的完全兄弟的亲密的团结一致。同时，我已向陕北建议，在一方面军中也进行同样的动员和准备，已得他们回电，现正在一方面军及独立军师团地方部队中进行这种动员。陕北最近有一告二、四方面军同志书，我们也准备用二、四方面军首长名义致书一方面军战士，以互相勉励，准备大会合。

“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必要时将来可以二方面军指战员名义发一告一、四方面军同志书，这将来到哈达铺时（岷州、西固之间人口稠密的地方）再面谈决定。目前即应在二方面军中进行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和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

任弼时的这封信得到了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一致赞同。八月十六日，贺龙、肖克、关向应致电任弼时说：“（一）在救济寺留的信，我已收到。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斗争。（二）赞成以二方面军的名义出一告一、四方面军的书。（三）你务必在哈达铺归还二方面军。”任弼时高瞻远瞩、顾全大局，为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一致，为开创西北的新局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在近两个月的艰苦行军中，红二方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胜利地通过了广袤荒凉的草地，并且有效地保存了部队的有生力量。九月一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红二军团先头部队到达哈达铺，红六军团进至礼县并攻打礼县县城，由于攻城未克，遂于九月三日撤至祁家窑一带休整。九月六日，红二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全部到达哈达铺地区。这时，任弼时即从红军总部回到了红二方面军。红二军团第五师于九月七日正式改为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

甘南战役

红二、四方面军通过草地时，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非常有利。红二、四方面军已经占领了腊子口、大草滩、哈达铺、临潭、漳县、渭源和通渭等地；西进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红一方面军已经占领了定边、盐池、洪德、同心等十多个城镇，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形势已经形成，全国的抗日高潮也正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了国际国内形势，并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党和红军战略任务的首位，制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积极同蒋介石政府及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分别进行统战谈判，并大力开展群众抗日活动，以推动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道路。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冬季以前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指出红军三个方面军行动的基本方针是：（一）逼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二）紧密地联合东北军，

并进行西北其他各部的联合谈判，造成西北新局面；（三）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准备冬季打通苏联；（四）发展甘南作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同时巩固与发展陕南苏区，使之与陕北、甘北相呼应；（五）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九月八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又说：“从三月起中央已开始同南京政府秘密谈判。”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推动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当即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确定的方针，并且指出：“为着不放弃全国极有利的局面，使我党能够担负起当前的艰巨任务，我们深切感到党内的团结一致与建立绝对统一集中最高领导力量是万分迫切需要的。……在蒋敌进攻严重关头，我一、二、四方面军只有密切关系，在一致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能造成西北新局面，而不致被敌各个击破。”再次表示了红二方面军坚持党的团结，坚决反对分裂，拥护中共中央领导，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的决心。

在全国抗日形势日益发展，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合的情况下，蒋介石置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正确方针于不顾，一方面加紧解决“两广事件”，准备把胡宗南部由湖南迅速调到陕甘；另一方面命令位于定西、陇西和武山地区的国民党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和位于天水、秦安和武都地区的国民党第三军王钧部，阻止红军会合；同时，阴谋撤换张学良，强迫东北军和西北军执行他的“剿共”计划，进攻红一、二、四方面军。为了阻止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件”后增调嫡系胡宗南部进入甘肃，九月初，中央军委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要求：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保卫苏区，主力占领海源、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作战；红二、四方面军兵分两路，红四方面军为左路，占领岷州、武山等地，继续向东向北，会同红一方面军向定西、陇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与消灭敌毛炳文所部，红二方面军为右路，东出甘南和陕西省西南部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和宝鸡，建立苏区，东与陕南苏区，西同甘南苏区相联系；以这一行动，实现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并准备打击与消灭胡宗南部，以巩固与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进而迫使蒋介石与红军谈判，以推动全国的抗日民族战争。

根据中央军委的计划，红二方面军总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七日在哈达铺研究制定了成（县）徽（县）两（当县）康（县）战役计划，八日发布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命令提出：“我方面军决乘甘陕敌人分兵据城的弱点，透过其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凤县、略阳、康县之敌而袭取之，建立临时根据地，配合一、四方面军行动，求得三个方面军会合，战役任务期于九月底完成。”为了达成上述任务，红二方面军不顾部队刚出草地，减员很大，体力虚弱，未及休整等困难，于九月十一日和十二日，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由于广大指战员士气高昂，行动迅速，进攻方向又恰是国民党第三军王钧部与川军孙震部的中间地带，敌人守备相当薄弱，因此，进展顺利。左路纵队红六军团沿礼县崖城、红河、罗家堡、天水县娘娘坝、徽县高板一线，向两当前进，十四日，红十七师途经礼县罗家堡时，发现王钧部护送电台的第二十一旅一个连，当即发起攻击，将敌全部歼灭，俘敌四十多人，缴获十五瓦电台一部，各种枪四十多支。十六日，红六军团十六师在娘娘坝又歼敌一个连。后敌人进行疯狂反扑，十六师师长张辉在作战中光荣牺牲。十

七日，红六军团进至徽县马家庄后即分兵两路：红十八师南下徽县之永宁，红十六师、十七师直捣两当。十八日凌晨，红十六师、十七师先头部队五十多人进抵两当城下，在预先打入两当县保安队内部的党的兵运工作者的配合下，一枪未发，即生俘保安队员和警察九十七人，缴获步枪二百余支，子弹四十箱，服装三百多套。清晨，红十六师、十七师主力进驻县城。入城后，各部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张贴标语，走访群众，出示布告，稳定人心。同日，红十八师从永宁出发，攻克了徽县县城。

中路纵队红二军团四师和红三十二军，十一日从理川出发后，经礼县之上坪、洮坪、江口，两和县之姜席、十里，成县之纸坊镇等地，长驱直入，奔袭成县。十七日发起攻取成县县城的战斗，歼敌王钧部一个营，缴获各种枪三百余支，胜利占领县城。接着，红六军团十八师将徽县县城移交红二军团四师后，回师永宁。红六军团十六师、十七师于二十日东攻陕西凤县，但因敌众我寡，久攻未下，遂返回两当县开展群众工作。红三十二军在成县一带活动。

右路纵队红二军团第六师，十二日从岩昌镇出发后，一路风餐露宿，跋山涉水，沿礼县之白河、桥头、肖良、三峪、西河、大桥一线，进击康县，十九日顺利攻克县城。接着，迅速东进，威逼陕西略阳县城。尔后，该师第十六团和第十八团由略阳进至徽县，十七团则留在康县一带开展群众工作。

从九月十一日到二十日，红二方面军以十天时间，长途奔袭，英勇作战，胜利攻占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并占领了陕西略阳、凤县的部分地区，圆满地完成了成徽两康战役计划。九月二十五日，国民党王钧部第三十五旅及补充团，由武都向成县反扑。二十六日，红三十二军及红二军团四师十一团在成县西之大船坝、小川镇一带迎敌。二十七日，红二方面军总部命令红二军团开往成县，与红三十二军密切配合，伏击敌人，给敌王钧部第三十五旅以严重打击，共打死打伤敌人数百名，俘虏三百余人。在战斗中，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政治委员周成宏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红三十二军和红二军团均移师徽县之红川一带。

成徽两康战役结束后，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这一地区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的指示，红二方面军一方面以一部分兵力继续围攻凤县、略阳，一方面抽出大批力量开展群众工作。当时正值秋收季节，红军战士热情地帮助群众抢收庄稼。每逢集日，还敲锣打鼓走上街头，宣传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表演反映群众革命斗争的文艺节目，给青少年教唱《我们红军打土豪》等革命歌曲。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很快，许多人主动为部队腾出住房，给部队送水送饭，传递消息，不少青年踊跃参军，革命热情极为高涨。

在普遍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红二方面军积极帮助建立革命政权，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九月十九日，方面军总部在成县召开了几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成立了成县苏维埃政府，并组织了陇南抗日游击队。二十日，红六军团领导机关在两当县城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两当县苏维埃政府，并组织了两当县农会和“两当县义勇军”。二十一日，红二方面军总部在徽县城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徽县苏维埃政府，并组织了东河、东关、东关口、东柳沟四个抗日委员会。为了开展游击战争，红二方面军总部还帮助建立了一支拥有一千多人的徽县工农游击大队。在康县，红二军团六师也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康县苏维埃政府。地方革命政权建立后，领导当地群众斗地主，打土

豪，分发胜利果实，为红军筹粮筹款，发动青年参加红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仅半月时间，红二方面军就吸收新战士两千多名，并筹集了大批抗日资财。

经过红二方面军的英勇战斗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成徽两康地区成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新的战略区域，形成了与陕甘宁根据地和红一、四方面军在西北地区几方呼应的有利局面。

将台堡会师

在红二方面军挥师东进遂行成徽两康战役任务的同时，红一方面军也从宁夏的豫旺县城一带开始西出，红四方面军则按预定计划，进入岷（州）洮（州）西（固）地区。红一、二、四方面军日益接近，形成了南北夹击敌人的有利态势。

蒋介石于九月初解决了“两广事变”之后，就急调胡宗南部兼程北返，抢占西兰公路的静（宁）会（宁）定（西）段，企图截断东北军主力同其驻兰州部队的联络，控制东北军，并隔断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的道路。同时，命令位于定西、陇西、武山地区之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向陇西集结；令位于秦安、天水、西固、武都地区的第三军王钧部以主力向武山地区集结；令川军第四十一军孙震部由绵阳、碧口等地向北推进至武都、西固一带，协同青海马步芳部进攻红四方面军；令第二十五、四十九、五十一、一四师以及第三军、东北军、西北军和川军各一部，向陕甘南部边境之成县、凤县、略阳、康县地区推进，围堵红二方面军；令宁夏马鸿逵部和在甘肃固原及其以北的何柱国、马鸿宾部南北对进，夹击清水河以西的红一方面军主力。

为了迅速实现三个方面军的会合，中央军委根据这种情况于九月十四日下达了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以打击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为主要目的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这一计划的实施，是消灭胡宗南部，实现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发展西北新局面，以至推动全国抗战的关键。在战役计划下发的同时，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了号召，指出：“在这一对中国红军的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展有着决定意义的战略计划中，我红军的三个方面军需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红二方面军领导接到战役计划后，对三个方面军战略方针上的统一感到非常高兴，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九月二十一日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林育英、洛甫、周恩来、彭德怀等，表示热烈拥护。电报说：“静、会战役不独是适合当前的军事、政治形势上需要之正确决定，且是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能得到统一集中领导之正确决定……，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我党与中国革命最可喜庆之条件。”为了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红二方面军当即决定红六军团进到宝鸡地区，牵敌西进，策应红一、四方面军作战。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整个战役计划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结果非但没有消灭胡宗南部，反而使胡宗南部乘机由西安进至清水、秦安、庄浪地区，同毛炳文和王钧部靠拢了。王钧第三十五旅及补充团还乘机向成县发动了进攻。川军孙震部也由武都进至康县一带，企图

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46页。

引自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同胡宗南部、毛炳文部南北夹击红二方面军，致使红二方面军陷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据此，红二方面军遂于十月一日致电中央军委，就部队的行动问题提出了建议。电报说：“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县后”，“我活动内幅狭小，地区贫苦，人口稀少，不利于我扩大、筹资与林整。我们建议在现地一星期后，我方面军即出动，经天水、宝鸡间北渡渭河，至渭水、张家川、莲花镇地域”。十月二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放弃成、徽、两、康地区迅速北进。十月三日，方面军在徽县发布北进会合红一、四方面军的命令，命令指出：“我方面军具有会合第一、四两方面军协同作战之目的，由现地经天水、甘谷、与（于）麻沿河、永兴镇、武山的中间地带进到通渭地域，并相机消灭相遇的敌人单个兵团。”十月四日即以红六军团为右纵队，红二军团及红三十二军为左纵队，向北转移。

红二方面军的转移行动是在缺乏必要的掩护下进行的，一直处于十分仓促被动的局面。决定转移时，部队分布于徽县、两当、康县地区，成县已被敌王钧部占领。川敌孙震部正急速由武都向康县迫近。为了抢渡渭水并且摆脱当面敌人的压迫，红二方面军主力不得不先行出发，致使分散在康县活动的红二军团六师十七团收拢不及，遭敌优势兵力之截击包围，失去了与领导机关的联系。根据当时的情况，方面军决定，主力经高桥镇、横河镇，在甘谷以西的乐善镇附近抢渡渭水，然后，继续挥师北上。胡宗南、毛炳文、王钧等部很快觉察并利用了红军行动中的弱点，倾其全力，无所顾忌地向红二方面军进逼，致使红二方面军在向北转移过程中，前有胡宗南、毛炳文部的堵截，后有王钧部的追击，处境极为不利。部队由成、徽、两、康向渭水前进时，曾于甘谷以南的盐关镇遭敌伏击，红六军团损失很大，红十六师政治委员晏福生负伤。十月十日抢渡渭水时，适逢上游暴雨，河水猛涨，因情况危急不得不冒险徒涉，又有不少同志光荣牺牲。渡过渭水之后，仍不断地遭敌地面部队的堵截和飞机的袭扰，给转移造成很大困难。

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红二方面军奋勇苦战，夺路前进，于十月二十二日，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至此，红二方面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一年，转战湘、黔、滇、康、川、甘、青、陕八省，行程二万余里，大小战斗一百一十多次的伟大长征。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是胜利的、成功的，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尚有一万一千多人。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毛泽东在陕西保安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同志时，高兴地赞扬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他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尽管如此，红二方面军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也还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的，共减员约一万数千人。

会师以后，第三团政治委员肖锋代表红一方面军把数万斤粮食，两千多只羊，二十多头牛，三十多头猪，一千多套棉衣，数万张羊皮，五百匹布和三万块现洋送给红二方面军。当红二方面军到达陕甘边境时，中共中央又派邓小平等前往慰问，并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后来，中共中央又派周恩来带着人民剧社对红二、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在洪德城为红二方面军进行了文艺演出。在这里，周恩来和贺龙两位南昌起义的战友亲切会面。一九六一年，贺龙回忆说：“三个方面

军会合后，周恩来由保安到洪德城，他和我见面后，曾问我三个方面军会合后怎么办，我说，统一归彭指挥吧！那是我们二方面军再次表示态度拥护中央。”在那次文艺演出中，红二方面军的同志深深地为人民剧社充满革命激情的文艺演出所感动。贺龙看了演出节目后，兴奋极了，当场就说一定要搞一个这样的剧社！与贺龙一起看演出的周恩来指着坐在一旁的人民剧社社长危拱之对贺龙说，好嘛，叫你们宣传队跟我一起走，让危拱之同志帮助你们好好训练一下。贺龙提出剧社名称就叫“战斗剧社”。将台堡会师后，任弼时奉命调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任总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职务由关向应接替。

第四节 总结长征的经验教训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妄图聚歼红军阴谋的彻底破产，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已经胜利地完成了一九三四年秋开始的战略转移的历史任务，给全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展示了光辉灿烂的前景，有力地推动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高潮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但是，蒋介石集团仍然顽固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坚持对红军实行“围剿”，他们不顾民族危机与全国人民的意愿，无视中国共产党一再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乘红军从会宁及其东西地区北移时，调集十几个师的兵力分四路由南向北大举进犯，妄图将红军消灭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其部署是：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两个师为一路，王钧第三军两个师和关麟征第二十五师为一路，经会宁向靖远攻击前进；胡宗南第一军四个师为一路，经静宁向打拉池、古西安州进行主要突击；王以哲、何柱国指挥东北军步兵约五个师、骑兵三个师以及马鸿宾第三十五师残部为一路，由隆德、固原地区北进，以保证胡宗南部右翼安全。同时，在西线和北线，以东北军第一一四师由兰州附近进抵一条山，以邓宝珊新编第一军一部固守靖远城，以马鸿逵新编第七师担任中卫、中宁及其以东地段河防，马步青骑兵第五师担任中卫、靖远段河防，防堵红军渡黄河北上或西进。

为粉碎敌人的上述阴谋，中央军委对部队行动进行了具体部署。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红二方面军担负防御掩护任务，于十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先后于海源的硝河城、马营、关桥堡和河家堡等地与敌接触。战斗中，红二军团第四师十团参谋长带领的一个连和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团长刘子昆带领的两个连，在海源以南的脱烈堡和海源以北的上下龙池湾遭强敌包围，突围作战中受到很大损失。此后，红二方面军又于十一月中旬开始，投入了山城堡战役。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在山城堡与洪德城之间的水头堡集结，准备策应。红六军团与红一方面军第八十一师之特务团、教导营在洪德城、环县一线以西地区，迟滞东北军。三个方面军密切协调配合，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对山城堡之敌发起攻击，当日黄昏一举攻克，取得了歼敌胡宗南部一个多旅的重大胜利。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大振了红军的声威，转变了被动的局面。同时，进一步加深了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分化了敌人的营垒，对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山城堡战役之后，红二方面军即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在环县以西地区进行休整，对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长征进行了检查总结，既肯定了成功的经验，又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了一次深刻、生动的政治和军事路线的教育，对迎接新的民族解放战争，作了思想和政治上的准备。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任弼时提出了《关于二、六军团长征的总结与二方面军发展前途及目前任务报告大纲》。其要点是：（一）长征的胜利结束，开始了红二方面军胜利发展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达到了全国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合；有苏区根据地作为我们发展的依托；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完成战斗任务；到达了抗日的前沿阵地，准备直接参加抗日战争。（二）红二、六军团长征的胜利使蒋介石追堵计划又一次遭到了失败，再一次证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它扩大了党和苏维

埃的政治影响，兴奋了全国民众，保存了（红二方面军）基本的有生力量，促成了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师和党的团结。大会师对中国和国际斗争都有深刻影响。红二方面军所以能够取得长征的胜利，是因为：广大指战员英勇果敢，艰苦奋斗；发扬了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和所有指战员政治上的坚定性；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及军委的政治及军事路线；全国红军革命力量的配合与广大群众的拥护。（三）目前形势和红二方面军的发展前途：国际国内事变和统一战线政策顺利开展；正确地估计自己的成功、胜利和现有力量以及方面军壮大的经验教训；反对一切对形势和力量估计不足的各种不正确倾向；准备迎接一切新的发展与壮大。（四）我们的基本任务是要与日本强盗直接作战，中国红军要成为“抗日联军”（指红军同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他抗日军队之联合）的模范，落后的要赶上先进的，不仅长于运动战，而且能进行阵地战。目前的任务，一是突出军事政治教育，培养成为军事上、政治上、党的领导上坚强的党军；二是整理军事政治组织，消灭一切长征后的疲劳和游击主义，严肃党纪和军纪；三是严密的巩固部队，防止可能和存在的一切减员现象；四是整顿政治纪律，改变群众关系。（五）我们的弱点、错误与主要经验教训是：未能在湘黔边创建根据地是因为未精确估计到敌人新“围剿”的部署，因而在湘中时兵力过于分散，失去了一些消灭敌人的良机；同时，瓦屋场、便水战斗又未能给敌人以有力打击，造成了被动不利的局势。未能在川黔滇边——黔大毕创建根据地，是因为进入黔西后未能乘胜占领有战略意义之地带，乘敌调动兵力、部署未妥之机集结我军主力坚决各个击破；同时，对敌估计也有错误，如对万耀煌急进估计不够。我们所得之主要经验有：突围长征，要有战斗准备和决心，采取逐步转进策略，这可减少部队连续行军之疲劳，不致削弱原有战斗力量，并可利用停留时间争取补充人员、筹集资财、进行群众工作。为着顺利创造新的根据地，必须在到达预定地域前，求得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必须在到达预定地域后，迅速占领主要方向的战略要地，并忍耐暂时之疲劳，集结主力乘敌调动之机各个击破，必须不失时机的以主力伸出根据地以外，迎击单个前进之敌，或调动敌人于有利地带求得消灭之良机，必须力求连续战斗的胜利，只有连续战斗的胜利才能保持新根据地的基本地区。在远征行进中，除特殊情况外，不应放弃能够取得大小胜利的战斗；在特殊条件下，可采取迅速果敢之行动，不惜短时之疲劳和不可避免之减员。同时，在作战方法上应声东击西，尽量迷惑、疲困和调动敌人，使自己能掌握主动，造成敌疲我利的局势。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在各部队普遍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总结报告》。总结报告分从长征出发到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从甘孜北上至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两个阶段，对长征过程中的政治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具体的总结。

第三章 进行抗日准备，迎接 民族解放战争

第一节 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策略路线教育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蒋介石调集二三十万嫡系部队到陕甘宁边区，准备对红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围攻，同时，亲自飞到西安，妄图驱使具有联共抗日倾向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积极“剿共”。为了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张学良、杨虎城于十二月十二日发动了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对于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红二方面军迅速对部队进行了传达教育，并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立即从洪德城地区出发，经环县、庆阳进到了陕西的三原、云阳镇地区，勘察地形，构筑工事，进行思想动员，准备进行战斗。

后来，由于中共中央采取正确的方针，使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提出了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国民党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随后，中共中央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并于五月在延安召开了党代表会议。会议明确指出：停止内战，争取国内和平的阶段已经过去，今后的策略方针是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日而奋斗。

在这一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面前，红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跟得上革命形势发展的。但也有少数干部、战士对若干具体问题，如释放蒋介石、暂时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以及红军准备改变名称等一时思想不通。有的甚至说：“进行了几年的斗争，换得了国民党的一顶帽子。”更有少数人，经不起和平环境的考验，产生了安于享乐、斗志松懈的情绪。为了使部队充分认识党的路线的正确，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而斗争，保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以及红军的阶级本质和光荣传统，以便保证部队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胜利转变，完成抗日的一切准备，红二方面军移驻陕西富平地区后，即遵照红军总政治部的指示，发出了建设模范党军的号召，以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为中心，针对部队的具体思想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教育：对那些一时思想不通的干部、战士，进行了艰苦的说服解释工作；对少数贪图享乐、斗志松懈的人，进行了必要的批评帮助；并且从一九三七年二月起，对每个党员的思想和工作，进行了检查、鉴定，表扬和奖励了许多好党员，开展了反不良倾向的斗争。同时，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基础知识编成教材，在党内进行了系统的教育，使大家认识到释放蒋介石、暂时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以及红军准备改变名称等，都是为了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日，争取抗战胜利所采取的必要步骤。明确了党是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力量，红军永远是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政府，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始终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这次思想教育收效很 514 大，干部、战士进一步端正了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克服了部队中存在的不良倾向，党员的政治水平和组织观念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模范作用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第二节 加强部队的党组织建设和军政训练

在党的组织方面，从一九三七年二月开始，普遍进行了党的组织的整理。当时，红二方面军政治部派出了大批干部深入连队帮助工作，各军、师都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具体地进行了布置，各个基层党支部以及党的小组也都进行了思想动员，使大家了解了整理党的组织的意义和重要性。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部队的党的小组、支部和总支普遍进行了改选，凡有二十五名以上党员的支部、支部委员会都有支书和组织、宣传、地方、抗日、青年等六个委员，统一了支部委员会的组成。经过这次整顿，有二百八十六名新的党员活动分子参加了各级党的领导工作。同时，二月的一个月里，就发展了五百二十五名新党员，使党员在部队中的比例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五以上。师、团分别集训了支书、支委和小组长。方面军政治部还统一规定了整个部队的党日制度。因此，党的组织健全了，党的领导加强了，党的生活活跃了，党的力量壮大了。

在部队训练方面，积极进行了系统的大规模的军事训练。训练中注意把干部教育放在第一位，认真抓好各级干部的学习和训练。方面军组成了教导团，设五个大队，第一、二大队训练团的干部，第三大队训练营、连干部，第四大队训练青年学生（主要是高中毕业生），第五大队训练参谋人员。各级领导对战士的教育也抓得很紧，以期迅速地使每个战士都具有一定的干部的素质，以适应大发展的形势的需要。当时的军事训练，着重于投弹、刺杀和射击，同时，开办了机关枪训练班和通讯技术训练班；在战术上，实施了由单兵到连进攻的训练，并注重实兵对抗演习。

在政治教育方面，干部学习了《论帝国主义》、《党的建设》，以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列宁主义问题》等课程，战士学习了《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到何处，中国人民应该怎样入《红军是抗日的中坚领导力量》等。整个的政治教育以民族革命教育为中心，同时也进行了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教育和阶级教育。为了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还普遍开展了识字运动，并学习算术和自然常识。部队如同一所大学校，学文习武，生气勃勃，全军上下为着献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如饥似渴地学知识、求上进，形成了空前的学习热潮。

第三节 积极准备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在加强部队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军事训练的基础上，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红二方面军于陈炉镇召开了党代表大会。任弼时作了政治报告，贺龙、关向应、甘泗淇等讲了话。与会代表对报告和讲话进行了认真讨论，并通过了《二方面军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认为：“党中央的基本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要“坚决地为实现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而斗争”。决议明确提出了新形势下红二方面军的建设方针和任务，指出：“在巩固国内和平与对日抗战的时期中，红军的巩固与军事、政治的强化，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就要求继续不倦地巩固红军（即或改变了名称），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保障党在红军中绝对的领导与红军的独立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更顺利地进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红军同时要继续保卫苏维埃区域（即或改变了名称），因为苏维埃区域，在现时是中国唯一的民主政权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最可靠的支柱。红军应以极大的力量担负组织人民和友军对日作战的任务，学习新的领导群众斗争的艺术与创造新的经验和新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决议要求红二方面军必须进一步加强部队的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使每一个共产党员和红色战士都能了解党的政策、路线和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认清红军与其他军队的区别；不断地提高军事素质，健全各种制度和军事生活，保持部队艰苦奋斗的作风；加强干部的无产阶级党性的锻炼，提高在土地革命斗争中久经锻炼的领导骨干的水平；加强部队党的建设，进一步健全党的组织与各级党的领导，搞好党的教育，正确地开展思想斗争，一方面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反对放弃党的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不断地扩大红军部队，开展争取友军的工作。大会最后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红二方面军委员会。这次党代表大会，对于保证部队忠诚不渝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以及保证部队胜利地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战争，完成抗战的一切准备，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次党代表大会把部队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大会后，各部队在军事、政治和文化学习上，相继开展了竞赛，部队工作更加活跃。各连队都恢复了列宁室，广泛地开展了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连队还建立了“战斗剧社小组”和“奋斗剧社小组”，抽调活泼的青年战士到剧团学习歌舞、戏剧，做到了每个连队都能自己组织晚会。同时，还以团为单位，组织了“战斗”或“奋斗”体育社，发动指战员参加球类、田径和拳术等体育活动。方面军政治部要求部队都要学会《誓死不做亡国奴》、《抗日先锋》、《武装上前线》、《保卫西北》等四首歌曲。为了更进一步地推动部队的教育和训练，五月三十日，方面军于庄里镇举行了首届运动大会，进行了军事（刺杀、投弹、射击）、政治（政治演讲、政治测验）、文化（墙报、识字、日记奖评）和体育娱乐的（球类、田径、唱歌）各项测验、比赛，检阅了部队训练的成绩。

整训期间，红二方面军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于五月间，积极地参加了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维护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另外，还奉命开展了一场反对军阀主义、游击主义的斗争。当时，反军阀主义的主要目标是方面军总指挥兼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反游击主义的主要目标是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为了消除这场错误斗争的影响，

后来，任弼时曾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专门发表文章，号召全党全军《向贺龙同志学习》。文章说：“贺龙同志是南昌起义的军事领袖，苏维埃革命时期的红军创造者之一”，“有指挥战争与建设军队的丰富经验”。“他对革命对党一贯忠诚”，“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是坚决而忠实地执行的，从不以军队势力和党对立，不把军队看得比党高。当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时，他是坚决反对张国焘所采取的反抗中央的行动的，在延安的一次反对张国焘路线的会议上，贺龙同志手指着张国焘说：‘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军阀了！’这说明了他是对党忠诚的，是反对军阀主义的……他还时常说，率领军队的党员，绝对不能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自己如果调动工作时，就希望代替自己工作的人，能够很快地把军队带得顺手，很就绪，否则自己心中是不安的。这说明了贺龙同志对党对革命的忠诚，说明了他是立场坚定，有原则性，有组织能力，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性格直率，富有魄力，大公无私的一个同志”。任弼时对红六军团和王震也有着深刻的了解。一九四四年十月，《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他指出：红六军团“是从当地群众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再发展到地方游击队，由游击队集合而成红军的”。这样产生的红军，特点是“与群众的关系比较密切”，“对地方党政一般他说服从习惯要好一些”，“干部的机动性和独立活动的能力强一些，士兵的觉悟程度、政治条件、政治基础也比较好一些”。“我们应该估计它的政治素质是好的，对这个部队的战斗力也应该估计是相当强的”。“那么湘赣这个部队有没有弱点呢？它是游击集合而成的队伍，民主性比较大一些，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它的长处，但是另一方面部队的散漫习气是大一些，我过去也是这样看法，它的战斗力相当强，但游击习气大一些”。他还说：“对于创造这个队伍，哪些人员是有功绩的，哪些同志是这个队伍历史发展上的重要人物呢？我们说从本队伍里面产生出来的重要人物应该是谭思聪、王震、谭家述等同志，这些人都应该作为这个部队的创造者”。任弼时的文章和谈话，对历史上这场斗争做了公正的评说。

为着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整训期间，红二方面军还大力进行了群众工作，运用各种方法，在驻地建立抗日团体，帮助地方党发展秘密组织，对友军和当地的上层人物广泛开展了统战工作，积极进行了抗日救国的宣传，并与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开展球类比赛、文艺演出等联欢活动，从而密切了军民关系，取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仅仅几个月，就有二千一百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

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以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各项工作突飞猛进，在政治、军事和组织上为抗日战争作了充分准备。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妄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表了抗日宣言。八月二十五日，红二方面军遵照红军总部的命令，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第一二师，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始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新历程。

引自《任弼时选集》第 275—276 页。

引自《任弼时选集》第 362 页。

基本总结

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七年七月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在这将近三年的时间里，红二方面军在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下，在贺龙、任弼时为首的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英勇地恢复和发展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们经过艰苦奋斗，胜利完成了由湘鄂川黔边到陕北的伟大长征；长征结束后，他们及时地、积极地进行抗日准备，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这一时期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的历史，是红二方面军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克服巨大困难和逐步摆脱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进而接受和执行正确路线的历史，是胜利发展的历史。

（一）

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的过程，是逐渐克服第三次“左”倾军事路线和逐步深入贯彻执行正确军事路线的过程。

湘西攻势是一次胜利的攻势，这一胜利开创了湘鄂川黔边斗争的新局面。当时，两军会师之后，对于部队的出击方向认识很不一致，但红二、六军团领导坚持认为，集中兵力向湘西展开攻势，避实就虚，避强击弱是最为有利的，并且从这一认识出发，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战斗行动。湘西攻势的胜利，是红二、六军团领导坚持正确的作战方针，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果断决策的结果。

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开始的时候，遵义会议刚刚开过。中共中央和军委为了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及时地电示红二、六军团，明确提出反“围剿”的总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接着，又发来了遵义会议的决议摘要。红二、六军团在粉碎敌人“围剿”的斗争中，总体上是依据遵义会议新的作战方针来指导作战行动的，但是，在反“围剿”的第一阶段，怕中心根据地丢掉，思想上还有单纯防御的残余，对转移到敌人翼侧后方隐蔽集结，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发生过失和弱点，使我们在决战中取得胜利的指示还缺乏深刻的了解”，不敢诱敌深入，总想在根据地边上打，几次重要战斗，都是被动地远出正面迎击敌人，因此，屡战不利，日益被动，以至被迫准备退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但是，当着放弃塔卧，丢掉包袱，行动自如了，陈家河——桃子溪一役就扭转了被动的形势。这种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教训，使红二、六军团领导进一步认识到遵义会议军事思想的英明正确，从而在作战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自此以后，红二、六军团在反“围剿”斗争中，就自觉地运用遵义会议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导自己的行动。根据利用敌人矛盾，拣弱敌打，各个击破的指示，适时地把主要矛头转向较弱的湖北敌人；把外线作战作为经常的作战手段，集中兵力突入敌人的后方、翼侧，广泛机动，迷惑、引诱和欺骗敌人，迫使敌人离开碉堡；采取围城打援，预期遭遇、伏击和侧击等战术，在运动中大量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取得了忠堡、板栗园等战斗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围剿”。

（二）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珍视和不断加强党和红军的团结，是红二方面军这一时期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红二、六军团黔东会师是一次团结的会师，胜利的会师，模范的会师。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时候，既共同面临着策应中央红军突围和创建新根据地的重大任务，也都各自存在着需要互相帮助解决的问题，需要团结一致，共同战斗。两军团所以能够迅速地结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除了红军在政治上的一致性这个根本条件，主要是两军团的领导者都具有高度的党性，对形势任务的一致认识和对组织领导的正确解决。两军团的领导和全体指战员都深刻认识到，两支部队只有密切的团结起来，才能巩固发展，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因此都以团结为重，把自己的部队看成是党的军队，没有私心和地区之分。在政治思想和认识一致的基础上，会师后很快就建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核心的集体领导，统一了组织，统一了军事指挥。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两军团领导人都注重在部队中进行团结教育，指战员高度地发扬了阶级友爱、团结互助的精神。从会师之日起，红二、六军团就一直是亲密团结、同心同德，结合得如同一个军团一样，所以，才取得了以后一系列的重大胜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批判和纠正夏曦的错误有些提法和“斗争方法也有错误”，但总的说还是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团结了夏曦，从而对红二军团的建设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红二方面军十分重视同红四方面军的团结。方面军领导对张国焘的反党活动与分裂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注意把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和广大指战员同张国焘区别开来，积极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对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起了良好的作用。红二方面军这一时期的斗争经验，充分揭示了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的伟大真理。

（三）

红二方面军从斗争实践中深刻体会到根据地的重要性。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立即恢复、发展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来在长征中，也曾先后在湘黔边、黔大毕、黔滇边、陕甘边为建立临时根据地而斗争。

经验证明，根据地的开辟，必须首先在军事上多打胜仗，大量消灭敌人。湘鄂川黔根据地能够迅速的开辟，主要是由于两个军团集中了力量，向敌人薄弱部分进行突击，抓住有利战机，在龙家寨战斗中一举歼灭了陈渠珍部的主力，从而打开了局面，控制了广大地区，争取到战略展开与发动群众的时间。长征途中几次争取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斗争，虽然对红军的休整、补充和发动群众起了积极作用，但始终未能巩固，主要是因为没能更多地消灭敌人。

在局面打开以后，建设根据地必须要有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指导，才能争取群众、发动群众。红二、六军团在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领导下，在湘鄂川黔边区积极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党、建政、建立群众武装、扩大红军、筹粮筹款、剿灭土匪，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为根据地建设初步打下了基础，使红军在人力物力上得到了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但是，由于当

时在土地政策和阶级关系等方面存在一些过“左”的错误倾向，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根据地内部不很巩固，因而，在强敌包围下难以打破敌人“围剿”，这也是不得不放弃根据地的原因之一。

（四）

红二方面军遵循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始终把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为把部队建设成为一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人民军队而斗争。

在加强党的领导方面，红二、六两军团会师后，坚决纠正了夏曦的错误，在红二军团中恢复健全了政治机关，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增强了内部团结，使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在反“围剿”和长征的最紧张、复杂、艰苦与变化不定的战斗行动中，经常注意利用各种时机，发展与健全党的组织，进行短暂的会议汇报，使党员了解到在某一环境中的政治情况，从而在群众中起骨干作用。同时，根据当时的敌情、任务、居民等具体环境，动员党员及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不失时机地进行深入的、有效的政治解释与动员，积极发挥英勇坚定的模范作用等，这样来保障作战、行军计划之完成。到达陕北以后，在新的民族革命形势下，提出了把部队建设成为一支模范党军的口号，大力整顿了党的组织，把党对部队的领导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为抗日战争做好了准备。

红二方面军长征中政治工作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善于把握大局，极为重视中共中央确定的重大战略行动方针的宣传和贯彻。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和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红二方面军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及时发布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卖国罪魁蒋介石的宣言，把民族革命斗争提到了重要位置。这个宣言完全符合当时客观形势的发展，符合全国人民和红军指战员的意愿。在抗日救国思想指导下，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不论在湘中、黔东、黔大毕还是通过康藏、甘南地区，都十分重视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十分重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并且组织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抗日救国团体。把长征同抗日救国行动紧密联系起来，这是红二方面军胜利完成伟大长征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红二方面军适应当时极为残酷的革命斗争的需要，不断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不良倾向。注意根据各个时期斗争的不同情况，及时提出明确的政治口号，指明斗争的前途。如在黔大毕时，提出“创造黔大毕游击区”的口号，渡金沙江时，提出“与四方面军会合”的口号，充分运用具体的政治口号动员全体指战员为完成某一阶段、某项任务而奋斗。同时，在战斗异常频繁、行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在部队中不间断地深入地进行思想动员和宣传鼓动。因而，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和高度的战斗性，显示了革命的政治工作真正的优势。

在巩固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方面，根据当时作战紧张、频繁的情况，政治工作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经过政治机关的政治组织与管理、卫生、供给（部门）密切的配合起来，加强收容，解决物质上可能解决的困难，减少病员逃亡，巩固部队”；二是在注意实战锻炼的同时，抓紧战斗的间隙，进行战术技术训练和政治、文化教育，努力提高干部战士的军事技术

和思想、文化水平。部队到达陕北以后，为了迎接抗日战争，在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训练，对巩固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红二方面军一贯重视干部的培养教育，在紧张的战斗行动中，坚持办红军学校和教导团，始终把培养干部作为提高部队素质的中心一环，因而使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能力不断得到了提高。

（五）

红二方面军离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经过二万余里长征，胜利到达陕甘宁地区这一时期，斗争是艰难、曲折和复杂的，经验也是十分丰富的。对此，一九三七年七月，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关向应在《红二方面军的北上抗日》一文中曾经做了系统、全面的总结。文中指出，红二方面军长征，“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一）“实现了战略计划”，进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二）“高度地保存了有生力量”，“在行军六千一百四十里后（在黔大毕），比出发时的总指数增加百分之二十；一万零八百七十一里后（渡金沙江），保持了出发的水平；一万四千六百里后（在甘孜），保持了百分之八十七；一万六千五百四十里后（出草地在哈达铺），还保持了百分之六十以上”。（三）“在没有根据地的条件下，却消灭了、击溃了许多敌人（如万纵队之遭击败，李、孙、郝纵队之遭打击）”。（四）“广泛的宣传了党及红军的政治主张，与居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五）“在两次大会师中，与各方红军交换了斗争经验”。

文中指出，取得长征胜利，有什么经验呢？

（一）建立了坚强的领导。“湘鄂川黔省委及军分会在任弼时、贺龙等同志领导下，正确的执行了党的策略路线，坚决的为争取苏维埃胜利，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保存壮大二、六军团的有生力量而斗争”。

（二）“全体指战员具备了高度的政治素质，团结在党及军委分会之下，好象一个人一样，为消灭进攻之敌，完成战斗任务而奋斗。不屈不挠的意志，无上（尚）的信心，无比的英勇，血（赤）诚的牺牲心，崇高的责任心，刻苦耐劳的朴素性等等，在这一行动中，得到了高度的发扬。此外，上下级的互信、指挥机关指挥的灵敏及情况判断的正确，都是很关重要的”。

（三）“我们认定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就象鱼与水一般的关系。在长期行军及战斗环境中，任何时候不忘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实行（这是朱、毛游击队时红军严肃的政治纪律），要使群众不怕红军，并认识红军是他们自己的军队。……愈在困难的环境中，就应更加注意到纪律的维持，这样来发动群众，使群众认识红军，拥护红军。这样与群众保持密切的关系，是伟大的斗争力量。”

（四）“国内战争中大规模的转移，在不可避免的敌人严厉的追迫下，（要）使红军不能（会）象历史上一般军队那样容易（失败），在转移中，就必须坚决的战斗。如果企图避免战斗，那便会常常引起更多的战斗，结果不仅不能避免战斗，而且会遭到无代价的牺牲，消耗有生力量。这是中国内战的历史所深刻的教训我们的。我们抓紧了这一原则，不放弃一切有利的战斗，对于追堵之敌，在运动中，在一般有利情况下，进行坚决的突击。……换句话说，在转移中，必须准备必要的牺牲，不可避免的牺牲，予敌以打击，制止其追击，才能得到军用品的补充，才能得到休息的可能。因为有便水（在

湖南晃县)的奋斗,才能有石吁、江口的休息;有将军山、六龙场、新街的苦战的胜利,才有黔大毕一时期的立足,才有六千红军的扩大及大批资财的补充。这正是战争中辩证法的运用。”

(五)“在转移中,一切装备,都(应)适于游击战争,轻装急进,实施迅速秘密突然大胆的战略战术机动,(要)采取逐步转移的原则(建立游击根据地及巩固根据地,补充整理),以大规模的运动战游击战来完成长征。”

(六)“急速的行动,勇猛的动作,突然的机动,震撼敌人战略战术的痛苦处,造成敌人忘(危)机,(盲目)的动作,使敌人不得不处于应付的地位,不得不失去常态地调动,变成仓皇的状态,这样便易于取得运动战的机会。”

(七)“大规模的转移中,要预计到部队是有很大的流动性的,任何时机(候),都应注意到部队的补充。补充的来源,主要是靠沿途同情于我们的居民。在行军时、宿营时、警戒时、驻军时采取各种有力的方法进行扩红。此外,俘虏中的同情我们的分子(绝对是大多数同情于我们的)也应争取其加入红军。这种经常争取补充的工作,成了保存有生力量的主要手段之一。”

(八)“在长征中,常有超过一定体力限度的连续不断的运动,这是可以消耗军队的元气的。因此要善于争取必要的休息整理。”

(九)“以曲线的行动避免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同时可以疲劳敌人、迷惑敌人,并造成消灭敌人单个部队的良好条件。因为敌人的追击,每每是成为扇面(形)的前进,堵截的部队,是布置在某一地区,每每(是)固定的防御,(所以)在遭遇敌人前后的追堵中,很灵活地、适当地(当然又要看地形及左右两侧的敌情来决定)在曲线上运动(当然没有一定的轨道),(就会)避免敌人主力部队的压迫,造成消灭敌人单个部队的条件。”

(十)“我们是大兵团在广大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游击战”。“有时在某一方面,(也)进行局部的正规的防御(如在大定的将军山),可是这种防御,是为了在其他方面进行坚决的突击,而且防御的本身,也是积极的。”

(十一)“乘敌向我追击,部队疲劳,队势不整之际,坚决消灭其分进部队。有时则扼制(其)追击的部队,或在追击部队未赶到前,击其堵截部队及在我侧面的部队(如在湖南之瓦屋塘及贵州之平越)。有时侧击伏击(其)追击部队。”

(十二)“消耗的战斗,一般的(应)避免之,力求避免牺牲过巨的战斗。”

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是充分“发扬了运动战游击战的特长”的。当红二、四方面军在西康会师的时候,总司令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二、六军团在这次行动中,是集游击战、运动战的大成。”正因为善于运动战、游击战,所以在与敌人兵员武器及其他条件对比居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仍能顺利的活动于湘鄂川黔滇康等省,高度的保存有生力量,完成了预定的战略”。后记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光辉历程,是我党我军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这支部队的光荣历史、丰富的斗争经验,以及可歌可泣的事迹总结编写出来,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教育后代,具有重要意义。

一九五九年五月,按照中央军委决定,由贺龙元帅为主任的红二方面军

战史编辑委员会，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完成了战史初稿。但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尚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一九八七年七月，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新的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对初稿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和充实。编修工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以红二方面军所处的历史地位、作用和有关原始档案材料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准确、真实地反映这支部队的风貌。但由于占有资料水平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这部战史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总政治部的大力支持；得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江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四川等省各级党史办的大力协助；得到原在红二方面军工作过的老同志的热情指导，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大事记

1927年8月——1937年9月

(一)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大事记

(1927年8月——1934年10月)

一九二七年

- 8月 湘鄂西地区各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湖北省委制定的秋收暴动计划，发动群众，准备武装起义。
- 9月10日 中共鄂中特委和沔阳县委书记领导农民群众在沔阳和沔阳、监利交界地区举行暴动，组成游击队。本月中共公安县委组织农民武装和党组织控制的团防举行暴动，袭击江陵弥陀寺，占领公安县城，组成公安游击队。11月下旬沔阳暴动武装攻克沔阳县城和监利的新沟咀。
- 本月 华容、石首、枣阳、荆门、天门、汉川等县相继组织了暴动。

一九二八年

- 1月上旬 中共中央决定，由郭亮、贺龙、周逸群、柳克明、徐动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
- 下旬 贺龙、周逸群由上海到监利，会合了贺锦斋率领的游击队及中共鄂中特委和石首中心县委书记领导的武装，组成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并参加监利、华容、石首等地的年关暴动。
- 2月中旬 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攻监利城，未克。
- 月底 周逸群、贺龙等在焦山河召开会议，决定各路游击武装返回原地进行斗争，贺、周率贺锦斋等十余人去湘鄂边。
- 3月初 张华甫、黄大鹏等率“神兵”袭占巴东城，成立了巴东县人民委员会。
- 上旬 贺龙、周逸群等抵桑植会合贺龙旧部、亲属所率十余支武装，组成了三千余人的工农革命军，占领桑植城。
- 4月初 国民党军龙毓仁旅进犯桑植，工农革命军几战不利，武装大部失散。周逸群返回鄂西。
- 本月 鄂西、鄂中的游击队作战不利，分散活动于沔阳、江陵之白露湖及石首等地区。
- 5月初 贺龙在桑植、鹤峰边界收集失散武装三四百人。
- 上中旬 周逸群抵石首，会合石首、公安武装，后转至洪湖，

下旬	与华容及鄂中武装会合，20日攻克沔阳峰口镇。敌联合“清剿”，各县革命武装分散活动。邹资生等编为特务大队，去洪湖西岸一带游击。鄂中武装在沔西拖船埠遭国民党军严重打击。
本月	中共鄂西特委遭国民党破坏，领导人大部牺牲，周逸群去沙市组成临时特委，并将特委机关迁往宜昌。巴东游击队遭国民党军进攻，作战失利，分散转入秘密活动。枣阳暴动武装组成游击总队，并建立了小块革命根据地。
6月下旬	石门南乡群众暴动，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支队。工农革命军于桑植小埠头设伏，歼敌一部，收复洪家关，部队又扩大到一千五百余人。
本月	新的中共鄂西特委组成，周逸群任书记。
7月初	枣阳游击总队遭国民党军进攻，损失严重。
上旬	桑植团防袭击洪家关。工农革命军撤往乐育。
本月	中共湘西北特委组成湘西前敌委员会，工农革命军改编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8月25日	国民党军围攻石门太浮山，红军第四支队失败。红四军奉中共湖南省委及湘西特委指示，为配合石门及临澧、澧县，常德、桃源地区的斗争，进抵石门北乡开展地方工作。
9月上旬	红四军在石门的溁阳、泥沙遭敌袭击，军参谋长黄鳌、师长贺锦斋先后牺牲，部队大部溃散。贺龙率余部二百余人转至鹤峰边境的堰垭一带活动。
10月	枣阳游击总队遭敌进攻，作战失利，枣西游击根据地被敌占据。
11月上旬	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改为湘鄂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为书记。
上中旬	红四军在鹤峰地区整顿部队，加强党团组织，遣散部分老弱战士，部队仅剩九十一人、七十二支枪。
下旬	红四军转至宣恩、咸丰、利川、恩施一带活动。
12月中下旬	红四军在利川一带消灭“神兵”数股，并袭占湖北建始县城，攻克五花寨、官店口等市镇，进抵鄂阳关。在鄂阳关将中共党员陈宗瑜所部“神兵”三百余人编入红四军，部队扩大到六百余人。

一九二九年

1月上旬	红四军攻克鹤峰城、太平镇、洞柘湾，开始以鹤峰为中心创建根据地。
本月	红四军进行整编，成立第一路指挥部。整编后，全军一千余人、三百余支枪。
2月上旬	中共鄂西特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决议，总

	结斗争经验，决定开展游击战争。会后，将游击队合编为一个大队，下辖两个中队，并乘蒋桂战争爆发的有利时机，向当地之敌发起进攻。
本月	原属中共湘西特委领导的华容、南县、安乡及原属中共鄂中特委领导的沔阳、天门、汉川、潜江、京山划归中共鄂西特委领导。
3月18日	桑植、鹤峰、五峰团防三千余人分数路进犯鹤峰根据地。红四军于张家坪迎击王文轩部，击毙王文轩，余敌皆退。
本月	鄂西游击大队在江陵、石首、监利等县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十七天作战二十一次，一度攻克石首县城。
4月上旬	红四军进入桑植境内，并攻克龙潭坪、土地垭等村镇。
5月初	红四军攻克桑植城。
本月	鄂西游击大队攻克监利之毛家口，歼敌两连。
6月中旬	江陵、监利团防向江陵沙岗地区进攻。鄂西游击大队英勇反击，歼敌八十余人。
下旬	中共长阳党组织领导农民举行武装暴动，于8月失败。
7月初	国民党军周寒之部千余人进犯桑植，在南岔被红四军全歼。
中旬	国民党军向子云部二千余人复犯桑植。红四军诱敌入城，将其全歼。战后，红四军扩编，成立第二路指挥部，全军共四千余人。
本月	鄂西游击总队组成，周逸群任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大队。
8月12日	红四军攻克大庸之西教乡国民党军险要据点。
下旬	红四军攻克慈利江垭、九溪后回师桑植。
本月	鄂西游击总队克江陵、石首境内之天心洲、新厂等十余据点。
9月	国民党军第三十四、第五十师进攻洪湖根据地，鄂西游击总队第一大队在沔阳小沙口与敌遭遇，伤亡严重。
10月上旬	国民党军第一五四旅进犯桑植，红四军主动撤离县后在樟耳坪作战失利，转至鹤峰。
本月	鄂西游击总队第一、第三大队于沔阳聂家岭击溃“清剿”之国民党军一个团。
“清	长阳党组织再次发动武装暴动，组成长阳独立师。
11月	鄂西游击总队乘蒋冯战起、国民党军主力撤出鄂西之有利时机，展开进攻，先后攻克三官殿、熊家河、马家寨、观音寺等据点，并于石首之小河口全歼石首团防三个中队。
12月下旬	中共鄂西特委在石首袁家铺召开鄂西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周逸群为书记的特委。
	鄂西游击总队改编为中央独立师，段德昌任师长。
本月	中共巴兴归县委在甘家坪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重新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巴兴归苏维埃政权。

会后，组成了工农革命军鄂西游击大队。
鄂西游击总队攻克杨树峰、谢仁口等地，恢复并扩大了洪湖根据地。

一九三 年

- | | |
|---------|---|
| 1 月上旬 | 中共鄂西特委万涛到鹤峰传达中央指示及中共鄂西地区第二次代表大会精神，接红四军东下洪湖根据地。 |
| 2 月 5 日 | 中央独立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孙德清任军长。孙患病后由邝继勋继任，周逸群任政委。 |
| 本月 | 红四军第一次东下，中途受阻，折返五峰。
长阳独立师改名为独立第五十师。 |
| 3 月初 | 巴兴归游击队袭占兴山县城。 |
| 8 日 | 红六军攻占江陵郝穴。 |
| 12 日 | 红六军攻克观音寺。 |
| 20 日 | 红四军第二次东下，在湾潭歼五峰团防孙峻峰部。 |
| 4 月中旬 | 中共鄂北特委在枣阳重建革命武装，连克蔡阳铺、黄龙岗、璩家湾等地。 |
| 本月 | 红四军在澧县、松滋地区受阻，退返五峰。一周后第三次东下。
红六军攻克藕池、石首、调弦口。
鄂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调弦口召开，成立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周逸群任主席。联县政府设立赤卫队总队部，周逸群兼任总队长。 |
| 5 月中旬 | 红四军进入澧州境内，于张家场歼国民党军戴斗垣一个营。 |
| 部 | 红六军连克沔阳、仙桃，进抵汉川。 |
| 6 月上旬 | 红六军抵江南迎接红四军。 |
| 18 日 | 红六军到达公安县城，攻占申津渡。本月巴兴归苏维埃政府成立。巴兴归地区的游击队改编成红军独立第四十九师。 |
| 7 月上旬 | 红六军 1 日攻克公安县城，4 日与红四军会师，红四军改称红二军。 |
| 中旬 | 红二、红六军在普济观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并组成红二军团前委，周逸群任前委书记。 |
| 下旬 | 红二军团主力扫除龙湾、熊口等地敌据点，占领潜江县城。红十七师在沔阳地区肃清白极会等地地主武装。 |
| 本月 | 襄枣宜革命武装组成红二十六师。 |
| 8 月下旬 | 中共鄂豫边特委成立。 |
| 本月 | 红二军团攻克府场、潜江、岳口、杨林尾和沙洋等地，渡襄河向东发展。 |
| 9 月 5 日 | 红二军团根据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决定，进攻沙市，伤亡千余人，未能攻克。 |

上旬	红六军攻克石首、藕池及调弦口。 中共鄂西特委在江陵全家洲召开鄂西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大会由周小康主持，原定开七天，因敌进攻，开了三天即告结束。
12日	邓中夏到达洪湖，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及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并命令部队返洪湖集结。中共鄂西特委改称中共湘鄂西特委。
23日	红二军团攻占监利县城，歼国民党军新三师及县保安团共二千余人。
10月6日	红二军团攻占沔阳城、彭家场及仙桃。
上旬	中共湘西特委紧急会议及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先后在监利召开。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组成，周逸群任联县政府主席。
下旬	红二军团根据中共长江局指示，执行夺取常德，配合红一、红三军团二次攻打长沙的任务，渡江南征，连克南县、华容、藕池、公安等城镇。
11月	红二军团4日占领津市，围攻澧州未克；13日攻占石门。下旬国民党军进犯石门，红二军团在夹山寺、余氏桥等地击溃进犯敌军，乘胜占领临澧县城。 国民党军在洪湖周围集结兵力，进犯根据地。21日后，监利、南县、华容等城相继失陷。中共湘鄂西特委移往调弦口。 中共湘鄂西特委为统一指挥长江南北的地方武装，迎击国民党军对洪湖根据地的围攻，成立了江左军和江右军两个指挥部。 长阳成立苏维埃政府。红五十师伏击川军袁海青团获胜，部队得到扩充，下辖三个团。
12月上中旬	红二军团1日再攻津市、澧州。2日红六军攻克津市，红二军包围了澧州。9日援敌逼近，红军被迫北撤至杨林市，街河市一线。17日敌向杨林市进攻，红军作战失利，退至刘家场。
24日	红二军团转往鹤峰。
29日	红二军团在湘鄂边武力解决甘占元、覃伯卿等部三千余人。
本月	红二十六师攻打唐河等地，一度攻克唐河，但未能巩固，后又重返襄枣宜根据地。 杨林市战斗中与红军主力失掉联系的部分部队返回洪湖，组成独立团。

一九三一年

1月上中旬	国民党军以十旅之众向洪湖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监利、沔阳、潜江等县之江左军各大队予敌以重大杀伤后，主力转至外线活动。
-------	--

	红二军团向石门出击，在瓜子峪作战失利后返回走马坪。
本月	国民党军围攻襄枣宜根据地，红二十六师受到严重挫折，后转往南漳地区游击。
2月	红二军团连克五峰、长阳、资丘等地，歼敌千余人，后转至枝柘坪进行休整。
3月中旬	周小康奉命编散红五十师，并毫无根据地给红五十师和一批地方干部扣上“改组派”帽子加以杀害，其中有红五十师师长李步云、政委江山等人。
本月	“围剿”洪湖根据地的国民党军月初以江南根据地为重点开始第二次“围剿”。江右军在华容东山地区坚持斗争，并加强洞庭湖地区的工作。活动在江左的独立团在监利、沔阳地区，先后攻克朱河、峰口、府场等地，恢复了监沔地区原有根据地。 夏曦到达湘鄂西，在洪湖根据地成立了中共中央代表机关湘鄂西中央分局。 红二军团在枝柘坪召开前委会议，讨论有关部队行动的问题。
4月2日	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 红三军将湘鄂边独立团及红五十师一部组成教导第一师。
上旬	红四十九师改名为红三军教导第二师。
上中旬	红三军克巴东后渡江克兴山、秭归、远安、荆门，进攻当阳。因敌援赶到，红军激战不胜，退至马良坪。
中下旬	洪湖根据地武装力量在反“围剿”斗争中进一步壮大，以独立团及江右军为基础组成了红三军第九师，并组成了警卫第一团、教导团和沔汉独立团，接着向敌展开反攻，先后收复老新口、熊口、龙湾、大丰口、汉河口等地。
下旬	洞庭特区武装、江右军袭击注滋口、阳罗洲团防，歼敌百余人，俘敌团长。
本月	湘鄂边召开五县党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湘鄂边分区特委及苏维埃联县政府。周小康为分特委书记。长阳红五十师余部编为长阳游击大队。 围攻江南之国民党军向华容东山进攻，江右军及群众万余人先后撤往江北地区。
5月1日	唐赤英到湘鄂边，召开分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和中央分局成立情况。湘鄂边分特委改为湘鄂边特委。
上旬	红三军教导第一师改编为湘鄂边独立团。
18日	周逸群于岳阳贾家凉亭附近遇敌，光荣牺牲。
中旬	红三军11日在马良坪遭国民党军围攻，主力向北突围后，连克石花街、均州，准备在武当山创建根据地。 红八师第二十二团突围时与主力失掉联系，在九道梁

	与教导第二师会合。
下旬	段玉林率江右军一部攻占九佛岗、石华堰等地，歼国民党军第十九师李觉部一个团。
6 月上中旬	国民党军向均州进攻。红三军撤离均州，于 18 日攻占
	房县。之后，大力展开创建鄂西北根据地的工作。
24 日	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成立。
中下旬	红九师向江陵出击，于沙岗歼国民党军一个营，在普济观歼国民党军两个连。22 日川军换防向红九师反
扑，又被歼一个营。	
7 月上旬	红八师第二十二团同教导第二师主力进入房县与红三军会合。接着，教导第二师改编为红三军鄂西北独立第二团。
本月	洪湖地区发生水灾，根据地大部被淹。
8 月上旬	国民党军袭击房县城。红军经三昼夜战斗，歼敌一部，残敌北逃。
26 日	襄枣宜根据地成立革命委员会。
中下旬	红九师主力奉命向北出击，17 日克沙洋，21 日克荆门。红二十五团 15 日在杨家场歼国民党军一个营，并乘势攻占潜江城。
9 月初	红九师进入襄枣宜根据地，在钟北与红二十六师会
合，	两师协同歼灭钟北反动武装一部。
	国民党军以华容东山为重点进行第三次“围剿”，实行了空前残酷的大屠杀，殉难群众达万余人。
中旬	以红三军教导团为主编组红二十五师，留鄂西北坚持斗争。
中下旬	红三军根据中共中央及中央分局指示，中旬自青峰镇出发向洪湖根据地转移，28 日与红九师在刘猴集会
合。	
本月	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十四旅及团防武装围攻湘鄂边根据地。
10 月中旬	红三军回到洪湖根据地。 夏曦接任红三军政委，并决定将红三军缩编成五个大团。
下旬	围攻湘鄂边根据地之国民党军被击退。
本月	红二十五团奉命恢复江南根据地。因国民党军兵力过大，未能完成任务。26 日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决定成立江南县委及江南游击大队。
11 月初	鄂西北独立第二团自鄂西北返回巴兴归根据地，在巴东的甘坪、小龙一带扫除敌据点。
上中旬	国民党军进入潜江、沙洋。红三军在后港、十回桥歼守敌两个营，后又转向襄北，于 21 日在皂市歼守敌一部。
12 月下旬	湘鄂边独立团先后歼灭五峰、长阳等地团防。

红二十五师在上达河，全歼国民党军兴安警备旅，俘敌旅长刘正增以下九百余人，缴枪千余支。

红三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恢复师的建制，编为第七、第九两师和一个独立团。

本月

湘鄂西省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周老咀召开。

一九三二年

1 月中下旬

中共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会于 22 日至 30 日在周老咀举行，通过了进一步贯彻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各项决议。

红九师、汉川独立团进攻皂市、龙王集、陈家河，先

后歼国民党军第四师十二旅及第四十八师特务团等部，俘敌旅长张联华以下近四千人。

25 日

关向应由中共中央派到湘鄂西任红三军政委。

中共鄂豫边区代表大会开幕。当日，国民党军进至会议所在地附近。大会停开。

本月

鄂西北独立第二团进攻巴东二塘垭受严重损失，团长黄大鹏牺牲，部队转往兴山活动。

2 月初

营、石门保安团两个营。

湘鄂边独立团击溃国民党军新三十四师第三旅两个

2 日

中共鄂豫边特委改组为鄂豫边临时省委。

上旬

原红三军教导团由鄂西北返回洪湖，改编为鄂西北独立团。不久，又与红三军独立团合编成立红八师。

营，

红九师夜袭张截港，歼国民党军独立三十七旅一个并乘胜袭占潜江县城。守敌退逃策口，被红八师包围。红九师在竹根滩击溃国民党军增援部队，俘敌数百并协同红八师歼灭策口之敌独立三十七旅两个营。

人，

22 日

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决定省委主要力量转至白区。下旬襄枣宜根据地红二十六师改编为第一路游击军，地方武装一部编组成第三路游击军。

3 月上旬

国民党军集中十个团以上兵力向襄北地区进攻。6 日红三军歼敌第一四四旅于文家墩及其附近地区，俘敌旅长韩昌俊以下二千余人。

月底

国民党军集中约十五个团兵力进攻襄北地区，并以四

本月

个多旅的兵力为“进剿”部队，攻击红三军。红三军集中七个团迎敌，在瓦庙集、何家湾一线与敌接触，自 30 日至 4 月 5 日，激战七昼夜，红三军撤出战斗。国民党军围攻鄂西北根据地，红二十五师被迫撤出鄂西北根据地，向洪湖转移。

4 月上旬

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改组。8 日临时省委召开执委扩大会议，讨论“彻底执行国际路线”的问题，并作出

相应的决议。

红二十五师在兴山境内与鄂西北独立第二团大部合编为红三军第四路游击队。游击队经沙洋返回洪湖后，又奉命编为鄂西北独立团。

鄂西北独立第二团与红二十五师合编后，中共巴兴归县委又集中当地武装一百二十人编成川东游击队，后因作战失利，部队溃散，根据地陷落。

5 月下旬 国民党军集中二十个团兵力“清剿”刁汊湖地区。23日红三军主力向“清剿”之敌第一二三旅进攻，在张家场及其附近地区激战至30日，后因国民党援军陆续赶到，遂主动撤退。是役，毙伤敌旅长于兆龙以下八百余人，红三军伤亡一千五百余人。

本月 国民党军第五十师和独立第三十四旅共六个多团围攻襄枣宜根据地。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指导下，湘鄂西根据地开始第一次“肃反”。万涛、周小康、孙德清、柳克明、段玉林等大批党政军干部被诬害。

6 月 13 日 国民党川军分四路进犯洪湖根据地，红三军主力急从襄北折回。13日，红九师和警卫团于新沟咀歼敌第四师一个多旅，俘敌三千余人。红七师在浩子口歼敌第九旅一部。

15 日 襄枣宜根据地第一、第三路游击军在反“围剿”中受严重损失，余部转至钟祥地区活动。

本月 国民党川军和团防共三千余人围攻湘鄂边根据地，鹤峰、燕子坪等地相继陷落。

7 月下旬 15日，国民党军开始向洪湖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至月底，先后占领襄北及潜江县城。红三军退返襄南。

8 月上旬 红三军一部在荆门东南沈家集、范家集一带与国民党川军郭勋部激战，后因敌援兵赶到，红军主动撤至熊口、莲花寺一线。敌追至浩子口、周家矶一线。

13 日 红七、红八两师进攻沙市。红八师攻占草市，歼敌人百余人；红七师攻进沙市市区，因敌援兵赶到，再战不利，遂撤出战斗，退回熊口。

下旬 襄北及潜江之敌，进攻洪湖根据地中心区域。夏曦决定以红七师及警卫师一个团担任内线防御作战，红三军主力及警卫师另一个团转到敌侧后牵制敌人。

31 日 红三军主力转至荆门境内，与追击的川军八个团进行战斗，消灭其中一部，并组建荆当远独立团。

本月 国民党军连续突破红七师新沟咀、周老咀阵地，红七师受到严重损失。

湘鄂边独立团在国民党军围攻下，坚持斗争近月，后被迫转向洪湖根据地，湘鄂根据地陷落。

9 月上旬 红三军主力转至襄北地区。

上中旬	洪湖根据地中心地区陷落。红七师突围到达江陵地区后转到襄北，与红三军主力会合。
中旬	湘鄂边独立团渡江到达江陵地区，与洪湖地方武装一部合编成独立师。
10月上旬	独立师在国民党军压迫下向襄北突围，途中受阻，师政委卢冬生率领一部转入荆当远地区。后与荆当远独立团会合，荆当远独立团编入独立师。
	湘鄂西根据地第二次“肃反”开始，唐赤英、王一鸣等被诬害。
下旬	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王店开会决定红三军转往湘鄂边地区。
11月上旬	红三军经豫南、陕南进入川鄂边境，途经豫南苗店、郝砦一带时，与追堵之国民党军作战，损失很大。
本月	洞庭特区周围国民党军大举“清湖”，特区地方武装受严重损失。
12月下旬	红三军21日攻占巴东县城，30日攻占鹤峰。

一九三三年

1月初	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毛坝举行会议，决定恢复湘鄂边根据地，首先进攻桑植。
中旬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指导下，夏曦决定在红三军中
	进行清党（重新审查、登记党员）。
中下旬	红三军13日攻占桑植县城，20日向国民党军新三十四师周曼卿旅进攻，激战未果。26日周旅竭力反击，28日红三军被迫退出桑植。
下旬	湘鄂西中央分局再次在毛坝举行会议，夏曦提议解散党团组织和创造新红军，因遭与会人员反对，未能作出决定。
	卢冬生率领之独立师一部于21日攻占兴山城，后得悉红三军已抵湘鄂边，即向桑植鹤峰地区转移，2月初在鹤峰的走马坪与红三军会合。
2月上旬	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走马坪开会，决定发展鹤峰周围根据地，并将红三军编为红七、红九师，独立师编为红三军教导团。
3月24日	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金果坪召开会议，决定解散红三军和地方的各级党团组织及省苏维埃。
本月	湘鄂西根据地第三次“肃反”开始，段德昌等被诬害。
6月	湘鄂西根据地第四次错误的肃反开始，宋盘铭等被诬害。
7月中下旬	国民党军五个旅又五个团向以鹤峰为中心的根据地发动围攻，麻水、鄖阳关、金果坪、官店口先后失守。24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烧巴岩开会，决定开辟新根

- 据地，赤化宣恩全县，组织来凤、龙山、咸丰、利川一带农民武装，并巩固现有根据地。红三军军部率第九师转到宣恩、利川、咸丰一带活动，红七师在鹤峰根据地活动。
- 8月 红七师在五里坪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营，并袭占五峰县城。25日袭击松滋磨盘洲之国民党军，27日又进攻西斋，因作战失利，部队撤返鹤峰游击。
- 12月上旬 红七、红九两师在鹤峰石灰窑会合。
- 19日 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大村开会，决定创造湘鄂川黔根据地，放弃恢复湘鄂边的计划。
- 下旬 红三军22日攻克四川黔江县城。一周后，国民党军组织反扑，红三军转至咸丰活龙坪一带。
- 本月 熊贡卿受蒋介石委派到红三军劝降。1934年1月被红三军处决。

一九三四年

- 1月3日 红三军袭占利川城，后于18日转往龙山县境。
- 3月 红三军在龙山、永顺、桑植、大庸、慈利等地进行游击活动。
- 4月上旬 湘鄂边境之国民党军联合向红三军进攻，红军被迫转至鄂川边之黔江、酉阳、秀山、利川一带。
红三军伤病人员在咸丰活龙坪一带组织的游击队改编为鄂川边独立团。
- 中旬 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十字路开会，决定发展鄂川边区苏维埃运动，把鄂川边游击区域扩大到利川、石柱、黔江、咸丰、宣恩等县。
- 5月上中旬 红三军9日袭占彭水县城，14日进入贵州境内。
- 6月1日 红三军占领沿河县城。
- 19日 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沿河枫香溪开会，决定创建黔东根据地。
红三军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布置整顿部队，重建党、团组织，恢复政治机关及开辟根据地的工作。
- 7月21日 中共中央的交通员到达沿河，送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决议和关于停止“肃反”的指示。
- 21~22日 黔东特区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沿河铅厂坝召开，组成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
- 8月上旬 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会议，讨论贯彻五中全会决议及中央关于停止“肃反”的指示，并作出《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五中全会决议和指示的决议》，停止了“肃反”。会议于8月1日开始，4日结束。
- 9月 新发展起来的黔东各独立团大部和黔东纵队合编，组成黔东独立师。
- 10月中下旬 红三军迎接从湘鄂赣根据地远征到达黔东的红六军

团，两支红军胜利会师。

(二) 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大事记
(1927年10月——1934年10月)

一九二七年

- 10月上旬 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各县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革命地方武装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先后产生。
- 本月 毛泽东发给永新的中共党员、积极分子五支枪，成立了永新赤卫队，刘作述为队长。
- 11月 红军攻占茶陵城，发给茶陵的中共党员、积极分子五支枪，成立了茶陵赤卫队，谭家述为队长。

一九二八年

- 1月 根据毛泽东指示，遂川的中共党员、积极分子以大革命时期保存下来的六支枪为基础，成立了遂川赤卫队。
- 2月 永新乡村开始组织工农暴动队。至秋，湘赣边界各县乡村的工农暴动队普遍组织起来。莲花赤卫队缴获叛徒陈刚如的两支枪。敌靖卫队实施报复，赤卫队将敌打退，缴枪两支。
- 3月 永新赤卫队于黄田包围国民党保安队十余人，缴枪五支、白洋千余元。
- 4月 永新赤卫队奔袭潞江国民党保安队，击毙保安队长，缴枪十二支。
- 5月 莲花赤卫队由攸县边界赶赴南村，将抢粮的国民党保安队大部消灭，缴枪十余支。
- 7月 永新赤卫队在暴动队的配合下，围歼丰田村国民党军一个排，缴枪三十余支。
- 8月 永新赤卫队夜袭驻花溪国民党军一个连，击毙敌连长，歼敌一个排，缴枪三十余支。
- 10月14日 吉安西区暴动队进攻官田国民党保安队，缴枪五支。不久，成立了吉安西区工农游击队。
- 11月 莲花赤卫队奔袭萍乡朵瑶下村国民党靖卫队，缴枪四十余支。茶陵赤卫队袭击严塘国民党军保安队。
- 12月 蒋介石命令何键指挥五个旅准备向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进行第三次“会剿”。

一九二九年

- 1月14日 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由井冈山向赣南、闽西挺进，红五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及湘赣边各县地方武装留井冈山地区，保卫根据地。
- 25日 湖南、江西两省“会剿”之国民党军开始向井冈山根据地进攻。
- 28日 红五军被迫撤离井冈山阵地，转向赣南。湘赣边地方武装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
- 2月 国民党军集中两个旅的兵力进攻永新、莲花、宁冈、茶陵四县交界的九陇山根据地。
- 3月 蒋桂军阀战争爆发，进攻根据地之国民党军大部撤走。
- 4月 中共边界特委从永新、宁冈、莲花、茶陵各县抽调人员、武器，连同第三十二团王佐、袁文才部和红五军留下的人员组成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
- 湘赣边地方武装先后收复宁冈、莲花县城。
永新、茶陵、酃县、宁冈四县反动地主武装组织联防，向红军进攻。边界独立第一团歼灭宁冈靖卫队大部，四县联防被击破。
- 5月2日 红五军奉前委指示返回湘赣边界活动，抵达茅坪。
- 上旬 中共边界特委将独立第一团编入红五军。
- 中旬 国民党军集结两个旅，分由茶陵、永新合击红军，宁冈、莲花两县城先后被占。
- 下旬 红五军转进至湘粤赣边境活动。
- 6月 原在粤汉铁路岳长段任工人纠察队队长的王震，从武汉返回家乡浏阳北乡，先后成立中共湘鄂赣边第十第十九区委，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 7月 边界地方武装在红五军返回后，先后收复遂川宁冈、莲花县城。
- 8月6日 江西国民党军集结四个营的兵力进攻红五军。
- 11日 红五军离开湘赣根据地，向湘鄂赣根据地转移。国民党军先后占领宁冈、莲花两县城。
- 10月上中旬 永新赤卫大队、永新西北特区赤卫队、暴动队共千余人，进攻黄门坊，歼守敌百余人。
- 30日 红军地方武装解放永新县城。从此，永新成为湘赣边根据地的中心。
- 本月 红军地方武装先后收复宁冈、莲花县城。
浏阳东乡的赤卫队有很大发展，以大光洞、萤火洞为中心的浏阳第一区苏维埃政府成立。
- 11月初 国民党军许克祥部独立第三旅由茶陵、酃县分两路向湘赣边界进攻，一部占莲花县城，莲花赤卫大队撤至

- 九都。
- 4 日 莲花地方武装在峙陇肢口伏击进犯九都之国民党军，缴枪七十余支、子弹数千发。中旬国民党军独立第三旅由莲花撤离，红军再次收复莲花县城。
- 12 月下旬 中共湘鄂赣边第十八、第十九区委成立浏北区联队。

一九三 年

- 1 月 永新赤卫大队大部和莲花、宁冈赤卫大队各一部，合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
- 2 月初 王震领导的例北区联队发动群众举行年关暴动，攻入百多名靖卫团守卫的北盛仓，缴枪十一支。
- 7 日 中共红四军前委在吉安肢头召集红四、红五、红六军军委和赣西、赣南特委联席会议，决定将湘赣边、赣西和赣南三特委合并组成中共赣西南特委。
- 中旬 赣西南地方武装和群众第一次攻打吉安。
- 3 月 15 日 中共赣西南特委成立。特委下设东、南、西、北路行委。原湘赣根据地各县和吉安县属赣江以西地区，划归西路行委领导。
- 下旬 中共西路行委根据赣西南特委指示，整顿各级政权组织，并开展分田运动。
- 浏北赤卫队扩编为浏阳游击第一支队，队长张正坤，政治委员苏芳。浏东赤卫队扩编为浏阳游击第三支队，队长张维。
- 4 月上旬 赣西南地区地方武装和群众第二次攻打吉安。
- 下旬 赣西南地方武装和群众第三次攻打吉安。
- 本月 浏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
- 5 月初 安源煤矿工人在红六军帮助下组织了工人武装纠察队，队长李强，政治委员汤××。后到醴陵乡村活动。
- 9 日 茶陵赤卫大队奔袭严塘，歼国民党挨户团一个中队，缴枪三十余支。
- 11 日 茶陵赤卫大队攻占高陇，消灭国民党挨户团一部，缴枪十余支。
- 6 月上旬 赣西南地方武装和群众第四次攻打吉安。
- 20 日 赣西南地方武装和群众第五次攻打吉安。
- 7 月 1 日 赣西南地方武装和群众第六次攻打吉安。
- 中旬 永新、莲花、宁冈赤卫大队和吉安西区赤卫队奉命编为红二十军第三纵队。后改为红二十军第一七四团。
- 27 日 茶陵赤卫大队改编为茶陵游击大队，队长谭家述，政治委员谭思聪。
- 浏阳游击第一、第三支队和浏阳赤卫军跟随主力红军攻入长沙。八月上旬撤出。

8月1日 委，	中共湖南省委上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湘东特委，以张启龙为书记；将浏阳、醴陵、攸县、茶陵、株洲、莲花、萍乡、万载、宜春等县划归湘东特委领导，建立湘东根据地。
上旬	茶陵游击大队会同莲花、永新赤卫大队攻占茶陵县城
	，歼国民党五县挨户团联防部队大部，缴枪二百支。
下旬	战后，茶陵游击大队扩编为游击第二纵队。
安。	赣西南地方武装和群众配合红二十军第八次攻打吉安。
9月中旬	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由长沙城郊转向江西活动，路过醴陵时，写信给袁德生、谭思聪、张启龙、王震，指示集中湘东各县主要地方武装，组成独立师，保卫和发展湘东根据地。
10月6日	湘东独立师在萍乡大安里正式组成，师长刘沛云，政治委员谭思聪，参谋长马赤，政治部主任王震。下辖两个团，第一团团张维，政治委员田可平；第三团团谭家述，政治委员王震兼任。全师共八百余人，近五百支枪。
7日	湘东独立师于萍乡新店全歼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一个营，缴枪二百余支。上旬参加攻打吉安的赣西地区地方武装和部分群众编成二十军第一七五团。
11月上旬	蒋介石集结十万兵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起第一次“围剿”。
	中共湘东特委根据立三路线组织湘东南起义，将各级党、青年团、政府和群众组织的领导机关合并为领导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
中旬	湘东独立师和起义群众，根据湘东行动委员会的指示向萍乡攻击，未果。
	湘东独立师和起义群众于攸县老漕泊歼国民党一个挨户团，接着南下，连克茶陵、安仁县城，又歼国民党
	两个保安团。
24日	中共红一方面军前委给赣西特委和湘东特委（行委）发出指示信，通报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调动情况，并明确指出了赣西和湘东根据地红军游击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
25日	湘东独立师在攸县以北皇图岭全歼国民党醴陵、攸县、衡山三县保安团和皇图岭守望队七百余人。
县、	湘东根据地和西路地区军民对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展开英勇阻击。莲花地方武装在莲花城北梅州地区袭击第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辎重部队。湘东独立师于莲花城东南苍山口截击第十九路军行军纵队，歼敌一部。
12月上旬	湘东独立师在群众武装配合下，于永新城西袭击国民
13日	湘东独立师在群众武装配合下，于永新城西袭击国民

党军第六十师先头部队，给予很大杀伤，随后尾击，于永新以东莲花坪又歼其后卫一部。

一九三一年

- 1月3日 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
- 29日 湘东独立师挺进湘南，于茶陵严塘歼国民党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七旅第一一四团一个营大部。
- 30日 湘东独立师袭占酃县城，全歼国民党一个保安团。
- 2月3日 湘东独立师在资兴彭公庙击溃该县保安团，乘势袭占资兴城。
- 6日 湘东独立师占领永兴县城。
- 7日 湘东独立师放弃永兴县城，开始北返。部队撤离时，遭敌突然袭击，师政治部主任田可平牺牲。中旬湘东行动委员会取消，改为中共湘东南特委。湘东独立师返回莲花整训，增编第二团，团长彭年，政治委员谢国瑜。同时，将湘东独立师改名为湘东南独立师，下辖三个团，共一千五百余人。
- 3月上旬 湘东南独立师第一、第二团在株（洲）萍（乡）铁路和袁水流城阻滞由湖南东进之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第三团挺进湘南，迎接红七军。
- 14日 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与红七军第五十八团会合于酃县以北的十都圩。
- 24日 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与红七军第五十八团于茶陵县尧水、严塘之间的将军山，歼灭国民党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五旅的一个团及茶陵、攸县、安仁三个保安团的一部，俘敌团长陈汉雄以下一百余人。
- 下旬 湘东南独立师与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在莲花召开庆祝胜利会师大会。
- 月底 中共河西临时总前委和红军河西临时总指挥部组成，滕代远为前委书记，张云逸为总指挥，曾炳春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河西红军行动。
- 4月初 蒋介石集中二十万兵力，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
- 4日 湘东南独立师、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及红二十军第一七五团攻克吉安永阳镇，歼灭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第二三旅一部。
- 下旬 湘东南独立师、红七军第五十八团与红七军主力在永新天河会合。
- 13日 红七军、湘东南独立师与红二十军第一七五团包围安福县城。
- 15日 红军在安福东南的廖塘桥、古田地区伏击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第一五四旅，歼其一个团，俘敌八百余人，

	缴枪数百支。
下旬	红七军和湘东南独立师转战宜春、分宜地区，协助北路地区开展工作。
5月3日	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
6月初	红军河西临时总指挥部决定，红七军和湘东南独立师向湘东南地区出击。
10日	红军在茶陵地区击溃国民党九县联防挨户团，并歼灭其中两个团，乘胜占领茶陵城。
13日	红军占领安仁县城。
14日	红军占领攸县城。
15日	红军再占茶陵城。
16日	红军占领酃县城。
7月1日	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兵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
上旬	红七军和红二十军（不含第一七五团）调往中央根据地。
8月1日	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湘赣省苏维埃临时政府于永新城成立。王首道为临时省委书记，袁德生为省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同时，将湘东南独立师改为湘赣独立第一师，李天柱任师长，谭思聪任政治委员。
中旬	独立第一师进抵宁冈、遂川地区，积极配合红一方面军反对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本月湘赣根据地和红军部队开始“肃反”。
9月15日	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中旬独立第一师在地方武装和群众配合下，围困永新城之国民党军第四十三师一个旅。
29日	独立第一师在独立第七团、红三军团特务营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全歼进犯吉安永阳镇之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一个团，俘其团长毕卫汉以下近千人，缴枪八百余支。
下旬	永新之国民党军第四十三师一个旅弃城逃，红军追击至安福金田，在安福独立营配合下，歼其一部。
10月8日	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莲花花塘村召开，正式成立省委，选举王首道为省委书记。
17日	湘赣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莲花花塘村召开，正式成立省苏维埃政府，袁德生为主席，张启龙、彭德怀为副主席。
中旬	根据湘赣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全省普遍展开重新分配土地的斗争。
22日	独立第一师在茶陵桃水击溃国民党军第六十三师第一八八旅，俘二百多人。
11月初	独立第一师护送湘赣省出席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东渡赣江。

- 上旬 独立第一师转到赣南，先后攻克上犹城和南康塘江，就地开展群众工作。
- 国民党军集中十个师，连同地主武装共约八万人，对湘赣根据地开始大规模的进攻。
- 中共湘赣省委决定组织临时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武装反“围剿”。临时前委由林瑞签、李朴、冯建元、刘锋、袁任远等组成，林瑞签为书记。
- 中共湘赣省委决定，以红色警卫团、独立第七团为基础组成独立第三师，师长冯建元，政治委员甘泗淇。下属两个团共八百余人。
- 中旬 国民党军占领永新、莲花和吉安永阳。
- 12月初 独立第三师、河西教导队在永新地方武装配合下，于永新城西富家垄地区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四师一个营和永新保安队。
- 上旬 独立第一师奉命由赣南返回永新以西的文竹，与独立第三师会合，围困驻守莲花之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
- 11日 独立第一、第三师与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第二三一旅一个团在莲花九都激战。独立第一师第二团团长沙年牺牲。
- 18日 红军在莲花浯塘击溃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一个营。

一九三二年

- 1月3日 永新国民党军第十四师在红军及地方武装和群众的围困打击下，被迫撤离。独立第一、第三师于永新以北之钱市街伏击，给敌以很大杀伤。是役，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谭思聪、独立第三师第一团政治委员刘锋和湘赣省委委员罗启厚等牺牲。
- 2月上旬 湘赣军区在永新成立，张启龙为总指挥，甘泗淇为政治委员。同时组成四个分区指挥部。
-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分校（简称红军学校）以河西教导队为基础正式组成。
- 中旬 红八军成立。下辖独立第一、独立第三两师，共约四千人，军部由独立第一师师部兼，没有专门设立军的领导机关。独立第一师师长李天柱，政治委员王震兼代红八军军长、政治委员。
- 3月2日 莲花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在红军及地方武装和群众的围困打击下，弃城向萍乡逃窜。至此，国民党军对湘赣根据地的“围剿”被粉碎。
- 3日 中共湘赣省委召开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通过全省三个月（4至6月）的革命竞赛条约，展开大规模的根据地建设运动。

- 为配合中央红军的作战行动，红八军进至遂川以南的藻林地区，积极展开活动，牵制敌人。
- 5月 以茶陵地方武装为主组成新的独立师，师长谭家述，政治委员曾毅之。
- 6月初 红八军挺进茶陵，攸县以东地区，围歼攸县网岭守敌，俘二百余人，缴枪一百余支。
- 15日 独立第十二师在上犹营前镇组成。师长叶长庚，政治委员魏桓。
- 20日 中共湘赣省委召开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三个月革命竞赛情况，并通过政治决议及冲锋季（7至9月）竞赛条约。
- 中旬 蒋介石调集兵力发动第四次“围剿”。其战略步骤是：首先集中力量消灭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然后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及其邻近各根据地。
- 8月1日 湘赣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永新县城召开。大会通过了《扩大红军与健全地方武装》等五项决议案，选举袁德生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启龙、谭余保为副主席。
- 6日 红八军在攸县地方武装配合下，奔袭攸县官田，全歼国民党攸县保安团。接着，又同援敌第八十五团激战，毙敌三百人，俘敌二百余人，缴枪四百余支。
- 19日 红八军在茶陵高陇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六十三师第三七八团大部。
- 9月初 红八军为了能同赣江以东的中央红军的进攻作战取得密切协同，进入遂川、万安、泰和地区展开活动。上旬中革军委指示红八军在赣江西岸地区向北进攻，威胁樟树、南昌，求得大量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
- 20日 红八军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北上袁水流域，强攻分宜城，战斗失利，伤亡近四百人，代军政治委员王震负伤，独立第三师第二团政治委员赵克强牺牲。
- 下旬 红八军在峡江、新淦和新余之间地区积极活动，打击敌人。
- 红八军在安福以北地区击溃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一个旅，胜利返回永新地区。
- 10月 中革军委为加强湘赣红军的领导力量，派蔡会文、肖克到湘赣根据地工作。蔡会文、肖克于25日到达永新。
- 11月初 红八军在吉安天河村进行整编，正式组成军的领导机关，蔡会文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并兼红八军政治委员，肖克任红八军军长，李达任参谋长，袁任远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将新独立师编入红八军。原独立第一师改为第二十二师，新独立师改为第二十三师，独立第三师改为第二十四师。全军共五千余人。

上旬	中共湘赣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永新召开。会上通过政治、党的建设、红军与地方武装等七个决议案。这次会议进一步推动了反“围剿”的准备工作。
中旬	进攻湘赣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共十个师八万余人完成“围剿”部署。东线第五十二师一五四旅开始进攻，并袭占了吉安敖城。红八军向东行动，反击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第一五四旅。
下旬	红八军在安福利田和吉安官田诸地区与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激战，给予沉重打击。
12月11日	湘赣军区抽调茶陵、莲花、萍乡等县独立营各一部，组成新的独立第一师，由侯梯云任师长，陈韶任政治委员。
12日	红八军于安福桂林坊击溃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第一五六旅一个营，俘连长以下六十余人，缴枪五十四支。
15日	红八军转移到遂川、万安、泰和地区，钳制、打击国民党军，并帮助地方政府开展工作。

一九三三年

2月28日	红八军遵照中革军委命令，再次北上袁水地区。
3月9日	红八军进到新余地区，两次强渡袁水未成，后向东发展进攻，直逼赣江。
下旬	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位于湘赣地区的国民党军再次向湘赣根据地发动进攻，红八军经中革军委批准，由袁水地区回师永新，待机歼敌。
4月3日	湖南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建绪到茶陵，统一指挥湖南、江西、广东国民党军分三路合击湘赣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永新、莲花。
7日	红八军在遂川零田圩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一个加强营。
13日	国民党军第十五师占领永新城。湘赣省级机关在红军分校和地方武装掩护下，转移至象形、花溪地区。
16日	国民党军第十五师和第十六师径直东进，企图围歼红八军于遂川、万安和泰和地区。红八军绕道返回永新牛田地区，威胁湘军侧背，迫使国民党军撤出永新。中共湘赣省委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由陈洪时主持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改组了省委，撤销王首道的省委书记职务，并组成了新省委。中共中央任命刘士杰为省委书记，刘未到任之前由陈洪时代理。
本月	湘赣地方武装重新整编，除原有独立第十二师、独立第一师外，又以吉安、永新独立团编成警卫师，以分宜、新峡独立团（营）编成独立第二师，萍乡、莲花、攸县独立团编成独立第三师。
5月6~7日	红八军和独立第十二师及茶陵独立团于莲花九渡冲地

	区给国民党军第六十三师以沉重打击，毙伤其副旅长钟钟山以下五百余人，俘千余人，缴枪近千支，其中重机枪二十五挺，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8 日	国民党军第六十三师一个营及莲花县保安团第四中队突然包围莲花浯塘村，进行大屠杀，造成骇人听闻的浯塘惨案。
29 日	红八军、独立第十二师及茶陵独立团，于莲花棠市地区截击护送辎重的国民党军第十五、第十九师各一个旅和第六十三师一个营，俘团长以下千余人，缴枪五百余支，其中重机枪四挺，还缴获电台一部、军衣两万余套，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
本月	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到湘赣根据地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
6 月上旬	独立第十二师编入红八军。
中旬	红六军团于永新组成。军团所辖部队有由湘赣红八军改编的红十七师和由湘鄂赣红五十二师改编的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红八军改编为红十七师，师长肖克，政治委员蔡会文兼。没有军团领导机关，部队暂由红十七师首长统一指挥。红十八师保留师的番号，未设师的领导机关，并将部队缩编成一个团，由徐洪任团长，苏芳任政治委员。
29 日	中共湘赣省委发布《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新的第五次围剿前夕党的紧急任务决议》。
月底	红十七师在永新市与由湘鄂赣根据地调来的红十八
师第五十二团会合。	
8 月上旬	湘赣军区警卫师及独立第一、第二、第三师分别改编为警卫团和独立第一、第二、第三团。宁冈、遂川、酃县独立营合编为独立第四团。
18 日	红十七师第四十九团和第五十一团一部，强攻茶陵梅花山地区的雪花坳之国民党军第九十五团阵地，战斗失利，伤亡三百余人。
9 月 1 日	红六军团转移到宁冈下水湾、大夫坪地区，准备打击国民党军第十五师。
4 日	红六军团进占宁冈新城。
11 日	红六军团围攻大陇不成。
26 日	红六军团在宁冈茅坪、塘南与国民党军第十五师激战，毙伤敌数百人。
10 月中旬	红六军团进逼萍乡，威胁醴陵，并以独立第三团袭击老关车站，破坏株（洲）萍（乡）铁路。
15 ~ 16 日	红六军团在萍乡以南麻山地区与国民党军陶广、李觉两支队共七个团激战。
11 月 7 日	中共红六军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永新召开。
8 日	红十七师在茶陵独立团配合下，于永（新）茶（陵）边界的梅花山、五佛岭地区击溃国民党军第十六师和

- 第十五师第四十五旅共五个团的进攻，毙敌近千人，俘八百余人。
- 21 日 中共湘赣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永新县城召开，会议通过政治、苏维埃、肃反等八项决议，产生了新的省委，任弼时为书记。
- 12 月 15 日 红六军团在护送出席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湘赣代表东渡赣江后，于万安潞田歼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第四六一团大部，俘敌团长李春光以下六百余人，缴枪五百余支。

一九三四年

- 1 月中旬 红十七师奉中革军委命令准备北上。红十八师留湘赣根据地坚持斗争，其领导机关正式组成，师长徐洪，政治委员王震（因王震去赣江以东参加苏维埃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暂由甘泗淇代理）。
- 26 日 红十七师于分宜以东的肖公庙抢渡袁水，进入湘鄂赣地区。
- 下旬 湘赣军区决定将由中央苏区调来的江西军区独立第三团和公略警卫营以及茶陵、永新独立营合编为红十八师第五十三团。
- 2 月 3 日 红十七师在奉新黄沙击溃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第五十二旅和第六十师第一八四旅，歼其第一八四旅一个营。
- 4 日 红十七师与湘鄂赣红十六师于黄沙胜利会合。
- 5 日 国民党军第十五师袭占永新龙源口。
- 6 日 国民党军第十五师占领七溪岭。
- 10 日 红十六、红十七两师由武宁以西之石口渡北渡修水，击溃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师一个营。
- 17 日 红十六师于德安大、小拗地区钳制尾追之敌，红十七师袭击德安马迥岭车站。
- 18 日 国民党军第十五师侵占永新城。
- 22 日 红十七师摆脱国民党军八个旅的围攻，由永修柘林南渡修水。
- 3 月 3 日 红十七师在修水漫江遭国民党军第五十师四个营袭击，部队英勇反击，歼敌一个营。
- 5 日 红十七师到达幽居根据地，找到中共湘鄂赣省委，并再次会合红十六师。
- 7 日 红十八师在永新城南的自在亭伏击国民党军第四十三旅。
- 8 日 红十七、红十六师冲破国民党军五个师的“合击”，经幽居根据地北侧的塔台向修水、武宁、崇阳和通山四县之交的根据地转移。
- 10 日 红十七、红十六师进至修水、武宁、崇阳、通山之交的根据地。

15 日	红十七、红十六师在修水沙湾与国民党军第十九师四个团遭遇，战斗失利，红十七师第五十团团团长李崇、第四十九团政治委员胡楚父和政治处主任曾杰等牺牲。
18 日	红十六师于浏阳县的浏阳坳将第五十团暂时编入第四十九、第五十一团。红十六师回幽居根据地活动。红十七师继续南下，向湘赣根据地转移。 红十八师在永新以北的高车岭击退国民党军第四十四旅的进攻。
22 日	红十七师由萍乡芦溪、宣风间的珠亭山强渡袁水，胜利返回湘赣根据地。
25 日	红十七师与红十八师在安福洋溪会合。
月底	中共湘赣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湘赣当前形势和红六军团的行动方针及任务。
4 月 5 日	红六军团在永新县城以西的沙市地区全歼国民党军第十五师第四十三旅，毙敌六百余人，俘旅长侯鹏飞以下官兵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二千余支、重机枪二十四挺。
15 日	红六军团于安福以西的田里与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师第一八六旅激战，毙伤敌三百余人，缴枪二百余支。
5 月中旬	红十七师恢复第五团建制，仍辖三个团。
下旬	湘赣省级机关转移到永新东南的牛田。
6 月 3 日	红六军团在永新以东金华山地区抗击国民党军第十六师和第一八六旅等四个旅的进攻，毙伤敌副旅长李国强、团长唐肃以下三百余人。
下旬	红十八师控制金华山阵地。红十七师进到松山地区防御。
7 月 1~3	日红十七师在松山地区英勇抗击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师进攻，歼敌四百余人。3 日下午，红十七师撤离松山地区，转移到永新石灰桥地区。
4 日	红六军团撤离金华山阵地，转移到永新东南的牛田和津洞地区。
18 日	红六军团围攻遂川五斗江未果。
23 日	红六军团一部围攻遂川衙前未果。 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挺进，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并与红三军（红二军团）联络。同时，指定由任弼时、肖克、王震组成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领导红六军团的行动。
下旬	红十八师第五十四团在永新牛田组成。
8 月 5 日	红军第四十九团攻占遂川衙前国民党军据点。
7 日	红六军团全部九千七百五十八人，在独立第四团的引导下，于下午 3 时由遂川横石出发，开始突围西征，

- 八日袭占遂川以西的藻林。
- 11 日 红六军团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进至湖南桂东寨前圩。
- 12 日 红六军团在寨前圩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庆祝突围胜利，并作进一步的战斗动员。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和主要领导干部任命。肖克为军团长兼红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治委员兼红十七师政治委员，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兼红十七师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十七师政治部主任，龙云为红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为政治委员，谭家述为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
- 20 日 红六军团占领新田县城。
- 23 日 红六军团继续西进，到达零陵以北的蔡家埠地区，企图抢渡湘江未果。
- 25 日 进入阳明山区。
- 26 日 红六军团在国民党重兵合围之下，东出白果市，然后急转南下，跳出敌人合围圈。31 日乘虚在道具以南的薛家厂渡过潇水。
- 9 月 2 日 红六军团于蒋家岭击溃国民党桂军第十九师一部之堵截，进入广西灌阳境内。3 日于灌阳文村击溃国民党湘军第十六师一部和桂军第十九师两个团。4 日于兴安界首以北的凤凰嘴地区渡过湘江，向西延地区前进。
- 5 日 先头团进占西延县城。
- 8 日 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依托西延山地展开游击活动，求得在城步、武冈、绥宁地区暂时立足，吸引敌人，然后再沿湘黔边境转移到凤凰、乾城、永绥地区建立根据地。
- 14 日 红六军团于绥宁西南的小水遭国民党湘军第五十五旅突袭。
- 17 日 红六军团袭占通道县城。
- 18 日 红六军团在新厂地区给国民党湘军补充第二总队以歼灭性打击，毙伤俘敌六百余人，缴枪四百余支。
- 22 日 红六军团由平寨进入贵州黎平地区。24 日在苗、侗族人民协助下，由里格北渡清水江。25 日进至清江县的凯寨、孟优，遇国民党湘军堵截，折返大厂。
- 26 日 红六军团在清江大厂地区与国民党湘军补充第一总队和桂军第二十四师遭遇，发生激战，第五十四团团长沙雄牺牲。战后，将第五十四团拆散，分别编入第四十九、第五十一、第五十二团和第五十三团。
- 10 月 1 日 红六军团于施秉、黄平间击破国民党黔军的防堵，强渡大沙河。2 日袭占旧州。
- 4 日 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沿施秉以北地区向江口方向前

- 进。
- 7 日 红六军团在石阡甘溪与国民党桂军第十九师遭遇，作战不利，伤亡近五百人。
- 15 日 红六军团一部在沿河水田坝（铅厂坝）与红三军会合。
- 16 日 红六军团主力由石阡朱家坝折转南下，后卫第五十二团陷入国民党湘军重围，奋战数昼夜，最后遭受失败。
- 17 日 红六军团主力再到甘溪。黄昏，击退国民党湘军的截堵，通过石阡、镇远大道，突出敌人重围。
- 20 日 红六军团主力在石阡公鹅坳击退国民党湘军第一一
团、黔军第四团的截堵，胜利通过石阡、江口大道。
- 23 日 红十七师第五十团与红三军会合于梵净山下的木根
坡。
- 24 日 红六军团主力与红三军在印江木黄胜利会师。

(三)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大事记

(1934年10月——1937年9月)

一九三四年

- 10月26日 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南腰界召开庆祝会师大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
- 27日 两军团领导人致电朱德、周恩来，报告红二、红六军团新的决定：两军团集中行动，向湘西北发展。
- 28日 红二、红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开始湘西攻势，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开辟新的根据地，并决定留中共黔东特委和黔东独立师继续坚持黔东斗争。
- 30日 红二、红六军团占领四川西阳县城。
- 11月7日 红二、红六军团占领湘西永顺县城。
- 13日 红二、红六军团接中革军委电示：红二、红六军团应深入湖南西北扩大行动地域。两军团主力撤出永顺。
- 16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任弼时、肖克、王震、贺龙、夏曦、关向应，指出红二军团政治领导在离开湘鄂西后的主要严重错误。
- 红二、红六军团进行龙家寨战斗，给国民党军陈渠珍部主力以歼灭性打击。
- 18日 复克永顺。
- 24日 红二、红六军团主力南渡西水未成，回师占领大庸、桑植。
- 25日 中革军委电示红二、红六军团：坚决深入湖南中部及西部活动，积极协助西方军（即中央红军），红二军团主力及红六军团全部应集中一起，以突击遭遇的敌正规部队。
- 26日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湘鄂川黔军区及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成立。
- 12月1日 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颁布《关于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
- 7日 红二、红六军团主力继续发展攻势，由大庸向南进袭沅陵，因敌有备未克，旋沿沅江东下。
- 10日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移至塔卧。
- 16日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作出创造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决议，提出根据地建设的各项任务，制定了《分田工作大纲》。
- 17日 红二、红六军团进行浯溪河战斗，歼灭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十四旅大部。
- 红二、红六军团包围常德。18日占领桃源。
-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改变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创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

- 20日 朱德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指示红二、红六军团留在常德、桃源及其西北地域活动，并派出两个别动队，分向益阳、辰州两方向活动，以牵制湘军。
- 24日 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军加紧部署对红二、红六军团的“围剿”。红二、红六军团撤离常德、桃源。26日回占慈利。
- 27日 朱德电示贺龙、任弼时、王震、肖克：红二、红六军团不应在慈利久停，应在敌人分进合攻之先，转向永顺。

一九三五年

- 1月初 红二、红六军团主力由慈利返回永顺、大庸地区。
- 4日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发出关于地方战争动员的指示。
- 6日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任弼时总结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的斗争情况，具体布置战争动员工作。
- 11日 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致电中革军委，报告反“围剿”的方针和作战计划。
- 27日 红二军团在大庸丁家溶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开展反对夏曦错误的斗争。
- 28日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颁布《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
- 2月8日 红二、红六军团进行溪口战斗，迎击敌郭汝栋纵队。红二、红六军团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 11日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红二、红六军团如何粉碎敌人“围剿”发来指示，决定成立湘鄂川黔军委分会。
- 3月14日 红二、红六军团进行高粱坪战斗，击溃国民党两个保安团，并给予湘军第十六师两个团以重大打击，歼其一部。
- 15日 大庸失守。
- 21日 红二、红六军团进行后坪战斗，应战敌李觉、郭汝栋纵队，毙伤敌近五百人。
- 22日 桑植失守。
- 31日 中共中央致电任弼时并转湘鄂川黔省委，对夏曦的错误及处理作出指示。
- 4月5日 中共中央电示红二、红六军团，认为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是存在的，仍应尽力在原地区坚持斗争，争取胜利。
- 13日 红二、红六军团进行陈家河战斗，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十八师第一七二旅。
- 15日 红二、红六军团进行桃子溪战斗，歼灭国民党军第五

月底	十八师师部和第一七四旅。16日收复桑植。 红二、红六军团主力东出，进占江垭，象耳桥，逼近慈利。
5月7日	红二、红六军团主力由江垭，慈利地区西返，于塔卧、永顺间之茶陵坡消灭国民党湘军第六十二师一个营。
6月9日	红二、红六军团包围湖北宣恩，并切断宣恩、恩施间的通道，准备打击增援之敌。
13~14日	红二、红六军团进行忠堡战斗，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师师部和第一二一旅，俘敌纵队司令张振汉。
23日	红二、红六军团开始围困龙山。
7月初	红二、红六军团与中革军委中断密码电讯联系。
3日	红二、红六军团进行小井战斗，击溃增援龙山之国民党军陶广纵队。
10日	红二、红六军团进行象鼻岭战斗，击退了国民党援军独立第三十八旅。
15日	红二、红六军团进行胡家沟战斗，迎击国民党援军黄新纵队五个团。
27日	红二、红六军团放弃对龙山之围困。
28日	红二、红六军团进行招头寨战斗，与敌陶广纵队激战一天，阻止了其对龙山的增援。
8月3日	红二、红六军团进行板栗园战斗，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毙敌师长谢彬，俘虏千余人。
8日	红二、红六军团进行芭蕉坨战斗，击溃敌陶广纵队十个团。
20~27日	红二、红六军团主力东出津市、澧州地区，占领石门、临澧、澧州、津市。其间，26日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为号召全国民众保卫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卖国罪魁蒋介石的宣言》。
9月上旬	红二、红六军团撤离津市、澧州地区，集结于石门西北的维新、仙阳、大兴、磨岗隘一带。
29日	红二、红六军团在磨岗隘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任弼时代表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中革军委分会总结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动员粉碎国民党军更大规模的“围剿”。
30日	红二、红六军团电台收到中革军委电台的联络信号。任弼时及其他领导人用密码致电周恩来，进行联络。朱德、张国焘根据任弼时等29日致周恩来的密码电报复电红二、红六军团，提出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
10月上旬	红二、红六军团致电朱德、张国焘，建议部队主力转移至黔东石阡、镇远、黄平地区。
15日	朱德、张国焘复电指示：红二、红六军团“在狭小地区内固守为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可轻于尝试，远征减员必大，可否在敌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堡垒，以进攻路线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之。”

- 19日 朱德、张国焘再次致电红二、红六军团，重申15日指示的方针，并提出如何行动由红二、红六军团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 11月4日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及中革军委分会于刘家坪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向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实行战略转移，并对转移行动作了具体部署。新组建了红五、红十六师两个师部又五个团。
- 19日 贺龙代表中革军委分会下达突围命令。部队当晚从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 20日 红二、红六军团在张家湾一带冲破国民党军澧水封锁线。
- 21日 红二、红六军团占领洞庭溪、大宴溪，消灭国民党军一部，突破玩江封锁线。
- 23~28日 红二、红六军团占领辰溪、浦市、溆浦、新化、兰田和锡矿山等城镇。
- 12月11日 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退出湘中，向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
- 22日 红二、红六军团进行瓦屋塘战斗，攻击敌陶广纵队第六十二师。
- 24日 红二、红六军团由竹舟渡过巫水，转向北进。26日占领锦屏，27日从江西街、托口渡过清水江。同日，收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来电，《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案》摘要。

一九三六年

- 1月1日 红二、红六军团到达冷水铺地区。3日占领龙溪口、晃县，4日占领玉屏。
- 5日 红二、红六军团进行便水战斗，拟集中主力歼敌李觉纵队先头部队，因敌援兵猛烈反击，被迫撤回原阵地。
- 9日 红二、红六军团占领江口。留在黔东根据地执行掩护任务的红十八师，突围后归还红六军团建制。
- 12日 红二、红六军团进抵石阡，胜利完成了转移石阡地区的任务。
- 19日 中革军委分会召开石阡会议，检查总结突围以来的战斗行动，分析面临的形势，决定继续西进，争取在贵州西部创建新的根据地。
- 21日 红二、红六军团开始由石阡西进，当日突破镇（远）、黄（平）、余（庆）封锁线。24日占领瓮安。26日占领平越，歼敌一个营。27日占领洗马河和龙里，威逼贵阳。31日占领扎佐、修文，造成由息烽北渡乌江的态势。

2月2日	红二、红六军团袭占鸭池河，并渡过乌江，占领黔西县城。
5日	中革军委分会召开黔西会议，决定部队实行战略展
开。	红四、红六、红十七师迎击东北方向急进之敌，红五、红十六师西取大定、毕节。6日占领大定。
8日	中共川滇黔省委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9日	红二、红六军团占领毕节。
14日	黔西县城失守。
17日	红二军团进抵大定。
18日	大定县城失守。
19日	红二、红六军团进行将军山战斗，歼敌六个连，毙俘敌四百余人。
27日	中共川滇黔省委和中革军委分会决定放弃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转向安顺地区。
3月2日	红二、红六军团召开野马川会议，决定转战滇东地区。同日，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牺牲。
4日	红二、红六军团到达回水塘、妈姑。5日占领柯科。7日进至奎香、恒底、板底地区。
8日	红二、红六军团主力由寸铁坝和奎香返回五十里，在以则河地区反击尾追之国民党军樊嵩甫纵队。9日折转奎香、恒底地区。12日红二、红六军团进行得章坝战斗，毙伤敌万耀煌部一百二十余人，俘二百余人。
16日	红二、红六军团绕回奎香，柯科地区。
17~22日	红二、红六军团在昭通、威宁之间南下，进至云南东部地区。
23日	红二、红六军团进行来宾铺战斗，重创滇军刘正富旅，毙敌四百余人。
	朱德、张国焘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提及红二、红六军团渡金沙江北上事宜，但无肯定性意见。
28日	红二、红六军团进至盘县、亦资孔地区。
29日	红二、红六军团致电朱德、张国焘，请求决定部队行动。30日朱德、张国焘来电，指示红二、红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起北上。
31日	红二、红六军团撤离盘县，分两路向普渡河渡口急进。
4月6日	红二、红六军团进抵云南寻甸。
8日	红二、红六军团进行音翁山及款庄、小松园战斗。战斗中，红四师政治部主任肖令彬阵亡，红六军团在不利形势下转到可郎。
9日	红二、红六军团进行六甲战斗，毙敌四百余名，给滇军龚顺壁旅以沉重打击。
10日	红二、红六军团转向昆明方向行动。11日占领富民。
12日	红二、红六军团致电朱德、张国焘，报告了部队向巨

甸前进并设法在该地渡江的意图，请求予以接应。

- 15日 红二、红六军团渡过普渡河后，占领楚雄、盐兴。16日占领镇南，牟定。17日占领姚安。18日占领祥云、盐丰。20日占领宾川。23日占领鹤庆。以破竹之势，横扫滇西。24日中革军委分会在鹤庆召开会议，确定了北渡金沙江的部署。当日，红四师占领丽江。
- 25~28日 红二、红六军团分两路到达石鼓、巨甸，由此胜利地渡过了金沙江。
- 30日 红四师越过哈巴雪山，到达中甸县城。
朱德、张国焘致电祝贺红二、红六军团胜利渡过金沙江。
- 5月1~3日 红二军团直属队和红五，红六师以及红六军团所属部队全部到达中甸及其附近地区。
- 5日 红二、红六军团决定分两路从中甸出发，红六军团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红二军团经德荣、巴塘、白玉，向甘孜前进。
- 10日 红二军团占领德荣。
- 13日 红六军团占领定乡。
- 22日 红六军团占领稻城。
- 30日 红六军团离开稻城，向理化进发。
- 6月3日 红六军团在理化以南之甲洼，与前来迎接的红三十二军会合。
- 7日 红六军团到达理化县城。
- 17日 红六军团经巴塘进至白玉县城。
- 22日 红六军团到达甘孜普玉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受到红军总司令部首长和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的迎接。
- 30日 红二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与红三十军会师。
- 7月1日 红二、红六军团全部到达甘孜及其附近地区。
- 2日 在甘孜举行庆祝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盛大联欢会。
中共中央电贺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
- 5日 中共中央军委颁布组成红二方面军及干部任职的命令。
- 11日 红二、红六军团由甘孜的东谷出发，开始北上。
- 23日 红六军团到达阿坝。
- 26日 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红二军团到达阿坝。
- 27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
- 8月8日 红二方面军到达包座。
- 9日 任弼时在救济寺发出给贺龙、关向应、肖克、甘泗淇的信，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迎接红一、红二、红

	四方面军大会合提出了要求。
11 日	红二方面军到达阿西、巴西。
16 日	贺龙、肖克、关向应复电任弼时，赞同其对过去党内斗争采取的立场。
25 日	红六军团到达哈达铺地区。
9 月 1 日	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红二军团先头部队到达哈达铺。
	红六军团进至礼县并攻打县城。
6 日	红二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全部到达哈达铺地区。
7 日	红二军团第五师改编为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
	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制定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计划。
8 日	红二方面军发布《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
11~12 日	红二方面军按预定计划开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行动。
17 日	红二方面军占领成县。18 日占领两当、徽县。19 日
占领康县，并围攻凤县。	
21 日	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表示拥护静（宁）会（宁）战役计划。
27 日	红二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在成县伏击国民党军王钧部第三十五旅，给敌以沉重打击。
10 月 1 日	红二方面军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对部队行动提出建议。
2 日	中共中央复电同意放弃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地区，迅速北上。
3 日	红二方面军在徽县发布北进会合红一方面军的命令。
4 日	红二方面军放弃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地区，开始向北转移。
10 日	红二方面军渡过渭水。
22 日	红二方面军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至此，红二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
11 月 21 日	红二方面军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进行山城堡战役。
30 日	任弼时提出《关于二、六军团长征的总结与二方面军发展前途及目前任务报告大纲》。
12 月 12 日	红二方面军奉命由环县到达陕西三原地区，准备打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19 日	红二方面军政治部提出《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总结报告》。

一九三七年

1 月	红二方面军加紧部队建设和训练，为抗日战争进行准备。
2 月	红二方面军开始整顿部队党的组织。

- 3 月 红二方面军在陕西铜川陈炉镇召开党代表大会，任弼时作政治报告，贺龙、关向应、甘泗淇讲话。
- 4 月 红二方面军积极参加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维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及全党的团结、统一。
- 5 月 30 日 红二方面军举行运动大会。
- 7 月 7 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
- 8 月 25 日 遵照红军总指挥部命令，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第一二 师。
- 9 月 2 日 部队在陕西富平庄里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 3 日 部队由庄里镇出发，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